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Yangtze IDEI

2017

# 长江产经圆桌会

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南京大学）

# 简介

“长江产经圆桌会”是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根据网络信息时代学术交流和信息传播的特点，在全国首创的线上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学术、政策研讨活动。它由院长刘志彪教授牵头，定期围绕政府重视、企业关注、民众涉及的重大经济事件和热点话题，以电子问卷的形式广邀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官员和企业家独立发表真知灼见。该圆桌会近年来在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下，以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为出发点，以服务中国政府战略决策为宗旨，以引导社会舆情为己任，秉持“热情·专业·理性”的理念，寻求理论分析、政策阐释和应对策略。

收录本集的这些文章，经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官方公众号“长江产经智库”推送，共获得了数十万点击量，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及良好的舆论效应。我们将以往的研讨内容按年度汇编成册，作为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研究成果之一，并面向社会公开发布，以飨读者。

# 目录


1 重大结构性失衡下如何加快形成经济发展新动能？ 1

2 如何发挥外资对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13

3 发展智能制造与振兴实体经济 23

4 为什么现阶段资金不肯流入实体经济？ 31

5 县域经济的地位及其在供给侧结构改革中的作用 40

6 长江产经智库新年百人调研：中国经济的回首与前瞻 46

7 积分落户制的合理性及其背后公共福利不均等问题 60

8 恢复房地产消费品属性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 66

9 如何发挥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国企改革重要突破口的作用 70

10 你最期望提交全国两会的国是提案是什么？ 78

11 如何给民营经济减负？ 90

12 中国制造该何去何从？ 99

13 两会观察 | 中国经济有底气有信心 106

14 关注两会 | 长江产经智库学者看 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 109

15 经济转型升级时期更需要鼓励和保护企业家精神 120

16 当前形势下如何防控金融风险 134

17 如何看待体制内外人才的流动？ 146

18 江苏如何聚焦富民？ 154

19 如何推进结构调整和新旧动能转换，有效防控风险？ 161

20 “一带一路”战略下，长三角地区如何有效发挥作用？ 172

21 中国是否已经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184
22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考 194
23 如何看目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及未来经济走势？ 199
24【纪念恢复高考 40 周年】
中国急需再次启动类似积极向上的简单而重大的改革 214
25 如何看待和规范地方政府债务 223
26 长江产经智库关于完善中国资本市场制度建设的九点建议 229
27 飞地经济的发展：定位、动力与协调 233
28 驱动产业创新升级的金融制度 241
29 如何看待目前的外贸形势 253
30 大湾区与长三角地区的发展比较、转型问题 264
31 对当下人才竞争的看法 273
32 那头“灰犀牛”，会不会撞了年轻的中国市场经济的腰？ 282
33 互联网平台企业扩张：欢呼还是忧患？ 287
34 互联网产业发展 297
35 供给侧收缩的影响：像雨像雾又像风？ 305
36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大规模兼并重组 310
37 长江产经智库学者齐聚姑苏，共话未来中国新动能与新产业 317
38 如何在产城融合中发展特色小镇 321
39 如何打造江淮生态大走廊 327
40 如何建设扬子江城市群 332
41 美国缩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337
42 如何建设和发挥优秀企业家精神 342

43 悠闲地宅还是勇敢地堵？——我看长假大家谈 351
44 长江产经智库专家解读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 356
45 当代技术变革趋势、特征、影响及江苏应对策略 363
46 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与修昔底德陷阱及江苏策略 371
47 在环保约束下后发地区如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377
48 美国税改：中国的对策 387
49 当前和未来如何推动高质量发展 396
50 从医患对立事件看医改方向 404
51 如何改进政绩评价机制，推进高质量发展 411

# 重大结构性失衡下如何加快形成经济发展新动能？

2017 年 1 月 4 日

**编者按：**2016 年 12 月 14 日至 16 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 2017 年的经济工作进行了总体布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组合，是当前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五大支柱性政策。其中产业政策要准，就是要准确定位结构性改革方向。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不畅，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

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据此提出了“重大结构性失衡下如何加快形成经济发展新动能？”这一议题，并引导群内各行业专家、学者展开讨论、提出建议。

## 结构性失衡的现状

**刘志彪（长江产经院）：**

当前在新动能形成的过程中，面对经济分化要着力避免的不良倾向有：一是实体经济衰弱无力，但虚拟经济虚火旺盛，资源都流入虚拟经济领域，危及实体经济生存环境；二是一些一线城市房地产价格上升过猛，而三四线城市库存消化任务艰巨；三是民营企业投资下降太猛太快，而资源都流入国有企业，以及地方政府的各种融资平台。这些结构严重失衡的现象，绝不是供给侧结构改革所意欲的政策目标，而是重大经济结构失衡的表现。

**彭本红（南信大）：**

政府放开的地方都有可能产生新动能，管得死的行业或领域难以出现新动能，因为效率太低了。

**杜运苏（南京财经大学）：**

重大结构失衡现在基本上很清楚了，现在出口不行了，只要转向内需，这个失衡慢慢就降低了。难点在于新动能形成。在没有重大科技革命情况下，形成新动能过程较为缓慢。互联网

+ 的新动能，中国把握得比较好，但已经释放了相当部分，后面可能要寄希望于新能源等战略性产业，而这些产业，中国优势并不显著，需要政府和企业共同努力。

**张建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重大结构性失衡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消费品不能满足消费者对其品质的需求；二是建材类产品因基建规模趋少而显过剩。前者的供给主体是民企，后者是国企。

解决民企供给品的品质不高，从三个方面解决：技术创新、质量体系以及健全法制。解决国企产能过剩，除了国际产能合作外，还要真正淘汰僵尸企业，向市场释放那些呆滞的资源。

**盛文军（人行杭州中心支行）：**

现状：

（1）制造业投资乏力。从今年实际情况看，制造业投资增长乏力的直接原因是新的投资增长点不足，而根本原因则是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相对滞后。因此，寻找新的投资增长点，再造制造业投资增长动力机制，根本途径有两条：一方面，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提高产业附加值和竞争力。

（2）企业效益下滑和信心不足仍未根本改观，可能影响投资增长的可持续性。实体经济层面企业信心的修复和恢复及上行，是保持投资平稳较快增长的重要基础。

（3）金融平稳运行压力较大，投资要素保障工作仍需进一步加强。目前，实体经济融资难问题还没根本缓解，预计下阶段，资金仍是制约有效投资较快增长的因素之一。

**何 雨（江苏省社科院）：**

现在民企遭遇困难，其实有两个方面的关系没有平衡好：一个是国企与民企的关系；二个是劳资双方的关系。

中国民营经济要想好起来，除了要平衡国企与民企关系，还必须平衡劳资关系。这是我理解的结构性失衡要点之一——需要再平衡。

**张月友（南京财经大学）：**

重大结构性失衡的表现形式是供给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升级的需要，导致中国经济一方面存在无效供给，另一方面又存在供给短缺。前者是存量的问题，后者是增量的问题。前者的主要表现是工业领域的产能过剩，后者的主要表现既有高端制造业供给不足，又有新兴产业供给不足，但主要是服务业供给不足。重大结构性失衡的核心在供给侧的存量上，表现在经济任务上，是“三去一降”。

**孙月平（江苏省委党校）：**

房地产市场是重大结构性失衡的一个重要领域，表现在供给和需求的失衡、一二线和三四线城市的失衡、“住”和“炒”的失衡等等。

我的基本判断，未来房地产市场培育发展新动能的基本方针应当是“稳中求进”，“稳”就是不要大涨大跌，“进”就是通过农民工转户、基础设施互通等办法推进三四线城市去库存，改进保障房的建设和分配解决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改革教育、社保等制度促进租房市场发展等。

**姜彩楼（南信大）：**

中国经济失衡可以从供需失衡和科技创新与生产环节失衡两个角度来理解。近年来，国内生产能力成长很快，但是与消费需求相比较，目前有相当比例的消费需求倾向选择海外产品，供需结构性失衡现象比较严重。企业是创新的主体，由于长期追求“短平快”的生产模式，我国企业研发部门不强，难以为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实质性支撑，这一老大难问题需要得到彻底解决。

**史先诚（江苏省金融办）：**

供给侧结构性失衡的本质，是供求关系失衡严重。农产品、工业消费品、装备机械的国内供给与需求都相去甚远，导致低端供给严重过剩，高端严重依赖进口。沉没成本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社会成本高（导致国企和民企软预算约束），产业创新转型升级的难度大，结果是徘徊在失衡和痛苦之中。

**结构性失衡产生原因**

**杨平宇（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从供给侧角度来看，结构失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高质量需求供给不足，和低质量需求供给过剩。产品供给不足的原因又可以分为行业垄断、技术能力不足两种情况。

**张 晔（南京大学）：**

央企控制了中国经济的大量上游产业，例如油、电、气、钢铁、矿等基础能源行业以及土地，使得制度成本过高。比如为什么京沪南京的房价高，就是因为必须从土地财政获得发展资金。为了获得最大收益，政府自然会像教科书里的垄断厂商一样行事。

雾霾的起因是偷排，偷排的理由是降成本，降成本的原因是税负高，税负高的原因是要养活诸如环保局（部门规格提升了）等部门人员，这些人要养活的原因是要他们治污。

**于晓华（哥廷根大学）：**

我对于“基础产业被国企垄断，所以能源等价格很贵”这一观点有不同意见，把自然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联系起来是不对的。这些行业本来就是自然垄断行业。私营一样会出现高价甚至更高价，比如在德国，能源价格就很贵，这和所有制没有很大关系，相反，国企还可以对价格进行控制，比如国内的民用电价格就很便宜。所以关键是要管制：加强反垄断，同时增加竞争力。比如钢铁行业因为没有管制造成过度竞争、产能过剩；电信、能源行业过度管制使得供给不足。对自然垄断行业的规制，需要产业组织理论来支撑。但是国内学界对此研究很落后。

**孙 军（淮海工学院）：**

我国严重结构性失衡的原因在于消费不足，投资过多。投资必然形成产能，过去投资过多形成的产能通过对外出口化解。目前全球经济萎缩，贸易壁垒加大，在发展模式不变的情形下，新的投资必将形成新的产能过剩，过低的回报率与货币漫灌推高房价和股市泡沫，抑制了实体竞争力，加大了社会扭曲。

**宋凌炎（江苏精诚 & 精缦毛毯）：**

我认为失衡与企业和体制都有关系。

（1）企业管理创新不够。当下很多企业都没有认真地去思考问题，而是一味地抱怨与责怪外界因素。去年我们进行了管理创新，公司员工从原来的 600 多人一下子减少到了 300 多人，实践证明，人员少了生产效率反而提高了，同时产品质量也提高了，这个过程中我们还增加了自动化设备促进自动化生产流程。

（2）产品创新理念不够强，一直觉得客户要求高。用更多的精力去做好一个高端客户，对企业而言可以积累经验与信心。“企业的利润在于品质”是理念上的创新，创新理念让企业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3）人才创新不足，需要不断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人才。以国际视野看中国制造。希望政府能放低人才引入政策，可以更好地推动创新。政府部门的体制（特别是教育部门）要有助于企业引进人才。

**陈 柳（江苏省社科院）：**

重大结构性失衡，根本上指的是供需失衡：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不能满足国内需求变化。低端产品过剩与全球贸易周期、中国产品成本上升等因素有关，高端产品不足当然与创新能力不够相关，但两者的深层次原因还是制度扭曲导致的要素错配，即制度原因导致在低端产品上配置的资源无法较快的出清或撤出，转移到高端产品和产业上来。

**毛 强（中央党校学报）：**

国民生产总值中政府税收、企业利润、居民收入比例的严重失衡，同样也是重大的结构性失衡，这些年却一直在恶化之中，制约了消费能力的提升。

**李 群（南京审计大学）：**

重大结构性失衡一般在两种情况下发生：一是经济周期性波动导致的，二是政府人为干预导致的。若是经济周期性波动导致的，一般通过市场的自我调节就能解决；若是政府干预导致的，那就先解决政府自身的问题。我国加快形成经济发展新动能的根本方法简单说来一句话：将政府行政干预经济的“权力关进笼子里”，真正做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就能立即释放出巨大的新动能。

**姜德波（南京审计大学）：**

供给侧改革、供求失衡，根本原因是中高端消费者对国产品没有信心；而缺乏信心的关键是国内质量体系不健全。在国外买到的国产商品经外国检验机构检验，便有了质量保证，价格也提高了很多。所以，解决失衡下的经济发展动力机制，应该从经济软环境着手，构建信用、质量保证体系，严惩失信企业，逐步树立中高端消费者对国产品的信心，这才是政府要做的事情，其它让市场去解决。

**钟永一（江苏省社科院）：**

在欠发达国家，市场失灵尤为普遍。有效的政策就需要对这些市场失灵现象进行区分——哪些可以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哪些需要政府发挥作用。而我们的问题是，“强政府”无视前一种情况。

**鲁明泓（长江产经智库特约研究员）：**

| BUSINESS CYCLE REFERENCE DATES | | DURATION IN MONTHS | | | |
|---|---|---|---|---|---|
| Peak | Trough | Contraction | Expansion | Cycle | |
| *Quarterly dates are in parentheses* | | *Peak to Trough* | *Previous trough to this peak* | *Trough from Previous Trough* | *Peak from Previous Peak* |
| | December 1854 (IV) | -- | -- | -- | -- |
| June 1857 (II) | December 1858 (IV) | 18 | 30 | 48 | -- |
| October 1860 (III) | June 1861 (III) | 8 | 22 | 30 | 40 |
| Aprill 1865 (I) | December 1867 (I) | 32 | 46 | 78 | 54 |
| June 1869 (II) | December 1870 (IV) | 18 | 18 | 36 | 50 |
| October 1873 (III) | March 1879 (I) | 65 | 34 | 99 | 52 |
| March 1882 (I) | May 1885 (II) | 38 | 36 | 74 | 101 |
| March 1887 (II) | April 1888 (I) | 13 | 22 | 35 | 60 |
| July 1890 (III) | May 1891 (II) | 10 | 27 | 37 | 40 |
| January 1893 (I) | June 1894 (II) | 17 | 20 | 37 | 30 |
| December 1895 (IV) | June 1897 (II) | 18 | 18 | 36 | 35 |
| June 1899 (III) | December 1900 (IV) | 18 | 24 | 42 | 42 |
| September 1902 (IV) | August 1904 (III) | 23 | 21 | 44 | 39 |
| May 1907 (II) | June 1908 (II) | 13 | 33 | 46 | 56 |
| January 1910 (I) | January 1912 (IV) | 24 | 19 | 43 | 32 |
| January 1913 (I) | December 1914 (IV) | 23 | 12 | 35 | 36 |
| August 1918 (III) | March 1919 (I) | 7 | 44 | 51 | 67 |
| January 1920 (I) | July 1921 (III) | 18 | 10 | 28 | 17 |
| May 1923 (II) | July 1924 (III) | 14 | 22 | 36 | 40 |
| October 1926 (III) | November 1927 (IV) | 13 | 27 | 40 | 41 |
| August 1929 (III) | March 1933 (I) | 43 | 21 | 64 | 34 |
| May 1937 (II) | June 1938 (II) | 13 | 50 | 63 | 93 |
| February 1945 (I) | October 1945 (IV) | 8 | 80 | 88 | 93 |
| November 1948 (IV) | October 1949 (IV) | 11 | 37 | 48 | 45 |
| July 1953 (II) | May 1954 (II) | 10 | 45 | 55 | 56 |
| August 1957 (III) | April 1958 (II) | 8 | 39 | 47 | 49 |
| April 1960 (II) | February 1961 (I) | 10 | 24 | 34 | 32 |
| December 1969 (IV) | November 1970 (IV) | 11 | 106 | 117 | 116 |
| November 1973 (IV) | March 1975 (I) | 16 | 36 | 52 | 47 |
| January 1980 (I) | July 1980 (III) | 6 | 58 | 64 | 74 |
| July 1981 (III) | November 1982 (IV) | 16 | 12 | 28 | 18 |
| July 1990 (III) | March 1991 (I) | 8 | 92 | 100 | 108 |
| March 2001 (I) | November 2001 (IV) | 8 | 120 | 128 | 128 |
| December 2007 (IV) | June 2009 (II) | 18 | 73 | 91 | 81 |
| Average, all cycles: | | | | | |
| 1854-2009 (33 cycles) | | 17.5 | 38.7 | 56.2 | 56.4* |
| 1854-1919 (16 cycles) | | 21.6 | 26.6 | 48.2 | 48.9** |
| 1919-1945 (6 cycles) | | 18.2 | 35.0 | 53.2 | 53.0 |
| 1945-2009 (11 cycles) | | 11.1 | 58.4 | 69.5 | 68.5 |

* 32 cycles
** 15 cycles

上图是美国 1854 年至 2009 年 33 个完整的商业周期。155 年中经历了 33 个完整的周期，平均每 4.7 年一个周期。收缩期平均 17.5 个月，二战后的收缩期平均 11.1 个月。说明不到 5 年有一次衰退，每次衰退不到 1.5 年，近 70 年来衰退甚至不到 1 年。因此，我觉得如此频繁的商业周期和较短的衰退应该与技术革命、创新、新动能关系不大，而更多地与宏观经济管理、市场调节机制等相关。

## 结构性失衡下的经济发展对策

### 刘志彪（长江产经研究院）：

主动推进经济分化，尽快让新动能替代旧动力，重要的是要认清形势，提高思想认识和明确政策取向：

第一，要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高度，全面理解、认识和处理现阶段的经济分化问题。一是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在这个基本方向约束下，促进经济分化其实是发展的手段，不是目的。要通过推进经济迅速分化，最大限度地降低发展的社会成本，以短痛换取忍受长期的折磨，从而有利于解放和发展，而不是束缚社会生产力。二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既然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就要主动让市场机制、企业和企业家在经济分化中发挥自我调节的功能，政府要通过微观制度改革，释放市场主体的活力，为加速分化创造良好的环境。尤其是对“僵尸企业”，要按照市场竞争规律的要求，斩钉截铁地处置，就像权威人士所讲的，该“断奶”的就“断奶”，该断贷的就断贷，坚决拔掉“输液管”和“呼吸机”。

第二，各地区、各行业、各企业都要主动适应新常态、重视创新和提升质量效益。过去一些年中，在经济加速分化过程中，我国涌现出了一批有活力的地区、有国际竞争力的行业和企业，以及在国内外都叫得响的著名品牌。实践证明，凡是主动适应、引领发展新常态的，重视创新和质量效益的地方和企业，其发展态势都比较好；反之，压力和困难就会比较大。这一发展新常态目前还在延续，甚至在加剧。未来在经济分化中，我国将不断冒出更有活力的地区、更具国际竞争力的行业和企业，但同时有些地区、行业和企业日子也会越来越难熬，必须有充分的思想、政策和行动准备。

第三，推进经济分化的根本原则，必须破除预算软约束，推进预算硬约束。经济分化虽然在微观上由竞争机制驱动，但是这只是外力的作用。对于促进经济加速分化进程来说，光提倡竞争还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要有现代企业制度的配套。一方面，严重的产能过剩与企业、地方政府的软预算约束有直接的关系；另一方面，软预算约束机制是阻止经济分化的主要的制度性力量，也是市场出清的主要障碍。很显然，如果市场主体在投资决策时，从不用担心失败后的退出，那么投资和产能一定是膨胀的和低效的；如果它们在竞争中失败了，又可以受到软预算约束机制的保护而不用破产清算、不用追究任何主体的决策责任，那么我们就根本无法实现经济的分化，资源也不会自动进入创新领域。

第四，要以精准的产业政策引导经济分化和资源流动。首先，产业政策在现阶段的功能，应该主要定位于弥补市场失灵和失败。它的作用不是替代市场，而是在市场的基础调节和完善市场，解决因市场缺陷而忽视公共利益的问题。其次，是要把握产业政策作用的方向和主要内容，重点是要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产业向中高端迈进。为此要在中高端共性技术、人力资本供给等方面，提升生产要素的质量，鼓励技术创新的政策氛围形成。最后，就是要改进产业政策实施的方法，按照国家产业发展目标的要求，对市场主体进行精准的激励。如可以把事前

补贴改为事后奖励，提高产业补助资金使用效率；还可以把对生产者的补贴改为对消费者的补贴，以刺激市场扩大，等等。

**张俊芳（东方国际）：**

产业结构调整也是资金流向的疏导而非运动似主导，比如养老产业没人愿意盖养老房，政府可以研究如何利用法律政策让这个产业良性循环。为了解决结构失衡，上市公司的资金应该规定除了企业正常并购不可投资地产炒股等。

中国政府应该鼓励民间企业在海外赚钱，并给予税收优惠，这样让经济良性循环。美国的税是联帮税管联帮开销，州税、销售税供州政府用，食品等基本需求没有销售税，房屋地产税供警察局和学校用，这样就永远没有卖地的问题了。中国的税有许多不确定性，任何部门可以随意收税费是很可怕的。

**王思彤（江苏省统计局）：**

解决失衡问题，直观感觉是，把过高的压压低，把过低的拉拉高，两种方式都能起到恢复平衡或者再造平衡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双管齐下，可能效果更快，寻找新动能只是在低的一端发力，属于偏方。所以，既要补短板，也要限产能。同时开展研究会更好。

**孙国民（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关于重大结构性失衡及发展新动能问题：

一是从供需情况看，对于国内供需结构的失衡问题，本质上是投资失衡导致的产出失衡问题。因此，生产端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以高质量服务消费结构升级为前提。

二是解决“软预算约束”问题。个人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十六字方针”还没有彻底完成，需要进一步深化制度改革，甚至要实现某种制度上的改革突破。围绕产权问题，可以进一步优化，如扩大资本规模（如增资扩股等），提升运营效率，优化治理结构（如引入战略投资者，不一定非要是国外的战略投资者，国内的也可以）等。在绝对控股的某些领域，可以尝试临界控股权的试点，更多更好地尝试通过市场这只“无形之手”优化资源配置，平衡供需结构性失衡问题。

三是关于加快发展新动能的问题。在现有供需结构受制于全球消费结构、国内市场消费需求结构以及“软预算约束”的情况下，一种是“被动”适应需求结构的转型，即消费需求“盯住型”动能培育模式；另一种是“主动”引领和创造需求，进而优化升级需求结构、带动新动能的发展，即消费需求“创造型”动能培育模式。

**刘根荣（厦门大学）：**

对于所有制结构因素导致的重大结构性失衡有赖于政府行为规范化，以及对国企改革的推进。建议推进过剩产能行业国企间的兼并重组，鼓励有能力的国企实施“走出去”战略，实现

过剩产能的国际转移与优化布局。现在传统产业，特别是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企业应该是去产能的重点，可以通过征收排污税大幅提高其环保成本，利用经济手段解决问题，而不是通过行政手段强制去产能。

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关键在于完善市场机制，特别是要完善资本市场，推进贷款利率市场化，形成支持产业发展的投融资机制。同时要关注国内市场需求变动带来的新机遇、新产业。国内消费结构升级，特别是消费者追求高品质生活，如健康快乐绿色休闲的消费新理念，将带动包括体育运动与器材产业、卫生保健产业、绿色食品产业、旅游度假产业、休闲娱乐产业的发展。

**杨 锐（苏州大学）：**

加快形成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微观路径是，政府全力支持行业龙头（民营）企业的基础性研发。

**张建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重大结构失衡下加快形成新动能的一个思路是：构建国家科技创新能力，以此抓住新工业革命的机遇。国家科创能力有三个力量：大众的“双创”、国有科研部门和企业。双创非常活跃，但属于散户型的，难以获得根本性技术突破；国有科研部门，如高校和科研院所，沉淀了大量的科技创新资源，或者利用率低，或者科技成果不能向企业释放；企业方面现在能在市场竞争中担纲大任者还不多。我认为，应当建立国家多区域多层次的科创中心，并把这些中心连接成为覆盖全国的网络，以此把新工业革命的潜在机遇转化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新动能。

另外还需要重视农民问题。改革开放初期，农民成就了乡镇企业，形成了强大的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新动能。后来，农民进城务工（如餐饮，家政，等等），改变了城市的分工结构，增加了城市人的休闲时间，这些从家务和低端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城市人带动了庞大的旅游业，丰富了经济结构、增加了新动能。现在到了应当真正把农民市民化的时候，市民化后提供两个动能：一是进城的各种消费和投资创业，二是新农村建设，达到城乡一体化。

**孙军（淮海工学院）：**

一是改变土地财政模式，加快新型城镇化步伐，这一方面会化解产能过剩，另一方面会提高内需；

二是加快放开各类垄断性行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这包括石油、天然气、电讯、金融、医疗卫生，教育、媒体、文化等；

三是降低物流、各种费用，切实降低企业运用成本；四是逐步利用一带一路战略走出去。

**盛文军（人行杭州中心支行）：**

结构性调整中如何发挥金融的作用?

一是货币政策要坚决支持扶优劣汰，信贷优先支持有效益、有市场、有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

二是对符合产业发展导向行业中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给予优先信贷支持，而无所有制限制。

三是尽快研究推出扩大投贷联动试点商业银行的范围，并继续差别货币政策待遇。

四是证券市场对并购重组的上市公司加大支持力度，鼓励有实力的非上市公司并购上市公司。

五是相关基金主管部门加强政策协调，研究推出产业基金、债券基金、股票基金等统一审批步伐。

六是加快金融尤其是民间资金进去垄断性行业和领域步伐，逐步解决投资难问题。

加快投资增长的对策建议：

（1）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

（2）提振民间投资。

（3）加大体制机制改革力度，进一步深化关键领域改革扩大有效投资。

（4）有效化解投资风险，进一步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5）加快发展能有效服务扩大投资及实体经济转型的直接融资体系。

（6）积极深化金融产品创新，推动解决实体经济的融资担保问题。

（7）创造条件支持促进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并进一步完善金融组织体系。

**张国华（发改委 TIS 规划院）：**

首先，在面对新兴的商业模式时，政府出台监管规定不能操之过急，在保障服务安全可靠的基础上，行业具体如何发展、如何组织？应该先让企业通过市场竞争得出结果，而不是一上来就用具体的法律法规限制死。同时，我们要改革我们的治理体系，让所有相关利益主体：政府、企业、智库、个人都参与其中，有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和方式。另外需要重新认识在新型城镇化道路上人口和土地的对应关系。在中国过去 30 多年城镇化发展中，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从城市建设规划的学术理论界到技术行业，已经形成一个惯例——“一万人对应一平方公里的城市建设用地”。这样的关系是来自于前苏联时代“以人定地、以地控人”的计划经济规划思维。

**张月友（南京财经大学）：**

纠正结构性失衡培育新动能的关键在“一补”。既取决于通过创新突破供给技术的约束，也取决于将存量资源向增量发展的转移，其实质是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将存在过剩产能的传统工业领域的人才、资金、土地等要素转移到服务业领域中去，其结果意味着中国进入服务经济具有历史必然性。调节结构性失衡，靠市场机制解决“一补”的增量问题，其关键在于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发挥政府作用”必须给“让市场主导”让路。在存量领域，市场调节机制失效，“发挥政府作用”和“让市场主导”要双管齐下。

**战岐林（山东工商学院）：**

“重大结构性失衡”是指供给的质量偏低，不能满足人民增长了的高质量需求。对策：

第一，研究为什么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无法推进，找到破解之道。该问题解决了，供给质量自然会提高，结构性失衡就消失了。

第二，研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之外的办法，另辟蹊径，寻找经济发展新动能。

要“推动”创新和创业，我觉得方向上不大对头。创新，是有高回报的，受需求刺激，寻觅商机，只要没人拦着，企业自会去做。根本无需政府推动，只需提供一个专利保护制度环境即可。

**夏网生（江苏省商务厅）：**

从政府层面看，一方面，需要基层干部继续发扬开拓创新的精神，体制机制和管理方式的创新也是新动能。另一方面，容错机制与追责机制要并行而施，新动能主要在基层。

支持新兴产业的方式很重要，初期风险投资、后端产业化中加入一定的政府采购，但不宜对生产经营及规模扩张过度介入。

**姜彩楼（南信大）：**

解决结构性失衡问题，瓶颈问题在于制度。

第一，重视和加强标准等刚性制度的建设和执行。

第二，在工业化基础上，建设符合新兴产业创新规律的生态。创新实践中，一个重要的经验是创新容易发生于商业化氛围浓厚的地区。

第三，重视管理经验的引进和学习。

第四，建设健康的市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史先诚（江苏省金融办）：**

深化改革，要调整政府、企业、居民三个口袋的收入结构，必须让后两个口袋充盈，企业有余钱创新（减税）、居民有余钱扩大消费提高消费品质（加工资），政府不应该老是在具体产业领域往前冲，既累又不准，要瞄准居民和企业需要的方向（基础设施、基础研究、基础教育、基本社保、失业救济等）。收入结构改了，僵尸企业可以入土为安（投资者和债权人吸收亏损）、工人可以下岗换职业，软预算约束打破，届时新动能、新模式逐步出现。

**赖红波（上海理工大学）：**

找到经济发展的创新模式、路径、业态和路径，也就是新动能，我认为核心举措之一，就是进一步优先发展和落实文创产业引领传统制造业转型和创新。包括：（1）知行合一，不再停留在简单的政策层面；（2）对文创产业扶持的内容之一，就是加大对设计创意企业的扶持。

**崔卫东（蓝鲸咨询）：**

优化产业组织，矫正重大结构性失衡。

我国很多产业“企业规模经济效应与企业竞争活力的矛盾”已经成为产业组织的“重大结构性失衡”。在不同所有制共存、鼓励混合所有制国企改革、支持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投资（PPP）的政策背景下，建议从消费品领域起步，混合型领域试点示范，引导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由商品销售的市场一体化，走向“商品、服务、投资、知识产权”的本地化、全国化、全球化“四大功能三级跳”，重视智库研究成果的推广应用等 4 个方面，矫正产业组织的重大结构性失衡。

一、从市场化程度高、竞争相对充分的消费品领域起步，引导优化产业组织。消费品领域市场化程度高、竞争相对充分，市场能够自动出清，他们去不去产能完全可以依靠市场调节。消费品领域企业更多的是民营企业，完全依靠市场调节，自动出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建议，第一，支持优势企业提高市场集中度。第二，支持优势企业强强联合。第三，制定弱势企业退出政策。第四，加强行业分析信息发布引导。

二、从不影响国计民生的混合型领域试点示范，引导优化产业组织。有一些领域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都有竞争力，如钢铁行业的宝武、河钢、沙钢、日照钢铁等。采取相对平等的政策，选择 2−3 个行业试点示范。

三、拆除地区行政壁垒，建立一体化市场体系，引导优化产业组织。引导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由商品销售的市场一体化，走向“商品、服务、投资、知识产权”的本地化、全国化、全球化“四大功能三级跳”。

四、重视智库研究成果的推广应用，引导优化产业组织。

# 如何发挥外资对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2017 年 1 月 9 日

**编者按：**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提出：“发挥外资企业对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这一提法有三个意义：一是把建设法治化的市场营商环境作为振兴实体经济的战略举措来看待；二是充分肯定了外资企业作为实体经济对中国发展的贡献，为过去引进外资正名，拨乱反正；三是建立了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引进外资和发展实体经济三者之间的联系，强调了外资对法治化营商环境的依赖。其提出的背景主要有四个方面：

（1）过去中国实体经济的健康良性发展，是在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经济全球化中实现的，外资企业大量进入带来了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巨大的溢出效应，壮大了中国以低端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

（2）现在因国内外条件下的变化，中国制造企业走出去的多，外资进来的少，利用外资格局面临巨大的挑战。这也是导致中国实体经济地位动摇的重要因素；

（3）国内在利用外资工作中政策发生了动摇。近些年一些人认为，我国外资吸收多了，带来了种种问题，认为我们被外资利用了，环境也被外资企业破坏了。针对此倾向，中央权威人士说，我们要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外资，现在，欧美等发达国家都在吸引我国的投资，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我的外资多了？

（4）中国营商的市场环境正在恶化。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提出了要通过“建设法治化的市场营商环境，加强引进外资工作”。中共中央国务院已经颁布了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提出了要抓紧编纂民法典，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在实践中，现在以各种名义侵犯民营企业产权的行动屡屡出现，最迫切需要的是应该根据中央的部署，坚持有错必纠的原则，甄别纠正一批侵害民营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以恢复和提升企业家对中国发展的信心。

基于此，群内各行业专家、学者也针对“如何发挥外资对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展开了讨论。

## 外资引进制度的机遇与挑战

**夏网生（江苏省商务厅）：**

外资企业在调整经营战略时主要受成本和市场两种因素影响，在市场需求和竞争压力双重因素的影响下其必然会向上下游延伸产业链或将高级产业部分生产基地转向我国。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规模的快速成长和消费层次的不断提升，外资企业越来越重视中国的市场规模和前景，同时在品质消费需求日益强化的驱动下，外资企业开始对其经营战略做出相应地调整，将高端生产环节也转向中国，以利于更好地争夺市场。这种因市场结构变化导致外资企业经营战略发生的变化，给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带来了新机遇。

**陈 柳（江苏省社科院）：**

针对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引导外资振兴实体经济的提法，我认为这次会议在总体强调脱虚入实，外资也是总体战略的一部分，预计今后一个阶段金融服务业对外资的开放会放慢，强调实体项目落地。

从乐视和曹德旺在美国建新能源汽车和玻璃厂的两个案例所披露出的信息看，美国地方政府为吸引外资进行实体投资也在进行积极的政策配套，包括不少基础设施的支持。但是我们过去搞外资的政策洼地形成了很多的负面效应，如何真正以国际接轨的、专业化的方式打造优良的营商环境是目前的任务。

**张建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2016 年中国实际 FDI 是 1263 亿美元，2016 年 1~11 月是 1138 亿美元。说明两个现象：一是中国仍然是最有吸引力的市场，市场规模大，产业体系完备，劳动力成本上升告一段落；二是各国对 FDI 的竞争在加大，包括发达国家复兴制造业和发展中国家力推工业化。

**周诚君（中国人民银行）：**

当下的关键问题是资本外流较为严重。

**纪 明（广西师院）：**

外资区域选择考虑的主要因素是在保证资金安全性基础上获取高收益率，随着中国经济整体进程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经济潜在增长速度下降，导致资本回报率下降，应是资本外流的首要因素。

**何雨（江苏省社科院）：**

新常态下，吸引外资的利益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过去，外资入华，主要动因是中国所谓“低人权”的劳工优势，随着中国全面迈向中产阶级社会，我认为未来吸引外资的核心就是中国的消费优势，当前利用外资的新优势，就是我们巨大的中高端化的国内市场，中国吸引外资，特别是高质量外资，可以考虑以此为切入点，将其与国内市场需求中高端化捆绑。

本轮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在高质量市场开放性日益收窄的情况下，或许会推动外资实施积极的本土化战略。中国应考虑出台相关政策，通过非均衡政策设计，鼓励在华外资实施“本土化”战略，这样会真真切切的助益中国实体经济发展。

**王建优（朗姿股份）：**

从我的实操体验来看，在时尚消费行业，海外品牌商主要是看中国内地具大的市场增长潜力，而我们主要是相中他们的品牌影响力、研发能力、海外营销渠道和客户价值等。因此，时尚知名品牌外商一般除了在国内设立营销管理公司外，大多不愿意投资生产性实业，而国内有实力的同行上市公司大都在四处寻找海外好标的并实施并购，但上市公司海外直接收购目前还仅限于现金方式，无法用股份支付方式来完成，这必然限制了上市公司海外收购的能力。为此，建议证监会允许上市公司通过发行股份方式直接进行海外并购，这也是吸引外资的重要可行方式。

**邵 军（长江产经智库特聘研究员）：**

我们开放之初主要允许国资与外资合资，后来倡导独资，这些政策都有阶段性特点，因此现阶段应该鼓励融合。我在工商联工作时也尝试鼓励民资与外资合作，在产业链资金链上形成深度融合，但收效甚微，说明需要国家层面的政策。

**张立冬（江苏省社科院）：**

当前我国已经过了关注外资的量的阶段，现在处于关注于质的阶段，要围绕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培育国内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目的吸引外资，还要趁机此会让国内企业凤凰涅槃。

**张月友（南京财经大学）：**

过去国内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是总量失衡，所以当时的引进外资主要体现为促进投资、促进工业化、促进出口，是一种为解决总量失衡的对外开放，主要目的是经济增长。现在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和问题的根源已经转变为重大结构性失衡，引进外资就必须为解决结构性失衡服务。因此，新一轮的加强引进外资必须是选择性引进外资，必须是服务于调结构促转型、促进经济服务化、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新一轮加强引进外资投资

的重点领域应该是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新兴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领域。主要目的应调整为围绕补短板、促进结构调整、促进实体企业发展、促进新旧动能转换和创新动能的加速形成而为。

**岳中刚（南京邮电大学）：**

2012 年以来，国内对跨国公司选择性地反垄断调查对引进外资有消极影响，尤其影响高端制造业在国内投资和布局。另外我国对知识产权保护不重视也是跨国公司研发总部或研发中心不在我国布局的原因。

**方向阳（中国财政杂志社）：**

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和新的平台上，我们更有底气将引资当成手段，重视引资质量，同时对内开放也是改革，不能再对外资给予超国民待遇。

**沈凯玲（澳洲国立大学）：**

引进外资的溢出效应也在于促进中国的资本走出去。现在国际上对于中国资本在国际上的收购很多是对于中国企业的不了解，对中国的市场经济的规范不认可。如果外资在中国能感受到符合市场经济的治理，这就是最直接的证据。

**陈 琛（机工智库）：**

现在对于外资的利用到了临界点，想用但如何保障产业安全？如何让我们的政策支持不会流失到外资那？比如商务部政策资金每年有大量都被外资拿过去，他们想把外资排除在外，发现很难，外资和内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宋凌炎（江苏精诚 & 精缦毛毯）：**

我认为未来最好的机会在中国、最大的市场在中国。中国传统制造业也已经往改造升级的道路上，很多企业都已经智能化，甚至有些已经超过国际领先水平，只要用心管理经营，专心致志钻研，把产品做到极致，一定能吸引更多的外资。当下中国实体制造要做的就是不要沉浸于过去，认清形势、静下心来、抛开浮躁，创自己特色的民族品牌。比如：我们的毛毯供给美国最有名的 Costco 超市，同时 Costco 公司为了更加稳定的供应链，主动提出参股，美国人坦言目前中国制造已经远超过美国本土制造。

**蒋青云（复旦大学）：**

高质量外资为什么要来？第一是产业机会导向型；第二是资源基础型；第三是能力型基础；第四是知识基础型。因此我们需要研究基于区域和产业的网格化分析，看看如何才能对接高质

量外资。

**曾楚宏（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

通过吸引外资来加强实体经济的发展，首先需要考虑外资为什么会来，而且是进入实体经济中，也就是外资进入中国实体经济的利益需求，他们愿不愿意进入实体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实体经济的发展现状和前景是否能够让外资有良好的判断和预期。当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遇到很大困境，一方面是脱实入虚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在全球价值链中遭遇双向挤压的问题，这些都是当前实体经济要进一步发展需要突破的障碍。

“一带一路”涉及的国家多为发展中和欠发达的国家，他们目前虽然经济落后但未来市场潜力巨大。只要能够借助一带一路战略成功构建以我为主的生产网络，就能够“挟天子以令诸侯”，以此作为诱饵吸引外资参与我们的实体经济发展，实际上就是参与到未来市场潜力巨大的分工体系中。由此提升我们在吸引外资中的谈判力。

**盛文军（人行杭州中心支行）：**

个人感觉要对吸引外资政策进行反思和检讨：一是吸引外资达到促进国内技术进步的初衷了吗？二是如何摆脱外资依赖症，不再把外资当作实现经济增长的政策手段？三是为何不提对内资开放（开放是双向的，即对内对外开放；内外资平等竞争），进而让内资进入垄断性领域？

**外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对策**

**夏网生（江苏省商务厅）：**

一是要改变招商引资的传统思维定势。在招商引资中不能再一味强调成本的低廉、政策的优惠，更应强调市场规模和潜力、市场环境的规范。二是要注重引进产业链两端的高级环节，尤其是研发和营销环节，核心零部件生产环节。三是东部沿海地区要以自主品牌和核心技术参与高端分工，注重参与外资的本土战略。四是中西部地区在成本优势仍较大的情况下引进代工型外资一方面要注重延长代工的国内产业链，另一方面要提高代工的本土价值链。五是营造公平、可预见的法制环境，营造良好的保护知识产权的社会环境。

**孙 军（淮海工学院）：**

一是利用外资要与政府对于我国基础研发的支持、市场化的创新能力培育相结合，更多发挥市场机制的驱动作用；二是对外资开放的领域也一定要同时对民资开放，不能像以前那样歧视后者，并逐步化解国进民退、过量资金无处可去的事实；三是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也同时要走出去，尤其是沿着一带一路，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实现人民币自由浮动和走出去；四是政

策要有连续性。

**夏海力（苏州科技大学）：**

一方面，应该给外资企业以国民待遇，将外资企业与民营企业同等对待，继续向外资开放一些非限制行业。另一方面，继续实施“招商选资”的政策措施，积极引导外资向我们急需的产业和行业集聚。

**王修志（广西师大）：**

就外资立场考虑为何选择中国，最重要的因素还是中国的市场。与 30 年前相比，中国的市场发生了巨大变化：30 年前我们“以市场换技术”，总体还是被动，外资主要看重的还是我们廉价的劳动要素。今天，我们对外资的吸引力应该更大，仍应坚持“以市场引外资”，当然，今天外资在中国面对的竞争环境也已发生变化。国内市场需求的培育、市场环境的规范透明，应该是我们发力的方向。可以自信地依托我们的市场为外资设置条件，同时对合乎条件的外资提供融资服务（决定里提到通过资本市场为外资企业融资），这是新阶段利用外资的极大便利。

**张建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在这种内部引力与外部拉力拔河比赛中，中国引进 FDI 的方向由中低端转向中高端。要在中高端领域引进更多的 FDI，

第一，自己要加大研发、创新和人力资本投入。

第二，制度建设，特别是知识产权和政府依法行政。

第三，以服务业开放吸引生产性服务业外资，发达国家的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 60%~70%，潜力很大。

第四，建立最发达的基础设施，把亚、欧、非联系起来，铁路运输的规模和效率要高于海运，同时提高电子商务和物流覆盖全球市场的能力，为企业提供最好的平台。

第五，要利用发达国家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外部性：由于创新成本增加和创新周期缩短，企业在发达国家的创新必须以最短的时间实现规模收益，这正是中国的市场优势。

第六，由于我国地区间的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和要素禀赋差别很大，对 FDI 的需要也不同，应当根据各地区实际，制定差异化的政策，提高针对性。

**孙国民（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一是要建立假外资引入的识别机制和惩罚机制；

二是要提升外资引入的质量，这个高质量就体现在对产业转型升级，对高端产业、现代服务业以及战略新型产业的外资引入上以及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外资方的战略投资者进入等；

三是要改变思想观念，外资需要，高质量的内资也需要，不能厚此薄彼；

四是充分考虑外资引入的均衡性，包括区域均衡、产业均衡；

五是进一步优化“四张清单一张网”，优化外资投资环境和预期。

**周 斌（江苏省邮电规划设计院）：**

1. 过去外资的优点：超国民待遇、各种红利（政策红利，制度红利，劳动力低成本红利等）、跨国直接投资存在绝对优势以及比较优势、中国的广大市场；

2. 缺点：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不正当竞争、“粗放式生产”、全球分工处于弱势地位等；

3. 如何继续发挥外资经济作用：（1）开放：从整个产业链健康发展的角度，从有利于参与全球化市场竞争的角度，从培养和壮大核心战略新兴产业发展角度，再从高端工业化角度等方面扩大开放的力度，发出类似 1978 年的能够长期坚持的对外资经济利用的统一的政策；（2）强制和引导：对于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经营必须有强制投资的要求，同时配合核心技术本土化的要求，部分国产化的要求等；（3）有取有舍：外资利用必须在国民待遇下推进，同时要考虑对本土产业的发展壮大的助力；（4）大的区域试点要有产业定位和要求；（5）刺激外资的二次开放积极性：列出外资的优先引入目录，建立类似“特色小镇”这种专门针对外资的经济集中体的打造。

**赵 进（江苏省商务厅）：**

要发挥外资对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首先是进一步开放制造业领域，二是让其享受国民待遇，三是鼓励其投入生产性服务业。高端制造业、智能制造如何才能给外资足够的吸引力？我觉得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在中国制造，在中国消费”。高质量高水平的外资更看重的是国民待遇和公平稳定的营商环境。

**杜运苏（南京财经大学）：**

现在吸引外资有两个方面需要改进：一是人民币汇率和资本管制，这方面是外资进入中国的重要考虑因素，国家需要加快改革，稳定预期；二是税费，如果欧美进入减税周期，我国要及时研究跟进。

**孙月平（江苏省委党校）：**

1. 对外资的准入管制从过去的正面清单转向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2. 必须逐步放宽的领域和环节有：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准入限制，国企资产和债务重组，资本市场的投资额度等等。3. 要着眼于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和培育创新动能，处理好外资准入中的开放、效率、公平和稳定的关系。

**曹玉平（河南大学）：**

首先，要结合我国要素禀赋结构动态演变现状和未来升级方向，发挥外资对产业升级、结构转型的促进作用。在资本稀缺劳动丰裕的背景下，以前吸引外资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国外丰富的资本和远离前沿的中低端技术，新形势下，我国吸引外资应以利用国外资本助推我国创新型经济体的建设。其次，通过理论、实证以及历史案例研究，探讨有利于国外先进技术向我国溢出的企业组织形式、国际研发合作模式等，并通过战略性贸易或产业政策助其实现。

**施 康（香港中文大学）：**

1. 新一轮的引进外资要和国有企业改革结合起来，以外资融化国企坚冰，带动民资，加快国有的混改；

2. 要分析上一轮不少外资，比如零售业在中国水土不服的原因，针对性地解决问题，改善营运环境；

3. 新的外资引进要有选择，应该引进能给国内企业带来正面溢出效应的企业。

4. 在引进外资过程，完善我们在知识产权、金融创新的不足之处。

**刘根荣（厦门大学）：**

从根本上讲，我国已进入产业升级和优化的新阶段，对外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利用好以下的政策工具：

一是利用好产业政策。及时制定和调整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目录，明确中国产业发展方向。

二是要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优化国内的经商环境，构建可持续的制度竞争优势。

三是防止短期外资大量转移进入短平快项目或资本市场，造成短期经济波动加剧。

四是加快市场化改革，建立市场化的利率形成机制与汇率形成机制。

五是在 WTO 的框架下建立行业保护机制。

同时，高素质人才是行业发展、技术创新的主导性生产要素。引进外资，更要做好引进外智工作。

**刘建森（徐工集团）：**

利用外资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建议：

1、对外资开放的政策要保持连续性，对外宣传要统一口径，不能言行不一致，更不应出现杂音，比如，东部地区对外商投资需要提高投资标准、提高环保标准等，这些可以做，但是一旦作为宣传重点，则一定会影响外商投资信心。

2、各级政府要对外商继续实施亲商护商政策，要守信用重承诺，尤其是已经承诺过的优惠政策要切实落实，不能自行变更，否则就会动摇现有的外商信心，还有可能影响其他人来华

投资的信心。

3、加强沟通与宣传，利用外交渠道、工商协会等管道做好吸引外资的宣传。

4、慎用贸易战，尤其是在政治关系出现波折时期，更要保护好外商、外企，不能拿外商、外资企业当作撒气筒、替罪羊。

5、为什么世界上把欧美、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作为一类投资国，主要是政策透明、有法律保障、有章可循。中国对于涉及外商投资的政策，包括税费、汇率、外汇管制等政策，都要慎重，可以征求外商协会的意见，不要仓促出台。

**张月友（南京财经大学）：**

第一，建设法治化的市场营商环境。法治化的市场营商环境，从具体企业的角度看，有三个层次：一是对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活动的规制。二是对企业间市场关系的活动的规制。三是对企业与政府、社会关系的活动的规制，这方面的政策法规最多。

第二，新一轮引进外资的过程也是引进外智的过程，是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必须打造开放性经济新体制，改善投资环境，扩大服务业市场准入，进一步开放制造业，稳定外商投资规模和速度，提高引进外资质量。改革外商投资审批和产业指导的管理方式，向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转变，促进开发区体制机制创新和转型升级发展。

第三，逆向外包战略。

**毛德勇（浙商银行）：**

以前我们引进外资是解决资本和技术的问题，个人认为目前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劳动力问题和技术问题，关键是要解决技术问题。建议在新的引进外资举措中，重点以建设“全球特色小镇”为基本思路，通过国家的宏观规划，引进外资加上本土资源，建设国际产业集聚园区，以此促进提高我国实体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司增绰（江苏师大）：**

1、当前招商引资要引资、引智、引产业相结合；2、引服务业与制造业相结合；3、引资时应摒弃挖到篮里都是菜的思维，因为这种思维在当前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中仍很普遍；4、当前的招商引资，还应避免铺摊子，过度建设开发园区；5、在招商引资中，在关注招商大项目、标志性项目的同时，也应重视中小项目的招商，重视招商产业的多元化、多业态，优化产业生态。

**庞 春（华南理工大学）：**

可能引人比引资更重要，人来钱来，人走钱离。

**张远鹏（江苏省社科院）：**

1. 进一步开放生产性服务业，对内对外一起开放，形成良好的竞争局面；

2. 加快推进与发达国家的双边投资谈判；

3. 充分发挥国内市场优势，在国家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鼓励把对外并购和返程投资结合起来，提供关键零部件和高品质产品与服务，尤其是加强“一带一路”经贸联系，瞄准欧洲利基市场小巨人企业招商引资和购并。

4. 国内企业首先要在产品质量和品牌上下功夫，形成更强的与外资合作的能力。

**李 群（南京审计大学）：**

今天的引资应转换成：引进外资以市场促创新、促就业、促发展。

1、政府只要在引资领域建负面清单，排除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以及涉及国家安全的战略性产业。产业不分传统和新兴，不分低端和高端，都有创新的空间，要通过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以竞争促创新。

2、在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通过大力引进外资可缓解就业的压力。

3、政府要做的，就是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对国资、民资、外资都本着国民待遇和公平贸易的非歧视原则，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和市场环境，通过国资、民资、外资共同促进经济发展。

4、在新的引资过程中，不要将其作为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直接指标，不要出现为引资而引资的一窝蜂、竞相杀价的现象。

# 发展智能制造与振兴实体经济

2017 年 1 月 13 日

**编者按:** 2016 年 12 月 8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16—2020 年）》，旨在通过加快发展智能制造，培育我国经济增长新动能，抢占未来经济和科技发展制高点，推动我国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造我国制造业竞争新优势，实现制造强国。“以智能制造促实体经济”成为了国家及各省市的重要战略。

基于此，机工智库陈琛和东源节能环保苏晓东提出了“智能制造如何振兴实体经济”这一议题，群内各行业专家、学者也在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的引导下针对“发展智能制造与振兴实体经济”展开了讨论。

## 观 点

**苏晓东（东源节能环保）：**

智能制造本质上是提高效率，同时能够更好地衔接用户与生产，从而满足人的个性化的需求。智能制造的最大障碍不是技术，也不是资金，而是人的观念。

美国的互联网产业发达，制造业的自动化水平相比德国要稍逊一筹，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很快，社会渗透力很强，因此可以通过互联网来解决生产效率问题，这同时也会带来生产的自动化。从互联网技术、软件技术上看，中国与美国差距不大，所以应该从互联网的角度出发去推动工业转型，另外在互联网文化上，中国和美国比较接近，因此，我认为中国的智能制造更应该学习美国。

**宋凌炎（江苏精诚 & 精缦毛毯）：**

目前很多传统企业基层的质量保证体系都没有做好，自动化都还没进展，如何让他互联网化、智能化？我认为应该先鼓励企业规范化、自动化，然后再进行智能化。另外一个问题：智能化系统目前尚属初期，企业会对装备的成本与产出效益、包括资金流等问题进行评估，政府部门需要定位智能制造装备的价格合理化和普及化。我认为目前智能制造只能在小部分企业实施，循序渐进，每个行业找出一些示范企业，一部分带动整个行业协同发展。

**巫 强（南京大学）：**

智能制造提高中国产业竞争力显然是国家产业政策着力推动的方向，我想到的一个问题是，是否智能制造会导致当前中国的中低技能劳动力出现较大规模的失业现象。按照国际经济学界对美国经济的研究经验，技术进步在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也会导致中低技能劳动力工资下降，甚至失业（所以美国的收入差距拉大不是由于全球化，而是源于其技术进步）。智能制造显然会要求从业人员的技能知识更新，同时会减少使用的劳动力规模，这应该是我国推进智能制造业过程中高度关注的问题。一方面是，要加大全社会的人力资本投资，包括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大量针对投入，为企业采取智能制造提供合格的劳动者。另一方面是，要在推动智能制造的过程中，做好再就业培训和失业救助等保障工作。

**王修志（广西师大）：**

这个命题可以放在 GVC 重构视角下讨论。欧美国家通过 200 多年的两次工业革命，积累了建构 GVC 的垄断技术。从发展看，这种垄断技术的垄断利润会递减，中国要参与甚至主导GVC的重构，除了贡献新的理念、依托市场优势外，更重要的还是要依靠技术创新获取价值增值，这个阵地在实体领域，智能制造是突破口。

**庞 春（华南理工大学）：**

智能化制造实质是技术升级，与分工演进密切关联。举个例子，原来简单劳动生产粮食，这是一个简单分工结构，后来先造出铁，用铁造锄头，再用锄头生产粮食，再后来造钢铁，用钢铁造拖拉机，再用拖拉机产粮食，这就是内生技术进步，现在生产粮食以及这些中间产品再引入机器人，技术进一步升级。

**杜宇玮（江苏省社科院）：**

以智能制造为主要特征的先进制造业，已经成为发达国家重振制造业的重要目标和主攻方向，也将成为未来世界各国产业发展的制高点。以江苏为代表的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在第一轮全球化中抓住了国际代工的机遇，确立了其“世界加工制造业基地”的地位，而在下一轮全球化中必须抓住智能制造的机遇，建设“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以智能制造为重点发展先进制造业，绝不是以战略性新兴产业替代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也绝不是简单地用机器设备替代产业工人。而是要以智能装备制造业为支撑，促进制造业整体提质升级，促使产业工人从“一线操作”向“二线操控”的技能升级。具体路径包括：（1）在产业培育上，紧贴需求发展智能装备制造业；（2）在产业技术上，推进协同创新致力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突破；（3）在产业融合上，加强两化融合推动制造业智能化改造；（4）在产业布局上，突出集群发展打造示范智能产业基地。

**赖红波（上海理工大学）：**

发展智能制造的路径之一，就是“制造企业 + 互联网”。

目前，实体经济（尤其是传统产业和行业）正在被互联网所颠覆和重构，互联网能够使实体企业（当然，也包括金融等为代表的服务类企业）以更快的速度和更灵活的方式满足消费者的各种需求，有利于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助推传统制造企业实现弯道超车，缩小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差距。

“互联网 +”背景下，整个产业链是互联的，信息是共享的，价值链中价值传递方式将因此被重塑。一方面，通过深度应用信息技术和网络物流系统等技术手段，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另一方面，互联网降低了制造企业与用户交互的成本。在此基础上，制造企业可结合计算智能、柔性制造等生产技术，通过信息控制生产模块的切割与组合，使得大规模个性化定制成为现实。

**刘志彪（长江产经院）：**

我觉得，发展智能制造，不能抛开原有产业体系另搞一套，也不可能主要依靠新的投资去建设新的产业体系，而是要以“智能化 +”为核心，重点加强对传统产业的大规模技术改造，以此为起点振兴实体经济。马云最近说，不是实体经济不行了，而是你的实体企业不行了。没有夕阳产业，只有没有经过“智能化 +”为核心改造过的落后的产品、工艺、技术和流程。实践证明，再传统的产业，只要经过现代智能技术的改造，都可以成为现代产业体系的一部分，焕发出蓬勃朝气，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跨越，形成强大市场竞争力。

根据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当前世界经济的低谷时期，是进行大规模技术改造的最佳时期。我们应立足现有制造业优势，通过技术改造尤其是智能化改造，打造一批国际一流的先进制造基地。

一是要对智能化制造业的提升方向、技改重点做出科学预判和战略规划。建立和完善智能化技术改造项目审批、补贴、绩效评估等政策体系，构建智能制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完善制造业智能化改造的管理机制和制度保障。

二是鼓励相关企业在智能化园区集聚发展，吸引和鼓励智能制造技术企业的合作攻关。支持企业同其产业链的上下游、相关高校科研院所、国内外企业共建研发中心，合作开发智能制造所需技术。

三是重视智能制造业技术标准的制定。政府应选择重点行业中的优秀企业，鼓励其探索实施智能化技术改造的标准化示范工程，进而形成相应的改造流程并向全行业推广，以提高行业整体发展水平。

四是在金融支持政策、高端技术人才政策等方面完善推进智能化技术改造的配套措施。如通过化解产能过剩腾出信贷资源、物质资源和市场资源，以精准的产业政策支持企业智能化技术改造，用市场化手段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再如，鼓励企业放眼全球引进高端技术专业人才，建立首席技工等激励制度，做好人才引进后的服务工作，等等。

**霍伟东（西南财经大学）：**

当前，我国智能制造是企业升级、振兴和再造我国制造业的基础与核心，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础。国家应在大力投入研发及科技攻关上下功夫，出政策。只有打好智能制造基础，做好保障，才能占领制造业高端，真正振兴中国制造业，振兴实体经济，强我中华。

**毛丰付（浙江工商大学）：**

智能制造本质上还是精密制造加信息化。没有高质量的原材料，高精度的制造基础，智能制造就是空中楼阁。

**刘建森（徐工集团）：**

智能制造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为目标的制造业生产流程的智能化改造，主要是以三维设计、ERP、MES 等信息系统为支撑的机器人替代人工的生产活动的智能化。这类改造应该纳入设备投资改造范畴；二是以提高产品竞争力和附加值为目标的产品智能化设计。产品智能化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目标，信息化是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或手段。制造业企业软件化是大势所趋，企业要注意专业化人才与信息化人才的融合，要有意识加强跨界创新能力的培养。

**杜运苏（南京财经大学）：**

我国智能制造发展，现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机器人替代劳动力，降低成本同时提高生产效率，比如富士康已经投入了成千上万机器人；二是迎合需求多样化趋势，比如红领，可以根据客户个性化需求，快速低成本完成订单。智能制造对于维持和提高“中国制造”竞争力很关键，难点在于智能制造的核心技术。

**孙国民（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智能制造是大趋势，是个长期事情。政府需要做的是，顶层标准设计，基础设施、工业云和大数据的共享配套，在税收、金融上的扶持和对于市场选择的尊重；对于企业来说，关键在于意识到这个趋势和对于时机的把握；在大的层面上，装备制造业技术能力的提升是智能制造的关键所在。另外，一定要给企业一个稳定的创新预期，不要因为房价暴涨等使企业预期走坏，稳定的环境胜于一切。

**谈 镇（江苏省委党校）：**

1、首先智能制造就是实体经济的组成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二者是一荣俱荣关系。

2、新一轮工业革命中国最大机遇就在智能制造。

3、智能制造的关键在制造而不是智能，就持续产业竞争力角度来说制造的关键是核心技术的获取和关键技术的突破。

4、当下的中国宏观和微观的重点注意力都放在技术创新层面，就中国经济持续性而言，比技术创新更重要的是制度创新，而当下的中国最最为关键的是组织创新。

5、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突破智能制造提升实体经济的正确路径，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激发企业和企业家的能动性，预期、尊重感等最为重要。总之，变政府为经济运行主角，官员为导演的范式，为企业是经济运行主角，企业家为导演的范式。同时，企业加大技术、品牌、结构等创新。

**张建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相比于其他国家，中国面临的技术特殊性是，三期革命性技术的叠加。一是，工业革命以来的核心技术还没完全掌握，但是通过改革开放我们已经吸收了发达国家所有可能的技术。二是，1980年代的信息技术，目前正处于对其他产业大规模深度改造阶段，大约还需要20年。三是，2008后兴起的新工业革命。这三方面最高层认识的很到位且都有对策，分别是：成立航空发动机集团、互联网+、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提出北京和上海要建立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从这三方面的背景中看智能制造：首先，它是一种由新兴技术决定的新兴产业；其次，它是改造传统产业的方法论和工具。两者的合力将给中国产业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刘根荣（厦门大学）：**

1. 要意识到智能制造在未来产业升级和产业价值链中的核心地位，这是发展的大趋势，不以主观意识为转移的。

2. 对中国智能制造的发展要实行必要的产业政策引导。对有利于形成完整智能制造产业链的技术研发和生产提供必要的政策扶持，鼓励优质生产要素在智能制造业的聚集。鼓励智能制造产业园的发展。

3. 优化国内市场制度，完善资本市场，鼓励有条件的智能制造企业通过国际兼并重组实现跨越式发展，提高中国智能制造业的创新能力，掌握核心技术，提高核心竞争力。

4. 要做好人才培养。人才是智能制造业发展的基础，有创新力的人才队伍是发展智能制造的关键性因素。

5. 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可以大量承接从传统制造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业是智能制造业发展的基础，是其发展的支持服务体系。

6. 在路径选择上，可以针对中国亟待突破核心环节加大投资力度，以点带面，完善智能制造的产业价值链。

**陈 琛（机工智库）：**

今年和智能制造相关的产品技术发展迅速，甚至相关的投资并购也爆发增长。个人觉得智能制造并非机器换人那么简单，它有许多障碍：一是核心技术障碍。我们在关键技术上不掌握，做系统集成就不能随心所欲。二是观念意识。我们很多企业还是传统思维。三是基础不行。很多企业还没有到 3.0 甚至 2.0，没有条件上。有的企业不精益化，自动化以后反而加速浪费。四是中小企业缺解决方案。我们在东北调研了几家企业，设备集成好了，后期的服务却不行，服务企业也不愿意再过来。

**周 斌（江苏省邮电规划设计院）：**

首先对智能制造的理解，智能制造有几个阶段：

1、传统的制造型信息化向智能制造的深化和延伸（目前大部分这种方式）：制造型企业生产线的生产运作管理信息化（如海尔等企业）~ 制造型企业管理信息化（如东软等软件产品）~ 制造型企业后向供应链信息化（如丰田等的 JIT 管理）~ 制造型企业前向信息化（如制造型企业自己做的电商销售平台或类京东、苏宁等独立平台）。

2、相对于传统的制造型企业信息化，智能制造最主要的就是有自己独立的多方采集的大数据资源，同时有统一的管控平台，能够实现精准生产、按需生产、智能决策等作用，同时能够将前端销售、中端生产、后端研发等联动起来。而制约其发展的一方面是数据，收集困难且存在制度制约（政府相关数据难以获取），另一方面就是统一平台的搭建。正是由于存在这些困难，如果所选择制造型企业没有执行到底决心、必要的人财物投入和破釜沉舟的魄力，很难真正实现企业的智能制造。

3、跨越企业层面，上升到产业和行业的核心问题解决的智能制造，这是我认为目前可以重点推进的事情。

基于以上考虑，发挥智能制造对实体经济促进作用的建议：

1、国家战略需要再务实和落地，我觉得目前还是有点宏观，需要从区域、行业、未来发展战略等多个纬度提出策略和措施。

2、智能制造需要核心技术攻关和政策扶持。

3、大胆提出把中国打造成全球重要产业的智能制造的数据信息枢纽中心，同时打造基于全球制造业的核心业务流程的云平台。

4、智能兴企：结合目前特色小镇，五化融合等，将智能制造的标准和考核指标量化。

5、智能兴业：政府搭智能制造平台，供企业尤其行业内欠发达企业低价或免费使用，从产业发展角度帮助他们提高智能制造水平。

6、智能创业：这是解决智能制造的核心技术，同时将之打造成新兴产业。

**任保全（常州大学）：**

智能制造对于振兴实体经济意义重大。而智能制造的发展却主要依靠中国自身，那么智能制造的推动与实现，必须更加注重整个产业体系的布局和联动性：

1. 通过推进智能制造，培育对生产智能制造的智能装备的需求市场，从而带动生产智能制造的智能装备产业的发展；

2. 通过推进智能制造，培育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市场，从而带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3. 通过推进智能制造，培育智能制造产品的市场应用，从而改造传统老产业。因此，需要推进产业间的互动发展和发挥产业间的协同效应。

此外，为了配合智能制造的发展，一是，必须加大与智能制造相适应的消费者市场、生产者市场、人才市场、产业关联市场的培育；二是，要提升品牌形象和打造高端品牌，改变和提升中国制造在全球智造的形象和影响力；三是，要避免出现披着“智能外衣”实为“新瓶装旧酒式”的低端制造。

**吴苏贵（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制造业发展必须“互联网＋”与“＋互联网”相结合的模式发展。现在重视的是互联网 +，其本质上是为行业服务的技术和商业模式，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就是简单的 IT 技术的应用，是信息化的延伸，第二层是互联网思维在企业产品开发设计生产及销售阶段的结合，第三层是深入到行业运营中的物联网。

**张俊芳（东方国际）：**

智能制造关键拼人才，人才的基础是教育。

智能制造的未来关键在于：（1）各种接口的标准化规范化；（2）传感器的竞争力，sensor 传感器的标准化大规模降低成本；（3）制造业流程全产业链的配套，从宏观层面应该抓标准化，从一开始降平台接口成本未来才可大规模推广无缝对接。

**方向阳（中国财政杂志社）：**

发展智能制造（或高新技术产业）是又一个系统工程：

一是在政府层面，做出 20−30 年的规划以稳定预期，联合科学院或支持大企业在核心技术上组织攻关，建设为智能制造服务的智能制造平台，在关键共性技术上发力，制订相关产业和财税扶持政策，宽容和兜底失败，在结构性失业上做出安排。

二是在企业家层面，鼓励有愿意承担风险和创新意识的企业家去做尝试，投入中长期连续的资源支持。

三是在知识层面，有专业的顾问团队。

四是在企业的组织运营层面，要有强有力的组织管理团队以及掌握新技术、具有工匠精神的员工。

**司增绰（江苏师大）：**

制造业智能化为什么要互联网＋制造业，而不是制造业＋互联网，因为实践证明传统制造业＋互联网的能力较差。传统制造业＋互联网犹如制造业长出两个翅膀，比较难；互联网＋制造业犹如互联网长两条腿，相对容易一些。

**张远鹏（江苏省社科院）：**

智能制造还是企业自己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循序推进，国家不要拔苗助长，企业需要的是适用技术，而不是最先进的技术。

**吴继冈（常州市发改委）：**

发展智能制造首先要提升我国制造业整体发展水平，如果我们制造业不能改变低水平的制造阶段，那么发展智能制造就很难实现。

发展智能制造，政府与企业要形成共识。光靠政府引导还不够，关键是要涌现出一批敢于实践智能制造的企业家。

就目前而言，振兴实体经济还是要更大力度的给企业松绑，为企业创造公平公正的发展环境，提升企业家信心。长期以来，我们只是把企业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工具，而没有真正确立企业在经济发展中应有的地位。所以，只有善待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才是真正振兴实体经济的出路。

**王思彤（江苏省统计局）：**

振兴实体经济，一定是相对于虚拟经济的繁荣而导致的实体经济衰弱而言的。虚拟经济的高投机性是任何实体经济都没办法与之抗衡的。但虚拟经济的基础是实体经济。所以，实体经济永远不会被虚拟经济所取代。

振兴实体经济，本质上是提高其赢利能力，通过不断缩小与虚拟经济在短期赢利方面的差距，来获得投资者的关注。实体经济的主体是制造业，所以振兴实体经济归根结底就是振兴制造业。振兴制造业，必须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减少低端同质化。于是，智能制造成为大势所趋。发展智能制造，离不开人才、资金和技术。而核心还是资金和人才。没有资金，企业根本无法进行智能化改造。没有人才，企业也不敢贸然闯入智能制造这个高科技领域。所以，发展智能制造，关键是抓紧培养一批具备智能思维的企业家，培养一大批掌握智能技术的骨干员工。

# 为什么现阶段资金不肯流入实体经济？

2017 年 1 月 18 日

**编者按：**岁末年初，关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争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 2017 年经济工作时，把着力振兴实体经济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2017 年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提出要正确认识“实体经济”的内涵：“实体经济”是一个相对于“虚拟经济”的概念，不是仅仅包含制造业，而是涵盖着一二三产业。既然实体经济对于当下中国的转型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可为什么市场上的钱总是流不进实体经济呢？针对这一现象，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提出了“为什么现阶段资金不肯流入实体经济？”这一议题，并组织群内各行业专家、学者展开了讨论。

## 观 点

**刘志彪（长江产经院）：**

首先需要对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进行定义，这个定义不能简单按照部门的观点，因为银行、金融也有实体经济成份；也不能用实物观点，房子就是实物但用于炒作就是虚拟经济，因此我的定义是：在价值增殖的 G--G' 的过程中，如果媒介是资产，那么这个活动叫虚拟经济；如果媒介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就叫实体经济。如房地产业，当炒房用时是虚拟经济，当居住的消费品用是实体经济。

接着我对这个流行的命题先做个剖析：一是说明过去（应该是指 2010 年前吧）而不是现在，资金是愿意流入实体经济的，这是为什么？二是或者说明现在虚拟经济发展太火了，它出现自我循环，不跟实体经济玩了。三是或者说明实体经济太烂了，虚拟经济无法跟它玩。为此需要判断“资源配给实体经济究竟是太多了还是太少了、谁错配了”这一根本性问题。如群内张健（香港金融）所说，2015 年底中国企业部门债务率 170.8%，杠杆率居于国际首位，高出发达国家平均值 80 个百分点，高出新兴经济体国家平均值 66 个百分点，而 2008 年中国企业债务率才 90%。能不脱实向虚吗？

上述第一条说明 08 年四万亿货币放水后，现在中国经济正承受着“结构调整阵痛期”的后果；第二条说明目前严重的资产荒或资产短缺，正拉高资产的价格吸引源源不断的巨量资金涌入，也可能说明虚拟经济领域加杠杆情况严峻的现实；第三条说明去杠杆、降杠杆、移杠杆的主体，目前为止的重点在企业部门。

**倪 敏（硅谷创业）：**

个人觉得实体经济是分化了，一般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也就是说资金也还是流向实体经济的，但都是流向新的行业，比如互联网行业、北京上海等地的创业公司，这些新领域很热，但有些传统领域就会慢慢消亡了。

**张慕濒（华东师大）：**

确实在互联网助力下实体经济已经分化，使用互联网进行营销管理创新达到一定程度的行业利润率高，而传统行业以及互联网运用尚未达到一定程度的行业还在原有框架内计算成本利润。另外，互联网 +（我指的是互联网及更智能的一些工具媒介）的运用提供了新资产，吸引资金投入，反过来又促进虚拟经济的发展——因为创投、风投、PE 等投资模式背后就是需要不断创造金融供给和供给模式。如果把经济转型看作与时间赛跑，在这场比赛中互联网 + 是装备，装备好的胜出，只是跑道上目前已经没有纯粹的长跑运动员，只要能跑，跨界也行。实体经济为何吸引不了资金，表面上是资产荒，深层是有些行业尚未接纳新规则做出改变。当然，税负成本若能进一步降低会营造更好的环境促进企业接受新规则。

**宋凌炎（江苏精诚 & 精缦毛毯）：**

我阐述一下实际遇到的问题：资金不流入实体经济的根本原因在于实体经济负担重、利润低。互联网交易不用交税，金融交易不用交税，金融投资一本万利不用交税。而分析实体企业：只要有买卖就要交得一次税，哪怕有利润也是 25% 的企业所得税，实体企业用人多，人工成本当增值税交税，归根结底是：实体企业太难做，当下实体企业成了谁都不想碰的烫手山芋，如何有资金流入？而虚拟经济一本万利的现象很多，当前有赌钱来钱快，谁还愿意去工作的心态。

一个简单的例子：前些天我们在人才市场招聘会上，互联网业、金融业排长队等候面试，而实体企业却没人报名。我怀着好奇与许多应聘人员沟通后发现，他们都说：现在谁还会去实体工厂？互联网与金融来钱快，有机会、有空间。应聘者如此，何况投资者？

再打个比喻：目前的实体企业融资情况和虚拟融资情况：实体企业像是在沙漠中行走的人遇到沟里的脏水（银行贷款），可以短期解渴但对身体健康有一定潜在风险；而虚拟经济相当于在咖啡厅里，可选择性很多。如果能把银行贷款给实体企业的还款期限改到两年以上，实体企业会比较乐于接受贷款。

投资实体回报小，虚拟空间大，政府应该给予实体更多更有效的优惠政策，这样虚拟和实体才能相辅相成，共进发展，否则长远发展很容易造成经济危机。

**陈 东（南京大学）：**

现在实体经济的发展中，企业诚信问题严重，三角债多，回款难，稍不注意就资金链断裂，

国企拖欠民营企业应收账款也很严重，实体经济难做。以调研的一家民营企业为例，他们承接国企的 PPP 分包的项目，现在没有钱付给农民工工资，年底了政府要找他们茬。但怎么办？为了拿分包项目，他们不仅要自己垫钱先干活，而且还要给上面的企业付一部分保证金，保证自己能干好活。干到年底了，农民工要钱了，这家企业两头受气，度日如年。企业就像处在食物链底端。

**彭本红（南信大）：**

实体经济的投资要很长时间才看到收益，影响官员政绩考核。

资金资源能否流向实体经济，首先还是要看企业面临的微观环境，包括市场环境、经营环境、商业周期环境、融资环境等，其次宏观环境也很重要，比如政府政策引导，财税激励措施，最后企业家心态也很重要，产业之间平均利润相差太大，资本随着利润跑了。

**孙 军（淮海工学院）：**

目前我国的问题，一是实体总体供给远大于需求，但国有企业效率却很低；二是创新能力较差；三是经济刺激政策和外部环境改变，使得虚拟经济过于脱实向虚，反过来抑制了实体的创新活动。因此，接下来，一是放开国有垄断行业，允许资金流入推动创新活动，二是资本市场要发挥注册制的功能，强化退出机制，提高证监会的执法能力，推动资金向真正创新企业集聚；三是改变过去因为经济高速增长而积累的庞大的行政人员和不必要的支出，防止黄宗羲定律成真，真正为实体减负，度过经济转型期。

我认为每个阶段应有所侧重。具体说来，实体过剩阶段，发挥好资本市场对于创新的驱动功能，抑制投机；实体不足阶段，重视资本市场对于实体的资金融通功能，扩大产能。

**夏海力（苏州科技大学）：**

我认为：一是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太低，远不如房地产业暴利。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冰火两重天，似乎从来没有这么严重过：上市公司大面积炒房，引发更多的资金脱实入虚，资本市场虚火继续过旺；二是，实体企业融资成本较高，其实央行一直释放流动性，市场不缺钱，实体企业风险过大，客观造成银行投资意愿降低，融资成本增加；三是实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较大，流动性差，风险巨大，一部分实体企业也没有很好地适应网络经济变革的要求，造成效率低下，竞争力差。

**刘瑞翔（南京审计大学）：**

我觉得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企业成本上升，投资回报率下降，实体经营不下去；二是国家货币超发，资金需要找出口。

**王修志（广西师大）：**

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造富神话摧毁了一批企业家，颠覆了传统的企业家精神；沉重的税费负担和恶劣的营商环境打击了一批企业家的信心。

资金本性逐利，投向实体经济与否主要看企业家决策。建议：1、承认并依法保护企业家权益，解除其后顾之忧；2、依法改善营商环境，有效降低交易费用；3、依法完善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功能，提高融资渠道运行效率；4、依法保护知识产权，鼓励企业技术创新；5、开放市场，培育市场，为企业创造发展空间。

**盛文军（人行杭州中心支行）：**

谈实体经济避免不了经济周期，在经济的下行期，投资预期回报率低，投资周期长，投资成本高，谁会来投资？此时的出路是：对内开放，放开部分垄断性行业和领域；同时降低投资的资金成本；鼓励股权投资；打通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的通道——并购融资等。当实体经济的信心起来了，投资回报率大于预期，资金就会自动流向实体经济，因为资金是逐利的。

**孙国民（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一是资金追求收益的本质不会改变，改变的是资金在不确定性复杂环境下更加追求有保障的收益获取，抵抗风险预期。二是既然资金的本质没变，那谁在变？“变”的是：第一，实体经济平均回报率在下降，对新进入资金没有吸引力；第二，出现投资回报更有吸引力的地方了；第三，考虑到资本回报的周期，周期越长，资金成本越高，可能还存在风险越大；第四，宏观环境大环境变了，变了让企业家不能把控自己的业务市场和企业突如其来的经营风险；第五，银行贷款资金流向主要是流向地产行业，很难流入实体经济：一方面银行贷款条件更加严苛，符合放款条件的少了，另一方面也是银行在宏观环境及产业利润回报率下降的情况下在规避金融风险。三是要进一步综合优化实体经济发展环境，打通资金和实体经济发展的通道，二者要形成良性互动。

**张远鹏（江苏省社科院）：**

虚拟经济，特别是互联网出现后，虚拟经济创新的速度快、空间大，加上虚拟经济操作方便、流动性强，在互联网的背景下，赢者通吃，获利空间巨大，或者聚小利而成暴利，即使失败也符合中国人赌性大的特点；而实体经济相对创新慢，在多部门产能过剩、国际需求紧缩、国企事实垄断、涉及环节及政府管制众多、人力环境等成本压力大增的背景下，盈利水平相对下降。

**陈 柳（江苏省社科院）：**

从实体方面看，直接原因肯定是实体经济难赚钱。现实中看企业上实体项目，大都比较困难，

就算有点利润也都在应收款上。你可以说是说它创新不够、不是高端产品，但事实是你让绝大多数实体企业经营者一下投资出一个高端产品来，不是常态。从虚拟经济看，吸引大量资金的原因也不尽相同，房地产和金融领域就不一样。金融领域主要还是与政府信用滥用有关，表现为与政府信用相关的底层资产，往往会被层层加杠杆衍生出形形色色的金融创新产品。

负债的企业主要是政府平台和国有企业，表面上看，银行或其他金融经济机构借款给平台和国企是进入实体经济了，但是这些业务主要都是表外业务。从第一层的借贷关系后还会衍生出大量信用扩张，相关的信用产品都是虚拟经济，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正是国有信用的刚性兑付。

投资中高端需要更强的技术基础、更优的商业模式创新，现实当中感觉投资壁垒很高，风险同样很大。我认为当前政府最需要做的事情还是要拓宽投资的壁垒和限制，比如：建筑质量部门建筑检测虽然放开了，但是原来脱胎于政府检测的部门具有很大的隐形的优势，新的民营进入不去；环保部门的危险品处理，一些必要的政府发放资质，不少扭曲为政企勾结进行纵向排斥。

**马步洋（Metalink 新材料）：**

（1）首先，资本逐利为本，人则趋利避害；

（2）资金投入实体经济风险大（这是中国经济结构性失衡结果）、银行对实体经济尤其中小实体经济企业信贷成本高风险亦大、银行管理缺乏区别对待不同风险系数行业企业进行足够差异化信贷授予的技术与管理手段、一刀切的政策进一步恶化了信贷环境并极大限制了信贷资金流向实体经济，兼之，信贷责任制促使银行从业人员规避法律与道德责任转而将信贷流向政府平台与国有企业，此类贷款今后如何似乎与个人关系不大；

（3）中国绝大多数实体经济企业其主体为中小微企业处于行业过度竞争、苦苦挣扎者众，难以大范围发展直接融资、缺乏资本市场对接能力和渠道，当前资本市场管理状态对此几乎无作用，这条路暂时不通；

（4）解决对策：调整经济发展体制，将各级政府通过国有企业介入经济发展、占用绝大多数社会信贷比例的主体，而此类主体如央企、地方政府平台使用资金效率不高、容易滋生腐败、制造大量无效 GDP、造成可观国民财富浪费，为此，只有真正进行改革才是王道，尤其破除所谓的国企与政权关系的伪论；

（5）见效较快的可能措施：鉴于央企、地方平台占用资金巨大，银行趋之若鹜，应先采取措施区隔其获资渠道、突出债券市场和国有大行作用、重点规范中小银行信贷投放、确保实体经济中的良性选手尚有资金渠道维持与进行创新升级，给实体经济留下喘息与自我调整时间，因为银行业压缩实体经济信贷也是因为其资金可以在其它领域运营，事实上，实体经济中仍然存有不少好企业，银行业信贷导向留出空间给这些企业、甚至可以加码信贷支持，也是为了银行自身的长期利益。

还有一点，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毒瘤”之一：“二银行”的存在。谁是“二银行”？国有企业！

谁是“二银行”的客户？民营企业，绝大多数是实体民营企业。逻辑是：银行货款给国有企业（因为认为安全），国企以各种方式转贷给民营企业（民营企业无法正常获得资金），民营企业将剩余价值分享“哺育”国有企业。

**何 雨（江苏省社科院）：**

经济脱实向虚，相当大的一个原因在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制度环境不一样，或制度监管的尺度环境不一样。一是制度在实体与虚拟领域中的供给本身就不平衡；二是执行尺度持双重标准。无论是制度，还是监管，对于实体经济的创新，在相当程度上都是从严监管。观之虚拟经济的创新行为，一是出现了制度真空，相关制度没有跟上；二是即使有制度，也是从宽监管。让经济脱虚向实，就是要在制度及其执行层面的尺度上，坚持同一性。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对制度及其执行尺度的敏感度差别也很大。实体经济对制度及其执行尺度，敏感度要弱得多，即使从宽监管，等到反馈到实体经济时，至少也要1–2年的滞后期。相反，虚拟经济对制度及其执行尺度的敏感度非常高。制度稍微调整，就能引发虚拟经济领域中的次级创新，互联网金融就是非常明显的例子。

**翟太煌（山西证券）：**

增加对实体经济的投入，关键是资本金，非债务，需要通过多层次资本市场这个中介。

**刘晓昶（华泰证券）：**

资金也是看预期回报率的，在经济下行期间，实体经济回报率降低，投资实体经济的动力本来就不足；再加上实体经济产能过剩和强调去产能，投资一般实体产业就更没有出路。只有少数有明确消费升级需求的创新产业以及政府支持产业等还能试试。

投资虚拟经济的好处是，可以在全市场所有行业中发掘机会，这是投资实体经济所无法相比的。同时投资虚拟经济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和灵活性，可以在经济低谷期保存实力，而一旦新一轮经济周期启动时则可迅速抢占先机。

从2000年以来的证券市场看，实体企业通过证券市场获得的股权融资规模是震荡上升的。我国股权融资规模从2000年的1318.80亿元提升至2016年的17478.43亿元。股权融资规模包括IPO、增发、配股等。与百万亿元级别的银行贷款余额规模相比，我国的股权融资规模比例还太小，对实体企业的支持微不足道。

**刘 剑（金橙投资）：**

个人认为，当前有效资本投向实体经济不足，除了有经济周期、政策、税赋、融资等普遍原因以外，与实体经济（在江苏尤其表现在制造业中）自身处于转型升级的阵痛期有直接关系。

**张月友（南京财经大学）：**

资金为什么不进入实体经济，可能需要解决的是两个问题：（1）主要目的是要解决中国实体经济本身的经济结构失衡问题；（2）防控金融风险。

一、不是钱不去实体经济，而是钱过多地进入了落后生产体系中的实体经济，不进入满足消费升级需求的实体经济。一方面，传统落后生产体系中的实体经济早已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既无利可图，也存在产能过剩，还严重污染环境。另一方面，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满足消费升级需要的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供给短缺，与我国创新研发投入不足、技术进步缓慢和政府的垄断限制进入等因素有关。因此，钱不进入实体经济，实际上是市场经济理性的反应。

二、除了资金要素，实体经济的发展也受自然环境、人口变动、劳动力结构、社会价值观、教育发展等的因素影响，理论上说，各因素之间是匹配的。当前，伴随老龄化提速和高等教育扩招迈向深入，人力资源供给越来越倾向于金领、白领的脑力劳动市场，而不利于蓝领的体力劳动市场，越来越倾向于虚拟的线上工作和生活，而不利于线下“现实”的工作和生活，越来越倾向于更多地提供服务业供给，而更少地提供制造业供给。因此，钱不进入实体经济，实际上也是劳动力分化、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结果。

**刘根荣（厦门大学）：**

资金脱实向虚反映了资金的逐利的本性，根本原因在于以下几点：一是实体经济的困难加大、风险加剧，税费负担过重，影响资金的回报率，导致部分资金不愿进入实体经济；二是资本市场发展不成熟，特别是股市运行机制不健全，政策性风险大，影响资金通过股市进入实体经济的效率，降低了资金入市意愿。三是，由于中国未开征资本利得税，导致资金进入虚拟经济的回报高。四是，来自国外的资金进入短平快的虚拟经济领域，短期内对虚拟经济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五是，虚拟经济领域的投资收益兑付时间快，流动性强，满足投资者快进快出的投机需求。

要解决资金脱实就虚的局面，重点在于要打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分割而相对独立封闭运行的趋势，这就要求：1. 打通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联通机制。必须进一步发展资本市场，强化资本市场的资金配置效率。2. 提高实体经济领域资金的回报率。改革税费制度，对不合理的收费要清理，并适当地进行结构性减税，提高实业资本的回报率。3. 要加强金融服务，为需要资金投入的各类企业。4. 对虚拟经济将保持正确引导、严格监管以实体经济名义获取的资金流向虚拟经济领域的行为；谨慎对待各类金融衍生品的创新，打破虚拟经济自我循环机制。

**某业界从业人员：**

在不同的投放方式下，流动性和利率传导机制也不一样。

过去通过外汇占款投放，用存款率对冲投放，两种方式均属于普降，辐射面广。而现在的MLF、SLF 等工具属于中长期的定向根工具，利率传导（或引导短期利率下行效果不佳）和资

金投放都受限（如 PSL 定向投放棚改），最后只能放大逆回购，而逆回购资金流向实体经济中间链条更长，相比存准，逆回购后的金融机构很容易玩资金空转（反映在债市上，这一年多流动性充裕），这种情况下逆回购的流动性和利率传导效果都有问题，而且还无法支持长期资金需要。

**纪 明（广西师院）：**

我从宏观方面分析核心的原因可能：我国经济长期发展过程中的劳动力价格负向扭曲造成进入实体经济的资本获得超额回报，但近年来随着劳动力价格的持续上涨，使得资本进入实体经济的超额回报率下降，再累加房地产等虚拟经济膨胀导致进入资金获得超额回报，资金自然不愿意进入实体经济了。

**李建平（卧龙湖小镇）：**

我的观点“金融不支持实体企业是个伪命题”。1、逐利是银行本性。实体企业哪有虚拟经济如此暴利？但逐步会冷下来，银行的目光会瞄向好的实体企业，不要急！ 2、企业是否够强大。真正强大的企业也不缺资金。3、企业营运风险大。4、国际市场变化大。国际政经形势、市场萧条萎缩、汇率变化和产品核心价值含量等。5、缺乏有效资产抵押。企业技改是投设备，银行贷款要房产抵押！ 6、实体二代无兴趣。创业一代开始老去，二代基本在国外，加上各种原因收山走人。7、政府卖地建设见效快。8、企业劳动力匮乏，农二代也不愿如此苦差事。9、真正有科技含量和核心技术的企业很少，国际分工后这种研发投入和人才都不够，哪来竞争力！10、就业在实体企业的认识要改变。今后不可能回到当年世界工厂的年代，解决就业问题要靠发展服务业，这方面中国差距很大。

**孙月平（江苏省委党校）：**

1. 不宜把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对立起来，更不宜割裂。2. 当务之急是推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虚拟经济规范发展。3. 要在全社会弘扬企业家精神，打造“务实”的商业氛围，培育实业文化。

**谈 镇（江苏省委党校）：**

资本不愿意流入实体经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传统的实体经济就是国有企业垄断，伴随着改革开放，实体经济发达的重要标志就是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势必会影响国有企业做强做大。虚拟经济管理部门，还没有这种知识储备，所以不断出现新热点，新资产暴涨的领域！

**李 湛（苏州发规院）：**

实体经济目前产能过剩，而虚拟经济仍处于供给不足阶段，什么时候实体经济去产能到了

平衡点以下，而虚拟经济过剩，资金就流向实体了。

**张少军（厦门大学）：**

第一，相对利润率是影响资金进入实体经济还是虚拟经济的重要因素。第二，未来的不确定性，不利于资金进入回报周期更长的实体经济。第三，当前虚拟经济存在的行政垄断，使得资金在其中更加安逸。

**刘建森（徐工集团）：**

资本不愿意流向实体经济，其实主要是不愿意流向实体经济中的制造业。原因：1、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有一定进入壁垒，尤其是技术壁垒，增大了投资难度与风险。2、实体经济相对于虚拟经济的价值链条长且复杂，管理难度大。3、实体经济中对员工管理，存在代理成本和代理风险，而虚拟经济中存在大量自我管理、自主管理，符合人性自由与个体自信的内在需求；4、实体经济投资回收期较长，虚拟经济可以即时实现。5、虚拟经济的快钱效应与一夜暴富的示范效应。6、二者的工作环境，如写字楼 vs 厂房车间，也是影响人们投资就业的重要因素。7、自 2010 年以来，市场需求都呈下降趋势，实体经济竞争加剧，投资回报率低，而人工成本高居不下。这也是资本不愿意流入实体经济的一个因素。

**姜德波（南京审计大学）：**

资本投向的选择主要考虑两方面，一是盈利能力，二是方便。实体经济由于整体的市场不景气而盈利性近年来连续下降，加之投资回收期长、流动性差，而且投资的沉没成本高，实体创业的艰辛程度又甚高。所以，社会资本不愿意投向实体经济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 县域经济的地位及其在供给侧结构改革中的作用

2017年1月23日

**编者按：**“郡县治，天下安。”县域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基本单位，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具有重要地位。近年来我国县域经济发展较快，尤其是广东、浙江、江苏等地结合各自区域特征，调整县域经济结构，涌现出了一大批有特色、有实力的县域，但总体来看，广大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仍然存在着经济结构不合理、农民增收缓慢、县乡财政困难、人才资金缺乏、县级政府调控乏力等问题。随着2017年1月7日“大数据时代首届中国县域经济发展论坛”的召开，县域经济发展再次成为了专家、学者们的关注焦点。针对这一现象，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提出了“县域经济的地位及其在供给侧结构改革中的作用”这一议题，并组织群内各行业专家、学者展开了讨论。

**观 点**

**刘志彪（长江产经院）：**

县域经济在县级行政区划的地域内，统筹安排和优化经济社会资源，从而形成开放的、功能完备的，具有地域特色的区域经济。县域经济的特征：1、以县城为中心，乡镇（尤其是建制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城乡兼容。2、县域经济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市场调控主体，并有一定的能动性。3、县域经济具有地域特色，这种特色与其地理区位、历史人文、特定资源相关联。4、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是功能完备的综合性经济体系，其活动涉及上下左中右、工农商学兵、价财金物流等方方面。

中国县域经济现在因缺少发展机会，要素流出十分严重。每年从县一级流出的大学生返乡就业的很稀少，遍地开花的邮政储蓄银行光吸储不放贷，存贷款差太大。

**于晓华（哥廷根大学）：**

我觉得县域经济的供给侧改革最重要的问题是人的问题，只有有了人才能有经济，因此需要彻底放开计划生育。

**孙国民（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一是县域经济是现代城市经济和都市经济的战略平台和重要节点，也是新兴城镇化的重要载体。古人也有“郡县治，天下安”的提法。这个“安”，不仅仅指社会治理的安，还有经济发展带来小康社会乃至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富足之“安”；二是县域经济高端资源要素匮乏，特别是以人才及科技资源要素为中心的创新资源匮乏，从而使得县域经济缺乏龙头大企业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主要以中小企业为主，产业转型升级相对缓慢，科技型企业、创新经济、新兴产业等比重较低。因此，需要高校科研院所、国企央企等要适当与县域经济进行互动，特别是科研资源互动（如设立国家工程分中心、实验室分中心等）、人才及其智力的下沉（沉到县镇级层面）、龙头企业带动（加强与龙头企业、国际化企业、跨国公司的配套，融入他们的产业链中）、竞争性金融扶持的互动等，推动城镇经济向现代都市经济转型。三是大力发展县域总部经济，重点发展以乡情为纽带的本土化企业总部经济、不为所有但求所用的职能型总部经济、有限影响力和辐射力的区域型总部经济。

**孙 军（淮海工学院）：**

中国的老龄化加剧、放开二胎之后出生率仍然下降，这对中国经济尤其是县域发展很致命。下一步，一是要努力加快新型城镇化步伐；二是推进公共服务建设和公平化；三是全面放开计划生育，并且给予补贴；四是寻求比较优势，发展特色产业。在高铁和互联网逐步普及，经济转型的情形下，尤其要如此；五是继续推动县域之间的竞争，但这要建立在严格环保、要素和产品自由流动，绿色 GDP 基础之上。

**杜运苏（南京财经大学）：**

全国百强县江苏占四分之一多，苏南县域经济比较发达，人才、资金等要素流出相对好一点，苏北很多县要素外流很严重。最近，环保整治，苏北县域是重灾区。环保趋严，对落后地区县域经济发展负面影响会初步显现出来，与要素外流形成叠加效应，需要寻找经济增长新动力。

**伊道科（企业家创新俱乐部）：**

县域经济还是要走产业经济合理布局的路子，发达县域都是早前通过招商引资等方式，培育了现在的产业，不管是否合理，第一轮发展基本都是粗放型的。现在还落后的县域，走不了也不应该再走前面的路，而是结合自身的资源环境，规划好适合本县域长期发展的产业布局，再通过招商引资等手段，加速发展。从这方面来说，后进的县域和发达的县域相比，空间更大，障碍更少。

**易志高（南京师范大学）：**

在中部，以前的县域经济大多主要靠资源和大规模出去务工，最近一些年主要承接东部沿海的产业转移和省会或地级市因产业升级而发生的工厂搬迁，大多污染较重（不过比没搬迁前稍好点），还有一波就是以前在外打工积累了一定原始资金回来创业的（因技术原因，大多集中商贸和农产品种植或加工领域）。除此之外，旅游业的兴起也成为拉动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

**纪 明（广西师院）：**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最基本单元，但长期以来，与大城市相比，县域资源集聚能力弱的问题一直存在，成为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背景下，充分重视县域经济的地位和作用，解决县域资源集聚能力弱问题的核心是县域城镇化，基本取向是特色产业、生态、宜居。

特色生态是关键，像广西的巴马县规划的健康养生产业，使得每年流动过来旅游、短期居住的人口超过常住居民。

农村劳动力空心化在广西的一些边境地区和山区表现的特别明显，很多小面积的耕地抛荒严重，劳动力流出并不是因为农业技术水平提高排挤劳动力，而是大中城市的虹吸效应。

**刘根荣（厦门大学）：**

当前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着许多问题：一是产业链不完全，缺乏全产业链的竞争力。多数企业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环节，主要承接大城市产业配套生产与服务，抗市场风险能力弱，受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严重。二是优质生产要素流失严重，人才、资金、技术等核心要素匮乏。特别是缺乏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三是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远远落后于大城市发展水平。四是县域经济体制、机制落后，经济发展规划往往受地方官员偏好强烈影响，缺乏连续性。

发展县域经济，一要着眼于市场主导与政府推动的双重机制建设。县域经济对资源的集聚能力有限，市场容量也有限，因此，完全依靠市场解决县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是不现实的，需要政府推动，特别是在产业政策、营商环境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产品供给方面需要政府的支持。二要发展特色产业。发展能利用本地特色资源优势的农林牧渔业以及旅游业；发展与大城市产业相配套的加工业，深度融入大城市的产业分工体系。但要防止县域经济无限制地承接大城市的高污染产业。县域经济发展要突出自己的生态优势，产业定位更多考虑将来城市群体的休闲、旅游、健康等未来高品质生活需求。有条件的县域可以建立产业园区，提高产业集聚效应。三要发展和完善县域经济体的要素市场，重点发展产权交易市场、资本市场。

县域经济发展比较成功的如福建的晋江市、南安市，其主要产业发展经验就是产业集聚效应明显。

**宋文阁（江苏省国资委）：**

我认为县域经济，根本不需要产业发展与规划，因地制宜，做好对应周边城市配套与服务，就可以了。当务之急，仍然是抓好县委、县政府班子建设，突出基层政权建设，突出三农，突出农村集体资产保值增值。

**储胜金（省委研究室）：**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重视地域分工的优化。最近到苏南一个全国十强县去调研，感觉转型升级、科技创新，对一个县级城市来说，还是有着一定的难度。他们想推动一个千亿级支柱产业在制造业的基础上强化创意设计，提升附加值，但是创意设计的人才培养和引进，难度非常大。一流的人才需要一流的环境、一流的设施、一流的服务、一流的教育文化医疗卫生条件、一流的专业人才集聚交流氛围，而这些在一个县级城市难以完全实现。因此，我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同等级的城市，应该承担不同的责任。超大城市、特大城市，要切实把人才和创新抓在手里，把高技术制造业抓在手里，而把用地量大、用工多、资源消耗高的一般制造业、装备制造业、重化工业等放给县域，放给中小城市，形成合理的中心—外围地域分工。就像上汽把上海作为研发、销售总部，把仪征作为汽车生产基地，形成了较好的分工关系，实现了良好的绩效。县级城市，可以用柔性的办法利用大城市的研发资源，技术上有排他性要求的企业，则可以在大城市甚至在发达国家自建研发中心。

**张建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个特征是，离中心城市越远发展水平越低，要素流出大于流入，发展动力不足。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看，主要是补短板的问题。解决之道是：

第一，离中心城市近的县域，由于经济发展基础较好，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进行产业转型升级，为此要利用和吸引中心城市的高级要素，如人才和技术，实现转型升级。第二，对于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县域，可实施以下对策：通过城市化减少人口，把人口迁移到大中城市；中央，省，市和县四级政府共建：

一是，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和培训、医疗保健、环境和生态保护等。二是安排适合当地要素特征的公共或产业项目；挖掘当地比较优势产业，培育龙头企业和品牌，充分发挥新兴技术的作用，比如把大数据与农业结合，发展精细农业，还可以利用大数据掌握不同空间和时间的消费者的需求变化，实现精准销售；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国内外互联互通；设立创业创新基金，激励民众创业创新。

**何　雨（江苏省社科院）：**

我个人直观认为，县域经济的特殊属性有：

1. 它是城市链接农村经济的前沿阵地；2. 与大中城市相比，县域范围内的居民消费，依然是价格敏感型的，对性价比有着更大的挑剔。3. 近年来，困扰县域经济的一个难题就是，包括资源、人才、资本等在内的各种要素，在大城市的虹吸下，其精英价值部分被抽空。

基于此，发挥县域经济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作用可以考虑：

1. 是县域范围内的“离土不离乡”式城镇化，以之全面提升中国经济非农化水平，提高城乡二元结构中的乡村短板；2. 针对县域消费结构特征，开发适之于县域市场的产品。3. 县域经济的特点就是，缺乏链接外部市场的通道。当前，电商的大发展，为县域经济走出县域限制，面向更为广阔的国内甚至国际市场提供了可能。能否有针对性地在县域经济中，推动电商与县域特色产品的结合及其规模化。

乡土性，既是县域经济的优势，又是其劣势所在。需要激活乡土性中的积极因素，构建起带有情感的共同体社会，同时限制乡土性中的愚昧、落后因素。

**邵 军（长江产经智库特约研究员）：**

与八十年代县域经济的黄金时代相比，当前县域经济相对独立性弱化，其重要性日趋下降。1. 大城市效应，更多县变为区；2. 人才、劳动力流失；3. 差异性扩大；4. 强镇扩权。县域经济这个课题在江苏将淡出。

**蒋乃华（南通大学）：**

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崛起，民营经济腾飞，县域经济借助于柔性的制度安排，很好地替代了市场的配置功能，有效推进了县域经济发展。在创新驱动发展的新时期，县域经济的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更加艰巨繁重。最为突出的是：

新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降低了县域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大城市的极化作用削弱了资源在县域空间集聚的基础；旧的财政分权模式不利于县域财政的增长。因此，县域经济的衰退是城市化、工业高端化的必然结果。

**盛文军（人行杭州中心支行）：**

如何发挥好金融在支持县域（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一、坚持重点突破，积极推动“两权抵押”试点实现新格局：

一是结合本地实际，积极复制推广农村金改试点地区的先进经验；二是全面完善抵押配套机制。加快推动确权登记、农村产权交易、价值评估、风险缓释等机制和抵押物配套处置机制；三是有序推进“两权”贷款实现扩面增量提质。

二、坚持创新驱动，推动互联网金融迈出新步伐：

一是积极鼓励引导金融对县域电子商务创新发展支持力度；二是积极推动“互联网”支付工具运用范围的有序有效扩大；三、坚持固本深化，促进县域金融“四大体系”再上新台阶。

三、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紧紧围绕县域产业转型升级，紧紧围绕现代农业加快发展，做好县域金融“四大体系”创新完善：

一是不断深化县域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优化县域金融环境；二是着力深化县域金融基础服务体系建设，努力探索健全县域新型金融组织体系的机制和体制；四是大力深化县域保险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县域经济金融风险分担机制，尤其在扩大县域保险产品和业务以及县域社会保险保障体系等方面。

**崔卫东（蓝鲸咨询）：**

发达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提两点建议：

一是更多的融入世界经济，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县（市）。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建设具有全球创新能力的产业，县级经济必须融入全球化，而不仅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二是镇改街道，不要搞市级镇。现在的县级市所在地，是镇建制，不是城市管理体制。县城（县级市所在地）与其他镇乡之间，是割裂的。

**王思彤（江苏省统计局）：**

县域经济既要完成好规定动作，也要完成好自选动作。2006−2015 年，我在省民调中心任主任，亲眼见证了江苏各县陆续按省定标准达小康的全过程。当时省委提出的主导思想就是，不能以市域总体达标代替县县达标，不能以平均数代替大多数，不能以统计数据代替老百姓的真实感受。所以，我们江苏在全国率先开启了县县达小康的探索之路。从 2006 年第一批达标的昆山、张家港、江阴、常熟、吴江、太仓，到 2015 年最后一个达标的泗洪，我们完成了 4 大类 18 项 25 个指标构成的省定小康标准从确定到县县达标的完整过程，为全国的小康建设之路提供了活生生的江苏范本。省委当时提出的不能以市域总体达标代替县县达标，就是习总书记现在要求的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省委当时提出的不能以统计数据代替老百姓的真实感受，也正是习总书记现在强调的小康不小康，百姓说了算。

江苏小康的成功实践证明，县域经济是独立的，是客观存在的。县域经济是市域经济的基础，也是省域经济，国家经济的基础。我们今天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绝不能忽视县域经济的作用。但是县域经济毕竟是从属于省域经济和市域经济的，所以它不可能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必须先完成好规定动作，再考虑并完成好自选动作。这个规定动作就是省域经济，市域经济一盘棋的需要。比如县县达小康，都有时间表的，你那个县只能提前实现，不能拖后腿。比如三去一降一补，该去该降该补的，你那个县就要有动作，不能逆潮流而动。但在完成好规定动作的前提下，各县又可以百花齐放，结合实际搞一些自选动作，上一些自选项目，出台一些自定政策，为更好地完成规定动作提供支撑。

# 长江产经智库新年百人调研：中国经济的回首与前瞻

2017年2月2日

神猴辞岁，金凤迎春。在这辞旧迎新的日子里，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组织了长江产经智库群海内外各领域专家、学者，举行了一次特别“除夕盛宴”——

长江产经智库新年百人调研：

中国经济的回首与前瞻

问题1：2016年中国经济运行中令你印象最深刻的事件是什么？

问题2：现阶段，你最关注的经济问题是什么？

问题3：2017年，你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本期推文我们按照发言顺序整理了专家、学者们的观点（为了便于阅读，每位学者观点中的1、2、3分别对应上述三个问题），并按照发言中出现的频率，分别列出了2016年令大家印象最深刻的五件事、最受关注的五个经济问题以及2017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最主要的五个挑战。

**沈志强（建信信托）：**

1、川普上台，美股指创新高。2、中国央行什么时候加息？是不是已经定向加息？ 3、FDI指标何时恢复正增长，民间投资信心何时恢复。

**王思彤（江苏省统计局）：**

1、十几个重点城市住房限购。2、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何宣布。3、如何让外向型经济复苏。

**孟 楠（徽银南京）：**

1、国内经济冰火两重天，国进民退，实体经济面临生死存亡。2、民营经济减负如何落到实处？改革敢不敢进入深水区？ 3、如何恢复实体经济的信心。

**张明之（南京政治学院）：**

1、堪堪守住底线。2、转型升级是否合意。3、如何应对中美摩擦。

**孙 军（淮海工学院）：**

1、去产能和去库存。2、国企等改革。3、杠杆和债务。

**杨平宇（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1、传统制造业如何转型升级。2、制造业服务化的实现路径。3、全球化新局面。

**陈 东（南京大学）：**

1、外汇持续下降。2、外汇是不是还要下降。3、外汇继续下降，全社会信心下降。

**缪放嵘（南京中诚石化集团）：**

1、经济 L，市场信心恢复。2、国企怎么混改。3、中美全面博弈。

**夏网生（江苏省商务厅）：**

1、无。2、2016 年最关注实体经济发展。3、2017 年最关注世界经济发展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李 湛（苏州发规院）：**

1、年初股市融断。2、川普上台的具体经济政策。3、三去一降一补如何深入推进。

**王修志（广西师大）：**

1、曹德旺访谈引出的企业税负之争。2、国内实体经济发展环境的优化。3、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发展的机会和信心。

**伏玉林（华东理工大学）：**

1、人民币持续贬值。2、僵尸企业退出。3、资本再配置和微观层面的激励机制。

**陈建勋（上海社科院）：**

1、外汇管制加强，上海自贸区众多金融创新政策收紧，没有文件的窗口指导替代政策，走出去企业后续投资如何跟上？严重影响一带一路的进程。2、最关注的经济问题是如何有效去产能？去产能问题已经大大超越经济范畴，市场出清还是行政手段重拾，两种思路，两种结局。3、决策机制如何完善？在经济精细化、社会多元化的今天，经济决策的粗放已经严重不适应现实，决策官员如何听得懂市场语言、企业语言成为关键，不能用搞活动搞运动的方式来搞经济。

**彭本红（南信大）：**

1、去产能。2、国企混改。3、营商环境恶化。

**王 虎（国泰君安证券）：**

1、房价上涨。2、改革还能否推进。3、国内投资下滑，汇率贬值压力制约政策应对。

**周 斌（江苏省邮电规划设计院）：**

1、三去一降一补。2、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3、供给侧改革如何真正深入。

**刘志彪（长江产经院）：**

1、经济降中趋平、趋稳。2、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力弱化。3、不是外国的影响，不是川普，而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没有做好。

**赵顺群（丹阳市发改经信委）：**

1、汇率持续下降。2、汇率是否能够稳住。3、如何深化改革。

**张立冬（江苏省社科院）：**

1、完善农村土地“三权分置”。2、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扶贫问题。3、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地生效。

**岳中刚（南京邮电大学）：**

1、外资大规模撤退，民企生存之艰难。2、如何激励各级政府推动经济建设的积极性。3、企业创新动力不足，如何实现经济转型升级。

**张建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1、全国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对制造业发展的担心。2、新动能是否和如何生成。3、如何以创新（主要是通过制度和技术创新）培育新动能。

**张三峰（南信大）：**

1、房价上涨。2、民间投资低迷。3、私营企业经营环境能否改善。

**单豪杰（中投证券）：**

1、人民币持续贬值、房价持续走高。2、教育改革与人才激励建设。3、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内生发展动力依然不足，宏观刺激效应效果不大，进入恶性发展循环。

**孙国民（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1、三去一降一补中的去产能，去库存。2、2017 年经济能否实现一季度开门红，尤其是上半年的经济走势。3、经济发展动力不足。

**韩 平（哈尔滨商大）：**

1、全国上下对实体经济和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忧虑。2、去产能找动力。3、如何引导创新创业（主要是通过制度和技术创新）培育新动能。

**黄忠全（江苏五星资产评估公司）：**

1、许多一、二线城市房价非正常高速上涨，导致政府限购政策出台。2、实体经济如何真正发展。3、川普上台导致政策不确定性，有可能引起中美贸易及相关问题。

**孙月平（江苏省委党校）：**

1、房价持续走高，民间投资下降。2、股市发展。3、内忧新旧动能转换，外患特朗普乱来。

**曹东坡（东方邦信）：**

1、宝万之争。2、房地产市场（特别是一线城市）发展。3、国内投资下滑。

**徐 宁（南京大学）：**

1、民间投资断崖式下滑，经济发展的民间动力消失。2、各方面各领域的经济政策。3、经济发展的旧动能已破，新动能未立。

**苏 健（南京社科院）：**

1、制造业的转型升级。2、企业的国际化发展。3、全球范围配置资源的能力能否得到提升。

**张小兰（西南民族大学）：**

1、全国生态环境恶化。2、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和绿色发展。3、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蔡汉东（伟机投资有限公司）：**

1、房价上涨。2、企业税负及营商环境。3、全球化新格局。

**吴学军（金泉投资）：**

1、涨价去库存、去产能。2、通货膨胀什么时候发生。3、如何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为经济保驾护航。

**洑福强（苏食集团）：**

1、股市熔断机制失败。2、企业脱实向虚的现实。3、实体经济信心不足。

**张友良（湖南省委党校）：**

1、房价分化加剧。2、创新机制。3、金融市场。

**田志刚（南京财经大学）：**

1、税负之争。2、地方政府债务。3、制度环境与产权环境。

**翟太煌（山西证券）：**

1、去产能导致煤炭钢铁价格上涨。2、通胀。3、军民融合。

**金心异（深圳独立学者）：**

1、财政收入增长衰竭。2、人民币汇率。3、信心危机。

**姜德波（南京审计大学）：**

1、行政手段去产能。2、经济发展新动能。3、特朗普的经济政策。

**龙晓荣（银河天成集团）：**

1、差钱。2、十九大，经济向左还是右？ 3、诚信。

**杜运苏（南京财经大学）：**

1、去产能导致原材料价格飞涨。2、滞胀。3、新增长动力不足，投资拉动效率在下降。

**刘晓昶（华泰证券）：**

1、国内经济疲弱，人民币持续贬值。2、国内经济增长新动力在哪里。3、对发展国内经济、应对全球博弈尚无明确思路。

**杨 锐（苏州大学）：**

1、企业迁移、倒闭。2、如何形成国企与民企协同进步的经济发展新动力。3、激发、培育企业家创造力。

**周 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1、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差距。2、实体经济的创新发展出路。3、实体经济的金融发展环境。

**谈 镇（江苏省委党校）：**

1、房价暴涨、股市疲软。2、经济风险消除。3、不在国外的外因，而在国内的内因。思想混乱的假改革，虚发展。

**鲁明泓（长江产经智库特聘研究员）：**

1、上半年股市熔断和下半年房地产急刹车。2、2016 年四季度 PPI 走势趋好是否延续到 2017 年，以及经济的全面好转。3、中国经济从外向出口规模型转向内向消费创新型。

**毛 强（中国党校学报）：**

1、一、二线城市房价大跃进。2、实体经济如何稳定发展。3、金融风险和债务风险问题。

**何 雨（江苏省社科院）：**

1、民间投资断崖式跳水。2、民间投资信心何时恢复，以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3、民间投资信心不足。

**刘东皇（江苏理工大学）：**

1、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房地产调控。3、开拓国际发展空间。

**宋常铁（新华网）：**

1、国进民退、东北早衰、实体不振。2、民营银行的前景，会设置多少？ 3、运动反腐 + 清官文化抗拒政治体制改革，经济进一步下滑。

**蒋乃华（南通大学）：**

1、房地产业市场剧变。2、增发货币去哪儿了。3、经济增长缺乏新动力。

**钟永一（江苏省社科院）：**

1、东北塌陷。2、民生民心民情。3、内外交困的应对。

**华建强（省发改委）：**

1、地条钢事件。2、省级政府在当前经济下行过程中应该更强势还是更放手。3、经济下行有没有安全底线，在哪里。

**方向阳（中国财政杂志社）：**

1、经济下行压力加大，L底守不住。2、雾霾问题何去何从？ 3、内部如何恢复民营经济活力，外部如何应对川普冲击。

**蒋青云（复旦大学）：**

1、房地产市场由年初宽松到年中趋紧，到年底几乎歇菜。2、除了投资规模外，中国经济究竟有什么可持续发展动力？ 3、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

**黄志军（南京大学）：**

1、股市的持续震荡与房地产调控。2、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评估框架对有限信贷投放影响。3、经济缺乏内生动力，产业升级缺乏。

**许 萍（苏宁环球）：**

1、房价上涨，宝万之争。2、通货膨胀何时到来。3、如何激励和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

**钱 锋（深圳城市空间）：**

1、一、二线房价暴涨和国庆密集统一的调控政策。2、国进民退，实体经济动能。3、地方债和企业债。

**张 程（江苏证监局）：**

1、人民币大幅贬值、实体经济持续不振。2、企业减负。3、形势越来越严峻，办法几乎没有（可行的办法是有但被采纳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郑江淮（南京大学）：**

1、一、二线城市房价高涨。2、有没有切实降低企业成本的措施。3、外汇和资本市场继续暴跌。

**杜庆江（盈科全球）：**

1、房价暴涨、股市疲软。2、面对现实，而不是一味歌舞升平。3、国外：全球格局变革以及汇率等产生的影响，国内：政局对未来的影响。

**陈秋霖（中国社科院）：**

1、数据造假在中央层公开批评。2、地方融资主要是为过日子而不是发展，如何持续？风险多大？ 3、一刀切的三去一降一补，没有精准发力，容易南辕北辙。

**张慕濒（华东师大）：**

1、资本市场制度建设停滞不前、思路不清。2、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方向。3、制度上是否留足民营经济发展的空间。

**于明超（南京师范大学）：**

1、互联网金融乱象。2、国有企业改革。3、稳定汇率和刺激增长。

**刘玉荣（南京大学）：**

1、实体经济的“脱实向虚”问题。2、制造业与服务业资源要素配置扭曲如何矫正问题。3、全球贸易低迷与贸易保护背景下，企业如何转型与重塑新的竞争优势问题。

**聂敏杰（中房海通）：**

1、宝万之争。2、经济发展转型升级，即经济发展新动能（如何引导投资）。3、新经济拉动的增长动能不足，人民币汇率和外汇管制挑战，如今三驾马车齐放缓（熄火）后如何有效刺激，供给侧改革对经济的调控成效。

**战岐林（山东工商学院）：**

1、资本外流。2、实体经济环境。3、实体环境能否出现向好的趋势。

**陈伟贤（江苏省人民医院）：**

1、房市不正常的暴涨，中国经济令我迷茫。2、中国中小经济体如何发展？是否都要迁徙

国外。3、政治经济精英要向中央讲实话，不要虚假空谈。

**邓 立（中国商业联合会）：**

1、交易场所乱象丛生。2、中国经济转型升级。3、国际环境不确定性。

**纪 明（广西师院）：**

1、去产能与房地产价格上涨、钢铁等行业价格大幅度波动。2、侧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措施。3、经济增长新动能培育。

**宋文阁（江苏省国资委）：**

1、房地产最严历调控及资本市场失范。2、国资国企改革的深化及混改作为突破口能否落地。3、阶层利益固化及政治体制改革。

**林学军（暨南大学）：**

1、外需下降，内需不振，经济增长乏力。2、拓展海外市场，发展新兴产业。3、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内经济活力不足。

**楼稼平（宁波布衣）：**

1、被别人认为是非市场经济国家以及我们的狡辩。2、短期极悲观，认为当下的经济问题已不可能以经济学的方法所能解决。3、RMB 贬值以及为抵抗贬值的措施所带来的伤害。

**程 鹏（江苏巨和实业有限公司）：**

1、发达城市房价上涨。2、税费社保征收居高不下。3、各级高中低层干部如何与中央 / 国务院政策保持一致。

**司增绰（江苏师大）：**

1、大学生就业难。2、啥时能够真正重视消费、真正重视实体经济，真正重视创新。3、中美贸易摩擦。

**夏海力（苏州科技大学）：**

1、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房价的暴涨。2、制造业和实体经济遇到的困难。3、如何建立对我们有利的经济国际化规则。

**颜银根（南京审计大学）：**

1、实体逐步回暖。2、美国制造业再发展。3、贸易保护主义重抬头。

**查婷俊（南京大学）：**

1、汇率下跌与资本市场异常波动。2、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在哪里。3、经济政策如何提振市场信心。

**汪德华（中国社科院）：**

1、民间投资不振。2、社保改革滞后导致财政风险快速上升。3、国际经济秩序重整，有风险有机遇。

**吴舟沫（扬子晚报）：**

1、部分城市地价疯涨，却限制楼价。2、税负太重，投资无好去处。3、特朗普是否跟我们玩真的。

**张远鹏（江苏省社科院）：**

1、一、二线城市房价飙长，然后突然出台最严限购。2、经济转型升级，自主创新能力的全面形成。3、川普的保护主义经济政策对华的巨大不确定性和可能的负面影响。

**陈 柳（江苏省社科院）：**

1、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大宗商品价格爆涨，房价爆涨。2、政府平台债务问题如何良性循环。3、去杠杆与金融分险暴露之间的平衡。

**田伯平（江苏省社科院）：**

1、房价疯涨和资本外流。2、经济增长动力。3、企业家信心和国际环境。

**姜彩楼（南信大）：**

1、去产能。2、房价。3、土地依赖。

**张海丰（广西师大）：**

1、管理层对实体经济和制造业的重视和强调。2、自主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制造业高级化）。3、本就利润薄的制造企业在经济下行过程中，纷纷倒闭，全国失业增加，有发生系统性风险之患。

而虚拟经济借实体经济低迷卷土重来，形成空转之势，使实体经济雪上加霜。

**高春亮（南京财经大学）：**

1、房价上涨。2、环境与增长的平衡。3、挑战太多，但外部政治贸易，内部分配。

**踪家峰（南开大学）：**

1、民企跑路。2、经济下滑。3、政府改革。

**曹玉平（河南大学）：**

1. 外汇储备快速减少与人民币贬值。2. 驱动创新创业的金融体系结构。3. 全球化逆境和GVC 重构背景下的经济开放新模式。

**周彩霞（南理工）：**

1、外汇储备快速减少及背后的原因。2、金融领域危机累积。3、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能否协调。

**巫 强（南京大学）：**

1、宝万之争。2、中国在逆全球化中的外向型经济发展。 3、金融体系风险累积爆发，可能导致局部金融危机。

**李剑兰（北京大学）：**

1、党中央和国务院对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的重视前所未有，六大文件夯实基石。我认为这是当下也许不容易被充分估计未来却功德无量的实事之一。2、经济“脱实向虚”的问题。3、黑天鹅齐飞外部环境不确定因素增多、中国企业创新能力尚未整体形成、公民对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建设需求加大与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双峰叠加”的大背景下，宏观经济政策中“快增”和“快转”如何调协。

**曾世宏（湖南创新发展研究院）：**

1、个别地方出台不利于分享经济自由发展的产业规制。2、产业转型升级，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健康发展。3、消费升级。

**陈英武（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研究院）：**

1、全国开始大张旗鼓运动式地去产能、去库存、降成本！但民营经济投资下滑（2016 年民间投资 365219 亿元，仅比上年增长 3.2%，其中工业投资增长仅 3.4%）。2、制造业向中高端迈进，我们还缺少哪些条件？如何补全？ 3、主要还是来自内部，十九大的召开将会使各地又开始新一轮比拼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提的几大任务推进艰难。

**王文莉（中原航空港产业基金管理公司）：**

1、一、二线城市房价暴涨。2、国进民退，政府在经济中拥有过多的资源。3、雾霾倒逼产业升级。

**杜宇玮（江苏省社科院）：**

1、整体实业不振，局部虚火过旺。2、现代服务业发展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瓶颈突破。3、全球化逆境与国内制度环境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背景下，如何保持中国经济平稳增长。

**储胜金（省委研究室）：**

1、企业成本上升、对外投资加速、外资撤离加速、人民币快速贬值、加大外汇管制。2、去产能政府之手发力与民企跑路之间的关系。3、深化改革，加快国企混改、优化所有制结构，大力支持民企创新优化动力结构，培育内需型经济体系优化贸易结构。

**任保全（常州大学）：**

1、房价涨的太快。2、逆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如何实现转型发展。3、特朗普上台后中美间的经济博弈。

**陈爱贞（厦门大学）：**

1、股市不断新低房市却翻上天。2、内忧外患下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发展。3、国际形势不确定与国内各种问题可能随时暴发。

**张少军（厦门大学）：**

1、部分热点城市的房价暴涨。 2、如何确立稳定预期。3、资金如何脱虚向实。

**郭育蒿（新世纪物流）：**

1、钢铁、煤矿去产能后，第四季度的上、下游价格不对等，纠纷太多，值得思考。2、实

业如何走出困境？ 3、美国对外新的政策变化。

**罗立彬（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1、中国成为人均“中等偏上收入”，总量“全球第二大”的“特殊”经济体。2、中国如何承担起“全球经济领导”的职责。3、全球化面临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如何充分利用好“人均中等”，“总量第二”的“国情”，推动全球化深入并为中国经济服务。

**杨向阳（南京财经大学）：**

1、房价。2、民企生存与发展环境。3、市场化改革的有效推进。

**张云逸（上海鸿逸投资）：**

1、信心不足引发的资金外逃，贬值加速，民营投资雪崩。2、国企混改如何推进是决定经济发展方向的重要方面和观察点。3、解决好失信、失策、失据；重拾信心，政策协调，进退有据。

**李 群（南京审计大学）：**

1、房地产政策调控。2、真正落实“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3、信心，尤其是民资、外资的信心。

**黎 峰（江苏省社科院）：**

1、实体经济低迷而房价疯涨。2、虚拟经济的泡沫如何挤压，实体经济怎样振兴。3、供给侧和市场化改革如何进一步推进。

**刘瑞翔（南京审计大学）：**

1、实体经济萎靡不振，虚拟经济正在形成泡沫。2、大量民营企业的出路。3、十字路口的方向，向左还是向右。

**章寿荣（江苏省社科院）：**

1、三个 6.7 ＋翘尾 6.8，三去一降一补最强是补短板。2、经济发展的新动能能否形成。3、川普的随心所为与国民的经济预期飞信心。

我们根据调查问卷整理出 2016 年令大家印象最深刻的五件事、最受关注的五个经济问题以及 2017 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最主要的五个挑战。

2016 年，中国经济运行中令大家印象最深刻的五件事：

（1）房地产价格疯涨与随之而来的密集限购令

（2）股市熔断

（3）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失衡

（4）人民币贬值与外汇下降

（5）去产能带来的原材料价格飞涨。

现阶段，大家最关注的五个经济问题：

（1）如何深化国企改革

（2）如何为民营企业减负

（3）如何重振实体经济信心

（4）如何完善资本市场发展

（5）供给侧结构改革如何深入推进并顺利实现“三去一降一补”。

2017 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最主要的五个挑战分别为：

（1）中美可能面临的贸易摩擦

（2）全球经济格局重构过程中的风险防范

（3）利用创新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

（4）警惕实体经济“脱实向虚”

（5）国内经济转型升级。

# 积分落户制的合理性及其背后公共福利不均等问题

2017年2月8日

**编者按：**2016年12月27日，南京市发布了《南京市积分落户实施办法》和《南京市户籍准入管理办法》两条新规，从2月1日起，外地人“积分落户”的户籍新政正式在南京施行，这也意味着实行多年的购房落户政策将成为历史。

基于这一背景，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提到：“有人认为，迁徙自由权是现代社会公民应当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对外国人落户实行积分制可以支持，但坚决反对任何中国城市对中国人落户实行积分制，因为南京是全国人民的南京，不是南京人的南京。而这个问题背后的实质是限制国内区域间自由迁徙的积分制到底合不合理？”针对这一议题，群内众多海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对此展开了讨论。

**【积分落户等户籍制度的合理性】**

**倪 敏（硅谷创业）：**

国内用户籍制度限制了人的自由流动，长远看对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是一种限制。不放开户籍制度，那资源就永远集中在城市，非城市人口就想挤进城市，结果户籍制度趋严，城市资源集中更加明显，然后人口更想挤进来。当发达地区饱和了，居住成本高不可攀，就会向欠发达地区回流了，市场会起作用。

在美国，房价越高的地方房产税越高，多缴的税变成地方收入，有更多钱建设学校和公共设施。

**杜运苏（南京财经大学）：**

目前完全取消大城市人口限制不现实，关键是积分制与购房落户制的公平性。随着养老和医疗全国统筹推进，人口流动最大的障碍是基础教育。二胎放开以后，这个问题更加不可能解决，毕竟基础教育资源有限，一旦放开，远远超出承载能力。

**唐德淼（无锡环研中心）：**

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应该逐步取消，有不公平性；自由流动，是人力资源配置的方式之一，应以市场调节为主。

**颜银根（南京审计大学）：**

类似积分落户的户籍制度无非希望：

（1）减少人口流入；（2）多流一些“精英”。但这种制度会对欠发达地区产生更强的抽血效应。人口流动的最终结果一定是吸取欠发达地区最优秀人才，欠发达地区发展更缓。我个人猜测，特大规模，超大规模城市现在已经严重影响城市生活质量，负效应很强，因此现在政府只能用制度手段控制。

**刘根荣（厦门大学）：**

我认为积分落户的方法是积极的，应该肯定，至少让人有明确的预期。也不能过于迷信大城市，城市发展有阶段性，大城市会在未来的某一时期达到饱和，小城镇就会成为新的增长点。

人口流动的初期对流入地会带来一定的财政负担，但这些新鲜血液是推动流入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所以要有长远眼光看问题。现在各方都以自己为中心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忽视公共权利的制度建设。可以考虑财政转移支付券制度，将公共产品供给实现量化到个人的制度，每个人可以取得相应的财政资源。流入地可以根据流入人口的数量，在省级层面实现财政转移支付。

**罗立彬（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我觉得任何制度（包括积分落户和买房落户）的出现或者退出，背后都有制度的“成本”和“收益”衡量问题。积分落户有利于“实际在南京”的人口享受公共服务，而不是“只买个房子，人却不在南京就业不为南京做贡献”的人就可以享受公共服务，这应该是为了“公平”考虑，因为让一些没钱买房的人，只要在当地就业也可以落户享受公共服务。就像北京现在有不少外地人租房也可以上小学。当然可能表面上牺牲一点经济增长的“效率”，因为公共服务“均等化”肯定会牺牲“效率”，甚至有“浪费”，但是从中国国情看，有时候这种“牺牲”和“浪费”也会带来“社会和谐”的收益。

如果买房子就可以落户并享受“公共服务”，那“公共服务”就不再“公共”了，变成了谁有钱谁就享受“公共服务”。虽然市场机制最终可能发挥作用使得拥有“货币投票权”的人享受更多优质服务。但是作为政府，肯定要在政策上更支持“均等化”。从这个角度看，积分落户肯定比购房落户强。

**赵正宇（南京市园林局）：**

户籍制度不太可能取消，并且户籍制度虽然有弊端，但绝不是影响市场要素流动的主因。

**马步洋（Metalink 新材料）：**

大城市病教训深刻，尤其是摊大饼式发展模式，资源集聚到一定程度将产生负效应。采取措施延缓几个特大城市膨胀速度无疑有其很大合理性，户籍只是其中之一，且从经济社会发展长期趋势看，户籍无法真正阻挡人口流动，关键是有计划地疏导，尤其是发展次中心城市，形成人口分布的星罗点状状态，这也是其它城市的发展机遇，如南京。

实践证明，200 万以上人口城市才有产业资源综合集聚效应，大至 1000 万就可能产生负效应，中国东部应发展一批 500 万城市人口次中心城市，长期来看，是提升次中心城市资源集聚层次。医疗、教育、就业机会，以市场化机制，以次中心城市为载体，实现均衡化。

**张慕濒（华东师大）：**

户籍制度实际上已经在做出调整。我觉得人口向大城市流动这个现象不能简单地看作为了享受户籍带来的公共福利（北上深其实各有不同），大城市主要的功能还是提供了一个要素流动并高效交易的网络，比如就业机会。所以上海有很多的非户籍流动人口，只要能生存下去，再大的生活成本也选择留下来。大城市其实是制度供给相对充分下的一种市场化选择，提供大城市供给应该从北上深辐射的二线城市开始，区域经济中的一些特色地级城市也已经呈现出勃勃生机，比如广东惠州。

**鲁明泓（长江产经智库特聘研究员）：**

短期恐怕也只有积分落户了。不过可以在积分的构成部分，做些文章。如果想要高素质的人群，就把学历要求定高点；如果需要资金，就将纳税标准定高点；如果想要劳动力，就制定合适的年龄标准；如果定位公平，那就按先来后到的顺序决定。

**姜德波（南京审计大学）：**

措施演变过程：

直接交钱买户籍（上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买房入户（90 年代以后）——积分入户（现在），总体看，政策还是更合理了，是进步。

**【如何解决公共福利不均等问题】**

**刘志彪（长江产经院）：**

听一个苏南某地区县的官员说，过去买房入籍，某些相对贫乏地区的人，到该市农村地区买一套几十万的破房子，拉十几个人入籍当地，由此本地必须负担其脱贫重任，还要负担其子女教育、老人抚养、全部医疗等公共服务支出。这一方面影响了转入地原住民的公共福利，如上中小学更拥挤等；另一方面由于各地承担 2018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这会影响当地政府财政支出预算以及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身份证制度推行后，限制人员流动的户籍作用就不大了，现在户籍制度其实已变成公共福利不均等的代码，由于基础教育和医疗等资源在地区间不公平分配，要如何推进公共福利均等化?

**谭江涛（三峡大学）：**

完全依靠地方政府进行基础教育与基本医疗投入，那是中央财政的推卸责任，这种制度设计也进一步阻碍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

**孙 军（淮海工学院）：**

我认为根本问题在于基础教育和医疗等资源不公平引起的，我建议：

一是医疗、基础教育等向社会资本开放；二是给予农民土地、房屋等确权，增加财富收入，在此基础上逐步取消户籍制度。

公共福利均等化，绝对不能由权力来安排，应以来市场化，权力来弥补市场不足之处。

**毛丰付（浙江工商大学）：**

从政治上看，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社会动员机制和小城镇及农业地区不同，风险程度更高。从经济上看，特大城市是增长引擎，放开人口，财政不可持续，影响经济效率。从历史遗留看，大城市福利和其他地区比起来有巨大福利势差，积分制相当于分级泄洪。

**高春亮（南京财经大学）：**

实现公共服务完全均等化浪费也大，比如公共服务按镇村配置，如果人都走向大城市，那公共服务配置也会出问题。问题就是大城市主导还是中小城市主导，还是兼而有之。另外，我国城镇化减速也难免，如果人们愿意留在中小城镇还好，否则大城市成为必然。优质资源稀缺与人口众多是根本矛盾，流动的目的不是单纯就业，而是人力资本积累变现，大城市的作用很大的，所以还是需要增加特大城市，减少北上广深稀缺程度，这样地级市压力也小些。

**孙 东（南京审计局）：**

江宁区是个典型，在江宁不仅有临近的安徽大量需要解决的外来务工子女就读问题，还有河南等不相近的省份集中从事废旧回收的人员子女就读问题。江宁是解决外来务工子女就读最多区域，现在从建邺区往雨花区迁移，从雨花区又被疏导到江宁。所以江宁的新班额、择校率都不达标。江宁最多有接近 1/3 的外来子女就读，生均公用经费对区里都是不小负担。

**谈 镇（江苏省委党校）：**

一般来说：

公有制效率要低于私有制，共和制效率要低于联邦制！解决的办法：

加大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大地方立法权！就当下服务教育来说，义务教育由国家财政承担，大学教育主要由省级财政承担，职业技术教育由地市级财政承担。

**何 雨（江苏省社科院）：**

大城市病的原因，可能还是大城市太少了，且分布不均匀。我测算过，美国 20% 的人口集中超大城市，日本接近 40%。中国达到美国水平，超大城市需要吸纳 3 个亿，大概需要十个北京和上海。

改革以来的城市化，可以称之为流动的城市化，即，流动人口并没有沉淀，融入到城市，成为市民。下一阶段的城市化，应该是进入扎根城市化阶段。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能更实际。即，基本公共服务，其内容是基本人权层面的，应该予以保障，也是政府的职责所在。非基本公共服务，不宜均等化，而应考虑差异化，市场化。

**叶 蓁（人民银行）：**

户籍最初被强制与土地和房产联系，后又在城镇化中衍生出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的不平衡。表象看，户籍是人权保障，本质还是城市服务享有权利。此处需分析两类人的福利是否都没有损失：

一是进城者，二是原住者。尤其是不能忽视原住民的福利损失。解决当前大城市户籍等问题的一条思路是做加法，即发展三四线等城市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既能改善三四线城市原住民福利，又能吸引更多人进入三四线。对于一国或某一省辖区而言，应统筹协调发展区域经济，放开准入，完善退出机制，建立市场化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

**孙国民（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中国现在的很大问题是经济发展带来的城市发展不平衡，通过国家城市，中心节点城市建设，打造多级核心和发展高地，且要在中西部地区进行布点，然后配合政策促动，是不错的选择。

**杨平宇（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城市有那么好的公共服务主要原因是人口密度大，均摊成本不高。医院和学校只是城市向心力的一部分。消费娱乐，文化休闲等场所也是现代年轻人必不可少的。

**陆慧琦（溧阳市政府）：**

所谓公共服务均等化，体现的应该是底线思维，守住的首先是民生生存底线。在此基础上，根据财力，让群众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红利，实现可持续的健康增长和社会关怀。在此过程中，影响决策最大的是两个基本面问题：

1. 政策准入和管理方式；2. 财政分配模式。不考虑基本面，脱离实际的建议有社会效应，但缺乏执行力。

# 恢复房地产消费品属性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

2017年2月10日

**编者按：**2016年12月6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明确了2017年中国楼市发展方向，强调要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既抑制房地产泡沫，又防止出现大起大落。据此，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组织群内众多海内外知名专家、学者针对“恢复房地产消费品属性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这一主题展开了讨论。

**刘志彪（长江产经院）：**

我认为恢复房地产的居住属性、降低其投资功能，是一件很有难度的事情。因为中国人的财富增值渠道一直比较窄，不仅把房地产作为家的代名词，当成保值增值的工具，而且过往的实践也证明是最佳的选择。不像美国，财富可以通过资本市场上的各种金融工具来实现保值和增值，也可以通过资本市场来化解各种风险。美国在1900−2000年的一百年内，股票的年均收益率每年9%左右；而土地的价值在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之后，同期只上升了24%。中国资本市场保值增值功能的欠缺，是房地产作为投资项目选择的重要原因。另外，建立这种具有消费品属性的房地产管理机制，还在于其中的约束条件太多，主要的约束有：

1、要符合国情；2、要适应市场规律；3、要成为基础性制度；4、要具有长期效应。想要满足其中的一、二条约束条件，并非易事。要想办法让房地产仅具保值功能，不具有资产增值功能，在房地产已经成为投资品的前提和环境下，不太容易实现。各种政策调控的力度太大，易刺破泡沫引发金融经济危机，力度太小，又解决不了问题。

**张 晔（南京大学）：**

目前土地供应的资源错配是核心矛盾。土地资源错配这个问题，很久以前就出现了，随着大城市化的推进，这个矛盾更加突出。降房价，必须以土地供应的阶段性调整为中心，建立长效机制。

我个人认为，现在对中国城市化阶段的判断是错误的，其实，城市化已经完成，未完成的是大城市化，这也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引擎之一。也是产业结构转向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

的结果。但大城市土地供应又一直紧张，这是大城市房价上涨的原因。相反，三、四线城市人口流失严重，却在不断增加三、四城市的土地供给人口流失，所以库存压力大。

我认为或许未来以环京沪的二线城市作为磁铁，以“地票”的形式控制房价吸收城市移民，减轻一线城市压力，是一个多方能够接受的方案。中国有 13 亿人口，这样大的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完全可以有一批人口在 2000 万左右的中心大城市。

另外，我认为房产税对房价的作用，只是辅助性的，不是灵丹妙药。如果大家预期房价要涨，宁愿交税的。而且税收完全可以转嫁给租客，收取房产税，并不会改变房主是否租赁的行为。所以房子买卖是买卖，租赁是租赁，两个完全不同的市场，房租高的一般房价涨幅反而低。

**何 雨（江苏省社科院）：**

符合国情，至少有两点要考虑：

一是土地不可能私有化；二是土地财政难替代。适应规律，应该充分考虑调控与市场的关系，一刀切的长效机制恐怕有困难。

我觉得，中产阶级崛起，需求结构发生变化是新国情。其中，对房地产业的一个直接影响，就是投资需求、保值需求，取代生存需求，成为当下市场环境的一个客观存在。其实，部分城市房价暴动，是市场在资产荒压力下理性选择的结果，主要是市场行为。要阻止房价上涨，只能诉诸于非市场手段。目前看，以户籍为基础的限购最有效。

**孙 军（淮海工学院）：**

实际上，目前一、二线的房子已经足够多了，之所以供不应求完全是货币驱动下的结果。在全球货币开始逐步收缩，我国汇率贬值的大背景下，增加土地供给有必要性，但并非最有效手段，到时恐怕烂摊子更大。目前，恐怕仅在房地产上打转很难的，发展资本市场至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手段。

房地产本身就具有投资属性，因此完全化解不可能。由于房地产体量大、产业链长，因此就应该重视房地产行业。目前的问题是，这种模式的上游尤其土地层面不具有市场化应对机制。因此，下一步就是要化解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冲动，一是要央地重新分权，化解地方因财政不足，土地供给过少问题；二是要学习重庆的“地票”制度，建立具有市场化的土地调节机制；三是建立保障房制度，解决低端人群的居住保障问题；四是多层面供给投资品，化解投资品不足问题；五是投机过大地区开始征收房地产税。

**张慕濒（华东师大）：**

美国学区房产生的房产税一半都给学校支配，这是美国教师职业高尚的主要原因，这部分钱可以用来请最好的老师，做最好的设施，培养出最好的学生。学生家长也愿意承担高房价，良性循环。这种方式可以借鉴。

**缪放嵘（南京中诚石化集团）：**

未来可能的政策调整是土地使用权期满，自动免费续期，但期满后与房产税交纳挂钩。用存量房每年的持有税抵新开发土地出让金的不足，来平衡地方财政不足。目前上海二手房与一手房交易比是 4.8:1，因此在存量房上做文章税收空间更大，是趋势。

恢复房地产消费品属性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真要做到就一条：

住宅成交的增值部分交税与办公、商务的房产一样，纳税占到增值部分的约 55%。

**踪家峰（南开大学）：**

二线以下城市的房地产本来就属于消费品不需要恢复，一线城市允许政府发债冲抵土地财政以及征财产税，则有可能解决这一问题。房地产不能市场化，特别是土地市场不进行市场化，房价会一直涨下去。

**赵正宇（南京市园林局）：**

政府干预和监管的目的，还是回归市场正常功能的恢复。除此之外，政府首先要做的是困难群体的基本权利的保障，政府掌握土地，应该做的是保障基本住房需求，而不是控制房价。

**孙国民（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说一个简单粗暴的方式：所有房产按家庭户口进行登记（自主报，并进行核实。未上报的，一经发现，无偿收归国有。），然后进行“打土豪分房产”，将土地革命引入房产革命。限制每户最多购房套数，超过部分全部由国有收购公司低价收购，然后以对等的价格售卖给消费者，解决炒房者待价而沽的问题。

**史先诚（江苏金融办）：**

房地产消费属性的回归：限制家庭人均总面积，有钱也不让多买，同时控制公司持有非租赁性住宅地产物业。持有超出家庭人均总面积的，按商业地产政策执行增值税。但如此，将导致房地产市场崩盘风险大。所以要逐步分级实施增值税。

**许 晖（江苏省经信委）：**

我认为可以部分借鉴粮食政策。粮食是私人产品，粮食安全却是公共产品；住房是私人产品，但住房保障应纳入公共品范畴。两者虽有不同，但也有相似之处。

公共品提供不等于计划经济。而且计划也不是“洪水猛兽”，市场和计划都只是手段，哪种（或混合）方式效率最高，选择哪种方式。新技术条件下（如信息化），市场和计划的分野将逐步缩减。

**陈志龙（财经作家）：**

存量环节的税收政策虽是最有效的长效机制，势在必行，今年应该会有试探性的审慎方案在面上推出。

三四线城市除昆山（靠上海）、东莞（广州深圳之间）等少数发达地区外，基本已处于严重过剩状态，扬州的一个几十万人口的小县城，大规模“东扩”10 公里造新城，以为自己是上海或深圳，目前过剩 400 万平米，房价回到 09 年水平。

**孙 东（南京市审计局）：**

这两年国家对于扶贫政策突出一个词——精准，从目前地产调控政策看，也要突出精准。以南京四大保障房片区为例，第一，里面相当部分是拆迁安置，不具备保障属性，而且一户多套普遍，其他地方也类似；第二，公共服务配套跟不上，好多主城区的人，户籍仍就在原地读书；第三，就是择邻而居，已入住人的素质不高，很多人有房子也不肯过来住。

**罗立彬（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现在的“限购”政策只需要严格和完善执法手段就可以达到较好的调控效果。观察我们身边左右，不少家庭都已经有两套住房，考虑到我们房改是上世纪末才开始的，所以这一代人需要买两套住房也是“合理”的。比如我们普通人都希望自己有一套，再给儿女置办一套。我相信人们对房子的需求不会不停的增长。据“权威”分析，世界范围内，户均住房拥有量达到 1.8 套，就会有“拐点”。现在从全国来看，房价上涨已经从之前的“普遍上涨”过渡为“有的涨有的降”（所谓“冰火两重天”），说明人们对房子的需求整体看已经下降。所以相信中国人对房子的需求会随着人们拥有住房数量的增加而逐渐“回归理性”，到时候政策调控的空间也会加大。

**张建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之一就是土地资源稀缺，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及衍生出来的疯狂炒卖违背了这个国情。建立使房屋成为基本消费品的基础制度和长效机制，应当符合国情：一是，设置一个住房标准，保证城市和农村居民一个家庭拥有一套住房，多余的收重税；二是，对于刚到城市的农村居民，作为过渡，可在农村和城市各拥有一套住房，其中对在农村的房屋设立一个过渡期。

# 如何发挥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国企改革重要突破口的作用

2017年2月13日

**编者按：**2017年的改革已疾驰上路。其中，发改委体改司牵头的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今年将在国家层面上扩大试点。同时，地方也在全速推进混改。在近期的地方两会上，大多数省份释放了将在今年“铺开”地方国企混改试点的信号，这无疑增加了混改“升级扩容”的想象空间。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据此提出了“如何发挥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国企改革重要突破口的作用”这一议题，并组织群内各行业专家、学者展开了讨论。

**倪 敏（硅谷创业）：**

个人觉得把经营不善的国企资产评估后走司法拍卖，设置保底价，信息公开，价高者得。以前90年代国企改革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其实路子是对的，但执行过程不公开，结果资产留到厂领导私人腰包去了。现在互联网平台这么开放，只要信息公开就不会造成资产流失。

**何 雨（江苏省社科院）：**

混改，也可以理解为国有企业在实践上的“返祖”，重回建国初期“公私合营”模式。只不过，建国初期公私合营的方向是走向全面公有化，而现在则可能是开启了私有化帷幕，特别是在竞争性领域中。混改有一个好处，就是要看市场脸色，无法搞强制性的拉郎配。如果国企拿出来的资产，都是烂货，社会资本是不会跟进的。这在相当程度会倒逼国资拿出优质资产。

在混改方案设计中，一定要对社会资本股权进行充分赋权。不仅取决于决策层的后续动作，同样取决于实践层面的制度创新。在我看来，可以采取“三分离，三保证”措施：

“三分离”：一是混改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要分离，以切实保证混改企业的市场化运行。二是在混改企业中，国有资本部分，要保证党企分离。党组织可以负责监督，但是不宜过分介入日常经营。三是要保证政治责任与经济责任的分离。传统上，国企要承担维护就业稳定，保证市场平稳的政治功能，而社会企业通常只承担经济功能，即效益导向。混改后，要对竞争性行业的混改企业，其政治功能与经济功能进行切割。“三保证”的内容有：一是保证市场化方向。混改企业在日常运行中，坚持效益导向。二是保证法治化。即，混改企业中出现的问题，不宜参照传统国有企业解决方案，而是参照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方案。三是保证公私资本在权利上的地位平等。考虑到实践中公权力对公有资本的倾向性，应在方案设计中，适度增加保护性条款，

保护民营企业。例如，可以设计一个豁免条款，让民营资本只承担经济与法律责任，不允许追究政治责任。

**彭本红（南信大）：**

混改的初衷有两层意思，一是吸收社会资本发展国有经济，二是改进国企治理结构。但实际操作难以达到目的，主要原因在于目前的国企是党委说了算，效益好的国企不会允许外人染指，或只许权贵资本进入，而效益差的民资不愿进入。因此如果没有良好的顶层设计，必将导致国有资本流失，而治理结构得不到任何改善。唯一的出路恐怕还是要回归制度层面的设计。产权清晰、权责明确、引入现代治理体系是一条好思路，现在要加一条保护私有产权不被充公。

**李建平（卧龙湖小镇）：**

混改肯定比国有独资好，现在国企基本上是大企业，就在证券市场上去改好了，但实际上市混改后的企业还是按照国企管，任命干部还是列入干部管理序列，实际上还是国企。

**宋凌炎（江苏精诚 & 精缇毛毯）：**

混改对于国企来说有一定的排斥性，应该把国企的垄断适当放开让民企参与管理，民企的拼搏精神可以植入国企中去；另外一个方面，引入一些年轻有活力的管理层对国企的推动创新有一定意义。

**闫 浩（江苏经信委）：**

举一个例子：徐工集团和三一重工是中国工程机械的龙头企业，位列第一、第二，一个是国企，一个是民企，二者都在争取老大地位。当年徐工的优势是劳动生产率远远高于三一重工。近几年经济形势不好，三一重工调整经营策略，把员工从近 7 万人压缩到 1.5 万人，徐工的经营机制不如民企灵活高效，人数仍然是 2 万人，徐工集团解释说：当前经济形势不好，我们不把冗员推向社会，这是国企应尽的社会责任。

**张晓东（中国管理科学学会）：**

更根本的是体制和机制，是否缩编并非问题的要害，有效管理提高效率、人均效能才是要点。三一重工确实在信息技术上投入不小，但却也未必会超过徐工花的钱。关键是三一重工的 IT 建设一直有规划、有条不紊、稳步而坚定的推进。徐工集团信息化建设的章法则与三一重工明显有差距。

**孙军（淮海工学院）：**

我感觉混改要让国有企业变得更有效率，要解决几个问题：一是 CEO 等管理层的激励机制要完全市场化；二是国企的党委如何定价的问题，若仅按政府领导定价，收入太低，与 CEO 团队收入差距太大，一定会形成问题；三是决策的效率问题，层级不能太多，尽量扁平化运作，要给 CEO 管理层充分的支配权（这方面可以好好研究一下万科团队，这个背景虽然有点特殊，但确是国有化的企业）；四是混改的目的就是引入市场化机制和力量，因此应从法律层面坚决保护民资的安全性、自由进出的选择权。民资的目标单一，而国资目标多元化，很难协调。混改要想成功，必须以市场为根本，以民资为主导。所以，在大多数行业中，国资完全可以通过战略性投资去实现自身目的，这就要求国资在很多行业尤其是竞争性行业中转换思路。

**张俊芳（东方国际）：**

混改可以用期权激励管理层，研究好的期权机制来激励管理层可以为国企私有化找到出路。

**史先诚（江苏金融办）：**

混改建议，适用于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

按上市公司标准全面股改，要保留的国企，国有资本留着绝对或相对控制权，其余股权放开由各类企业申购，民营资本用手或用脚投票或退出。国有资本采取股权投资方式介入民营企业和民营上市公司，同样用手或用脚投票。

**陈 东（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1. 混合所有制的主要目的是淡化所有制的外衣，为了以后以社会资本而非国家资本的面目出现，而不是以放大国有资本为目的。2. 目前混合所有制改革最好以不同的国有资本交叉持股为过渡阶段，以建设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为手段，逐步吸引民间资本进入。3. 国有企业党委会领导主要体现在大型央企或国企的总公司层面，面广量大的层层控股交叉持股的股权特征不明显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以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董事会）治理为主。4. 以管资产向管资本为主转变。对资本的管理，可以借鉴地方政府管理方式，加大企业的纪检监察建设，可以把纪委和监事会合并。也可以创新企业架构，在企业总经理上面设审计委员会，总管审计纪检检查。受董事会领导。5. 企业总经理可以市场化招聘，也可以上级任命，但要加强对其监督。6. 股权分散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可以创新成立党群工作委员会，委员会包括党办，以及工会，职工代表大会等群众组织，主任甚至可以社会招聘，就是企业的员工，不一定非要上级任命。7. 混合所有制企业要行政脱离，高管可以持股。8. 混合所有制企业必须要是独立的法人实体，尽量不要是子公司或分公司。无论是国有资本还是民营资本控股，都是社会资本。最好从资本属性上，经过多重持股，已经看不出是谁控股了。

**翟太煌（山西证券）：**

要和实实在在为百姓为国家为政府服务的民营企业混合，而不是那些汇率一跌就出逃资金、成本一高就转移生产基地的民企，不把外部成本转给社会，如污染造假等。

**张云逸（上海鸿逸投资）：**

（1）混合所有制是当前形势下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的一个最优实现形式。

（2）混合所有制，实现了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现代企业制度、坚持走市场经济道路、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有机统一。

（3）混合所有制，既可以通过层层控股实现国有资本对国民经济特别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基础领域、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产业和集中发展优势产业方面的控制力和决定作用；又可以通过股权纽带的和谐共生，加强对各类社会资本和社会利益格局的管控和协调，减少利益矛盾、社会矛盾和不和谐不稳定的因素。

（4）混合所有制在具体的股权设计上要严格区分两种情况：

一是在前述重点领域和行业要坚持国有资本的控股地位，坚持三个三分之一的原则，即国有资本占股比例在三分之一以上、公司管理层和公司内部职工占股比例在三分之一以下、社会资本占股比例在三分之一下。二是在一般行业或领域、已经或者即将充分竞争的行业或领域，采用对优势企业参股的办法，分享其经营成果和利润，保持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并为重要领域投资提供储备。

（5）混合所有制的企业必须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完善新形势下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使企业成为独立完整的市场主体。这种新形势下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应该有四层，第一层是党委，作为公司的最高领导机构，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党委会讨论通过，主要决定公司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和方向路线问题。第二层是股东大会，作为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主要讨论公司的重大经营决策。第三层是董事会，作为公司的日常决策机构。第四次是经理层，作为公司管理的执行机构。

（6）混合所有制可以通过与资本市场有机结合，严格区分产业层面和资本层面。在产业和企业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提高国有资本和其他各类资本的流动性来提高其自主选择和保值增值能力。

（7）混合所有制持续稳定运行的基本前提是独立的企业财产权和公民个人的私有财产权得到充分保障，这就要求有一个相对独立、公正、基本稳定的宪法法律体系和司法保障体系。

（8）混合所有制的入股形式，可以按照社会各个单位和个人的资源禀赋和其提供的生产要素来参与，并按照实际为企业创造的价值进行调整。资本、技术、劳动、管理通过合理评估皆可入股。有利于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提高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并通过持续对全社会生产要素和产业资本的整合，不断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

（9）混合所有制在国内适应了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在国际上也有利于我国作为大的经济体全面地参与全球化和国际竞争。

（10）其他形式的所有制主体其实大可不必抵制混合所有制，而应该积极拥抱混合所有制。一是现实条件下的最优选择，可以通过资本形式充分实现自己权益的独立性和完整性。二是主动参与到混改中也减轻了竞争压力和工作压力，有更多精力关注健康和家庭。

（11）混和所有制保证了国有资本在国民经济和重要领域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保证了党对企业的绝对领导，充分调动了企业家的精神和创造力，保证了员工的基本利益，在具体运作时应充分发挥基层和群众的智慧，放权让利搞活，一企一策，达成各方满意的方案。

（12）混合所有制的最终成功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决策机制、有效的激励机制，完善的管理流程和业务流程以及严格的审计制度和监督制度的基础上。

**杜运苏（南京财经大学）：**

从股权来看，国企上市公司已经有一定分散，进一步分散也不难操作，上海等地已经开始试点推广员工持股计划。难点是治理结构，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怎么样实现优势互补，高效管理。

关于国企混改的退出机制，通过资本市场最有效，上海经验很有借鉴价值，但没有上市的国企比较难，可以考虑与国家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结合起来，既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又为国企混改提供了一个退出途径，一举两得。

**杨平宇（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多元化的集团公司可以根据不同类型的子公司采取不同的控股比例，甚至可以少于 50% ，只需总体上有控制权。比如，有利用对方资金的，利用对方技术的，和利用对方管理经验的。

**单豪杰（中投证券）：**

对国有企业而言，核心矛盾依旧就是政企分开。否则，国企的决策依据就是党章，私企外企的依据是公司法。我身边的几家企业也有外资、参股，主要是财务投资，在管理上没有实际权力。

国企改革其实多年前的思路是正确的，抓大放小、政企分开、国家重点控制一些公共性的垄断企业和关系国家安全领域的企业，其他竞争性领域都可以退出控制权，可以财务投资实现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

**刘瑞翔（南京审计大学）：**

混改的关键问题是混改后控制权的分配问题。在加强党的领导背景下，如何保证民营资本的合法权益，这是重点也是难点。当下混改和以前的国企抓大放小不同，以前的抓大放小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一种转变，整体上国有企业是逐步退出市场的。在现有的背景下，混改

可能发展为国企加强对市场经济控制的一种方式。

**蒋青云（复旦大学）：**

我觉得混改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要探索包括 VIE 在内的新型治理结构，以保证混改后的公司足够有效率；二是要充分考虑包括原国企企业家的贡献在内的新型激励机制，从而优化治理结构，防止宝万之争、南玻事件再现；三是优化党对公司经营的领导，主要通过国资股权代理者行使所有权，千万不能以党代政，政企不分。

**王建优（朗姿股份）：**

混改的关键是要看公司治理结构中谁说了算。我曾亲手操刀过两个案例，一个是国有引入民营资本，另一个是民营引入国有资本，且两种情况下国有与民营股权相当，但其实公司治理的权力结构没有发生本质变化。其中最重要原因，国有资本运营的好坏与国有资本代表者的利益几乎不相关。

**刘根荣（厦门大学）：**

混改的根本目的：一是为 100 万亿左右的民间资本找出路，开渠引水，成为发展国有经济的重要力量；二是为完善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带来真正有效的监督者。但混改面临一系列问题：

一是国有资产会不会成为私人资本的口中肥肉，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二是国有企业特殊的治理结构是否能够通过引入民营资本而得到有效改善？本人认为可以探索试点，不要全面铺开，防止一刀切的冒进做法。在总结试点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探索可能的路径与方案。

不要太在意国有资产的存在形式，不要拘泥于某种具体形态的资产。可以将竞争性行业国有资产转化为国有金融资本，以国有股权投资基金方式自由选择进入或退出，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目标。对于某些确实需要国家控股的行业或企业，可以通过国有股权投资基金方式进行股权投资实现控股。

**宋文阁（江苏省国资委）：**

混改关键靠战略及实施方案，形成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举一个混改成功的经典案例。我在亨通集团挂职时，亨通集团当时有美国资本、日本资本、国有资本，还有个人资本，现在看亨通集团通过混改发展的很好，就证明混合所有制还是有生命力的。

**王修志（广西师大）：**

1. 在制度层面，重点有二：（1）民间资本准入制度设计，即通过制度改革打破此前对民资

的进入限制。相对于新旧“非公36条”的“玻璃门”现象，混改显然希望通过国资和民资的混合经营，彻底拆除“玻璃门”。制度设计需围绕“能否进入”和“愿否进入”展开。（2）民资合法权益的法制保障。对民资合法利益的法律保障，是化解民资后顾之忧的前提。因此，需要在宪法及相关法律方面的进一步完善。法律条款的修订要围绕“敢否经营”展开。

2.在操作层面，（1）要坚持“实践出真知”原则，减少是非争论（姓资姓社），鼓励先行先试。（2）混合之前应该有一个目标整合环节，以最大限度规避目标冲突。国企的目标相对多元，民企的目标则相对单一，组成混合体之后的经营和发展目标如何设定？个人觉得民企原来的目标需要做加法，即至少应该纳入企业社会责任目标；国企原来的目标则应该做减法，要适当淡化隐形的政府职能目标。（3）理论研究工作应着眼于对实践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升华，提炼有推广意义的实践操作模式，要尽量杜绝在具体操作方案中的纸上谈兵。

**易志高（南京师范大学）：**

我认为可能还得考虑如何混或混的具体方式，民企以现金、股权、资产还是用其他来源资金混入，这可能会对其混后的运行方式及风险有很大影响。因为不同的资金来源其风险也不一样，或者风险承担能力和意愿也不一样，并且这个资金来源和混合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关联的影响。

**孙国民（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1）股份所有制是全球性的现代企业制度，混改是释放和弥合国有企业和国际同类（顶尖）股份制企业价值创造的余差的重要制度性选择，是改革前进的方向；

（2）现代企业治理要考虑“五个权”，分别是企业所有权、经营权、经营决策权、监督管理权、剩余索取权，这“五个权”的制衡和匹配，是混改必须要过的坎，混改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各种“权”的争夺。理论上讲，谁能实现混改后企业价值的最大化，谁就拥有相应权利的配置；三是混改中涉及公私多种所有制等多方面问题，建议允许公私所有制企业相互持股，也要考虑到大型金融集团（包括银行）的参股和控股（如金融机构成为战略投资者或者财务投资者），还要考虑到通过多级持股以实现较少的股权实现更多的股权控制。

**孙月平（江苏省委党校）：**

1.宏观层面，从抓大放小而来，当前国企改革重点是央企、省属国企，存在的问题都是老问题：人员、债务、经营亏损等等，混改的目标应当是减少国企数量，做强做优做大应当从国资层面理解。

2.中观层面，从国资集中而来，当前重点是部分行业国企垄断，存在问题是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则，混改的目标应当是增量方面放手发展民企，存量方面对现有国企重组，引入民资或其他国资，改革成功的标志是民企巨头、龙头的大发展，例如房地产行业等。

3. 微观层面，从政府主管部门改制而来，当前重点是集团、母公司层面，存在问题是政企、政资、政事不分，混改的目标应当是重组、整体上市，难点是公司治理结构，当前只能是交叉任职，双向进入，改革成功的标志是职业经理人制度的成功。

4. 国企是政治体制的微观基础和重要环节，中国国企改革只能和政改同步进行。

**谈 镇（江苏省委党校）：**

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几点思考：1、当下的中国经济改革还有两块难啃的硬骨头，一是国有企业改革，二是金融改革。2、国有企业改革从放水养鱼、放权让利，到两步利改税、承包制、股份制，到现代企业制度，虽然步伐艰难，大方向正确。3、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次优选择。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部分基本经济制度和第三部分现代市场体系最大亮点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混合所有制是同义两说，而理论和实践部门都只赞颂前者。4、混合所有制的判断要弱化所有制和产权的纠结，在一个国有企业产权缺损严重、看重使用权内部人控制的时代只要外部资本进入都可以计算！ 5、混合所有制的关键还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法人治理结构。6、可能有效的操作路径还是退出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金融等 8 大领域以外所有国有资本；上述 8 大领域放松地域垄断，渐进推进民营化。7、混改的保障是政府职能的转变，转变的两个关键就是权和钱，法治阳光政府等是权的重点，改革财税体制的关键是决算公开化！

**任保全（常州大学）：**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有力推进，离不开提高民企的参与热情，而这又离不开投资过程中的经营效率提升和投资风险的化解。其中最为关键的是，降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交易成本，逐步打消民企投资的顾虑。一是建立符合民企和国企各自相对公平的话语权体系；二是建立公开透明的综合互联网信息服务平台，降低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投资风险和效率损失；三是建立有效的“纠错退出机制”，降低民企投资的纠错退出成本，让民企投资能投得进、退得出。

# 你最期望提交全国两会的国是提案是什么？

2017年2月17日

**编者按：**随着2017年全国两会的临近，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组织群里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及各行业的企业家们，针对“经济学人最期望两会代表提出的前三项国是提案或议案是什么”展开了调研。

## 经济学人最期望提交全国两会的国是提案

**储胜金（江苏省委研究室）：**

1. 建议推进税制综合改革。加快房地产税的出台，推进重构房地产价格体系，回归住房的居住属性，为社区公共服务提供持续稳定的税源；顺应美国等发达国家减税大趋势，研究减轻企业综合税负，改善营商环境，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力；调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并综合考虑家庭收入和抚养负担后计征。

2. 建议全国义务教育从9年制扩展到12年制（把3年高中阶段教育作为义务教育）。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目标。而早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韩国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经济起飞之前就都建立了一整套从小学到高中阶段的优质教育体系，为产业结构转型提供了重要支撑。从“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到“普及高中阶段义务教育”，不仅是个社会问题，也是个经济问题，更是关系到提高人口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问题。这一步尽早要走，建议尽快研究方案，条件成熟后全面铺开。

3. 建议进行农村宅基地权能分离改革试点。为了维护农民的居住条件和居住安全，国家严格限制宅基地在非集体经济成员之间的流动。但对已经城镇化的农户而言，能不能将宅基地和其上的住房在更大范围之间进行流动，需要研究。其中一个改革思路是，进入城镇的农户，其宅基地的使用权仍然归农户长期拥有，但宅基地（含其上物业）的经营权（居住权）可以向全社会转让，而不应限于本集体经济组织，从而培育农村宅基地和住房转让交易市场，为农民城镇化提供制度支持。商定的转让期限到期后，由农户收回宅基地及其附着住房，也可由农户与经营户（租户）商定续约。什么样的农户可以转让宅基地、一般转让期限多长为宜、原有房屋进行改造的权责利、政府和基层组织在其中承担什么责任，等等，可以在试点中进一步探索。

**华 生（三藏中国）：**

1. 修改劳动法，出台企业及个人信用机制。修改现行劳动法，使之建立在公平公正适合中国国情民情之上。奖励具有工匠精神和诚信品质的企业，重罚造假售假有害等失信企业及个人（法人，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有相关者），制定黑名单机制。

2. 调整个税和企业税费。内需升级，必须要改革税收和分配制度，个税提高起征点（可以适当调整实体经济以外高收入人群的个税税率），降低企业综合税费，提高违法成本，让企业不再去打擦边球避税逃税，事实证明，民企在现行劳动法及重苛捐杂税下，已经很难再为所谓的“弱势群体”员工扛旗，大多数企业主终日战战兢兢诚惶诚恐。

3. 取消计生委，调整教育体制。说到计划生育，就说到孩子，生养孩子，要能生也要能养，更要育，个人觉得现在生养育都令人忧心。一句话：教育体制及导向需做出调整，培养少年强则中国强的少年青年！

**黄志军（南京大学）：**

1. 高考按片区进行划线。例如华东六省一市统一划线，再过渡到全国的教育公平和均衡；加快高等教育改革，硕士和博士并轨，提高博士待遇，推行全额奖学金制度，推进人才的深造，培育创新原动力。

2. 建构学者的旋转门制度，让高级学者和智囊可以在学界政界自由流动。

3. 在少数民族地区加快实施全国统一的生育计划，加大边疆反恐力度，强化国防现代化和战略武器库的更新升级，确保本土永续安全。

**闫 浩（江苏经信委 ）：**

根据改革的总体目标，精简政府机构，理顺政府职能。目前政府机构设置重叠，职能交叉，政出多门，互相制肘，内耗严重。在这种状况下，国家的大政方针执行起来阻力很大，各级政府机构的施政行为往往偏离改革目标，甚至成为改革阻力。不改革政府机构、精简冗员，深改任务难以完成。

**张友良（湖南省委党校）：**

1. 提高农民养老金标准。建议逐步与城镇居民养老接轨。

2. 加快推行新股发行注册制改革。

3. 完善个人所得税征管体系。建立动态的，多方位的科学化征管体系。

**周 斌（江苏省邮电规划设计院）：**

1. 农村供给侧如何深入改革并与农民长远切身利益紧密结合。

2.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突破口在哪及如何真正试点和落地。

3. 各政府及经济组织如何真正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落地并形成经济增长新动能。

**张海丰（广西师范大学）：**

1. 与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智能与新能源革命）相匹配的国内金融制度改革，如何将金融资本引向重大创新领域的提案。

2. 高校科研资助体制改革，如何由申请制转向申请与奖赏制相结合的提案。

3. 制定《保护与促进先进制造业法》，将制造业立国作为基本国策的提案。

**何 雨（江苏省社科院）：**

1. 实体经济降成本提案。

2. 民营经济平权保护提案。

3. 虚拟经济去杠杆提案。

**盛文军（人行杭州支行）：**

1. 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支持实体经济。

2. 加快垄断性行业和领域向民间资本开放进程（包括金融业）。

3. 健全完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体制机制。

**高传胜（南京大学）：**

1. 以调查民营企业与民众的方式，全面检查与评估简政放权、“放管服”综合改革的落实情况。

2. 降低企业综合负担，营造良性政商关系，吸引资本投资实业，增强企业活力、信心与竞争力。

3. 放开市场准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全面推进医疗、养老、教育等社会服务产业、事业和公共服务业分类协同发展，特别是要创造宽松有利环境，促进社会组织（特别是社会企业）充分发展，发挥它们在社会服务供给中的积极作用。

**夏网生（江苏省商务厅）：**

1. 完善高层次人才引进的政策体系，更好促进创新创业。

2. 加快教育体制改革，重塑创新基因。

3. 增加传统节日和公假天数，促进文化传承，使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王思彤（江苏省统计局）：**

1. 建议尽快出台全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监测统计指标体系，便于各地对照检查，确保按时或提前完成任务。

2. 建议加大机场航站楼火车站候车室的管理，优先把有限的空间用来满足乘客办理手续和候机候车需要，而不要被各种店铺挤占。

3. 建议加大对领导干部干预统计数据行为的惩处力度，像抓反腐败一样抓统计数据造假，坚决实行数据造假一票否决制，不让弄虚作假的干部得实惠。

**王辉龙（南京党校）：**

1. 人口增速下降背景下的教育公平问题。（城乡间、区域间、阶层间）。

2. 后发展地区如何避免污染产业转入问题。

3. 如何激励企业进行投资特别是研发投入问题。

**张健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1. 减轻民企负担，包括税收、各项费用、社会团体的乱集资和乱摊派、政府部门及官员的吃拿卡要。

2. 成立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领导组。加快不同类型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并协调其发展，比如国家科学中心、北京和上海的科创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制造 2025》中的工业创新中心等。

3. 制定高校教师和学生创业创新实施细则，以避免创业创新对正常教学和科研的不良冲击。

**巫 强（南京大学）：**

1. 提高个税起征点。

2. 有步骤开放国家统计部门的底层微观统计数据，繁荣社会科学研究，讲好中国故事。

3. 实体经济降成本，控风险。

**刘瑞翔（南京审计大学）：**

1. 政府机构改革，减少不必要的财政支出，减少维稳费用。

2. 进一步加快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对民营企业开放现代服务业，减少民营企业税负。

3.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强调科研工作中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主持人可提取科研经费中相当部分作为人力资本的报酬。

**张远鹏（江苏省社科院）：**

1. 落实减免税负 20%。
2. 简政裁员。
3. 彻底放开家庭生育政策。

**毛翠英（南京财经大学）：**

大家对于减税诉求已达成共识，但个税好像主要关注点放在了以家庭为单位以及考虑养老、购房等税制模式的变革方面，我个人觉得与此同时，还必须关注税率，否则恐怕效果依然难说。目前个税的税率相对来说还是太高，至少前三档的累进税率容易造成超额负担问题，建议降税率。

**楼稼平（宁波布衣）：**

1. 建议启动设立永佃权的研讨，三年内完成立法。第一步用来替代农田承包经营权，永佃权是农民的私有产权，同时农田所有权由集体改为国有。永佃权可以买卖、转让、抵押、继承。国家因公共需要而征购永佃权的，应按佃权的预定等级价格与市场价格孰高的原则给永佃权的所有人予补偿。征购的决定由地方人大批准或做出。除征购之外，任何人和机构不得胁迫农民强租强买。第二步用来改造农村宅基地、农民自有地的产权结构，所有权与使用权（永佃权）分开，在商业性开发，农民可以将所有权连同永佃权一起按双方协议价格售予开发者，也可以保留永佃权以收取年金形式的佃权收益。第三年将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改为永佃权，予城市居民。

2. 大力压缩政府管控范围（简政），大力裁撤行政机构（精兵），积极推进国有经济退出商业竞争性领域的投资与经营进程（节支），为民间经济腾出天地（增源）。

（1）要充分认识近四十年改革成功的实质，是放松对民间经济的管制后民间经济所释放出来的活力拯救了当年“接近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国强源于民富，民富在于人民本身的创造力，宽松的管控与低廉的税收与国家财政与税收规模持续增大并不矛盾，改开以来民间经济滋养了急剧增强的政府行政力量，也喂大了公共投资（如市政、地铁）和公共支出（如社保、外援）。但现在常识已近颠覆（总觉得功在教育领导人民），国进民退几年已使地方财税收入面临捉襟见肘的窘境。

（2）减税先精兵，精兵先简政，如果舍此次序，规模稍大而又有实质性的减税裁费举措已经没有施行空间。打破目前这种“减税官困，不减税民疲”的两难局面，只有先从政府这一方做起，予民休养，恢复民力是正道。

（3）地方的公共投资规模要严格控制了，诸如地铁之类将使今后地方财政不堪重负，实际上已经沦为货币投放的又一渠道而已。

3. 对全国社保基金、地方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的年度报告及投资项目应建立人大审议审批制

度。保值是第一位的，追求增值性的投资必须严格控制。对这种公共性基金的收支管理应从财政部、人社部管理升格到人大审议审批。

**杜运苏（南京财经大学）：**

1. 实体经济，尤其是民营企业降低税费，作为供给侧改革重要组成部分，今年要加大力度。

2. 如何应对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对下游企业的冲击。去产能导致的原材料价格上涨，今年会对下游企业产生较大影响。

3. 汇率机制改革。汇率波动明显加大，对外向型企业受影响较大，在加大汇率机制改革的同时，加快外汇市场建设，降低汇率风险。

**任保全（常州大学）：**

1. 推进房地产的健康发展。让房地产回归合理的价格区间，剔除房地产的虚拟经济成分，让其重回实体经济功能。

2. 促进教育的公平公正。消除中小学教育水平的巨大差异，也同时消除高等教育的不公平性；并且要提高高校教师尤其是科研型教师的待遇，给予知识应有的尊严，从而引导社会尊重知识注重人才。

3. 营造民营经济长久发展的公平经营环境。消除民营经济的发展瓶颈，给予民营企业与国营和外资企业同等的优惠政策，并制定推进民营企业快速发展、提升竞争力、促进转型升级的有力政策。

**林学军（暨南大学）：**

1. 如何搞好中国的新一轮开放，利用一带一路的战略平台，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提升中国国际分工的地位；

2. 加快提升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发展新兴产业，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

3. 改善营商环境，减少企业负担，激活经济活力。

**王修志（广西师大）：**

1. 工薪阶层税负改革，切实降低老百姓个税负担，提振消费，增进民众福利。

2. 深化行政职能改革，切实优化企业营商环境，降低企业（特别是民企）综合负担。

3. 以促进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转型升级为目标，深化资本市场改革。

**沈凯玲（澳洲国立大学）：**

1. 改善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处境，对一些不考虑女性生育抚育对其职场影响的貌似一视同

仁（其实是排斥女性特别是职场女性）的规定进行调整。这方面国家自科青年基金就做了一个示范，2016 年其规定申请青年基金的资格申请为：当年 1 月 1 日男性未满 35 周岁 [1981 年 1 月 1 日（含）以后出生 ]，女性未满 40 周岁 [1976 年 1 月 1 日（含）以后出生 ]。今后可以根据生育情况而非性别而定，让女性能安心生二胎。这些细节看似小事，但方方面面汇集起来却会影响女性的生育决策。考虑到我国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应该通过各种政策大张旗鼓地、扎扎实实地降低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而不是寄希望于老人的无偿付出或者女性对自身的压榨。

2. 国企改革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这方面当前的政策不明确，对策思路不清晰。不同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当前我国的民营经济已经有了质的飞跃，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经足以承担重任。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实事求是地调整我们对国企所谓解决就业问题、所谓战略意义的认识。国企做技术进步的探路者、生产力的排头兵，承担民营经济还不愿意承担的角色。所谓解决就业方面，现在国企成为城镇户籍人口的就业庇护所、寻租所。要把通过国企对一部分人就业的暗补变成市场化的明补。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国企在宏观经济中的尖刀作用，顶梁柱作用。在对国企的绩效考核方面可以通过大数据适当参照同行业同地区民营经济水平。另一方面，应该认识到民营经济是解决就业的主渠道，发展经济的主战场。政府与民营经济应该形成荣辱与共的长期契约关系，通过税收政策奖励纳税、就业、获利企业，创造守法纳税正向激励，消除老实人吃亏现象。

3. 环境治理，特别是公众关心的雾霾的治理不应仅仅依赖科技、财政，还应该重视经济手段、大数据。假设说污染企业在排污时面临巨大的排污成本，其中很大一个比例是用电成本。那么可以考虑结合电力系统的用电量数据对污染需要排污的企业先行征收根据其排污用电正常水平的电费，无论其实际用电是否达到正常水平，不予返还。如果没有达到，还要追加治污费。这样的制度可以是多层次的，不仅仅是在企业层面，还可以是在行政区，市级层面。用水等方面也可类似执行。

**姜德波（南京审计大学）：**

1. 改革：以管住政府有形之手为重点，真正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
2. 发展：以减负为重点，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3. 民生：以完善大病医疗保障为重点，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刘根荣（厦门大学）：**

1. 给企业降税减负，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
2. 鼓励高知中产阶级生育二胎，提供生育激励机制。
3. 加强食品安全管理，加强环保管制，打造安全的生存环境。

**孙 军（淮海工学院）：**

1. 降低宏观税负，减轻民企负担。
2. 修改劳动合同法。
3. 降低垄断服务性行业的进入门槛。

**踪家峰（南开大学）：**

1. 降低民营企业的负担。能否甩开膀子真正公平地看待民企，降低民企负担特别是民企税收负担，比如增值税能否降低 10%。

2. 新型城镇化问题，需要彻底废除户口制度特别是北上广深的户口限制，是否能拿出一个时间表。

3. 政府改革。

**张小兰（西南民族大学）：**

1. 高校职称评定分教学系列和科研系列，应把教学效果纳入考核标准。
2. 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到 1 万。
3. 农村卫生公共设施建设问题。

**杨平宇（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1. 打通各地区医保。
2. 试点推进主要城市垃圾分类。
3. 鼓励科技人才兼职，降低科技人才所得税。

**陈 东（南京大学）：**

1. 启用真正懂中国资本市场的专家，把资本市场搞好，否则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没戏，扩大内需更不可能。

2. 未雨绸缪，高度重视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问题。解决办法之一就是放开生育，尤其是以实质性政策鼓励其他民族安居西北，形成民族大融合局面。

**陈心颖（福建省委党校）：**

1. 特朗普的施政理念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2. 民营企业减少税负问题。
3. 如何降低交易成本，获取新一轮制度红利?

**孙国民（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1. 减负层面：第一是个体层面，提升个税起征点。按照家庭为单位进行征收，同时要对第一套住房进行个税抵扣，对财产性收入进行征税。第二是企业层面，对企业进行减负。在优化现有税制的基础上，特别是在合理税率的基础上，全面开展降费降本，理清企业各类费用，推行企业费改税改革，以实现各类费用“三个一批”，即清除一批、降低一批、转税一批。

2. 房地产行业，如何构建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长效机制，从根本上解决“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问题。要实现标本兼治，必须将房地产市场长期稳定在一个低回报的层面，实现房地产市场低收益的保值，总体收益控制在与国债收益及 5 年期银行存款收益相当的层面。

3. 宏观层面，即如何启动和激发内需市场，特别是消费市场，需要提出一个较为系统的内需市场启动的一揽子方案。至少包括（但不限于）：第一是对个人和企业要进行减负；第二是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质量满足消费者需求，要从供给侧和需求端通盘进行考虑；第三是搞活和繁荣资本市场，增加财产性收入，同时要抑制短期投机行为；第四是激活民间资本。面对改革的深水区，要扩大开放领域，尤其是要优先扩大对内资市场的开放力度。

**高春亮（南京财经大学）：**

1. 加快建设 4–6 个特大城市。
2. 加快资源枯竭型城市国企改制。
3. 优化对口帮扶绩效。

**宋文阁（江苏省国资委）：**

1. 关于快速推进改革问责制的提案。
2. 宏观税负总体减少及企业税负优化问题提案。
3. 国企改革发展及党对国企领导的提案。

**唐德淼（无锡环研中心）：**

1. 积极支持支撑《中国制造 2025》战略的先进装备制造业发展路径与规制。
2. 现代农业规模化经营的确权和流转制度设计。
3. 逐步取消事业性单位编制和行政级别。实行真正的聘用制，用市场化方式高效配置人力资源激发活力的路经和对策方案。

**朱新聪（海尔）：**

1. 个人所得税按家庭为单位抵扣。
2. 地方国企混合制改革加速。

3. 完善资本市场支持实体经济。

**梁 君（广西师大）：**

1. 高校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
2. 国有传媒企业特殊管理股制度构建。
3. 农村休闲旅游合作社的推广与发展。

**鲁明泓（长江产经智库特聘研究员）：**

1. 尽快夯实 L 型底部，稳步重启经济增长。
2. 大力发展养老产业。
3. 警惕事故频发苗头，加强安全生产管理。

**孙 东（南京市审计局）：**

1. 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落到实处，创造环境、解决问题，不能成为口号。
2. 推进学前教育教育公平，解决普通百姓上公办园难、上民办园贵问题，推进公办园招生公开透明。
3. 因地制宜指定领导干部考核制度，重视民生、环境指标，加大对各项政策落实不力、破坏环境等问题追责问责力度。

**苏 健（南京社科院）：**

1. 制定《电子健康法》，推动数字化医疗的有序发展。
2. 设立专项基金，支持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3. 建立公共财政支持多途径养老的动态保障机制。

**孙月平（江苏省委党校）：**

1. 推进股市活跃健康发展，保护散户利益。
2. 实施“扶贫济困工程”，促进社会和谐。
3. 构建“社会养老计划”，对独生子女的父母退休后实行特别的养老政策。

**刘志彪（长江产经院）：**

1. 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措施如何尽快落实、落地。
2. 实体经济如何振兴。
3. 如何增加居民的投资理财渠道。

**夏海力（苏州科技大学）：**

1. 全面清理全国开发区和工业园的闲置土地。现在全国都在兴办工业园，大城小镇无处不在，可是一些园区杂草丛生，一荒好几年，而一些真正需要土地的企业反而还要不到地，应该按照政策，几年不用的应该收回。

2. 切实为民营经济减负、降低税费。加大力度全面清理民营企业现在抱怨较多的一些部门巧立名目设立的各种收费和罚款；加大民营企业发展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方面税收优惠政策，降低企业用工成本。八项规定之下，一些官员一味避开民营企业也不行，还要建立一种亲商的政商关系，为民营企业发展解决后顾之忧和营造畅通的沟通渠道。

3. 为高校师生的创业活动提供“绿色通道”。政府多部门应该协作服务，为高校师生的创新创业提供便利条件。应该在公司注册登记、创业场所、纳税、融资等方面制定系列优惠政策，鼓励高校师生的创新创业活动。

**万闻华（连云港组织部）：**

1. 民营企业的减税减负。
2. 治污的问责制度建设与落实。
3. 打破电信石油等行业的国企垄断，适当引入竞争。

**杨 雷（南京垠坤投资实业公司）：**

1. 民企减负。
2. 劳动法。
3. 二胎和人口问题。

**张俊芳（东方国际）：**

1. 民企减负着眼鼓励就业创造就业机会，比如外贸出口企业雇 30 人减税 1%。

2. 劳动法应该像川普去 FDA 监管降成本一样才能振兴经济，人性的懒必须靠适度自由的劳动法医治。

3. 二胎和人口问题应解决高智商不生农村多生的问题，提出人口优化结构的方案。

**张明之（南京政治学院）：**

1. 个税改革。
2. 企业减负与改善营商环境。
3. 教育资源均等化，公平高考。

**蒋青云（复旦大学）：**

1. 建立个人所得税征管公平机制。
2. 切实做好农村地区的医疗保险制度，缩小城乡差别。
3. 充分发挥东中西部市场势能作用。拉动内需，减轻产能过剩负担和减少对国际市场的依赖。

**刘建森（徐工集团）：**

1. 加速建立海外投资企业的经理层在中国拥有绿卡制度，核心在于快捷高效。
2. 制定中华文明圈国家的学生来华留学培养计划，扩大中国的影响力，培育知华、亲华派。
3. 对友好国家实施中国旅游城市免签证入境待遇。

**易志高（南京师范大学）：**

1. 我国股票市场监管问题。
2. 县乡一级行政执法行为的合法化以及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再激发问题。
3. 大学教育的再定位。

**十大最期望被提交全国两会的国是提案**

我们对专家、学者们关系的问题进行了整理，按照提及的频率进行总结，发现大家希望今年两会中能够被代表们提及的提案或议案主要涉及以下十个方面：

（1）加大民营企业减税减负力度，促进国内民营经济发展。

（2）推进教育制度改革。包括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公平公正高考制度、完善高校科研体系、加大人才引进力度等方面。

（3）税制改革。主要涉及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提高、税率的降低以及减轻企业税负两个方面。

（4）政府机构改革与职能强化，全面落实“简政放权”，减轻财政压力，更好发挥市场作用。

（5）加大农村供给侧改革力度。主要包括提高农民收入与社会保障水平、加强对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等方面。

（6）完善资本市场，发挥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

（7）振兴制造业，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8）积极推进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释放经济活力，对部分行业可以降低准入门槛、开放市场引入民营经济。

（9）在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基础上，继续完善人口、生育政策。

（10）修改现行劳动法中不合理部分。

# 如何给民营经济减负？

2017年2月20日

**编者按：**近年来，我国民营经济增加值占比不断提高，民营企业提供就业岗位数量不断增加，民营经济已成为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也是我国国民经济成分中最具活力的部分。然而民营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着由于生产经营成本高、税收负担重等问题带来的巨大压力，如何给民营经济减负、提振民营企业家信心、激发创新创业新动能，是当下民营经济面临的重要难题。基于此背景，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提出了“如何给民营经济减负？”这一议题。

**刘志彪（长江产经院）：**

我们之所以讨论民营企业如何“减负”而不是如何降低民营企业“税收”，原因就在于除了税费，民营企业还面临数不清的赞助、捐赠、产业扶贫、光彩事业等等，这些也都是企业的负担。

给民企减负不仅具有双向调节供求的政策含义，而且有增强民企信心、刺激投资的政策预期。减负包括降要素成本和降制度成本这两块。前者最重要的途径是提升生产率，由此去降低单位产出的成本。这方面政策的操作空间有，但是并不大，而且大多属于中长期措施，如控制房价、改革金融体系等，由此对企业产生降要素成本效应。后者是要通过制度改革降低交易成本。税收和各种名目繁多的收费，是民企制度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财政支出刚性的前提下，目前我国全面大幅度地实施降税的空间并不大，主要实施的是结构性减税政策，但是可以从尽量减少财政支出、优化收支结构来考虑问题。一是可以阶段性地降低长期居高不下的“五险一金”费率。降费率有较大的运作空间，也是国务院印发的《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的要求。二是目前吃财政饭的事业单位太多太烂，对其改革让各种可面向市场的事业单位、中介机构与政府彻底脱钩，让其参与市场竞争，也是可以尝试的重要降费手段。三是减少用扶持名义对各类企业的乱补贴。这块数字很大，面广量大，分散隐蔽性很强，对其改革的潜力也很大。

举一个娃哈哈集团的例子：“2015年娃哈哈集团及所属企业的缴费项目为212项，缴费金额7412.07万元，包括：一是政府性基金2项，全部为国家设立项目，共3456.43万元；二是行政事业性收费26项，其中，国家设立22项，地方设立4项，共2185.25万元；三是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排污权出让收入）1项，为国家设立项目，共372.91万元；四是经营服务性收费148项，共1236.30万元；五是协会商会会费、订刊费等其他收费35项，共161.17万元。”从例子中可以看出，主要的缴费项目均为中央政府设立的。

**杜运苏（南京财经大学）：**

营改增以后，如果没有政府机构改革，降低民营企业税费的难度很大。另外，人工成本不能抵扣对很多劳动密集型民营企业来说也是一项重要负担。目前社保费有一定空间，公务员和事业单位都在推进社保改革，是个比较好的机遇，可以全国统筹规划。

**何雨（江苏省社科院）：**

民营经济减负20%，是一个非常具体的目标。通常来说，不外乎“开源”与“节流”。其中，“节流”应该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点，但是前提是减负，先要弄清民营经济负担的主要项目，看看哪些是弹性化的可操作的负担。根据经验，初步建议：一是营改增总体税点标准下调10%；二是建设透明化、规范化政商关系，降低民营经济维系政商关系的隐形成本；三是资金成本偏高是民营经济面临的普遍问题，能否采取定向措施，解决民营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陶向南（南京大学）：**

相当多的民营制造业，老板的心态是套利，而不是研发和升级，并参与竞争。所以绝不能一刀切的减负，让他们再套利出逃。因此问题的实质不是减负或补贴，而是如何通过有效的减负（−20%），促进社会总财富的创造（+25%）。

**汪德华（中国社科院）：**

宏观政策中通常关心的是减税能否刺激企业扩大投资。我曾经提出过一个方案，把增值税抵扣链条中机器设备投资的抵扣比例提高到1.5倍或2倍，激励企业技术升级。另外，税费负担，还有个地区间的马太效应问题：越是发达地区，税费负担可能越轻，典型的如养老保险费，广东企业缴费率只有14%，不发达地区却是20%。

**沈凯玲（澳洲国立大学）：**

我借鉴西方失业保险政策的思路看企业纳税的问题：

企业的税负为什么一定是根据当期经营状况征收呢？如果企业一直经营纳税都很好，偶尔有一年因为市场情况而经营不利，可不可以按其以前纳税的情况，提供税收返还呢？这样对有实力、且好好纳税的企业有激励，又规避一些短期风险。

**方向阳（中国财政杂志社）：**

涉企税收（包括企业所得税）都是按比例征收的，与丰年歉年无关；过去名义税率高，但逃避税方便，征收率不高，现在税务部门征管系统先进，实际税负接近税法税率；对企业来说，费比税更硬，很难逃脱。

当前民营经济发展的最大问题在于体制机制性障碍，包括政府不当管制、民企信心活力不足等，即使采取降税措施，也会遇上类似于货币的流动性陷阱一样，存在降税政策陷阱：也就是不断降税，却对实现宏观经济目标不起作用，同时却可能影响财政的合理支出规模。

**左健伟（政府办）：**

民营经济减负核心是希望降低民营经济的成本。而且因为民营经济的特殊性，解决其负担，不仅仅是税费负担，还有各种生产资料价格的奇高，比如水、电、气、油，还有资金价格，都比国外高出很多。我们在担心特朗普的贸易战之前，中国的外贸出口就已经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说明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正在丧失。因此，降低民营企业的成本负担，很大程度是结构性、体制性的。

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民营经济的困难，还与中国经济进入下行通道有关。在一个蒸蒸日上的经济中，企业的任何成本，都会因为下游需求和价格传递得以转嫁。因为无论是税费还是垄断资源品的价格高，都不会对民营经济产生不利影响，但是经济下行周期，就完全不同，民营经济就开始裸泳。

民营经济的困难，还与中国经济的，特别是民营企业的运营方式有很大关系。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是跟随战略，模仿、规模、价格战是绝大多数企业的基本生存法则，甚至是成功法则，因而在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企业发展遇到了技术瓶颈和成本瓶颈，原有的规模战略和低价格竞争，拼的就是成本，在成本拼不下去的时候，又没有核心技术，也就死路一条。因此，在企业不突破技术瓶颈的情况下，任何的减负，可能只能让企业在拼价格道路上再多走一段。核心还是需要培养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加大对于科技创新的扶持。

**孙国民（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中国企业目前各类负担到底是多少？假定税、费以及政府人员在行政审批、工作往来和行政执法中给企业带来的其他商务成本的总体负担是 35% 左右，那么减负 20%，那就要减负 7 个百分点。怎么做到，恐怕要多措并举：

一是减税，最为理想的状态，最好是一步到位，在现有营改增的基础上，将三档的税收各自降低 2 个百分点；同时对小微企业做好免税，放水养鱼，搞活经济。二是减费，建议取消所有各类费用，一律改为政府承担，就像取消农业税一样。三是费改税。因为各地存在各种费的不同，造成一些乱收费现象以及区域企业负担的不公平，建议费改税，全国统一征收。四是税费之外的综合降本的方法，就是要加快构建以市场化为导向，多层次、多元化、多渠道的投融资机制，各地可以有重点的进行改革试点。主要包括几点：

(1) 进一步优化债务结构，推进置换债券和新增债券，启动资产证券化，特别是要放开民营企业资产证券化硬约束，逐渐提升直接融资和政策性银行融资在总融资中的比重。为此，就需要启动和活跃资本市场（包括新三板）、债券市场等直融市场；(2) 针对间接融资，特别是银行

贷款，要将反映贷款价格的利率降到合理水平，如贷款和存款之间的整体利差要缩小到 1−2 个百分点以内；(3) 结构性减税，主要对科技创新、设备添置、知识产权保护等免交或少交税费；除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减税外，对科技型中小企业也要进行减税，比如实行 5 个点的税收优惠；(4) 对电、气、水等能源价格进一步优化，在之前级差定价的基础上，结合以“三去一降一补”为主要内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定向调控的力度，进一步明确扶优淘劣的产业导向。这里重点谈一下电力体制改革，就是要抓住机遇加快电力设施布局，然后通过电力体制改革，降低电力成本（就是要再降低电价），从而实现企业的降本。同时，还建议国家将综合降本作为政府为企业减负的一项重要工作列入年度岗位目标考核当中，要抓铁有痕地去落地实施，切实抓出成效。

**梁 君（广西师大）：**

税收负担只占企业综合成本的 6%，税收负担占企业综合成本的比重其实很低。

减轻民营企业税负的思路：

一是优惠政策应逐步着重于以技术创新为代表的企业竞争能力培育，兼顾待业人员再就业、福利企业等解决社会问题的领域；二是探索更具体的间接优惠方式，如加速折旧、投资抵免、延期纳税，而不局限于一般的税率优惠和减免税直接优惠；三是民营企业中有很多是小规模纳税人，应保证其与一般纳税人一样，贯彻“增值额多的多征，增值额小的少征，无增值额的不征”。

**孙月平（江苏省委党校）：**

民企减负是个操作性很强的问题，目的是降本增效，我的分析：

1. 政府层面：一是降税减费，费改税，二是改间接税为主为直接税为主，三是发展直接融资。2. 社会层面：推进科技进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企业运行效率，减少物流等费用。3. 企业层面：一是税收筹划，二是推进重组，三是用活用足政策。

**孙 军（淮海工学院）：**

在总体税负不能够大幅下降，经济必须分化的前提下，为企业减负主要应该是为那些中等技术、服务水平的企业减负，这些企业应该是减负的主体，是支撑中国中产阶级形成的核心，是中国摆脱陷阱的关键。给这些企业提供能够生存下去，凤凰涅槃的机会。另外，要为创新型企业出现提供环境，减少补贴。因此，一是要具体研究每个行业中等水平企业的情况，拿出针对性的减负措施，这类行业应该鼓励竞争和创新；二是要给创新型企业提供生存的条件，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补贴。另外，放松政府垄断行业的行政管制，降低企业成本、增加利润空间，同样相当于减负。

**淤福强（苏食集团）：**

提几个问题：一是劳动法部分条款将员工责任让民企最大化承担合理吗？二是国家倡导工资收入倍增计划符合经济规律并可持续吗？三是企业对外合作资产评估升值部分必须缴纳所得税不是杀鸡取卵吗？四是水、电、气、油、运的供应都是国企垄断的，其低效率高成本有可能下降吗？解决民企税费高问题关键还是要政府自身改革。一是杜绝乱收费。实施费改税，凡是税费必需依法征收。二是减少乱补贴。各种行业扶持政策及项目补贴都会造成不公平竞争和不正之风！

**林学军（暨南大学）：**

税收是一个资源的重新分配，政府拿多了，民间资金就少了。税收会带来两个效应，一个是收入效应，即因为税收使人的收入减少；另一个是替代效应，即因为有税收，影响商品的相对价格，使人的福利水平受到影响。如果利用税收进行投资，国营企业的利润高于民营企业，投资也由国营企业利润返还，这就不至于造成负担。因此，必须弄清公私之间的资源配置是否合理，是否给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

降低税收负担，首先是要降低老百姓的税负，对百姓日常生活必需品征收低税收，降低劳动者的边际税率，鼓励就业。还要鼓励百姓储蓄和投资。对企业，应当制定合理的企业所得税率，可以实行累进税率，根据企业的经营情况浮动收税。还要允许企业加速折旧，鼓励企业更新生产设备，提高劳动生产率。还要允许企业用利润弥补亏损，减小经营风险。

**张建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就我所了解的印刷行业来看，企业最期望降低的负担集中在四方面：一是，降低税收，主要是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二是，降低费用，主要是人工成本增长过快，包括工资、养老金及失业保险金。三是，降低利息，包括从银行和中介机构的贷款利率高以及担保费用高。四是，降低电费，包括工业用电和商业用电。此外，从政府的角度看，还应该从以下三方面为民企减负：一是，健康的营商环境，包括政策透明，减少政策的不确定性；依法行事，保护企业合法的产权，经营管理权；规范政府部门和官员的行为，不再对企业吃拿卡要。二是，降低物流成本。三是，为中小微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提供免费或低费用培训，以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能力和生产率，提高管理者对产业政策和宏观经济的认识能力。

经济环境塑造经济制度。当前民企负担重，是由于国内外经济环境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我们的体制机制没有进行与时俱进的变革，造成越来越大的扭曲，使得不同经济部门之间越来越不协调，经济和社会的运行成本日益增加，一些民企的逆向选择（如脱实向虚，投资海外）在所难免。

**崔卫东（蓝鲸咨询）：**

统一企业政策，由各级深改办牵头，上一级深改办检查下一级地方，凡给其他类型企业的政策，民营企业参照享受。比如：开发区给予的招商引资政策，现有民营企业同时享受（类似于 WTO 的最优待遇原则）。只要有一家企业享有的政策，这个地方的其他企业同时享受，这个地方就形成税费洼地。

**张友良（湖南省委党校）：**

各类企业的情况不一样，应分类施策。高新企业主要是人才成本和技术转化问题，这方面政府可出台一些地方政策支持。服务企业主要是物业房产上涨较快。制造业的用工成本不断上升对企业压力较大。另外，民企的融资利率在 12% 也是难以承受的。

**宋文阁（江苏省国资委）：**

一、关于民营企业税负降低 20%。我个人理解，一是税负应当指宏观税负，包括税与费。二是也可理解为当期（当年）税负比上期（上年）税负降低 20%。三是 20% 这个比例符合企业发展或盈力能力，如 28 定律。

二、关于民营企业税负降低 20% 的经济学意义。我个人理解，一是大幅度提升企业盈利能力，二是落实民营企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具体举措，尤其是大大降低了企业财税规范成本，三是为民营企业战略与产业转型提供了发展空间。

三、关于降低民营企业税负的具体举措，我个人理解：一是进一步规范营改增后的遗留问题，尤其是进项税管理问题，切实解决发票开具难的问题。二是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改革，规范费管理，费变税一部分，费废除与消灭一部分，费减免与优惠一部分。三是民营企业本身也要加强财税管理，用足用活税收政策，如可以进行合理税务筹划，加强顶层税务设计，实施业务财务税务法务一体化。四是建议从国家层面进行税制改革，与国家财政预算相衔接，在保证刚性的前提下，增强弹性。五是民营企业要积极转型，适应新常态，加大研发投入，争取更多的税收优惠。

**刘根荣（厦门大学）：**

要降低民营经济的负担，一是要压缩政府的财政支出，为降低税费腾出空间；二是要规范税费，切实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三是降低物流成本、降低商业用电、用水价格。四是要降低雇工成本，特别要降低企业负担的养老金比例。

**王修志（广西师大）：**

相对于国企，除显性的税费负担外（其解决须借助税费制度改革，可借鉴类似于当初

GATT 和 WTO 关税削减的方式），民企的负担还来自各种隐性成本，其中主要有两类：一是办理相关业务（手续）的时间成本。据我们针对桂林部分民企调研座谈所获得的信息显示，其办理业务所耗费的时间明显超过国企，职能部门拖延现象较为普遍（不知道东部发达地区是否好些？）。二是办理业务所花费的潜规则资金成本。相较于本身即拥有权力资源的国企，民企要付出更多的潜规则费用，才能获取发展所需的相关资源。所以切实推进职能部门简政放权也是必须的（从桂林的情况看，现在还是很难）。这些隐性的负担（比如职能部门拖延工作所增加的时间成本及其它潜规则成本），通过深化改革可以有较大的降负空间。

**宋凌炎（江苏精诚 & 精缇毛毯）：**

为企业减税的话题比较敏感，与其说减税，不如说如何在国际化进程中让中国企业有相对竞争力，我参加全国各种企业商会 60 个，了解下来中国民营企业真正负担重在：

一、是劳动法部分条款将员工责任让民企最大化承担，导致企业需要额外购买保险作为防范增加无形成本；五险一金给民企带来负担也很沉重。

二、中国的增值税应该要重新划分界线，建议在生产过程中劳动力成本不应该归纳为增值部分交增值税。中国制造离全面智能化还有很长的路，劳动力文化知识和技能跟不上企业的发展，必须要保留部分循序渐进的改造升级的企业来安排低文化知识和技能人员工作。

三、既然是信息时代，我们也走全球化、中国制造也要面对全球化竞争，需要考虑的问题是：我们需要了解其他国家的经济政策，与国际上各个国家对比，中国制造不要失去绝对竞争力。否则不但会造成企业与资金外流、长期以来越来越多企业将面临倒闭，经济将倒退。

四、减税不是目的，短期的减少企业负担是让企业能够在走国际化道路上健康成长。建议不要动不动就把一些暂时没有盈利的企业归为僵尸企业，要知道过去人口红利和信息封闭时代，企业的利润有一定空间，足够承担各种费用，而如今企业面临国际化各方面问题，首先考虑如何活着、如何活好，然后考虑如何发展；要知道有时候不是母鸡不下蛋了，而是母鸡生病了，等母鸡健康了自然就会下蛋。中国的东北、西部地区开发还是需要一些时间和过程的，全面推进智能制造还需要时间和空间，不可忽略的社会基层人员的工作如何安排问题也值得思考。

**马 健（买付通国际租赁）：**

民营企业的减负，需要解决融资渠道缺乏、融资难的问题，间接降低民营企业的运营成本，而不仅仅是从减税降费方面着手。民营企业融资成本占其经营成本的比重较大，现有环境下靠国有银行的融资极度困难，靠其它融资渠道如小贷、融资租赁、民间借贷等，由于资金融通的中间环节较多，信用体系不健全导致风险控制环节复杂、难度高，这些因素转嫁到企业导致融资成本高昂。政策调整的路径可以是：

减少资金中间环节、加快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大数据化的信用体系建设以及改变民营企业的融资手段和方式等。

从减税、降费的操作层面上来说：减税环节复杂、流程慢，难度不亚于攀登珠穆朗玛峰，对振兴民营经济来说是远水不解近渴；降费的空间非常有限，对民营企业减负来说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可操作的思路是依据当前稳货币、松财政的政策取向，按照民营企业以往税收贡献比例，对民营企业的融资（包括非银行融资）进行财政贴息，使税收取之于企业，用之于企业。具体地可由中央制定统一的财政贴息政策，各级财政遵照执行。

**彭本红（南信大）：**

从营商环境方面来说，民企减负可以围绕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府要调研和梳理一下民企承担的税费，合并或取消不合理的税费；二是重新检视劳动合同法，比如最低工资制度、五险一金制度等，有些与当前实际不太适应了；三是运营过程中的制度性成本，比如疏通政府职能部门的关系成本等。

**盛文军（人行杭州中心支行）：**

关于为民企减轻税负的建议：一是中央和地方的分税制应调整，目前对企业的税负的减免基本来自地方，但增值税改革后，地方收入减少，导致对企业税负减免不到位。另一方面，为弥补地方财政缺口，不得不求助于房地产市场。二是企业要发展才是根本，在现有的国情下，税收是对民企其中的负担之一，与其说减税改税制不如从企业解决就业率的比例来给于用工补助，出台保险政策。三是税收基调要调整，不是有盈利就缴税，而是多盈利多缴，少盈利少缴。

**谈 镇（江苏省委党校）：**

去年底在省里调研时，顺便了解营改增的影响，大多企业普遍反映营改增对企业税负影响很小，工业企业本来就是销项税减进项税，服务业企业又没什么可以抵扣的！降低民营企业赋税负担是一个系统改革设计，其中的关键还是推进改革。需要结局的问题有：（1）税费合一；（2）合并国税地税；（3）减税降费前提是拆庙送神，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总之要让创造财富的人比耗费财富的人更有话语权。

**周景梅（扬农化工）：**

作为企业，目前更感兴趣的是在现行税收体制下如何合理避税，即如何合理利用好国家税收的优惠政策。比如：评上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所得税由 25% 下降为 15%；一些费用可以税前列支，如职工教育经费，部分职工生活福利费等；一些费用可在成本中加倍体现，如技术开发费可以 1.5 倍计入成本等等，这些都可以减少企业缴税。

**夏海力（苏州科技大学）：**

我的理解：一是，加大力度全面清理民营企业现在抱怨较多的一些部门巧立名目设立的各种收费和罚款。二是，可以加大民营企业发展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方面税收优惠政策，降低企业用工成本。三是，八项规定之下，一些官员一味避开民营企业也不行，还要建立一种亲商的政商关系，为民营企业发展解决后顾之忧和营造畅通的沟通渠道。

# 中国制造该何去何从？

2017 年 3 月 2 日

**编者按：**2016 年最后的日子，知名企业家曹德旺关于中国制造业成本比美国高的声音引爆了舆论圈——“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负比美国高 35%，后者土地基本不要钱，电价是中国的一半，天然气价格是中国的四分之一，中国较美国有优势的，只有劳动力。”曹德旺的这些话，一下子把中国制造所面临的问题铺开摆在了公众眼前。

纵观制造业发展的历史轨迹，过去二三百年时间内，每一次制造技术与装备的重大突破，都深刻影响了世界强国的竞争格局，制造业的兴衰印证了世界强国的兴衰。当全世界的眼光重新又汇聚在制造业上的时候，中国的制造业又该何去何从？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提出了“中国制造的困境与突破”这一议题并总结了“振兴中国制造业十条”，在群内引起了各领域专家、学者、企业家们的热烈讨论。本期推文中，我们根据刘志彪教授提出“振兴中国制造十条”分类精选了大家的观点并进行总结。

## 中国制造的困境

1、由于各项成本上升带来的企业负担过重。

（1）成本上升主要体现在制造企业的劳动力成本、环保成本、融资成本、能源使用成本等方面，加之税费负担过重，使得中低端制造患上了“成本病”和“产能过剩病”。微笑曲线底部成本的大幅上升，而两端的研发设计、品牌创新带来的盈利上升速度不及成本的过快上涨，因而无法形成积累，进而正向的良性循环，削弱了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造成国际制造向周边国家的转移，致使中国制造红利的减少（刘志彪－长江产经院、方勇－南京大学、刘杰－省地税局、刘根荣－厦门大学、周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宋文阁－江苏省国资委、孙军－淮海工学院、张小兰－西南民族大学、刘瑞翔－南京审计大学、王文莉－中原航港基金、孙国民－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李剑兰－北京大学）。

（2）伴随中国经济陷入投资依赖模式、政府趋向土地财政体制难以自拔的过程，以房地产等基础物价带动的全社会营商成本大幅上升，制造业企业各项成本持续攀升，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且此困境仍然延续，亟待寻找系统性方案缓解、解决，避免进一步发酵、因大规模大范围企业倒闭导致大幅度增加失业而冲击社会稳定，尤其造成国民财富灭失，根本削弱中国制造业长期竞争力，毁损国民经济的产业基础，中国梦因之落空（马步洋 –Metalink 新材料）。

2、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缺乏工匠精神与企业家精神。

（1）高端制造在技术上，其动力系统和控制系统长期难以突破，受制于人，使得高端制造业患上“心脏病”和“精神病”，且高技术制造业生产行业过于集中。广东的高技术优势集中在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2015 年，两大行业增加值合计占整体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的 90.4% ，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占 82.9% 。相比之下，其他行业占比非常小（刘志彪 – 长江产经院、王思彤 – 江苏省统计局、陈爱贞 – 厦门大学）。

（2）中国制造业困境，诚有实体经济环境的问题如税负问题、资本市场问题、劳动力成本问题、产业政策问题、监管环境问题等等，单从企业来说，还是创新问题、管理问题，追根究底还是企业家精神问题（朱新聪 – 海尔）。由于缺乏企业家精神，产品趋于低端化、同质化，自主知识产权及品牌程度低。江苏电子、化工、电气、钢铁、机械、交通运输设备、纺织及服装、金属制品、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十个产业合计产值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的 75.8%，是工业经济的中坚力量。但总体上还属于大而不强，自主名牌不多，产业链环节末端化（王思彤 – 江苏省统计局、宋文阁 – 江苏省国资委、孙军 – 淮海工学院、林学军 – 暨南大学、张小兰 – 西南民族大学），从产业链的视角来看，不仅生产环节企业缺乏自主创新能力，还包括品牌建设、标准、营销等环节的弱势（张立冬 – 江苏省社科院）。

（3）中国制造在面对“十年磨一剑”的历史沉淀中，未能成功培育工匠精神，这方面的教育改革、工匠培育体系和文化支撑都不够（孙国民 – 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由于缺乏自我创新的能力以及工匠精神，制造企业技术升级与产品创新能力不足，缺乏核心技术，被锁定在产业价值链低端环节，盈利能力弱（刘根荣 – 厦门大学），加之中国制造业缺乏鼓励和保护创新的机制，以上机制一旦形成，可能对促进我国制造业发展和升级将有显著效果。在创新成果得以有效保护的情形下，个人的创新积极性得以显著提高，这对促进整个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也是有极大推进作用的（毛德勇 – 浙商银行、王文莉 – 中原航港基金）。

（4）从全球价值链（GVC）角度看，中国制造未能形成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体系，一些产业处于低端被俘获的低附加值层面，GVC 分工体系和分工模式长期处于“低端锁定”状态，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都只是全球化的被动参与者，缺乏中国制造的产业话语权，其弊端具体表现为：自主技术创新和品牌培育工作被拖延；制造业整体利润空间被严重压缩；制造业传统文化和工匠精神逐步被侵蚀；低端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制造业布局和资源配置与国内市场终端需求错配加剧。（孙国民 – 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王修志 – 广西师大）。

3、产业过于分散，不利于创新资源的整合利用。

中国制造的困境在于产业过度分散。500 多种主要产品中，中国 220 种产品位居全球第一。但是财富 500 强企业中，中国制造企业仅 50 多家。首位企业主要产品占全球第一的不足 30 家，前三的约 100 家左右。产业内企业分散，造成创新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研发活动同水平重复。江苏光纤产业占全国的 40%，分别由 6–7 家企业生产，市场占有率最高的企业不足 17%。这些优秀企业的研发项目大同小异。中国制造业分散的状况，还表现在竞争性领域民营企业处于被动地位。10 多年来的结构调整和优化产能，民营企业被一轮一轮的割了韭菜。水泥、钢材是典型的产业。在增长率不高的制造业领域，与国有企业处于相当份额的民营企业，无法通过份额

扩张提升品牌影响力（崔卫东－蓝鲸咨询、孙月平－江苏省委党校）

4、国家制度的不完善，表现在产权保护缺乏、营商环境不佳等方面。

（1）政府干预太多、管得太宽，针对企业的政策、法规制定随意性太大，“权力经济”色彩浓厚，抑制了企业的活力，使得企业转型无门、升级无力，创新能力与资源缺失，各项内外制约严重，而经营环节多、涉及面广、从业人员多的制造业首当其冲，累积到一定程度形成了今天制造业的困境局面（程鹏－江苏巨和实业、马步洋－Metalink 新材料）。目前政府治理能力尚未达到“良政善治”标准（“操作系统”的反应相对迟滞）与制造商的合理诉求快速变化（大量“应用软件”的运算发起）之间有着较大的矛盾（李剑兰－北京大学），加上企业专注创新的动力弱化，而指望得到政府资源的预期不断增大，市场配置资源的概率不断下降，政府替代市场的现象逐渐上升（谈镇－江苏省委党校）。

（2）政商关系处于转型期对民营制造业投资产生较大的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反腐败斗争呈高压态势向前推进，经济和政治生态不断改善，官商勾结现象明显降低，但也带来了传统政商关系的转型巨震，部分政府官员“谈商色变”、“躲商、冷商”，不愿也不敢与民营企业打交道，企业的困难无从倾诉、问题无法解决，企业家的归属感、安全感有所下降，甚至连“政商关系”本身都成了贬义词，企业与政府的交易成本、服务成本变得更高，降低了民间资本投资的积极性。民营企业家地位不高。根据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民营企业家自我评价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长期低于其经济地位，民营企业家的自豪感有所降低，也降低了扩大投资和谋求转型升级的积极性（陈东－南京大学）。

（3）中国制造业的困境主要在于制度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困境在于制度问题的表现之一，是一个产业的企业散乱，缺乏兼并重组，垄断竞争程度低，在世界 500 家最大企业中，中国数来数去就那几家制造业，且以国企居多。垄断竞争不足，就没有创新动力，就不能实现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就不能实现低成本高质量。另一个制度问题是国企与民企的双轨制，以及政府过度支持国企，而对民企放任不管（指缺少关心），国企又偏偏依仗权势挤压民企，二者很少相得益彰，多是此消彼涨，形不成发展的合力（张建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5、企业融资难、融资方式单一，造成企业“轻资产”倾向，不利于制造业发展。

（1）融资生态过度依赖间接融资状态下，银企互信难，各项金融资源长期向体制内倾斜，内在创新驱动本能较强的民营制造业企业难以获取资源，企业特别是盈利性较弱的企业处于被抽贷压贷的焦虑之中，而向直接融资生态过渡又困难重重（史先诚－江苏金融办、马步洋－Metalink 新材料）。相对于其他所有制的制造业，这两年民营制造业面临的困境更大，民间投资增速断崖式下滑，民营企业不敢投、不愿投、不会投的现象非常严重，这与正在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操作不当有关，在执行过程中，有些地方政府没有充分遵循“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则，一方面，“去产能”让民间投资加快退出相关行业；另一方面，可以供民营经济进入的新投资领域却严重不足，尤其是当下的 PPP 投资，民营企业能拿到的一手项目非常之少，退出与进入之间的严重失衡，导致了民间投资失速（陈东－南京大学）。

（2）一方面融资风险、产能过剩和转型升级，这些问题主要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企业的发

展模式逐步积累的。在当前国外需求萎缩、国内需求减速的情况下，产能过剩使企业无法产生足够现金流，又通过担保链蔓延产生金融风险，也没有足够资金进行转型升级（赵顺群－丹阳市发改经信委）。另一方面，民间投资的“轻资产”倾向，使得虚拟经济泡沫扩大，挤压制造业生存空间（陈心颖－福建省委党校、周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 振兴中国制造十条

1、抑制虚拟经济尤其是房地产业过旺过火趋势，让实体经济企业获取社会平均利润率。

通过打破垄断，基本创造平均利润率环境，让制造业的利润率和房产金融一样。给制造业进入高利润区域打开玻璃门（谈镇－江苏省委党校）。

2、通过去产能过剩等竞争政策、利用资本市场鼓励优势企业收购兼并，增加制造业企业集中度，增加其调控市场价格的能力。

（1）利用金融工具改善民营企业现状，一方面可以通过改善高科技企业融资环境、发展民营银行、村镇银行、发展科技企业创投基金等方式，鼓励民间借贷（宋常铁－新华网）；另一方面可以倡导直接融资，发展创投，以资本市场的繁荣逐步降低企业对间接融资的以来，让民营制造业能通过资本市场克服当前困难，加快转型升级（史先诚－江苏金融办、陈东－南京大学）。

（2）按照“控风险、降成本、促转型、优服务”的思路突破制造业困境。控风险主要是要防止运营困难的企业转嫁风险，为较好的企业筑好防火墙，同时对于恶意转嫁风险的企业和银行工作人员加大打击力度。降成本则要落实好中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为产能过剩的解决赢得足够的时间。促转型不仅是企业的产品升级和工艺升级（在这两个方面企业比较熟悉），更加重要的模式升级、产业链的升级乃至企业家的升级方面需要政府更多的支持。优服务也不仅是进行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更重要的是行政体制的改革，包括发挥好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减少管制，精简机构压缩人员，降低行政成本等多个方面（赵顺群－丹阳市发改经信委）。

3、营造法治化市场营商环境，鼓励外资、民资等实体经济企业投资，纠正外资利用中的左的倾向。

（1）政府需要培育公平公正的市场体系，减少企业负担，鼓励竞争，反对垄断，让政策能公平落地，减少政策执行中政府的自由裁量权，对民营制造业产能的“减法”和“加法”都要公平对待，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提升民营企业家投资信心，并且通过行业协会更多地协调避免价格竞争（陈东－南京大学、林学军－暨南大学、史先诚－江苏金融办），同时平等对待一切来源的资本，不要管是内资还是外资，国有还是民营，营造出良好的营商环境（方勇－南京大学）。

（2）政府在守住环保底线的基础上，尽量放开对制造业企业的各种管制，通过放松管制、加强监管、构筑正道、放弃诱惑，让企业完全依靠市场生存、发展。管制不利于企业，已为实践所证明，而诱惑导致畸变，似乎尚未引起警惕。比如补贴、退税之类，尤其是创业版的 IPO

制，是扼杀企业家创业精神的毒药。企业是拟制人，在权利上与政府平等。对于陷入困境的企业，政府可以出谋划策，但不能越俎代庖。改革开放以来，政府由管制走向监管，其实走得并不远，而如今已放弃了对于监管职责职能的信心和努力，以亲力亲为代替之。对于民营企业的支持，非数个主管部门合作无法达成，而欲置民营企业于死地，一个部门就够了。这就是当前行政管理体系的现状与作用（楼稼平－宁波布衣、方勇－南京大学）。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完全以建立符合创新创业的各色环境、为民众谋长远幸福为原则进行全面改革（马步洋－Metalink新材料）。

（3）在制定标准时，政府不应该采取一刀切的手段。低端不代表质量低，低端市场需求还是很大的，升级还是得靠市场竞争。低端和低质量是不一样的，不能混为一谈。政府不能代替消费者选择，正确的是让市场自己选择，如果消费者都有钱，都要质量高的，生产低端的企业自然倒闭，如果市场有需求，为什么不做呢，说明你的需求没有到那个水平，强行提高质量水平也没有意义（王宇－南京大学）。即制造业需要有分层，形成群雁齐飞的态势，但各自定位又有所不同，例如“头雁高飞、中雁竞飞、尾雁快飞”。政府只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保持政策稳定性，做好守夜人角色就好（王运陈－川农大）。

4、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的同时，运用一切手段鼓励传统产业中的企业在经济周期的底部阶段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如进口设备一次性全额抵扣、技改全额贴息等等。

（1）充分利用人工智能、互联网等先进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加大研发投入，实现产品转型升级，打造智能制造业，降低成本的同时提升制造业效率，打造符合消费需求升级的高端制造业（宋文阁－江苏省国资委、林学军－暨南大学、刘晓昶－华泰证券）。

（2）制造业更需摒弃传统思维，真正将互联网思维落地，其认知维度有五：一是人力资本创新，打造一批具有创新思维、创造能力，能够认同企业文化且能奋斗的队伍；二是思维创新，从过去搞定客户、让客户满意、感动客户，演变为成就客户，让客户享受企业价值；三是技术创新，始终聚焦客户需求，将思维移植到产业价值链上，争取一个产品就是一个产业集群；四是制造业服务化的工业4.0创新，通过智能制造催生定制化研发、定制式生产；五是推动营销模式与管理模式变革创新，传统工业规模驱动固然有效，但电子商务已经可以“一两拨千斤”（周平－双登集团）。

5、实施“品牌中国”战略，大张旗鼓地表彰中国制造业中为国争光的各类品牌企业、优秀企业家，设立“中国工匠”表彰制度。

（1）中国制造业应该努力发现这些市场罅隙，培养灵巧型制造业企业，占领国际市场。关于技术创新，应该继续走开放、联合的创新路线，一方面培育自己的核心技术，增强创新能力，扩大技术优势，打造自主品牌；另一方面利用研发外包、并购等方式获得核心技术，降低创新风险以增强企业后劲，减少企业亏损（王思彤－江苏省统计局、张小兰－西南民族大学、姜彩楼－南信大）。

（2）沿海经济发达城市要由能力驱动时期对有形资源的渴求转变为依赖无形资源推动企业成长。所谓无形资源，无非是专利和品牌。所以，如何通过技术创新不断积累技术专利和技

术诀窍，提高产品质量和竞争力，如何通过品牌资产的形成和积累，提升产品的感知价值和品牌力，是未来制造业发展的“两个轮子”（蒋青云－复旦大学）。

（3）完善现有激励机制，提升民营企业家积极性。国家对民营企业家表彰层次较低，最高层次的表彰就是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应该对民营企业家的表彰适当改进（陈东－南京大学）。

6、大幅度提高制造业中技术工人的待遇，实施首席技工制度，并鼓励他们持有企业的股份。

制造业缺乏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是我国制造业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需要将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的培育放在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等重要的位置上，着力从教育改革、文化基因改造等方面抓起，矢志不渝地推进，同时严格法治环境，提供弘扬工匠精神的基石（孙国民－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谈镇－江苏省委党校）。

7、为制造业中的民营企业减负20%，打破一切为民营企业制造的人为的进入壁垒。

（1）民营经济具备投资与消费两重性。民营经济萎缩，将导致居民收入结构重新趋向单一（薪酬重又成为居民收入的主要途径甚至唯一途径），不但投资能力下降，消费能力也将随之弱化，居民将渐次从高端消费品市场向低端消费品市场退却。房产按揭是消蚀当前居民收入存量的最大负担，股市的赚钱效应不彰，假如未来居民收入结构继续简化，则整个经济将重新趋于轻型化、低端化，制造业有何美妙前景？（楼稼平－宁波布衣）。

（2）为民营企业减负首先要清理企业各种税费，通过减税降费和放开垄断性生产性服务业，为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供坚实支撑，其次要降低企业成本，尤其是用工成本，包括降低员工的社保负担，为企业用工提供廉租房，降低企业税费等（方勇－南京大学、宋文阁－江苏省国资委、孙军－淮海工学院、刘根荣－厦门大学）。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将税赋和降本进行到底，为中国制造减负，特别是要在土地要素、融资成本、减税降本、行政审批等方面形成一揽子减负方案，全力支持中国制造轻装上阵参与市场竞争和国际竞争（孙国民－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3）企业生产中的劳动力成本增值部分作为增值税交税17%可以适当考虑降低。因为在制造业中劳动力成本真的不是增值部分，目前中国制造已经不是像过去的家庭式小作坊，劳动力成本占生产成本很重要的比重，加上社保压力，要使中国制造快速变成制造强国，在国际上占先机，需要对中国制造实质性的措施支持中国制造（宋凌炎－江苏精诚&精缦毛毯）。

（4）具体的税费改革措施可以有：1、考虑将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率上限双双降到20%以下，放水养鱼，做大税基。2、社保、医保费率调降余地不大，可以定几个缴费基数，让企业根据自身状况选择基数缴纳，不能再搞成实际的第二个税。3、公积金对目前的一般制造企业已经玩不起，养活着一大批公积金管理人员，公积金贷款最后搞成了劫贫济富的东西，不如取消（程鹏－江苏巨和实业）。

8、鼓励中国制造企业从全球价值链底部开始升级，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中形成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在开拓内需中形成国家价值链。

（1）积极对接一带一路倡议，沿一带一路重塑全球价值链体系，加快国际化步伐的同时

提升创新能力、塑造品牌优势，鼓励企业融入国际市场，开拓市场，提高竞争力，学会利用国际市场，配置全球资源的本领，在形成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到技术密集型都应有所长，有所发展，轻工业、重工业要并重，不能出现产业空洞化的现象（林学军－暨南大学、宋文阁－江苏省国资委、孙军－淮海工学院）。

（2）变被动依赖 GVC 的战略，转向以国内市场需求升级为契机和基础的主动重构 GVC 战略，具体思路为：以国内市场为制造业发展的根据地，以终端消费需求升级为制造业品质提升和创新发展的根本动力，以自主品牌 / 创新技术 / 电商平台（新型渠道）和国内市场构建新的 GVC 分工体系，政府在其间须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通过机构和职能改革，降低制造业综合负担，同时在全社会营造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环境（王修志－广西师大）。

（3）制度改革的同时推动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创新。同样的设备，同样的中国人，在外资企业就能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而在本土企业中产品质量就低了很多。中国制造业本土企业的管理水平还有待提高。我觉得目前提升中国企业生产率的最主要的源动力应该是管理，这比技术更重要（陈爱贞－厦门大学）。

9、尽快实施严厉的知识产权、专利保护政策，激励制造企业加大自主知识产权的投资，形成核心竞争力。

支持企业进行技术升级要求不仅是在关键零部件、关键的技术、设备等方面加大技术突破，还要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特别是专利和品牌，用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促进创新，以创新驱动中国制造业的整体升级与转型，促进有竞争优势的制造企业占据全球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方勇－南京大学、张立冬－江苏省社科院、刘根荣－厦门大学）。

10、把一些优秀的大学改造为职业技术大学，对它们实施比“211”大学更加倾斜的政策扶持力度，而不是让办学水平较低的“三本”院校转制为职业技术学院。

（1）目前教育改革的难点在于把传统的本科院校（包括学院和大学）转型为职教，因为中国的高校偏好学术型（张建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从基础教育开始，一切服从升学指挥棒，制造业发展的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无法培育。即使 985 高校也多沦为留学、公务员、考研预备校，专业学习严重不够，本科教育是青年后期成长之基，专业学习不够，又在学历、职称指挥棒下偏理论轻实战，使得学生无法快速进入经济一线（宋常铁－新华网）。

（2）制造业发展需宏观与微观层次共同发力，微观层次的突破不能被忽视。中国制造粗制滥造的印象并没有彻底改变，需要精益生产，其中工匠精神如何塑造是关键，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职业教育及收入分配制度；职业教育要改变类似综合性大学的管理方式，要更专；毕业后相应职业资质的评定要完善，并加大薪资倾斜力度，重视人力资本培育，与高管薪资匹配，同时引进职业经理人（夏网生－江苏省商务厅、宋文阁－江苏省国资委）。招生制度学习德国模式（50% 以上的中学毕业生进入各类职业技术学院成为了德国制造强国的基础），调整教育结构，增加职业技术院校的招生规模，提高毕业生待遇和社会地位，培育高素质的技术工人大军（闫浩－江苏经信委）。

# 两会观察丨中国经济有底气有信心

2017年3月6日

**刘志彪委员：** 供给侧结构调整会有阵痛，但中国经济可以承受，迎难而上增后劲

**朱建民委员：** 经济增速放缓，增长“含金量”提高，坚持创新大有可为

**崔根良代表：** 振兴实体经济，是推动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金钥匙”

2016年，我国经济增速6.7%，创下自1991年以来的最低增速。有人担忧，中国经济是不是还在探底？今年还能保持中高速增长吗？

去年经济增长缓中趋稳、企业效益由降转升、城镇就业超过预期，实现了“十三五”良好开局。代表委员们表示，这份实实在在的成绩单表明，中国经济有底气有信心。

## 增速换挡不焦虑，中国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中国经济增速跟以往比是高位下行，但是跟其他国家比，我们还是一枝独秀，所以根本不必焦虑。”南京大学教授刘志彪委员说。

尽管增速回落，但中国经济总量迈上了“70万亿”新台阶。2016年GDP增量达4.6万亿元，比上年增量多了1600多亿元。从全球来看，这一增速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首。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计，2016年美国经济增长1.6%，欧元区增长1.7%，日本增长0.9%，南非增长0.3%。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3.2%，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尽管经济增速放缓了，但是经济增长的‘含金量’提高了，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在增强。”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建民委员说。

增长“含金量”体现在收入增速继续跑赢GDP。去年我国国民总收入增长6.9%，加快0.6个百分点，说明收入增速并没有因增速回落而放慢，百姓有了更多获得感。

增长“含金量”体现在单位能耗继续降低。2016年，我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上年下降了5%，在能源消费中清洁能源消费的比重提高了1.7个百分点。这得益于绿色发展理念落地生根，天空更蓝了，河水更清了。

增长“含金量”体现在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发展协调性、可持续性更强。2016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8%，比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快1.1个百分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51.6%。刘志彪说，服务业发展往往比工业更稳，服务业继续保持上升的势头，经济运行的稳定性也在相应提高。

## 结构调整不可避免、也必须面对，中国经济积蓄发展后劲

“结构调整的阵痛，对中国经济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也是必须面对的。过去增速较快的年代，进行结构调整不容易。现在是挑战也是机遇，结构问题一下子全部暴露出来了，可以顺势用精准的产业政策引导其调整，消除长期累积的投资偏差，未来发展就会有更好的后劲。”刘志彪说。

刘志彪认为，供给侧结构调整的阵痛，对中国经济来说，是可以承受的。虽然在短期内，去产能会影响一些地方的 GDP 和财政收入，去杠杆会使一些企业过紧日子，并使其风险显性化。但应该看到，结构调整可以释放出闲置的土地、信贷等稀缺资源，投入到更有效的产业和行业，从而为后续增长提供内生动力。

代表委员们表示，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很大、发展环境错综复杂，企业经营仍面临不少困难。但总体机遇大于挑战，对未来经济发展依然充满信心。

“人口大国”的消费潜力，让企业有信心。“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世界 1/5 的人口在中国。中国市场本身就很大，随着人们收入、消费水平的提高，这个市场的潜力与空间更大。”亨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崔根良代表说。

持续释放的“政策红包”，为企业稳预期发挥了重要作用。过去一年，国家连续出台了多项降成本、去产能的好政策，为实体经济发展去包袱、扫障碍。“国家对制造业越来越重视，出台了一系列振兴实体经济的好政策，这是推动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金钥匙’，也为制造业吃了‘定心丸’。”崔根良说，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脊梁，是兴国之器、强国之基。中国制造业完备的产业链，再加上信息化、“互联网 +”的护航，将大大提高各行各业的整体竞争力。

“一带一路”战略的不断推进，也为企业提供了更大的竞技舞台。2016 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 145 亿美元；沿线国家对我直接投资新设立企业 2905 家，增长 34.1%，直接投资金额 458 亿元。随着国际产能合作稳步推进，一批重大项目顺利实施，也将带动我国装备、技术、标准和服务继续“走出去”。

## 迎难而上转方式，创新驱动孕育经济发展新动能

“供给侧结构调整，对有准备的企业特别是优势企业来说，其实也充满了机会。”刘志彪分析，当前经济增速放缓，是进行大规模固定资本技术更新的最佳时期，如果企业利用国家支持技术改造的机遇，就可以用更低的代价买到更为先进的技术设备武装企业，从而为新一轮竞争做好准备；经济低谷期也是行业内优势企业兼并重组劣势企业的最佳机遇，会产生巨大的、低社会成本的结构调整效应。

朱建民表示，2017 年，企业还要加快高端化项目的投资。“尽管辽宁经济增速出现了下滑，但是我们对新一轮辽宁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依旧充满信心。”朱建民介绍，作为全球最大的环氧乙烷精深加工和减水剂聚醚的制造商，奥克 2016 年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 46%，再创历史新高，

证明了只要坚持创新，立足实业也能大有所为。

抢抓机遇，迎难而上，正成为中国经济迈向“双中高”的最大共识。

“我们坚信党中央、国务院实施的新一轮振兴战略，建立新型政商关系，进一步改善投资营商环境，我们一定能够抢抓机遇，乘势而上，为企业可持续发展、辽宁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做出积极的贡献。”朱建民说。

市场新主体正加速孕育。2016 年全国新登记企业 553 万户，比上年增长 24.5%，平均每天新登记企业 1.5 万户，明显高于前两年，掀起了创业创新的新高潮。“当前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新动能持续较快增长，以创新求发展，‘中国智造’才能在全球化竞争的关键一程抢占制高点。”崔根良说。

创新驱动，正孕育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放眼前瞻，中国经济的航船正聚合澎湃之力，破浪前行。

原载《人民日报》（2017 年 03 月 05 日 06 版）

# 关注两会 | 长江产经智库学者看 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

2017 年 3 月 9 日

2017 年 3 月 5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回顾了“十三五”开局之年取得的成就，并部署了 2017 年九大工作任务。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现场聆听了总理的报告，并号召群内各行业专家、学者、企业家们对报告进行深度研读，结合实践就各自的工作领域，谈一谈政府工作报告中令自己触动最深刻的部分。本期推文中，我们整理了大家的观点，力图从多个视角提供不一样的解读。

**刘志彪（长江产经院）：**

总理工作报告说，今年工作总基调是“稳中求进”。我体会，稳是大局，是底线，具体是指金融安全、民生保障、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底线要保持住。而进呢，主要是指改革要进，要勇于进取，深入推进改革，加快结构调整，敢于啃“硬骨头”，努力在关键领域取得新进展。

稳是基础，是前提；同时也只有大胆地进，勇于改革，才能稳，不进则退。实践中，改革不能局限于下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改革；改革不能搞形式主义，政府权力扩张必须得到遏制。

**宋文阁（江苏省国资委）：**

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加快推进国企国资改革，以提高核心竞争力和资源配置效率能力为目标，形成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这句话令我印象深刻。原因主要是因为：

（1）国企国资改革发展的目标不清晰，国企国资改革与发展的终极目标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二十几年来一直处于探索中；

（2）加强党对国企的领导，不可能有效制衡形成法人治理结构；

（3）国企体量（尤其是资产规模与营收规模）以及其产业的垄断地位，都使其占用、控制和消费了大量优质资源，也不可能形成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

**王思彤（江苏省统计局）：**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把“以创新引领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作为2017年第四项重点工作任务，并提出了五大举措，即：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大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持续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全面提升质量水平。其中，在“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一节，明确提出“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健全新兴产业统计”。我认为这既是对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的《关于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质量的意见》的再强调，也凸显了新形势下统计体制与制度方法改革在政府工作中的特殊意义。体制改革的目的是更好地发挥统计在宏观调控进程中的作用，而当务之急又是把新兴产业统全统好。2016年，国家统计局已经建立并实施了聚焦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三新“统计制度，取得了预期效果。新的一年还要总结实践经验，把三新统计继续抓好，努力使统计制度方法跟上不断变革出新的经济发展的脚步。

另外，依据公开资料，我谈一下个人关于“为什么将年度经济增长目标定位6.5%左右而不是6.5%以上”的观点。政府工作报告把2017年GDP增幅定为6.5%左右，低于2016年6.7%的实际水平，说明决策层的经济预期并不乐观。原因如下：

（1）经济形势没有出现明显好转。2012年以来，我国GDP增速持续下滑，从2012年的7.9%，一直回落到2016年的6.7%。回落速度虽然有所减慢，但回落的态势并没有出现根本性改变，没有见底，没有止跌回升。L型的横筋没有显露勃起迹象。

（2）二产增长明显乏力。2016年GDP增长6.7%。其中，一产增长3.3%，二产增长6.1%，三产增长7.8%。很明显，6.7%的增速主要是靠三产拉动的。回头看，2015年GDP增长6.9%，二产增长6.0%，三产增长8.3%，二产已经出现低迷态势。2014年GDP增长7.4%，二产增长7.3%，三产增长8.1%。二产增速依然低于GDP。2013年GDP增长7.7%，二产增长7.8%，三产增长8.3%。请注意，这时候二产增幅还超过GDP增幅。2012年GDP增长7.8%，二产增长8.1%，三产增长8.1%，二三产增速持平。2011年GDP增长9.2%，二产增长10.6%，三产增长8.9%。二产此时保持着两位数增长，而且幅度大于三产，也大于GDP，是拉动GDP增长的主要力量。2010年GDP增长10.3%，二产增长12.2%，三产增长9.5%。GDP依然保持着两位数增长。不难看出，自2010年以来，不仅GDP增速是持续走低的，二产增加值增速是持续走低的，就是三产增加值增速也是持续走低的。三产增加值比重之所以能够在2015年超过二产，不是因为三产的突飞猛进，而是二产的体力不支。

（3）外贸形势持续低迷。2016年，货物进出口总额比上年下降0.9%。其中，出口下降1.9%；进口增长0.6%。显然，如果不是进口略有增长，进出口总额下降幅度还要更大一些。回头看，2015年，货物进出口总额下降7.0%。其中，出口下降1.8%；进口下降13.2%。显然，进口的控制是下降的主因。2014年，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2.3%。其中，出口增长4.9%；进口下降0.6%。应该说，这时候，外贸形势特别是出口形势至少还是乐观的。2013年就更好了，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7.6%。其中，出口增长7.9%；进口增长7.3%，进出口保持均衡。

（4）经济大省表现不佳。2016年，广东GDP增长7.5%。其中，二产增长6.2%，三产增长9.1%。

进出口总额下降 0.8%。其中，出口下降 1.3%；进口增长 0.01%。江苏 GDP 增长 7.8%。其中，二产增长 7.1%；三产增长 9.2%。进出口总额下降 0.7%。其中，出口增长 0.2%；进口下降 2.2%。山东 GDP 增长 7.6%。其中，二产增长 6.5%；三产增长 9.3%。从这三个 GDP 大省情况看，二产增速低于三产，低于 GDP，已经成为与全国相同的共性特征。

（5）全球经济低迷态势没有好转。不确定性因素增多，潜在危险增加。

其次，定为 6.5% 左右而不是以上，说明决策层对未来局势判断仍不明朗，希望能留有余地，可进可退。从各经济大省 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情况看，广东 2017 年预期目标是：GDP 增长 7% 以上，进出口总额实现正增长；江苏预期目标是：GDP 增长 7%−7.5%，外贸进出口保持稳定；山东预期目标为：GDP 增长 7.5% 左右；货物贸易进出口保持稳定。与 2016 年实绩比较一下不难发现，三省都在调低 GDP 增速，而对外贸形势的判断也只是希望稳定在上年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全国的预期目标只比上年低 0.2 个点左右已经够可以的了，哪还能用“以上”呢?

**孙 军（淮海工学院）：**

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我印象特别深刻。原因主要是因为：（1）目前中国的融资模式和银行特征决定了中小企业永远处于弱势地位，这就需要放管相结合，推动银行等对社会开放、大力发挥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功能；

（2）不同所有制的企业所面对的市场约束也不同，中小企业杠杆率过高，市场不景气一定倒闭，而国有企业未必如此，所以，降低企业杠杆率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要让国有企业软约束硬化。

**盛文军（人行杭州中心支行）：**

不靠改革，没有出路——关于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的三条建议：

（1）加快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步伐。赋予央行宏观金融审慎监管职能，彻底改变各种为政，画地为牢，各好一套的局面，使之切合金融综合经营的现实和需要。当前建议尽快出台《关于赋予央行监管金融控股集团的条例 / 管理办法》。

（2）加快金融向民资开放的步伐。各类金融机构和市场均向民资开放，前提是具备和符合准入条件，在此方面要迈出实质性一步，给出可实操的行动方案和步骤及时间表。

（3）加快健全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步伐。当前重点之一是给予各省市构建地方性资本市场的权限，由金融监管部门和省级政府进行双重监管，地方性资本市场的职能主要是活跃地方金融要素的聚集、投机和交易，通过并购重组等方式，重点服务地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升产业竞争力。设定考核标准和评估体系，在初始阶段，限定经营范围，在本省市之内，待具备条件和能力后，由金融管理部门考核评估通过后，可适度、分步骤扩展经营地域，最后直至全国。

**何 雨（江苏省社科院）：**

“对于侵害企业产权的行为，必须严肃查处，有错必纠”这句话让我印象深刻。这是对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法的继续，今年应力推司法部门纠正一批影响较大具有典型性的侵害企业产权行为，以让法治的阳光照耀到民营企业家身上。

**华建强（省发改委）：**

总理报告中先后 4 次提到“服务业”，其中最大亮点是在经济结构加快调整中指出“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上升到 51.6%”。2007 年国务院下发的《加快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到 2020 年“十三五”末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 50%，实际上，2015 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已经达到了 50.5%。预计到 2020 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将达到55%以上，就业比重达到50%以上，江苏省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将达到53%左右，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将达到58%左右。可以说服务业已经占据了经济的“半壁江山”。当然，当前我国服务业的快速上升，除了经济转型升级和结构优化的大趋势使然外，也有制造业不景气的原因，即所谓的“水落石出”现象，服务业要实现稳定的增长和健康发展，还是要做好服务业内部的结构优化，特别是要优先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如此才能实现我们期待的“水涨船高”。

**郭育嵩（新世纪物流）：**

支持市场采购贸易、外贸综合推广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实现全国通关一体化：这样可以降低企业通关成本，提高效率，真正实现异地报关，口岸放行。

**孙 东（南京审计局）：**

李总理报告中强调 2017 年重点任务之一要“加大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力度”，江苏省 2016 年底开展 2（减）6（治）3（提升）行动计划，力争在 2−3 年内解决全省影响环境质量的突出问题，两者不谋而合，可见环境生态问题形势紧迫。但从现实情况看，任务艰巨，以南京为例。从相关部门数据看，全市轻、重工业比重在 2:8 左右，以化工、电力和钢铁为主的重化产业占全市工业产值 50% 左右，其消耗的水、煤和排放的二氧化硫、固废等占全市 9 成左右，其中化工园区和栖霞片区主要污染排放占全市 6 成。解决问题困难很多：一是历史欠债太多。以梅钢等 6 家在宁主要重化央企来说，现有设备和工艺与清洁生产差距较大，长期形成，只能每年逐渐消化。二是在线监测存在盲点。以梅钢为例，厂区大约 170 个排烟口，安装在线监测点仅在 30% 左右。对污染源监测不能全覆盖，环境监管能力有待提升。三是环境经济政策调控水平有待提升。以排污费专项使用为例，运作比较封闭，基本都在资助在宁 6 家重化央企，项目计划缺少长期规划，资金使用绩效不清晰。

**高传胜（南京大学）：**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的“必须把改善供给侧结构作为主攻方向，通过简政减税、放宽准入、鼓励创新，持续激发微观主体活力”，我印象特别深刻，原因是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严峻形势下，只有持续有效地激发微观主体活力、潜力和动力，才能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协调高质发展，进而为人民过上美好幸福生活打下最坚实的经济基础。而从业界的普遍反映看，简政放权、减轻税费等负担以及放宽行业准入等需求最为迫切，因而，2017 年需要在业已开展的相关改革议程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改革，以切实落地的政策措施来呼应业界的合理需求。在美国特朗普政府主张通过减税、放松管制等手段大力吸引资本投资美国、促使制造业回流美国的新形势下，进一步简政减负、放宽准入、鼓励创新，还是中国积极应对新一轮国际竞争必不可少的重要改革举措。

简政放权、“放管服”改革，不仅需要政府以壮士断腕的勇气积极推进自身革命，还需要在广泛听取学界、业界的理性呼声基础上，确定深化改革的方向与具体内容，进一步完善政府部门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市场负面清单管理，并以此设计评估改革的激励约束机制，构建动力与压力双轮驱动的工作考核与问责机制，确保科学合理的改革方案能够产生出来并有效落实下去，减少懒政怠政、推诿扯皮等不作为现象。

减轻税费等负担，既包括继续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有效降低税负来应对美国直接税制的直面竞争，也包括全面清理规范政府性基金、取消一些不合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降低过高的经营性收费，还需要通过系统性制度改革来继续降低“五险一金”缴费比例、通过深化改革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有效降低微观主体的用能、用网以及物流等成本。这里的关键是如何才能让相关部门和单位破除本位利益，舍小利顾大义，让微观主体能够轻装上阵。

放宽行业准入、降低行政壁垒，让更多的微观主体能够有更多、更便捷和更加公平的发展机会，不仅是解决民间投资大幅下滑的必要之举，同时也是持续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前提。这里，不仅需要打破一些行业原来主要由国有资本垄断、破除行业在位者和既得利益者区域性垄断等问题（如出租车行业、长途汽车客运行业），创造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还需要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审批环节，降低微观主体发展的行政壁垒。

**马野青（南京大学）：**

我就对外开放发表下自己的观点：

（1）对外开放是经济全球化和我国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经济发展的需要。经济全球化是跨国公司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而驱动的，目前的所谓逆全球化并不能改变全球化的总体趋势（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的暂时萎缩是经济危机时期国际市场萎缩的产物；跨国公司的价值链回流有限，美国制造业回流貌似增速很快，其实绝对量与其海外企业与雇员数比微乎其微。特朗普要求美国数据公司将工作岗位留在国内，其实该公司还是把绝大多数岗位转到了墨西哥；跨国公司价值链回流与海外扩张并举，2015 年 FDI 与跨国并购就达到 08 年以来顶峰；特朗普奉行的

并不是孤立主义、闭关锁国，而是强调美国利益的公平贸易，其贸易代表办公室 2017 年贸易报告就指明贸易谈判重点将由多边转向双边；TPP 夭折、TTIP 前景也不妙，但其规则并没有消亡，将影响日后的贸易谈判；我国适应需求升级的供给侧改革以及构建 NVCs 需要引进国外先进要素弥补国内短板；对外开放还可以起到所谓以开放倒逼改革的作用，引进系统外力量打破国内垄断利益的藩篱。

（2）开放的部门：国内暂无生产能力、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有利于提高供给质量的先进制造业部门与环节；先进生产与生活性服务业部门。

（3）开放手段：按国际规则的开放、符合国际规则的适度保护、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并举、稳定透明的制度环境。

还有一个看法，我们要正确评估自己的发展阶段。国内有一种观点认为按照邓宁的发展阶段论好像我国已到了净对外直接投资阶段、2016 年对外投资也似乎超过了利用外资，但需要思考的是我们去年的人均 GDP8102 美元（我折算的）与邓宁 80 年代的美元已经贬值不少，我们目前的 GDP 由于外资因素与邓宁所讲的 GDP 口径不可比，GNP 或 GNI 应该更准确，还有我们对外投资究竟有哪些垄断优势？因此，我们究竟有没有到达净对外投资阶段是令人怀疑的，我们应该正视自己的经济发展水平，继续重视引进利用外资。近几年海关总署一月份的国际贸易年度统计我们的贸易额都用人民币统计不用美元了，我觉得似乎不太合适，我们还是应该重视与国际接轨。

**陈建勋（上海社科院）：**

今年李克强在讲话中表示“坚持汇率市场化改革方向，保持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稳定地位”。这一表述可能指向中国政府提高人民币地位使之成为国际主要货币的目标，而不对人民币汇率水平发表评论，可能更多地是考虑到市场的不确定性。在欧洲政治形势不确定以及美联储可能加息的情况下，需要留出更多灵活应对的空间。而过去三年的政府报告中所做的一项承诺，即“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这句话消失了。

**宋常铁（新华网）：**

政府工作报告内容讨论之——引导环保治理理念创新，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的要义，东北江河纵横，植被尚好，物种丰富，被确定为中国北方生态和环境安全的屏障，同时负担中国粮食安全的政治任务，一定要处理好生态、环境建设与当前经济任务的关系。多年来，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而同时关内大量耕地流转为地产、园区开发、乡村旅游、经济作物、苗木种植种地，东北则为了完成粮食生产任务，许多山林被伐、坡地开垦，退耕还林还草变成落实不好。东北黑土固然肥沃，但极易流失，露出下面贫瘠的黄土，再也无法耕种，不仅粮食生产难以持续，甚至在东北中西部降水较少地区，正快速荒漠化、沙漠化。建国以来，大小兴安岭、长白山的植被受到严重破坏，次生林在高寒地区生长缓慢，无法涵养水源。这样

尽一步导致北方气候和环境的恶化。为中国环境安全和边疆稳定，建议硬性规定退耕比例，提高财政补贴，加快东北民营工商业发展，以有效的区域产业分工调整和财税、金融政策，扶助东北地区乡镇、农村从简单农业生产向产业类型多样、结构合理的新型增长模式转变。同时，严控关内大城市占用耕地发展工商业，确保粮食安全，同时保证中国环境和生态安全。

**夏海力（苏州科技大学）：**

李克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的科技创新部分的解读：

（1）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加快新材料、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制药、第五代移动通信等技术研发和转化，做大做强产业集群。”其中提到的“5G 通信技术”已经成为近年来全球主要国家竞争和研发的热点，属于战略性的新技术。5G 通信技术一旦商用将带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智能家居等典型的新兴产业，有机构预计到 2035 年，5G 将在全球创造 12.3 万亿美元的产值。目前我国 5G 通信技术的研发处于世界前列，已建成全球最大 5G 试验网。继续加大力度推进 5G 通信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对于我国掌握未来通信产业的制高点、制造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大的战略意义。例如，在 5G 通信技术研发方向，东南大学尤肖虎教授团队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南京市江北新区可能成为全国首个全域覆盖 5G 网络的地区。建议国家支持江苏省牵头制订 5G 技术标准，以抢占世界 5G 发展制高点。

（2）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完善对基础研究和原创性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机制”。这句话我觉得讲的很好，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受制于国家经济基础和发展水平，我国的科技研发是应用性研究远远多于基础性研究，很多研发工作是跟随式的，创新性和原创性不足，特别是基础领域的创新相对滞后。但我国已经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时期，需要战略性高技术领域实现原创性、重大突破创新作为支撑，而建立和完善基础研究和原创性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机制，是实现原创性、重大突破创新的保证。因此完善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中国国情的基础研究和原创性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机制，有利于我国营造鼓励创新和宽容失败的创新氛围，可以在制度上保障我国科研人员“敢做冷板凳”，秉持十年磨一剑的决心，久久为功，产生从“0”到“1”的原创性研究成果，不断实现我国科研领域的重大突破。

**林学军（暨南大学）：**

我觉得创新应注意以下两点：（1）官产学合作比产学研合作更重要，创新一定要发挥政府的组织和带动作用。（2）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创新应当从国家创新体系扩大到全球创新链，利用全球的知识和资源来提高创新的能力与效率。

另外，我个人认为“稳中求进”的关键在于学会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1）当前我国的外贸形势确实面临挑战，西方国家经济衰退，我国出口不容乐观，这给我国保持经济增长带来不利的影响。但我们要看到一带一路国家与我国的贸易在增长，因此我们应当充分挖掘开拓一带一路的市场，扩大中国商品的出口。

（2）利用一带一路战略平台，扩大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建立我国稳定的市场和资源供应地，为经济发展提供保障。

（3）利用一带一路平台引导中国企业有序走出去，开展对外投资，充分利用海外的资源，降低成本，扩大市场占有率，提高经济效益。

（4）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把提高中国在国际分工的地位，改变中国在全球价值链被低端锁定的不利局面，放在重要的战略位置上，必须在对外贸易和投资中，注重布局全球价值链，同时要利用全球的创新资源升级我国在价值链的地位。

当今，美国新政府的逆全球化的政策，对我国是一个挑战，同时也是个机遇，我国应当旗帜鲜明地坚持全球化的道路，坚持扩大开放，为我国经济增长不断注入新的动力。

**张远鹏（江苏社科院）：**

除了大家谈的重大问题之外，我觉得印象深刻的还有《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到全面取消国内长途和漫游费，昨日三大运营商已经表示在今年十月正式实施。其意义：

（1）降低老百姓通信成本，特别是有益于低收入人群，他们通信最低消费少，一般不定制任何优惠套餐；

（2）全国一个价，没有漫游、长途费有利于全国市场的形成；

（3）具有重大意义的是有利于市场和社会自然发展而形成的城市群的建设。例如宁镇扬一体化，以前一直希望统一在 025 区号下，而这难度很大，换区号首先要国际电信联盟同意，南京、镇江、扬州三个市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升成 8 位号了，统一后会出现重号等问题。现在手机国内长途、漫游费取消了，加上越来越多的人用移动电话，这个通信同城化就基本解决了。同时还可以促进按照空间距离而不是行政区划来配置资源、购买房产、居住。

**崔卫东（蓝鲸咨询）：**

建议：“更好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与“推动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结合起来。让非公有制经济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展现活力，培育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在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中，提高非公有制企业全球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培育更多的非公有制全球化企业，增强非公有制企业产品或服务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王洪飞（金科股份）：**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房地产的描述概括为两句话：一是对三四线城市，支持居民自住和进城人员购房需求；二是对房价上涨压力大的城市要适当增加住宅用地的供应。

客观地说，这次政府工作报告对房地产行业不再使用“调控”这一主观主导性较强的词，意味着政府对这一行业长期以来实施“调控”思路的调整，变为更加遵从市场规律，更加注重从源头解决问题。但问题是，房价上涨压力大的城市如何增加住宅用地的供应？在落实上会很

困难。一方面，一些一线城市客观上无地可供，比如北京、上海等，今年的供地计划比去年还少。另一方面，土地是每个地方政府核心的资产，客观上对增加供应有强烈的抗性。

**陈伟贤（江苏省人民医院）：**

大健康产业是个很大的概念，不仅仅是医药、医院、病人管理、医护培养、费用落实等等，50、60 年代老白姓看病好像问题不突出，因病返贫几乎没有，那时的计划经济对健康产业是全包，看病是广覆盖低水平。近 30 年医疗迅猛发展高档药物高档检查越来越多，和国际接轨较多，有限的经济资源无法覆盖加上医疗不公现象极其严重，问题显得突出，但是大家要看到现在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提高的太快了。这么长的寿命加大了医疗投入的缺口。

另外，我们现在的教育浪费现象也是非常严重的，随便问个人都是很不错的学历，再问问干啥工作基本都是搞销售的，做保安的，搞一般服务的（可能主要是一般家庭孩子），我工作时医院挂号的，收费的，导医的基本都是小学初中文化，现在很多是国外留学回来干这些工作。现在职业技术工人明显缺乏且很多优秀传统技术后继乏人，建议国家减少理科招生计划，多增加优秀的职业教育计划。

**李 锋（江苏省经信委）：**

对总理提出的去产能工作的认识：

（1）对若干过剩产能行业去产能是近年来国家对工业经济的重要战略决策。从全球或全国来看，钢铁、煤炭、水泥等行业的产能相对实际需求或可以预见的未来需求，确实存在绝对过剩现象。所以，在去年全国全面完成去产能任务的基础上，今年国家仍明确再压减钢铁产能 5000 万吨左右，退出煤炭产能 1.5 亿吨的任务，并且要淘汰、停建、缓建煤电产能 5000 万千瓦以上。

（2）去年钢铁煤炭价格一直处于上涨势头，这与这两个行业产能情况总体过剩、需要去产能并不矛盾。价格上涨原因一方面是对前期价格走低的恢复性上涨，也与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周期性回暖有关，当然去产能任务工作也对价格回升产生助推作用。但总体价格仍然偏低，价格回升基础脆弱，企业盈利还没有恢复到应有水平，盈利对企业创新和持续发展支撑作用仍显不足。这恰恰说明去产能工作仍然要大力推进。

（3）从区域经济，比如江苏实际情况来看，产能的利用率问题更体现为竞争力问题。一般认为，如果全国统一市场、统一环保能耗标准、统一取消融资等优惠政策，江苏钢铁行业由于技术水平总体较高还是很有竞争力，并不存在绝对过剩问题，所以对江苏等经济发达地区，更希望采用市场化手段去化解过剩产能，甚至可以在全国的去化过程中通过占领市场和兼并重组实现做强目标。但受行政能力和行政成本的限制，国家虽然强调在去产能时要严格执行环保、能耗、质量、安全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但实际工作中，只能以各地实际产能为基数按比例下达指标行政推动去产能，虽然简单粗暴，但可以完成国家总体

目标任务。

（4）对江苏煤炭而言，由于自身资源存量不足、安全生产压力大等原因，我省自身有主动关闭煤矿的动力，国家对煤炭去产能的奖补政策资金加速了关闭工作，可以说我省煤炭去产能是顺势而为，压力不大。和国家签订的《目标责任书》，5 年任务 2 年可以完成。但钢铁行业去产能压力较大，前几年落后钢铁产能该淘汰的已经尽数淘汰，经过 2016 年的化解工作，已经去化了近 600 万吨钢铁产能，2017 年去产能任务，只能对相对落后产能下手。这些产能在中西部地区，可能都算是先进产能。在这种背景中，市场化手段很难发挥主体作用，实际工作中只能借助行政手段，从讲政治的高度推动。

**徐 宁（南京大学）：**

总理的报告中有六处提到与养老相关的内容，包括了工作回顾、评价与部署。在回顾和评价部分，2016 年做了“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高基本养老金标准”两方面的工作，但“人民群众还有不少不满意的地方”。2017 年，要“改革养老保险制度”、“进一步向社会开放养老市场”、“继续提高养老金标准”。

个人理解如下：目前我国养老产业发展存在服务提供不足和支付能力不足两大痛点。服务提供不足的解决要靠放开市场，让社会力量进入，形成产品提供充裕、竞争格局良好的产业业态。但是，支付能力的不足导致了市场需求虽然旺盛却无效，进入的社会资本长期无法盈利，制约了养老产业的繁荣与发展。解决的逻辑前提在于打通支付环节，将养老保险、社会保障等社会资金有效导入。总理在提及 2017 年养老方面的工作时，也重点谈到支付的问题。进一步思考，本人认为，支付环节的打通特别是要引入社会资本，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建立关于养老主体的评价标准、服务标准与支付标准体系，这应该是促进中国养老产业发展的牛鼻子。

**杨 锐（苏州大学）：**

2014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开始提及基础研究。《报告》里所侧重的基础研究，似乎更倾向于量子通信、中微子振荡、高温铁基超导等重大基础性研究领域；然而，为响应需求变化，企业要实现由产品的模仿创新转向原创性创新，以企业为主导的、面向市场的基础研究则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多数领域，没有基础研究，企业很难有自主的原创性创新。但是，对于企业来说，开展基础研究，面临长期成本与短期收益之间的困境。为此，从政府支持企业创新角度，

第一，以具有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企业或行业里的领军型企业为展开基础研究的核心主体（甚至可以进一步落实到企业研发部门而非企业），支持他们从事面向行业技术变革的基础研究；

第二，这里着重强调的一种支持方式，即赋予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或行业领军型企业所立项的“项目级别身份”，比如市厅、省部、国家等。这个身份能够激活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整合社会资源尤其是高校学者的平台功能。如此，既能让基础研究嵌入市场需求面向行业发展，又能让学者植入产业实践面向理论前沿。

**王修志（广西师大）：**

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意义重大。主要表现在：

1. 在国际形势不确定性加大，经济危机影响尚未彻底消除的背景下，释放国内需求是支撑“稳增长，调结构”战略的基石，也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驱动力。

2. 着眼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全球治理视野，以及新一轮全球化战略的推进，特别是构建区域价值链 / 国家价值链，并以此最终形成以我为主的新型全球价值链，内需培育都是战略根基。

总之，释放内需既要着眼稳增长，更要考虑优结构；既要考虑国内区域协调，也要放眼全球治理。因此，释放内需的政策手段要更加精准，突出战略意图。结合报告所提进一步释放国内需求的若干举措，提两点建议：

其一，消费需求方面，突出消费“稳增长，去产能，促创新”的约束和激励效应，建议强化消费者主体地位，明确以制度建设塑造消费者主权，以消费者选择促供给侧改革。（1）推进住房 / 教育 / 医疗等领域的减负，通过工薪阶层个税改革“降税增收”，增强消费者家庭和个人消费能力；（2）建立健全严格的产品质量标准，确保消费者产品选择权，打破消费终端被动接受格局；（3）鼓励公平竞争，打破供给端行政垄断，形成供需双方平等地位。

其二，投资需求方面，突出投资在区域结构 / 产业结构变迁中的决定性作用，在“积极扩大有效投资”的过程中，贯彻“三去一降一补”方针，同时充分结合区域差异 / 产业差异实际，纳入区域价值链 / 国家价值链因素，以区域和产业合理分工 / 高效分工为导向，着力提高投资的精准度。科学发挥各类投资的功能，以中西部和农村地区公共服务（特别是教育 / 交通 / 人才建设等）为重点科学布局政府投资；在一般竞争性生产和服务领域，通过营造公开透明的营商环境，引导和鼓励民资 / 外资精准投资。

# 经济转型升级时期更需要鼓励和保护企业家精神

2017年3月10日

**编者按：**如何调动各类企业的积极性，切实保护企业家精神，支持企业家专心创新创业，是当前改革发展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2017年2月23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伟主任在“2017年政策咨询研究工作九大重点”中提到了“保护企业家精神，促进民间投资”，并指出现阶段，民营企业家最关心的问题是产权保护，而国企改革也要求通过制度设计调动国企管理者的积极性。基于此，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组织了群内企业家、学者以及各领域专家针对“我们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家精神？如何保护企业家精神，促进民间投资？”展开了讨论。

**我们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家精神？**

**龙晓荣（银河天成集团）：**

伟大的企业家所具有的共同基因包括：对所从事行业的深刻理解和专注；博大的胸怀与格局；清晰的发展战略及对未来的洞见能力；诚信，合作共赢的品格，艰苦奋斗的精神！最重要的是不逐浮利的坚持！

**踪家峰（南开大学）：**

企业家精神就是不认命、不服输、不安于现状、要折腾出个名堂。

**宋常铁（新华网）：**

我们急需真正有原始创新能力，而非简单模仿的自主创新的企业，这才能让民族经济有持续竞争力。我们急需有社会担当的企业，它们有实业家的梦想，在寒冬中依然坚守那些有未来的领域。在社会变迁的关键节点，不逃避，不盲从，能抱团。

新时代的企业家精神，一定要完成后现代转型，充分估量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对人的思维、沟通的剧大影响，保持与时俱进、日日维新。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尤其要处理好与市场和政府的关系。要摆脱所谓“重农抑商”、“学而优则仕”之类传统文化影响，明晰知晓，

你没有剥削，你未失德，企业才是主流社会，优秀的企业家是民族的骄傲。

**罗立彬（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如果说“现在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家”，我觉得除了需要“明星式企业家”之外，我们也需要“平民型企业家”，在“双创”背景下（双创折射的也是一个经济发展阶段的背景），我们甚至更需要“平民型的企业家”，因为中国现在很可能不是企业家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所以先增加“企业家数量”才是最重要的。

不能过于高端的定义企业家，应该回到经济学中“企业家才能”的定义，任何一个敢于直面市场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同时给他所雇佣的人以相对稳定回报（也就是工资）的人都应该被称为企业家。

**邵 军（长江产经智库特聘研究员）：**

我也认为现代契约精神最重要，企业家、政府、消费者都应遵循，不要倡导超人式的企业家精神。

**苏 健（南京社科院）：**

企业做的好，需要企业家具备领导能力。打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捕捉市场机会。至于精神，时代需要企业家精神。但从对企业分析的角度，领导力更易分析。

**吴钧琪（中脉科技）：**

企业家首先是专才，成长过程中往高大全靠拢，除了政治正确外，具备契约精神越来越重要，同时必须逐步具备工匠精神。

**方向阳（中国财政杂志社）：**

1. 企业主不一定是企业家。2. 称的上企业家的应该说是成功者，但不一定具有企业家精神。3. 企业家精神作为意识层面的东西，不一定企业家才有，普通人也可能具备。4. 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不一定能成功（以创造大财富为标准），与环境特别是制度体制机制密切相关。

**楼稼平（宁波布衣）：**

（1）企业是拟制人，是民法与商法调整的对像，凡其设立程序与实体权利合法且未逾法律禁止条款的，自然人都可以设立企业。企业不是需要不需要的问题，现代社会实际上也不再让某个主体拥有决定企业降生与否的权利。（2）企业家精神，实际上是人的基本精神素质的某种特别体现与发挥，可遇而不可求。可以让人自由的制度环境，扩大了“可遇”的基数，增

加了“可求”的概率。

**王以丹（南京消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什么是企业家精神？逐利、冒险、担当。对逐利的欲望要克制。对冒险要有对冲。对担当要鼓励。克制，取决于企业家自身修为。对冲机制，很值得研究。鼓励，政府肯定行。至于保护，难理解。

**何 雨（江苏省社科院）：**

企业家精神，从词源上看，是一个舶来品，是与西方近现代工商业文明的崛起相伴生的一种现象，在我看来，也就是作为精英的企业家群体内生的价值取向及其激励与约束自我的行为规范。

企业家精神，有道与术两个层次：所谓“道”，即，责任感、使命感。正是责任感与使命感，驱使企业家有理想，有抱负，有情怀，有动力，是从事经济活动的“原力”。所谓“术”，即技巧层面的东西。包括资源整合、人员管理、战略决策等方面的内容。“道”与“术”，都非常重要，缺一不可。无“道”之“术”，容易走上邪路，如，郭永贵之流。无“术”之“道”，则显得空洞，让“道”变成虚幻的形而上的东西。真正的企业家，应该是“道”、“术”双修。心中有大“道”，手中有万“术”。

**刘根荣（厦门大学）：**

所谓企业家精神就是指企业家所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与素质，企业家的成功不仅仅靠自身的特质，还需要社会层面的制度激励。

企业家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敢于冒险精神。企业家往往能比常人更具风险承担能力，敢于直面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问题，细心求证、果断决策。二是创造性破坏能力。企业家不是墨守陈规的人，他们一般具有敏锐的商业意识，以及对现有市场、制度或商业模式进行边际革命的创新意识，挖掘商业机会与利润空间。三是有较强大的资源聚集与整合能力。企业家必须具备整合内外资源，调动各要素所有者积极性的能力；特别是要拥有发现人才、利用人才的慧眼与胆识。四是坚忍不拔的精神。大凡成功的企业家，都勇于面对无论来自商场、家庭、还是社会所带来的失败与挑战，坚持不懈，以近乎偏执的态度取得事业的成功。五是讲究诚信的契约精神。诚信的契约精神也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法宝，是企业家在商场的立足之基，纵观古今中外的成功企业家莫不以诚信为本的契约精神展示其成功的奥秘。

一个地区是否更多地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文素质与传统，往往跟这个地区的自然禀赋有关。简单比较、观察就可以发现，越是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企业家精神越缺乏，闽南沿海地区自然资源特别是人均土地资源稀缺，导致闽南人企业家精神充足，个个都爱拼才会赢。

**王美今（中山大学）：**

企业家精神应根植于有法治基础的市场经济体系，没有清晰的规则，难以说清企业家精神。

**卞华舵（和灵资本）：**

企业家精神 = 冒险精神 + 机会意识 + 创新精神 + 永不满足。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发展的源动力之一，是统领其它生产要素的生产要素。企业家精神主要来自天赋和特殊的人生经历，很难通过教育培养。企业家精神的形成与个人禀赋、民族文化和激励制度相关。

**淤福强（苏食集团）：**

（1）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是“三创企业”：创新财富、创新技术、创新管理。企业家应具有的精神：创新精神、敬业精神、合作精神。

企业家应尽的责任：不要让改革倒退、不给消费者添麻烦、不给社会添灾难、不要忘记弱势群体。

**孙国民（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企业家精神可以划分为五个层面，一是个体企业家精神，二是团队企业家精神，三是公司企业家精神，四是社会企业家精神，五是政府企业家精神。大部分人把企业家精神理解为企业层面外化的企业家精神，忽视了内企业家精神，也就是说，大企业或者事业部制的企业内部仍然存在企业家精神，比如新成立业务部拓展、事业部或者利润中心等。

**毛翠英（南京财经大学）：**

能创新，有信念，不违法，懂策略，精管理，有韧性，够执着，这是我自己认为的企业家精神要素。

**张晓东（中国管理科学学会）：**

我说企业是“三台”：灶台，舞台，平台。灶台：解决自身和员工及其家庭吃饭问题；舞台：尽情施展自己的能力；平台：通过它实现自身、客户、员工、社会的价值。

商人和企业家的区别在于，尽管都通过经营积累和增进利益，俗称的“商人”止步于此，而企业家则是具有社会责任的。似乎也可以说，企业家是富有社会责任感有情怀的商人。

**刘建森（徐工集团）：**

企业家精神的核心是坚持、坚韧、坚强和冒险精神。企业家是善意描绘蓝图的人，也是乐

于砌砖垒墙的实干家。

**宋凌炎（江苏精诚 & 精缦毛毯）：**

企业家精神在精神方面看起来是虚的，但却是一种灵魂。在这灵魂深处有一种责任，逼着你往前走，不可以失败；企业家精神是一种顾忌，更多时候考虑让身边的人快乐与舒服；企业家精神是想象的时候永远把自己看得很小，在行动的时候把世界看得很小；真正的企业家精神是一种责任，来自对家庭、团体、社会、国家以及世界的责任，责任与利益面前有所衡量。

**黄忠全（江苏五星资产评估公司）：**

企业家精神首先是一种责任、一种担当、一种顶天立地的精神!

**纪 明（广西师院）：**

新时代的企业家应该具有三高：高情商，高胆商，高智商。

**张明之（南京政治学院）：**

超高的协调能力，包括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也是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内容。

**刘志彪（长江产经院）：**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基本细胞。细胞有活力、能够不断地进行新陈代谢，经济才可能健康和可持续地发展，否则难以奢谈经济运行稳中求进、稳中向好。健康的、有活力的企业需要企业家精神和其依赖的生态环境。我重点谈一下这两个问题：

对企业家精神，我们不必“神话”，其实它是一个很朴素的概念，没有那么伟光正、高大上，就是熊彼特讲的敢于创新、善于创新，勇于否定自己，毁坏一个旧秩序、创造出一个新事物。具体来说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善于捕捉和发现商业机会；二是敢于把发现的商业机会早于别人付诸于行动和实践。我们很多人都具有前者这种慧眼，但是往往不具备后者的行动能力，因而不具备完整的企业家精神。

**倪 敏（硅谷创业）：**

我觉得企业家就是给自己打工的，守法经营不就行了吗？为什么非要谈有什么精神？有什么精神和做企业成功之间一定有必然联系吗？我的意思是，多在制度层面去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才能有更多的企业家。企业家做得对，做得好，有市场去褒奖，决策错了依然市场给他教训。谈精神，可能大家就自然而然想去寻找企业家精神领袖，然后给他光环给他便利，可能最后就歪了。

**陈传明（南京大学）：**

企业家的原意是冒险者。企业家精神：冒险精神（创新充满风险）、风险意识（努力降低风险）、创业冲动（把风险变成机会）。

**杨 锐（苏州大学）：**

企业家精神是一种根植于企业家的行为，而非“企业家精神”这个整体概念的抽象修辞理解。讨论企业家精神，实际上是讨论企业家类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为此，依据企业家所从事的经济活动来区分，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跟随型企业家；一类是创新型企业家。创新型企业家又分为两个子类：a. 创新型非生产性企业家。他们通过寻租、投机……等非生产性行为来谋取社会地位，即报酬。b. 创新型生产性企业家。这类企业家的经济活动会增加就业、增加多数人的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是最直接的。

**杨平宇（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在创新、冒险和前慑性方面的个性特质，以及能将这种特质渗透到公司战略制定和企业经营的各个环节的能力。

我认为企业家精神可以分为需求侧（市场为主型）企业家精神和供给侧（内部运营型）企业家精神。需求侧企业家精神体现在市场敏锐性和冒险精神，善于抓住市场机会，并快速占领市场，例如温商。以这种需求侧企业家精神为战略导向的企业呈现出一种外延式发展特征。而供给侧企业家精神体现在企业内部运营环节的改善和创新，以这种企业家精神为战略导向的企业更注重于业务流程、生产流程、产品功能等方面的改善和提升。结合当下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和实体经济升级特征，制造业更需要的是供给侧企业家精神去实现制造业价值链升级，并嵌入全球创新价值链。以这种需求侧企业家精神为战略导向的企业呈现出一种内涵式发展特征。现代服务业和新兴产业企业家更需要需求侧企业家精神，利用企业家冒险性、前慑性特质，以实现新业态、新产业快速增长。

**蒋青云（复旦大学）：**

企业家首先是以赚钱为使命的人，相信赚钱也是为上帝增加光彩；其次，是为了使命而不妥协的人，敢于冒险，不守陈规，甚至违规；再次，企业家有自己的赚钱逻辑，或相信技术创造价值，或相信管理创造价值，或相信关系创造价值。

**朱新聪（海尔）：**

我们需要创业、创新的企业和企业家精神。具体来说就是：一切从用户出发满足现有和潜在用户需求、能坚守社会责任、擅整合资源、敢创造性破坏、愿冒险、耐寂寞。企业家精神没

有所有制、规模、行业等之分。

**王宜森（金埔园林）：**

企业家的精神应该是企业的责任和社会的责任双重担当。中国的企业家是幸运的，也是最辛苦的。中国有巨大商机和市场，企业家有更多的创业的机会和发展空间，然而中国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的社会地位不高，相关法律不健全，人治严重，造成了企业随时面临各种压力。

**周 斌（省邮电规划设计院）：**

首先要认同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目前真的很重要，无论对国家还是企业，需要深刻理解“战争年代英雄是将军，和平年代英雄就是企业家”，企业家是稀缺资源，需要保护、培养和挖掘，但这种意识和观念在国内目前并没有得到统一和高度认同，所以真正的企业家其实很累，风险也很大，无论国企还是民企。其次我认为新形势的企业家精神要有在目前复杂的中国特殊环境下，如供给侧改革落到实处、创业创新形成典范、国企改革形成示范等等，能够将资源“用对、用大、用活、用强”的同时融合工匠精神和基业长青远大理想的特殊精神，这种精神可以说在第一代企业家精神（如马胜利等）、第二代企业家精神（柳传志、张瑞敏等）、第三代企业家精神（任正非、马云等）基础上的融合和升华，不一定就是很大企业的领导者，即使是小的企业做到极致也可以同样的精神，对中国企业未来发展将有引领式的作用，肩负更高的使命。

中国不缺企业家，也不缺个人英雄色彩的企业家精神。中国缺少的可以传承下去的、能够做百年企业的企业家精神，这种精神需要企业家前赴后继的努力，同时也需要整体土壤的培育，更是要打破寻租型企业家精神，这是目前企业家面临的最大风险和困难。

**陈伟贤（江苏省人民医院）：**

企业家精神应该是敏锐的眼光，机会适时把控，改革创新精神，爱国爱民情怀，与政治保持一定的关系。

**张建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企业家精神是人的一种潜能，这不仅从那些有头有脸的企业家身上看得到，在我们身边也能看得到，只是这种潜能能否足够大的释放出来取决于个人的意志力和外部环境。企业家的创业创新活动是不确定的，没有偏好风险的精神，成不了企业家。

**盛文军（人行杭州中心支行）：**

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是根据企业的发展阶段来划分的，初创型企业尤其是技术型企业，未来发展如何犹未可知，如何谈社会责任？这与谈企业文化一样，只有发展到一定阶段，规模、市

场地位、竞争力等相应具备后，社会责任才有现实意义。

**章寿荣（江苏省社科院）：**

说到企业家精神，自然会想到“冒险、合作、敬业、好学、执著、法治、诚信、博爱”等一系列与之相关的词汇。其实，这些都是企业家必备的能力与素质。企业家的精神，是企业家在经营与发展中坚守的“舍小利取大道”的企业文化。

企业家能力仅仅是一种“术”，而企业家精神应该是一种“道”。道不通，则术难行。“舍小利取大道”，企业家不唯经济利润而动，而是要有更高的社会与文化追求。

在当前中国的环境与语境下，企业家要取的大道，包括三个方面：创新扩张、市场担当、社会责任。

创新扩张是企业家的第一天道。创新是企业存在的基础与开端，扩张则是企业成长与发展的本义。江苏的企业，特别是一大批改制过来的民营企业，有着不事创新仅靠机遇而崛起的先天不足。苏南文化中“小富即安”的局限性，又使很多企业满足现状、不思创新与进取。因而“热衷模仿”、“安于现状”、“规模瓶颈”，这些词眼成为不少江苏企业家的精神“短板”。

市场担当是中国企业的共同天职。中国市场环境仍有待进一步完善。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维护公平竞争与法治精神是企业家的天职，市场的扭曲需要健康向上的企业家精神来纠正，守正道、行法治、讲公平竞争是现代企业家的共同担当。

社会责任是企业家的价值体现。除了公平、公正对待企业职工的内部社会责任外，最重要的是企业对社会的贡献。这种社会责任不仅仅体现在履行环保责任、产品安全与慈善捐赠上，更为重要的要把企业的经营目标与民生幸福和社会进步结合起来。

**徐 宁（南京大学）：**

企业家精神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内涵，但其核心要义都是创新，敢于承担风险。改革开放初期，企业家精神表现为用于脱离体制，下海经商尝第一只螃蟹；21 世纪初期，企业家精神表现为敢于拥抱世界与信息新技术；当下，企业家精神应该表现为更加集约化的思维，聚焦并收敛于某一具体领域，锤炼“工匠精神”。

**如何保护企业家精神，促进民间投资？**

**宋常铁（新华网）：**

保护企业家，要永远捍卫个人和法人财产权不可侵犯原则，除恶意洗钱外，要允许资本自由流动、出境，不能允许任何强力机关以各种借口干扰生产经营。严厉高层反腐，促进党内民主和社会开明，防止腐败分子借机剥夺企业家创业成果。

要加强对中小企业和创新创业企业的金融服务，发展民营银行，规范引导民间借贷市场。

加强企业家品牌营销的培训，会重视，会用钱，让更多品牌快成长，快壮大。一定要反对一切用原罪说攻击企业家的行为，是否有罪一定是法律认定。

**罗立彬（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其实企业界成功人士往往都是做“小生意”起家的。当年俞敏洪被问到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后做什么的时候，他就说“只要自己的孩子能够养活自己，就算到哪里去摆个小摊位也是光荣的”。我觉得我们社会对“企业家”的定义门槛太高了。如果人们总是本能的觉得只有做到多么成功才算是“企业家”，才是“企业家才能”的体现，那我想这并不有利于真正充分发挥中国潜在的“企业家才能”这种生产要素的作用。其实“双创”倡议在经济增长的背景下看，就是要把“高成本的劳动力”转化为“低成本的企业家才能”。如果把企业家的门槛定义的太高，是不利于这个目标实现的。

**楼稼平（宁波布衣）：**

（1）如何保护企业家精神的问题，显然隐含着设置前提，那就是“谁”来保护。由政府来保护乃至鼓励，本质上是把“可遇”问题替换为“可求”。保护乃至鼓励，就是过去耳熟能详的“倾斜政策”，那些三十年前曾被各种各样的倾斜政策惠顾的企业和企业家现在还剩几棵常青树？支撑那些常青树的生命力的，是政客天赋还是商人特质？有保护企业家精神的权力主体，同时必定对企业家精神有选择。徐翔的“企业家精神”是有的吧，但那是保护与鼓励的结果吗？该保护吗？所以问题归结为，对企业家精神的选择会与市场选择同一吗？无论是谁都会认为不同一吧。人为选择的前提，肯定是基于市场是不完美的假设，而且同时存在的前提，是“我们”会比市场做得更好。这种荒谬，学理上很容易论证，但实际上大家都不甘心。（2）促进民间投资，其前提也一样，肯定是指“政府”“官员”“政策”，而且仍然离不开选择问题，因而也不可能是普惠式的。（3）学者既不是企业家，也不是官员。我们大概清楚我们没有能力告诉企业家该怎么做。但我们往往自信可以告诉官员该怎么做，这是我们中国学者根深蒂固的“帝师”基因。但实际上，都虚妄得很。我觉得，在“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和企业家精神”问题上，学者特别应该告诉官府，没你什么事；在“如何保护企业家精神、促进民间投资”问题上，学者特别应该告诉官府，你觉得能做好的，实际上都是会做坏的，不做是最好的姿态。当然，如果能从法律上取缔这种手段，那是更好的。学者还应该告诉公众，保护企业家精神和促使民间投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事儿，是新时代该有的公共意志，而公共意志应体现在法律上，只有法律，才是“可求”之“求”的正途，只有法律，才能创造“可遇”之“遇”的最大基数，一个自由竞争并被法律藩篱定义的市场，能创造并实现“可求和可遇”的最高概率。

**何 雨（江苏省社科院）：**

真正的保护，不是为企业家群体在制度与规范上开绿灯，走特权，而是要从头走正规化之路。

从政策导向上讲，要想培养出健康正态的企业家精神，就是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要把企业家们搞成神经。

**刘根荣（厦门大学）：**

要守护一个社会的企业家精神，调动企业家的积极性，是政府的职责所在。政府爱护企业家，激励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确定产权，明确私有产权神圣原则。产权制度是保护企业家精神的基本制度，也是鼓励企业家创新的主要制度激励。完善产权保护制度，重点是完善法人财产权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二是要维护契约自由精神。只要法无禁止就允许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的市场创新行为，以契约自由精神保证民营企业家的投资，不得以国家利益或集体利益的名义破坏市场契约精神，打破企业家的稳定预期。三是要公平对待体制内外的企业家，特别是要鼓励宣传民营企业家的精神，引导社会正确认知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与社会贡献，不抹黑污化企业家的社会功能。四是要改善政府服务，重新塑造良好的政商关系。政府服务是否到位，是否公正、公开、公平，是决定政商关系的重要因素。企业家精力有限，特别是民营企业家需要更多地处理政商关系，不仅大量占用其时间精力等资源，更不利于民营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培养与激励。五是要通过鼓励创新、创业，为潜在的企业家提供足够的舞台，让更多的企业家脱颖而出。

**洑福强（苏食集团）：**

中国企业最大的问题是生存，中国企业家最重要的是本分。金箔集团江宝全主席说：目前，有些政府职能部门在对待民营企业的观念和做法上，还有“三道门”要打破：一是卷帘门，拉下来让你吃闭门羹；二是玻璃门，表面上通畅实为一堵墙；三是旋转门，职能部门令企业绕弯子。

**吴皆宜（南京大学新加坡校友会会长）：**

企业家最重要的是要对社会负责任，才具有企业家精神。现阶段的中国，必须尽快培养在新规范行为准则下的会计与审计专业人才，这是一国财政来源的支柱，并给出各个行业应有的标准化账目规格和审计要求，同时规范此行业的专业行为刑罚规则，对政府审核人员定立明确责任刑责。我发现没人谈及此方面的基础强化问题，这么基本的问题不深化，代表猫腻就在此处。只有在先强化基本财务报告的基础上，再谈税务优化才可行。保护主义正抬头，有好的审计制度才能吸引中小外资企业，他们需要当地政府的保护而不是官员的敲诈。在好的财务制度下，才能出好的企业家。否则好多企业家的企业家精神都是伪命题。

**孙 军（淮海工学院）：**

目前有些企业遇到的问题，除了经济环境不好，并由此导致的税负等凸显之外，很大程度上也与企业家精神缺失有关。2008 年以来，各级政府为了避免衰退开始刺激经济，经济刺激为

粗放式增长、企业家精神的缺失提供了坏的土壤。

**刘志彪（长江产经院）：**

可以这样说，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就是企业家精神的形成、释放和发挥作用的历史，也是培育企业家精神的生态环境不断改善的进程，否则中国经济不可能维持三十多年的持续稳定增长。现在中国经济转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说到底也是企业家精神出了问题。现在讲要保护、鼓励企业家精神，促进民间投资，其实不如讲稳定其政策预期，稳预期其实就是要稳政策，稳政策更需要稳法律法规，稳市场营商环境。这里的关键问题就是几条：一是要依法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宪法授予的合法权益；二是要进一步在执法中强调民营企业与公有企业一样，其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坚决纠正一批侵犯民企产权的案件；三是不可追究民企的“原罪”，否则谁也不敢在政策不明朗的模糊地带进行创新；四是要坚决纠正实践中“严格立法，普遍违法，选择性执法”的倾向。

**陈传明（南京大学）：**

保护企业家，或更准确地说保护企业家精神，除了有产权制度、契约制度等制度环境的完善外，可能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不能“秋后算账”，不能用今天的法律去追究以后的行为，否则今天的创新就可能成为明天的犯罪。

此外，企业内部也有个保护企业家精神的问题。要让内部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不仅有冒险精神、风险意识、以及创业能力，还要让他们从内部创业中获得足够的利益。要把现代企业变成“内企业家联盟”。把内部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变成内企业家要比把他们推向外部变成竞争者好。

**周 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我觉得企业家应该具备人文主义的情怀、善于发现机会的敏锐、应变环境变化的能力，做好“决策者、协调者、联络者”的中心角色。一等的企业家带方向，二等的企业家做机会，三等的企业家做市场。

**杨平宇（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首先以影响企业家认识为路径，引导和有效发挥企业家精神。其次，加强政府诚信建设。政府诚信问题让交易成本充满了不确定性，严重的干扰了企业家的投资决策。打造透明化政府树立政府诚信是保护企业精神的关键举措。第三，金融支持。主要体现在资金周转困难时，银行放贷的及时性。第四，对于外向型企业，更需要政府提供法律问题的支持，以及强大国家后盾。

**朱新聪（海尔）：**

要有并完善明确产权、保护私有产权、经营激励的制度，要有完善的契约制度公平竞争的经营及法制环境，鼓励和倡导企业家精神的社会氛围。

**陈 柳（江苏省社科院）：**

我觉得所谓企业家精神，其实是与市场化程度有关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企业家精神的表现形式也不一样。改革早期很多企业家精神表现为率先突破制度的羁绊、领先于正式制度安排。当前企业的转型升级，也是企业家精神的转型升级。让市场竞争来选择企业家，是对企业家精神的最大尊重。各地都在培育新一代企业家，更应当是放在公平、友好的市场环境上，尤其是法治环境上。

**周 斌（省邮电规划设计院）：**

首先国家的整体环境，现在中国迫切需要能激活企业家精神的“新的土壤”，如“战后日本长期的高科技的扶持形成的效应”、美国硅谷近 20 年的精神引领等；其次所有的经济政策最终落到实处时对企业、企业家精神的鼓励、引导和扶持，现在社会对企业、企业家的唯高学历、唯海外、唯高技术、唯税收、唯外企、唯央企等态度，一定程度上是对企业家精神的弱化和绞杀，企业家精神需要保驾护航和赞扬，但真正的检验是市场，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的建立才是企业家精神培养的摇篮，而经过努力成长的优质企业，无论创始人还是企业本身是什么背景，都将给予相应的鼓励和回报，这需要从制度、政策、金融、教育等多种途径去创造环境；最后保护企业家精神、保护民营，在目前环境下，做到平等就足够了，该放开的都放开，该扶持的都扶持，该处罚的都处罚。以前有徽商精神、晋商精神 ... 近代有潮汕商人、温州商人 .... 他们是“聚精神”，不是“个精神”，所以现代环境我们要打造新的“聚”企业家精神，同时尽可能多的培养多“个”企业家精神。

**谈 镇（江苏省委党校）：**

现阶段重点要解决的是企业家阶层生存的环境，企业家精神培育的土壤。所以，比经济形势好转更为重要是制度环境创新（法治社会的推进），当下的中国比制度创新更重要的是组织创新（政府职能的转变，政治体制的改革）。

**张建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企业家精神表现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制度创新，即改革开放设计者的首创精神；第二个层面是实体创新，即无数的企业家。因此，在当今中国这个环境中，制度创新是首要的问题，随着企业家精神越来越被认可，随着企业家精神实践的深化，制度创

新的深度和广度越来越迫切，尤其是在思想观念和法律上建立官、商、民平等的关系。

**王 丰（江苏东鋆科技）：**

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还不是经济增长快一点慢一点，最大的问题是企业家精神的流失。目前创业的环境，包括舆论环境、资本环境、制度环境等，越来越有利于大公司发展，不利于创业型企业家的出现。而企业家的成功，除了自身内在的原因，还需要外在的因素有：（1）法律层面：社会对物权和制度的尊重。（2）金融支撑：稳定的公共财政、债务管理、货币体系。（3）基础设施：交通、通信、网络。

**郑江淮（南京大学）：**

企业家精神其实是一种角色、一种职能，需要一种特别判断力和执行力，能够发现创新机会，能够实现创新机会。此时发挥了这种角色功能就称之为具有企业家精神，彼时不发挥这种角色，就不再具有企业家精神。当前中国要提出鼓励企业家精神，就是鼓励创新创业，在全社会营造鼓励企业家角色功能发挥的体制和机制。由于这种角色是比较特殊的，也是本能的，很多人很多时候是不具备的，因此需要更为鼓励、呵护、容忍企业家角色功能的发挥。因此，改革现行的创业、创新的体制，降低其成本，都是鼓励企业家精神的最重要、最直接的手段。

**孙月平（江苏省委党校）：**

企业家精神最核心的内涵是创新与冒险，企业家以此对社会做贡献，成功与失败都是贡献。企业家、企业家精神是一个社会最稀缺的资源，对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必须尊重、激励和保护，其中最重要的是营造自由、宽松、容错的机制和环境，企业家法无禁止皆可为，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

**林学军（暨南大学）：**

当前，我国的企业家队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一是创新能力不足，二是缺少社会责任。因此，要努力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的企业家群体。

培养企业家的创新精神首先要激发企业家创新的动力和动机。改革开放之初企业家多是洗脚上田的农民，他们创业的动机是因为人穷思变。今天，我国已经达到小康的生活水平，因此，创业和创新的原动力在减弱。如何激发企业家创新和创业的动机？我认为，首先应当有一个尊重企业家的环境，中国千年的儒家文化鼓励“学而优则仕”，而非学而做大事，经商办企业，为社会创造财富；其次企业家应当有良好的品德素养，他们不满足于生存，而应当有社会的责任，关爱社会，奉献国家，有远大的理想，才有伟大的事业；其三要有良好的经营环境，例如完备的法律体系，保护产权，维护公平竞争，以保护企业家发展进取的信心；其四要鼓励创新，在当前知识经济的时代中，要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企业家不能只一味苦干，还要巧干，通过创

新寻找市场机会，通过创新提高市场竞争力等。

**朱长征（长平经济论坛）：**

企业家精神的存在，不只在商界。企业家精神的扩散，依赖一定的社会环境（温度、土壤），能不能对冒险、失败更加宽容些？能不能有自由思想的市场，让各种主义、流派、思潮，各种奇思妙想，各色人等进行砥砺、沟通、交锋？

# 当前形势下如何防控金融风险

2017年4月5日

**编者按：**去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基于此，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组织了群内企业家、学者以及各领域专家针对“当前形势下如何防控金融风险”问题，从PPP中的金融风险、房地产调控中的金融风险、实体经济高杠杆率的风险等角度展开了讨论。我们精选了群内海内外专家、学者们的观点发布于这一期推文中，如果你有什么有趣的观点或是希望对文中作者的观点进行补充、评价，都可以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当前形势下如何防控金融风险**

**刘志彪（长江产经智库）：**

中国金融风险问题既来自于整体经济的高杠杆率，更来自高杠杆率的结构性。这种结构性高杠杆和隐匿性，决定了金融风险来源和防控的重点，决定了完成三去一降一补这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的突破口。

第一，央行统计数字表明，到2016年底，在居民家庭、非金融企业、金融企业和政府四个部门中，只有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较高，总负债高达102.6万亿人民币，而其他部门负债水平并不高。如果考虑到我们企业还有1.5万亿美元的外债，我们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是非常高的。因为现在全国一年的GDP增长额，也不过就是80万亿不到。

第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非金融企业总负债虽然看起来很高，但是这些债务主要集中在几千家大型国有企业身上，据研究，国有企业负债占非金融企业总负债的70%左右。说明自2008年的量化宽松之后，发出去的货币大多都流入到了国有企业，造成目前产能过剩的企业和僵尸企业也都是以国有企业为主。

第三，国有企业负债中，隐匿着数量不清、但是肯定规模不小的地方政府负债。主要在两个渠道：一个是政府融资平台是用企业形式来负债的，算入国有企业的负债；另一个就是通过PPP项目，理论上企业应该以股权形式投入，但操作中“明股实债”情况多见，也就是地方政府给社会合作者提供一个债务和利息的保障偿还水平。

由此，防控金融风险的表面文章可能是降杠杆，其实内在的根本措施，还是要硬化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债务约束。这种约束要求国企掌门人和地方政府长官，对超过偿还能力的债务

负起经济、法律甚至必要的政治责任。为此也要求中央必须改变对其追求规模扩张为主的考核评价机制，改变既有的财政分配格局，改变地方政府的职能，改变中央和地方关于事权、支出责任的现有划分。

**楼稼平（宁波布衣）：**

1、经济组织结构、运行机制的不同，金融风险的定义亦绝然不同。（1）市场经济的国家，金融风险（支付困难及不能）爆发的方式是大面积地发生于微观层面，表现为大量企业（包括金融机构）的破产，并伴随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政府对风险乃至危机的干预措施，可理解为救市，故而政府多以债权人身份向陷入危机的企业提供紧急援助，救援成功后，政府收回救济款本息（如2010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归还联邦政府50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本息，提前走出次贷危机），救市政策随之退出。（2）以国有经济为主体、以经济管制为手段的国家，政府对风险乃至危机感受的阈值很高，在它看来，民营企业的大量破产、民营经济之溃败消亡乃至居民财富增量或存量之萎缩，还不是金融风险的爆发和经济危机之已然。

2、本国特色的金融风险：（1）对内清偿之困难或不能。包括难以或不能支付养老金、政府及其掌控机构雇员的工资，不能清偿到期政府债券。（2）对外清偿之困难或不能。包括难以或不能清偿到期国际债务。（3）宏观金融风险的发生必然导致恶性通货膨胀。恶性通胀表现为价格体系的全面崩溃和无法遏制的本币贬值。

**宋常铁（新华网）：**

（1）区域性风险极易引发社会不稳定和群体性事件，系统性风险需标本兼治、统筹推进。

（2）地方政府变相融资混乱，要对PPP项目抓好入库关，对县级政府申报项目、周期较长项目、资金杠杆较多的尤要引起重视。

（3）让银行做银行应该做的事，发挥银行在金融生态的主导作用。资金大量囤积在央企和有背景的国企手中，尤要加强监管，防止投机冲动。

（4）发挥民营银行、村镇银行作用，提高微粒贷等小额信用贷的普及率，促进创新创业。中小企业融资难是区域性风险的重要表现，对互联网金融平台从严整顿同时予以正名。

（5）对企业债务违约，强化对券商等发行机构的风险披露的监管，对有欺诈行为企业给予实质性惩罚，比如一次违约永不进入。

（6）重点发展、规范引导地方、行业产业基金，为民间资本扶持实体经济提供更安全渠道。

**卫战胜（湖南军民融合投资基金）：**

地方政府举债大多投入市政建设、交通运输建设、教科文卫、保障性住房等领域，这些公益性项目共同特点是在初期不产生或产生极少的现金流，也没有短期收益。只要允许地方政府的债务延期，爆发全面的债务危机和财政危机的概率较小。通过债务重组、资产整合等手段变

更债务条件，延长债务期限，缓解债务人流动性风险，盘活存量资产。

从1994年开始，中国就不是一个资金短缺的国家，但是我们有的都是短期资金，非常缺乏长期资金。改革开放这些年，许多外商风险投资公司大多是长期投资者，而咱们国家的投资者大多是中短期投资者。美国大约有21%的GDP是由接受创业风险投资的公司创造的。在日韩，综合性商社是推动日本经济、韩国经济的总舵手。他们不仅能够促进产品的销售、金融板块的金融产品的发放和研发，还具备极其强大的投资功能。在日本，综合商社更加了解银行客户的经营状况与还款能力，因此银行往往会委托综合商社帮助放贷，以克服信息不对称。在过去，我们主要强调的是产融结合，其实产融结合并不能真正启动协同效应。日韩综合商社的运营模式，本质是“产商融”相结合。也就是说，过去我们更多关注制造商与金融结合，忽视了商，而商才是真正让产融结合发挥效能的关键点。综合商社的情报收集能力、资本运作能力和资源掌控能力都是作为国家综合实力和竞争力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创投所需要学习的。

防范金融风险是政府金融办的主要职能，还需要强化地方政府金融办的专业队伍。

**沈志强（建信信托）：**

目前金融乱象的本质是不具有风险管理能力的机构参与了较多的金融实践，从而导致金融风险积聚。我对当前金融风险的担忧是：越来越多的缺乏风控能力的个人、机构借着金融创新的名义进入金融活动领域，且缺乏监管，加大了防控金融风险的难度。

因此，建议政府对金融活动的参与主体要进行甄别，制定准入标准，对不够资格的一定要挡在门外；对金融创新活动要有系统性的制度约束，不能为创新而创新；要制度先行，有可能的话建议对金融创新活动进行立法或出台专门条例。

**高春亮（南京财经大学）：**

融资难本来就应该，关键要有破产制度保护创业者，鼓励失败后可再来。现在的错误在于认为降低贷款成本有利于实体经济。在没有个人或企业破产保护下，降低贷款成本是不负责任的，也不利于供给侧改革，反而增加中间食利者。

**周 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近年来，发达国家艺术品市场已经成为与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并称的第三大投资市场。随着文化艺术品证券化，艺术品转变成为资本投资组合的一部分，资本市场的波动会通过各种传导途径传导到艺术品市场产生冲击。与此同时，艺术品价格的波动也会通过投资者的资本投资决策影响到其他资本市场。

对我国文化艺术市场的发展提出如下对策建议：（1）完善文化艺术品交易制度。在艺术品金融化过程中，应该尽快实现文交所在发行权与上市权的分离，减少艺术品上市融资的风险。（2）规范市场准入制度。通过完善征信制度，合理评估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提高市场的

专业化水平，降低市场的噪声交易行为。（3）要建立艺术品对冲机制。

**王辉龙（南京党校）：**

一些隐蔽的实业中的借贷行为要高度关注。大量企业的互保，一定条件下将会引发区域性金融风险，甚至引发社会动荡。摸清这种地下借贷的体量在当下十分必要。

**张立冬（江苏省社科院）：**

金融服务于经济，防范金融风险，一是从金融机构入手，把衍生的变相提高利率的信贷及类信贷品种彻底打下来，毕竟从实体经济抽血的金融必然会积累风险。二是壮士断腕，把僵尸企业真正反映到不良，督促计提拨备。三是部分企业经营尚好，但因资金链紧张导致经营困难的，要充分发挥政策性银行补短板作用，与地方政府合作成立救助基金，注入相对低成本流动性；同时注资成立国有担保公司，切断担保圈风险蔓延。

**黄志军（南京大学）：**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点突出了不良资产、债券违约、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等累积风险的防控。这些风险的背后揭示了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金融系统集聚的成规模的不良资产，很多是历史沉淀原因造成，积重难返，不能急于求成，债转股等化解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二是金融系统风险较大的资产分布多位于县域农村和小微企业，部分地区的民营企业也是重灾区，需要切实调整政策导向，根据市场的原则，进行信贷的布局和投放，不能拔苗助长。三是金融风险化解的根本途径还是企业的自我创造能力。在此基础上，金融资本才能找寻到发展和增值的根基；尤其值得强调的是，中国的民营企业缺乏创新激励和实力，盲目的强化金融对其的支持极易引发新一轮的金融风险的加剧态势，需要引起足够警惕。

**陈 东（南京大学）：**

我主要从当前 PPP 带来的金融风险作简要描述：PPP 的狂飙突进使全国整体金融风险隐患加大。摸清各地政府债务底牌，防控债务风险是国家重点关注的问题。2013 年−2014 年，国家审计署曾对各地方政府债务进行了大排查，但自 2014 年下半年以来，全国自上而下掀起了一股 PPP 热潮，这使本来已经浮出水面、再进一步跟进清理就可以大致解决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又重新沉入水下。一是 PPP 更多的是一种隐形债务。二是负债规模大。三是项目融资成本过高。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和政府约定的年收益一般要超过 10%，考虑到很多项目本身的年收益率只有不足 5%，这些价差都需要政府的财政兜底。四是“伪 PPP”盛行，项目收益率普遍较低。各种打着 PPP 旗号由政府承担兜底责任的“伪 PPP”盛行，政府回购、明股实债、固定回报等变相融资问题较为突出。

建议：对 PPP 项目进行认真审查，限定 PPP 项目范围。完善专门针对 PPP 长线资金进入

的融资政策，构建涵盖股权投资、信贷、担保、保险、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等多层次的 PPP 融资市场。严查通过 PPP 进行利益输送，避免赢利能力过低的项目进入 PPP 目录。把 PPP 项目和国家整体金融风险可承受能力相挂勾，避免一味求大求多。

**何 雨（江苏省社科院）：**

防范金融风险，需要把握金融创新的尺度。无论是股灾，还是互联网金融，抑或是山东失控的高利贷，都与当时当地的金融创新有关。要防范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从事各类违法犯罪，祸害普通百姓。

除了银行喜欢锦上添花外，企业应该也要反思自身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喜欢锦上添花的银行，在景气阶段，会积极推动企业加杠杆扩大规模，而这恰恰为以后的低谷期埋下风险的种子。故，实体企业，一定要有在景气期抵制银行蛊惑的定力与抗性。否则，在非景气期，一旦落井下石的银行进行抽贷，高杠杆企业将瞬间崩溃。

另外，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能否防范实体风险？考虑现实情况，相互担保在企业间非常盛行。其后果就是，在增强企业集体抱团抵御风险的同时，也会出现株连之灾。能否考虑建立某种熔断机制，阻止互保企业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让优质企业不因无妄之灾突然死亡？如，能否在事前限制互保企业，最高担保比不超过本企业净资产的 10%。

**孙 军（淮海工学院）：**

一是坚决控制房价上涨、全力发展资本市场，这就要求一方面要完善法制、强化监管，逐步放开注册制，赋予证监会对违法案件更大的处理权，另一方面鼓励和支持各类社会资金的入市力度，尽最大可能保持资本市场的稳定向上发展趋势；二是坚决杜绝假 PPP、政府主导型的特色小镇建设，最大可能的用市场化手段去推动；三是全面梳理地方政府债务平台，堵死漏洞，防范可能发生的危机。中央和地方税种和税收比例要重新划分，赋予地方更多收入来源，抓紧建立地方官员新的选拔考核标准；四是要忍耐一段时间的经济低速增长，全面清理和降低政府不合理、没必要的各项支出，一定程度上降税减费，用时间换取企业转型的空间，给企业创新留出时间。

**盛文军（人行杭州中心支行）：**

当前形势下如何防范金融风险？一是紧紧抓住当前复杂环境下的主要风险点。其一，关注流动性风险；其二，关注市场风险；其三，关注“三去一降一补”中可能发生的金融风险。

二是着力强化信用风险防范。同时加强风险预警和预判，对于不同种类的风险要分类处置、分别对待，不搞一刀切。鼓励金融机构探索不良资产的处置方式和途径，如资产证券化、债转股等。

三是加快落实推进同业业务和跨界业务监管政策措施的落地、落实、见效。尝试建立透明

的全市场交易报告制度，对于跨市场、跨界交易，探索穿透式监管措施。

四是强化央行宏观审慎监管职能。重点是尽快赋予央行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金融控股集团公司的监管权。

**李 锋（江苏省经信委）：**

当前中国比较突出的金融风险大致为四类，一是商业银行面临着资产质量恶化的压力，信贷规模的急剧膨胀、企业经营环境恶化导致不良率提高与银行资本充足率不足的矛盾；二是债券市场的信用风险，企业债券今后几年进入了兑付的高峰期；三是影子银行的风险持续加大；四是金融业对房地产的依赖程度加深，房地产泡沫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房地产的虚假繁荣也招致制造业生态的恶化。

化解金融风险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力：一是发挥金融政策的导向作用，强化金融监管。二是合理划分财政与金融的职能，防止财政风险向金融风险转化。三是建立多元化融资体系，减少银行信贷风险。四是提升企业竞争力，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发展，推进企业改善企业经营状况，提高企业盈利和偿债能力。五是切实控制房价上涨，在供给端增加土地供应，改善土地供应结构，影响房价变化的心理预期。

**谈 镇（江苏省委党校）：**

首先，关于金融风险点，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高度警惕四类风险（债务违约、不良贷款、影子银行和互联网金融），个人以为当下资产泡沫和贬值预期下资本外流的风险更为严峻，而且金融风险呈现跨行业、跨市场的特点。

其次，关于金融风险的根源。金融是经济的镜像，金融的问题核心是经济问题，比如债务违约、不良贷款、影子银行等问题一方面源于长期以来的金融压抑导致金融供给不足，结构不优，另一方面又源于金融资源错配，刘老师说的预算软约束问题是其根本。

最后，关于如何防控金融风险的问题。长期而言，根本上是要靠改革，尤其是关键领域重点环节的改革。

**史先诚（江苏金融办）：**

1. 金融风险不容小觑。历年以来，稳增长等词最后都是“防风险”。但是，2016 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 2017 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都把防金融风险提到了近年前所未有的高度。至少钱荒、股市巨幅波动、债市波动、汇率、非金融企业高杠杆、理财资管等影子银行、险资举牌、房地产泡沫、政府债务风险应急预案，以及 e 租宝、昆明泛亚等非法金融规模过大，已引起高层非常重视。

2. 金融风险本质在于实体经济疲弱及脱实向虚。国际经济在次贷危机后持续低迷多变，处于长周期下行阶段。国内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高，各类负担重，但转型多迷茫困难，利润率持续

徘徊在盈亏平衡点。流动资本投资转向空转、房地产以及割韭菜再分配。

3. 金融风险需稳妥防控。处置金融风险是技术活，也非一朝一夕，更难毕其功于一役。股市去杠杆已有惨痛教训。病去如抽丝，非金融企业降杠杆不可能再像当年救国有银行。

互联网金融风险（包括民间金融、投资理财、资产管理、文化金融、非法集资等），本质是非法金融活动及其导致的社会稳定风险。

政府债务风险：预算法范围内的，风险要在县级层面释放，允许地级政府及以上发永续地方债。预算法范围外的（类平台国企），要按国有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原则逐步以血的教训方式，教训国企和金融机构。

**唐德淼（无锡环研中心）：**

金融风险的管控应该集中以下几方面：一，互联网金融领域及其衍生产品领域，如互联网众筹、校园无抵押无担保信用贷款、小额无抵押无担保信用货款等细分衍生领域。二，理财公司的类金融产品，尤其平台类理财公司潜在风险大。三，民间借贷（融资）风险突出，因为基本以高收益率为诱饵，偏离资产增值的正常盈利能力比较大。

**杜运苏（南京财经大学）：**

当前阶段，国有企业和政府虽然负债率高，但暂时没有暴露，倒是民营企业，经济环境不好，环保风暴加强，最近国外针对民营企业做空日益频繁，需要引起重视。首先要梳理调查民营企业债务和经营情况，排查潜在金融风险较大的企业，未雨绸缪；其次协助民营企业反击国外做空，吸取辉山乳业经验教训；第三，针对问题迅速做出反应，协调好债权人，避免进一步恶化。

**陈 柳（江苏省社科院）：**

虽然当前的金融风险可能来自于外部汇率压力、政府债务、银行不良、企业互保等方面，但主要表现还是在经济下行阶段高杠杆可能无法持续的问题，主要是国内的结构性原因。次要表现是在创新的背景下金融创新过度，监管没有完全跟上，表现为 P2P 等蜂拥而入，留下不少后遗症。

就高杠杆来说，第一，要正视政府平台这一问题。在 2013 年做过全国性的审计摸底之后，再也没有对平台到底负债多少的全国性数据。

第二，平台的问题，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虽然只要政府信用在，这部分债务可能会类似于永续债的形式不断滚动，大规模违约预计短期内不会发生。微观上地方政府在土地财政上越陷越深，宏观上货币财政政策效果越来越差，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加得不到纠正。

第三，我相信由于这几年民营企业导致的金融风险一直是在逐步释放当中的，应该情况不会更糟糕到哪里去。虽然这几周山东和辽宁的几个大型民营集团出现问题，但大型企业出问题可能主要还是与这类企业政府介入过深有关，政府介入不深的民营中小企业要出问题这几年早

出问题了，所以民营大企业出问题将是民营企业金融风险暴露的尾声。

第四，平台问题是当前发展模式的体现，改的话要大改。需要就政府融资的边界、地方稳定收入来源、地方竞争模式等问题重新界定，才能考虑一次性由中央政府加杠杆的方式解决。

**王建国（日本中京大学）：**

我知道强大的丰田汽车，与其说是丰田的强大倒不如说是丰田具有一个强大的、金字塔式的供应商群。也就是说，强大的丰田是依托在许多优秀的中小、小微企业之上的，而那些中小企业、小微企业经营中所需的流动资产主要是依靠银行贷款。

**刘晓昶（华泰证券）：**

防控金融风险要建立市场化的挑刺机制，让一批专业机构、专业人员在对各类风险企业或机构进行挑刺中获得利益，就像存在索罗斯、浑水这样的专业人士机构，各类风险企业才不敢造假、不敢过度负债高杠杆，市场才能达到平衡，这就是鲶鱼效应。

**张建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从近两年的典型案例看，一个共同的特征是，企业经营好的时候，银行扎堆送钱，而一旦有风吹草动，银行立刻撤资，把企业送上绝路。根据史料，德国和日本的工业之所以具有难以撼动的国际竞争力，就在于在两国工业起飞初期，银行与企业成为命运共同体。

从这得到的启发是，要化解当前的金融风险，银行不要做藏头的鸵鸟，而是积极筛选优质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给予资金支持，既为企业也为自己。

**田志刚（南京财经大学）：**

金融风险发生的诱因很多，有经济因素、管理因素及技术因素等等。管理风险的发生在于内控制度的缺失，或内控制度执行不好；经济风险的发生在于实体经济弱化的背景下，衍生出众多基于短期利益获取的投机金融产品，这与扭曲国家相关金融政策有关。当前金融风险的隐患还有地方政府庞大的负债规模，地方政府、银行、融资平台（慢慢与地方政府剥离中）、资金使用者、制度默认构成了资金链条，哪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导致债务风险的发生，进而导致金融风险蔓延。实体经济的雄起，金融制度的优化等是解决问题的路径。

**刘根荣（厦门大学）：**

防控金融风险，必须注意处理好以下几对关系：

一是处理好金融风险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关系。经济活动具有不可预见性，同时我们也必须认知到每个国家和地区金融风险具有不同的成因，特别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经济体，其当下金

融风险的成因具有明显的体制性特征，具有相当的特殊性。

二是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一方面可以借鉴市场经济国家的一般手段与措施，利用市场机制化解风险。另一方面，要对政府干预资本配置导致的金融风险有足够的警醒。

三是处理好长期风险管理与短期风险管理关系。从短期金融风险来看，中国整体金融风险尚处于可控范围；但从长期来看，中国金融风险呈现不断积累加剧的趋势，其严峻性到了必须重视的时候。

四是要处理好实体经济风险与虚拟经济风险的关系。实体经济中的企业杠杆率过高，企业资本结构严重恶化才是金融风险真正的最大危害。去杠杆的重点是去实体经济的杠杆。

五是处理好国内金融风险与国际金融风险管理关系。中国是一个开放型的大国经济体，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已紧密联系在一起，国际金融风险会对国内金融风险产生巨大的影响。例如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波动、汇率波动以及国外大国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都会对中国国内金融风险产生巨大影响。因此，我们要做好防火墙，有足够的宏观经济手段、措施应对国际金融风险。

**叶　蓁（人民银行）：**

我觉得除了中国国情之外，在全球宏观和历史视角讨论金融风险也非常重要。IMF的观点是，各国政策的不确定性和内顾倾向，会加剧原本已经偏向稳定的金融体系。

**刘建森（徐工集团）：**

我们大型企业集团应该学习日本财团的运营机制，建立以资本为纽带的财团，整合价值链条的资源，使产业与金融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提高大型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和竞争力。

**郑江淮（南京大学）：**

从各产业链来看，金融风险发生在产业链上任何一个环节，就会通过企业之间产品采购和供货以及通过银行扩散开来，但是银行只是被动地反应。如果发生支付危机的企业是产业链某环节上的少数大企业，金融风险还比较好控制，可以通过银行软约束缓解。但是如果发生支付危机的企业是产业链某环节上的中小企业，那么金融风险就很快扩散开来，而且很容易扩散到其他产业链环节。当前，政府供给侧改革的着力点应该侧重于降低中小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上。大企业很容易得到政府政策的惠顾，但是那些上游行业中大企业在去产能下，很有可能提高其产品价格，进而又提高了下游行业中中小企业投入成本。产业链上的中小企业在政策性成本降低上没有得到支持，又遭受投入成本上升的冲击，这双重冲击极有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毛德勇（浙商银行）：**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可能存在以下问题：一是适度偏紧的货币政策，让在较宽松、低成本

环境中赚的不好意思的银行等金融机构，短时间内难以调整状态。二是适应了低利率、低盈利水平的低端、大规模制造企业，一旦融资成本上升，其盈利能力下降，极易引发企业陷入困境。三是目前国内影子银行体系规模较大。四是不确定性的政策预期使得金融机构持币观望，市场流动性降低，必将使得长期靠同业拆解为生的机构面临困境。

建议解决方法：一是稳定的政策预期，二是适度偏紧的货币政策，三是加强危机应对和处理能力。

**彭本红（南信大）：**

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较高，是经济发展的巨大风险。特别是国有企业和房地产企业，任何一个出现问题都对经济造成重创。两类企业的去杠杆需要有创新的思路，一是要树立破产文化，使僵尸企业出清，化解过剩产能，推动资本向高效率生产者转移。二是要加快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改革不合理的金融制度，实施普惠金融，使国有企业、民企特别是中小企业处于公平融资地位。三是打击将房地产贷款纳入理财产品的行为，监管机构适当限制开发商的股票和债券发行，降低开发商的高度负债现状。

**陈 琛（机工智库）：**

我们最近接触了一个项目，有三个主体：地方政府、地方企业和央企。地方企业希望地方政府支持他上个项目，大概二十亿元，地方政府去北京找了央企做 PPP，央企在地方拼凑了总盘子 200 亿的项目，但核心还是那个私企的项目，这样风险也越来越大。从中发现，地方政府有一个美丽的愿景，但是对于金融工具使用的知识以及金融风险控制的知识不掌握，只能被动接受别人的指令。

**丁胡送（安徽发展研究中心）：**

金融运行风险总体可控，但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特别是，2015 年企业负债规模持续上升，部分企业发生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增加；部分地区非法集资多发，银行不良贷款率较往年有所上升；部分市县政府债务过重，还本付息压力较大。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有以下对策：

一是主动释放信用违约风险。银行要建立完善不良贷款快速处置机制。同时，对涉及到的重点行业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加强评估分析、进行风险排查，制订处置预案。

二是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工具，谋划推动置换债券的发行工作，通过债务置换完善债务结构，降低举债成本。

三是着力控制民间融资风险。吸取近期发生的非法集资事件的教训，进一步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和相关部门的监管责任，提高投资者风险防范意识。

四是积极扩大直接融资。紧紧抓住 IPO 注册制改革的机遇，积极完善资本市场；重点加大对这些企业首发上市的培育和推进力度；抓住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机遇，推进中小企业在战

略新兴板、“新三板”和区域股权交易中心挂牌。

**林学军（暨南大学）：**

防范金融风险就是防范经济危机，是保障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旧的经济危机主要发生在实体经济，新的经济危机主要在金融领域，而且破坏性更大，传播更广，必须防范于未然。当前，我国的金融风险主要有来自银行的呆账、烂账，有债务违约，还有一些民间的网上银行、小型借贷公司为逃避监管的所谓金融创新等等。但我个人觉得，我国的房地产业是金融风险的重要导火索，必须重点监控。主要原因是：（1）房地产过热是我国贫富悬殊的根源。（2）房地产过热是我国资本脱实就虚的主要原因。（3）房地产过热是诱发金融风险的重要原因。

房地产过热的主要原因在于某些地方政府的推动。所以，要加强房地产的调控，关键在于政府本身。另外政府也可以增加房屋的公共供给，给刚上班的年轻人及低收入者提供公租房。控制资金过快流入房地产，减少房地产的银行信贷等，多渠道、多种措施预防地产泡沫带来的金融风险。

**王美今（中山大学）：**

现实是，为了保就业稳增长，政府通过不断扩大债务进行投资。因此，防控金融风险，要特别注意政府向居民部门转移债务的极限位置。一旦突破，汇率大贬，资产价格大跌的风暴也就开始了。

**梁 君（广西师大）：**

金融风险首当其冲的应是信用风险。当前实体经济不振，坏账呆账风险陡增。地方政府为了完成 6.5% 增速目标，一方面有加大放贷的冲动，另一方面又迫于指标完成压力诱导企业大肆做假数据。实际潜在的金融风险比想象中的严峻。

**司增绰（江苏师大）：**

防控化解金融风险，必须了解正视金融风险源。当前金融风险是一种系统性风险，构建健康协调的产业生态系统很关键。比如，房地产泡沫较大、实体经济衰退、技术创新产业创新滞后等，就是产业系统较大的不协调。

**张 健（香港金融）：**

一个鲜活的，可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案例：魏桥潜在的风险是谁造成的？他们自己归结为做空的敌对势力、会计师和香港法制、以及可能的中国政府不作为。

但从金融风险的角度，原因正好相反：（1）企业没有遵守法规和会计制度的基本底线。（2）

金融机构自我约束和外部（包括金融监管）约束缺失。（3）外部经济周期和铝电纺织等产业周期变化未符预期。

因此，所有金融风险都可从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微观层面找到原因，但解决方案必须从宏观的经济周期，产业政策和金融监管来着手。

**曾楚宏（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

关于抑制金融风险的问题。我认为最主要的根源来自于房价虚高、脱离经济水平的基本面。可以这样说，由房地产泡沫所引致的金融风险不仅绑架了银行、保险等金融行业，甚至绑架了整个中国经济，绑架了各级政府。不解决房地产市场的投机行为和房价虚高过快上涨的问题，就很难有效抑制当前金融风险过大、实现经济可持续稳定发展的目标。

由此，更进一步的问题则是，政府为何不采取房地产税等更为市场化或更加严厉的手段抑制房地产市场风险呢？我想，不是政府不想，而是在现阶段不能这样做、也不可取。因为一个经济系统的有序健康发展取决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两大引擎，在状态良好的情况下这两大引擎是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但是在恶劣情况下两者之间的传导机制会使得在一方产生的风险和问题迅速传导到另一方并形成牛鞭效应，加大风险和问题程度。

那么，如何有效抑制房地产市场的金融风险呢？我认为要从根源着手。如果实体经济能够走出一波独立上涨行情，中央政府就会没有后顾之忧的对房地产市场“痛下杀手”了。将重心放在大力扶持实体经济发展，实现创新驱动转型升级上。只有实体经济向好、经济基本面不动摇，中央才有底气和本钱向房地产金融风险开刀。

# 如何看待体制内外人才的流动？

2017年4月12日

**编者按：**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指出：“人才流动的壁垒是客观存在的问题。由此决定区域间、行业间、不同层级间的发展水平和差距，决定了深化改革应该着力和发力的方向。人才在国家间流动的障碍，决定各国产业结构的差异和福利水平的高低，如果无障碍地可以流动，国家之间、区域板块间等的差距就不存在了。因此，中国作为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千方百计地打破人才国际流动的壁垒，关系到如何迅速拉平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基本现代化；作为一个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如何打破人才流动的区域界线，发展更多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关系到整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如何通过制度改革打破不同职业之间的界限，建立旋转门制度，关系到国家竞争力和长远发展的后劲。当年深圳开放是中国第一次下海潮；浦东开发开放是中国第二波下海潮。这两次下海潮我都经历了，它们把中国许多在原体制下不得志、或急于改变自己生活、或发财心切的知识分子都吸引走了。而现在雄安新区建设，如何唤起新一波人的激情？”

基于此，刘志彪教授组织群内企业家、学者以及各领域专家针对“如何看待体制内外人才的流动”展开讨论。

**刘志彪（长江产经院）：**

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破解和松动，是从人才管理体制的松动和流动开始的。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所取得的成就，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让人才从计划体制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从而促进了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迅速发展，促进了沿海东部地区的迅速崛起。不过，这个时期的人才流动，基本上是单向的，即从体制内向体制外的流动。形象地看，改革者在体制外为人才造了一个巨大的“饭碗”，而且这个碗里的饭更好吃，由此吸引端“铁饭碗”的蜂拥而去，而后改革者再想办法改革铁饭碗制度。

改革到现在，单向度的人才流动格局已经停滞，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由此带来改革的缓行甚至某种停滞不前。现在需要探讨是建立多向度的人才流动制度，具体有：体制外向体制内的流动；地方部门向中央机关的正常流动；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间、城市间流动；不同职业间的旋转门流动制度等等。

**王辉龙（南京党校）：**

政府越强的地方人才从体制内流出的动力越小，一方面强政府下体制内可以获得显性或隐

性的收益更多；另一方经济活动受到更多限制，体制外不容易生存。因此，使体制内外人才有序流动的根本是要平衡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王建国（日本中京大学）：**

坚持体制内外有别，实际上就是承认或肯定这个社会合理存在着一个特权圈，进了这个圈内（体制）就可以享受某些特权，离开了这个圈就等于放弃了那些特权。

只有让体制内的人才流动起来，并与体制外有更多的交流替换，这个体制才能走向更为有序更有效率。

**孙 军（淮海工学院）：**

体制内外人才的自由流动，一个大的好处在于能够让人尽其用，也有利于削弱固化的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情形，真正体现人才的作用和价值；一个坏处是若体制不健全，通过体制内的权利纽带进行内外通吃，会造成社会腐败等不良后果。

建议：一是继续深化市场经济体制，形成尊重人才的社会氛围；二是限制政府之手乱作为，确定权力边界，不断顺畅人才晋升机制。最终形成内外互通、可上可下，社会尊重人才的氛围不断凝聚，市场化体制不断深化的局面。

**张建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应解决政府和高校等传统事业单位的人员拥挤和沉淀问题。不论是采取任期制，还是终身雇佣制，前提是雇员要精炼，不能成为养老机构。

**卫战胜（湖南军民融合投资基金）：**

人才的流动是整个社会发展的活力、源泉，所以我们应该支持人才的流动。我国正值用人之际，用人机制不改革，一切改革都不靠谱。政府应革新用人机制，构建有效管用、简便易行的选人用人机制是深化改革的重要制度保障。

近 200 年，中国自然科学发展不快的根本原因，主要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封建宗法制度、官本位的依附关系，限制扼杀了人的创新力。创新是什么？创新就是对生产要素、消费要素、包括人的要素的重新组合。未来的改革方向，就是通过外引内联，实现各种要素合理流动。中央的解放思想，就是在遴选各种要素的组织方式。就是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中心作用，允许更多潜在要素参与市场交易。

工业的落后首先归结在教育。职业教育被忽视和低层化是我国教育方向的一大错误。

**何 雨（江苏省社科院）：**

“体制内外人才有序流动”有两个分析层次：一个是“体制内外”；二个是“有序流动”。先谈第一个层次，这个问题是有参照对象的，就是欧美的“旋转门”制度。在这一制度下，政商学界精英是能够形成对流效应的。当下中国“旋转门”的核心是要打破“体制外”人才，特别是优秀人向“体制内”流动，尤其是非公人才向“体制内”流动的通道问题。再谈第二个层次，何谓“有序流动”？我个人的理解是，流动必须是公开透明、合法合规的。

**张小兰（西南民族大学）：**

仅从我所在西部高校而言，人才流动问题主要是市场机制不足和恶性竞争问题，市场机制不足首先体现在评价机制上，在西部，高校评奖就是人脉关系大战，官本位体现淋漓尽致；另外在一个学校，体制内外收入差别巨大，像校医院正式职工和聘任人员差别有 2~3 倍；再次行政部门与教学部门待遇差别明显，平常工资高一台阶，选房等也都是科长、处长先选，然后教授、副教授再选。

西部高校留不住人，除了东部待遇诱惑之外，西部高校体制压制竞争也有关系。因此亟需深化西部高校改革，推进市场化。

**刘瑞翔（南京审计大学）：**

当前人才流动是单向的，究其原因，是改革停滞，形成了既得利益阶层，体制内的收益高于体制内收益，另一方面，市场活力不够，实体经济举步维艰。

**王显东（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公务员体制内，中央国家部委大幅减少直接从高校招考，多从省市县公务员中选。部省一级公务员要减，县一级基层要增加人，并不断提高素质。

**周景梅（扬农化工）：**

在体制内的公司，管理层级太多，从总部到一线生产经营性实体企业，中间有 3~4 个管理层级。一方面，最基层的实体企业缺乏人才，缺少各种专业技术和经营管理人才，另外一方面，在基层以上的各个层级，滞留着很多人才，最高层级人员通过第二层级、第三层级等等不断要求基层企业提供数据、提供财务分析，不少人在做“二传手”，太浪费、太可惜。

**踪家峰（南开大学）：**

根本解决办法是省以下的市、县自治，无行政级别。

**陆慧琦（溧阳市政府）：**

流动的门槛一般是这么设置的：级别、经历、资历、推荐情况。弹性很大的同时框框又很多，而且信息很不对称，而流动的核心是待遇和级别。区域或领域内的流动较为简单，跨度大的还需要考虑各方关系平衡，特别是家庭问题。

**孙 东（南京审计局）：**

以职业化推进公务员健康流动。以职业化推进公务员队伍建设，是打造专业、高效、廉洁的服务型政府的有效路径。在“进”口：在选拔新人时，强调新进人员的资质，要具备本机关对口行业的基本资质和技能，更加重视从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和大型企业引进具有中高级职称人员。在日常管理中：加强后续培训，打造具有职业素养和职业技能的公务员队伍。此外，建立职称晋升机制，解决基层机关职位的“天花板”效应，建立另一种晋升渠道。在“出”口，要“严管厚爱”、“优胜劣汰”。现在机关存在少部分“提拔嫌老、退休嫌早”的人，工作涣散，影响了机关的影响和工作氛围。要用职业化的退出机制，避免机关出现“能人出走、懒人混事”的“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

**闫 浩（江苏经信委）：**

中国的体制下，政府人员结构固化，无法流动。政府决策、智库研究与企业运营之间相互脱节，难以协同。偶有交流也是个案，不成气候。需要探索人员大规模交流的机制。

**邵 军（长江产经智库特聘研究员）：**

（1）党政军学研国企都是广义体制内，组织部人才工作全覆盖。（2）体制内兼职，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事等，应发挥好体制外人士作用。（3）华侨作为中国公民，可有条件参与体制内部分工作。

**战岐林（山东工商学院）：**

体制内外人才有序流动，有两个关键：

1. 给劳动者流动的自由。某些部门设置了不合理的门槛，轻松拿着高收入，这违背了公平正义，也影响了经济效率。这个门槛怎么打破呢？“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这也符合契约精神，从今往后，体制内外，一律聘任制，大家都能接受。

2. 给劳动者社会保障。如果社会保障跟不上，所谓推动人才流动，最后必定沦为对劳动者的进一步抑制。在“降成本”思路下，很多人讨论的“增强劳动力市场活力”就是在加剧剥削。

**张晓东（中国管理科学学会）：**

重要的不是人为的设计人才从某处往某处流动的制度，关键是构架好选人用人换人的机制。从需求出发考虑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他们如何产生出来，无论体制内外，让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现在社会日趋多元，人才如此多样，把需要的“位子”设置好并打开打破流动禁忌，让市场机制自发去疏导流向才是出路。

**方向阳（中国财政杂志社）：**

1、从单个人（才）流动角度看，其面临的基本格局：宏观层面是公共部门和民间，也就是所谓的体制内外。中观层面是同一体制内的强弱部门单位或组织，以及中央地方、总部分支之分。微观层面是级别的升降。

2、人才流动最大的障碍同时也是动力在体制壁垒。

3、人才的确认既与个体先天基因、受教育程度等因素有关，也与平台岗位相适、能力的运用发挥相关。

4、中国人才流动问题不能脱离中国最大的实际，也就是官本位制。不仅壁垒在此，也决定了人才的流向。其间体制改革的一举一动也是决定性的。

5、什么样的制度和体制机制决定了什么样的人才流动状况，随之决定了人才流动的未来和效果。

**周 斌（省邮电规划设计院）：**

现在体制内衡量成功或吸引的只有三个，一是铁饭碗稳定带来的社会名望，尤其退休后的高保障；二是“官”的权力的满足；三是内外高收益。但这些在国家简政放权、资历（30/35/59等关键年龄段）、反腐、经济发展、稳定等重压下已经逐步出现了重大变化，优势慢慢缩小且工作压力越来越大，管制越来越多，风险越来越大。

建议：1、国家或区域政府，除了高度类同的人才政策外，还要围绕体制机制出台专门的政策、制度、甚至国家大法。

2、体制内“逼出”人才，逐步打通，激活体制。

3、打破体制“试点创新特殊化”，一方面在承载国家梦想的区域首先打破体制机制；其次同时可以考虑专门成立人才特区，当然需要与产业、创新、研发等结合起来。

4、体制突破化可以首先选择事业单位、高校、国企等，去除人才出去的顾虑，在一定保护基础上让其参与社会的创新，并在体制内外优先自由流动。

5、人才分类与体制内部流动有序指导。对人才分类的基础上鼓励流动，这要与人才的特征、使用的要求等挂钩，增加人才流动成功率和价值发挥最大化可能，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6、关键根本要解决体制内还有体制、体制外没有体制的矛盾。

**陈心颖（福建省委党校）：**

我们国家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碎片化的，尤其是体制内跟体制外待遇差别很大，这点尤其不利于人才的顺利流转。实际上，一个国家的精英应该更多的配置到市场化程度高的地方，这个国家才有发展后劲和潜力。

**周 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要素自由流动尤其是人才自由流动应该是市场资源有效配置和利用的前提和基础，然而高校体制内外进入和退出都有较高的门槛和人为障碍。一方面，体制内对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的考核指标越来越严格，自身发展压力较大，而有勇气跳出去也面临着不少的经济赔偿。另一方面，高薪聘请行业内国外知名学者和专家，也可能同样面临水土不服的尴尬。跨国界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和合作，也许不失为一种方法，人才流动的国际化交流是一种途径。

**宋文阁（江苏省国资委）：**

关于体制内外的人才是否有序流动，关键在于人才标准构建。我从人力资本会计视角，主要有以下几个观点：一是从会计要素，高度重视人力资本作用，充分计量与确认人才价位，发挥人才无形资产价值；二是扬弃德才兼备标准，充分考虑人才显性、隐性知识价值、经验、岗位、能力、职务等多要素，在合理人才分类的基础上，构建各自科学的人才标准模型；三是在党管人才的前提下，从招聘招录、培育培训、选拔任用、薪酬管理、考核评价、监督管理等多环节，建立各自分类且恰当的管理体系，严格执行人才标准和管理体系，防范劣币驱逐良币，尤其防范逆选择、逆淘汰问题。

**杜运苏（南京财经大学）：**

自从国家公布鼓励体制内人才流动以后，尤其是体制内“非正规收入”下降后，人才从体制内流到体制外有了一定进展。但双向良性流动还没有形成，要具体区分流动阻碍因素，有一些是行业或职业壁垒，无法改变；有一些是制度或人为因素，还有很大改进空间，包括社会保障体系改善，体制内选人用人制度创新，人才流动激励机制等。

**毛 强（中央党校学报）：**

突破体制机制实现人才互相流动：一要提供可以相互流动的机制，提供可能性；二要完善体制内用人机制，使真正能干事干成事的人成长起来，破除资历年限等硬性规定；三要根治官本位，理清层级制，杜绝权利本位。

**崔卫东（蓝鲸咨询）：**

培育职业素养，建立职业愿景，促进体制内外人才有序流动 。

培育职业素养。有序流向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人才，需要精湛的专业技能、丰富的从业经验、深厚的职业素养、高尚的思想品德。培育具有全球视野、家国情怀、较宽职业范畴的职业素质，是畅通人才流动的有序条件。

建立职业愿景。现有人才在体制内外流动，需要有强烈的职业愿景。无论处于体制内外，人才流动政策要有利于具有职业素养的人才，向其职业愿景进发，配之于人品、技能、经验，做到事逢其人而顺，人尽其用而才。

雄安新区面向 80 后人才，不分国内外、不分体制内外，一给体面的薪酬；二是给房；三给高级技术或管理职位，能够有一摊子事情的决定权。四给全球一流、华夏文化的幼儿园、小学教育和儿童医院。中学、大学、三甲综合医院、肿瘤医院，先做规划稍后建设。这样的具体政策，一定吸引人才。

选拔优秀党员、民企人才担任雄安新区副处至正厅级经济主官。一段时间以来，央企干部进入省部级岗位，给省级地方经济工作，注入了活力。但是，县级地方国有企业比较单薄、民营企业发达，研究制定吸引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优秀人才进入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担任县市级经济主官的政策措施，有利于畅通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各方面人才流动渠道。

**郑江淮（南京大学）：**

现在人才问题是体制内要敢于用体制外的人才，尤其是体制外的党员人才，例如把大量的优秀民营企业家，大量的优秀的党员民营企业家吸收到党和政府决策体制中。这样的话，经济社会政治决策更加稳健。

**李 群（南京审计大学）：**

体制内外人才流动有四种流向：A 体制外之间的流动，B 体制内向体制外流动，C 体制外向体制内流动，D 体制内之间的流动。其中，A 最简单，基本是由市场决定。其余三种都存在壁垒：B 体制内向体制外流动的主要壁垒是社会保障的落差，以及政府的干预；C 体制外向体制内流动的主要壁垒是政策通道有但不畅通；D 体制内之间流动的主要壁垒是政府的干预，以及原工作单位的障碍。并且 B、C、D 三种流动的壁垒中都有政府的影子。因此，要实现体制内外人才的良性流动，最主要的就是政府该管的管起来，不该管的彻底放。

**张明之（南京政治学院）：**

吸引人才，经济待遇肯定是首要的，但其他的如社会地位（归属于哪个群体）、政治身份（有

多大程度的自由）、发展的空间（孩子的教育条件）、保障力度（环境、医疗）等，都是重要因素。

**夏海力（苏州科技大学）：**

新设立的雄安新区如何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集聚全国优秀人才，吸纳国际人才？

第一，建议雄安新区借鉴德国鲁尔区的发展经验，大力吸引环保科技人才，发展以环保科技为特色的高新技术产业。一方面可以解决高素质人才非常关注的宜居问题，另一个方面可以打造绿色智慧新城。

第二，借鉴上海浦东的经验，建立“国际人才创新实验区”，实行特别人才政策，适度放宽对外企和外籍人才的限制，吸纳国际人才。

第三，将北京地区国字头的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往雄安新区积聚，这样不仅可以给雄安新区带来高素质人才，还可以缓解北京地区的城市问题。

第四，对雄安新区的房地产和房价加强规划和管制。

**楼稼平（宁波布衣）：**

为人才流动提供前提条件的，必是体制是一种大致对称的结构，也就是说某种人才在体制内外都存在着足够大的“用武之地”，只有两者旗鼓相当而可分庭抗礼时，才会出现人才市场。

当前体制内外人才流动的状况：（1）体制外人才的需求萎缩。体制外组织结构一直相当单一，一旦民营经济衰退，体制外领域对人才吸纳本来就不大的容量，将随之缩小，形成体制外人才的闲置或干脆退出，同时它造成了大学生就业难、正常在职人员的工资甚至低于退休人员养老金的现象。（2）体制内人才开始出现壅塞和浪费。体制内人才的使用状态趋于官僚化、工具化，除了成本决定型人才还可能“人尽其才”外，其他原本可以在体制内外自由流动的市场定价型人才开始在体制内大量沉淀、浪费。（3）体制内外人才在地域间的非体制性流动亦不易。因此，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人才，不可能以市场定价型方式大规模地流入新区。

**丁胡送（安徽发展研究中心）：**

智库和党政部门之间缺乏灵活通畅的“旋转门”。在西方国家，智库与政府部门之间往往存在一种被称为“旋转门”的人才交换通道，从而有效地保证智库对国家政策施加影响。而我国存在两个方面问题：一方面智库人才进入党政部门渠道不畅，多年来很少直接进入其他党政部门的。另一方面党政部门具有研究能力的人才一般不愿意流转到智库。

# 江苏如何聚焦富民？

2017年4月19日

**编者按：**近期，刘志彪教授组织长江产经智库群内企业家、学者以及各领域专家针对“江苏如何聚焦富民”问题展开了讨论。

## 江苏如何聚焦富民

**张 慧（新疆经信委）：**

国改、创新、混改，都不是直接富民。比如创新，并不是不致富，而是指向的是集体、是老板；而现在所说的富民，手段不在于创新，而在于分配。

**王建国（日本中京大学）：**

长期以来江苏擅长的是集体经济，江苏的乡镇企业，还有华西村举国瞩目；而浙江的温州模式则是以个体经济为主的。现在看来，似乎浙江人更有钱了，而江苏的集体经济显得有些暗淡无光了。所以，提出聚焦富民是否意味着把重点放在个体经济上？

其实在浙江有钱人并不集中在农业资源丰富、工业基础比较雄厚的杭嘉湖地区，而集中于比较落后的上八府的地区，比如：温州、台州、义乌等，这些地方过去很贫穷，于是当地人就跑遍全国各地做生意。正是由于浙江传统产业薄弱，所以反而容易发展新产业，形成新的政企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江苏的“聚焦富民”应该把重点放在“脱工业化”而发展新兴产业中来。

**伏玉林（华东理工大学）：**

江苏聚焦富民，从产业角度看，要研究江苏的产业产出要素分配份额问题。例如：是否存在劳动收入份额偏低，资本收入份额比较高的产业的产权结构等。

**何 雨（江苏省社科院）：**

富民，可以考虑聚焦青年群体。在当前人口规模红利衰竭、少子老龄化等现实压力的冲击下，如何最大限度地挖掘青年潜力，对于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事关重要。

**陈 东（南京大学）：**

第一，江苏上交税负比较高。第二，江苏的政策创新力度不够，干部中规中矩，同时苏商以制造业为主，创业可以发挥的空间没有浙江大。第三，在对口支援等扶贫工作中，江苏的贡献远大于浙江。

**周小虎（南理工）：**

我认为江苏做实业的多，做投资的少，因而错过中国资本增值的关键期。民间资本市场的落后、历史价值观念和初期苏南模式都是诱发的主要原因。

**陈长江（南通大学）：**

我理解，民富的首要含义是劳动力收入的比重相对于政府收入和资本收入的比重提高。而现阶段的民富，更是在第一阶段“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已经实现后，让“剩下的一部分人”富起来，这部分人是城乡的低收入群体，尤其是农村。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实现富不是首要任务，实现老、病、幼的基本保障更为重要，尤其是农村居民。因此，实现民富首要要把社会保障制度完善起来提高起来，覆盖面扩大起来；其次是要把农村居民财产资产化，用产权来保障，用市场来增值。

**刘瑞翔（南京审计大学）：**

富民主要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问题，要用资金流量表进行分析，才能有客观的结论。

**卫战胜（湖南军民融合投资基金）：**

实现民富目标、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提升产业附加值都客观要求高水平的服务业做配套。

实现民富目标，首先是摆脱贫困。江苏相较于其他地区，脱贫压力不大。

其次要创新财政资金使用方式帮助城乡居民创业致富，由打工经济过度到股东经济。另外，政府应该开展提高农民的能力并培养企业家的活动，同时利用其私营部门的实力。

最后，普惠金融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必然要求。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普惠金融体系，战略收益、社会收益、财务收益，都要考虑。政府要把虚拟经济的投资收益降低到与实体经济差不多的水平，只有这样，才能引导资本流向实体经济。

**蒋青云（复旦大学）：**

江苏人均收入虽然不错，但是收入差异比较大。原因是：第一，由于企业成本控制原因，本地劳动力被本地企业挤出去了，成了半失业人群；第二，由于长期实行集体经济，江苏人的

创业精神较差；第三，江苏的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制造业之外的生产性服务业发育不良，现代农业（除了大闸蟹小龙虾）基础也差，既吸纳不了劳动力，又没有创业空间；第四，江苏人的财富性收入水平较低。

因此，要富民就需要：（1）提升产业水平，增加本地人就业水准；（2）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创业机会；（3）加快城市化进程，提高人民的财富性收入机会。

**宋常铁（新华网）：**

1、浙江藏富于民，江苏藏富于政。解决办法除了国退民进，还是要为民营经济创造好的环境：第一、资金困境靠民间资金互助社、村镇银行、产业基金。第二、建设有效的创业辅导机构，而非流于形式的孵化器，孵化器真有效需强大资源和公益情怀。第三、高校应用性专业直接对接车间，像台湾那样，放宽师资职称评审自主权。

2、文化、历史是制度、人事的土壤，社会要深入进行创富光荣、创新光荣的生动多样的文艺作品、乡土教材建设，给予相应的媒体、出版、展演财政补贴。

3、重点支持新农村建设，发展附加值高，产业链与农村、农业紧密关联的新型轻工业，拓宽农村经济的升级空间。

4、限制国企、央企准入范围，还人民以真正的市场公平。

**楼稼平（宁波布衣）：**

一、问题意识产生之源（江浙比较）：

1、2016 年，江苏省人均 GDP 为 95295 元，全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2070 元（中位数 27436 元），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当于人均 GDP 为 33.65%（中位数 28.79%）。同年，浙江省人均 GDP 为 83538 元，全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8529 元（中位数 34192 元），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当于人均 GDP 为 46.12%（中位数 40.93%）。

2、居民收入结构。江苏，工资性收入占 58.20%，经营净收入 14.73%，财产净收入 8.98%，转移净收入 18.09%。浙江，同项目权重分别为 57.64%，17.10%，11.26%，14.00%。

3、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江苏：69.01%；浙江：66.25%。

4、江苏省居民收入的绝对数只相当于浙江省居民的 83.24%，而人均 GDP 却为浙江省的 1.14 倍。尽管江苏居民的体制性收入比重高于浙江省，但生活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重却也大于浙江省。这意味着江苏居民收入比浙江的低，但生活负担却比浙江的略重。

结论：江苏藏富于政府，浙江藏富于民。

（1）江苏居民更依赖于体制，或者说江苏政府更为强势。（2）本来，江苏政府方面集中了更多的 GDP，自然有更大的能力使居民的生活消费支出比重低于浙江的（除了显性的收入补贴外，还可以有强大的隐性补贴，比如地铁免费乘座等），但事实却似乎相反。

二、如何聚焦富民？

1、藏富于谁并不是太大的问题，关键是当政府集中了居民所创造财富的大部分时，如何在保护效率的同时，建立完善的转移支付机制，以实现更大程度上的社会公平与共同富裕。

2、国民收入如何在政府与居民之间进行分配，实际上涉及的是政府职能、权力的设计问题。一个全能型的政府必然要求集聚更多的社会财富和更大的干预权力，但政府职能太全，就会遇到各职能之间的内在冲突问题。

3、关于“如何聚焦富民”，长远来看，焦点应在于政府职能的设计和公共财政的建设。但短期看，因为民主与集权、公平与效率，历来是社会公共治理所面临的亘古难题，而一个高集权、全能型的政府实际上更缺乏解决这一难题的能力。

4、在目前的情况下，江苏政府完全可以同样强势地致力于关怀民生的仁政，不妨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先把聚焦之“焦”，由远而近地转移到如何直接地增加居民收入上，比如提高江苏居民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个人房屋出租免税，江苏股民从上市公司取得的现金分红返还红利税，江苏职工就职于江苏企业的减半缴纳五险一金等等。

**陈岸立（山东农发行）：**

富民首在使民以时，夫不失其时者，在人君简静可致耳；富民重在教育，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思想自由，让知识真正统领发展，心灵的富足才能让社会更有序；富民基础在匠人精神，努力去除浮躁、暴富、功利等思想，沉下身子，静下心思，谋富、思富、创富；富民务求创新，山不过来，我过去，换个视野、换个角度、换种方法，可能就是柳暗花明。

**刘志彪（长江产经院）：**

按我理解，富民就是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福利水平和生活水平。收入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消费水平以及财富积累水平；居民福利水平的提高则有助于提升富民的平均水平。

现在讲要“聚焦”富民，说明过去经济工作的“聚焦”不完全在这方面，可能是因为发展阶段的限制，聚在了扩大生产和市场供给能力，聚在了集中追求经济规模，聚在了象征政府形象的项目和工程。过去在人均收入较低的水平上，我们面临资本短缺和商品短缺，这可以理解。现在我们是资本过剩、商品过剩，不扩大内需、不聚焦富民，不提升居民的收入水平、居民福利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就会越搞越产能过剩，脱离了发展经济这个根本出发点和目的。

从总的方面来看，影响富民的根本因素就两个：一个是生产性努力，另一个是分配性努力。

生产性努力是指一切创造财富、增加财富总盘子的活动，它是富民的前提和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它只能通过增加劳动投入总量、提高劳动生产率两个途径来实现。其中提高生产率的办法，也只能是技术进步、机器劳动替代人类劳动、鼓励劳动者积极性提高、改善经济体制等。只有财富总盘子不断做大，人均财富才能不断增加。分配性努力，是指一切不增加财富总量、而仅仅是分配和再分配财富的活动。在创造的财富一定的前提下，分配性努力是零和游戏，即

我失去的，就是你所得到的，反之亦然。

其实，影响居民财富增加的分配性努力，还可以区分为初次分配性努力和再分配性努力两种。前者是在实体经济生产领域内部发生的，后者是在生产领域与非常生产领域之间发生的，更多地与具有强权的国家性质有关系。分配性努力是造成在财富生产与财富分配之间不成比例的根本原因。

初次分配性努力的具体形式至少有两项值得我们注意：

一是财富在国内居民与外国投资者之间的分配。GDP 中外资拿得多，自然本国居民就会拿的少。依靠吸收外资来发展经济的地方，如苏南地区，都普遍存在这一分配失衡的问题。

二是财富在创业者与打工者之间的比例。资本所有者拿多了，创业的人多了，就会出现平均财富大大高于大多数人所拥有的财富量的格局。如浙江与江苏的差距就主要在此。

再分配性努力，形式比较多。对我们的分析比较有意义的有：一是财富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三者之间的分配比例。财富一定的前提下，政府和企业拿多了，居民就不可能很富裕，这恰恰是江苏聚焦富民战略的软肋。二是金融因素。现在实体经济盈利微弱，而虚拟经济过火，善于和敢于利用金融杠杆炒作资产增值的地方，往往要比单纯做制造业的地方富裕。

**王修志（广西师大）：**

就逻辑而言，富民需要依赖两个条件：一是事前的创富机会和平台；二是事后的财富安全和福利保障。就当前国情看，这两个条件的达成均取决于政策和制度设计。对前者来说，主要是要素所有者的市场准入限制，特别是民间资本的“玻璃门”现象，也包括普通劳动要素所有者的就业障碍问题，缺乏平等的竞争机会，也就失去了创富的先决条件；至于后者，则主要是不合理的税费政策，以及尚未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包括教育医疗等），这些制度和政策缺陷加剧了民众的创业、工作、生活负担，造成家庭实际财富缩水，福利下降。因此，要持续推动富民行动，就必须下决心推动改革，切实做好相关政策的废改立，即彻底废除行政垄断障碍，改革税费政策，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从而实现“有创富热情，有创富机会，有财富安全，有福利保障”的良性发展格局。

**孙 军（淮海工学院）：**

为什么江苏过去没有聚焦富民？（1）外向型经济所致。江苏过去最典型的特征是外向型发展模式，其中的代表是苏州。在人口红利巨大、技术不足、资本占主导的环境中，大量的利润必然会被资本所占有，打工经济无法真正富民。（2）政府财政收入增长过快所致。中国在过去的经济快速发展中，虽然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也在提升，但与政府财政收入的过快增长相比，仍然过慢。

如何聚焦富民？（1）启动内需市场。基于内需的经济发展模式有利于收益在资本所有者、劳动所有者和政府之间的合理分配，有利于扩大劳动者的收入水平。（2）改变国有企业控制

的局面。我国储蓄过多必然会转化成投资，在预算软约束和行政壁垒存在的背景下，大量资金流入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对于市场的不敏感使投资很难与消费者需求相匹配，这一方面会造成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占用了过多的资源。（3）改变政府、企业、居民之间收入分配不合理的局面，政府应该逐步界定自己的权力边界，放权让利，把更多的收益分配给企业和居民，更好地实现富民。（4）降低行业壁垒，推动创业、创新。在除去涉及国家和自然垄断等的行业外，其他行业应尽可能的向民资开放，并通过各种政策措施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局面的形成。

**宋文阁（江苏省国资委）：**

一是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如房屋出租、创业创新等；二是改革个人所得税，加大免征额与扣除额管理；三是加强社会保障，减少教育、养老、医疗等自费支出承担；四是深化国企国资改革，加强国有资本预算管理，划转国有资本收益充实社保；五是创新民营资本投资政策措施，如资本扶贫、资本下乡，防范民营资本投资塌方式下滑；六是保证居民充分就业，防止失业失地。

**梁 君（广西师大）：**

根据福利经济学第一定律，自由竞争可以使社会福利最大化，这个福利可以由企业、消费者（居民）和政府三者的福利（剩余）来构成，因而要促进富民，一方面要促进自由竞争，减少垄断，尤其是国企的垄断，让广大居民拥有更多参与竞争的权利，最终使社会的总财富增加，居民的分配比例也会提高；另一方面在社会总财富既定的条件下，增加企业和政府对居民分配福利的力度，如企业可以增加工人工资，政府可以少收个人所得税或增加转移支付等。

当前的教育制度和养老医疗制度还不够完善，对富民构成了制度约束，广大居民（尤其是农民）在收入水平提高以后，流动性偏好也增加，不敢消费，也不敢投资。高储蓄率和低投资转化率同时也约束了社会财富的增加。

**王显东（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聚焦富民要出台普惠的政策举措，一任接着一任干。压缩政府开支，地铁公交降低价格，医院收费要降，大病要保障，基础教育义务教育要提质，加大廉租房公租房保障。

**周 斌（省邮电规划设计院）：**

聚焦“富民”对于政府官员、企业高管、成功的私营企业主就先不考虑了，主要是普通收入者、创业者、农民等群体，这部分人一是本身收入不高；二立足的根本薄弱；三人员规模巨大；四处理好了未来可能是区域经济新的增长极。所以具体对策一：“补富加富：弥补过去，全过程享受未来社会发展成果”，从根本上先缓解其财务压力，想法设法让大家享受尤其过去没有享受的成果（比如现在有针对下岗职工补办养老保险的措施、宅基地长期所有并享受土地开发的股份回报等）；对策二“创富环境打造，无或少后顾之忧去奋斗”，减少这些普众人员生活压力，

主要是教育、医疗和养老；对策三“全民助富－开拓眼界、群体共同变富考虑”，从政府角度，想法设法的提升这群人的谋生技能，最好是一片或整体考虑，从产业链区域开发角度让他们加入到蓬勃发展的链节上来；对策四：普通大众领军人物的发掘和培养。

**刘建森（徐工集团）：**

1、思想解放主要是要继续弘扬致富光荣的风尚，不能宣扬仇富、仇钱意识，政府的宣传引导至关重要。2、中央与地方财税管理体制需要继续改革，中央政府要在制定金融、财税政策时把富民与强国放在同等重要位置，并予以体现。同时，给地方政府更多藏富于民的经济自由基础与权力，并把富民纳入对地方政府的考核。3、“富民”的重点要放在“全民富裕”，防止出现两极分化和大锅饭，尤其是防止两极分化，要给弱者做好社会保障。

**巫 强（南京大学）：**

富民是政策目标，简单而言就是要提高老百姓的收入。而老百姓的收入可以大致分为两大类，即工资薪酬和投资收益等其他财产性收入。如果仅考虑工资薪酬这部分收入，它首先取决于其自身的技能水平。在就业市场较为完全的前提下，工资薪酬是劳动者技能水平的合理市场回报，技能水平越高，工资薪酬就越高。在此意义上，政府要富民，关键是在提高就业人员的技能水平，为其提供急需的各类技能培训，并且完善劳动力市场的建设，为劳动者寻找符合其技能水平的就业岗位提供更加完善的市场服务。其次，这部分收入还取决于这些劳动者所在的企业能否在产品市场竞争中获取更高的收入。在企业内部收入分配相对合理的前提下，只有企业总收入提高后，那劳动者才能提高自己的工资薪酬收入。在此意义上，政府要富民，关键是为企业走向高收益的经营领域提供可能的条件，包括开放各类行政垄断的经营领域、鼓励企业通过兼并收购实现竞争力增强等等。

# 如何推进结构调整和新旧动能转换，有效防控风险？

2017 年 5 月 3 日

**编者按：**本周，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特邀中国人民大学张杰教授主持专题讨论，张教授组织群内企业家、学者以及各领域专家针对“如何推进结构调整和新旧动能转换，有效防控风险”这一问题展开了讨论。我们精选了大家发言中的主要观点发布于这一期推文中，如果你有什么有趣的观点或是希望对文中作者的观点进行补充、评价，都可以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如何推进结构调整和新旧动能转换，有效防控风险**

**张 杰（中国人民大学）：**

本次的讨论我们围绕三个问题：

第一，中国经济新动能究竟在哪里？

第二，中国经济新动能转型升级过程中有哪些障碍？

第三，推进中国经济新动能的突破口和政策思路。

我个人一直的观点是，中国当前的经济新动能核心在于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以及相关的各类产业，主要途径有三：第一，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这是最为基础的；第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壮大；第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壮大。

当前最为突出的三个障碍是：

第一，迄今为止没有构建出与中国经济新动能内在需求相匹配的金融体系；

第二，没有构建出与经济新动能内在需求相匹配的创新链体系与创新机制制度；

第三，房地产泡沫与金融泡沫成为抑制制造业自主创新提升和增加制造业成本的重要因素。

在我看来，中国当前扩张中产阶段以及缩小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就是在于发展和壮大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关键在于提升制造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没有生产率提升就无法根本性地提升工资和提供高收入岗位。金融泡沫和房地产泡沫只能降低劳动生产率，扩大收入不平等。中国今后的经济动力，既在于消费驱动，更在于投资驱动，此阶段的投资驱动，本质上是经济新动能带来的。

**陈 东（南京大学）：**

我从民营企业角度提两点：

一是需要有效打造“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让民营企业家把更多的精力用于企业的长远发展上，把更多的资源分配到实体性投资上去，有意愿、有信心、有能力去进行“脱虚向实”转换。

二是要加强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整合。我国企业除了传统的“新三会”，还有“老三会”，即还有工会组织、党组织、职工代表大会组织，而且近年来民营企业的党组织比例有提高的趋势，“新三会”占比稳定在一半左右。和成熟的西方公司治理结构相比，我们的党组织和职代会组织是他们所没有的。我们的民营企业应该要充分发挥这两个组织的作用，而不是进行抵触。在“亲”“清”新型政商环境下，这两个组织的作用会更多的把党和政府的正能量、发展理念带到企业中来，会对企业结构调整、新旧动能转换和有效防控风险起到重要的作用。

**宋圭武（甘肃省委党校）：**

经济增长有三重动力。

第一重动力是要素动力，要素动力是表层的，且具有短期作用；

第二重动力是制度动力，制度动力是深层的，且具有中期作用；

第三重动力是文化动力，文化动力是最深层的动力，且具有持久作用。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或经济增长，最终取决于要素、制度、文化三重动力的合力作用。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转型阶段，进一步挖掘潜力需要注重开发要素、制度、文化三重动力，形成有效新合力，推动中国经济持久发展或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刘志彪（长江产经院）：**

讨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能问题，应该回到最基本的原理上来。在生产函数中，目前来自资本、劳动、要素生产率三块的动能都在衰减。资本投入的减少尤其是民间资本投入这些年的大幅度降低，既与这些主体的预期不稳定有关系，更与投资的边际报酬连续下降有关系；人口拐点的提前到来，使用工成本上升迅速，同样的劳动生产率下，劳动对产出的贡献必然降低。现在主要的问题，可能是综合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很多人认为这是经济结构转向服务业为主之后导致的（鲍莫尔定律）。其实我觉得中国现在短缺的是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传统制造业绝大多数是过剩的，另外现代服务业的生产率其实并不比传统制造业低，因此可能鲍莫尔定律不是解释中国经济动能衰减的好的理由。因此，所谓增加新动能问题，其实也就是跟提升中国要素生产率有关。关键方面在于：

第一，加速结构变化，就是提高配置效率；

第二，促进要素升级，比如说发挥知识资本的作用，从汗水经济转向智慧经济，从低端的劳动力转向高端的人力资本；

第三，机制改革。三个方面可以概括出综合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主要方面。

配置的效率提高非常重要，但是配置效率提高的前提，是要有一个市场决定行为决策的激励机制，否则就无法保证附加值低的部门的要素，自动向高附加值部门进行流动和转移，要素效率就不可能高。另外，促进技术进步问题，说到底还是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调动起人的积极性的问题。中国现在并不缺人才，而是缺激励人才有效集聚、使用的机制。所以总结起来看，新旧体制动能转换，我觉得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如何通过加大改革增加新动能的问题。不真改革，中国经济没有出路。

张杰教授提出的中国经济的新动能在制造业，我认为是有前提的。传统的中国制造业是泡沫经济最大的领域，几乎没有一个部门不是杠杆过度、产能严重过剩。如果继续用“振兴实体经济”的名义加大对传统制造业的投资，只会把泡沫越搞越大，最后出现严重的金融危机。因此，加大对制造业的投资不能笼统地说，要有前提。这个前提就是要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流程、新业态、新模式去改造传统产业，让其提高质量、增强竞争力。从微观一点的角度看，目前，我国沿海发达地区出现了因要素成本上升，某些传统产业破产倒闭、外迁和外移的搬迁情况，人们担心产业空心化问题。为此，这些地区在发展战略上可以在价值链上选择向高端攀升和产业延伸的办法。一是向研发、设计这个上游发展，即进行产品创新；二是向下游延伸，发展营销、物流、网络、品牌、融资等国际总部业务，即组织架构创新和业态改造；三是在中游截取加工制造中价值增值大的环节，即进行工艺创新；四是多元同心化拓展，拉长产业链，进入关键零部件和关键设备制造业。

**卫战胜（湖南军民融合投资基金）：**

过去的动能是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土地、出口市场以及传统过剩产业，过去的金融动能是银行。而今天的动能是政府法制基建投资、土地入股、内需市场以及高端服务业，今天的金融动能可能会转向创业投资。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市场一旦出现动荡，整个经济和社会都会大受影响。事实上中国隐性的金融危机产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被人们忽视了：当经济增长方式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建立直接投融资为主体（以股权投资为主轴）的新经济秩序，而社会仍以间接投融资为主时，社会大量游资不能转变成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需求而必然转变成投机和无序运动，从而产生投资和需求、生产和消费脱节。

通过鼓励创新创业，形成以创新创业带动就业的格局，可以在扩大国内消费方面收到“一箭三雕”之效：一是增加居民收入，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二是提升居民对未来和消费的信心；三是通过创新创业，带动新产品、新服务市场供给的增加，促进国内消费多元化。 用创业投资提振中国实体经济质量，才能有效对冲房地产泡沫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阻碍人民创新创业步伐的，是以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金融体系，只有改变商业银行“朝南坐”的市场地位，才能让更多的钱，流向创新领域。

在新旧动能转化过程中，决策者若不能革新用人机制，来突破旧体制对人才的约束，其结

果就不会强化各方参与者的积极性。

**刘瑞翔（南京审计大学）：**

我主要从需求角度来进行分析，长期以来，投资、出口、消费被形象称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国主要依赖投资和出口的拉动，消费所占比例远低于正常水平，最终需求结构是扭曲的。随着中国经济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生产要素价格提升以及投资回报率下降，投资和出口已经很难承担拉动经济增长的重任，必须依靠消费需求的拉动。

消费需求占比远低于正常水平的原因，与我国国民经济收入分配和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有关。一方面，政府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是逐年增加的，另一方面，居民间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因此，要发挥消费的驱动效应，就必须从收入分配着手，从宏观和微观层面进一步优化我国当前的分配格局。

**司增绰（江苏师大）：**

要提升对现代服务业、对创新的客观需求，一个思路是提高我国产品、服务的质量、功能、性能、品牌等，在产品需求、产品设计、原料供给、材料生产、生产工艺、产品品牌、产品营销、产品流通、产品售后服务、产品废物回收等环节全产业链创新。强化对民生消费品品质提升的重视，补居民消费品质量、性能、功能、品牌不足的短板。

**孙 军（淮海工学院）：**

在我国人均 GDP 仍然较低的背景下，完全不同意我国目前要靠消费拉动的判断，我认为下一步应该由政府主导投资向市场主导、企业家主导投资转变，这就要求坚决破除行业壁垒，允许民资进入绝大多数垄断部门，政府之手后退，市场之手上前，这一方面会重新提高投资效率，另一方面会不断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增加居民消费能力，最后会大幅度降低我国金融风险。

**王建国（日本中京大学）：**

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是扩大内需的关键，而这个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又以收入分配的均衡性相关联。目前的中国不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壮大中产阶级队伍与扩大内需都只是一个空想。

**杨平宇（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现在推进城镇化建设应该是最大的拉动内需手段。一方面基建投资，另一方面撬动农村人口的高端服务需求，促进现有的新技术、新业态，向农村地区推广，也是扩大新动能重要手段。

**张小兰（西南民族大学）：**

从投资看，由于大中小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基本完成，未来基础设施投资只能在较偏僻的乡镇展开，但投资效率有限。从出口看，传统低端产品面临东南亚低成本竞争，而高端制造业又没形成国际竞争为，再加上全球经济不景气影响及国际政治因素影响，前景令人担忧。从消费看，中产阶级是消费主体，而我国中产阶级由于税负、收入和生活成本等问题，还远远没有形成。

所以我认为新动能要靠中高端制造业发展，而中高端制造业要靠（1）互联网 +；（2）鼓励民间资本创业；（3）高新技术创新及对传统产业改造；（4）重视产品品质，把电饭锅等消费留在国内；（5）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为制造业发展提供法律保障；（6）重视我国制造业品牌打造。

**伏玉林（华南理工大学）：**

从政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角度看，可以通过三个方面的改革推进结构调整和新旧动能转换：（1）去管制。通过去管制，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减少关键要素如资本的跨企业资源配置的扭曲。（2）减税降负。通过减税降负，解决微观激励问题，把原有分权体制下地方竞争带来的绩效加以系统化整合，建立新型政商关系。（3）改革所有制结构。以所有制结构改革为抓手，撬动结构变化，逐步实现经济结构的自调整机制。

**罗立彬（北京第二外国语学校）：**

39 年前的中国改革开放为发达国家转移低端产能提供了一个近乎独一无二的目的地，中国当时劳动力成本极低，低成本劳动力群体极为巨大，文化统一，政治稳定，具备强烈的致富愿望。而 39 年过去了，当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也有低端过剩产能需要转移时，却不再有像当年中国那样理想的转移目的地。当前低收入国家都不具备当年中国的条件。所以我觉得一带一路倡议中，培育一个理想的过剩低端产能转移目的地，应该是很重要的意义所在。

**刘东皇（江苏理工学院）：**

在我看来，城镇化一直是经济增长的动能所。过去城镇化突出表现为土地和经济城镇化，农村弱化。无论在城镇经济和农村经济的比重还是两者的联动性发展方面中国城镇化进程还未结束，城镇化继续发挥动能作用应改变过去的粗放型方式，推动以人为主的城镇化进程，新型城镇化应是新常态经济的重要动能所在。

**陈岸立（山东农发行）：**

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是市场价格机制引导下的一个渐进的、螺旋式上升一个过程。从我们支持实体经济的类比来看有一定代表性：一家位于经济相对不发达县域的纺织企业，使用老式的

剑杆织机，万锭用工在三百人以上，但是企业是自我积累、自我发展型，很少使用银行贷款，企业利润并不是很低；另外一家在全球纺织业排名领先的公司，大量使用机器人等先进设备，万锭用工人数不到 8 人，但使用较多的银行贷款，企业的利润水平也不是很高。因此可能一大批使用大量贷款的相对技术水平较高的企业却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困境；担保圈风险扩散，导致一大批企业受到影响，银行风险贷款迅速增加；影响就业和地方税收。

**张明之（南京政治学院）：**

（1）形成经济新动能的动力在于：内在动力，主要是经济结构自身的一个结构性转换；外在动力，就是在全球产业链地位升级。

（2）经济新动能升级主要障碍。制度设计上的非市场化导致资源市场化配置困难，经济政策因部门利益而协调困难且非连续性，资本因逐利性而过多地流向非实体经济。

（3）突破口和思路。一是约束政府权力，切实政府治理现代化，监管有度。二是政策制定，论证的科学性和实行的长效性。三是过剩产能的淘汰和消化。四是高附加值产业创新发展。五是国际经济交往中提高话语权和影响力。

**赖红波（上海理工大学）：**

经济增长动能或转型升级内在动力，从微观知识角度来看，必须有新的知识，培育“持续租金”的异质知识获取（形成激励导向），跨界和创新，了解、汲取更多新的知识，打破传统知识获取的路径依赖（不能在旧的知识基础上实施新的战略或战略变革）等。当然，也包括：（1）企业本身的默会知识传承（从制度层面减少雇员的频繁流动）；（2）知识产权的保护和隔离机制，从重视数量到重视质量（从机制上完善，包括最近我国发明专利申请断崖式下跌）；（3）知识体系的重构等（突破企业传统结构或体制机制对新知识获取的制约），包括：如何减少阻碍中国经济新动能的知识形成因素等，传统产学研也需要反思如何升级。

**王辉龙（南京省委党校）：**

旧动能主要是低成本驱动，追求的是如何提高生产效率、提升产能，实践上是以结构调整提升了生产效率。新动能主要是创新驱动，追求的是提高产品（服务）的质量和品质，实践上以效率提升带来了组织结构调整。从低成本驱动到创新驱动的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是，实体经济从追求数量转向追求质量。大量低端企业的存在会拉低行业利润率，带来实体经济泡沫风险，不利于新旧动能转换。

**方向阳（中国财政杂志社）：**

动能与动力有联系和区别的，简单的例子：在力的方向上位移一段距离才叫做功，做了有用功才有能量的增加，否则是“内耗”。

体制机制障碍的突破是最大的驱动力。比如，国家安全的提供是纯公共产品，但并非一定需要政府直接设立央企或国防工业去生产，而是由国防部用政府购买高效率的私人公司（当然需要市场准入和加强管制）产品去解决。

**倪 敏（硅谷创业）：**

关于寻找经济增长新动能，其实不光国内面临这个问题，全球都面临这个问题，而且现在还没看到有方案。突破不光是技术创新上，还有政策上。比如无人驾驶汽车，新能源汽车，可能是未来的经济增长新动能的方向之一，但是，政策方面还没有突破，所以没有办法实现产能化。在新动能没有产能化之前，没有办法创造新的岗位，吸纳更多的劳动力。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未来对劳动力的需求只会降低，所以，政策层面的突破才是产生经济新动能的根本动力。

**张俊芳（东方国际）：**

要升级产业，必须在激励机制上解决问题有法律保护，保护知识产权，传统的知识产权意识淡薄会阻碍产业升级的。

**何 雨（江苏省社科院）：**

关于新旧动能转换，个人认为，这一表述尚有商榷空间。转换，似乎有抛弃旧动能，拥抱新动能的意味，但其实新旧动能各有优劣。旧动能长处在于基础雄厚，发展稳定，但存在污染、能耗问题；而新动能长处在于顺应方向，有更高技术含量与附加值，但规模有限，前景不确定性大。未来经济运行，要针对旧动能存在的既有问题进行改造，而不是一棒子打死。对于新动能，也要警惕新动能崇拜可能引发的风险。

**杨 锐（苏州大学）：**

经济增长的源泉必然是创新。所谓的结构调整，应该是行业结构的调整，即判断哪些具体的行业能带来较大程度的增长。这个结构调整本身就是一种新动能；与此结构调整的相关体制机制的变革，也是一种新动能，在这方面若能具体化可能更有针对性。但是实际上，无论是具体行业，还是具体的体制机制，它们所产生的增长力量都是落实在省际或城市这个地理尺度。他们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空间载体，如果脱离这个空间尺度去谈产业、谈体制机制，效果甚微。我的观点就是，需要大力发展国内城市间的相互贸易，促进城市经济创新发展，这是实现经济内生增长的重要路径。城市间的相互贸易，有三种类型：资本品贸易、中间投入品贸易和消费品贸易。有三个判断：

（1）一个城市尤其需要与发展水平有差距的、邻近的其他城市，通过中间投入品、资本品和消费品的联系，促进城市合作创新。如果少了前面两个条件，即使有产业联系，效果甚微。

（2）充分利用大数据等新兴产业来促进城市间的这些产业联系，可以帮助各行业的产品

性能提升、生产效率提升和市场创造。与此同时，新兴产业也获得了自身发展。

（3）一方面，体制机制的突破，应该把思考重心转向城市间的相互合作与国内贸易，尤其是与比自己落后城市的贸易。另一方面，从产业政策角度，传统产业变革的力量，多不是来自产业自身，而是来自其他产业。因此，面向大数据等新兴产业的政策、规划等，政策重点不是以自己的城市为中心来谋划发展，而应该是以促进城市间的产业联系进而创新为中心来谋划发展。

**林学军（暨南大学）：**

（1）创新是新旧经济转换的动力。中国发展的旧经济，主要是增加资金、劳动力、资源等的投入，靠的是扩大生产规模，粗放型的经济发展道路。当今，中国的土地已经开发殆尽，能源枯竭，资源短缺，污染严重，劳动力成本上升，旧的发展模式已经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必须提高创新能力，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环境污染，把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过渡。为此，我国必须加大人才培养的力度，造就千万科技工作者，还要增加研发经费，完善科研的基础设施，加强政府、产业界、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合作，鼓励企业开展科研活动，保护知识产权，建立完整的国家创新体系，提高国家、产业、企业的创新能力，努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培育战略新兴产业，推动中国经济不断向前发展。

（2）开放是新旧经济转换的根本。当今是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国家越开放，经济越发展。我国旧的开放是以引进为主，今天我国已经站立在开放的新阶段。经过改革开放近 40 年的发展和积累，我国已经具有一定的资本优势、技术优势。在国内市场已经饱和，投资报酬率下降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学会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一带一路”战略，给中国的新开放提供了新机遇，我国应当利用这个战略平台展现新优势，发展新贸易，开拓新投资，努力构建有利于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形成新的国际分工新格局，推动中国经济迈上新台阶。

（3）制度创新是新旧经济转换的保证。制度可以让人有明确的预期，激发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例如，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可以保护科研人员的权益，激励科技人员研发的积极性，从而形成创新的热潮。制度可以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例如，公平竞争，反对垄断的制度可以鼓励企业提高管理水平，提高产品质量，提高经济效益。制度可以引导旧经济形态向新经济形态的升级转换。例如，环境保护的制度，可以引导企业节约资源，减少能源消耗，形成可持续的发展态势。又如，鼓励外向型的经济制度，可以引导企业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利用比较优势，开拓国际市场。制度的力量是强大的，可驱动中国经济更上一层楼。

**王修志（广西师大）：**

结构调整，动能转换，风险防控，三者逻辑上内在统一。基于这个判断，当前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为学界提供了一个以风险防控为切入点的研究视角，大体可以按照“风险识别 – 风险成因 – 风险防控”之思路展开。

一、风险识别：抓主要矛盾。关于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经济风险点的判断，可能更多的目光聚焦于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关注由于过度投机而形成的两市泡沫破裂风险。但从国民经济全局来看，特别是着眼于中长期发展而言，当前最大的风险应该在实体经济领域，这应该是主要矛盾。

从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等各项指标考察，实体经济毫无疑问才是国民经济这座大厦的根基。从旧常态转型为新常态，转型期最大的风险就在于实体经济这个根基缺乏动力活力竞争力，因此，防范风险，根本上就是要防范实体经济这个根基崩塌的风险。结构调整，新旧动能转换，是实体经济从旧常态顺利过度到新常态的关键，是夯实实体经济根基的关键。

当前实体经济的风险点主要表现在：（1）供给侧资源错配，效率低下，创新动能不强；（2）需求侧消费制约，需求转换升级受限，外贸出口空间被挤压。

二、风险成因：抓矛盾的主要方面。关于实体经济不振这个最大风险的成因分析，需要“跳出风险看风险”，以便更准确地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反思实体经济今日之困局，既有实体经济自身产业周期演变规律这个内因，更有长期以来房地产业畸形发展，以及金融业背离实体经济等外因。

从内因看，18 世纪以来历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和产业创新之动力效应递减，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 GVC 分工体系的价值创造及价值增值能力趋弱，处于分工中低端及产业跟随地位的中国，享受到的开放红利分工红利自然也呈下降趋势。

从外因看，房地产和金融市场长期畸形发展侵蚀了实体经济成长的土壤，挤压了其成长空间，成为实体经济转型发展的外部障碍。更深层次的影响在于，两者直接导致畸形的价值观、发展观、政绩观，在企业家精神、劳动要素、土地要素、资本要素、科技要素等方面动摇了实体经济发展的根基。就实际情况来看，此处外因的负面影响却更为凸显，可视为矛盾的主要方面。

三、风险防控：近中远组合拳。

近期：扬汤止沸，遏制过度投机势头。房地产市场坚定实施最严限购，严厉打击非法中介；金融市场坚决惩处违规交易的金融大鳄，依法严治金融领域腐败。

中期：釜底抽薪，构筑有效的制度防火墙。房地产市场：明确“居住”功能，加强制度和法制建设，形成长效良性发展机制；金融市场：明确“服务”功能，健全监管，稳妥推进改革创新。

长期：固本扶元，培育实体经济创新发展的土壤。供给侧：科学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以体制机制改革推进资源优化配置，提高资源效率；以法制建设保障企业家合法权益，激发企业家创新热情；以金融市场改革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高效金融支持。需求侧：以消费者主权培育为基础，通过个税改革和转移支付等方式切实提高民众消费能力，通过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改革切实降低民众消费后顾之忧，进而发挥消费需求对供给侧的约束和刺激效应，推动供给侧改革。

**张建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经济结构调整内容很多，但重点是产业结构。当前的产业结构问题由四个方面引起。一是，消费者需求结构变化；二是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发生了变化；三是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增强；四是产品国际竞争力结构的变化。受传统动力的约束，现有的产业结构没有适应四个方面的变化。所以，要改变陈旧产业结构的前提是改变传统的动力。

所以，新动力的形成需要重构制度体系，以精细化的制度引导经济行为走向集约化生产经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精益生产管理，一是科技创新。精益生产管理，有日本和德国两个学习榜样。科技创新问题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国有企事业单位几乎垄断的政府的研发资源，结果是低效率、低质量的创新供给。比如，高校和科研院所从事研发项目的大多数都是 1–3 年的项目，且成果转化率极低。如果这些项目交给企业开发，将显著提高创新效率。近一段时间，我对 2012 年以来国家颁布的科技创新政策整理了一下，一个初步印象是，政府偏好国有研发机构的体制机制很难改变，而有效率的创新机制才是增强新动能的关键。

**李 锋（江苏省经信委）：**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基于互联网的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金融领域的 P2P、城市交通的滴滴快车、共享单车等基于互联网的业态模式，不仅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便利，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之一。这些业态模式需要监管，特别是大量占有押金的类金融机构，应该由相关部门研究监管办法，有效保护市场竞争的公平和消费者权益监管。但监管方式要顺应新业态发展规律，本着审慎宽容的原则，认真调研，仔细研究，保护好创业者的创业热情。

**朱长征（长平经济论坛）：**

新动能的产生，不是政府部门做规划和产业政策能够得来。当大家谈论工匠精神、看到大量海外代购，说明中国制造的较多产品仍停留在中低端位置，这些行业产品质量、工艺、品牌的提升将激发大量新的有效产出。此外，我们还面临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迟缓或停滞困境，如石油天然气、电力、电信、铁路等，服务业的金融、医疗、教育、文化等领域开放也存在较多障碍。这些领域，特别是高端服务业，仍然存在程度不一的行政性垄断，进一步放宽这些行业准入并鼓励竞争，必将大大改善这些领域的效率。

**彭本红（南信大）：**

个人认为，新旧动能转换实质是以传统要素驱动转为以新兴要素驱动的转变。随着新产业、新业态的涌现，出现了一些与传统要素相区别的新要素，比如知识、技术、信息、数据等新生产要素构成了新动能产生的基础。新动能的培育应该结合行业特点，比如农业新业态、制造业新模式、服务业新领域都可以使传统动能焕发新活力；也要结合区域特色，东部的知识、技术

密集，中西部的数据、信息密集都有可能产生新业态、新模式。新动能的培育对政府管理能力提出挑战，需要建立包容审慎的动态监管体系，同时也需要构建多方参与的治理体系。

**宋凌炎（江苏精诚 & 精缦毛毯）：**

新旧动能转换应该可以说是新经济时代的到来，当全球经济疲乏、制造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企业需要生存发展，必须要寻找有效方法，包括在自动化智能制造上动脑筋，在生产管理工作更加精益化，在技术改革与技术创新上更多新突破，在产品销售方面采用包括网红直销等新模式，在售后服务上使用更贴切的新的服务方式。我认为新经济新动能转化必须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自动化智能制造相结合的新的合作公司，不再区分互联网公司，传统企业、纯服务业以及销售业，而是融合了四位一体的现代化新型经济的企业。

**曹玉平（河南大学）：**

当一个经济体处于要素驱动的追赶阶段，由于主要是利用成熟技术为成熟市场提供成熟产品，失败风险小，成功概率高，经济运行呈现出“高出生，低死亡”的特征，配合官僚政治的事先筛选，这时优胜劣汰的事后筛选机制就不太重要，所以预算软约束的危害很小，甚至有利于为快速追赶提供金融支持；但一旦这个经济体由追赶阶段进入创新驱动的前沿或准前沿发展阶段，就必须利用高新技术为新市场开拓新产品，面临着极大的未来不确定性，大量创新创业项目产生后只有少数好项目能够成功，其他大量项目都会破产死亡（这很残酷，但却是创新驱动发展阶段的固有特征，也是保持创新活力的根本）。研发项目的不确定程度越高，事后筛选相比事前甄别的有效性就越明显，而只有预算硬约束才能让失败项目依理正常死亡。反之，创新驱动阶段的预算软约束只会导致大量僵尸企业存在（市场被阻塞，资源被占用，激励被扭曲……），使得高出生，高死亡的活力机制演变为高出生，低死亡的过渡局面，最终进入低出生，低死亡的腐朽状态。所以转型经济体要想在前沿创新上取得好成绩，必须通过制度动态变革不断硬化自身的预算约束，从而为创新转型提供适宜环境机制。而目前我国金融体制优先将贷款发放给具有预算软约束的国企，具有创新活力、面临预算硬约束的中小微企业却融资难。

# “一带一路”战略下，长三角地区如何有效发挥作用？

2017年5月10日

**编者按：**本周，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特邀徐工集团出口公司总经理刘建森博士主持专题讨论，刘博士组织群内企业家、学者以及各领域专家针对“‘一带一路’战略下，长三角地区如何有效发挥作用”这一问题展开了讨论。

## “一带一路”战略下长三角地区如何有效发挥作用

**刘建森（徐工集团）：**

江苏政府或企业走出去建工业园已经有些年头了，而且大都在“一带一路”上，但是，如苏州工业园一般取得成功的，还很少。究其原因，我感觉有以下几点：

1、长三角借“一带一路”抱团出海，是一条走出去的途径，不仅受到政府财政的支持，也受到两国政府的保护，省去诸多不便，如注册、用工、签证等。但是，这样的走出去，首先必须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尤其是当地的切实有效需求是企业落地生根的基础；其次，应该物以类聚，打造产业集群，否则园区定位非常模糊，难以有长远发展。

2、目前一些工业园区或自贸区，不是真正调研基础上做出来的，缺乏市场基础和投资价值。

我对于长三角经济区融入“一带一路”的建议：政府可以支持那些已经在当地形成一定规模的企业，扩大成工业园区，并实事求是地给予补贴，积极引导同类企业和价值链条上下游的其他企业入驻园区，切忌凭空想象。即支持已经生根的企业，扩张发展，而不是圈地造园再吸引投资。

江苏是否被划入“一带一路”，并不重要。主要看长三角地区的企业家是否需要“一带一路”的市场，是否有走出去的意愿，是否具有竞争力的产品与服务。企业家的主动作为，是关键，当然要及时与政府沟通，以便获得支持。如果论条件：江苏任何一个地市级城市都比迪拜强、比韩国强，但开放程度不够。中国的“一带一路”不仅仅是单向的行动，更应该是双向的，比如对“一带一路”国家实施更加宽松的商务政策，提供免签、落地签等便利条件，加快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卜茂亮（南京大学）：**

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来看，中国要在“一带一路”上构建价值链。长三角地区最有可能成为价值链的链主，起到发包方的重要作用。

**邵 军（长江产经智库特聘研究员）：**

“一带一路”是中国国际化战略的一种形象说法，意在寻求历史感和表达节制姿态。“一带一路”规划由于太拘泥于地理节点，所以对长三角重视不够，但长三角其实应是国际化先锋板块。

江苏参与一路一带建设，应主打园区模式。九十年代以来，江苏最成功的发展亮点是园区建设。1989 年我随领导访问新加坡，看中了他们的裕廊工业园，经几任班子努力最终落地苏州并取得显著成效，为省内后来的园区建设提供了丰富经验。在走出去战略中，建立了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柬埔寨西哈努克港工业园，目前也取得成功经验。因此，到合适的国家建设工业园区，江苏有经验、有队伍、有基础设施建设能力、有跟进企业，且可复制。

**陈伟贤（江苏省人民医院）：**

“一带一路”沿途的国家，宗教信仰和中国不一样，他们有的是伊斯兰教，有的是佛教，近年来人民币的不稳定，“一带一路”国家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大打折扣，可能“一带一路”在目前的情况下进行，还是有很大的困难。我觉得讨论“一带一路”的投资环境和投资内容及苏商的投资形式还是有价值的，不一定非要用大国企巨头去投高铁、高速、大型基建，民营企业去投资也是很好的选择。

**何 雨（江苏省社科院）：**

从目前看，陆上方向的“一带”，不仅中欧班列越来越频密，而且中国的产业园区、物美价廉的制造业产能向中亚、东欧的转移，还是有成效的。海上方向的“一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就目前来看，“一带一路”的主要机会，集中于“带路”沿线上相关国家的工业化与基础设施现代化上。对于长三角来说，工业化与基础设施是其优势，应全力抓住这一国家机遇，推动相关产能、技术与装备走出去。具体到江苏来说，园区经济是江苏的拿手好戏。江苏可以考虑在“一带一路”国家建立园区经济，使之成为江苏飞地经济，推动江苏制造国际化。

**孙国民（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长三角是中国经济最活跃最能代表中国实力、体现中国高度的地区，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发挥作用：一是把长三角打造成中国高端技术高端产品的输出窗口，特别是船舶技术、信息技术等高端装备技术及其产品；二是构建国家和全球价值链，占据价值链高端，形成位（势）差，

进而通过垂直分工、发包、供应商联盟等形成瀑布效应；三是创新产能合作新模式，把长三角地区的部分产能带出去、转出去，实现腾笼换鸟；同时，创新税源经济，通过税源分成、长三角岛（如：浙江岛、江苏岛、上海岛）等建设，扩大税源、人才引进和创业创新的力度，整合全球高端创新要素资源；四是通过理念传播，特别是将长三角成功的发展模式以嫁接、嵌入等方式推向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中实现多赢。

**张远鹏（江苏省社科院）：**

关于长三角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观点如下：

一是，发挥制造业发达的优势。“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贸易畅通，但是现在最重要的不是国际贸易而是国际投资，在《愿景与行动》中提出双向投资。以前我国在“一带一路”国家贸易为主，现在应该是贸易、投资相结合，投资带动贸易。

二是发挥长三角工程承包水平较高优势，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有所作为。江苏是全国第一的建筑大省，在海外开拓也有很多成绩，其他在电力、轨道交通、互联网设备、电线、电缆制造都有一定优势，可以发挥这方面的优势。

三是发挥长三角电商发达优势，建设“网上丝绸之路”。

四是发挥长三角教育文化发达优势，推进民心相通工程。长三角高等教育发达，在“一带一路”除了学历教育的合作外，提倡重点集中在高等职业技术的合作和技术培训，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学历、资格认证的互认。

五是发挥长三角新能源环保技术优势，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在环保和生态领域的合作。建设专门机构或者设立基金，以长三角企业牵头，促进环保技术、生态保护及新能源技术的交流合作。

**刘志彪（长江产经院）：**

“一带一路”是一个新的开放观念、理念，不是地理规划，关键的主体不是政府而是企业。只有企业参与，形成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才能真正实现。

民营企业作为投资主体，抱团去“一带一路”国家建设产业开发园区的交易成本最低，风险最小。

1. 国内尤其是江苏在过去几十年的开放发展中，具有管理经济技术开发区、高科技园区的丰富经验和实践本领；

2. 民企走出去，可以避免国外企业针对中国国企的反垄断指控；

3. 抱团走出去办园区，与当地政府讨价还价能力更强，还可以降低东道国可能的频繁的政府变动给企业带来的政治风险；

4. 更能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和驻外机构的关注及其保护；

5. 对投资的东道国经济发展影响大，可以以较大的规模经济来雇佣当地高级雇员、使用当

地生产者服务（如银行贷款、律师、警卫等），降低与其打交道的成本；

6. 更有利于减少中方走出去人员的国外生活不舒适感，降低其家庭成员亲友的担忧、忧虑，使其安心工作。

**周 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一带一路”战略下，长三角地区的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需要协同合作和错位竞争。一是借助于良好的区位优势，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对文化产业发展的驱动力，鼓励文化企业进行探索，推动数字创意产业的优先发展；二是加强区域间的协同效应，构建公共服务平台，实现不管是技术支持、金融支持还是项目支持的一体化平台打造，实现大数据下文化产业共享平台，推进将文化产业产学研成果转化；第三，实现区域内的错位竞争和良性发展，“一带一路”框架下，仍然需要立足自身竞争优势，找到资源优势立足点，文化资源也好，经济条件也好，政策法规也好，差异化竞争发展，错位中确定方向。

**刘根荣（厦门大学）：**

首先，“一带一路”不是狭义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而是中国提出的国际经济合作战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所有的省份都可以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寻求各自的战略机会，拓展海外市场。长三角经济区是我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可以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寻求深度的产业合作空间，将产业链适度外移，利用好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产业链价值链优化布局，打造全产业链的竞争优势。

其次，要积极利用长三角地区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特别是开发区的建设经验，开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园区建设的深度合作。例如利用苏州工业园区的先进经验建立一带一路产业园区建设的干部培训基地，长三角地区雄厚的教育资源作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同时鼓励长三角地区企业抓住“一带一路”战略机遇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特别是对那些工程机械企业、基础设施建设企业、轨道交通、车辆工程等相关技术企业更应该积极参与。政府相关机构要做好服务工作，在鼓励企业走出去的同时，注意为企业防范投资目的地的系统性风险提供及时的信息服务与预警工作。

**林学军（暨南大学）：**

我认为“一带一路”给长三角带来的机遇有：基础设施建设的机遇，扩大经贸的机遇，投融资的机遇，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长三角有中国先进的技术装备，经验丰富的建筑施工企业，可以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大显身手。长三角还有众多的外向型企业，可以利用“一带一路”这个战略平台开拓海外市场，扩大出口，增加进口，还可以引导企业对外投资，加速长三角区域的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生产要素的全球优化配置，构建全球价值链。上海是我国的金融中心，因此，长三角可以为“一带一路”投资、融资服务提供有力支持，同时，可以推进人民币国际

化的进程。

搞“一带一路”除了机遇还要注意风险，这些风险有经济风险、政治风险和安全风险。“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有些经济还比较落后，法律不健全，政局不稳定，有些还存在恐怖主义的威胁。因此，在建设一带一路的过程中，要注意各种风险的控制，政府加强沟通联系，与沿线国家签订贸易、投资保护协定，企业要加强风险的评估，还应当制定相关的避险措施。

**赖红波（上海理工大学）：**

1、“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目前还处在初级阶段的布局，所以，无论是江苏还是整个长三角地区都不用急在一时，好好修炼自身的内功，就是支持“一带一路”和最好的参与。

2、目前，长三角地区急需改变自身的协同不足、各自为政的局面。发挥协同创新，促进长三角先进制造业崛起，为“一带一路”后续第二阶段的发展提供可持续发展动力和新模式路径。

3、长三角地区的协同创新，必须改变原来的格局思路，寻找新的协同创新思路，比如以产业为协同创新引领，包括先进制造业、制造业服务化，智慧产业、现代服务业等。

**杜运苏（南京财经大学）：**

江苏很多企业已经在“一带一路”国家布局设计产业园，如红豆，苏美达等，目前看还比较成功。但随着外汇管理收紧，对江苏企业“走出去”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能会产生一定负面影响，江苏相关部门应该尽力为本省企业到“一带一路”投资提供便利。出口和工程承包是江苏重要优势，但这些国家风险高，主要靠出口信用保险保障，江苏在保费方面已经有一定支持力度，如果可能话，进一步加大力度。

**宋文阁（江苏省国资委）：**

从国企国资角度看，（1）长三角的国企国资沿着“一带一路”积极走出去，尤其是传统行业，如钢铁、建筑等产业。（2）发挥长三角在船舶、运输、港口、码头等优势产业，积极推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重要地位。（3）发挥长三角人才资本高地优势，积极配置高校资源，输出人力资本。（4）积极开展国际贸易，长三角是国际贸易重地，重新塑造与过去丝绸茶叶一样的国际贸易地位。（5）苏浙沪构建新的经济共同体，由国家牵头，形成新的运营模式与合作模式，发挥顶层设计的作用。

**陈 琛（机工智库）：**

我们曾经就“一带一路”战略调研过一些装备制造业企业，他们反映出来的问题是，“一带一路”战略，不仅是一个企业一个行业的问题，而是多个企业且多个行业的问题。

**苏 健（南京社科院）：**

一是重视发挥行业商会作用，维护企业的利益。二是长三角地区可重点推动制造业企业和高端服务业，积极参与国家的一代一路战略的实施，降低企业对外投资门槛和简化程序，鼓励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三是遵守国际规则，重视文化的差异性，聘请专业咨询公司进行跨文化管理培训。四是开展对外文化交流，促进了解，包括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吸引国外专家到长三角地区从事研究。

**沈凯玲（澳洲国立大学）：**

1）“一带一路”我觉得需要对各个国家的国情有深刻的认识。所谓对各个国家的国情的认识，包括其经济禀赋、历史变迁、政治制度等等各个方面。最基本的，我们的企业如果去投资，在劳动力市场规则方面就需要有充分认识。其劳动供给如何、用工成本、裁员需要的手续、社保费用，劳资关系调节的官方与非官方机制。

2）不仅对沿线国家，而且对其他地区内有利益的国家的情况都需要有足够现实的认识。中国现在是大家关注的国家，一举一动都会给人以很多联想。而我们在处理公共关系方面的经验未必很多，而公众态度的变化必然会形成政治压力。

3）具体说到江苏，即可以是为其他地区提供技术设备也更可以是通过提供培训扩大对江苏技术设备的长期需求。

**陈岸立（山东农发行）：**

“一带一路”最核心的内涵是国家地区间的互利互惠。惠及我们自身，就是把我们稀缺的自然资源、技术、装备吸引进来；惠人就是把我们拥有的、对方需要的输出出去。利用我们发起国的优势把我们成熟的技术，没有比较优势的装备，尽快的输出到“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充分发挥我们的人才、技术、管理、装备的引领作用，与接收国建立经济共同体；同时对国内来说也更好的腾出经济发展的空间。在先期的实践来看，一定要注意输出国的利益，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利益所在。模式应该因企而异，在注重对方利益的同时，发挥示范引领作用，逐步的增强我们的利益诉求。

**王修志（广西师大）：**

做强自己是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基于长三角地区历经近 40 年参与 GVC 的开放实践积累，从构建“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的逻辑出发（这个区域价值链的空间视野应该是从国内区域逐步扩散到沿线国际区域），长三角地区可定位于区域价值链的建构者和推动者。强势企业 + 创新技术是建构区域价值链的基础和要件。因此，长三角地区需要着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创新环境，让优势企业脱颖而出，让创新技术脱颖而出。

**孙 军（淮海工学院）：**

一是，推动长三角一体化，整合内部市场，加快生产要素的自有流动，这有利于长三角利用“一带一路”走出去的同时，反过来做大总部经济，避免产业空心化，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二是，对江苏来说，不在规划中并非坏事，这就要求江苏创新思路和参与方式推进“一带一路”，这有利于解决“一带一路”参与的内生性问题。内生性的形成必须全力发挥企业尤其是民企的参与能力和作用，政府的作用是全力支持！

**姜德波（南京审计大学）：**

长三角地区参与“一带一路”，企业的参与是基本的形式和主要的主体，各级政府的作用必不可少，但是，高校、学术机构也应当有所作为。语言、文化、宗教、法律、风俗等对于走出去的企业而言，都可能是障碍，都需要有高校或研究机构去做针对性研究和人才培养。

**李 湛（苏州发规院）：**

长三角地区融入“一带一路”，最重要就是通道建设。主要有四大通道，一是义乌的义新欧，浙江的货物可通过义新欧，输送至沿线国家和地区；二是苏满欧，目前是我国亚欧通道中最具竞争力之一，速度快，经过国家少，返程货物多；三是苏新亚，是苏沪出阿拉山口连接中亚的通道；四是太仓港和上海港，以此连接长江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目前有五定班轮，可进一步发展近洋远洋班轮，从东南亚再辐射中东、非洲、拉美。长三角企业沿四大通道布局，可省很多物流成本。

**郭育蒿（世纪物流）：**

长三角一体化及江苏“一带一路”的机遇：

1. 长三角一体化要做好顶层设计，不能各自发展，要有全局观。

2. 合理安排不同区域、港口、进出口的运输方式，降低企业成本，使效率优化。

3. 江苏的进出口企业及制造业比较发达，现上海与江苏已经通关一体化了，异地报关、口岸放行已使企业感受到便利，但通关效率不高。江苏太仓港已有了日本、韩国、越南、泰国等航线，目前进出口基本满舱，企业在进出口选择时上海港不再是唯一。

4. 江苏可以利用即将成立的港口集团，整合资源，完善功能载体，达到以港兴市、以港兴企之目的。

“一带一路”战略要求就是要提高国际竞争力，港口应做到：1. 长三角区域港口、航运资源整合，降低无序竞争、同质竞争。2. 政府积极引导码头岸线、航道的资源配置。3. 按港口功能不同，有效划分重大件、散杂货、集装箱的装卸区域。4. 港口应加大与外国班轮公司的合作，吸引中转货，提高港口效率。5. 港口要发挥“一带一路”中起运港、中转港的作用。

**张建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一带一路”倡议自实施以来，政府和企业积极行动，在基础设施建设、产能合作、文化交流等方面都有进展。可是相对于实践，关于“一带一路”的理论研究相对滞后。长三角有国家一流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应该深入到沿线各个国家，与他们的相应机构合作，构建起“一带一路”理论和彼此接受的治理机制。

**陈 东（南京大学）：**

第一，“一带一路”的落脚点应该是企业为主，特别是应以民营企业为主，政府只能搭台，而不能越俎代庖。第二，民营企业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是制度不太健全的，政商关系复杂不可避免，中国政府的作用主要是作为中国走出去企业的集体代言人，和当地各级政府和团体打交道，充当政商关系中“商”的角色。第三，民营企业走出去，最好以商会的名义，直接形成一个健全的产业链，占据生产和销售顶端，而不要单打独斗出去。第四，红豆的工业园区模式可以值得借鉴，大的民企提供工业园区招商，小民企根据自己优势进驻，公司治理上可以在园区设联合党委，一方面可以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一方面可以和我驻外机构加强联系。

园区 + 商会 + 联合党委的经济模式，驻外机构作为“商”的角色和当地政府团体打交道的“政商关系”模式，可以为我们推动“一带一路”减轻失败风险。

**颜银根（南京审计大学）：**

以目前沿线国家的消费能力，长三角主要有两个方向：出口大众商品；对外投资过剩产能。但这并非长远计划，在沿线基础设施提升后，下一步是做产业链的分工，真正的以我为主的产业链，还谈不上价值链。

长三角现阶段不宜大规模推进技术转移，考虑有二：其一，如何锁定这些合作伙伴。一旦这些国家成熟，是否愿意长久合作，现在还是未知数。这些国家既有可能形成经济同盟，也有可能形成与欧美的新合作关系。其二，国内中西部地区尚且发展不足，不宜过早培育竞争对手。

综合而言，长三角现在适宜出口大众消费品（培育潜在用户忠诚度）；投资国内过剩产能（试水国外经济环境）。在投资中抱团出现，充分利用规模经济，产业转移与产业集群同行，创造更高价值。

和沿线国家相比，长三角的比较优势在资本和技术。长三角在“一带一路”中既要考虑与沿线国家的关系，还需要考虑与中西部地区的关系。长三角在这个产业链中应该锁定高端是无疑的，江浙民企资金的进入是前提，以资金介入带动技术进入。

**张明之（南京政治学院）：**

目前海外共建园区尽管数目成上升状态，但是多数处于摸索阶段。其中，在传统“政府 + 政府”的合作模式之上，共建模式有 “企业 + 企业”“金融 + 产业”等模式。

“一带一路”构想下长三角经济区协调现代产业体系建设：

第一，巩固制造业强省（市）的支柱地位，为推进工业结构转向中高端创造条件。其目标是提升制造业的创新能力和产业技术水平，提升生产性服务业的契合能力。随着以智能制造、能源互联网为核心的工业革命风起云涌，对我国及长三角经济区制造业传统的区位优势造成极大的冲击，造成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和附加价值水平均未到达理想状态。长三角地方政府共同面临科技创新和工业革命的挑战，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是共同的和紧迫的任务。有关部门应在推动创新资源融合、建设科技创新技术平台和成果孵化平台等领域出台相应政策，比如创新创业园区的规划、科技人才的引进、知识产权保护与收益保障、产业技术工人的培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方向的选择与组团的方式等，三省一市从长三角经济区深度一体化的高度，采取一致行动来协调各地方政策，避免规则冲突、人才争夺、市场封锁等负面因素。

第二，总体上谋划产业链高端攀升的路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被大型跨国公司纳入全球分工体系，但引以为傲的低成本优势使加工制造环节长期以来处于价值链微笑曲线的中低端，高端制造业发育严重不足。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科技创新和产业革命为全球价值链重构提供了契机。长三角经济区地方政府在落实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时，应当为制造企业产能转移提供快捷通道，通过友好访问、博览会、跨境论坛等方式推介科技服务型企业进入东道国的研发、设计环节或营销、品牌、服务环节，为当地企业并购他国价值链高端企业提供支持，从而提高产品服务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第三，从长三角一体化的高度协同产业分工与布局。产业分工是形成区域整体优势的重要方式，建立在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产业集聚有利于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能发挥各自的竞争优势；区域产业发展协调与地域布局优化配置也是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要求。然而由于处于产业链不同环节的产业利润率和前后向牵引力有明显的差异，各级地方政府往往忽视自身的比较优势而去追逐产业利润率和前后向牵引力高的产业，不仅会阻碍区域产业之间的合理分工与布局，还会引起区域内部产业重复配置与低水平过度竞争，不利于区域经济的整体协调发展，甚至有可能导致长三角在新一轮国际产业分工和合作、产业梯度转移中失去商机，从而削弱长三角的整体竞争力。因此，各地方政府不仅要梳理本省市的优势产业，而且要在一体化基础上梳理整个长三角优势产业，本省市在这些产业中的角色，从而梳理出具有全国乃至全球竞争优势的产业链，找准产业链上的定位和赢利模式。

第四，高度重视产业转型中的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与升级。无论是结构调整还是供给侧改革，最大的困难在于存量资本的调整。因而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不能完全抛弃传统的加工制造业而另起炉灶，其中，加快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成为重要的途径。再传统的产业，经过现代

技术的改造，都可以成为现代产业体系的一部分。信息化和工业化的融合，就能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跨越。技术改造是以内涵为主的发展方式，包括以现代的数字信息技术嵌入融合传统制造业生产过程、以移动互联网平台植入传统产业的运行，产生“互联网 +”“智能化 +”的升级效应，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跨越。据工信部的数据，中央财政每提供 1 亿元可拉动投资 20 亿元，改造项目投用后新增工业产值 30 亿元，利润 3.1 亿元。据此测算，技术改造的效率（增量资本产出率和销售利润率）远高于全部固定资产投资效率。地方政府在确定地方财政的技改配套资金或技术改造项目专项资金计划方面要有针对性，加大资金配套力度，给予政策、信贷上的支持和优惠，积极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

**宋凌炎（江苏精诚 & 精缦毛毯）：**

“一带一路”引用了古代的丝绸之路沿线布局，“一带一路”战略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战略，目的是防范欧美国家的贸易壁垒，为今后打开一条属于自己的贸易大道。我觉得首先需要防范风险。对于风险防范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国家在安全方面应该提前做好功课，企业应该也要把目光放在远方，以利当地居民利当地政府利当地百姓为目的的方向去感召当地人民；另外一个方面，各国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的差异，也将产生一定的不确定性因素，需要与当地的一些知名人员对接合作，以及与大使馆加强沟通，更有利于“一带一路”工作的顺利开展。

**宋常铁（新华网）：**

1、认识江苏的经济优势，重点在制造业、航运、园区管理方面参与“一带一路”工程，重在发挥企业作用，尤其民营企业作用，防范成为国有资产流失的新渠道，并让中央在国际关系中处于被动。

2、认识江苏的文化和人才优势。“一带一路”不仅是经济战略，更是大国崛起的西向突围，中亚、非洲，中国传统影响较深，江苏是文化大省，丝绸和茶叶经济的地点，《西游记》的源头，应该在重新找回中国影响的进程中发挥作用。

3、江苏与东南亚地区更有文化和历史渊缘，降水、积温、植被更接近，应重点向东南亚布局。

**黄敦平（安财）：**

我非常支持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一方面对去产能，调结构有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绝对驱动。但“一带一路”应该有选择的进行，不应该一概而论。建议国家在决策过程发挥该方面的智库的作用，在进入该国时，事先对文化、意识形态进行全方位评估。

**任保全（常州大学）：**

一、长三角地区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战略有以下好处：1. 有利于消化过剩产能；2. 有利

于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3. 有利于利用当地廉价资源，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4. 更贴近国外市场，不但能拓展国外市场，而且有利于推进企业国际化、产业国际化、园区国际化和人才的国际化。

二、如何提升长三角地区参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效果：“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关键是将国际化投资和创业的平台搭好。1. 政府要基于当地产业特色和优势，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引导企业和产业对外投资，尤其要大力支持民营企业；2. 政府层面搭建“一带一路”信息共享发布平台，并定期发布《一带一路投资指南》，及时的投资信息发布和投资风险预警，降低对外投资风险和信息搜寻成本；3. 筹建“一带一路”投资基金；4. 可能路径是，龙头企业（链主企业）先导 + 搭建国外产业园区，布局相关产业，形成产业集群，实现国内外产业链的分工和布局；5.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应利用全球创新资源，推进国内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的衔接，通过全球化的分工，将总部留在长三角，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总部经济，将价值链的中、高端环节锁定在长三角地区，不但能避免未来的产业空心化，推进新动能转换，而且有利于居民收入增长，实现富民。

三、长三角地区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战略要实现四个方面的提升和改进，生产率水平的提升、生产成本的降低、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经济发展新动能的转化。

**单豪杰（中投证券）：**

要做区域老大本质就是要与欧美并排成为获取超额价值的第三极，除了国家层面领先的制度和创新能力外，必须在具体行业的产品技术水平、组织管理模式上处于领先地位，把一些中低端分工让给沿边国家去做。当前国内的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的事远比这个重要。当然应鼓励优势行业（例如交建、基建工程和高铁等）国际化，但应主要靠市场主体的综合考虑决定，限定小圈子的拔苗助长会得不偿失。

**丁胡送（安徽发展研究中心）：**

长三角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快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对于推动区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意义：“一带一路”战略有利于构建跨区域大开放、大合作、大发展新格局，有利于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有利于增强产业的市场竞争力，有利于扩大对外贸易，有利于抢抓新一轮开放布局先机。长三角具有独特区位优势，处于“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两大支撑带建设的战略区位；水、陆、空立体交通网完善，具备较好的互联互通基础；从文化旅游来看，历史苏商、浙商、徽商行商足迹遍及东南亚并远及欧洲，所经营的茶叶、棉布、纸张等远销欧亚非各地，具有较为悠久的商贸交往传统。

长三角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可按照“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要求，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国内重点地区、重要企业合作交流，加快出国出海和区域内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构筑“一带一路”合作平台，推动产业、企业、产品、技术走出去、引进来，密切人文交流友好互信，努力打造成为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示范区。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可将以下几方面列为重点：加快通道建设提升互联互通水平、瞄准重点国家（区域）拓展经贸互通领域、突出龙头示范促进企业走出去、发挥优势特色鼓励各地全面对接、注重人文先行开展深度交流合作、构建多种平台开辟合作共建渠道、着力机制创新营造良好政策环境、设立“一带一路”区域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和加强企业“走出去”的风险防范。

**楼稼平（宁波布衣）：**

关于推进 21 世纪一带一路战略的思路

1. 应对古典一带一路的历史意义作全面中肯的评价，既不可唯我独尊，亦不可妄自菲薄，只有温故知新了，才能继往开来。

2. 一带一路的生力军在民。古典的，历史已经证明。如今所以提出 21 世纪一带一路的战略，底气恰来自于改开近四十年来，释放了民间活力，带来了国家富强。所以，欲推进 21 世纪一带一路战略，仍应着力于养民生、蓄民力，练好内功。

3. 21 世纪一带一路的战略目标，必是互惠互利，双向开放。任何可持续的贸易及长期性的投资，都必须基于市场经济原则做出研判、决策。朝贡贸易思维要不得。

4. 21 世纪一带一路战略，还不应仅仅追求经济利益，如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全球性发扬光大，也列入 21 世纪一带一路的战略目标序列，相信她对全人类的贡献，一定能完美超越古典一带一路的。

# 中国是否已经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2017年5月17日

**编者按：**本周，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邀请南京审计大学刘瑞翔教授主持专题讨论。刘瑞翔教授组织群内企业家、学者以及各领域专家针对“中国是否已经跌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如果是，该如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展开了讨论。

## “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内涵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基本涵义是指：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即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进入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大部分国家则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 中国有无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果有，影响因素是什么？

**刘瑞翔（南京审计大学）：**

“中等收入陷阱”是有严格定义的，一般有两种标准，一是人均GDP的绝对指标，二是与世界前沿之间距离的相对指标，如果这两个指标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在固定年份内仍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则判断为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不大。根据世行设定的标准，高收入国家人均GDP约为12000美元左右，当前中国人均GDP约在8000美元，正常情况下保持6−7%的增长率应该问题不大，至多只要6−7年的时间即可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导致中国经济减速的因素比较多。一是各种红利的消失，如人口红利、转型红利等；二是产业结构从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第二产业向劳动生产率较低的第三产业转移；第三是伴随着经济发展，生产要素报酬率的下降；第四是资源环境约束进一步增强。

**张小兰（西南民族大学）、王建国（日本中京大学）：**

中国中等收入阶层远没有形成，因此不能套用“中等收入陷阱”来解释中国的问题。

**郑东雅（南京大学）：**

如果按照 Eichengreen（2011）、Shekhar Aiyar（2013）、Eichengreen（2013）等的定义，显然中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因为发生了大的、突然的、持续的偏离预期的经济增长。

**马步洋（Metalink 新材料）：**

中国目前还没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为中国仍然处于相对快速发展的阶段，即使短期、个别地区出现收入增长变缓乃至倒退，也不足以说明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必须警醒 “中等收入陷阱” 真正出现，因为发展和增长涉及国家政治与经济稳定大局，国民收入在中等水平的停滞将直接导致所谓梦想和民族复兴进程的重大挫折。中国有希望持续实现国民收入增长，因为中国已经建成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各领域完整产业链并具有强大的竞争性能力组合，因为中国的人口和市场规模具备支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内生空间，因为中国人民勤劳艰苦创业的习惯能力和对于财富增长的精神追求仍在，因为中国的科技和教育这两个创新发展的支柱仍然存在着优化提升可能，因为国际经济秩序和现有格局仍然存在一个大国崛起和提升综合能力的回旋空间，因为中国的政府治理能力仍然存在自省和优化的可能。

中国面临着可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的现实挑战，主要是增长模式过于依赖投资而显现出走火入魔初像：急剧增加的社会营商成本抑制乃至打击了作为国本的制造业的创新和发展，持续膨胀的政府规模直接消耗了国民财富并因过度介入微观经济活动冲击了市场经济秩序，作为全社会治理力量核心的官员体系在权力调整的动荡中懒政、怠政、乱政而无法高效廉明地推动制度和政策的科学供给与执行，司法体系存在的缺乏人身和财产安全保障等问题威胁着创新经济核心主体执行者的企业家阶层的持续有效创新经济活动，住房教育医疗保障的重大制度缺陷压抑着普通劳动阶层的劳动热情，不一而足。

**刘志彪（长江产经院）：**

我觉得，经济学里提出一个与收入水平有关的“陷阱”理论，很可能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如果在不发达阶段有“低收入陷阱”，加速追赶后进入一个台阶后，又有“中等收入陷阱”，到了发达阶段，还有“高收入陷阱”。到处都是陷阱，其实讲的是经济发展处于不同的阶段，其面临的发展问题和发展矛盾不同而已。哪里的矛盾不解决，哪里都不可能顺利得到发展，矛盾都可能冲突为停滞和震荡。

在处于贫困的低收入发展阶段，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是增加市场供给，市场短缺的实质是生产能力短缺即资本短缺。在这种“双短缺”经济态势下，政策的核心问题，一是如何

提高储蓄率从而扩大资本形成能力；二是如何提高生产能力从而扩大市场供应能力，缓解供需矛盾、满足市场需求。

现在，随着我国小康社会的逐步确立，在迈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过程中，需求过度、供给不足的矛盾基本解决，双短缺经济的特征逐渐消失，变成了“双过剩”，即资本过剩、商品过剩，同时伴随着资产短缺。表现为：一方面，我们现在的产能严重过剩，库存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大量的资本寻求高盈利出路，追逐有限的优质资产，由此不断地推高资产的价格。这时，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一是要由过去缓解劳动力过剩，变成缓解产能过剩；二是由过去的解决两个“短缺”，变成需要解决现在两个“过剩”；三是由缓解商品短缺，变成了要缓解“资产短缺”。

**张 杰（中国人民大学）：**

三个核心问题，一是巨大的贫富差距和利益集团。二是自主创新能力与制造业能否可持续，集中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问题。三是政治体制改革，能否构建出官员、企业家和百姓三方利益兼容的新型激励机制体制。

**刘根荣（厦门大学）：**

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强劲，完全没有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趋势。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指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以后，可能陷入产业结构僵化、经济增长乏力、人均收入长期增长缓慢，难以突破人均收入 1 万美元的现象。从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情况来看，高达 6.7% 的年增长率，无论怎样榨干了其中的水分，中国经济增速是惊人的，中国经济增长依旧展现出强大的动力。

毋庸置疑，近两年中国经济的增长趋势受多种因素的阻滞，各种经济总量矛盾突出，主要表现在：货币供应量的增速过高、资金错配导致实体经济杆杠率高、资金脱实向虚现象严重；大宗商品供求关系失衡，产能过剩；民营企业难以获得与国有企业平等的发展空间与市场准入标准；等等。这些问题与矛盾阻碍了中国经济的良性增长，中国经济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与挑战，但并没有全面爆发演化成现实的经济危机。因此，只要有改革的精神与坚决果断的措施，就可以消除中国经济发展的隐患，实现可持续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依然存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源泉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生产要素的投入增加；二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三是市场化改革的红利，即制度创新的贡献。现阶段这些增长的源泉虽有弱化，但依然强势存在，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因此，中国至少还可以保持 10 年以上中高速发展阶段，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孙 军（淮海工学院）：**

一是随着我国 GDP 增速的持续下滑，投资边际效率的持续递减，若说没有陷入“中等收

入陷阱”的可能性，那是自欺欺人；二是目前我国区域之间的差异逐步显现，尤其是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统计数据上看，北京、上海、天津、深圳等地已经越过了“中等收入陷阱”阶段，但也有辽宁、山西等塌陷地区；三是很多发达地区的增长是建立在大量农民工流入，但并不能享受当地各种服务基础之上的，这在经济下滑，工业化阶段末期，房价高涨背景下，很难持续，不能转型的相对发达地区会掉落；四是目前政府干预经济面广且深，且政府机构过于庞大，转型面临困难。

**孙国民（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一是中国经济 3%–6% 的增速能持续多久，持续时间越长，中低收入陷阱概率越小。

二是结构性收入陷阱是存在的，是发展不均衡所致。东部发达地区有些地方已进入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这部分地区不存在“中等收入陷阱”；当然，中西部落后地区，特别是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山区贫困区，有陷入中低收入陷阱的可能，需要通过精准扶贫、内生动力构造来实现脱贫致富，从而往中等收入迈进。现在的情况是，在高收入群体存在的情况下，如出现整体性中低收入陷阱，说明收入结构失衡严重，中低收入占据了社会的主导，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产阶层没有向上跃迁的动力，整体性“中等收入陷阱”是存在的，因此经济转型升级的可持续性、制度建设成效都将影响社会结构的变迁。

三是低收入地区如能迈入中等收入的上限，将是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即使这些地区没有迈出“中等收入陷阱”，也取得了历史性进步。

**王修志（广西师大）：**

认识并突破“中等收入陷阱”，需要从增长机制及其创新或转型切入，亦即从增长动能的认识及转换入手。

“陷阱”的表象特征之一在于其“危险性”。这既包括与经济增长陷入长期徘徊相伴生的就业下降、物价飞涨、产能过剩等经济问题；也包括贫富差距、社会矛盾、生态环境恶化甚至政治失序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政治问题（通常而言，伴随经济发展，民众对社会与政治领域的关注亦会增加，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这些问题将更为敏感）。社会问题与经济问题叠加，将进一步削弱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最终导致经济低迷——社会混乱的恶性循环状态。

“陷阱”的表象特征之二在于其“隐蔽性”。意指传统增长模式带来的“高速”或规模扩张，易使人自满，形成传统模式惯性，而忽略了潜在的矛盾和问题。换言之，就是被原有经济增长机制渐近锁定，这种锁定效应日益固化而难以自拔，未能及时培育新的增长动能。

所以，“陷阱”本质上是经济增长被传统机制锁定，在传统机制低效甚至失效之后，引发经济社会综合矛盾的一种可能性或者风险，其源头在经济增长机制，其危险在引发社会矛盾，这里的矛盾既有增量，亦有存量。

陷阱之说有极为深刻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背景，是后发经济体沿着既有体系发展过程中面

临的现象。因此，跨越或深陷必然与既有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分工体系密切相关。亚洲四小龙的“原有的增长机制”看，几乎都有“开放促增长”的特征，这里的开放有主动性，也有依附性。

**楼稼平（宁波布衣）：**

2016 年度中国人均 GDP 相当于 8126.70 美元，已属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如果汇率不变，即使新常态下的人均 GDP 年平均增长率降为 5%，那么中国将在 7 年后迈入高收入国家。如果再有汇率升值的话，这个时间还会提早。反之，如果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则迈入高收入国家的时间将被延迟，贬值严重的，才可能徘徊于中等收入而不能自拔。总之，从数据变化的角度来看，判断中国是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结论，不可能是先验的，而且我认为，即使 7 年后落入陷阱的概率要低于 50%。

GDP 或国民总收入中的政府收入与居民收入之间的比例（前者过大），和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比例（基尼系数），是导致中国可能落入陷阱的两大因素。

**闫 浩（经信委）：**

“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是工业化任务没有完成就过早的去工业化，导致传统制造业没有升级到先进制造业（高端制造业），传统服务业（生活服务业）没有升级到现代服务业（生产服务业）。只要不放弃建设制造强国的目标，只要实现制造业的高端化，由此催生生产性服务业，中国就不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姜彩楼（南信大）：**

很多国家高增长的推动机制是外来高技术资本集聚，尤其是进入工业化阶段以后，基础设施、工业体系建设会带来财富效应，居民收入进入高速增长期。这一阶段如果难以保证合理的分配机制，就会吞噬掉原有经济，加上后工业社会容易进入到技术和产业的瓶颈期，很多国家难以突破，就会向下发展。

**张小兰（西南民族大学）：**

我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在中国是存在的，这是因为“中等收入陷阱”描述的是一个国家在快速发展之后，会陷入一个发展比较缓慢的状态，我们国家正是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原因在于原先产业结构转换升级缓慢，缺乏有带动力的重大技术创新，以及政府干预过多，没有相应的政府体制改革等。

**刘建森（徐工集团）：**

中国经济不会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中国文化中小富即安的思想从来没有占主导地位，“大”的概念是主流，比如大富大贵、大红大紫。

**杜运苏（南京财经大学）：**

人均 GDP 或人均收入衡量是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不是很科学，无法反映收入分配问题。分析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有不同原因，但收入分配问题几乎是每个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还是要引起重视。现在没有公开的基尼系数，分配问题严重性无法知晓，而且这个领域改革几乎停滞。正如前面老师所讲，能否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创新，其他因素包括收入分配可以创造良好条件。

**颜银根（南京审计大学）：**

“中等收入陷阱”国家有一些共同特征，产业优势消失，产业出现转移。从这一点来说，中国有可能会出现陷阱。但是从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势头来看，未来几年城镇化发展还很值得期待，完全有可能利用内需让产业优势得以持续，走出完全不同于拉美的发展道路。

##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对策及建议

**刘瑞翔（南京审计大学）：**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对策：一是政府角色的转变。东亚国家和地区之所以能够顺利跨越陷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成功实现了政府角色的转变，减少了市场经济的直接干预，没有形成明显的利益集团。二是减少收入分配差距。拉美等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因此加剧了社会矛盾和动荡。三是处理好出口和内需之间的关系。利用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和国土面积，以及国内不同区域在资源禀赋和发展水平上的较大差异，通过产业在区域间的转移，实施国内版“雁阵”模型，实行中国经济整体系统的转型升级。

**宋圭武（甘肃省委党校）：**

中国要摆脱“中等收入陷阱”需要：（1）调整经济结构和发展目标。一是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二是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三是要高度重视农业；四是要适度发展第二产业，尤其是汽车产业；五是要适度参与国际化进程，要建立相对独立的国民经济产业体系；六是要大力发展休闲产业。（2）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切实使科学技术真正成为第一生产力。（3）发挥好政府的主导作用。

**陈启斐（南京财经大学）：**

中国要成为高收入国家，必须要找到新的增长动能。

**何 雨（江苏省社科院）：**

当前，中国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核心依然是如何让分配实现共赢，而不是基尼系数的不断扩大，让改革成果成为少数人的吃独食。在很多人看来，破解“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就是做大蛋糕，提高平均意义上的收入下限。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也仅是问题的一面。全面破局“中等收入陷阱”，还需要分配意义上的相对共富跟进。

**马步洋（Metalink 新材料）：**

中国克服“中等收入陷阱”，需要解决几个关键问题，择其要者，主要是面对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及背后的重重矛盾，其中核心是抛弃意识形态束缚，谨慎进行改革计划和步骤设计。当前主要是首先进行彻底的政府改革，借鉴美国共和党一直以来坚持的核心理念即小政府的理念，逐步减少财政供养人口，坚决进行服务型政府改革，坚决将进入竞争性经济领域的国有经济退出，及时进行国家地方两个财政体系的税收品种税率增减调整及合理分享机制调整，釜底抽薪地破除地方财政土地收入依赖，通过利益分享机制和分配权力归属调整重新焕发地方政府的区域性发展竞争热情。坚决设定政府公权力边界，通过司法体系与法律体系的完善优化，强化市场本身强大调整作用，保护企业家合法权利不受公权力无端伤害。调整现有国有资产运营和利益分配机制，着力利用国有资产增值运营增加对于人民的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真正有效保障。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制度供给与创新氛围及知识产权保护，主要是通过产业政策引导以竞争机制推动科技创新和科技进度。高度重视教育回归本质，破除迂腐的意识形态束缚、在人才成长的全过程专注于培养创新思维意识和全面素质。高度重视利用资本市场激活企业资源优化配置机制，引导资金资源流向新兴产业、创新企业。

**周小虎（南理工）：**

中等收入阶段面临两个过剩和两个短缺：资本过剩与商品过剩，资产短缺和创新力短缺。必须从提升技术和产业创新力入手，实现向高收入阶段迈进。

**刘志彪（长江产经院）：**

克服和解决中等收入阶段的矛盾和问题，如果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还在像过去那样追求投资能力扩大、追求GDP规模扩大，就必然会加剧产能过剩的病情，同时加剧经济中的资产短缺，放大泡沫经济的风险和其他负效应。

因此，克服和化解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其核心问题是要化解“资产荒”：一方面，

要通过鼓励在实体经济中进行技术创新，向资本市场提供更多可投资的金融资源；另一方面，要发挥资本市场支持技术创新的特有功能，募集更多的风险资金支持实体经济中的技术创新，由此形成良性互动，支持供给侧结构改革。在这个意义上，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和鼓励技术创新，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要驱动因素，也是防止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力量。

**刘根荣（厦门大学）：**

中国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巨型经济体，无论从国内需求还是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来看，中国都拥有经济持续增长的空间。构建以我为主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体系可以为中国发展打开庞大的市场，为提升中国人均收入水平提供巨大的增长空间。一带一路战略正是优化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实现产能合作，与其他国家共享发展成果。中国将以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巨大合作洪流，走出一条康庄大道！

**孙 军（淮海工学院）：**

一是政府如何精兵简政放权、如何发挥好市场的力量是下一步的关键所在；二是必须实现从打工经济向创新经济转型，这个转型的成败与否关系到中国大部分地区能否跨越陷阱；三是在农民工逐步回流的背景下，必须在土地财政、小城镇建设思路方面做出调整，给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性收入，逐步摆脱落后；四是必须协调好政府、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利用好市场化激励机制，建立新型政商关系，政府逐步放开对垄断性服务行业的控制，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王修志（广西师大）：**

回顾中国近40年来的经济增长机制或曰发展逻辑，亦具有明显的“开放红利”特征，但与此同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由于内外因素综合作用，在既有国际分工体系中，我们原有的分工优势逐渐减弱甚至消失，从而导致基于原有国际分工体系和开放逻辑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增长机制陷入运行困境（被锁定）。

值得庆幸的是，与此前“掉入”陷阱的多数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动能更强大，也更多元。其坚实的基础主要在于：一是庞大而且不断升级的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二是丰富的创新资源和强大的创新潜能；三是中国经济的区域差异性及其潜在的巨大的互补互动动能。以此为基础，中国对于既有国际分工体系的依赖相对更小，对于创建或主导新的国际分工体系有更强大的潜能。

具体讲，就是要转换开放逻辑，以内需升级为基础，整合并激活各类创新资源，释放创新潜能，构建国家价值链，最终形成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这应该是跨越陷阱的可行路径。

**楼稼平（宁波布衣）：**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对策及建议，即降低基尼系数，同时尽可能地把居民新增收入纳入体制所设计的渠道。

**周彩霞（南京理工大学）：**

中国在由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阶段，在抓好产业结构的转型的同时，一定不能忽视对“人”的关注，发展的目的归根结底还是为了人。

**崔卫东（蓝鲸咨询）：**

建议：在苏锡常地区调研 20 家企业的人工成本支出、员工收入、政府拿走的与人头有关的税费，分析欧美资、日资、韩资、台资、国企、集体企业、民企的企业支出、员工收入、人头税费三者间的结构关系，在苏北居民收入最低的 10 个县，试点“强企减费聚焦富民政策”，一试三年，缓解当下居民收入差异问题。

**孙月平（江苏省委党校）：**

怎么走出中等收入阶段，宏观政策的空间确实越来越小。许小年提出的“保护私有产权、缩小国有经济范围、放松和解除管制、全面减税”这四大举措，在现有体制下期望值不能太高，唯有期待微观层面的科技创新来实现“效率型增长”，但这四条又是推进重大科技创新的制度条件，这里面有一个悖论。

**彭本红（南信大）：**

“中等收入陷阱”解决的办法是一二三产业结构全面转型升级，现阶段提出的创新驱动和转型升级是一条好思路，也就是各个行业要培育新动能，提升传统动能。

**林学军（暨南大学）：**

一国达到中等收入，就是一个经济的转折点，必须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从粗放型增长，到集约型增长，提高创新能力，是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纪 明（广西师院）：**

当前，中国由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迈进，核心的问题应该是抓好产业结构的转型，基本的手段还是投资，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具体而言，优化投资结构，应该保持工业的高投资率水平以保持经济增长的速度，适度增加高端农业和服务业的投资以提高经济增长

质量，这对于中国区域经济的梯度发展特征来说，不是难题，很多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水平还比较低，因而应该实行区域差别化的政策。

**张立冬（江苏社科院）：**

“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就是增长动力转换问题，在低收入阶段通过技术模仿和制度创新等等可以相对容易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但到中等收入阶段，已不具备帕累托改进的外部环境，必须要通过自主创新实现构建以我为主的价值链，并解决好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流动性问题，才能实现产业升级并培育出以中等收入阶层为主的橄榄形社会。

**程 鹏（江苏巨和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这么大规模的经济体，若要迈入更高收入国家行列，依靠现有的东西方知识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制度和理论的颠覆性创新以合理利用资源，需要科技进步来开发新资源、新能源以及更好的保护环境，否则新旧大国间的剧烈碰撞将再次重现。

**黄敦平（安徽财经大学）：**

首先，预防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实质上就是怎样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一方面依托传统外在驱动力——投资，虽然投资驱动会带来一定的副作用，但也是不可或缺；另一方面，依托内在驱动力——创新驱动、内需驱动等。其次，对于我国来说，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人口，个人认为在当前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而人才红利还在挖掘的阶段，我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几率较大。

**谈 镇（江苏省委党校）：**

“中等收入陷阱”最初发端于拉美，“中等收入陷阱”和拉美陷阱是同义语，拉美陷阱最根本的原因是发展理念的错误。拉美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最大败笔是进口替代战略。中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在于转变职能，弱化管制，强化混改，坚定开放。

**夏海力（苏州科技大学）：**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区域发展差别很大，例如一些沿海发达地区可能早就进入了所谓高收入经济体行列，而一些老少边穷地区还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我们江苏省内部的苏南、苏中、苏北的发展状况也能说明这一问题，只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不同。各级政府应该重点关注“如何提高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问题。

#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考

2017年5月24日

**编者按：**本周，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组织群内企业家、学者以及各领域专家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构建意义和如何建设”展开了讨论。

##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考

**刘志彪（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要弄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必须首先界定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述起来很长，其实我觉得就是三个核心问题：

一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二是立足发展中大国的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三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简要地说，就是共产党领导，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研究在共产党领导下，怎么通过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实现国家现代化。

**周小虎（南理工）**

习总书记的政治经济学强调的经济发展导向性：即服务于人民群众，而不是资本拥有者，是从资本逻辑重新回归到劳动价值论。

**邵 军（长江产经智库特约研究员）**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解决生产关系如何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如何适应经济基础。在此理论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主要解决改革问题。

**刘根荣（厦门大学）**

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根本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合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体系，解释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形成有别于西方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运行机制；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经济运行机制；
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球化战略。

**于春晖（人民日报）**

从经济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时间维度，讨论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这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进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键议题。

**孙月平（江苏省委党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点其实就是这几年一直在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我理解，近 20 多年来，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都差不多，基本框架都是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定下的体系，不断扩展延伸。

**陈心颖（福建省委党校）**

需要厘清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否利用西方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分析框架来分析，还是只能单纯的利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

**陈 东（南京大学）**

对于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我从微观和民营企业这方面作阐述。

（1）大背景。应该是改革开放以后才能算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之前只能算政治学，无经济学可言，至少是实践不成功的政治经济学。

（2）市场主体。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特在主体的民营企业，而非国企。市场活力靠民企的发展壮大，他们在没有资源，没有背景，没有技术的情况下，从零开始，大浪淘沙，永立潮头，到目前贡献了 GDP 的一半以上，就业的 9 成以上，无论是传统行业，还是高新行业，或者是商业模式，都是民营企业在披荆斩棘，虽然民营企业失败率很高，但成功下来的都是真正的精英。如商业零售终端的苏宁，科技创新的楷模华为，互联网 + 领域的阿里巴巴、腾讯。

（3）公司治理模式。我认为民企下一步应该朝“现代企业制度 + 党建 + 社会公益”模式。真正探寻适合中国特色的民营企业现代企业发展模式，现代企业制度是基础，同时以党建推动新型政商关系发展，党建不仅保证政治方向，而且要和公司治理结合起来，可以以“双向进入”模式。通过党建，逐步替代现在的政治关联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和腐败高发。

（4）社会公益。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追求终极目标，所以民营企业在实现企业发展的前提下，以直接和间接方式对社会作贡献，但当前，主要还是以纳税和就业的贡献为主方向，不鼓励捐款和到不适应发展的地方产业扶贫。

**王修志（广西师大）**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及演进逻辑：原创—继承—发展—融合—创新。具体而言：

1. 强调基于中国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实践的原创性（这是“特色”的国情基础）；

2. 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再认识，特别是生产关系的继承和发展（涉及价值取向）；

3. 对西方经济学的融合借鉴：特别是与生产力对应的技术分析部分，大胆借鉴，为我所用（工具和方法）；

4.“理论＋实践”模式下的创新：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在实践中实现理论纠偏和创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制和机制特征：体制特征：所有制基础＋党的领导＋人民中心；机制特征：高效政府＋高效市场＋新型开放＋全球共荣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立足中国发展实际的一门学科或者科学，需要从逻辑和实践中系统回答：为何发展？为谁发展？发展什么？如何发展？

**张建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题目来说，“经济学”是核心概念，“中国特色”和“政治”是前提。根据某个经济史学家的观点，所谓政治经济学就是国家经济学，所以这两个前提合并在一起，就是“中国经济学”，它不是西方经济学，是与之对应的一个并行概念。

由于中国经济学中又有一个特定的定语“社会主义”，所以，中国经济学的任务就是解释（理论化）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共领导下，经济发展的成败经验。不论对于指导下一步的经济发展还是参与国际竞争都需要。

**孙国民（南大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几点看法：

一是时代背景发生了深刻变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的历史时代背景与当今社会不同。

二是马克思主义同有关国家具体国情的结合，实际上形成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放眼当今世界，唯有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和建设取得了最大的成就。因此，形成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中国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贡献。

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是强调该经济学理论立足中国大地、扎根中国实践；“特色”是该经济学理论和实践区域别于形形色色的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则继承并强调了中国仍然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是马克思主义者毫不避讳的内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公开的阶级倾向性，那就是服务于无产阶级政权，服务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服务于政党的经济学；“经济学”则强调了该理论的范畴，仍然是经济学范畴。因此，可以成为一门学科，而成为一门学科，就需要有核心的构念、理论框架、理论体系等。

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谈三点：

一是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架构、权力运行机制等。当今中国，带领全国人民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领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形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当然，这里的政治结构和权力运行机制，是伴随经济转型、社会转型而致的政府转型，是经济、社会和政府三大转型的有机统一，并不断体现政府再造的时代特征。

二是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这四个环节，特别是要立足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以及历史新方位的判断，要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三是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机制，这个动力仍然来自改革开放，而且是深化改革开放，是对改革开放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而当今的改革开放集大成的遗产是“一带一路”倡议，这是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崭新内容。

**施 康（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问题是解决人民内部的不平衡和制约生产率进一步提高的制度约束。

**宋圭武（甘肃省委党校）**

“四个全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也是中国经济学研究需要坚持的最新指导思想。在价值论层面，中国经济学一定要坚持劳动价值论。在产业层面，中国经济学应坚持新重农主义思路。在经济制度设计上，中国的经济学必须要把制度的公平建设放在重要位置。在经济增长动力选择上，中国经济学需要构建综合动力体系。在经济学研究方法选择上，中国经济学需要坚持唯物辩证法，需要树立全局分析、动态分析、辩证分析的思路，需要尽可能克服形而上学的研究思路。中国经济学追求的目标应是总体均衡，而不是局部均衡。

**鲁明泓（长江产经智库特约研究）**

孙冶方试图模仿《资本论》，用演绎推理的公理化方法，重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最后碰

壁失败。这是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一次宝贵尝试，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经验教训。细究失败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找到一个或少数几个具有公理性质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概念和基本定律（孙冶方用的是价值和价值规律）并不容易，二是用这些基本概念和定律去推演出种种繁杂的现代经济现象（孙冶方试图用十九世纪比较典型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总过程等）也十分困难。

在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时，如果用归纳总结的方法，再加上比较（主要与传统理论和西方理论比较，以突出新理论的特色）方法，那么不仅可行，而且容易得多。例如：我们可以总结归纳出中国关于市场与政府的理论与实践，关于产业政策的理论与实践，关于区域经济的理论和实践等。再如：我们可以比较中国的理论实践与传统以及西方理论实践的异同优劣。这些中国的理论实践以及异同可以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题内容。

# 如何看目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及未来经济走势?

2017 年 5 月 31 日

**编者按:** 本周，人民日报理论部的于春晖老师提出希望针对“我国目前宏观经济形势及未来经济走势”展开讨论，在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刘志彪教授和于春晖老师的带领下，群内专家们针对这一问题各抒己见。

## 如何看我国目前宏观经济形势及未来经济走势?

**刘志彪（长江产经院）**

2017 年一季度 GDP 增速达 6.9%，连续两个季度回升，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特别是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等超预期增长。短期看，这与供给侧去产能有直接的关系，严厉的去产能行动，使行业供求趋向平衡、上游价格趋涨、企业利润改善。但从整年度情况看，一季度经济的反弹很难延续下去，随着各地严控房地产的政策不断加码、出口形势和金融去杠杆等政策的影响，二三四季度经济继续高速上升的概率不大。漫长的结构调整、经济分化任务远未结束。

相对比去产能，三去一降一补中其他任务完成的不能算很好。去杠杆直接对准金融部门，不是非常妥当，导致了经济直接的波动。因为我国的杠杆率最高的部门，不是政府，不是金融部门，更不是个人部门，而是实体经济部门。现在金融部门要的是规范杠杆而不是去杠杆。我觉得去金融杠杆的提法也不是很科学，因为金融即杠杆，杠杆即金融，他是不能去杠杆的，只能降杠杆或者规范杠杆。

对降成本，中央虽然做了很大的努力，各级政府也摆出了各种积极的姿态，但是在生产要素成本趋高的总体态势下，政府对降低要素成本，尤其是降低人员工资成本的空间并不存在，主要的空间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尤其是降税降费，而这显然没有根本的、实质性进展。

对于补短板，中央明确指出的是要补四个短板：一是生态环境；二是科技创新；三是精准扶贫；四是基础设施投融资体系。这四个方面大多与民生幸福有关，其未来的投资力度直接关系到稳增长、创新驱动和民生保障任务的完成程度。它们也是替代外需不足、加大扩大内需力度的关键点之一。

未来宏观经济管理的着重点，我觉得仍然在中央领导提出的要“加强预期管理”方面。可

惜这个提法一直没有引起实践部门的高度重视。在保持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前提下，宏观经济预期管理对于未来的经济走向起着最为关键的调节和导向作用。防止预期不断恶化，就是制止经济不断地下滑。结构调整下的经济分化和产业升级，是一个长期的投资行为，需要有稳定的投资者的长期预期来保证。为了增加外资、民资等实体经济企业的投资信心，必须坚决地抑制虚拟经济长期取得过高的利润的格局，必须给民营企业减税减负，必须坚决地遵守过去给予外资、民企的优惠政策的承诺，必须尽快甄别纠正一批侵害民营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保护和支持民营企业家的创业创新精神。

过去中国是资本短缺、商品短缺的“双短缺”经济，现在是资本过剩、商品过剩的“双过剩”经济。前一环境下，产业升级要用产业政策，以推进产能迅速增长；后一环境下，促进产业升级要用竞争政策。如要多用补贴用户和消费者的政策，少用或不用补贴生产者的政策；要保护竞争，但不保护竞争者；要在去产能中救劳动者，但是不救僵尸企业等等。

**柯 杰（正善资本）：**

生产制造企业仍在艰难维持，间接融资仍很难，但创新性已有加强，正在迭代升级，不断淘汰低技术含量低毛利的产品。AI+ 传统行业欣欣向荣，资本关注较多，确实能为客户创造价值。

**宋凌炎（江苏精诚 & 精缇毛毯）**

对目前宏观经济形势的看法并不是太乐观。从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到智能制造看，未来还需要一段很长的路，很多企业还是会面临倒闭，加上国际形势、川普减税等影响，制造业的陆续外流，股市不景气造成股民恐惧状态的影响，房地产价格猛涨以及消费升级，但是工资的整体涨幅跟不上消费，特别是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偏低，老百姓以及工薪阶层日子也不好过，加上“一带一路”尚属初级阶段，也就是投入阶段，很难在短期内产生效益；故而当前形势我认为是疲乏的。

对未来经济走势的分析，整体肯定是好的，只是强大的中国就像造航母，需要不懈地努力，需要一个过程。当中国的智能制造以及转型升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将引领世界潮流，将迎来第二次经济的突飞猛进，让世界刮目相看；另外届时“一带一路”的布局也将为中国经济走向全球化铺开一条黄金大道，亚投行将让全世界认同，人民币也将与美元一样成为国际通用货币；当然与此同时，我们国家的宏观调控也在同步进行，缩短了经济发展历程，加速了经济发展。

**叶 蓁（中国人民银行）**

宏观其实应该看长期，或者长期看宏观，短期看微观。具体的微观不能简单从数据出发，而应该更多从人或企业的基本点出发做分析。现在的基于统计数据的宏观分析，与实际微观出现了较大偏差。原因有很多，既有统计上的问题，也有结构性因素。

**周景梅（扬农化工）**

就农药行业来说，一是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目前农产品价格很低，有不少是 20 年前的价格，农民种粮积极性低，通过使用农药增加粮食产量的愿望在降低；农药市场表现为整体需求低迷。二是退城进园的压力。近年来，江苏省政府相继出台了加强长江流域生态保护、推进全省化工行业转型发展等指导性文件，对企业退城进园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需要大量资金进行搬迁。三是安全环保的压力。中央环保督查今年将首次对全国 31 个省份进行全覆盖，目前正对 15 个省份展开督查。江苏省同时还出台了“两减、六治、三提升”专项行动，检查力度空前，处罚问责加大。外界对于安全环保的监管是越来越紧，要求也越来越严，严峻高压的形势容不得农药企业出一点闪失。否则，不可能做到长治久安，连生存都会非常困难。当然，压力的背后，也面临着一些机遇。一是从宏观层面看，国家进一步降低了企业税费，今年 7 月 1 日起，增值税税率将从 13% 降至 11%，对企业是一大利好，有利于减少支出。二是从市场层面看，我国到 2020 年将全面退市高毒农药，对于高效低毒环保型农药产品使用量预计将有所增加。

**刘建森（徐工集团）**

我的感受：1、中国工程机械企业上半年好于去年同期；2、出口大大好于去年，一带一路倡议拉动了工程机械出口；3、行业分化加剧，集中度进一步提高；4、工程机械的转型升级的主要指标：可靠性与先进性，尤其是可靠性。转型升级任重道远；5、中国工程机械企业在高端、大型产品上的成本优势仍然明显。

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不仅仅是基于制造业的服务产业的发展，还应该包括建筑、采掘、建材等产业的服务能力的提升，充分利用并挖掘现有的设计、工艺流程、营销等能力，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转型升级。

**马步洋（Metalink 新材料）**

当前宏观经济形势难言乐观，时有波动并未稳步向好，走出 L 型底部还需时日，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存在广泛结构性问题、体制因素本质依旧改革停滞。主要印证是虚拟经济泡沫泛滥、风险居高、股债房骑虎难下，实体经济产能过剩、金融避之、多数企业举步维艰。矛盾间结构难解，根子在体制回流。创新主体民营经济于困苦挣扎中寻觅转型升级之径，维持中国经济成功过关一丝希望。

根据近年来新形势、新变化、新情况，先救急切问题而后处置其它，个人认为（1）金融去杠杆、调错配，反复试探绝不轻易大幅盲动、守住不发生系统金融风险底线，这一点近期正有实像观察；（2）实体停止成本挤压、温水煮蛙，主要就是消除减轻抑制房地产等基础物价带动的营商成本全面持续上升，为实体经济提供转型升级喘息之机，这一点是要相信中国企业家的创新能力与长跑耐力，为此，尽快至少部分实行房地产税及有关税收分享及按事权重分归属，釜底抽薪抽掉房地产肆虐绑架政府与金融的底。

从目前宏观经济形势观察，中国经济正处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势能重组之关键期。由于矛盾复杂、相互牵连、改革停滞，中国经济尚有一段相当长时间的盘整期，旧有增长推动手段边际效益衰减无力，如无系统性改革措施统筹入场，民间创新活力不能解放释出，则无法判断此段盘整持续时间，希望自系统性改革始。

**宋圭武（甘肃省委党校）**

从世界经济形势看，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对中国经济带动的潜力有限；从中国经济自身发展趋势看，经过三十多年的高增长，成就巨大，但也产生了许多问题，客观需要有一个休养解决阶段。经济休养的时间可考虑 5 到 10 年左右，也就是国家“十三五”和“十四五”规划，应主要体现休养精神。如何休养，主要任务是消肿、固本、强基。另外，在修养期，国家经济增长率可调整到 5% 左右即可。另外，经济休养需要成本，这成本需要全民承担，因为政府负担最终也是群众负担，但富人应多承担一些。为此，建议在修养期提高财产类税收和高收入人群类税收。

**王世文（苏州科技大学）**

当前宏观经济内外政策空间余地大都缩减，货币政策尤其突出。中美经济增长的内生周期不一致，对去杠杆造成挑战。去，面临经济失速和资产价格波动的挑战，形成去杠杆风险。不去，又面临高负债风险，资源也无法实现从低效、无效部门向有效部门的转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法落实。两难之中，依赖政府政策经济实现内生性复苏需要很长时间。从微观方面，就苏州而言，近一年半来微观主体创新意愿和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活跃度不断增强。

**韩 平（哈尔滨商大）**

民间创新活力不激活，市场主体地位不真正确立起来，政府和市场边界始终模糊不清，产业支柱作用不树立，中国宏观经济调整不规则性波动趋势会加剧。

**徐 琴（江苏省社科院）**

个人以为，中国长期以来用官员的励精图治推动改革开放；如今面临转型关口，急需治理理念的转轨，需要用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治理理念取代儒家的励精图治范式，来自民间和基层的创新能力才可能激发出来。治理理念和范式能否转轨，大概率地决定着创新能否实现、转型能否成功。

再看看改开成绩单最漂亮的时期和地区，也都是轻管制的成果。高层只需把握国家安全、政治稳定，对民间和基层的各种创新跟踪、比较、筛选、认定、倡导式推广。

**王相林（海峡银行）**

首先要轻计划思维，政府不要试图直接干预资源配置。事实证明，这几年的供给侧改革的举措，无论是房地产去库存还是去过剩产能，还是对金融市场监管的乱拳出击，都有不合理之处。同时，要加强营商环境建设，塑造公平、法治的市场秩序，这方面有很多很多的工作要做。第三，制度改革上要旗帜鲜明回到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上来。要让民众有信心，对制度改革有稳定预期，如此才能调动经济发展的各种微观要素。

**周 斌（省邮电规划设计院）**

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应该还是趋稳。

不同实体经济机遇与挑战并存：1）整体制造型企业仍然处于低利润、高成本的转型期。转型更需要在制度、资源配置方式、商业模式、分配方式、产品内涵等多方面有变化，需要一种类似日本或德国整体的创新革命；2）具有一定垄断资源尤其大型央企随着国内转型改革、特区、新区、自贸区经济以及国际一带一路会得到新一轮的发展机会，这是未来稳定的基石，但长远活力创新不足，看混合所有制是否真正发挥作用；3）核心技术、互联网以及智能制造是未来实体经济能否再次腾飞的三个关键。

中国经济需要逐步解决过去发展中的问题，这些对新一轮经济增长已经带来阻碍，如环境，高成本，粗放经营，对地产经济高依赖等，这些在试点解决，但碍于政绩，不破不立还需要更多努力。

伴随着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以及销售物流服务实体经济的互联网虚拟经济将是新的经济革命，但它的发展一方面需要引领新技术如区块链、fintech、人工智能、VR 等新技术并首先应用；另一方面尤其必须真正与经济发展根本实体经济相结合，对传统产业的促进以及一定要形成具有战略意义的新的新型制造业。

对于未来，应该是 W 型拉锯增长，但上下的幅度应该逐步趋缓，同时随着时间推移逐步稳定或者转变为斜线向上增长后在较高点趋缓增长；或者就是斜线向下较低点趋缓增长。关键就看国家对经济新一轮改革是否得到成功：传统制造型产业转型；新兴制造型产业培育并壮大；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深化是否成功；虚拟经济对服务业、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等。

**楼稼平（宁波布衣）**

一、最值得关注的三个数据

1. M2/GDP 在今年一季度，依然继续其增长的态势。

2. 尤其是，自央行公布社会融资规模存量（Aggregate Financing to the Real Economy，AFRE）统计数据的 2015 年以来，M2/AFRE 几乎总在 1 的上下浮动（2015 年略大于 1，2016 年、2017 年 4 月底略小于 1，似乎显示着 AFRE 增长更快于 M2 的趋势），结合 M2/GDP 数据看，就意味着金融杠杆还在加长，但杠杆的边际效应却在下降。

3. 外汇储备（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FER）增加难，而稍有松懈则下降快。如以 M2/FER 来看，这个数字的继续增加，意味着人民币汇率将承受越来越大的贬值压力。

二、金融杠杆或许存在非对称弹性

由上，可知当前 M2 约略等于 AFRE，故 M2/GDP 的意义约略等同于 AFRE/GDP，即金融杠杆。

当 AFRE/GDP 小于 1 时，GDP 的增量，除了来自 AFRE 增量的推进外，还有其他因素（如制度、技术、人口等）的贡献。故，仅以 AFRE 角度来看，可说杠杆的边际效应明显，或 GDP 对杠杆有着灵敏的弹性；而当 AFRE/GDP 大于 2 时，GDP 几乎完全靠金融杠杆撬动，是为杠杆的边际效应钝化。当此之时，压缩 AFRE 或降杠杆，将直接导致 GDP 的失速，比如 AFRE 压缩 1%，GDP 可能下降 0.5% 弱。

三、当前的问题

1. 为什么这几年 M2/GDP 或 AFRE/GDP 增长到 2，CPI 与汇率还能保持稳定？这种状态究竟还能保持多久？目前是窗口期，还是新常态？如果是新常态，那就听之任之；如果是终将逝去的窗口期，我们还能淡定吗？

2. 去杠杆将导致 GDP 下降，是否可以忍受？忍受的阈值极限是多少？年 ΔGDP 低至 4% 可以吗？

3. 最关键的问题是——在忍受期间，是否可以唤醒制度、技术等因素以实现对 AFRE 的替代与超越，从而使年 ΔGDP 恢复到 6.5% 以上？

四、窗口期的政策建议

1. 如果汇率承压到一定程度，不妨实行临时的外汇管制；

2. 住宅限购政策必须尽快调整，全面放开一手房市场（不限购，可限贷），以此取得市场对政府实行二手房市场管制的同情。对二手房市场的管制要点：对售出：规定限售期，在限令期内的转让规定略严的条件；对购入：按已有套数限购，但不限贷。

3. 合并县市区级行政区划。以宁波为例，民国时期的鄞县，现已拆分为三个区，还有高新区、东钱湖区等。如果将这五个区合并为一个区，则至少可以减少四套班子。全国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因此，如果能在窗口期内尽可能大规模地合并县市区级行政区域，就可以为未来的减税腾出空间。

**陈 东（南京大学）**

一、宏观盈利好转的背后，民企利润被进一步侵蚀

虽然今年以来，宏观上赢利能力有所好转，但主要体现在上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致工业品价格大涨，上游行业利润明显增加，国有企业利润大幅增加。但这种利润的增加并不是全行业的增加，而是挤压中下游行业利润的，中下游以民营中小微企业居多，生存没有较大改善，甚至更差。

二、投资行业，国企隐性“与民争利”

今年上半年，统计数据显示，国有企业开始从高赢利行业的建筑、水利、公共设施、文体娱乐等领域有所退出，大举进军有色金属、通用设备制造、汽车、煤炭、黑色金属冶炼加工等，这些行业表面上 ROE 都不高，因此从统计数据上来看，国有企业开始不再“与民争利”。但背后的情况是，进军的行业都是 2016 年盈利状况均出现了大幅改善，这背后是挖掘机、汽车的销量大增，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退出的行业都是在盈利上出现了消极的变化。国企“为民让利”只是一个静态表象，更多的是一种“与民争利”的冲动。

三、金融去杠杆，民企更受伤

金融去杠杆是近来国家主抓的工作之一，货币投放 “缩短放长”、公开市场“准加息”、MPA 考核升级，委外清理，股市、债市、期市全方位熄火，企业融资能力难度整体加大，背后的是民营企业的“雪上加霜”。在央行信贷投放额度管控的背景下，银行会倾向于对国有企业诉诸的表内表外信贷提供相对便利，而压缩民营企业的信贷投放。而民营企业应收账款质押贷款、动产质押贷款、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第三方监管质押贷款、土地合作社抵押贷款等品种还难以操作。整体情况，民营企业大金融去杠杆背景下，融资变得非常困难。

四、其他困难

缺土地，各级政府往往把有限的土地指标优先安排引进的大项目、国有大企业上，民营中小企业很难争取；缺人才，高端人才“引进难”、专业技工“难招收”，一直困扰民营企业；劳动合同法有待完善，中小企业用人成本大增，用工风险增加；政府服务“若即若离”。政策扶持难到位，“重大轻小”“重数据、轻服务”，新的政商环境下不敢和民营企业深接触，深服务。

**程 鹏（江苏巨和实业有限公司）**

一、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就企业内部而言，今年我们的出口和转口贸易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10% 左右，进口和内贸增长了 20% 以上，这只能算是恢复性的增长，因为 16 年同期我们的数字不行。就外部支持来看，目前银行对我们企业的授信意愿也比半年多以前增强了，一可能是银行资金相对更充裕了，二可能是银行对实体经济的信心有所恢复。在我们企业自身的生存和经营中，形势最严峻的是 15 年至 16 年三季度这段时间，算是严冬。我判断这个过去的严冬期，经济走势还处在 L 型的那“一竖”上，现在是落在 L 型的那“一横”上了。

二、接下来的经济走势如何，我认为其实取决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首先，可以减免税收，可以简化税制，可以降低五险，可以取消一金。其次，可以简政放权，在出台与中央政策相配套的具体的行业部门法规、实施细则、管理规定、监管办法时，要有“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意识，不能只图自己方便安全，制定过于严苛的标准 / 游戏规则，也不能自由裁量权太大，两者都会首当其冲地伤害正当经营的企业，尤其是实体企业。

**宋文阁（江苏省国资委）**

一是本轮的国企改革为中国经济增添了新的活力、动力。本轮的国企改革，无论学界、还是老百姓或许对国企改革的目的意义有分歧。从近两年的规模营收、规模净利润、EVA、占GDP比例大幅增长，足可说明。

二是今年是混合所有制改革突破年，全面落实1+N政策文件，进一步发挥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带动力、抗风险力。

三是坚决执行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发挥国有企业主力军作用。在高铁、码头、建筑、工程等产业发挥全球价值链作用。通过产业配套协同，带动民营企业作为生力军也在主战场发挥作用。

综上所述，未来中国经济的走势明显不会太坏，完全符合中央意图，把GDP增量及增速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刘晓昶（华泰证券）**

今年总体依然是实体经济相当困难的一年，在美元加息背景下，国内货币政策趋向收紧，金融监管较严。

**孙 军（淮海工学院）**

宏观上讲，国进民退，以及投资效率的快速下滑，决定了我国经济形势的下一步不容乐观；中观上讲，大量的银行融资被房地产吸附、实体缺血，资本市场支持实体经济的缺失以及利率的被迫上调，决定了实体产业的不容乐观；微观层面上，有好有坏，有些企业被逼转型，有些企业被淘汰，有些获得突破，在中国这个大的层面上是必然的，但企业总体仍然较难！另外，从需求层面看，消费者的大部分财富被房地产高位吸附，对中国长远发展绝对不利。下一步，一是坚决推动资本市场按法治化发展，二是逐步放开垄断性服务业，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三是政府部门精兵简政，逐步减少新的公务员招聘人数。

**盛文军（人行杭州中心支行）**

一、2017年中国经济将持续回暖，但增速放缓。 原因：

（1）工业品尤其是上游产品补库存接近完成，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支撑作用将有所减弱。

（2）基建投资增速不会太高，民间投资回暖有个过程。

（3）出口对经济增长作用有限，制造业升级和进口替代将进一步降低出口的贡献。

二、金融风险防范短期将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就金融领域而言，金融改革发展要把握好稳与进的关系，货币政策将进一步加快回归常态，这意味着很难重现以前货币供给超宽松的状态，保持稳健中性将持续较长一段时间。在注重金

融去杠杆防风险的同时，要尽量避免由于措施不当而变相抬高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

三、重点关注和防范债务风险。尤其是政府支持类项目和国企债务风险。解决措施有三：其一，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步伐，特别是针对各级政府支持类建设项目的投融资。其二，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强化现代公司治理。其三，加快国企不良资产处置，探索利用市场化的不良资产处置办法如资产证券化、债转股等。

四是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这将是支撑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一环。当前要着力提升直接融资比重，逐步改变依赖银行融资的间接融资方式。加快发展股权投资；加快推进各类符合条件的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和市场。在维护金融稳定的同时，不断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金融自身发展的效率。

**姜彩楼（南信大）**

我国宏观经济总体上是一个追赶经济体，改革开放以来不同产业部门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投资效率在不同部门之间，也出现不同的趋势，应该区别对待。对宏观经济的理解，离不开全球化的大环境。早期增长中，引进高生产率资本的增长效应比较明显，也容易被人们观察到和接受。随着全球化的加深，内外资本生产率差距逐渐抹平，增长带动效应会减弱。此时，第二波动力应该要转移到创新驱动上来。相对于资本驱动而言，创新驱动无疑更容易形成“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治理结构，创新驱动更要关注国际市场的走向，这决定创新驱动的发展潜力。我国前期经济增长中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产业基础，尤其是制造业，在加工生产环节形成了规模优势，加上国内巨大的市场和要素禀赋优势，中国制造业部门仍然能够保持一定的竞争力。在我国一些制造业部门中，这几年也有一些亮点，比如高铁，目前青岛以中车四方为主，开始建设高铁城，目标是建设高铁科技创新中心，强化高铁竞争力。上海商飞集团最近也引人注目，C919 试飞成功后，商飞的研发进一步得到加强，争取国际市场的认可。2016 年国家提出建设创新工程中心，如果能够加强中国先进制造业龙头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沿着创新驱动道路走下去，对中国制造业来说，后期的技术扩散、示范效应等会出现。当然，目前体制性的制约因素还很多，比如一些不切实际的标准、规定等，造成了执法的两难悖论，进一步降低制度成本，向改革要红利，释放经济活力，仍然任务艰巨。

**张明之（南京政治学院）**

当下宏观经济形势：总体上有所回稳，工业经济增幅回升可能是最大的贡献，当然也有净出口的贡献。房地产调控政策趋严导致房地产业的多数指标走弱，出现下滑预期。通货膨胀压力有所下降，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地区经济走势分化依然存在。政策与市场的博弈味道明显，政府对市场的监管缺乏科学性。

未来经济走势：内部层面：取决于经济内生增长动力的创新成效上和金融风险；《中国制造 2025》能否有突破性进展，雄安新区、大湾区如何模式创新。外部层面：取决于出汇率稳定

与贸易增长，尤其是中美贸易关系；“一带一路”倡议能否有效落地。

总体上：取决于决策者对当前经济增速和结构改革的态度与决心。预计经济趋势缓慢向好但依然会有反复，结构改革任务依然很重。

**王 丰（江苏东鋆科技）**

去产能，基本上去的是上游企业的产能，现阶段能够生存下来的大部分是央企国企。现阶段，当上游产能不能满足下游企业的需要时，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形势。当然也有上游企业联合流通领域，出现了惜售捂售等情况。

生产领域，说说我们这样的企业：一季度订单量有所放大，而且同行业也有趋暖迹象。目前都在购置土地建造厂房采购设备扩大产能。但是从利润率和总利润来讲，目前的产能扩大了，利润没有增长。去产能：上游利润增长，下游成本增高。

**姜德波（南京审计大学）**

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过去一本万利的暴利行业不复存在，那种动不动数十倍的盈利率是不正常的，现在利润率下降是回归常态。企业指望政府政策扶持是没有出路的，企业要想有出路，还得依靠市场，在加强产品和技术创新的同时，加强企业的内部管理。

**谈 镇（江苏省委党校）**

当下宏观经济形势：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增长缓慢复苏、分化严重；产业回流分流，逆全球化抬头。国内经济判断：增长符合预期，结构呈现优化，风险忧患加大。

对未来的判断：政府职能不真正转变，增长动力永远是疲软的；政治体制不动真格改，发展理念永远是纸上的；企业家精神权益不保护，增长的效益永远是不可能持续的；政治成本和企业成本可以随意向百姓转嫁，就不可能出现要素更迭。

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让百姓承担发展改革成本的模式将继续滑行；各经济指标数据将继续滑行；新权贵集团速度和中产消费享受理念将继续滑行！

**崔卫东（蓝鲸咨询）**

宏观经济好于去年，未来经济取决创新。

一、宏观经济形势总体好于去年，国家推动的机器人、物流网、集成电路、装备制造等领域呈现亮点。

1、装备制造明显好于去年。工业企业技术改造投资意愿增强，集成电路、物流网、机器人等提高企业自动化程度的中高端装备旺销。

2、信息技术领域普遍见好。互联网、通信、汽车电子、智能制造都有较好表现。智慧城市已经渗透到县级城市。

3、食品与农产品市场低迷。四月份食品价格下降较多，各地农产品市场普遍低迷，一方面影响今年农民增收，另一方面促使持续 10 多年食品工业高于制造业增长速度的状况改变。今年食品工业增长速度可能低于制造业增长。

4、三大群体收入增长不快。农业劳动者、私营个体组织劳动者、新就业大学生三个群体收入增长与去年持平或略有下降。

5、企业分化比例出现积极变化。今年新增订单情况较好或生产订单饱满的企业占全部工业企业的比重上升。如果说过去经营情况较好的企业在 25% 左右的话，今年已经提高的 35% 以上。有些地区经营较差企业的闲置厂房出租率提高。

6、租房市场出现积极变化。大中城市住房出租价格上升。商铺出租率上升，关门打烊的商铺渐少，较好地段的商铺租金上涨。写字楼出租还没有明显好转。

二、国家重点产业领域创新的组织程度推动未来经济发展

今年的经济增长亮点，很多是“智能制造”、“集成电路”、“机器人”等国家或地区重大产业领域创新项目推动的成果。国家或地方可以像组织城市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那样，组织重大产业经济领域的创新项目推动。创新项目推广，不仅包括科技创新，更重要的是推进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成本低、见效快。建议：

一是推出夏秋冬青年时尚消费活动。青年是消费的主体，中长期消费和消费转型的决策者。通过媒体、高校、团组织，引导青年衣着、食品、休闲、文化的时尚消费，引导国内消费品制造和服务企业关注中国青年时尚，打造中国时尚品牌，满足广大青年的时尚消费需求。促进中国企业引领时尚，杜绝奢侈。

二是推出新材料重大应用项目。不仅推动下游厂商广泛应用新材料，还要推动全社会认识新材料的应用好处。通过新材料推广，既促进新材料产业发展，提升产品质量，也让材料领域的假冒伪劣失去或减少市场。

三是推动大宗农产品规模化经营和特色农业富民经营。江苏苏垦农发用全省 1.34% 的耕地生产了全省 3% 以上的粮食，提供了 40% 的稻麦种子。利用农产品市场低迷的机遇，在稻米、小麦、玉米、猪牛羊肉、禽蛋等大宗农产品领域培育一批不断提高行业集中度的规模化经营企业。释放大田作业劳动力，促进特色农业致富。

**刘根荣（厦门大学）**

中国宏观经济整体态势稳中有进，保持了较为良好的增长势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高于预期，根本原因在于消费需求带动明显，投资需求回暖，特别是民间投资复苏迹象显著。“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企业利率回升，供给侧的优化带来了与之相匹配的需求提升。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各级政府存在制度性偏好，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的过程中出现人为的“国进民退”现象，不利于非公有制经济的长远发展。另外，对金融风险的判断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偏误，没有弄清金融部门的杠杆率与非金融部门实体经济的杠杆率形成的内在逻辑差异，“去杠杆”主要集中在金融领域，整体经济的风险未见明显改善。

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化政策除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有产业政策，三大政策工具合理使用，不仅在短期内追求经济的平稳增长，更追求在中长期经济的良性快速发展。中国政府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有更多灵活的工具可以选择。如何有效利用产业政策工具实现中国经济宏观目标，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管理实践的鲜明特色。

**孙国民（南大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今年一季度主要经济指标回暖，整体经济运行呈“稳中有进、进中趋优”的发展态势，实现“开门红”。总体上看，下阶段宏观经济形势依然复杂严峻，需要重点关注：

一是需求有所回升，但存在不够强劲的隐忧。一季度，有效投资保持较快增长，但有效投资后续增速将有所回落、后劲不足；从出口情况看，外贸的良好表现既有转型升级、结构优化的作用，也有触底反弹后的恢复性增长因素，还有原材料价格带来的成本推动因素带动出口规模提升，预计，伴随美国减税、美联储加息、中美贸易摩擦预期风险增大，全年外贸走势将呈“前高后低”的态势。

二是增收有所改善，但存在持续增收的阻力。尽管企业整体盈利水平有所改善，但伴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实施，原材料和能源价格上涨推动企业要素成本上升、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处于高位运行，特别是纺织原料、钢铁、有色金属铜等价格上升，给袜业、纺织服装、机电装备、铜加工等产业带来较大影响，削弱了工业企业实际盈利能力以及出口产业的竞争力。

三是成本有所降低，但存在风险依存的隐患。各地都在开展降本减负，直接融资和政策性融资占比也有所提升，但受银行风险规避、担保物质量等因素影响，银行信贷更趋谨慎，信贷权上收明显，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依存，部分企业流动资金紧张，企业避税、逃税及欠税现象日益增多。从金融指标情况看，金融体系存贷款增长乏力，信贷资产质量受压进一步增大，银行资产不良率依然较高，不良贷款风险隐患尚未完全释放。

**董也琳（南京大学）**

当下中国经济重要特征：价格调整的通缩压力。与国外商品价格相比中国物价普遍偏高，这有很强的阶段性和内生性原因。首先 15 年以来一二线城市房产价格暴涨，土地价格传导至最终品，带来物价普遍上涨。其次，劳动人口数量下降和劳动力供需结构的摩擦，使得国内人工价格上涨明显，带来成本推动的通胀。最后，国内农业补贴使大米、玉米、小麦、土豆、羊肉、牛肉、猪肉以及一些水果的国内价格比国外普遍高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两百，农产品国内外价格倒挂情况严重。但是这样高物价并不具有可持续性，当前中国宏观经济面临较大通缩压力。

首先，从货币市场来看，由于外汇管制制度，我国官方数据显示我国外汇储备下降了 8000 多亿美元，这相当于央行回收了 5.6 万亿人民币，导致社会基础货币下降，随着近期央行对影子银行业务的规范化管理，社会总体货币供给面偏紧。

其次，从贷款投放的方向来看，越买越涨的房市大量吸附居民储蓄和企业投资能力，变相

提高了资金的机会成本，目前的房价已透支了未来10年的上涨动能。同时在高房价、高人力成本、高融资成本的侵蚀下，实体企业利润率普遍下滑，大量私营实体企业被迫撤出。

最后，伴随双边多边自由贸易的推进，将有越来越多性价比更高的进口品流入国内市场，加剧国内市场竞争程度，从而倒逼国内厂商创新活力和物价下移。

缓解通缩压力的方法具体有：首先，守住系统性风险底线，允许发生局部风险，特别是房产价格调整以慢跌取代快跌，以股市、汇市托价取代房市托价。其次，推进建立直接融资市场，使资金在市场机制下流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和产业，推动市场利率收敛至社会平均资产回报率。最后有条不紊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步伐，以“稳而慢升”的低估值加强对发展中国家货币的吸引力，鼓励发展中国家货币加大盯住人民币。

**王修志（广西师大）**

以新常态演进的基本逻辑和近中远期目标任务为前提，结合企业界 / 金融界 / 政府官员反馈的数据信息看，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及未来走势值得肯定。下一步需要以政府制度供给为突破口，继续强化微观主体信心，巩固良好预期。

（一）从逻辑视角看，经济新常态是大逻辑，它不仅是对当前经济基本格局的描述，也应该是长期发展的目标指向，即以创新、开放、绿色、协调、共享为特征的发展状态。这个大逻辑有三大抓手：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二是进一步释放以消费为重点的内需；三是“一带一路”开放战略平台。其近中远期阶段性目标任务可大致分为：御风险（主要是“实体 + 金融 + 地产”累积的系统风险）—转动能（内需 + 创新 + 外需）—调结构—促发展（以五大理念为特征的新型发展）。

（二）从数据视角看，近期应主要聚焦于“三去一降一补”指标的方向性，聚焦于系统风险的指标观测，中远期则应聚焦于其背后深刻的制度和政策变革。从经济主体看，须特别关注微观企业的经营数据，以及企业家的信心和预期；同时须从就业 / 收入 / 消费结构等方面特别关注居民及家庭的数据，以及其信心和预期。

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及未来走势的研判：在此阶段，主要关注三大问题：动能转换有无推进？营商环境有无改善？系统风险引爆点有无拆除？

从前述企业家、金融界人士、政府官员反馈的数据信息观之（如果这些来自一线的信息客观真实）：以“三去一降一补”和系统风险化解两项重点任务看，成效已经显现；以“一带一路”及对外开放整体环境看，形势也在趋于改善；以实体经济领域微观企业的经营业绩及企业家预期看，整体往乐观方向发展，实体经济领域企业投资特别是创新投资意愿在增强；以居民家庭就业 / 收入及消费而言，非居住类消费在逐步增加，预期相对乐观。

基于这个判断，当务之急是继续增强民众和企业的信心，努力巩固微观主体的向好的心理预期。以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政府必须继续以自身改革为前提，坚持新常态这个大逻辑，坚持五大发展理念，坚持法治化市场化改革路径，通过优化制度供给以增强服务市场的能力，增强企业和家庭活力。企业家信心 + 居民信心 + 政府信心，“三心合力”，未来前景

可期。

**林学军（暨南大学）**

如何推动今年的经济发展?

首先，还是要扩大内需，国人的消费能力可以进一步挖掘。主要方法一是抓好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增加名优特产品的供应，调节经济结构；二是利用“互联网 +”提高服务水平，加速商品流通；三是农村城镇化，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扩大农村市场；四是加大扶贫的力度，减少贫困人口，提高整体消费能力；五是倡导绿色经济，文明消费，节约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其次，我们要有计划地搞好固定资产投资。基础设施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但我们也要有计划、分步骤的进行。政府是基础设施的组织者，国有企业是基础设施的建设者、运营人。我们需要预防不切实际地，过于超前地搞基础设施，如此做法一是会造成债台高筑，将来会成为经济发展的包袱或定时炸弹；二是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最近，高铁亏损的报道时常见报，有关部门必须警惕。公共设施的建设为国民经济服务，不以追求利润为目的，但也不应当亏损。

最后要抓住“一带一路”的契机，努力提高对外贸易、投资的水平。我国的对外贸易市场比较单一，因此，深受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应当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增加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扩大互利合作。通过“一带一路”的建设重构中国的国际分工，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增强发展的后劲。

**孙月平（江苏省委党校）**

1. 宏观层面，中央已确定“稳中求进”是主基调，在现有体制下“稳”是没问题的，关键是“进”，例如今年四大改革重点：国企国资、产权保护、财税金融、养老保险，目前仍然在忙着做方案，要有大的突破非常困难。

2. 中观层面，新的区域战略不断推出，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都是大手笔，以此带动投资、产业发展是能很快见效的。

3. 微观层面，国企、民企都一样，冰火两重天。

结论：正在形成的中国模式是，以反腐得人心，以集权保稳定，以区域战略促发展。

**王思彤（江苏省统计科研所）**

我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看法：当前促进经济发展应以决胜全面小康为总的目标导向。现在离十八大确定的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还剩下三年时间。我们研究经济新常态下的各种新动能，都抵不上这个总目标赋予的强大推进力。从目前全国各地情况看，由于全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量化标准一直没有出台，使得裹足不前、等待观望、蒙混过关的现象比较明显。经济发达省份因为没有全国标准可以对照而不敢贸然宣布提前建成小康；经济居中

游的省份只是密切关注发达省份动向，更不敢宣布提前建成小康；而那些欠发达的省份，主要精力放在贫困人口尽快脱贫上，不希望全国出台统一的小康量化标准，因为这样就可以搭车过关了。可以看出，这三种情况带来的都不是积极进取的状态，不能够给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应有的动力，必须尽快改变。改变的途径之一就是尽快出台全国统一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量化标准，哪怕只有人均 GDP 一个参考指标也好。这样，各地就可以按照这个指标进行自我对照，通过比学赶帮超，明确自己的重点任务，激发起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更大的建设热情，从而有效地推动一省一市一县如期或提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尽快向基本现代化的第二个百年目标奋进。在这方面，江苏小康探索的成功之路可供全国借鉴。

# 【纪念恢复高考 40 周年】中国急需再启动类似积极向上的简单而重大的改革

2017 年 6 月 5 日

**编者按：**1977 年 8 月科教座谈会上，邓小平拍板：当年恢复高考！这一举措扭转了当时毒害中华民族的愚昧风气，并推动了后来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年，是恢复高考 40 周年，本周，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建议群内专家们用一句话纪念恢复高考 40 周年，并针对“中国取得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希望”展开讨论。

**纪念恢复高考 40 周年——中国急需再次启动类似积极向上的简单而重大的改革**

**楼稼平｜宁波布衣：**

我的一句话——青春·无悔

1977 年恢复高考那一年，我高中毕业，是应届生。应届生就遇到全国恢复高考第一年，真是令人羡慕妒嫉恨的好运气，特别是令长我 6 岁只初中学历的哥哥羡慕。

我记得是母校（宁波市第十三中学）通知我报名。在报文科还是理科时，父亲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你俩还是报理科吧”。父亲所以建议甚至以毋庸置疑的口吻严令如此，我们知道与他老人家的经历有关。

那一年参加高考后不久，父亲就设法让我在建设银行宁波市办事处（市财政局基建拨款科的对外牌子）上班了。1978 年元旦后，我到天台国清寺参加了省建行在那里兴办的业务培训班。好像过了没几天，母校通知我回宁波参加体检，填志愿表。这意味着我达到了录取分数线，在杭州参加高考的我哥也是。可惜，当时并未公布考生的考试分数各得几分，我们只能照需要而不是可能来填报志愿。我当时已经参加工作，填志愿时，不免患得患失，并非以入学为起码目标。记得我弟兄俩都把大连工学院作为第一志愿，我从小喜欢轮船，好像报的是造船专业。结果，我没有被志愿表上的任何一所高校录取。

我后来还参加过 79、81 两届高考，每次都达到录取分数线之上，但实际上选择的范围越来越小。最后，还是建行系统 1983 年首次招考干部专修生时，我考上了。所以，我人生的最高学历是大专。

**王美今（中山大学）：**

恢复高考被许多评论家称为“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文革后千疮百孔的中国百废始兴，首先就是在这里打开突破口的，其重大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对于我个人，文革开始时正念高一，之后的十二年里因不断地梦见上大学而被人笑话为“书痴”；当我自己也彻底感到绝望的时候，1978 年的高考让已近“而立之年”的我走进了大学课堂。真有重生之感！

**刘志彪（长江产经院）：**

恢复高考启动了中国社会长期僵化的纵向流动机制，使千百万平民百姓弟子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进入社会高阶层级，它是中国人才辈出、社会良性动态循环的关键举措。现在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已经到了类似四十年前的决定性时刻，不进则退。

**施 康（香港中文大学）：**

读书改变命运，中国需要类似恢复高考的重大改革来凝聚人气，为整个社会提供积极向上的力量。

当务之急，是要不拘一格降人才，鼓励体制内外人才大流通；要减少社会流动的障碍，改善社会上升通道，促进社会健康稳定发展，总之，要给民众，努力方向和奋斗的动力。也许下一个重大改革，就是取消户籍。

**刘建森（徐工集团）：**

恢复高考给读书人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会，给社会阶层流动带来动力。高考使我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改变了我和家人的命运，改变了农村人对读书的观念，从而改变了很多农村孩子的命运。高考虽然弊端很多，但仍是目前较公平的竞争方式。

**巫 强（南京大学）：**

改革开放最根本的目的是要改变人的激励机制，最大的社会效益就是能让每个人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人生，恢复高考无疑是实现改革开放目的和社会效益的最重要手段之一。

**谭江涛（三峡大学）：**

目前的高考制度虽然有缺陷，但是至少给了每个人，包括当年那些出生成分不好、但是努力上进的有志青年改变命运的机会，其重要意义无论怎么形容都不过分。相比较而言，而文革时期的工农兵推荐上大学，主要看出生，拼关系，演变到最后一定是历史上腐朽没落的九品中正制。

**倪 敏（硅谷创业）：**

停止高考其实停止的不是人才选拔，而是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

**陈 东（南京大学）：**

恢复高考，其实是伟人内心最深处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流淌在血液中的一种对中华民族未来前途的呼唤。有人说中华民族命运多桀，但也命好，每到关键时候总有伟人出来，我认为从历史的长河看，无论怎么样形容邓公恢复高考制度的伟大作用都不为过。

**王修志（广西师大）：**

作为一个未曾经历当时情境的晚辈，我的观点是：恢复高考，直接意义在于发现了人才，发展了教育，改变了知识分子的命运。其深层次的意义则更在于解放了思想，启动了改革，改变了家国命运。认清方向，排除万难，突破利益束缚，推进改革，这是“恢复高考”之于今天的最大启示，也是最大期待。

**李 锋（江苏省经信委）：**

对于国家，高考是选拔人才的最重要机制。对于每个个体，高考是改变命运、认识自我、实现个人价值的最重要途径。可以说，改革开放这 40 年，高考应该是最重要的改革。

**于春晖（人民日报）：**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梦是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过去的高考正是我们个人人生出彩、梦想成真、与祖国和时代一同成长与进步的制度支持。

**杨志勇（中国社科院）：**

高考改变了多少个人的命运，也扭转了国运。十年积聚的人才有了更多服务国家和社会的机会。高考是改革开放的先声，让社会回到了正常的发展轨道。

**张声旺（南大镇江校友会）：**

恢复高考是对文革教育路线的终结！ 77 年恢复高考造成大学学堂几代同堂的景观却真是那个时代的印记！真是要感谢邓公为学子们、为中国的教育路线的转变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反思四十年之教育，正因为厉以宁教授提出教育经济学始，对教育经济的研究曾一片繁荣，

可惜的是教育经济的研究转向了可悲的教育产业化的研究和实践。偌大一个中国，目前高考的模式尚难以替代，但应试式教育毕竟是中国特色的产物，存在着不公平之处，如地域、教育程度、指标分配等等。

产业经济的发展是奠定国家财富和富裕民生的基础，而虚拟经济最多就是产生 GDP，做实产业、扶持企业、降低税负、精兵简政，大幅压缩行政支出，将国民财富的再分配更倾向于民生和社会公平，应该是下一轮改革的可取方向。

**谈 镇（江苏省委党校）：**

中国人生轨迹在于两个移动：人生的纵向移动（现在空间越发窄小）和横向移动（表象繁荣根子没变），前者是高考，后者是户口！

**蒋青云（复旦大学）：**

高考让农村青年第一次享受到人生的公平待遇，唤醒了一代人对国家的挚爱，由此激发的生产力应该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刘根荣（厦门大学）：**

恢复高考制度是邓小平同志全面拨乱反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不仅改变了无数寒门学子的命运，更是使得命运多舛的中华民族走上了一条伟大的复兴之路。

**沈志强（建信信托）：**

很庆幸出生在这个年代，恢复高考、改革开放、科技进步、人类益寿。通过高考，改变了我一个农村孩子的命运，而后跟上了每一次的进步与变革。

**宋常铁（新华网）：**

教育是动物世界繁衍进化的武器，高等教育是人类创新进步的源泉，机会均等、程序正义，起点在教育公平。

**王思彤（江苏省统计科研所）：**

高考，让寒门学子有了升学的希望，生的激情。他们的命运，他们家庭的命运，他们家族的命运，因为高考而改变。

**李建平（卧龙湖小镇）：**

纪念文革后恢复高考四十年，我们是第一年毕业生和受益者。邓公拨乱反正的人才战略拉

开了中国现代化振兴的大幕。

我们现在的改革有很多弊端，例如：市场端相对开放，但房地产市场是高度行政化的；资源端是政府与国企间流动（怕腐败嫌疑），缺乏资源供给的公平市场；生产端是人力、成本、资金、税赋多重压力无法翻身；国际端存在世界经济、制造成本、外汇控制等……现在关键问题在于中央（特别是核心）的思想决断。当年如果没有邓公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大潮，就没有一系列的政策出台和全国的层层自觉推动，也就没有这几十年的改革成就。

**王建国（日本中京大学）：**

如果能够进一步让高考的招生制度彻底摒弃地域歧视，真正实现机会面前人人平等，那将与邓公一样功不可没。

**张建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高考是一个比较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制度，能让几乎所有的人得到所期望的。今天的经济社会改革设计应该吸收高考制度的经验。

**司增绰（江苏师大）：**

高考给了农村寒门子弟改变命运的一个正式通道，真正实现知识改变命运，知识创造未来。

**杨平宇（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农村的孩子考上中专就能有非农业户口，考上重点大学就能落户城市，给了农村学子憧憬的机会。

**陈伟贤（江苏省人民医院）：**

40 年前的高考改革让寒门学子时代奔儿有了上升的空间和为国效劳的希望。我当时在苏北的一家医院当清洁工，这个医院是从南京搬过去的，在苏北交通不便，家人分离，全员职工都很苦闷觉得再也不能回到城市了，我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全院职工都来恭贺，发自内心的恭贺，因为他们看到了自己的希望，果然其后数年大家纷纷回到了城市。

**孙 军（淮海工学院）：**

希望下一步能够思想市场繁荣，真正尊重人才，为中国下一步的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陈志龙（新华社）：**

期待国家在人才战略上重启关键性改革，期待革命性改革再出发。

**王洪飞（金科股份）：**

高考制度最大的贡献是给大家创造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我们现在仍然需要公平与正义。

**崔卫东（蓝鲸咨询）：**

恢复高考，是大样本、高福利、高效率、高秩序的改革。大样本是近 3000 万人参加不到 1% 的角逐。高福利是跳龙门、转户口、找配偶，甚至改变人生轨迹。高效率是很短的半年，实现从方案设计、资源组织，到实施完成。高秩序是公平、公正，考分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标准，几乎人人平等。期待国家 5–8 年有一次如此简洁可行、惠及百姓、震撼人心、改变社会的改革。

**汪德华（中国社科院）：**

恢复高考这一重大改革，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今天我想强调的是恢复高考对改革方法论的启示：一是恢复高考意味着以高等教育为龙头重视教育科技事业的发展。二是恢复高考意味着以分数这一单一标准替代以往的多标准选拔人才。三是恢复高考是对过去错误政策的拨乱反正。

从改革方法论的角度看，今天依然要重视恢复高考的成功经验：在错综复杂形势中，要抓住聚集人心的改革龙头；任何希望以多标准选拔或考核的政策都需慎重；对于违背规律的错误政策应及时拨乱反正。

**杨 锐（苏州大学）：**

当时的高考改革体现的是对知识的渴望。它至少改变了两代人的命运，但是中国的复兴却是几代人的事业。然而，当前各阶层，一方面不尊重知识的价值，另一方面却在追逐学历的光环。当年高考改革所带来的生产率增长效应已经被人们追求钱和追求刺激欲望而被极大削弱甚至抑制了。在当前的众多改革领域中，最为重要的是教育改革，其中，需要把高校回归到真正育才的方向上去。取消各类官方评估，取消不必要的人才头衔。

**孙 东（南京审计局）：**

90 年代中期高考的，那时候还没有大规模扩招。真的是改变命运，从东北一个小县城考到南京，留在南京。在当时，对于像我这样的人，高考几乎是离开小县城唯一的机会。

**周 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当年父辈读书时遇到文革，遇到上山下乡，学习被迫中断。将学习的希望和要求给了下一辈。正是因为高考，我们才能选择现在生活的城市——南京，一路读书才选择现在的热爱的职业——教师，才能在大学遇到自己的爱人。所以，高考于许多人而言，是遇人，择城，终老的有效路

径之一，说不上多么高大上的道理，但是高考确实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当老师期间，带过很多农村或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学生，他/她们通过高考脱颖而出，不仅改变个人的一生，也将影响家庭的命运。在此之上，高等教育深化改革的重要性也即凸显，因为他/她们的就业创业机会和环境将影响其他家庭的选择。公平公正公开的高考，也应该延续到其他的地方，给更多人再次选择的机会和权利。

**杜宇玮（江苏省社科院）：**

无论是高考改革还是当前所需的经济改革，都需要有一套公平的规则约束。不同的是，高考选拔的公平之处体现为一份试卷，强调的是正分；而经济改革的公平之处则需要有一份清单，但强调的是负分。

**张少军（厦门大学）：**

高考意味着个人可以通过才华和勤奋改变命运，而不再受制于出身。希望今后改革可以让个人和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公平获利。

**张小兰（西南民族大学）：**

恢复高考可以说或多或少影响了中国的每一个人，直接影响了中国改革开放，使得社会重视人才教育，为我国改革开放积累了人力资本，我国改革开放伟大成就，恢复高考可以排在贡献率第一位置。

**张晓东（中国管理科学学会）：**

无高考，无天公抖擞降人才，无知识改变命运，此一时。唯高考，唯高分取人路一条，唯考试决定命运，彼一时。坐而论道是非，莫若深入研究人才辈出新机制。

**宋圭武（甘肃省委党校）：**

中国改革开放已快四十年，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暴露的不足也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大的成就是促进了知识的迅速增长，最大的不足是道德的快速滑坡。而高考是改革开放最成功的制度设计。

**宋文阁（江苏省国资委）：**

邓公恢复高考，带来了科技、人才的春天，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注入了空前活力、强大动力。恢复高考毕业的前几批大学生，又符合干部“四化”标准，快速走上了领导岗位，成为治国能吏。实践证明，部级干部、厅局级干部大都是恢复高考前几批参加工作的，在主导着中国。

当下呼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党管人才原则，进一步加大中国教育改革力度，推进“双一流”建设，为中国梦培养本土化人才，为中国崛起提供人才保证，或许迎来人才的又一个春天。

**孙月平（江苏省委党校）：**

高考是一场存量改革、体制内改革，邓小平多次说过，改革是第二次革命。但邓之后的改革大多是增量改革、体制外改革，由此带来了大量社会矛盾的累积，既得利益者的阻力，改革越走越难。现在需要发挥邓小平留下的改革精神，在一些关键领域大胆突破，进行颠覆式创新，以此开创新局面。

**闫凌竹（基金）：**

恢复高考，改变了无数家庭的命运，但感觉最近十几年区域失衡情况也在加剧：老家所在的苏北徐州市睢宁县一中，90 年代出过全省文理状元同现一中的盛况，2000 年以前每年都考上几个清华北大的，但之后，逐年减少，目前最好的只是二本。优秀老师、学生逐步流向苏南，现在县里富裕家庭都尽量把娃送到徐州市里或南京上中学。

**霍伟东（西南财经大学）：**

恢复高考是恢复了中华文明延续之根。

**张明之（南京政治学院）：**

恢复高考是社会正义的复归和民族振兴的“千年大计”。

**唐德淼（无锡环研中心）：**

恢复高考是对某种“运动”式制度的自我救赎，是制度公平的一种负责任历史诠释，唤醒了民族奋进基因和文化自觉。

**踪家峰（南开大学）：**

高考不仅是改变命运的机会，而且是阶层固化的腐蚀剂。

**夏海力（苏州科技大学）：**

恢复高考是当时中国恢复公平正义的最大体现和科教兴国战略的最大举措。

**孙国民（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高考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福利，这个福利又衍生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福利，并继劳动力红利（第一波红利）后形成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二波红利：人才红利。未来希望高考制度朝着“宽进严出”的方向去改革优化，建设人才强国。

**翟太煌（山西证券）：**

恢复高考，从某种意义上是恢复个体尊严。恢复高考40年，实际上为中国的改革开发的长足发展，包括未来的崛起，储备了知识和人员的基础准备。

**周 斌（省邮电规划设计院）：**

现在的教育需要一场新的改革：一是教育过程的改革，二是人才使用的改革。

**朱新聪（海尔）：**

科举制对中国历史中华文明的推动是隐性的但是可以说最重要的，恢复高考对当代中国的重要性更是无以复加，对我这样的个体来说更是改变命运。当今社会越来越多元，但高考的重要性还是无可替代，希望高考改革越来越深入。

# 如何看待和规范地方政府债务

2017 年 6 月 7 日

**编者按：**本周，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南京大学马野青教授提议发起，江苏省社科院陈柳研究员作为主持人，对“如何看待和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 如何看待和规范地方政府债务

**陈 柳（江苏省社科院）：**

最近媒体报道了两个事情，一个是穆迪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主要理由是中国的政府债务持续走高；另一个是财政部向江苏省人民政府发函，要求问责部分县市违法违规担保举债。这两件事情反映了中国政府债务问题需要高度重视，江苏则是中国地方债务问题的一个缩影。对上述问题的分析，我认为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分析：

第一个问题，要厘清为什么国外评级机构、国内外学者普遍对中国债务问题评估比官方要严重。主要原因在于对地方平台债务性质的认定上具有根本性的分歧。财政部在对穆迪的回应时，用国债 + 地方发债的数据，说明了我国总体杠杆率要低于主要发达国家和东亚其他国家，并说明了按照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平台债务不能算作政府债务。由于政府平台债务的规模远远大于政府正式发债的规模，所以按照什么标准统计，结论大不相同。截止 2016 年底，按照省财政的统计，江苏政府债务余额为 10915.35 亿，低于财政部核准的 11830.3 的总盘子。但是，根据我对南京、常州、镇江三地的摸底调研，估算江苏的平台债务规模应该是地方正式发债规模的好几倍。哪种统计办法更准确，我想，起码金融机构在做平台业务时，都将平台当作准政府。

第二个问题，要重视江苏的地方债务问题为什么相对严重。政府债务是全国性的问题，但不可否认，江苏的负债率较高，虽然缺乏涵盖平台的全国性统计，但从几个统计可以侧面观察得出这个认识。一个是 2013 年审计署曾经做过一个全国各省的债务（包括或有债务、或有偿还责任）统计；二是城投债是有统计的；三是政府发债的债务余额各省是有精确统计的。上述三个统计，江苏都是全国第一。其原因，我觉得还是与江苏强政府的发展模式高度相关。江苏经济依靠政府投资拉动、重视招商引资大项目、重视民生基础设施建设，现在又都在搞各类创新创业载体，这种模式都需要政府大量投入。

第三个问题，如何看待中国政府债务风险。虽然国际上有各种杠杆率的指标，但考虑到中国政府债务基本都是转化成投资，不同于欧洲部分国家政府债务转化为社会福利。所以，我认为除了参考国际指标外，根本上还看中国社会的投资总体回报率是否能够保持在一个相对较高

的水平。当前，政府平台债务应该不至于直接爆发类似西方的经济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不依赖政府负债，实体经济下行的压力将进一步加大，经济增长保持在十三五的目标将比较困难。

第四个问题，如何从宏微观视角来规范、化解地方债务问题。过去几年，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去杠杆的问题，对于政府债务，主要采取了将规范的平台债务置换为低利率的正式债务，政府债务与平台债务切割等方法。置换应该说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是，在政府债务与企业债务的切割上，国外的评级机构和很多学者并不认可。金融机构为平台提供融资就是将你当作政府了，你自己硬要说自己是企业，逻辑不太通顺。财政部规范了 PPP，还有政府购买服务，还有政府承诺将项目回购款纳入预算等，平台以准政府名义融资的手法很多，防不胜防。我认为，这个问题改革的力度可能还应该加大：一是与发展观的问题，要控制政府各类债务增长，要允许经济增长速度适当下行；二是对当前的地方政府和平台债务可能要有一个一次性较大的动作。比如中央层面加杠杆、将更多地方平台债转为正式政府债务，将正式的政府杠杆率放到一个合理的比例之后（目前正式杠杆率低的让人难以相信），严峻立法打破平台刚性兑付；三是各地政府愿意举债可能还是与地方主官当地任期太短、难以追责相关。对此要有制度性安排。

**刘志彪（长江产经院）：**

1. 软预算约束没有彻底破解前，平台债即地方政府债，不重视这个问题，债务危机会来的很快；

2. 江苏地方政府债务重是事实，也是因为强政府模式使政府承担了过多的职能，但是也应该就此看到，江苏政府拥有的资产量大，质量好，资产价格高，而且这些资产大多用于生产性投资；

3. 地方政府债务的重要出路，除了要严格控制增量外，还要大力推进资产证券化，这取决于资本市场的振兴。

现在的地方政府债，是典型的收益内化，成本外化的外部性事情。中央政府置换地方政府债务，只是把地方政府上交的矛盾兜起来，或者把矛盾后移到未来。

**陈 东（南京大学）：**

对于中国当前债务问题，最大的是透明的问题，但目前有几个方面需要摸清：

1、政府隐性负债还有多少？很难统计。尤其是早期地方政府打着地方融资平台和事业单位旗号融资金。

2、当前爆发式增长的 PPP，过快过急，项目入库很多根本没有经过专业论证，有多少是“明股实债”？几年以后这些上万亿的 PPP 融资的问题就会暴发出来。

3、地方债务融资的利息多少？记得前几年当地某个区政府发面向体制内人员的债，年化利率是 15 个点，政府拿这个钱去做什么才能有这么高的回报？

4、当前经济下行，政府很多资产回报率很低，如果经济一直低迷下去，以前天量的政府

债务如果不能转换成永续债，怎么办?

**孙 军（淮海工学院）：**

形势表明，中国目前的关键问题是债务问题，而不是转型问题了，当然从一个比较长远的时间看，这两者之间又是相互关联的，后者更为关键。对于中国这个政府相对强势、资源调动能力强的国家来说，负债越来越多，而投资效率却不断下滑，这暗示了背后的绝对风险，千万不可等闲视之。目前，中央政府已就债务规范化问题、降杠杆等问题做了针对性部署，当然在实践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另外，通过股市增加IPO，房价高位来去杠杆，降债务，长期危害巨大。上述均是治标不治本之策，并不能从根本上化解债务可能带来的危机。

下一步，一是适度降低经济增速，维持在 6% 左右，为转型、降低债务留出空间；二是真正重视资本市场，多通过制度建设和市场化力量推动资本市场作用的发挥；三是加快建立新的税收分成体系，为地方政府转变发展模式、消除债务膨胀奠定基础。

**陈长江（南通大学）：**

江苏省地方政府平台债务较重是当前基本事实，这些地方政府平台债务基本投资在搞基建、搞开发区三通一平、招商引资。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地方平台债务所对应的资本质量在快速下降，这个与中国整体投资回报率大幅下降是有关的，但是对地方政府却可能是致命的。以开发区支持的快速经济增长就是以往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在中国经济高增长阶段，投资一个新的开发区，经济集聚的速度较快，地区政府投资一般的债务规模会经历快速扩大、规模不变、逐渐减少的过程，一般 20 年左右就能成熟，苏南地区短一些，苏中苏北地区长一些。但是现在，这个过程大大的延长了，土地和基建开发的投资回收明显变慢，15 年前的某个开发区债务规模仍然在扩张，每年的相关收入维持银行利息都不够。政府平台债务对应的资产质量快速下降，在政府背书情况下风险沉淀在金融机构。

**毛翠英（南京财经大学）：**

还有一种投入到民生领域的平台债，如有地区通过交投的融资平台筹资来提供公共自行车项目，最终资金将由财政兜底。实际上存在冗员等问题，如何提高债务资金使用的实际效率也应必须重视。

**王修志（广西师大）：**

政府公司化的竞争更多关注当期“产能”扩张（至于将来能否产生效益，能产生多大效益，并非重点），真正公司之间的竞争则更多关注投资效益（举债的未来收益）。举债出发点不同，约束机制不同，投资体制不同，由此导致两种债务在风险领域的巨大差异。

地方政府债务规范，从战术看是一个技术和工具选择的问题，从战略看则是一个事关政府

职能转型和财税体制改革的问题。战术可以因地制宜灵活选择，但战略方向却只有一个，必须坚定不移。

**刘根荣（厦门大学）：**

地方债务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强政府 + 软约束，是政府主导的追赶型经济的必然产物。所谓政府公司化实质是政府利用自身优势借道市场掩饰计划配置资源的一种隐性行为。

**孙 东（南京市审计局）：**

各级地方政府及开发园区都有交通平台、城建平台、水利平台等国资平台。从实践角度看：第一，他们的成立及运作，都是担负着政府交办的专业职能，充当政府开发建设的开路先锋。第二，他们的融资大多都具有政府信用背书，或者利用政府的资源抵押，他们的债务构成了政府或有负债。第三，从接触过的平台看，他们对于融资取得的款项基本都能专款专用，专项核算。支出与融资目的基本相符，如用于园区招商引资的前期开发工作，他们的回报就要看开发项目或所在区域的发展情况。那么，到底会不会带来政府负债风险呢？这要具体看平台所在区域产业布局情况、经济发展情况。防范政府负债风险隐患，控制平台过度融资：第一，要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产业布局调整相结合，让平台融资为区域产业升级转型服务。第二，政府要有高度责任心，对平台负债负责，统筹规划、加强监管、科学引导。

平台作为地方政府推动区域开发的抓手，会长期存在，其债务风险是地方经济发展晴雨表。以南京 2014 年成立的某国资平台为例，他成立的目的就是开发江北新区（尽管当时还没有获批国家新区），将高新区、浦口区和大厂等多个国资平台资源注入，成立之初资产过千亿。他发展前景、负债隐患，与江北新区发展息息相关。如果江北新区能顺利实现规划，成为南京经济发展增长极，他的负债应该不会有风险。江苏经济发展薄弱的三四线城市的确需要关注和控制平台负债，因为区域的发展可能无力支持还债。

**林学军（暨南大学）：**

对当前公债的看法：一是当前公债的快速膨胀，特别是地方政府债的扩大，主要原因是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 GDP，以投资推动经济增长。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增长转变到集约型增长。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二是公债的发行应当遵从效率的原则，即政府经常性开支的赤字不能用公债来筹资。经常性开支的赤字只能通过增加税收，减少开支来解决。政府资本性的开支，当期承担部分也必须由税收负担，只有今后分摊部分才能使用债务融资。

三是政府债务也必须控制在一定的额度，例如公债负担率（表明公债累积额占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得超过 60%；公债依存度（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财政支出有多少是依靠发行公债来实现的）不得超过 30%；公债偿债率（指当年公债的还本付息额与当年财政收入的比

例关系）不得超过 10% 等。

四是公债一般是用于公共品的，例如搞基础设施建设，如果公债用投资收益偿还，或者公营的效率高于民营，则不会造成超额负担。但是，如果公债投资亏损，公债要用增加税收偿还，或者增发货币偿还，则会造成超额负担。公债还会产生收入的再分配效应，扩大贫富差距。公债还会产生代际负担，即当代的债务由子子孙孙偿还，增加后代人的负担。因此，政府必须慎重发行公债，讲究投资的效益，避免给后代人造成沉重负担。

**孙国民（南大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关于政府负债原因讲三点：一是政绩观强化负债推增长。如果某种政绩观被误读并不断被强化，形成某种信号博弈，就会形成举国效应，就会各地一哄而起而有昙花一现之忧。

二是扩张冲动形成大规模负债。总的来看，要不是受到宏观经济形势、政策导向、地方财力支撑不够，扩张冲动就不会停止，未能很好的考虑到人口、资源、产业、城市功能及定位的匹配。当务之急，要树立正确的城市观，小而精，小而美，宜居宜业，品质之城，这些才应该是城市建管实践者应该追求的。

三是有形之手和闲不住的手辅之以财力支撑的必然。在地方财力有限，特别是经济增长趋缓，财政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各种财政金融创新手段日益浮现，需要警惕最终风险。

**楼稼平（宁波布衣）：**

未来的大概率事件是：地方政府的“债务”（投资）仍将无法遏制地增长，甚至快过 GDP 的增速；而国际信用评级机构还继续下调中国评级。而中国发生全面金融危机则无疑小概率事件。

**中国（地方）政府的特点：**

1. 地方政府就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但非子公司型的，而是分公司型的，最终的责任主体是中央政府；

2. 无论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均属无限责任，无破产之虞；

3. 拥有（行政区划内）全部的自然资源。货币发行的储备资产，事实上已不限于黄金、外汇；

4. 动员社会资源的权力极大、极强。事实上不存在征税、收费、举债、投资乃至货币发行等数量上、范围上的法律限制；

5. 有全面干预居民经济生活的能力。

地方政府债务的实质：

1. 可以实现现金回流乃至实现盈利，性质上不需要以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来偿还债务本息的政府投资项目，其因投资而生之债务，可以视为地方政府的非常规债务。这部分债务也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平台债务。

2. 但问题恰恰在于这些项目的商业前景极差，离开政府的主导与推动，根本找不到投资人，市场筹资也不可能成功。所以，为投资这类项目而举债之债，表面上是平台的，实际上就是政府的。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非常规债务项目投资还将进一步增长。

3. 目前越来越多的非常规债务项目，事实上已经成为货币投放的渠道，因为它们根本没有偿债能力。

4. 政府非常规债务的项目，原则上是无限的，最终的边界在于居民的支付能力。

正确的剥离方式：贷改拨。不过，建议“拨”的，不是资金，而是资产：凡无商业前景的以非常规债务为投资资金的项目，今后应将项目所占有的土地及相关社会资源（如许可证之类）均作为项目资产，无偿拨付予该项目机构（项目法人），同时按这些项目资产的市场评估价，贷记该机构或法人的项目资本金。然后以项目资产为抵押，向银行或社会募集部分建设资金或流动资金。

# 长江产经智库关于完善中国资本市场制度建设的九点建议

2017 年 6 月 13 日

**一、推出注册制必须以建立退出制度为前提。**

中国拥有 5000 多万家企业，为这些实体经济企业建立完善的投融资机制，直接决定着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毫无疑问，尽快推出注册制，是为企业建立和完善投融资机制的重要一环。但是审批制向注册制的改革，与其配套的退市制度、严厉惩罚的法律法规建设必须跟上。否则，不但会对已有上市公司的估值形成很大的负面冲击，同时也可能会引诱新进入的公司出现造假上市等严重问题。为此建议，先建立新进入企业与退出企业之间挂钩的制度，再建立针对资本市场的严刑峻法的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水到渠成后自然地推出注册制。

**二、建立 IPO 的企业数量、募资金额与市场指数逆向的、自动的挂钩机制。**

融资功能是证券市场的基本功能，IPO 的发行不仅不能停，而要坚持发，但发行数量和额度，应当根据市场状况和经济发展情况进行调控，进而加强预期管理，防止无节制的大规模发行对市场形成重大负面影响。

建议 IPO 发行的企业数量、募资金额与市场指数（如：上证综指、深证成指、创业板指）建立逆向自动的挂钩机制，以这种市场预期降低人为干预。市场越火爆，指数越高，IPO 发行数量和募集资金额越多；市场越低迷，指数越低，IPO 发行数量和募集金额越少。

IPO 后大股东要承担市场管理兜底责任，如果股价连续 5 个交易日低于发行价，大股东应当有义务给予增持；目前的类平准基金，应从 2015 年救市盯住指数不盯个股的策略，改变为放弃指数盯住优质个股，引导市场向价值投资方向转变。

要强化对财务造假的惩罚。对财务造假、内幕交易采取零容忍。可以实行类似驾照一样的积分制，累计扣分达到 10 分，必须退市。

**三、强化上市公司分红制度，鼓励长期投资。**

过去 A 股不分红，是为了尽快实现工业化和解决就业，从而鼓励企业进行再投资和扩大生产规模。这就是 A 股重融资轻分红的源头。随着股市功能的变迁，这种做法已经不适应新形势

的需要。切实实施强制性分红制度，要以三年为 1 个周期，上市公司的分红比例不能低于利润的 50%。同时应把减持、增发、并购等系列资本运作行为，与分红挂起钩来。鼓励上市企业分红、鼓励投资者长期持股长期投资，可与税费减免等激励措施相结合。

**四、可以考虑把每年的 IPO 指标拿出来拍卖，彻底解决大小非解禁、减持难题。**

证监会 5 月 27 日发布减持规则，只从量和时间的角度进行了限制，理论上相关股东至多只要用一年半甚至更短的时间，就可以利用政策漏洞减持完毕。应当规定，大小非减持要与上市公司的合规、业绩和分红情况进行密切挂钩。例如，达到相关要求，每年减持数额不得大于分红数额的 5 倍，大小非之间按持股比例确定每年减持数量。

解决大小非解禁的这个难题，也可以考虑把每年的 IPO 指标拿出来拍卖。谁承诺的加权平均的减持年限最长，就给谁先上市。这一机制设计办法，能有效解决减持无法控制的头痛问题。为了避免指标拍卖中的竞相报高价的弊端，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马斯金教授的理论，可以采取报价位列第二位的企业中标的办法。这样就激励了企业既不会乱报高价，也不会竞相报低价。

用这种拍卖方式去解决 IPO 后的竞相减持问题，会不会把中国的好企业都驱赶到海外上市？这需要综合考虑 A 股的相对溢价水平、监管宽严、交易费用等一系列问题后具体决定。

**五、要主要以信息披露的合规和质量为依据决定企业是否要退市。**

亏损的企业不见得非要退市。亏损的企业也有可能通过转型升级而出现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不能一出现亏损就要其退市。这是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尤其是早起成长的重要举措。

要鼓励而不是限制优势企业兼并重组劣势企业，鼓励因并购重组目的定向增发，且不排斥借壳重组，在这些手段都无法实施的情况下，对连续亏损的企业该退市坚决退市。

退市制度的设计，不是保证业绩好的公司留下，业绩差的退出，而是要依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把信息披露质量低、不合规的企业赶出资本市场，让市场信息在公司和投资者之间对称起来，让不同质量的企业卖出不同的价格。

对 IPO 企业信息的披露，要更充分更严格。对近三年财务信息披露的规定要予以调整，如延长并扩展至企业成立以来的重大经营决策信息。对违规的，欺骗股民的假信息从重惩处。

**六、从 ST 股退市改革着手建设退市制度。**

虽然，目前我们上市公司数量与美国相差不大，但美国上市公司的进退，早已实现正常化。这是美国股市长牛的基础。重塑中国证券市场的生态，加快完善退市制度，已经成为各界紧密关注的、非常迫切的问题。

退市制度改革可以从阻力最小的地方开始，从 ST 股退市改革着手，取消 ST 制度。现行的 ST 制度不仅没有起到风险警示作用，反而无形中助长投机。对于现有存量 ST 股，出于社会稳

定的需要，建议继续按老办法处理；对于新的连续亏损或财务造假的上市公司，建议直接退到新三板市场。这对广大散户投资者既是一种风险教育，也是一种保护。

股票退市可以借鉴股票公开评级并标注。如可以把股票按照估值盈利能力之类分为 ABCD, C 类可以理解为高风险类，警示类，可能存在较高退市的可能性，将即将退市调入 D 类，然后让所有交易者签署承诺书，承诺买入 CD 类风险自负。同时也尽可能对退市股民给一定补偿。每季度调整一次，提供虚假信息的直接调入 D 类，退市后可以在新三板或地府区域股权交易中心挂牌交易。

同时，要研究退市回购制度，公司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要承担主要责任，让大股东的回购价与发行价挂钩，公司实际控制人在经营上市过程中，涉及造假欺诈等，可以通过罚没资产补偿投资者。同时，也可以建立退市保险基金给予投资者一定的补偿。

**七、以严刑峻法加强证券市场基础设施建设。**

对于会所、律所、市场评估评级机构、专业研究机构等第三方机构一方面要严刑峻法，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对券商、基金公司、资管公司等持牌机构要进一步规范和引导。对新型市场主体比如私募基金、财富管理机构等，要参照国际惯例采取差别化的监管政策。大力引进国际大型投资机构，优化市场的投资者结构和投资理念。对各类国有主体参与市场的行为制定相应的游戏规则等。

**八、监管政策必须长期保持中性，严守监管边界。**

为了给市场创造良好的预期，日常监管政策必须长期保持中性，监管尺度坚持长期不变，不能一时宽松，一时严管，避免资本市场因监管尺度变化而大幅波动。相关法律法规的建立，不要搞朝令夕改和半夜鸡叫，也不要因为市场的波动而随意修改游戏规则。

当前监管的重点，在非常具体的交易细节上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在对市场水平的调节上动用了大量的资源。如现在对于市场短期波动大于 3% 都有大数据监控，对于什么行为构成市场操纵，并无严格的量化标准，随意性比较大。其实，没有必要在市场价格水平的调控上耗费过多的监管资源。价格和指数由市场交易主体共同确定，不是监管的取向和重点。

监管者也要严守监管的边界。监管的归监管，市场的归市场。现在国家队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严重损害了市场的公平公正。国家队的存在主要目的是改变预期，还有在危机时刻作为最后的投资人，就像央行是最后的贷款人一样。在非常的危机时刻，国家队存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改变市场参与者的预期，稳定市场运行，所以国家队的操作必须基于规则，不能像现在一样，国家队与机构、散户成为对手盘，变成大玩家。国家队因为有无可比拟的资金优势、信息优势和政策优势，经常性的在市场上高抛低吸割韭菜，损害了市场的公平。

**九、借鉴集团诉讼机制，发挥民间索赔的监督作用。**

集团诉讼是对证券市场进行宽进严管的核心武器，是防止和解决股市欺诈的问题的很重要的手段，被称为“二十世纪程序法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它能极大地降低受害者之间的组织和协调成本，只要有一人出面，就可能代表众多“沉默的大多数”打官司，其对上市公司及其董监高的违法行为有着不可替代的威慑力。

例如，美国联邦民事诉讼条例认为，公开发行的证券，涉及的是公众投资者，一旦出现证券欺诈行为，可由联邦民事诉讼条例来管辖，即任何一个投资者，均可聘请律师代表其他投资者启动集体诉讼程序。这意味着如果上市公司发生欺诈行为，那么只要通过一个人打胜了官司，利益就归所有股民共享，打败了甚至诉讼费都不需要出。由于打赢了官司的和解费的 30% 左右，都归律师所有，因此很多律师会主动承揽这类诉讼。显然，这种制度充分地发挥了民间索赔和民间机构对证券市场的监督作用。

中国的证券市场当前正迫切需要这种威慑力。我国证券市场多为小额投资者，证券欺诈所涉及的股东可能动辄成千上万，现行的共同诉讼与代表人诉讼制度根本无法达到便捷、高效地解决证券纠纷问题，对在资本市场贯彻法治精神，对促进证券市场良性发展极为不利。集团诉讼因其制度优势，能够包容人数众多且不确定的诉讼形式，应该成为证券欺诈案件审理方式的必要选择。我们可以综合运用行政监管、民事责任追究、刑事诉讼等措施，建立资本市场完善的责任追究机制。在行政监管之外，强化民事责任追究，建立支持中小投资者的起诉调查赔偿机制和事后追究机制，让市场中弄虚作假者承担巨额赔偿民事责任，同时要结合法治手段，对违法行为给予严惩。

# 飞地经济的发展：定位、动力与协调

2017 年 6 月 26 日

**编者按：**本周，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邀请南京师范大学于明超副教授组织群内专家、学者们，针对“飞地经济的发展：定位、动力与协调”这一主题展开讨论。

**飞地经济的发展：定位、动力与协调**

**刘志彪（长江产经智库）：**

飞地经济是我国大国经济发展背景下，在区域发展非均衡的前提下，寻求发展的回旋余地和整体发展优势的一个特殊问题。

飞地经济，我定义它是指两个不同的行政区打破行政区划限制，以生产要素的互补和高效率利用为直接目的，在特定区域合作建设开发各种经济、产业园区，通过规划、建设、管理和利益分配等合作和协调机制，实现互利共赢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这个定义的第一句，指出了行政区划是限制地区间产业转移、产业合作的主要障碍。行政区划代表了不同的、边界清晰的行政区的利益。产业在地区的流动，往往会影响区内居民的就业、政府税收等实在的利益，因此经济相对发达一方的地方政府，对产业转移缺乏兴趣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阻扰企业流向欠发达地区，就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出于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行为。尤其是在中国转轨经济背景下，地方政府较多地干预市场和微观经济活动，因此产业自由转移的人为障碍还是比较多的。现有发展格局中的一些飞地经济，因为这些内在的原因，成长过程也不是非常的顺利。显然，这种产业在地区之间的转移障碍，会极大地影响地区间的一体化发展、均衡发展和缩小地区发展差距。这是最近八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支持“飞地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的体制机制背景。

这个定义的第二句，指出了一种与“反产业转移”的行政化力量相对冲的市场力量，这就是在两个不同的行政区，虽然双方可能都不会愿意把自己的产业转移到对方的领地，但是如果可以实现要素的互补和更高效率的使用，那么在一定的激励机制设计下，它们之间是有可能进行产业转移合作的。这种要素在地区间的流动，表现为现实的经济增长潜力的发挥。如一方是发达地区，当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出现了“过密效应”，土地匮缺，劳动价格飙升过快，环境承载能力下降等，这时就有寻求发展新空间的内在需求。而另一方可能虽然是欠发达地区，匮缺的是资金、技术、管理和项目，但是它却恰好具有这个发达地区正在寻求的比较优势，它们之间就可能在市场利益的基础上达成对要素的均衡利用协定，从而把双方的比较优势转化为

竞争优势。

这个定义的第三句，说的是在特定区域（应该主要是在欠发达地区）合作建设开发各类产业、经济园区，通过规划、建设、管理和利益分配等合作和协调机制，实现互利共赢，是推进飞地经济发展的主要形式、内容和机制。国家八部委联合发布的指导意见，主要内容就是对鼓励这种飞地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合作机制、统计口径和方法等问题做出清晰的政策规范。其中，合作的机制设计问题最为重要，它是直接关系飞地经济能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对飞地经济，不要做太狭义的理解。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的行政主体之间建设的合作开发区，都是飞地经济。如果涉及开放经济，与外国政府合作建设的开发区，也是飞地经济。

飞地经济成功抑或失败的经验教训：双方政府之间有强烈的发展愿望；地区之间可以产生资源、要素互补优势；不能是飞出地殖民模式，也不能是飞入地肉包子打狗模式；建立起讨价还价的、利益均衡的合作机制，不能仅仅是政治任务；上级政府的激励机制到位，如给飞地经济创造政策的“洼地效应”，或不给钱，但是要给制度创新的特权或优先权。

**陈 柳（江苏省社科院）：**

八部委主要鼓励江浙沪东部沿海地区以飞地经济的方式对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区域之间的优惠政策比拼、恶性竞争。对西部地区来讲，可以减少不应该有的、超出限度的企业优惠政策；对东部地区来讲，部分不太愿意被转移的产业也可以尝试转移到中西部。如果当时昆山与重庆合搞一个笔记本产业的飞地经济，那对双方都大有裨益。

**高春亮（南京财经大学）：**

个人认为飞地经济的发展方式应该有两类，一类是大企业主导布局，一类是招商。第一类跨省市没啥难度，比如富士康，另一类是大家招商但集中在一处园区，这个成功的少，中西部合作起来难。我不大主张以发达带动落后的方式做。发达地区帮着落后地区建立园区后，企业会去吗?

我总结大家的疑惑：1. 园区合作容易，但企业的微观区位决策如何响应？ 2. 东中西协调，以园区入手，也算合理，但大规模产业转移已经结束，在去产能背景下，是否冲突?

飞地经济是城市经济溢出效果，是城市向外辐射的具体表现。所辐射产业仍然高度依赖原城市产业链。其核心是企业基于成本收益的再一次区位选择。如果力图建设大尺度空间范围的飞地，区位应当是沿边沿海，所转移也是钢铁石化等国企。其它产业不一定按政府要求去做，至于分成等制度问题不难解决。

**何 雨（江苏省社科院）：**

飞地，是连接不同发展水平地区，推动区域经济再平衡的一个创新性举措，是两个地区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桥梁与载体。飞地经济的关键，是能够“飞得起来，落得下去”。核心是

梳理好双方的优势与利益诉求。发达地区的优势在于技术、管理与资本，而落后地区的优势在于劳工、市场与要素成本。合作，应以发挥优势为原则，以达成各方利益为动力。发达地区的利益，是过剩资本与产能转移，而落后地区的利益在于就业与税收。故，我认为，设立的飞地，应该具有区域政策特区的属性。由发达地区承担主导作用，负责飞地的定位，布局与核心管理，而落后地区主要为飞地提供后勤保障，参与税收分成，满足就业。这样，才能调动双方积极性，发挥各自优势，把飞地打造为落后地区增长极。

江苏园区经济南北合作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飞得起来，落不下去”。根源就是利益分成机制出现问题，导致双方都没有足够的动力与积极性。

飞地，就是一个增长极。如何把极做大做强，是主要目标。与其他极不同地方在于，飞地极是两个发展水平、区域文化与治理理念相差甚大地区间的合作，是外生性推力。走出落后陷阱的关键，就是直接跨国陷阱。千万不要两个政府争主导，只有发达地区主导，才能强势破局。采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原则：所有权归落后地区，经营权归发达地区，并保证经营权三十年不变。此前飞地的失败在于利益分配畸形，是此前飞地的症结所在。无法在这一点上突破，飞地经济，就会变成飞地不经济。

**司增绰（江苏师大）：**

如果完全是市场行为、企业行为，就不能算飞地经济了。飞地经济合作可以考虑多种模式，区域差异小的可以用合作模式，大的可以采用租地模式，中西部地方政府把土地租借给东部地区政府，或许还有其他模式。但这都是政府主导下的。

**赖红波（上海理工大学）：**

作为一种跨越空间合作模式，跨区域合作一直都是存在的。现阶段飞地经济如何超过 90 年代的模式，打造升级版的区域合作和创新的新模式才更有意义。

**于春晖（人民日报）：**

我理解，发展飞地经济，是经济的区域化发展需要克服区域行政体制的制约，在小范围内探索如何适应经济区域化、一体化发展要求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及相关配套改革。其中，“飞地”指跨越行政区域但经济区域联系较紧密、经济发展基础、水平接近，相互合作发展空间大，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发展质量效益。本质上是在尊重市场力量基础上形成内生经济合力，而不是借助行政力量的传帮带。

产业转移是渐进的，试图跨越大的发展差距实现产业转移不如顺应经济区域化逐渐转移更有效，在产业转移渐次推进过程中实现协调发展，不适合采用类似灾后重建的对口帮扶机制。

**邵 军（长江产经智库特约研究员）：**

飞地，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有不同的意义和侧重点。我觉得当前中国推动发达地区到欠发达地区以飞地形式合作，主要是改变观念和提高行政效率，所以飞地开发区领导班子要由发达地区配备并指挥，除极少数必须属地的权力外，最大限度减少当地干预，方能有效。

**伏玉林（华东理工大学）：**

“飞地经济”旨在打破原有体制约束、促进资源的跨空间配置。省内飞地经济有不少的经验模式值得总结，如广东和江苏的经验；省际的也有一些如上海—盐城的合作模式（上海正在对口支持贵州遵义）等。飞地经济是采用市场机制、突破大一统体制、促进区域联动发展的模式之一，飞地经济比原有的对口支援更进一步，更强调市场功能发挥，是以利益共赢为纽带的合作。

我甚至认为振兴东北经济也应该采取市场机制促进区域经济合作来搞，关键是放权搞活。地方互惠发展是打破大一统的关键。最糟糕的就是既希望通过飞地经济模式促进区域合作，同时又有一只强有力的手来干预市场以实现政策的目标。

**杨 锐（苏州大学）：**

在城市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里，飞地经济既不能带动落后地区的发展，也不能帮助原地区的发展。飞地经济倒是可以和异地空间网络协同制造结合起来，要整就整最前沿的模式。既要保持与原地的产业联系，又要与飞入地产业有千丝万缕联系，双方企业都能从产业联系中获得好处。

飞地经济和大数据、智能化制造等结合起来，或许有可能找到思路。把企业价值链中的一些环节分离出去，集体打包到一个地方，再通过大数据，来协同生产体系。既能发展大数据，又能促进价值链创新。

**宋文阁（江苏省国资委）：**

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下，传统的围绕土地要素做文章的模式或许困难重重。无论什么合作模式、无论什么产业园形式、无论什么政府主导，生产的各要素成本基本上可控，基本上透明，核心要素基本上没有竞争力。个人认为飞地经济仅是过渡紧急措施，不可能在全国全球全面开花生根，或许昙花一现。

**孙 军（淮海工学院）：**

若飞地经济与普通的基于企业市场行为的产业转移相比没有太多优势，那基于飞地的产业转移意义何在？我感觉要解决该问题，一是中央要放权，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权力，譬如税收

等优惠措施；二是对于有区域销售壁垒的生产终端产品的企业应该有一定的作用，对于生产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企业作用不大；三是从生态环保层面上，国家出台政策，要求某些污染企业要在更大规模上集聚，降低污染，这会为具有区域或集聚优势的飞地带来机会；四是飞地经济或许更适合国际间合作，当然要注意规避其中的风险。

**方向阳（中国财政杂志社）：**

提出飞地经济还是在想弯道超车，针对的是制造业的集聚和发展。但放在互联网化时代和促进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角度，用换道超车的视角审视，由发改委牵头的这个八部委员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思路又会碰上更多新的问题。

**孙国民（南大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要重视产业集聚区建设，特别是可以探索“飞地经济”建设。当前，我国很多地方在推进都市圈经济发展，如南京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合肥都市圈、长三角都市圈等，这是开始飞地经济的重要机遇，如浙江诸暨市正在实施“北承南接”战略，这也是周边市在诸暨发展“飞地经济”的重要机遇和战略选择，比如在次坞、店口临杭产业园以及安华诸义产业自由港开展“飞地经济”建设，也将是有益探索。

飞地经济的难点：一是税收收入归属问题；二是 GDP 统计的归属问题；三是土地资源供给及产业集中区建设及资金来源问题（建议 PPP 模式筹资）。

**谭江涛（三峡大学）：**

飞地经济模式有利于不同区域各级政府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的充分挖掘，避免不同区域之间的恶性竞争，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实现相同行业企业在特定区域的充分集聚，实现知识、信息、技术、人才共享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代中强（集美大学）：**

飞地经济的外溢效应究竟有多大，是否进入的企业只是利用其优惠政策将低端的生产环节引入，如果这样，短期是可以创汇，一定程度上解决就业，但长期由于缺乏外溢效应，资源错配的扭曲效应可能会反噬短期的经济效益。

政府政策制定者要考虑将飞地经济区与国内市场联动起来，提高其技术外溢和产业拉动效应，通过产业关联，最大程度惠及国内市场。

**杜运苏（南京财经大学）：**

新形势下飞地经济落脚点有待明确，毕竟现在招商引资，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落后地区都

越来越难。

**林学军（暨南大学）：**

建设飞地经济，实际上是加强各地资源要素禀赋的整合，打破行政区划的条块分割，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推动区域经济合作，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粤港澳就是相互利用各地的资源优势，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当时，香港的资金、技术以及先进的管理经验，与广东丰富、廉价的劳动力相结合，形成“三来一补”、“前店后厂”等合作模式。当前，在改革开放近 40 周年，2017 年 3 月 5 日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这标志着继京津冀、长江经济带之后，粤港澳大湾区正式成为又一个国家战略。粤港澳大湾区，就是一个大飞地。

飞地和“湾区”的诞生，本质上是一个区域整合的过程。粤港澳大湾区的资源如下：一是金融资源，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的首次公开招股市场，最大的离岸人民币资金中心，是区内融资、资金管理及分配的枢纽。而香港和深圳的金融及经济规模加起来，就等同伦敦或纽约两大全球性金融中心，两者合作完全可以打造亚洲的“全球性金融中心”。二是交通资源，粤港澳大湾区内有完备的海港和空港群，公路网络也十分发达。三是产业资源，“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结构也颇为优质，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港澳地区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均在 90% 左右，内地 9 市制造业基础雄厚，已形成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的产业体系。四是经济资源，粤港澳大湾区整体面积 5.6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不足 1%，占全国总人口不足 5%（6634 万人），创造了 9.34 万亿的 GDP（2016 年），占全国总量的 12.6%。包含“二区九市”的粤港澳大湾区，不仅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城市群，而且经济总量大，2016 年 GDP 规模为旧金山湾区两倍，接近纽约湾区。五是辐射资源，从地理区位来看，粤港澳大湾区是通往东南亚、南亚、中东、欧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必经之地。向东是海峡西岸经济区；向西是北部湾经济区和东南亚；向北则是湖南、江西以及广阔的中国中部城市群。形成内接腹地、面向东盟的海、陆国际大通道，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战略枢纽。因此，要努力整合粤港澳大湾区的资源，建设世界级的经济飞地。

如何去整合这些资源。应当有两个驱动力，一是政府，二是市场。政府的力量就是产业引导，政策扶持，当然各地政府之间会有竞争，哪个地方的营商环境好，企业负担轻、政府效率高，就可以多争取更多的企业和资源。要鼓励各地政府开展良性的竞争，反对以行政手段干预资源和要素的流动，干扰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市场的力量就是企业的利益驱动，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要求企业不断整合、利用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

从资源禀赋来看，港澳地区以第三产业为主，金融和高端服务发达。而广东的科技创新能力和高端制造业基础雄厚，战略纵深给予港澳充分的投资空间。香港依托珠三角，有望进一步拓展成为像英国伦敦、美国纽约一样的国际金融中心，也可以缓解当前香港面对上海的竞争压

力。如此结合，粤港澳有望形成一个以香港为核心的大珠三角金融中心圈，以深圳为核心的“硅谷”创新中心圈，和以整个区域高端制造业为基地的高端产业圈，成为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持续吸引力的大城市群。当前，粤港澳三地已经实施零关税，但三地还有边境关卡，人员、物资等要素还不能完全自由流动，三地的制度不同，货币不同，也是实施紧密合作的障碍，所以有必要逐步实施一体化的行动，促进深度融合发展，这是建立粤港澳大湾区的关键。

**刘根荣（厦门大学）：**

飞地经济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区域间产业合作需求，解决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土地、人才等稀缺要素约束。飞地经济运营模式应采取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模式，将飞地经济发展成为汇聚先进生产要素与先进管理模式的产业园区。飞地经济的具体制度安排，如园区建设规划、建设资金的来源与分摊、入驻企业可享受的优惠政策、财税的分成、GDP 的计算等都应该通过地方政府之间协商解决。

**于明超（南京师范大学）：**

1. 关于飞地经济的定位。为了满足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需要，或疏散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非核心功能”，或在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对口支援基础上形成的，近年来各地出现了许多“飞地经济”的实践探索，显著促进了欠发达地区发展，缩小了区域差距。相对于通常的招商引资或产业园区模式，飞地经济实现了“区对区”的集约化产业转移，是一种发挥土地与技术资金管理上的互补性，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协同互助机制。此次八部委联合印发文件，旨在通过顶层设计来解决飞地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制度性约束，消除存在的行政壁垒，鼓励以更具创新性的合作模式在更广泛的空间范围内，更好的发挥“飞地经济”的集聚、辐射和带动效应促进区域协同发展，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三大战略。

2. 关于飞地经济的发展动力。初期可以通过政府主导来启动“飞地经济”的发展，但只有内源性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我认为重点在于：（1）突破行政壁垒，完善成果分享机制。为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欠发达地区政府具有很强的激励进行飞地经济的合作，而发达地区官员迫于政绩考核的压力，常有“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想法。《意见》中指出在政府内部考核时，对地区生产总值等经济指标“允许合作方协商划分”，将来还需进一步明确税收分成机制、规划税款划转方式，都可为合作双方的地方政府提供激励；（2）要与飞入地产业结构相契合，发挥基于产业链合作的集聚效应。飞入地以资源优势自身支柱产业为基础，将承接转移的产业与本地产业形成上下游关系形成产业链上的合作，发挥规模经济和外部性，形成产业集群辐射和带动作用，也为产业升级和新兴增量产业发展提供基础和进一步的合作空间；（3）飞入地基础设施，推进法治化的市场营商环境。欠发达地区往往基础设施较差，可以通过创新合作模式，由合作双方根据协议商定比例合理分摊基础设施建设等投入和费用，来降低显性的成本。更主要的是，欠发达地区营商环境往往与东部地区存在较大差距，许多地方甚至存在招商引资中胡

乱承诺、随意变更的现象。建议通过地方立法的形式，改善飞入地市场营商环境、降低交易成本，使企业消除事后“套牢”的疑虑，是保障按照市场化原则和方式开展合作的基础。

3. 关于“飞地经济”合作的协调。（1）因为涉及不同行政区域的政府，地方政府间协调问题尤其重要。当“飞地经济”发展中出现问题时，省（市）内部开展的合作相对容易协调，可以通过成立省级飞地经济协调小组解决。对更高层次，可以在国家层面由发改委牵头设立跨省飞地经济园区的协调服务机构；（2）欠发达地区之间也应在更高一级上有所协调，应发挥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形成差异化的“飞地经济”合作模式，避免陷入招商引资恶性竞争的局面。

必须指出，飞地经济是一种地区间的产业转移方式，但是它又不同于一般的产业转移。主要区别有二：一是主体不同，前者的主体往往是地方政府，是其有意识的行为，而后者往往是企业按照市场原则的自动和自发行为。这一特点决定了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只要不搞拉郎配，不搞行政命令瞎指挥，飞地经济式的产业转移方式，比市场驱动型的零星转移具有更快的速度和效率。二是前者是产业集群、产业链形式的规模化产业转移，是“一个面对另一个面”的转移，而后者往往是单个企业、单个项目的零星化转移，是“一个点对另一个点”的转移。显然，发展“飞地经济”，有利于加速“飞出地”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有助于腾笼换鸟、凤凰涅槃，同时也有利于加快相对落后一方的“飞入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其总体上的作用，则是缩小地区发展的不均衡态势，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能力和现实表现。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

飞地经济本质上是一种跨区域开放合作的经济发展模式，其特征在于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借助市场机制实现要素跨区域流动和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其目标在于实现市场主导的区域协同发展和成果共享。

其一，体制改革意义。区域协同（协调）发展，一直以来受制于体制机制束缚，要素跨区域流动和资源跨区域配置效果大打折扣。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这个作用的发挥在逻辑上必须以打破行政体制机制束缚为前提。因此，发展飞地经济，突破口即在于以行政体制改革创新区域政府间合作机制。

其二，政策创新意义。此前，各省区市多有战略性框架性合作协议，但由于政策掣肘，多数协议无法执行。飞地要真正实现市场主导企业“唱戏”，先决条件是政府“搭好台”，这必然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扶持。由于涉及两地政府，相关的土地政策、税收政策、产业政策等均需要大胆突破大胆创新。

其三，实践示范意义。飞地经济事实上已进入2.0版本，探索出区域间“开放”“协调”“共享”发展的新模式新路径，是《指导意见》的应有之意。各省区市因地制宜，在实践中培育示范样板。

粤桂合作特区作为目前全国唯一横跨东西部省际流域的合作特区，其试点价值值得，基本实现了体制一体化、机制同城化、政策特区化发展。但从粤桂合作特区的运营实践看，上级政府放权不够、管理机构合作机制不完善是尤为突出的两大问题。

以体制改革推进放权，以政策创新实现落地，是实践一线取得成效的当务之急。

# 驱动产业创新升级的金融制度

2017 年 6 月 29 日

**编者按：**本周，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邀请河南大学曹玉平博士组织群内专家、学者们，针对“驱动产业创新升级的金融制度”这一主题展开讨论。

**颜银根（南京审计大学）：**

产业创新升级，牵涉最多的两类企业是：（1）处于技术前段的企业（未来型）；（2）处于技术末端的企业（落后淘汰型）。针对这两类企业，金融制度需要区分对待：对于未来型，鼓励风投进入，政府牵线搭桥，企业评估对接；对于淘汰型，应由市场来决定，政府不主动干预。

考虑到企业转型升级有一定周期，政府应当及时了解本地企业运作及创新情况，此外通过增加覆盖面让更多创新企业有融资渠道、把关监管保护投资者权益，并在一定时期对某类企业给予重点关注和支持。

**曹玉平（河南大学）：**

现有文献通常将金融结构分为银行主导和市场主导两类，并认为前者适宜于不确定性程度低的模仿创新，后者有利于不确定程度高的颠覆性创新。其实，从金融安排与创新类型间风险、收益的匹配性上看，将金融结构划分为债务型和资本权益型更有相关性。以还本付息、稳健审慎经营为特征的债务型金融契合于低风险低收益的非前沿创新，而风险资本、股市等权益型金融可以为前沿创新服务。此外，与银行内化集中风险相比，债券市场更能利用散落的信息并分散风险，所以更有利于支持前沿创新。适宜的金融结构取决于经济发展阶段和技术创新类型，我国要完成从要素、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其关键在于实现从远离前沿的复制模仿创新向准前沿、前沿的革命性创新突破，在此过程中金融结构动态演进以匹配创新类型转换的需要是不可或缺的一环。由于追赶经济体也会有少量前沿创新；前沿创新经济体也需要进行产业化。所以，债务金融和权益金融都无绝对的压倒性优势，而是存在一个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多元配合比例。此外，由于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程度的演变，政府主导金融在模仿创新阶段通过事前筛选可以大有作为，而前沿创新必须让位于良序市场的事后淘汰，否则会适得其反。

科尔奈（2003）发现全世界自 1917 年以来的 111 项革命性创新，85% 产生于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的美国。但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只是一个外在宏观表征，只是驱动革命性创新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同时对制度、法规有更高的要求（一般认为只有普通法系才有利于建立市场主导型的金融结构），所以中国要向驱动创新的金融结构转型，制度、法制的完善是根本。

中国金融体系的现状是大银行主导的债务型金融结构，债券市场上政府、国企债占了较高比例，股市从场内市场到场外市场呈现不利于“双创”的倒金字塔结构，风险资本市场上有很多政府主导的创业基金，且不管银行、债券还是股市都倾向于将金融资源导向国企，这会导致严重的预算软约束和基本激励机制缺失问题；使真正的前沿创新活动难以获得金融支持而失败项目缺失事后淘汰机制。总之，我国目前的金融结构现状与驱动创新所需的适宜金融结构间存在着很大的缺口。增加资本权益性金融比例，并优化债务、权益型金融的内部构成、资金来源和去向、运行效率等，让各类创新创业主体凭借自身实力获得公平的金融支持和市场竞争机会才能促进我国经济创新转型。

**邵 军（长江产经智库特聘研究员）：**

关于金融支持创新，从我国目前情况看，我认为不是缺少工具，而是缺少人才及由合适人才构成的有效组织和机制。从风投，到创业板，到 P2P，主要的问题是运行成功的少。通俗地讲，现在不缺钱，缺少的是拿了钱能办成事的人，缺少的是能将钱与能办事的人组合起来的人。我的建议是，要大力培育具有复合知识结构的投资团队。

**杨 锐（苏州大学）：**

由于金融体系包含主体较多，可以从风险投资者的类型与创新类型关联起来。

**周彩霞（南京理工大学）：**

合理的金融结构应该与产业结构相适应。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适宜于传统制造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银行经营强调安全性，不可能将资金投向不确定性太大的创新产业；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则因为资本市场工具创新、分散风险的功能更能满足新兴产业的融资需求。从早年的工业革命到最近的信息技术发展带动的新经济发展，产业创新升级与金融制度变革都是相辅相成的，金融制度不可能脱离产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发展，没有金融的支持，产业转型升级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中国各省在地理位置、资源条件、比较优势等方面有很大差别，各省市间主导的金融制度也应该是存在差异的。沿海经济发达省份积极探索与新产业业态相适应的融资方式，金融监管部门的任务是为之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而非动辄直接干预；对于那些相对落后的省份，还是应该以银行融资为主导，强化风险管理，决不能盲目推动金融创新。

**柯 杰（正善资本）：**

1. 从理论与实践上看，由要素驱动型经济向创新驱动型经济转型，应大力发展直接融资，这个阶段的创新企业更需要这类资金。

2. 中国现有金融制度与驱动产业创新升级所需的金融制度不匹配，银行、政府基金偏保守，

体制上赚了钱享受不到投资红利，机制上亏了钱承担责任。

3. 大力发展天使、VC 基金，政府出台相关引导基金，并实施风险补偿机制。但要严格明确投资行业方向、阶段，做好投后监管。

**孙 军（淮海工学院）：**

金融对于产业的创新升级必不可少，这一方面体现为离开金融这一血液的流动和支持，产业创新升级不可能存在；另一方面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不能持续，产业转型会面临失败；再次体现为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匹配性。

当一个经济体面临转型时，也恰恰是经济衰退和萧条期。国家层面为了经济的平稳，通常会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加以维持，这种凯恩斯式的需求管理会带来两个后果：（1）延缓经济体除旧换新的步伐；（2）大量的货币进入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虚拟经济中，阻碍产业创新升级。

为了化解上述困境并推动产业创新升级，需要做好以下方面：（1）在经济衰退期，国家应该加大降税减费的力度，支持实体振兴；通过提高环保标准和大规模技术改造化解低端产能过剩的局面；通过负面清单制度，逐步扩大民间资本进入的行业门类，引导金融资本逐步进入，推动产业创新升级。（2）坚决抑制房地产行业的过度投机局面，这一方面可以通过增加土地供给来实现，另一方面为居民提供更多的理财机会。（3）大力发展股票、债券等资本市场，进一步放开民间资本兴办和进入银行等传统金融的壁垒，为产业的创新发展提供血液。这地方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政府部门在持续 IPO 的同时，要让 IPO 定价逐步市场化并强化退出机制建设。另外，对于各类金融行业，政府部门要强化监管举措，不做运动员，只做裁判员。

**杨平宇（温州商学院）：**

目前存在这种现象，有些地方产业扶持基金主要由政府行政官员负责经营，无相关专业知识，缺少相关专业支持，因此制约了金融对企业创新升级效果。

**金心异（深圳独立学者）：**

深圳最早认识到科技创新的关键力量，既不是政府，也不是科研人员和机构，甚至不是企业家，而是创新金融，关键点是金融资本解决了科技创新的风险承担问题。

任何科技创新皆高风险，但也有潜在的高收益。谁来化解科技创新的风险，从而使得科技创新获得足够的激励？风险投资（VC）是解决此一问题的最好风险对冲机制。VC 制度事实上是美国硅谷成功的关键要素之一，它通过专业的项目筛选团队，先最大限度地降低研发的投资风险，之后再通过众多项目的投资组合对冲掉一部分风险。在 VC 投资中起最关键作用的是所谓“大拇指定律”，VC 所投 10 个项目中，往往只有两三个最终获得上市融资，而为 VC 赚来

最多钱的只是 10 个中的一个，但这一个就可以把 10 个项目的平均利润率拉升到了可观的水平，从而最终有效地对冲掉了投资风险。

**陈心颖（福建省委党校）：**

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系结构，加之银行当前严厉的贷款追责约束，银行具有向国有企业贷款的偏好。而轻资产高风险的创新型中小企业缺乏足够的筹码获取银行的贷款。因此，大力发展债券市场是产业转型升级获取金融支持的重要路径之一。

**王世文（苏州科技大学）：**

金融机构服务科技创新的意愿并非不强，这关系到当下与未来市场竞争能力的强弱。和当年乡镇企业发展阶段相同，哪些金融机构服务经济主体乡镇企业的能力有实效，这些金融机构就能快速发展，这也是苏州不同于其他地区，农行能位居四大行之首的重要原因。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已成为经济新常态阶段的发展动力，金融机构对此关注度已可谓空前之高；难点在于外部制度滞后时代要求，内部技术与管理创新能力不足，此外人才的缺乏也是根本制约。

**陈爱贞（厦门大学）：**

世界上主要依靠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应该只有美国，欧洲、日本的创新金融支撑也主要来自银行。中国创新的金融支撑也只能主要来自银行，资本市场更主要是一个金融支撑的一部分。因此除了完善发展资本市场，发展民营银行应该是重中之重！

**刘志彪（长江产经智库）：**

现在我们对现代金融体系有很多的误解和错判，有人甚至到现在都认为资本市场就是赌场。其实，对资本市场的认识也是随着发展而深化的。最初人们是把它当作解决股份制后资本流动性的场所和工具，然后把它当作反映经济运行的晴雨表，当作现代股份制企业的融资渠道。在当代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其实早已把资本市场作为驱动产业创新升级、产业结构调整的最有效工具。

中国经济的实践一再表明，发展市场经济不能光要有货币市场，更要有发达的资本市场。发达的资本市场建设，关键在于法治体系建设。对于现阶段的中国经济来说，其中最重要的是对投资者的保护制度必须放在与融资同等甚至更为重要的地位。否则，中国资本市场将长期低迷和衰退，与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完全错配。从根本上说，如果没有建立起发达的资本市场，我们不能断言中国已经真正进入到了现代市场经济体制。

过去，我们主要依靠以借贷关系为特征的货币市场融资，而不是主要依靠以权益关系为特征的资本市场融资。这一现状的不断自我强化，是形成现阶段我国实体经济企业债台高筑、产业空心化、虚实经济关系严重失衡的主要原因。

大力振兴资本市场、创新直接融资体系，不仅是解决或者摆脱现阶段我国经济困境、化解中国经济风险的最为关键的一个狠招，而且是支持创新经济发展的最有效工具。撒切尔夫人在对比美欧创新发展差异时曾经说过，欧洲技术创新之所以不如美国，是因为欧洲缺乏像美国那样的纳斯达克市场。据此也可以说，只有资本市场振兴，中国的实体经济企业才可以实现低成本融资，才可以通过它来支持创新经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基本上是高风险性的，不能仅仅依靠银行融资。只有通过有市场约束的风险资金投入，才能真正解决创新经济发展的融资、投资需求，才能缓解日趋严重的资产荒，均衡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严重失衡态势。

**岳中刚（南京邮电大学）：**

国家应该支持互联网金融创新，特别是众筹发展，有利于创业创新。一是众筹以预售方式为小微企业提供初始资金；二是众筹模式可以为创业企业测试消费者类型与市场规模；三是众筹出资者也是消费者，也可以提供消费反馈、产品创意和完善建议。

**单豪杰**

建设一个法治化、市场化、国际化的稳健和完善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即可。

**王建国（日本中京大学）：**

日本的金融对创新的支撑力度明显不如美国，这主要是银行的风险偏好与创新资金的风险偏好有着明显的差异。在高储蓄率的日本，银行的风险几乎牵涉每家每户的生计，所以政府不希望银行从事高风险融资活动。就目前中国的现状来说，各地政府通过土地财政，通过各种杠杆确实握有很多资源，各地官员也愿意在扶持创新企业方面有所作为。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利用好这些资源，我们可以设计一个什么样的机制让这些资源真正有的放矢地起到有效的作用呢?

我觉得应该引起大家注意的问题是，政府出钱招商的弊病。近年来，许多地方政府纷纷建立科技新城、创业园等，以政府奖励的方式（财政支出）招徕“创新企业”落户。其实，很多地方招徕到了很多空手套白狼的创业者，这显然是因为评估者或审批者不需要对投资效果负责任所致。本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始于通过积极导入市场机制而减少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但历史好像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地。在创新投资这一块，政府唱起了主角，其效率之低，可想而知。

我看到还有一个问题是政府以财政补贴申报专利各种费用的方法可能引起虚假专利的增多。因为对于申报者来说，多一份专利就多一份话语权，对于专利事务所来说，申报成功一份就可以得到一笔业务费。结果这类申报成功的专利，其有效性和经济价值都会有问题。

我考虑过参照日本政府对私立大学管理方式的一种机制设计是政府投入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方法。比如，政府不直接对高新创新项目进行评估，而是参与民间资本对高新创新项目的投资过程。这样一来，既调动了民间资本对高新创新项目投资的积极性，也可以压缩权力寻租的

温床。

**张建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创新活动的多样性要求金融制度供给的多样性，不同国家以及一个国家处于不同的创新阶段，对制度供给的要求也不一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制度结构的演变与创新活动结构的演变，大体上看是一致的。在近 40 年中的大多数时间里，我国的技术创新都是以引进为主，由于这类创新的不确定性低，支持这些创新的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和自筹。近几年，对自主创新的要求越来越多，政府的研发支出强度趋于加大；同时，随着企业创新的活跃，风险投资支持创新的比重提高的也很快。

着眼于未来看，要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目标，就要构建一个满足以企业创新为主体的金融制度结构。相应的改革有：保证一个健康发展的股票市场，使创新企业低成本和便捷的获得直接融资；建立一个与产学研合作创新体系匹配的融资支持制度；公共研发机构（包括高校和科研院所）要转向关键共性的研发项目，把这些机构中长期从事的那些短小的应用研发项目交给企业，从而使得政府的一部分资金转而支持企业的创新。

**黄志军（南京大学）：**

在良性资本市场，金融产品的创新应该对应到实体经济产业部门的创新，国外的金融创新基本对应于新兴产业部门的兴起。但是当前我国金融体制效率传导机制的不畅，其根源在于：一是我国由于资本的稀缺性，特别是民营企业面临多种层面的金融制度约束；二是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由于创新不足、产品低端，对市场没有掌控力，进而对金融资本没有多少吸引力；三是国有企业规模庞大，集聚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和高端物质要素，由于激励机制的扭曲，一方面这些人并不存在创新的激励，另一方面，效率传导机制的扭曲约束了他们创新行为的实际效果，再者，其对民营企业造成挤出效应；四是中国的高校创新体系的异化和扭曲，缺乏原创性研发、做优质产品的精神和严谨的工匠精神。五是银行体系承担太多的社会和政府行政职能，导致过多的信贷资金配置扭曲，价格信号机制极度偏离。

**王 丰（江苏东鋆科技）：**

现阶段德国的产业创新金融是以银行、普通商业贷款和资本市场投资等为主体向风险投资公司投入长期信贷，通过与创投合作支持科技园和企业孵化器建设的途径，依靠国家层面对侵犯专利的予以严惩等为保障，来支持有科学发明专利的小企业发展的机制。

对发明专利的保护力度，和创新型经济的发展程度，明显呈正比。对发明专利不加以保护，企业对产品开发的投入将越来越少，创新金融的发展也就无从谈起。因此，未来政府对专利和知识产业严格保护的态度要摆明，监管也要严厉。

**高春亮（南京财经大学）：**

在中国仍有明确模仿对象的前提下，一是明确产业技术创新领域，二是政府设平台，三是上下游相关公司出资，四是技术共享。

**翟太煌（山西证券）：**

1 政策扶持直接融资：正如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银行，产业创新升级对应的政策性银行——创新银行也应该有。或对经济某一领域的扶持，或对同一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扶持。

2 市场与政策相结合：在交易所市场、新三板或中间层市场，以及区域股权交易中心市场，等三个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中，分别创设对应的“产业创新升级板”，疏通直接融资管道。

3 针对产业创新升级的投融资活动链条，分门别类对税收（包括个人所得税）、成本（利息）、人才等出台优惠政策。

在当下中国，产业创新升级必须上升为国家战略，针对不同区域的政策也应有所区别。

**孟 楠（徽银南京）：**

现阶段，银行信贷方面，自然是政府融资平台类最没风险也占比最大，民营企业风险最大，占比低；银行对专利，知识产权等几乎没有产品支持，且由于风险大，银行对小企业融资理论上是不支持的。因此，银监局如果在尽职免责方面多做些推动措施，应该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楼稼平（宁波布衣）：**

1. 我总觉得，如果某种金融制度不能容忍平庸的企业平安地生存于某个产业的话，那么对这种金融制度实在是寄托不了什么崇高的期望的，遑论创新、升级。

2. 能够容忍平庸的金融制度，活动于其中的大多数金融机构也会是平庸的，他们更多地关注借款企业或融资项目的安全、流动性和报酬之间的均衡。假如大多数的金融机构受制度的诱惑或逼迫，整天考虑的是如何驱动产业创新升级，就会将安全、流动性和报酬之间的关系置于一种走钢丝的状态，那是不行的。

3. 比起产业企业的市场化程度，我国的金融企业的市场化程度恐怕更低。这几年，银行或投资公司为什么更乐意向国企、央企和政府融资平台提供金融服务？耐人寻味。

**叶 蓁（人民银行）：**

驱动产业创新升级的金融制度这个问题似乎没有很好界定金融制度概念，因此我赞同“建设一个法治化、市场化、国际化的稳健和完善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即可”看法 。

银行或金融机构与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也是不利于创新活动的，如日本搞银团财阀，

消除信息不对称，但腐败问题严重；美国搞多层次资本市场，但有法律法治保障市场运行，并没有大型国企造成扭曲。

**林学军（暨南大学）：**

我认为，现在的金融制度对创新的扶持是不够的，最大的表现是贷款资金往往热衷锦上添花，而风险投资资金也并非支持初创企业，因此，创新企业往往面临初创时期的资金饥渴。

如何加强金融对创新的支持。一是要培养大批懂金融又懂科技的复合人才，由他们来经营管理风险投资基金，支持科技创新的发展。二是加强政府的引导，明确创新发展的方向，通过资金扶持支持符合产业政策的创新企业发展。三是要加强金融与创新的融合，如金融与创新融合的制度等，定期召开科技成果推介会、科技成果产业化洽谈会、专利交易会等等，打造资金供给与需求的沟通平台。

**张 磊：**

个人认为围绕3个问题解决：（1）二级市场并购，资源需要可竞争的寡头来整合才有配置效率；（2）创业和风险投资，培育足够的并购标的；以上主要涉及批发金融；（3）用云计算和大数据改造现有金融机构，适应金融零售化趋势。

**姜彩楼（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西方有一个里斯本会议，大致的意思是目前技术供给很强，但是要加强技术扩散，这就需要加强需求侧动力引导新技术扩散，一批学者研究需求侧创新政策。一个思路是加强政府采购创新。他们把创新分成6个阶段，认为在新产品进入商业化阶段时，加强需求引导效果是最好的。国内目前是技术供给不强，需求也不强。60%以上的企业无研发活动。

**曹东坡（东方邦信）：**

目前做中小企业融资的，有三个特征：（1）银行类金融机构，上报监管的数据虽体现出对中小企业融资规模持续增长，但许多是虚假的中小企业融资；（2）如小贷公司等对接融资的机构，虽然可能更容易对接中小企业，但其面临着严苛的杠杆率和较高的税负等约束，对中小企业所起的实际支持有限，特别是国内一些仿照格莱珉思路的贷款公司更是可持续性存疑；（3）一些互联网金融机构等，往往拿中小企业当幌子，从事其他高利润套利活动。究其原因：（1）中小企业风险难以把控，面向创新创业型企业的债权融资风险更集中，机构对此类业务的专业性也不足；（2）当前信贷模式受监管约束较多；（3）尽管面向中小企业融资有一些优惠政策，但并不足以弥补金融机构的机会成本。解决这些问题，制度方面需要在政策方面多听取金融机构反馈的意见，并做出有效的调整；建设好统一完善的征信体系，对于投贷联动等能够支持中小企业创新的新模式加大探索和推广力度。

**张慕濒（华东师范大学）：**

目前尚不知适合中国产业创新升级的金融制度应该是怎样，但确实存在一些困惑需要思考。例如：（1）在信息化、管理扁平化的时代，监管上越来越多的“一刀切”以及银行一直以来的纵向管理体制是否会造成区域金融发展的差异？（2）由于处于制度建设进程中，目前的金融制度又有许多可以人为调整的地方，导致各地在解读和执行金融制度时地方政府的长官意志成为特别的影响因子。这样一来是否会造成同样的制度在一些地方被用活了，在一些地方不一定得到推广和支持？（3）任何一个产业都离不开金融的辅助，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国家既然存在渐进的产业创新升级，则已经形成了与之相符的金融制度。但从两者关系来看，似乎先有产业创新升级才有金融制度安排的需求，所以，倒过来先谈驱动产业创新升级的金融制度安排，对有着自身发展规律的产业创新升级而言，能否适合、匹配？（4）由此，驱动产业创新升级的金融安排必然要在放宽管制 + 加快市场化法治化与利用地方长官意志之间寻求平衡或双赢，不知道会是什么状况？

**沈志强（建信信托）：**

从金融体系来看，中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驱动产业升级的金融制度；在资本证券化方面，国家也出台了创业板、新三板创新层等鼓励创新企业成长的制度安排。应该说，目前的金融制度在推动企业创新升级方面绰绰有余。再加上地方政府在产业创新升级方面的推手，金融制度应该有利于产业创新。但问题是，为什么效果不好？我试着分析金融制度背后的问题。比如说，国有银行受制于代理人制度问题，导致信贷政策的保守或偏稳健，虽有信贷政策，但执行无力。比如，信贷审批是集体决策，贷款出现不良后的处罚很轻，导致寻租现象、对项目不能真正尽职调查、真正好的产业升级项目得不到融资等问题时有发生。

除了代理人制度外，国外产业创新升级做法中有一种激励约束机制值得我们学习，那就是跟投（Carry）机制：项目团队要跟投，项目失败先亏他们自己，赚了钱可以获得超额收益，利益是绑定的。问题是，我们的商业银行及其子公司、证券投行大部分是国有性质，没法真正推行这样的激励机制，否则很可能是侵吞国有资产的罪名。因此我认为，金融制度本身不存在大的问题，是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通过推进国有企业混改，完善国有控股金融企业激励约束机制，才能解决好代理人的激励约束问题，真正推动有利于产业创新升级的金融制度创新。

**蒋青云（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我觉得把创新和金融联系起来的是价值管理系统。这方面我国的基础还比较薄弱，也不太统一，原因包括：（1）市场信息透明度低，政府、金融机构和第三方都难以独立建立创新价值评估系统；（2）技术市场和金融市场发展不同步，运行规则不对接，这使得他们对价值的评估也不统一；（3）第三方中介机构发育滞后。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

个人有两点想法：（1）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有国企和民企之分，鉴于其体制和资源差异，其金融支持的机制和模式应有不同；（2）现有金融制度的优化和现有融资渠道的挖潜，可能比金融制度的重新设计和融资渠道的创新更具现实意义。

驱动产业创新升级的金融制度设计，从逻辑上讲应首先明确谁是创新主体。就目前格局看，这个创新主体主要是企业。在假定企业创新意愿较强，企业创新环境较好的前提下，居于创新主体地位的企业所有制性质不同，其金融制度设计方案也应该有差别。

就具体的金融制度设计来说，一个应该坚持的思路是立足现有制度优化和现有渠道挖潜，即着力提升现有制度效率。在支持国有企业创新过程中，或推广政府产业创新引导基金模式，或通过政策性银行提供定向信贷资金支持，或借助证券市场实施专项定增；在支持民营企业创新过程中，借助市场直接融资渠道给予定向支持，将一部分民企创新项目纳入政府产业创新引导基金扶持对象，但不建议通过银行信贷方式支持民企创新。

随着资本市场日益完善，最终应逐步过渡到以市场机制配置产业创新升级金融支持资源的轨道，以充分提升金融资源使用效率。

**黄忠全（江苏五星资产评估公司）：**

前几年国家一直推行的“专利权质押融资”，开头时轰轰烈烈，但最后成效并不大，究其原因？该项工作参与者涉及四个主体：政府（各级）、银行（商业银行）、企业、评估中介机构。在这四个主体中，因为都涉及专利作为担保物的问题，而由于专利本身的法律属性、技术属性、经济属性比较复杂，风险大，导致银行具体信贷人员不愿意自己负责这块业务，而评估中介机构认为此项业务评估起来复杂，耗费精力和承担评估责任风险远远大于实物资产的评估，企业又感觉在此项活动中付出的各种费用及耗费的时间比一般资产抵押多很多。四个主体，三个方面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这项工作没有能够形成良好的运作循环。

国家大量的补助资金用在专利的申报上，导致本来一个文件就能完成的申请文件拆分成多个专利申请，一些根本没有创新的技术被包装成专利，导致大量的“垃圾专利”。这个现象的产生与我们各地政府的“专利申请补贴”制度设计有关，申请专利及专利申请费应该是企业自发和自掏的，这样出来的专利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而我们现在是政府资源太大太强，不该用的“保姆式”管理用在企业专利申请上，导致我国的专利数量像肥皂泡一样被吹大，成了世界第一专利大国。而其中真正有价值的专利少之又少，严重影响“专利”的荣誉和地位。所以，建议国家取消这块财政补贴，这块钱可以用在其他创新项目的支持上。

**周 斌（江苏省邮电规划设计院）：**

（1）金融制度“普惠顶层创新”驱动传统产业要素价值创新，应该是如何通过金融创新制度将传统产业的“要素”早点，或更多点，或更长产业链上下游，甚至跨行业的实现价值，

这就需要传统金融的金融制度在传统产业创新中更加更广更深的“普惠化”，而不是简单评估眼前利益风险贷款化；（2）新兴产业驱动，尤其是中小科技产业创新驱动，这块金融制度的创新应该是国有金融机构“计划下的政策方向创新驱动”与VC、债权、股权等“市场下的控制风险保障创新驱动”；（3）目前阶段考虑金融制度对产业驱动，必须要考虑好科技创新、金融创新、以及金融科技等相互促进作用，金融科技总体应在控制一定风险的情况下让金融作用科技手段对创业创新发展发挥最大作用，政府要做的就是创业化引导和系统性风险控制，其他的都交给市场；（4）金融制度创新还有就是顶层考虑总体公平公正，不能出现“简单纯资本”驱逐“优产业”或“优产业链”。

国家设计总体风险控制，激活金融及产业更多资源配置，金融制度创新对产业的驱动，重点就是如何解决传统金融的“信贷配合”解决普惠化问题；如何解决金融的信息不对称解决金融广化和深化问题；还有就是科技与金融出现的新情况，国家、地方以及企业如何多方创新抢占先机，保持全球领先地位。

**杜运苏（南京财经大学）：**

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缺乏诚信是金融支持创新的一个重要障碍。

**施 康（香港中文大学）：**

创新成功的概率本来就是万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本身具有极大的风险，因此商业银行不愿意投资也情有可原。因此，我认为政府做好知识产权保护就可以了，让市场自己去创新。

**郑江淮（南京大学）：**

中国如果给非洲发展中国家支持，采取贷款或者无偿援助，请问非洲发展中国家更愿意选择哪一种?

如果考虑到非洲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选择，结果往往是愿意选择贷款，理由很简单，贷款要付息，利息可以通过增税或收费甚至卖地来筹集。而无偿支持，结果是政府少了“作为”。由此可推及：如果要鼓励银行增加给中小科技型企业贷款的话，那么政府作为支持者尤其是科技管理部门要准确界定企业是否是需要政府补贴或贴息的科技型企业，银行就有动机给这些受到认证的中小科技型企业增加贷款了，原因是政府的支持力度起到了降低信息不对称和贷款成本。总之，科技创新的金融支持背后是政府部门对中小科技型企业真实、有效、大力支持。

**毛丰付（浙江工商大学）：**

为什么要产业升级，为什么不能产业升级？不把这个搞清楚，让金融制度怎么配合？越配合不是资源配置越扭曲?

**朱晓煜：**

创新需要自由的股权融资体制。商业银行主要是为企业家的套利而融资。商业银行最重要的是风控，不可能支持颠覆性创新，因为风险太大，坏账率会大大提高。

# 如何看待目前的外贸形势

2017 年 7 月 6 日

**编者按：**本周，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邀请南京大学马野青教授组织群内专家、学者们，针对“如何看待目前的外贸形势”这一主题展开讨论。

**马野青（南京大学）：**

我对目前外贸形势的总体看法是：这几年外贸出口的下降主要是受金融危机以后的国际需求萎缩、贸易保护主义加强、逆全球化与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我国劳动力及生产综合成本上升、国际投资转移、低端产能过剩、脱实向虚对制造业的冲击、国内不合理的分配政策与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抑制了需求的牵引作用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但我国外贸发展也面临一系列有利的因素或机遇：作为主要贸易伙伴的美国经济稳健复苏、欧盟也逐步摆脱衰退，特朗普的贸易政策也只是更强调双边的公平贸易，并非一味反对自由贸易；我国的一带一路战略逐步为国际所接受，实行国际产能合作，基于内需构建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逐步成为现实；高等教育、高等职业教育的逐步普及，技能劳动力、研发人员的新的比较优势逐步形成，人口红利的结构逐步转换；我国收入水平总体提高、需求结构升级支撑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产业结构及出口结构提升和未来外贸的稳健发展提供了基础，近年来我国出口中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比重提高概得益于此；庞大的国内需求对国外先进要素的吸引力增强，有利于国内研发创新、摆脱比较优势陷阱、培育充当国际价值链链主的知识资产优势；改革深化释放的制度红利如自贸区建设、外资准入门槛降低等使得国内高端制造业、先进服务业对外资的吸引力增强；国家鼓励实体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措施有助于重振制造业信心、重建外贸发展的基础；特朗普贸易政策的转向给我们提供了参与国际治理的机遇。

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的上升，有些产业、环节向邻近低成本国家、向目标市场国家转移是不可避免的，但另一方面也倒逼传统外贸行业的产业升级、创造新的竞争优势。这方面我可以介绍个我的 98 届本科生的例子。他所在的江苏汇鸿畜产嘉画文体公司主要从事画材（画框、画布、画笔、颜料等）的出口，进入门槛低，竞争激烈。但经过多年打拼，公司稳步发展，目前出口量居国内前三，今年 6 月份还创造了单月出口订单 500 万美元的纪录。其经验是：（1）与国外品牌商合资合作，借助国外品牌、渠道进入品牌商所在国市场，同时积极自主开拓国际国内市场，多举齐下；（2）颜料的自主研发；（3）运用电子商务，线上、线下并举，建立现代化的仓储、物流管理系统；（4）高工资吸引优质人才；（5）在安徽临近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工厂，实业基础能够很大程度上消化成本的上升。目前可以说公司已在传统行

业依靠规模优势、品牌优势赢得了竞争优势，公司处于良性循环状态，成为江苏汇鸿集团的明星公司。

**孙建波（中阅资本总经理）：**

我从人民币汇率的角度，谈谈我对外贸和中国经济质量的观察。3 月初在香港拜访投资机构时候，我指出，人民币汇率已经没有多少贬值空间。（1）一个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过渡的历史时期，伴随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阵痛，本币出现阶段性贬值。但只要未来仍然是出口大国，本币就不会无限制贬值。（2）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不少过去的制造业城市，如东莞、苏州，出现的并非制造业空心化，而是产业结构的升级。随着本国制造业的不断升级，本币有望升值。（3）中国进入高铁时代，高铁运输的是人力资本和消费力，更是高端生产要素和消费需求。高铁将塑造中国全新的以都市圈为特征的产业分工和区域经济格局：从生产端看，科技和人力资源在都市圈内部 200 公里半径内高效率运转，也在各大都市圈之间形成高效率协作；从消费端看，都市圈内的消费将形成高水平的消费形式。换句话说，生产端的专业科技服务和商业服务，消费端的高水平消费，将驱动中国具备平等参与当前国际竞争的能力，而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代工制造大国。

综合以上观点，我认为，人民币汇率进入稳定阶段，如果未来中国建筑业出现大滑坡，人民币汇率有可能短期跌破 7，乃至到 7.2。但从中国的都市圈经济格局和产业发展来看，人民币已经告别了过去 2014~2016 年长达 3 年的贬值期，进入筑底阶段。等待建筑业危机释放之后，人民币将进入长期升值通道。

**金心异（深圳独立学者）：**

我个人认为，未来 2~3 年内影响中国外贸的最大变数仍然是人民币的必然贬值问题。我对人民币的币值稳定性相当不乐观，预期 2~3 年内可能会到 8.3 甚至更低。主要依据是国内的人民币增发，是遏制不住的结果，通货膨胀几乎是必然的；另外只要外汇管制松动，会有更多现在的人民币资产持有者（权贵阶层、民营资本及中产阶级、外资出逃）抛售人民币资产等等。

人民币贬值对出口既有有利因素，也有不利因素。单纯的人民币对外贬值有利出口，但是还有人民币对内贬值的影响，其实是双贬值；何况还有许多原材料需要进口。

**孙 军（淮海工学院）：**

中国对外竞争力的源泉是制造业，在各种生产要素价格大幅度上升，房价快速飙升的背景下，制造业的生存压力很大，对外竞争力要想提升有压力。

建议如下：（1）努力提升制造业生产率水平，驱动制造业升级，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对冲掉外汇贬值趋势，降低房价控不住的风险；（2）在制造业不能快速升级的背景下，有必要实施一定程度的外汇管制，逐步缓解资金流出、房价下行压力、增强制造业竞争力；（3）放

开现代服务业，让包括民间资本的各类资本进入，提升我国实体经济利润空间，缓解资金流出压力，这也能反过来提升我国服务业对外竞争力，降低服务业进口。

**宋凌炎（江苏精诚 & 精缦毛毯）：**

我以纺织行业谈谈看法。2017 年虽然进出口额有微增长，但形势并不是太乐观。首先，国内大批实力企业生产转移东南亚国家，欧美国家对我们国家的贸易壁垒对国内出口企业的冲击非常大。第二个方面，国际上骗子越来越多，加上我们国内企业对知识产权的意识不够，自主品牌不多，代工占很大比例。很多贸易的标准也是他国说了算，打起官司赢的可能性不大，吃了哑巴亏。更有一些国家不需要提单原件即可提货，造成贸易的风险性太大；还有一些国家的银行信用体系不好。第三个方面，人民币汇率的不稳定，加之国内原材料价格的不确定因素，本来就微薄利润的情况下，很容易造成白干甚至亏损。第四方面，美国是中国对外贸易大国，川普执政的骨子里有美国商人的风格，讲究贸易绝对公平，将会出台各项政策措施进一步榨干中国出口企业利润。

建议：（1）国家有关部门多了解并对比东南亚国家与我们国家国际上的贸易差，通过政策制度平衡留守在国内的企业；（2）希望我们国家多参与国际贸易的条例、规则的制定，以对我们出口企业进行保护；（3）尽可能地稳定汇率，打击国内企业垄断原材料操控行为；（4）研究每个国家的贸易规则，进一步营造良好的贸易环境。

**罗立彬（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在全球化全球价值链时代，汇率贬值一方面会降低出口价格从而提高出口竞争力，但是同时也会提高进口价格从而提高出口价格而降低出口竞争力。如果仍然按照之前中国的“加工贸易占重要地位”的出口模式，即使是全球化时代需要进口原材料，人民币贬值应该仍然是有利于中国整体出口的。因为撇开所有复杂因素，中国的出口更多的是“中国劳动力的虚拟出口”，所以人民币的贬值有利于提高中国劳动力的国际价格竞争力，还是有利于出口的。

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国的对外贸易也在经历动能和优势的转换。十三五规划中指出要“培育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为主的出口新优势”，这些几乎全都具备“规模经济效应”和“边际报酬递增”的特点，也都要以“本地市场”为基础。所以，中国对外贸易正在经历从“以传统比较优势为基础”向“以本地市场效应为基础”的阶段转变。

**刘建森（徐工集团）：**

今年上半年工程机械出口向好的原因：（1）一带一路基建投资的需求带动；（2）亚太地区经济温和复苏；（3）高附加值产品，如大型矿山机械出口；（4）卡特彼勒关掉了欧洲和日本工厂，从中国卡特工厂向全球调拨产品，增幅在 60% 以上；（5）中国产品质量、成本、交货期、服务网络具有提升。

从工程机械与矿山设备来看：（1）矿山开采业的复苏，该领域投资信心在增长，全球1~4月份矿山设备销售增长，矿卡同比增长74%；（2）中国工程机械出口1~5月份增长29%，徐工出口增长94%，下半年增长预计放缓，但全行业增幅在20%以上；（3）国际贸易底部应该是2015年6月~2016年6月这个时间段。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经近10年，我认为应该进入一个缓慢复苏的经济周期；国际贸易也进入复苏阶段，最低点在2016年1月份（BDI指数317点）；（4）从区域看，中东乱局与美洲乱象，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对国际贸易有负面影响。但是，受一带一路带动，亚太地区政治经济相对稳定，发展势头良好，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战场。

中国过去依赖进口的核心零部件正在逐步被国产化代替（包括大量外资品牌在中国建厂）。徐工过去轮式起重机的吊臂钢材都是进口瑞典Welldox的，现在100吨以下起重机均采用宝钢的；小吨位挖掘机液压阀采用自制的液压阀，而不再进口日本的，市场反应很好。起重机、挖掘机、装载机油缸均采用自制油缸，而且还出口澳大利亚力拓集团，替代日立大型挖掘机原装油缸。一般的工程机械发动机采用潍柴、上柴、杭发（大型矿山机械除外）。

中国工程机械能在国际市场有一席之地，主要是技术水平和产品可靠性提高、海外销售与服务网络完备、厂商与经销商并肩作战、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与自主品牌、国内强大的供应链、中国制造能力保证了供货周期。这两天接待阿曼Sinan公司的老板Sinan先生，他对吊车非常内行，自己拥有多种品牌的大型吊车，一辈子都在从事吊装行业。根据他的说法：徐工650吨全地面起重机、650吨履带式起重机已经具备了世界领先水平（而我们的技术人员自己竟然没有意识到）。他指出：如全地面起重机第二节臂回收后，线路出现故障，徐工提供的解决方案，完胜美国马尼托克、德国利勃海尔的方案！徐工履带吊的底盘一体化运输（65吨）优于格鲁夫拆分三块的设计，因为现场拼装太难，第二次转场后再装就更难啦。他认为徐工650吨履带吊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设计。他还指出在塔式副臂全配的工况下，徐工650吨履带吊比竞争对手轻105吨。他在展厅看到我们500吨全地面的伸缩臂油缸的样品，认为比利勃海尔的设计更耐用，卡簧更合理。（由于我们埋头盯着世界最先进的技术，不可能把所有的竞争对手的车都买来拆解研究，这次阿曼的客户指出来，我们才发现，其实我们已经走的很远啦）。阿曼客人非常激动，中午饭都不吃，坚持技术交流，临走时，对我说：World No.1！ Exactly Right！在制造业艰难的时候，一些企业咬紧牙关，寻找出路，探索转型升级之路。我认为，一旦国际市场需求增长，中国制造业的规模优势一定会进一步彰显，从而带动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有质有量的新层次！

中国制造业供应链的能力还是非常强大的，中国制造业强大制造能力和规模优势已经在世界市场竞争中凸显，Capacity of Delivery to Market成为竞争优势。如我最近接待的中东客户，他刚刚接了一个合同，2017年10月1日要吊装，现在要一台650吨履带吊。如果德国利勃海尔，至少要他提交30%预付款，等待2018年6月交车，可是客户需要2017年10月1日进场吊装。前不久签署的183台大型履带吊（最大的1250吨吊车），8个月全部交付，这就是客户需求。而这对于欧美企业来说，绝对办不到的！

国际贸易的优势：成本、质量、服务、交付能力。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

（1）外贸转型发展逻辑：“问题 + 目标”导向的复合逻辑。外贸转型既缘于危机以来严峻形势下的被动转型，也是十八大以来着眼于新常态、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顶层设计。（2）外贸转型发展条件：“硬实力 + 软实力”。硬实力主要是改革开放近 40 年来我国市场需求的提质升级，以及国内不少产业、企业综合竞争能力的提升，由此从供需两端为外贸转型提供直接动力；软实力主要是指市场微观主体和政府的开放意识、竞争意识、危机意识、转型意识等观念的强化，在开放中求发展日益成为国人共识，并由此形成推动外贸转型的主观动力。（3）外贸转型发展思路：“以内为基，内外联动”。外贸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是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为此要构建“国内区域价值链——国家价值链——国际区域价值链——全球价值链”的复合型分工机制，最终形成内外联动的新格局。

**周 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经济驱动向技术驱动转变就是面临科技的飞速进步，技术改变了传播模式。文化产业尤其是艺术产业发展通过提高技术水平带动文化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提升产业的收益和竞争力。产业与传播互动发展需要采用虚实结合的方式，将“实”的艺术产业链与“虚”的互联网络结合起来。无形的资源平台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区域艺术产业的国际影响力，两个路径更好的实现将传统文化传播出去。（1）“互联网 +”下重塑和优化艺术产业链。从纵向上看，互联网可以实现艺术产业从内容创作、营销推广到文化消费的产业链上游、中游、下游的结构优化。从横向上看，互联网打破艺术产业壁垒，推动各产业要素的流通和跨界融合，将创意、人才、资本、技术等资源进行充分整合，打造成跨地域、跨领域、协同发展的文化产业大平台。（2）艺术市场的全球化营销。艺术市场的全球化，不会导致所谓物理距离减弱的重要性。相反，这里的全球化会导致重视区域文化联系和物理距离的重新评估。全球化营销给艺术提供了许多新的机会，并有可能导致艺术市场的民主化。在传统的画廊模式已经建立和稳定的时代，全球化的艺术市场需要更多的关注艺术价值和艺术的经济价值。经销商、艺术家和收藏家之间密切的社会关系是必不可少的。全球市场及其关键机构 ( 包括艺术博览会、互联网和拍卖 ) 也要走向密集的社会互动， 形成有效的商业行为。随着经济的全球化，这也必然要求我国的本土艺术在发展过程中遵守世界规则，而在国际化大背景中又不能丢失了我国传统文化特色，因此必须处理好艺术传播过程中的全球化营销。

**刘志彪（长江产经研究院）：**

今年以来，中国的外贸形势确实有所好转，各项数据很给力。5 月 5 日闭幕的广交会也见证了外贸回暖：采购商与会 19.6 万多人，来自 213 个国家和地区，同比增长 5.87%；累计出口成交 2063.57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6.9%。

但是从中短期看，对于外贸的持续增长态势并不乐观，压力很大：（1）世界经济并没有

进入持续的上升期，外需回升的基础并不稳固；（2）过去的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正受到贸易摩擦的进一步影响，“贸易保护之剑”高悬于全球贸易头上；（3）中国国内要素成本高企，新一轮产业过程并不顺利，与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亚等新兴经济体，以及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竞争更加激烈。

从中长期看，目前中国出口占国际市场的份额已超 13%，进一步提高出口的世界市场份额的空间并不大。比较可行的解决办法是尽快实施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利用中国庞大的内需优势虹吸全球先进生产要素，顺势而为发展创新驱动经济。

另外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是要在努力巩固住这一较高出口水平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在沿线构建以我为主的 GVC 对稳定中国外贸乃至全球贸易的巨大作用。未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的潜在能力和快速增长的可能性，将进一步推动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参与方实现贸易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但是现在这一战略的顺利实施，正面临着中国外汇管理措施趋严的严峻挑战。

总之，个人认为未来中国外贸有 3 个“变”：（1）外贸发展的基本面会出现根本的改变，由出口导向的全球化转向扩大内需的全球化；（2）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关系会出现基本的变化，由产业间互补性贸易占据优势，转向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差异化竞争并存的态势；（3）对外贸易的主动性、动力机制、区域和方向的结构，也会发生较大的改变，由中国发包的订单进口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沿一带一路倡议的出口会越来越大；以我为主的 GVC 创造的贸易量占全球贸易的份额也会越来越大。

**杜运苏（南京财经大学）：**

今年出口形势有所好转，但也不容乐观，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国内原材料上游国有企业垄断程度在去产能过程中不断上升，下游出口企业利润受到挤压；（2）很多国家对中国崛起越来越警惕，贸易保护问题不可忽视；（3）这一轮环保整治对很多行业有冲击；（4）人民币汇率波动加大，部分企业控制汇率风险能力较弱。

建议：（1）将双边自贸区作为“一带一路”推进的重要举措，双边双赢是深入合作的重要基础；（2）密切关注英国脱欧，寻求机遇；（3）去产能中的有些不合理措施要及时纠正，并为企业境外采购原材料提供便利；（4）稳定汇率。

**方 勇（南京大学）：**

（1）2014 年起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占当年全球货物贸易的 12%；这一格局由中国制造业供给能力决定，只要全球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不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占世界货物贸易比重 12~14% 的格局也不会发生重大变化。（2）短期内中国外贸形势主要受 OECD 国家为主导的国际需求变化的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主要影响成本已到极限的边际企业。（3）从长期看，中国的外贸发展正处于结构调整的关键节点，正在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型

生产环节出口为主过渡到资本－劳动密集型产品（环节）出口为主，少量企业实现了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制约外贸结构调整的关键因素是国内制造业的供给结构调整。（4）从价值链角度看，我们正在从低端要素供给者和低端环节生产者转变为中段的供给者和生产者，正在挤压发达国家的边际产业，这将使我们和发达国家的矛盾冲突更加尖锐和复杂，未来贸易摩擦甚至经济摩擦会更加突出，并以各种意想不到的形式出现。中国外贸结构调整中的曲折和困难也将主要从贸易摩擦和经济摩擦中产生。（5）塑造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是摆脱困境的一个可能出路，但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看，是否具有强大的最终需求以及能否控制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或核心环节，是塑造并治理价值链的重点。

因此，中国需要在扩大内需上下功夫，提升最终需求的规模和质量，以进口带动制造业走出去，以进口带动一带一路国家在价值链上依附中国的最终需求。

**战岐林（山东工商学院）：**

一、在2008年之前，中国外贸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十分重要，这不是常态。（1）外贸在1992~2001年担负着以开放促改革的任务，因此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2）2001~2008年取消政策障碍之后，劳动成本低、政策优惠大和环境管制松等带来的中国产品低价优势全面爆发，再加上良好的世界经济形势，中国外贸迅猛增长并形成事实上的重要。

二、回归常态的外贸，应该服务于国民福利的提高。（1）失去2001~2008年的条件之后，中国外贸失速是正常的、可接受的，因为那三个造就中国产品价格优势的因素同时阻碍了中国国民福利的提高；（2）基于国民福利优先的考虑，应该充分发展国内市场。对出口企业的政策倾斜应该克制，对国内企业的降成本应该强化落实。让中国人跑到外国去买中国生产的产品，这背后是国家总体福利的巨大损失。

三、外贸促进政策建议：（1）在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兴起的背景下，应该强化双边贸易谈判，加强自贸区建设；（2）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对发达国家产品的需求相似，沿线国家对中国优质产品也有需求；（3）加强对稀土、焦炭等产品的出口管控，以期获取较充分的国家利益。

**孙国民（南京大学博士后）：**

一、外贸经济呈现的几个特点：（1）一般贸易进出口保持较高的比重，对外贸增长具有带动作用；（2）出口单月的正增长使得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负转正；（3）机电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比重较大（约占58%），带动效应明显；（4）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增长较快，特别是对俄罗斯、巴基斯坦、波兰、哈萨克斯坦和印度等国的出口。

二、外贸经济发展遇到的主要问题：（1）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企业的结汇和报价产生一定影响；（2）“一年一兑现”的外向型经济扶持政策兑现周期太长，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的财务成本；（3）重点出口行业的资金压力大，主要表现为资金周转周期长、收汇风险大、

融资成本高等；（4）劳动力丰裕的周边国家替代性出口贸易以及进口替代战略的实施对中国出口形成较大的压力。

三、外贸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1）重点挖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外贸增长潜力，着力拓展外贸新兴市场和新兴产品出口领域；（2）继续推动转型升级，特别是在高附加值产品上，要形成定价权，形成以我为主的市场链、产业链和创新链；（3）大力发展跨境电商，积极拓展外贸市场；（4）创新贸易渠道，最大限度带动外贸发展；（5）未雨绸缪，进一步深度激发国内市场消费需求，特别是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和创造消费需求，让内需在保增长、促发展中多做贡献。

**宋文阁（江苏省国资委）：**

以某省国资委监管企业为样本，谈几点看法：（1）外贸规模单体偏小，经济增加值偏少。（2）企业经营风险高，资金杠杆率高。传统的代理业务，其实就是资金业务，总体资产负债率都在90%左右。（3）主业不突出，管理链条长。（4）乱担保突出，员工激励混乱。（5）转型升级力度不够，僵尸企业多，表现在新业务、新业态、新亮点不多，纺织服装行业整体产能过剩。（6）集团管控模式落后，过多依赖公司+个人管理机制。过多突出个人作用，造成应收外汇账款、存货等资产风险很高。如刚刚发生的货款被骗约2亿多元，正在诉讼中。

**巫 强（南京大学）：**

一、出口数据要保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基本不太可能。从外贸的发展阶段来看，2015年中国在世界出口中的比重为13.8%，在这么巨大的出口规模基础上，显然不可能继续保持过去的高速出口增长。所以，对未来中国出口增速的预期应该是低速增长，甚至出现负增长。

二、中国出口的发展还是要从关注规模和增速，转向关注附加值。过去中国依靠融入全球价值链，承担加工制造环节来实现出口增长，未来中国出口提高附加值依然要依靠全球价值链。（1）在现有西方跨国公司主导的价值链内实现附加值的提升。从当前来看，这种攀升必然遭遇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阻击，我的猜想是继续做强做深制造组装环节，推动制造组装环节的不断创新；我国本土制造企业如果最终能成为特定全球价值链在制造组装环节上无法被替代的角色，那在该全球价值链的价值比例分配过程中就会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自然就能获得更高的附加值。（2）构建本土企业所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尤其是抓住一带一路的机遇来推动构建本土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虽然一带一路涉及很多法制不健全、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完全不能和这些国家做生意，关键是风险的评估和控制。而且一带一路更多是一种新的开放观，是要从面向西方发达国家开放拓展为向全世界开放。

**张明之（南京政治学院）：**

谈一点当前外贸形势下更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情况：（1）准确判断外贸在当前结构转型中

的定位。外贸的数据转好，并不意味着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成功，也不意味着中资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更不是表明我们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提升。（2）外贸的倒逼机制在削弱。外贸形势好转，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固化和强化所谓的低端竞争优势，不利于科技创新、技术进步和制度建设。（3）外贸趋好与贸易摩擦的矛盾依然存在。国家的关注点太多，贸易摩擦经常会被置于后位，受制于既有国际秩序，双边和多边贸易谈判成本增加，外贸面临的风险与压力不容忽视。（4）外贸趋势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当前的数据反映的趋势是否能够持续，一带一路是否已经成为新的贸易增长点，尚需观察。

综上，只有以外贸结构的改善牵引国内产业转型，以国内产业升级促进外贸持续发展，才能进入一个良性状态。

**张少军（厦门大学）：**

（1）中国外贸占世界比重约 14%，继续增加外贸额难度大，成本高；目前的重心应该是如何提高外贸对国内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即提高贸易增加值。（2）外贸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的起点，需要在此基础上结合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才能建设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但目前国内货币超发带来的严格资本管制，制约了中国走出去的战略。（3）贸易引领产业，产业夯实贸易，贸易的竞争力来源于产业的竞争力，故中国产业的转型升级，是中国外贸能否行稳致远的关键。

**唐德淼（无锡环研中心）：**

国际贸易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值得重视：（1）反全球化的趋势加重；（2）贸易壁垒被重新建构，包括技术壁垒和规则壁垒；（3）贸易国际区域合作被打破，在试图建立新的区域贸易平衡；（4）跨境电商对传统国际贸易的影响。

**盛文军（人行杭州）：**

（1）对外贸易要与人民币国际化结合起来，在鼓励人民币跨境结算的同时，推进在国际市场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畅通人民币回流渠道和机制。（2）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与相关国家和地区合作，创建人民币离岸市场。（3）外需和内需协调发展，统筹发展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出口重点应关注其能否带动和提升国内相关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提升国家或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4）加快并购重组，尤其是国际并购，通过完善金融支持、服务和配套等支持和发展中国的跨国公司，进而成为百年老店。

**程 鹏（江苏巨和实业有限公司）：**

今年出口局面虽有了一定的改观，但下半年的进一步发展受制于全球经济复苏并不强劲的大背景，不能掉以轻心。中国作为经济上的一个超级大国，增长的根本虽最终取决于内需，但任何时候出口对于我们都是非常重要的。为了保持出口的适度增长，人民币保持适度的贬值而

不是高估，就是必要的；但贬值速度过快时，应当适当调低退税率来缓冲贸易条件的迅速恶化。

我们要实现出口的长期健康发展，现行出口退税的政策作用必须要降低。由于出口的激烈竞争，很多出口企业的贸易毛利也就3~5%，如果出口退税率能有13~15%，那就意味着这个企业100块进来的东西，90块就卖给外商了，只有等退税下来，出口企业才能真正实现盈利。这就意味着出口企业能否盈利，取决于国家能不能及时给其退税！如果国家一时准备不出这么多退税资金，出口企业就要出大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九十年代中期出口出现过全国性的急刹车，2001~2003年间全国的出口企业都面临资金困难，都是因为国家的退税资金出现了困难。

**林学军（暨南大学）：**

一、中国进出口贸易的主要成绩：（1）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中初级产品出口比重大幅下降，工业制成品比重大幅上升；（2）在工业制成品中，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总体呈上升趋势。

二、中国进出口贸易的主要问题：（1）出口贸易国际市场集中度过高，近几年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衰退，使贸易保护主义死灰复燃，贸易摩擦明显增多；（2）近年来外资企业成为中国外贸发展的主导力量，出口占比超过50%，中国民营企业出口规模仍有较大差距，并受到品牌、人才、税收、反倾销、技术壁垒等制约，出口贸易主体可持续性不强；（3）加工贸易方式占比过高，使中国处在国际贸易分工价值链低端，贸易失衡加剧；（4）出口贸易商品结构层次和技术水平较低，国际竞争力不强。

三、优化中国出口贸易结构，推动贸易强国进程的几点建议：（1）开拓新市场，推进贸易区域结构多元化。采取有效措施克服贸易壁垒的同时，利用“一带一路”战略机遇，努力寻求新的出口市场，走市场多元化战略。（2）稳定人民币汇率，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一方面要稳定人民币汇率，避免人民币汇率的大幅波动；另一方面要积极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不断扩大人民币的使用范围。（3）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组织，掌握国际贸易主导权。增加中国在世界经济的话语权，参与制定国际规则，为国际贸易和投资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4）引导支持民营企业出口发展，优化贸易主体结构。鼓励民营企业提高劳动生产力，并投资于高科技产业，注重从数量价格竞争向质量品牌竞争转变，以提升其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核心竞争力。（5）鼓励对外投资，构造全球价值链，争取国际分工的有利地位。开展对外投资，加强与周边国家、地区的产能合作，转移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延长产业的价值链，优化配置全球的生产要素资源，提高中国产业的全球竞争力。（6）努力发展服务贸易，改变服务贸易逆差的不利局面。我国服务贸易情况欠佳，与美国相比有很大差距；通过支持软件产业发展承接软件外包项目、大力发展中华文化产业和扩大电影音像出版物出口、发展现代中医药产业增加医药出口、拓展海外金融保险市场服务出口及外向型企业、加大创新力度扩大技术服务贸易数额和比重、吸引国外游客增加旅游收入等扭转服务贸易逆差的不利局面。

**郑江淮（南京大学）：**

当前外贸形势判断要考虑世界贸易增长结构性放缓趋势。日本银行 2016 年一份研究报告实证分析得到与 IMF2014 年类似的结果：全球贸易增长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持续放缓，其中有一半的原因可以从周期性因素来解释，另一半因素归结为结构性因素。后者使得贸易和 GDP 长期弹性降低，从 1986~2000 年时期的 2.18 降为 1.31。从地区来看，美国的贸易与 GDP 长期弹性系数同时期从 2.85 降为 1.4，欧盟从 3.11 降为 1.83，中国从 2.35 降为 1.16，其他新兴和发展中地区从 1.69 降为 1.27。这意味着全球范围内贸易放缓呈现出全球范围各地区相互影响和牵制的格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全球价值链呈现缩短的趋势，中国企业的国内增加值在持续上升，美国货物进口比重从 2002 年持续下降。如果从贸易品构成看，世界服务贸易与 GDP 弹性系数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这意味世界贸易放缓主要是制造业产品贸易放缓。通常认为贸易保护是影响贸易放缓的一个结构性因素，但是实证结果并不支持这个因素在发挥作用。与之相关的因素是世界各国贸易自由化进程放缓是一个明显的作用因素。

综上所述，中国对外贸易状况短期变化不能独善其身，如果要持续地改善对外贸易，除了加强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之外，就继续强化一带一路战略，鼓励更多的中国企业到世界各国投资，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这就要求政府在汇率、外汇储备和海外投资之间采取更为灵活、宽松的政策。

# 大湾区与长三角地区的发展比较、转型问题

2017年7月13日

**编者按：**本周，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组织群内专家、学者们，针对“大湾区与长三角地区的发展比较、转型问题”这一主题展开讨论。

**唐德淼（无锡环研中心）：**

扬子江城市群和大湾区城市群，存在不少差异：（1）创新基础和创新主体多维构成不同；（2）外向型和开放经济的构成不同；（3）区域内城市协同或互补性不同；（4）政府服务主动性不同；（5）改革和制度创新不同；（6）经济发展核心主体即企业的生存环境不同；（7）人才的构成与作用发挥度不同。

基于上述差异，扬子江城市群的提升路经是：（1）进一步明确群内城市定位，培育核心极，实现产业异质同构，发挥城市协同作用；（2）适当区划调整，突出扬子江城市群的国内外辨识度和功能定位；（3）进行制度创新改革，打造真正的服务型政府；（4）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在战略新型产业或企业发展方面，要系统地持续发力；（5）要提升民生质量，筑巢引凤，留住真正创新创业企业家等优质富有竞争力的人才。

**陈 东（南京大学博士后）：**

一、就全球化的城市来说，大湾区和长三角都具备了这一特点，但动态上有变化。大湾区长期以来有香港这一国际化的开放的自由贸易港，加上深圳异军突起，双核支撑，周边还有广州、东莞等城市，具备全球化城市良好基础。长三角城市群空间更广泛，但双核驱动性没有大湾区强，主要依靠以上海为中心的“一核”和“两翼”：“一核”指上海，“两翼”一般指南京和杭州（苏州、宁波也可以认为是“两翼”）；但长三角多点开花，具有全面发展优势；同时未来城市发展空间更大：南通可以比照浦东发展成为“浦北”明珠，宁波依靠交通连通打造成“浦南”，合肥异军突起将泛长三角“一核两翼”的三角形打造成平行四边形，沿江高铁和宁杭高铁如平行四边形两条对角线，进一步打造各种快速通道并产生城市化加速效应。所以，从未来空间发展格局来说，长三角要优于大湾区。

二、从全球化的产业来说，大湾区的产业和长三角的产业略有区别，大湾区的产业偏重于金融业、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而长三角制造业则较为齐全。如果从GVC的链条位置

来说，大湾区略高于长三角：正如前几天一篇文章评苏州“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一样，这几年长三角企业转型升级步入快车道，以代工为基础的发展模式也处在浴火重生的加速转型升级阶段；加上长三角制造业门类齐全，生产能力雄厚，若转型成功将更能代表中国制造业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也能在打造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

三、从全球化的企业来说，大湾区的知名企业占优，但长三角“单打冠军”较多，即大湾区“塔尖”，长三角“底厚”：大湾区拥有如华为、腾讯、百度等全球知名企业，长三角似乎让人耳熟能详的企业不多，阿里巴巴这样全球知名企业较少。但长三角单打冠军较多，全产业链的节点知名企业面广量大，如光电行业的亨通集团、纺织行业的恒力集团、零售行业的苏宁云商、零部件供应商的万象集团等，以及很多不知名的配套行业，这些行业如果将来能进行排列组合，形成合力，进一步嫁接高科技内核，将会产生遍地开花的效果。

四、全球化的人才。大湾区吸收人才的环境较好，长三角培养人才的基础较好。大湾区目前在制度创新、人才创新环境等上，要优于长三角，出现了青年人才、高端人才云集的局面；长三角高校云集，名校扎堆，人才基数大，但没有充分利用“人才产能”。未来长三角如果进一步优化创业环境，进一步加大对高端的支持，完全可以将人才进一步利用起来。对人才的使用，不能仅盯着国外的人才引进，长三角未来需要做好区域内人才的使用，并虹吸国内外高端人才。

此外，（1）从中国的区域版图来看，长三角更有优势，中国的经济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长三角就处于这条线的中间，连续南北，承东起西，背靠长江流域腹地，外接东北亚和北美；打造“一带一路”向西开放格局中，长三角承担着连接过去的向东开放和陆上丝绸之路的向西开放的中介作用；“一路”上同样可以成为连接东北亚和向西南开放的中介点。（2）长三角目前主要在制度创新上弱于大湾区，这也是香港长期以来在制度辐射上的优势所带来的，未来大湾区的优势仍要继续发挥香港的特殊地位，如果香港的制度辐射动力衰减，将会对大湾区带来很大的不利影响，长三角下一步需要在制度环境上有更大的作为，才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承担更大的作用。

**何 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1）差异。长三角涉及成员 26 个，而粤港澳为 11 个；长三角涉及空间范围为 21.17 万平方公里，而粤港澳大概为 5.6 万平方公里，前者几乎是后者的 4 倍；长三角覆盖人口大概为 1.5 个亿，而粤港澳大概为 9000 万，前者大概是后者的 1.67 倍。（2）共性。两者都是中国经济的主要策源地之一，是中国转型升级的前沿阵地，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系统重要性。

共性之处，让长三角和粤港澳有了可以对比的地方；然而，差异之处释放出来的信息，就是相对于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显得过于分散，无法在点上聚焦。这就意味着，相对于粤港澳大湾区作为珠三角的统领性动力源，长三角可能要走一条不同之路，即形成多个发展动力源中心。

从沿海型发达国家经验看，实施“多湾区城市群战略”是他们的现实选择，如美国的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日本的东京湾和大阪湾。对于中国来说，“多湾区城市群战略”应该也是

必然选择。目前看，除了粤港澳大湾区外，现在议论得比较多的还有杭州湾（依托上海、杭州、宁波等城市，杭州湾确实可以有所作为），然而，这仅仅是长三角南翼的一个湾区城市群，在长江口，包括上海、南通和苏州在内的城市同样能够构筑一个长江口湾区城市群，与南翼的杭州湾形成对位，成为长三角北翼的湾区城市群。

关于扬子江城市群，其优势在于都是省内城市，劣势在于出江入海口被上海把守。如果不能把上海吸纳进来，就像一个缺了半边脑袋的龙头。近年来，南通一直把自己定位为上海的“北大门”，其实，这一定位，尽管相对过去有很大提升空间，但是，还不够，南通还应有一种大家意识，把上海视为自己的“南大门”，向宁波等城市学习，全面融入、对接、利用上海。当然，这仅仅是上海之于南通的意义。上海之于扬子江城市群，江苏应该把它定位为扬子江城市群的“东大门”，是江苏经济出江入海、走向世界的门户。

最近看过一篇文章，是对粤港澳大湾区中广州南沙的定位分析，个人感觉，现在的崇明岛，跟南沙有类似之处，开发强度也不大，是可以大有可为的着力点。

**金心异（深圳独立学者）：**

我谈谈两个城市群所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或挑战。

一、市场化。智慧地推动市场化改革也就抢占了先机，对此地方政府要有清醒的认识：政府力量是有限的，一定要务实推动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发挥市场力量。

二、法治化。国家的方向一定是法治国家，无论过程多么曲折漫长。市场经济一定得是法治经济，否则就无法有效运行。地方政府在经济建设中不朝令夕改，要给别人（投资者、企业、国民）以稳定的预期，要让人敢来、愿意来、来了能呆得住、不害怕（有安全感）、有信心、不想走，觉得别的地方都不如这里。

三、国际化。两个城市群都是参与全球竞争的主要代表，过去的国际化有很大成就。未来，不要被“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迷惑、冲昏头脑，不要急躁冒进，要更深入地研究国际市场，熟悉国际规则，遵守国际规则，利用国际规则保护自己的利益。

**林学军（暨南大学）：**

长三角最大的好处在于制度统一，货币统一。欧盟打造世界最强的经济同盟，就在于统一的市场，统一的制度，统一的货币。统一，开放，带来的活力无限，产品、生产要素进入一国市场，就可以在欧盟内畅通无阻，因此，可以吸引世界的企业、资本，创造全球的财富。

粤港澳大湾区的最大问题在于统一。由于一国两制，大湾区内三地制度不同，货币有三种，虽然取消关税，但三地仍然有关卡，商品、货币、人员的流动还是受到许多阻碍。所以要建设好大湾区，深度融合，形成统一的市场，统一的制度，统一的货币是关键。市场和制度的统一在于保证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秩序的法规、法令，逐步实现开放、统一的市场，拆除所有行政藩篱，促进商品和要素的流通。货币的统一目前也许比较困难，港币目前还在发挥重要的

作用，但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深入，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应当逐步统一三地货币，减少交易和投资的成本。三地还要促进人员的流动和交流，如统一的身份证，统一的用人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居民可以在三地自由迁徙，自由就业。达到三地紧密的一体化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必定会迸发出无穷的魅力。

**颜银根（南京审计大学）：**

人类居住区域主要集中在水源较为丰富的地区，也在这些地区形成城市。海洋运输的发展推动了国际贸易，从而沿海形成外向型经济为主体的城市。即使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分布在海湾，也未必能形成湾区经济。湾区经济的形成必须具备两个条件：（1）城市间的经济关联度较高，专业分工明确，城市形成交叉网络。城市不只是简单的罗列，否则，只能是城市堆，而不是城市群。（2）湾区地理因桥梁、隧道等交通基础设施的新建而改变地理格局，从原来的半封闭状的交通链接变成封闭状，从而大大提高了原有区域经济关联度。据此判断，真正成型的湾区经济目前中国仅有粤港澳湾区和杭州湾湾区，环渤海湾湾区短期内无法形成。由于环渤海湾范围过广，即便是未来，环渤海湾是否能够发展也取决于跨海大桥系列（或隧道）的形状。

不同于粤港澳湾的发展思路，长三角城市群在现有范围内难以改变地理格局。长三角未来的发展需要进一步向西、向北、向南的地理扩张，重点发展南京和杭州两个次中心城市。

**闫 浩（江苏经信委）：**

湾区是由一个或若干相连港湾组成的地理区域，全球 60% 的经济总量集中在湾区。湾区经济是临港产业、海岸贸易、都市商圈与湾区地理形态聚合而成的区域经济格局，港口与枢纽城市在湾区经济中发挥辐射与纽带作用。全球知名的海湾有几千个，但真正意义上的典型湾区经济区只有三个，即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

上海南翼，由上海－杭州－宁波组成的杭州湾是典型的海湾，目前浙江正在联合上海倾力打造杭州湾区经济。上海北翼的长江江苏段（以下称扬子江）一直是内河航道，似乎与海湾无关。但是，“十二五”期间竣工的负 12.5 米航道疏浚工程已经使五万吨级海轮能够全天候直达南京（过不了南京长江大桥）。因此，扬子江实际上已经成为海湾，江苏的沿江港口城市已经成为海港城市。与典型的海湾相比，370 公里的扬子江深入腹地，把上海与沿江腹地紧密联系起来，沿岸城市人口密集，产业基础雄厚，交通网络完善，沿岸城市集内河港口与海港功能于一体，江海联运优势十分突出。江苏省正在编制的扬子江城市群规划应该为扬子江湾区规划未来。

由此看来，长三角是由中心城市上海与南北两翼的两个湾区共同组成的大湾区。长三角与粤港澳各有所长，长三角的制造业基础强于粤港澳，深圳的创新文化优于长三角，两个湾区都有条件成为世界级的湾区。

**孙国民（南京大学博士后）：**

一、共同点方面：（1）都是体制机制的先行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2）目标定位都是世界级城市群，在定位级别上应属于同一层次；（3）都是实践市场经济的区域，无论大陆还是港澳，都不因制度的不同而偏离市场经济体制的取向，只是程度上的差异；（4）新动能培育方面都具有很好的基础和潜力，特别是大学科研及学术优势，也包括中国最好最活跃的市场主体——企业；（5）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扮演重要角色，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国家队。

二、不同点方面：（1）制度差异性。粤港澳大湾区存在广东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香港与澳门资本主义制度特区“一湾两制”的“制度混合”特点。（2）开放度不同。广东和港澳较长三角先行一步，开放优势的增长相较长三角有所削弱，但开放存量优势依然高于长三角；此外香港的“国际联系人”角色是目前国内城市无可比拟的优势。（3）国土资源及经济实力不同。长三角城市群涉及 26 市，国土面积 21.17 万平方公里，2016 年地区生产总值约 14 万亿元，总人口 1.5 亿人；粤港澳大湾区包括广东 9 市以及港澳，总面积约占长三角城市群面积的 1/4，生产总值约 10 万亿元，人口约为 9000 万人。（4）发展质量不同。长三角总量大，但在人均 GDP 方面大湾区占相当大的优势。此外，香港、澳门是中国服务业最发达的地区，深圳是中国最强的创新驱动强市及制造业强市，广州制造业也相当强悍。总体上看，产业优势粤港澳大湾区胜出。（5）动力支撑不同，特别是教育科技支撑差异显著。从高校上来看，尽管香港的高校在国际排名中占有优势，但在国家定位和实质性国家地位及贡献上不及长三角 C9 大学实力（好比台湾大学国际排名很好，很多年份超越北清，但不能说明他就是中国第一，更不能说明他的实质性科技贡献第一，如果真的是实质性第一的话，台湾的科技就应该超越大陆，显然不可能。上述判断基于此），因此教育科技支撑长三角胜出；但在国际化人才培养方面，粤港澳大湾区胜出。从市场主体来看，长三角城市群“大（大企业）、好（好企业）、高（高水平企业）、名（著名和知名企业）、强（实力强的企业）”企业少，这方面粤港澳大湾区胜出。上述分析还说明，长三角教育科研优势转化不足，大湾区教育科研承接优势明显，对生产力促进作用明显胜出。

**张建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新工业革命为中国各地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各地在利用这个机遇的方式上有差异，这种差异可能决定了某一地区在未来是自然地延续还是人为地重构其竞争力。

在发展新工业革命中的一些新兴产业上，虽然长三角和大湾区两个城市群有差别，如大湾区有无人驾驶，生物技术和智能装备等产业，长三角有新能源和工业机器人等产业，但总体上看，大湾区已经跑在前面，长三角还处在转型的探索中。

造成这种差异的最主要原因是两地发展的机制不同。大湾区的产业转型是在市场竞争机制中，由一批创新领先型企业带动的；而在长三角政府的努力要大于企业，由于政府对新兴技术

产业的敏感性滞后于企业，所以政府的努力实际上阻碍了企业的创新活动。

港珠澳大桥的贯通将加快大湾区城市群一体化和资源优势互补，香港－深圳及其他城市将构成效率强大的研发－创新－规模化生产集聚区。但是，长三角很难做到这一点，尽管拥有中国最高水平且最集中的研发资源。

**楼稼平（宁波布衣）：**

（1）长三角成员属一个政治实体，但分别存在省直辖市、副省级、省直管市三个层级，成员长官或首脑的垂直升迁路径有互不相干的三个管道，即沪、苏、浙；而大湾区则分属三个政治实体，其中就粤省而言，跃迁层次固然与长三角相同，但升迁管道只有一个，即粤省。（2）相对来说，长三角的协作、竞争反而比大湾区会容易且充分，而且竞争态势也会显得温和与有效。比如，嘉兴、南通分别与上海的合作，假如都出成绩的话，嘉兴、南通的地方长官或首脑会分别晋升到浙、苏之省级；但东莞、中山分别与穗、港、澳合作，假如成绩相同，但接下来他俩就将面临只在粤一省内争一席的竞争，而这一席，是其他 9 个成员也盯着的。这种竞争的态势，如果中央无暇或无意掌控，内耗就是巨大的。（3）长三角的合作－竞争态势属垂直性多元化，大湾区则属横向性多元化，一般而言是后者较有优势，这也是大湾区发展较早的原因。

**王辉龙（南京党校）：**

粤港澳大湾区的整体崛起对长三角的发展应该是利大于弊。除非出于行政垄断原因（如曾经的北京之于河北），一个区域的发展对周边及其它区域总会形成溢出效应。

从文化上来说，粤港澳更偏向侨文化，开放度更高，更适宜新理念、新制度、新机制的植入；长三角是吴文化、徽派文化、海派文化的交融，江苏因鱼米之乡形成小富即安的思维习惯，浙江和皖南因资源条件所限都有营商传统，上海多少有点高高在上的优越感，长三角接受新事物的意识和能力不如粤港澳。但大湾区的融合难度大于长三角，主要受制于现存制度和人们对大湾区的共识程度。上海对苏南和浙北的辐射力，以统一的市场和相似的制度为基础，加上相通的文化和理念，经济活动从上海溢出到周边几乎无障碍。香港经济曾经深度嵌入珠三角，也是得益于这种统一的市场体系。粤港澳大湾区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信心和共识，桥通了，心更要通——关键就在于稳定、开放、透明的制度。长三角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分工与合作，在长三角城市扩容后，迅速地使新加入地区融合进来，既是难点，也是未来发展的潜力。有多少企业资源和人才储备，其实都内生于当地的市场条件和社会环境。是长三角强还是大湾区优，就看哪里的市场条件和社会环境好了。总体来看，目前长三角还是优于大湾区的。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

（1）城市群内部，应强化中心城市向外围城市的扩散效应。在上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主要表现为周边地区要素和资源向中心城市集聚，进而推动中心城市的发展；负作用主要表现

为城市之间、地区之间的差距拉大。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扩散效应主要表现为制度扩散、功能扩散、资源扩散，从而真正实现整体发展。

（2）城市群之间，应着力推进基于国家价值链的区际分工协作。着眼于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全球价值链重构的逻辑路径是以国家价值链为基础，最终形成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只有加强各城市群之间的分工协作，基于内需的国家价值链才有竞争力。

（3）中心城市的先进制度应该更多向周边扩散。中心城市的部分功能也需要往周边扩散，信息流和资金流也是如此。中心城市的引领功能，需要从原有的中心城市集聚模式转向中心城市扩散模式。

**刘志彪（长江产经研究院）：**

两大城市群都是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我从产业在空间上的配置和分工规律的角度，比较和展望一下它们的发展演化格局。

在过去长三角的一体化发展中，城市群中的核心和龙头上海，其城市功能是作为降低长三角地区交易成本的全球性城市，而其他地区（扬子江城市群和杭州湾城市群）则成为了降低制造成本的全球制造业基地。在现代经济运行中，交易成本和制度成本低的地方，往往直接制造成本相对地高，反之亦然。因而产业在空间配置上必须寻求综合性的“制造成本 + 交易成本”低的环境。这是跨国公司在产业配置上，把总部经济放在上海、而把生产制造环节放在江浙的主要依据。一般来说，由于交易成本是现代产业发展中必须降低的主要成本，而降低交易成本的主要环节，又都密集地分布于第三产业之中，因而上海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发展深度和高度，就直接决定了整个长三角地区的综合竞争力水平。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二十年来，上海通过“四个中心”（国际经济、贸易、航运、科技）的建设，大力发展以总部经济为特征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加大了与周边地区制造业经济联系，其交易成本的降低，直接推动了江苏和浙江的制造业向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高端攀升的进程。

与此相同的是，粤港澳城市群在过去的发展中，香港作为这个大湾区的中心和核心，其世界级城市的功能也是体现在它可以为其他地区降低交易成本而服务。“前店后厂”是早期的产业空间配置模式，广袤的珠三角地区成为价格低廉、竞争优势十足的世界制造中心。其实，港澳尤其是香港，其降低该地区发展的交易成本的功能，更重要地体现在它的先进的市场经济理念、灵活的市场经营机制和法治化的市场营商环境上。这是过去珠三角地区发展领先的主要原因，也是早期长三角城市群所不具备的优势。近些年来，深圳作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迅速崛起，与此有直接的关系。不过，由于边境线的分割和社会制度的区隔，又加大了港澳与广东南部两地生活成本的差异，增加了这个湾区整体上的制度成本。这是与长三角城市群相比相对不足的地方，也是我们判断被一体化程度更高的长三角城市群逐步赶超，以及香港近些年来相对竞争力有所降低的内在的理论依据。

综上所述，两大城市群未来发展演化的格局，取决于它们在空间和机制上的一体化程度，具体来说就是：上海只有始终不移地坚持形成现代服务经济为主导的产业发展方针，加快构建

以服务业为主的现代产业体系，转移和外包传统服务业以及二产中的一般制造业，集中资源和力量投资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强化服务、管理、集散、创新等城市职能，才能真正形成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竞争力之“核”，吸引力之“源”，辐射力之“极”，并以此为主体，与扬子江城市群和杭州湾城市群共同发展为网络化的城镇体系，才能真正地体现出世界级城市群的国际竞争力。

同理，粤港澳城市群未来的竞争力，也主要取决于：（1）香港与澳门、广东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体化程度。如何大幅度减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制度成本，是制定该地区发展战略时首先要考虑的头等大事；（2）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香港在现代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上不能“大陆化”，否则将会逐步失去这个世界级城市的降低交易成本的功能；同理，广东南部发展要避免“港澳化”，即避免金融、地产泡沫化，坚定地振兴实体经济；（3）必须加快香港澳门相关服务产业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目前过度依赖金融、地产、港口、批发零售、博彩的产业格局必须改变，更要注重其具有知识内涵的科技创新中心功能的建设。可以考虑的途径是既可以加大与深圳科技创新中心功能的合作，又可以加大引进国际智力资源。

**宋凌炎（江苏精诚 & 精缦毛毯）：**

我们回顾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起到了主导作用，学习珠三角应该学习他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管理制度。你有一片森林岛，必定会吸引各种各样的鸟雀来筑巢，如何创造一个适合的营商环境是首要考虑的问题。比如：住房、教育、医疗等等，能让外来人员同样具有安全感。

**曾楚宏（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

粤港澳和长三角城市群的差异不在硬性交易成本也就是通过技术手段可以解决的交易成本如通关成本和运输成本等的比较上，这方面双方的差距将越来越小也最容易改进提升，港珠澳大桥开通等就是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将来决定两个城市群发展潜力的更重要的是软性交易成本，即各交易主体的理念、信任、预期等所引致的组织协调成本，这不是通过发展技术搞基础设施建设等硬件就能降低的。粤港澳大湾区与长三角城市群相比目前最大的不足就在这里。长三角多年的发展一直是以上海为龙头进行产业布局和价值链分工的，上海的江湖老大地位和身份不断得到认同和强化，区域内的城市如杭州南京等对此也比较接受。因此，长三角城市群协调和组织成本较低，龙头（上海）一动，龙身（其他城市）也随之相应行动，再加上共同的制度形式和文化习俗，这种结构化的趋势越发增强。反观粤港澳，早年香港经济一枝独秀，广东甘心做小弟听从大哥的安排，“前店后厂”模式取得了不俗的成效。然而随着近年来香港经济的下行以及广东经济的不断提升，粤港之间的提防和猜忌已经逐步取代了以往的信任和合作。再加上广东本身还面临着广州深圳双雄争霸的不稳定因素，所以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首先要解决三个参与主体的身份地位问题，也就是结构化的问题。否则，三方的组织协调一致行动就无

从谈起。一旦三方的座次排定，身份明确，就如长三角一样形成结构化的格局，充分发挥香港国际自由港、澳门面向葡语西语系国家连接通道和广东创新要素不断积聚优势，粤港澳大湾区的未来不可限量。

# 对当下人才竞争的看法

2017 年 7 月 27 日

**编者按：**本周，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组织群内专家、学者们，针对“对当下人才竞争的看法”这一主题展开讨论。

**踪家峰（南开大学）：**

（1）人才竞争是好事，没有竞争就不容易发现人才价值；（2）有帽子的是人才，没帽子是不是人才？海归是人才，土鳖是不是人才；（3）人才待遇不能按身份（种姓）分配，如果土鳖不如海归，海归不如纯种洋人，洋人不如……这样就会陷入危险的境地；（4）360 行行行出状元，人才不能局限于高校与科研院所；（5）从重视人才到普及 12 年或 15 年教育，使人人皆成才；（6）现阶段要注意夹缝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7）创建一个自由、宽松、自治的学术团体比人才更重要。

**陈晓东（中国社科院工经所）：**

（1）国家一定会对教育部系统高薪挖人作出规定，否则老少边穷地区学校水平将成片坍塌。（2）以文章论高低的局面会逐步改变成文章和社会影响并重，并将过渡到经济社会影响为主。（3）人才待遇，包括职称、住房、子女升学等方面问题会逐步改善。（4）用人体制机制将会逐步改善，但社会文化对人才的理解与包容还将有一个长期的过程。

**何　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1）人才之争的主要战场在强二线城市；（2）强二线城市之所以进入抢人大战，主要是一线城市在发展上从集聚阶段进入了扩散阶段，从而为强二线城市提供了机会；（3）强二线人才之争，主要手段依然靠政策倾斜，比政策力度，同质化比较强；（4）情感牌、家乡牌等成为重要抢人手段；（5）抢人大战，依然无法解决人才的忠诚度问题；（6）潜在引发的问题是，去道德化的人才，将会引发他们的地区逐利行为。

抢，是我对当前强二线城市人才之争一个可能不准确的归纳。当然，人才之争愈演愈烈，也与地方政府的危机感、紧迫感有关；各地都在推动转型升级，而这需要人才，特别是高端人才。但现阶段地方政府都比较急功近利，想摘现成的果子而缺乏培养人才的耐心。如果真的以市场化的方式放纵各地人才之争，那么就会出现市场化的必然结果，即“马太效应”：人才

再次向少数城市集中。因此，在尊重人才、发现人才、运用好人才的这篇文章中，如何做好人才之争的市场化程度、力度与强度就很重要。不然，这些强二线城市，会像抽水机一样，把相对弱的二线城市、三线城市人才储备吸干。如在苏州大学的金元攻势下，就已经出现了西部高校老师出走的现实案例，而这必然会进一步恶化西部高校的人才储备。

地方竞争，制度层面，往往是对区域政策成果的法规固化。在国内，对于地方来说，制度层面基本是同质的，唯一差别的就是政策。制度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不同利益群体的反复磨合。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任期制就决定了地方政府只能选择政策开路。政策的大礼包，又受地方财力影响。深圳是先有特殊政策，后来才总结经验，进行法规固化的，现在形成了先发优势。在地区人才竞争上，后发就是劣势。这么多年为什么留学人员不回国？因为国内后发劣势。近年为什么加速回国？因为国内弯道超车，改变了后发。不是国内制度环境变好，而是国内政策环境驱使，如成都以大幅返还所得税吸引互联网高端人才就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张晓东（中国管理科学学会）：**

树立“人人皆才，人尽其才”的理念才能实现真正的以人为本，才尽其用！竞争是必然和客观，有序引导才是政策制订应有之导向。学者们要帮忙的是科学地厘清地方的合理人才结构，以及如何结合资源禀赋激发本地的人才活力，努力补足缺失。不是所有的人才都是江苏的急需，更不是越高的人才对江苏越有利，结构合理，分工有序的人才配置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所需。

**孙 军（淮海工学院）：**

关于人才竞争，要正面看待：（1）证明我国开始尊重人才，这对于创新驱动经济阶段来说，尤其关键；（2）有竞争则表明我国经济仍然具有活力，仍然具有强大的市场驱动特征。

具体做法：（1）倒逼各地区和单位，对资源进行重新优化配置，制度和激励设计向有利于人才积聚和能力迸发方向转移；（2）利用我国人均收入快速增长期，吸引国外尤其相对落后国家和地区人才进入，提供终身绿卡；（3）对于中西部高校，教育部应该给予适当倾斜，在资金支持、课题获取以及人才评价方面给予支持，不应通过强制手段阻拦。

**王培君（南京林业大学）：**

人才评价、人才结构、人才流动、人事政策是优化人才生态的主要着力点。公办高校除个别校外，普遍社会筹资能力弱，主要依靠财政拨款和专项资金维持办学；若专项安排主要依据大学排名、靠学科、铁帽子打分，则高校高薪挖人是必然的。制度（政策）很重要，并非全部。人有各种需求，人才更看重事业成就，平台舞台有没有，能不能任性发挥下才华？

**宋圭武（甘肃省委党校）：**

人人都是人才，人才问题不是一部分人的问题，是如何有效利用全社会所有人的长处的问题，是如何有效利用每一个人的才的问题，不是只讨论如何有效利用一部分人的才的问题。

人才问题根本是公平竞争，而公平竞争最重要的是业绩，培养仅是一个次要方面；如何体现公平竞争，核心是要以为人民服务的实际业绩为根本标准，不能由人主观认定谁是人才。完善人才业绩的考核和认定制度，要打破领导干部的铁帽子，让干部能上能下；不提倡打破职工的铁饭碗，因为饭碗是社会稳定保障，也有利于保护弱势群体利益；但同时也需要进一步完善职工管理制度，激活劳动潜力。

**杨志勇（中国社科院财经院）：**

人才不竞争，体现不出人才价值。人才自由流动，才能真正人尽其才。需要帮助的，应该是促进而不是阻止人才流动。

**蒋青云（复旦大学）：**

我觉得人才本来不是均质的，现在似乎一谈人才就用标准套，把活生生的人才装进各种工程里，成为流水线的组成部分，或者不断标签化，一旦贴上标签就认同等于业绩，从而使人才使用过程发生异化，最终成为庸才。因此，人才鉴别、使用和评价都很重要，目前的问题是只有上面说了算，下面说了不算。这本质上是上面不拥有人才评价的信息和能力，只能用标签来简化评价，从而把高级人才低端化评价，结果是由于政府发布了低端信号，市场上将出现一大批伪人才，从而扭曲了市场，使评价体制效率全无。

因此，人才信息经济学和人才治理方式很重要。我的观点是，政府重点解决人才市场的规则建设，解决人才流动中的程序性问题，把识才、用才和优才等权力还给民间。

**刘根荣（厦门大学）：**

何谓人才？具有异质性且替代弹性低的人力资本拥有者就是人才。人才竞争的实质内容是以制度竞争为依托的优质要素竞争。人才竞争的核心是制度竞争。可预期的、宽容的、公平正义的制度是吸引人才的根本。例如深圳形成人才高地，根本原因在于其透明的人才引进制度，从厦门与深圳在人才竞争中的差别就可以看出，为何深圳能够持续快速发展。

高端人才往往有较强的制度敏感性，制度适应性差，因此更要注重制度建设，打造适合人才发展的制度环境。国内歧视性的人才政策是非制度性的竞争，有短期效应，难以解决长期问题；国内人才竞争以赤裸裸的物质诱惑为手段，出现顾此失彼的人才不平等待遇，引发少数人的套利行为，损害了人才良性竞争。人才不是固定不变的，其异质性人力资本会随时间流逝。所谓人人都是人才观点很有迷惑性，站在道德制高点，但也是最不可行的人才观。人尽其用是人力

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的重要内容，但不是通常意义上探讨的人才竞争问题。人才竞争也是国际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表现为国际间移民偏好。一个对移民有吸引力的国家，其制度往往也是有竞争力的。

**伏玉林（华东理工大学）：**

人才是本土词汇，一般员工就是劳动力，但是称为人才的似乎与经济学文献中的高技能劳动力对应，当然企业家也是一种特殊人才，这样就避免了管理学中的人力资源的统称，从而对应到经济学中的劳动市场和经理市场。市场经济背景下，人才竞争反映为允许人才这个要素（劳动或企业家才能）的自由流动和价格的自由调节。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本质上就是允许人才的跨地区、跨行业的自由流动和自由竞争，允许“人往高处走”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讨论人才竞争，应当放在一个经济学框架中讨论，人才作为生产要素，在现有框架中可以纳入劳动市场和经理市场。非生产部门的劳动力不创造产出，但进入生产部门可以增加产出。围绕人才竞争的政策表现为两个方面：（1）完善劳动市场机制的政策；（2）为了实现某个时期的特殊目标而施加的特殊人才政策，其中包含了对劳动市场机制的反动。允许人才在市场上自由流动了，市场会发现价值。人才跨行业流动壁垒比较低，争议不大；但是人才跨地区流动壁垒较高，例如欠发达地区常常出台政策阻拦人才向发达地区的自由流动，这需要更高层面的协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毛丰付（浙江工商大学）：**

人才就是拥有特定能力的人，这种特定能力刚好可以解决某些现实问题。人才铁帽子王是官方认证，不是市场认证，不能反映市场的真实需求，是官本位思想的直接延伸。铁帽子王造成的不良后果至少有以下三点：（1）资源错配，官方认定的拔尖领域不一定是实际上迫切需要的领域，特别是老人才帽子不能反映和满足新兴领域的要求；（2）恶性竞争，因为帽子的信号效果最明显，用人部门重心不是发掘和培养人才而是按图索骥，拼抢帽子，某种意义上是完成任务的懒政；（3）破坏了人才正常的生长环境，扼杀了真正的人才生长空间，要么大树下面不长小草，要么拔苗助长，要么急功近利追帽子。

**宋文阁（江苏省国资委）：**

当下迫切需要改革人才，更需要改革帅才。迫切需要组工部门制定出人才改革的相关标准、提拔任免、绩效考核、薪酬管理、教育培训等办法。

**王美今（中山大学）：**

当前中国高校人才资源管理的一个深刻矛盾是高校之间的“挖人大战”有愈演愈烈之势。教育部长陈宝生喊话：“东部各高校，请对中西部高校的人才‘手下留情’！”；但这场没有

硝烟的战争并不仅仅发生在东西部之间，处在同一城市的高校之间挖墙脚的事也屡有发生。可以说，中国高校始终没有形成人才资源的有序流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近些年传统机制的阻力小了，市场机制不仅体现在流动本身，还体现在需求方给人才的“待遇”上有了某种程度的市场定价成分。高校人才资源的无序流动出现了新的特征，这突出表现在对“八种铁帽子王”人才的争夺上。各种“帽子”人才是高校学科评估的显示度指标，各个学校都为自己的优秀教师能获取“帽子”而不遗余力，行政力量有太深的介入。随着高校“双一流”建设的启动，对这些人才的需求陡升，“帽子”人才成了高校教师中流动性最强、市场议价能力最高的一群；“帽子”通过行政资源获取，而流动中市场按“帽子”给人才定价，导致行政上追求“帽子”和市场上追求“帽子”人才的双重疯狂，造成高校人才资源管理的混乱，恶化了学术风气，事实上不利高校的学科建设及高校的发展。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教育部要转换学科评估的“指挥棒”，放弃对高校学科建设的种种行政干预，还高校一个遵循大学教育自身的规律和国际通行的规则来发展学科的空间。

西方大学没有帽子只有椅子，核心是教授治校。西方有明确的学术市场（思想市场），竞争更具开放性，学术水平由同行评价，是否是人才取决于学术影响力。因此，尽管西方高校人才竞争也很剧烈，但能实现人才的有序流动。目前要求教育部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来管理中国的大学，是绝对不可能的，教育部绝对不会放弃“双一流”建设，教授治校更是不可能的议题。我们能做的，只能是在既定约束下尽量争取一些局部、较小的改动，比如“A 类期刊”的指定不能由教育部几个人闭门造车等等，尽量减少行政干预，降低扭曲程度。

**沈凯玲（澳洲国立大学）：**

高校里教授们的工作效率直接受行政人员的素质和工作效率的制约。各个高校间教授们的工作业绩考核相对公开透明，而促进高校行政人员提高效率的动力就小很多了。把时间机会成本极其不同的两类人放在一处，让时间成本低的一方管理时间成本高的一方，这就是矛盾。

**孟 楠（徽银南京）：**

我觉得中国不缺任何人才，只需要解决人才选拔和任用的诸多体制，即做实公平、自由和安全的环境。此外，国内教育制度不进行有效改革，人才不但不容易产生，也留不住人才。

**金心异（深圳独立学者）：**

就我在深圳的观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内一流的人才根本就不会来深圳；但深圳把二流三流的人才磨练成一流人才。

**赵顺群（丹阳市发改经信委）：**

（1）我们曾经机械化的评价人才，认为有中专以上学历的就是人才；（2）我们也曾经庸

俗化的评价人才，认为只要对社会做出贡献的就是人才；（3）人才的特性应该是稀缺性和难以替代性，其评价方式一定是竞争性和市场化。因此，从制度层面保证竞争，同时为人才成长创造宽松的环境，是最为重要的。

**龙小宁（厦门大学）：**

我觉得关键是要有鼓励自由思想的环境。

**孙国民（南京大学博士后）：**

从人力资源的角度来看，人人是人才，不是人才是因为放错地方了。人才的特质是专业化，资产专用性。典型特征是：人才专业化，专业市场化：前者说明人才资产专用性，后者说明人才价值。怎么体现人才价值呢，就是通过市场化实现。

**杨平宇（温州商学院）：**

吸引人才最重要的是有开放的文化。开放的企业文化，开放的制度文化，和开放的社会文化。

**许 萍：**

衡量人才的标准有三，首先必须能创造价值，带来效益；其次必须具备相应的知识、证书甚至经历经验；再次，具备相应泛技能，也称软技能。

人才创造价值也要视企业的发展阶段、团队成员角色平衡等因素；即使是体制外的人才，一个企业里不同岗位、不同职能的人才标准也是不一样的。从政府到企业都高喊重视人才，实际上都重视不够。重视人才就要给人才话语权，听取人才的意见，而大多企业老板自以为是，武断专制，只用了人才的双手，大脑在打卡时留在公司大门之外。

**宋凌炎（江苏精诚 & 精缦毛毯）：**

（1）人才竞争要有合理的机制，有人欣赏人才，把适合的人用在适合的岗位才能发挥最大效果，而不应该一味地强调竞争机制。（2）中国缺乏卓越的高级人才，首先教育制度地域招生差异化导致每个学校以成绩最大化为目标，导致书呆子型人才居多；人才应该从综合性的角度评估，掌握全方面知识的同时根据个人兴趣能钻研一个强项，并突出强项。（3）不论是培育人才还是选拔人才，人品一定要放在首位来考虑，所以任何竞争必须优先考虑道德修养。

**林学军（暨南大学）：**

人才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重要的因素。尊重人才，包容人才，给予人才宽松、公平的环境，是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发挥人才作用关键。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哪国拥有人才，哪国就能

在竞争中取得优势，相反则处于劣势。美国是全球创新的国家，发展的秘诀是人才，全世界一流的人才几乎集中在美国；许多发展中国家，如我国却是人才的净流出国，许多留学生在国内完成基础教育后去美国留学，成为高级人才后留美工作，这实际上为美国节约了大量的基础教育投入，让其以低成本获得人才的高效益。今后，我国应当努力创新人才制度，为吸引全球人才，提高我国竞争力而努力。当前，各国的人才策略都十分灵活，例如：（1）修改移民条例吸引高端人才，鼓励高端人才到本国定居；（2）吸引学成的留学生留在本国工作；（3）以高薪吸引各行业的高级人才，以平均工资的数倍高薪聘用；（4）提供便利的科研条件，邀请外国的优秀同行到本国做研究；（5）利用某些国家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争抢下岗或受排挤的科学家；（6）到发达国家建立研究机构，在当地聘请优秀的科学家开展研发活动，利用全球资源搞创新；（7）直接给优秀大学生资助，毕业后留下重用。这些措施极大地帮助各国搜罗全球人才。

我们要给人才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就必须改革现有的户籍管理制度、编制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绩效考核制度、薪酬制度等，让人才自由流动，将人才配置到最有效率的地方，真正做到爱才、惜才，发挥每个人才的最大效用。

**姜彩楼（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人才取决于知识结构和个体特质，市场具有发现人才、激励人才的功能。对人才群体的关注与国家发展阶段、发展战略密切相关。科技战略中关注研究人才，创新经济关注创业型人才。

**王建国（日本中京大学）：**

人才就是在一些方面比常人具有更为出类拔萃能力的人，又可以分为通才和专才两类，具有系统思维能力的通才与很有特长的专才都是很重要的。

人力资源的管理本质上不仅仅是合理安排、合理配置的问题。人力资源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不同于其他生产要素，其他要素用掉了就没有了，而人力资源这个要素是越用越多，因为人的能力在使用过程中提高了。所以人力资源管理最重要的任务是如何促进员工的成长。经济学的边际生产率分析在人力资源处理上有个误区：把所有的劳动力都看成同质的。所以，刘易斯就有了不发达国家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说法，林毅夫也说人口红利吃不完；而实质上，劳动力不是同质的，尤其是近些年，沿海城市的企业找不到所需的熟练工，而很多农民工又失业。

**单豪杰：**

所谓核心人才就是对一个项目、事项有把握能力、系统分析能力的人。在实践中，核心人才拥有系统化规划运作能力，在细节技术方面很多人都可以做，但具有系统化思维的人确实不多。

千人计划项目还是很成功的大项目，虽然有极少数投机的，但总体上孕育中国未来的一个新希望，无论专业还是法治建设。

**黄忠全（江苏五星资产评估公司）：**

不同岗位、不同标准会有不同内涵要求，大学有大学的标准，研究所有研究所的标准，机关有机关的标准，企业有企业的要求……凡是在一个岗位上基本能够做到“不可替代”的人都可以被称作“人才”。

我们现在有各种各样的人才计划，如千人计划、双创计划、创新创业计划等等，高校也有高校的计划。这些项目中是有很多好的、成功的，包括长江学者计划、杰青计划等。我认为，关键一点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所以出现无序竞争中随意乱开价码，浪费很多很多人民币等现象；如果学习是私立的，或者项目不是财政掏的，那时引进的项目才能真正选拔出人才！我们讨论的关注点是如何完善这些计划，把无序竞争不良影响降到最低，而不是要否定这些计划。

**刘志彪（长江产经智库）：**

人才不是不可替代，而是：（1）你想用多大的代价去替代；（2）在什么范围内不可替代？

作为人才的个人选择，它与所服务的机构的选择应该是相反的。个人最好修炼成技能在身，具有不可替代性；机构的选择是最好能把员工改造为通用型技能资产，防止被敲竹杠；个人的选择最好是能够有流动性，流动才能实现资产增值，所在机构对人才的选择，最好能塑造流动的不对称高门槛效应：自己想要的进得来，自己想留的走不掉。因此，人才的替代性弱、流动性差，是人才竞争与管理中，不同于一般要素的基本特点。由此可推演一系列结论，如各地为什么产业结构、生活水准不同？因为人才不可能完全流动和替代；为什么人才价格越挖越高？……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

以当前各地高校的人才竞争为例，为抢夺人才而爆发的价格战愈演愈烈，既扰乱了有序的人才流动，也扰乱了一部分人才的内心。但总体来看，各地各高校纷纷出台人才配套政策，凸显了人才的重要性，为人才成长营造了更为有利的环境，其正面意义值得肯定。当下关注的焦点，不应该过度锁定在人才价格几何，而应该着眼于人才引进与高校发展的关系，聚焦中长期目标和长效机制。

（1）遏制急功近利，放眼长远发展。当前高校引进人才，有深刻的导向背景，其中“双一流”更是决定性的指挥棒。定期不定期和官方非官方的所谓指标式学科评价，也是重要的推手。在此背景下，多数高校不得不放弃长周期的人才培养。究其实质，则是一种畸形的政绩观。因此，要改变当前乱象，就必须树立正确的目标导向，切忌短平快。（2）强化造血功能，构建长效机制。人才引进固然重要，人尽其才更加重要。人才引进之后，需要立足长远发展目标，为人才成长营造环境，打造平台，构建发挥人才作用的长效机制。强化人才引进之后的造血功能，更加着眼于团队建设和人才培养，壮大人才基数，同时为优秀人才创造脱颖而出的条件，最终

形成“人才基数扩张 -- 人才质量提升 -- 学校永续发展”的良性循环模式。

# 那头“灰犀牛”，会不会撞了年轻的中国市场经济的腰？

2017年8月3日

**编者按：**《人民日报》2017年7月17日在头版刊发了一篇评论员文章提到，“既防‘黑天鹅事件’，也防‘灰犀牛’，对各类风险苗头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置若罔闻。”，一时间，“灰犀牛”成为了当下的热词。

本周，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组织群内专家、学者们，针对“那头‘灰犀牛’，会不会撞了年轻的中国经济的腰？”这一主题展开讨论。

**名词释义：灰犀牛**

“灰犀牛”是美国学者米歇尔·渥克2013年1月在达沃斯论坛上提出的概念，后来形成了一本专著《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

相对于以黑天鹅比喻小概率、难以预见性和偶发性、而又影响巨大的事件，灰犀牛则比喻概率极大、冲击力极强的风险， 是我们应该意识到的风险，是一种视而不见的危机。灰犀牛事件不是随机突发事件，而是在一系列警示信号和迹象之后出现的大概率事件。

**陈 东（南京大学博士后）：**

我认为当前最大的灰犀牛之一还是民间投资增速下滑和结构投机化。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成功就是民间投资的发展，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结构优化。各种经济问题，如果由高度市场化嗅觉的民间资本来完成，就会化矛盾于无形。所以，在解决腐败毒瘤后，现在到了再次理直气壮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时候了。

**何 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灰犀牛最大的特征，就是意料之外。现在，汇率和不良债，都有共识，称不上灰犀牛。反而是楼市，大家都是看空做多。个人认为，楼市最具备灰犀牛潜质，我也倾向于楼市将面临重大拐点。

**孙 军（淮海工学院）：**

中国发展到当下，暗藏了很多灰犀牛，例如民间资金外逃下的外汇流失、地方政府债务、社保支付危机、房价过高、减税降费难度加大、技术进步仍然艰难、产业持续向外转移，等等。当下，对资本外流进行控制，加大对外资的引进力度，对内放权让利，鼓励创新创业，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灰犀牛，但仍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也就是说，目前主要是“防”和最大程度的“化解”，但仍不是解决之道，基本问题仍没有得到根治。以地方政府债务为例，尽管实施了 PPP、地方政府发行债券等方法，但地方发展的收入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尽管房产税长期来看一定得收，但在房价高悬、资金外流、土地出让收入仍是地方政府收入重要来源背景下，仍然很难得到快速实施。因此，在防灰犀牛的同时，一定要理顺经济发展体制机制问题，这是关键所在。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

当下最直接的灰犀牛还是银行累积的不良债权风险。风险一旦爆发，意味着居民家庭和个人长期储蓄所得的货币财富急剧缩水，其连锁反应是致命的。而深层次的灰犀牛，则是民众在改革进程中获得感减弱，由此导致改革信心逐步丧失，这将使发展失去根本动力。中国这样的体量，只要人心在，啥犀牛都不可怕。所以，深层次的真正有杀伤力的灰犀牛是：改革动力减弱 + 改革信心缺失 + 改革方向不明。

**孙国民（南京大学博士后）：**

社会阶层固化严重，向上通道受阻，源于用人制度上的重大缺陷，表现为用什么人、怎么用、用到什么程度等系列重大问题，这方面的矛盾长期存在。对用人机制实施变革，畅通社会向上通道，社会才会形成良性循环，形成正向发展回环，规避社会逆淘汰和格雷欣法则的大规模发生，并让人民群众看到希望，这是社会进步的聚力器。

**刘瑞翔（南京审计大学）：**

我理解的灰犀牛是经济系统的突然崩溃，可能爆发于一点向整个体系扩散。政府为了避免灰犀牛的产生，需要加强对经济的监管。

长期的化解之道就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要真正通过供给侧改革，减少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让市场配置资源。

**张建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我觉得灰犀牛来自经济增长新旧动能的不衔接。经济建设是中心工作，增长是重中之重，现在的增长仍依赖传统力量硬撑着，新动能不仅弱小，而且有可能难以壮大。因为一些重要因

素在制约和分散着新动能的积聚，比如大量的资金投向国外，国企越来越替代民企，民企的生产经营又非常艰难。

**宋文阁（江苏省国资委）：**

今天经济灰犀牛来自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如政策（如财政与货币政策）运用不恰当、军事外交手段的非常规应用等。具象的、什么量级的、什么摧毁力的？估计预测不到。从历史视角看，不外乎上述几种。

只要能预测到，肯定就防范，就会消灭在萌芽状态。

**伏玉林（华东理工大学）：**

当代经济危机来临之前的两个重要特征，是实体经济全要素增长率的持续下滑，再就是货币增长率的持续上升。上半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6.9%，上半年的 M2 增速明显下滑到个位数，经济转型效果显现。党报担心的楼市泡沫、汇率和不良债会不会成为冲撞经济的灰犀牛，个人觉得目前还没有出现经济危机的明显征兆。目前，仍然要继续致力于经济的市场化改革，通过竞争机制来提升实体经济增长率和技术进步水平，增强市场主体信心，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此外，继续抑制房地产泡沫，需要土地制度的深化改革，采取更加灵活的汇率政策，有效防范公司债务和地方债务风险。总之，化解大概率危机事件要从深化改革开放、振兴实体经济和防范风险三方面着手。

大萧条是一系列累积的结果，难以预测最后一根稻草。但是，从体制看，中国经济的彻底转型可能真的需要一次强行调整。

**刘志彪（长江产经智库）：**

我觉得灰犀牛以什么形式出现，确实不好预测。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它不一定由金融领域的问题引发，但是一定会在金融领域触发金融危机。

货币超发才是隐藏在中国经济运行系统中真正的灰犀牛！无论是房地产的泡沫，还是人民币的汇率，或者地方政府高额债务，其内因都是货币超发。

为啥会出现严重的货币超发？根本原因是增长方式的粗放型，以及对地方政府、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

**方向阳（中国财政杂志社）：**

灰犀牛有：中小民营企业大规模倒闭和大规模失业、房价大降、股灾频现、债务链断裂、银行挤兑、币值巨贬、资本大规模外逃。

**黄志军（中国农业银行）：**

普遍认为现在的房地产泡沫、汇率和银行不良是比较大的灰犀牛，但最根本的是，政策短期性所产生的强大动员能力，对灰犀牛产生膨胀效应。强大的动员能力，分散决策但行为一致的地方政府经济决策，都会催生灰犀牛的膨胀，进而掩盖问题的本源。而商业银行表现出与地方政府一致的决策行为。这种行为的一致性将抵消经济系统本身的分散决策风险规避功能，导致问题的自我膨胀。其实不管是房地产泡沫、汇率风险还是银行不良，还是企业缺乏本源的动力、没有核心的竞争力，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而企业的竞争力绝不单单是补贴、扶持基金能搞起来的，涉及一系列剜骨疗伤般的改革。所以针对上述灰犀牛的技术性解决方案，都解决不了问题，只会延缓问题本身，而最终又加剧灰犀牛的膨胀。

**单豪杰：**

地缘政治这头犀牛是确实存在的，现在一旦发生局部战争，房价、股市、外汇市场就成了大问题，其他的潜在犀牛短期内没这个导火索，不会飞奔的。

**林学军（暨南大学）：**

中国的灰犀牛可能有地产泡沫、汇市、股市激烈波动、政府债务违约；当然也可能因粮食安全、网络安全、能源安全、国家安全出现问题。解决问题是防微杜渐，防患未然。最重要的是提高劳动生产力，发展实体经济，储备粮食和能源；控制整体债务规模，控制房价，保持足够的外汇储备，维护股市秩序，保证股市平稳发展；加强互联网信息安全，提高国防安全保卫能力。

**杨志勇（中国社科院财经院）：**

灰犀牛是自己养起来的。决策专业性提高，犀牛就养不大。

**杜运苏（南京财经大学）：**

灰犀牛还是在国内可能性比较大，新动能发展缓慢，旧动能拉动作用下降，接下来要稳增长，货币增长还是会很高，在外汇管制趋严的情况下，如果控制不好或处于拉动经济考虑放松调控，国内资产价格还会再上新台阶，一旦出问题，将会带来一系列麻烦，如地方债等。

**王思彤（江苏省统计局）：**

以目前党和政府对宏观经济的把控能力，我认为中国短期内出现灰犀牛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中国经济自给自足能力比较强，除非发生影响与波及面比较大的战争，才会对如此庞大的经济体构成致命的冲击。想想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历比较大的两次危机就是索罗斯等引起

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但我们还是保持了足够的定力，尽管后者让我国的外贸出现了严重的滑坡。

**赖红波（上海理工大学）：**

一头怪兽在一点点长成，步履蹒跚朝我们越走越近……大鼻子（房地产捆绑和依赖）和4条粗腿（国企占据垄断大多数资源而缺乏创新；资金和信贷市场保守不思进取；汇率和国际贸易环境日趋恶劣；中小民营企业支撑的实体产业陷入转型陷阱）的轮廓清晰可见。

或许，这头怪兽就是传说中的灰犀牛?

**刘建森（徐工集团）：**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与贫富差距拉大的感觉之间的落差，也可能因一件小矛盾而引出灰犀牛，因此必须更加坚定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王美今（中山大学）：**

灰犀牛事件不是随机突发事件，而是有一系列警示信号和迹象之后出现的大概率事件。

赞同刘志彪老师“货币超发才是隐藏在中国经济运行系统中真正的灰犀牛！”的观点。应当关注美元黑市汇率和“官价”的价差、黑市交易的活跃度，这可能是“灰犀牛”出现的重要警示信号和迹象；人们纷纷争着通过黑市兑换美元，可能伴随着资产价格大跌，债务链断裂，资本大规模外逃，本币大幅贬值。

**彭本红（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基层的执法、贪腐、利益分配、临避冲突等引发的群体事件都可能是今后一段时间的灰犀牛。

# 互联网平台企业扩张：欢呼还是忧患？

2017 年 8 月 7 日

**编者按：**随着以阿里为首的互联网平台企业的不断扩张，社会舆论也透露着对此的种种担忧。例如阿里近来提出的要建立“无现金城市”，并不断涉足通讯、共享、保险、医疗等行业，俨然描绘了一幅宏伟的阿里帝国战略蓝图。这类互联网平台本身就是具有标准的双边市场特征的产业，加之它自身独特的产业特点，社会大众担心其通过不断挤压线下实体经济，更轻易的形成双边市场垄断势力，并在其大数据优势下，构成对用户隐私安全的威胁。

基于此，本周，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组织群内专家、学者们，针对“互联网平台企业扩张：欢呼还是忧患？”这一主题展开讨论。

**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某特约研究员：**

阿里以阿里巴巴起家，真正做大做强是淘宝，围绕淘宝建立了一个人与货物的交易平台，衍生发展支付宝、阿里云、菜鸟物流以及影业等等更多延伸和跨界，投资更是覆盖互联网新行业，搭建了一个新帝国，核心是淘宝和支付宝。淘宝模式受京东类型的冲击，特别是未来社群社交电商的冲击和颠覆；支付宝受微信支付的竞争影响越来越大。阿里最大的问题是内生性创新不够，缺少像亚马逊、像腾讯的微信这样的技术产品颠覆性创新，更多的是靠平台的力量去收购和投资新的方向。对比腾讯，腾讯以人与人的联系为核心，目前仅以游戏、广告等收入，未来商业化空间更大。阿里还有一个变数，背后股权隐秘而复杂，和政治太紧密，风险极大。

目前的电商平台交易成本已经看齐实体店了，降低成本的效应不明显了，这也是传统电商平台到了瓶颈。

**唐德淼（无锡环研中心）：**

互联网平台类企业呈现以下发展趋势：（1）行业集聚能力强，以独角兽企业占据市场大多份额，产业链相关企业得到一定发展，但同类平台公司如差异化发展无质的区别，生存举步维艰；（2）具有市场寡头垄断的特质和潜规则行为，已发展起来的平台类公司如 B-A-T 企业有明显市场优势，对平台上的利益相关者合作方时常采用天然的“强势”行为，让众多弱小的利益相关者即合作商家无条件接受，由于寡头垄断让使用者无任何议价能力，也没有市场选择的相对自由度，存在“店大”欺客行为；（3）平台企业对商家制假、销假、偷税漏税等破坏市场的违规违法行为有时视而不见，平台连带责任承担不到位，成为“假货、偷税漏税等不法

行为”的推动者；（4）多数平台类企业，是在概念+资本+消费供给变化的推动下，通过“烧钱”的方式发展起来，对实体经济的创新挤压厉害，如低价驱动的电商平台让实体无法淡定地专注于品质的提升，对优质产业体系聚力创新是不利的。

基于上述趋势，对策是：（1）对于已形成寡头垄断的平台类企业，要运用产业发展规制的方法，如反垄断法，对该平台企业进行拆分，打破垄断，维护市场公平交易的环境；（2）对于平台类公司相关商家的不法行为，不能听之任之，要协同管治，还市场对质量的信任和合规的经营秩序；（3）要适当限制寡头平台企业的无序扩张，防止吸着社会资本的“血汗钱”，砸出很多“互联网鬼城”，造成社会总体资源的浪费；（4）政府要学习和运用互联网平台的思维，变革政府组织的“塔式”架构，实行扁平化管理，提高绩效，同时，要引导平台类企业对社会公共服务平台、智慧城市、智慧政务等领域的投资或技术合作，通过政企共建智慧服务，提升社会智慧治理水平，从而凸显寡头平台类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巫 强（南京大学产业经济学系）：**

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看，互联网平台公司属于双边市场/双边平台的范畴，它们提供平台服务，便利买卖双方交易，往往能为消费者提供多元化的选择，并在买卖双方交易中以特定方式收取一定的费用，维持平台的运营。互联网平台公司的确是当前经济新动能的一种体现。但需要注意的是，平台经济效应会赋予这些互联网平台公司相应的市场优势地位，有可能这些互联网平台公司滥用其市场优势地位，阻碍市场竞争。国内外反垄断理论研究已经将双边平台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实践中，互联网平台公司也应该成为反垄断法执行过程中的高度关注对象。但我国当前的情况是：（1）由于我国经济转型发展中强调以发展为导向的产业政策，而对反垄断法（竞争政策）重视程度不够，目前国内反垄断法执行部门更多关注在传统行业领域的垄断行为。全社会对互联网经济中可能出现的垄断现象还没有足够的理解，还没有意识到这种垄断对社会福利的影响。（2）互联网平台公司可能的垄断行为更为隐蔽，牵涉因素更为复杂，难以简单界定为垄断行为。

可以关注的是：（1）现有互联网平台巨头通过资本运作，广泛涉足各类细分的互联网经营领域，可能从根本上消除未来的竞争对手，这些未来的竞争对手原本是可以通过颠覆性创新，对其形成巨大的竞争威胁；（2）互联网平台巨头是否会在形成寡头垄断格局后出现串谋，从而压榨平台上的买卖双方；（3）互联网平台巨头与地方政府的有形之手结合起来，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大项目的推进中给予互联网平台巨头诸多优惠条件，这有可能进一步加强互联网平台巨头可能的市场优势地位。由此，我国特有的行政垄断现象有可能与互联网平台巨头自身的市场垄断地位结合起来，交织在一起。

**孙 军（淮海工学院）：**

当网络平台成为企业的主要竞争模式时，产品的网络效应越大，企业的产品定位就将越会

偏离最大差异化原则。在这种情形下，企业之间的兼并重组、大平台的形成便成为了互联网产业发展新常态。这地方要注意的几个问题：（1）并非所有产品都具有强大的网络效应，这就注定了阿里、腾讯等大平台能够控制的事物仍然有限，扩张过度、构建生态链等风险仍然巨大，当然这并非否定互联网在农业、工业中的价值；（2）在分工深化的当下，专业化互联网平台有其巨大的分工优势，并非巨无霸平台可以完全取代；（3）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变化日新月异，一个再大的企业都要时刻面临着被市场淘汰的风险，这种案例比比皆是，而且还在加速。

因此，我的建议是，不要过于担心。政府的主要责任是强化市场秩序监管、放开垄断市场和对于市场创新氛围的培育。

**赖红波（上海理工大学）：**

“阿里帝国，可以创造一切，也可以毁灭一切，甚至超越一切，很伟大又可怕。”——该文的担忧不无道理的。

一方面，我们在互联网产业发展的产业规制或相关法律方面亟需前瞻的跟进完善，包括网络平台规则和约束。另一方面，不可避免的形成“有钱任性”（随意收购兼并等），对其他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或发展形成伤害?

**毛 强（中央党校学报）：**

网络平台发展的垄断趋势明显，阿里、腾讯等在把握住初期社会创新机会时，引领了一段时间的潮流，但垄断地位形成后越来越变得对社会创新的阻碍，就如同滴滴越来越变成人们厌恶的样子。国家的法律法规应当完善创新产权保护、反垄断等的建设，保护知识产权，构建良好的创新和营商环境。

**张 宸（南京大学博士生）：**

作为一种新的经济业态，电商平台的大幅度扩张符合经济规律，而且具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大型电商平台的扩张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升级。电商平台作为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线上零售业态，其提供的服务本质上仍是零售服务，与实体零售企业并无二致；简单地说电商打压了实体零售业垄断了商品零售市场，就好比说汽车的出现垄断了马车的市场。

电商平台高额利润由先进的业态形式和巨大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效应产生的，而且在未来可见的一段时间内仍将维持高额利润。增加商品销售的数量种类能够降低成本，降低成本又会汇聚更多的商品到平台交易，这是一个正反馈的良性循环；与此相反，实体零售业则受到劳动力价格和土地租金价格上涨的双重压力；要素成本的此消彼长也增强了电商平台对实体零售的竞争优势。电商平台的市场份额大，利润高，并不能说明具有垄断地位，所有其他的零售企业和个人都是竞争对手。电商平台的市场份额是靠其便捷、低廉的零售服务获得的，一旦有其他企业或个人能够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消费者会毫不犹豫地用脚投票。按照传统反垄断的政

策限制其发展会降低经济运行效率，减少社会总体福利，所以有必要考虑用其他方法改善社会福利的分配。个人能想到的一个办法是利用资本市场社会化分配电商平台的高额利润：电商平台需要天量的资本投入，必然通过资本市场向社会融资，投资者可以通过购买电商平台股票的方式获得高额利润分配；一个实体零售企业，如果发现电商平台竞争优势太大，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购买电商平台的股票，通过买自己输来获利。

电商平台的快速扩张也有利于产业升级：（1）电商平台是大数据资源的生成者和使用者。大数据毫无疑问可以提升经济运行效率，是一种宝贵的经济资源。电商平台是为数不多的可以生成和利用大数据资源的经济主体，而其他形态的企业天然不能生成和利用大数据资源，或者生成和利用的成本极高。大数据资源的生成和使用也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因此电商平台的快速扩张有利于降低数据资源成本，提升企业的数据竞争优势。（2）电商平台的快速扩张可以为下一轮人工智能经济的到来提供 IT 基础设施支持、数据资源准备、技术积累和人力储备。特别地，人工智能经济将会是人才的竞争，中国大型电商平台培育的数以万计的 IT 人才可以在未来的人工智能产业竞赛中为我国赢得优势，抢占先机。

**柯 杰（正善资本）：**

电商作为交易平台，价值在于：（1）降低交易成本，破掉经销环节；（2）提升交易效率，供需信息对称；（3）增强用户体验，足不出户可全网采购。

**何 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互联网平台企业，为不同产品与服务的集聚提供了新型载体，缩短了厂商与消费者的流通链条，降低了成本，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多元化、碎片化、个性化需求。然而，互联网平台企业一哄而上，良莠不齐，特别是在前期，主要依靠资本的金元来攻城掠地，这不仅在短期内对传统企业造成巨大冲击，而且某种程度上也扰乱了常态经济秩序。此外，互联网平台公司收集、沉淀下来的厂商与消费者数据，如果管理不当，或在利益驱使下，容易引发公民隐私泄露。如新崛起的滴滴，投资界看重的就是其深度化的消费者各类场景数据。大数据时代，互联网平台企业具有公共性的数据，为私利所掌控与运用，安全隐忧亟待破题。

**刘志彪（长江产经智库）：**

以阿里巴巴、腾讯等为代表的互联网平台企业，是现代经济中新实体经济的典型代表。这部分新经济形态，原本就是实体经济。他们只是将传统的线下的经济活动，搬到了线上，从而节约了空间和资本、降低了成本、创造了巨大的网络外部性和效率。

为什么现在社会上有人反感这些互联网平台的实体企业呢？我觉得：（1）搬到线上进行的实体活动，对传统线下的实体活动产生了严重的替代，从而危害了后者的利益；（2）过去人们对实体经济的定义有问题，把实体经济看成是生产实物的活动，自然像阿里巴巴等互联网

企业的服务活动，就成了需要抑制的虚拟经济；（3）以阿里巴巴、腾讯等为代表的互联网平台企业，改写了传统制造业的规模经济理论，其扩张的边界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从而使人们担忧寡头垄断对公平市场竞争的影响；（4）随着某些互联网平台企业数据收集能力的扩张，人们担心自己的隐私受到侵犯，担心某些企业的股权安排，影响国人利益，担心某些公众人物的不当言论，会阻碍社会进步的方向。

这就提出了社会和政府对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的鼓励、宽容和管理必须有机协调的问题：（1）在产业分化中，对弱势产业中的员工的利益保护问题。市场竞争中应该坚持保护竞争不保护竞争者、维护员工利益不维护失败企业利益的原则。（2）对互联网平台企业，也要反寡头垄断行为。判断是否垄断的标准，最重要的不是规模和结构，而是有没有行使垄断势力去侵犯竞争者、消费者利益，有没有潜在的竞争。（3）制定个人信息、隐私保护制度，限制互联网平台企业对个人隐私类信息的搜集，以及不当利用的行为。（4）互联网平台企业公众人物的言论，要有自我约束和社会监督、批评等等。

**宋文阁（江苏省国资委）：**

以 B-A-T-J 为代表的互联网平台，应理解为一种方向，一种趋势，一种力量。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经济的舞台上占有重要之地。在当前表现的垄断、跨界、压榨等不足不良，我认为都是暂时的经济表象，仍需关注观察，更需要包容宽容。如阿里，尽管日本资本控股，在美国上市，关键看实质控股权在谁手里？经营行为符合不符合中国法律？能否定义为中国企业？实践证明：大企业都与国家战略密不可分。底线是不危害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当然也需要国家出台相关政策，可以拆分多家在国内上市。

**任采文（清华公管院）：**

技术创新先于制度创新，技术创新拉动制度创新，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当民主从用手投票，到用脚选择，再到“拇指”表达时，制度设计都需要有新的理念和工具。

**龙小宁（厦门大学）：**

我觉得阿里的成功有些被神化了，其实阿里的网上优势很大一部分是相对于国内流通环节过多的规制和过高的成本；当然国内市场的巨大规模也帮助阿里取得了规模效应。我不认为阿里是实体企业，这一点它不同于京东：阿里是个平台企业，做的是帮助买卖双方相互匹配的事情，它的巨大成功让人家看到流通环节的盈利率远高于实体企业，所以才有对实体企业冲击的担心；阿里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假货和产品质量的问题，这也对实体企业关注产品质量没有帮助。

**宋凌炎（江苏精诚 & 精缦毛毯）：**

互联网热潮已然过去了。人们从怀疑互联网排斥互联网，到认同互联网，再到享受互联网

带来的便利，这过程可谓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冒出无数互联网企业，大批互联网平台靠烧钱壮大起来，有多少互联网企业在 2015 ~ 2016 凋谢了。

马云同时大力着手布局线下实体，从文化、影视、体育、物流、超市、金融等等。有人说马云是八爪鱼模式，或者说是在线下疯抢。另外 BAT 的百度腾讯，包括京东也都意识到，纷纷转站线下实体、金融以及 AI 等。未来互联网也好、平台也好已不再是企业，只能作为一种工具。而在这过程很多实体制造业业已借助互联网在布局产业结构调整，产品创新，加快自动化与智能制造，从原来的 B2B、B2C 模式变成 C2M。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而恰恰这种模式对互联网平台是毁灭性打击。所以我认为现阶段互联网企业如果不加紧布局升级，未来将燃尽灰飞不复存在。而那些放开胸怀，主动拥抱线下实体经济，利用资源共享共进共生共成长的企业，未来将有无限机会，那就是——新经济。

**毛晓春（戴尔中国）：**

京东主要以 B2C 自营为主，从厂家或指定代理商进货保有库存进行定价销售，阿里有天猫 B2C 和淘宝 C2C 两种模式，作为平台按一定比例收取交易费，天猫商户需要经过厂家授权，一般不会有假货，而淘宝就不好说了。

**司增绰（江苏师范大学）：**

无论国外新进入的产业还是国内新出现的产业，都要及时动态地对其产业安全评估。产业生态系统中，超大型互联网企业可能就像大鲨鱼，它的出现肯定会严重破坏产业系统中业态的多样性，因此应实时动态地评估大型互联网企业对产业生态系统造成的产业安全问题。对互联网新业态的发展应持包容、宽松的态度，留足其成长空间，但也应关注其对原产业生态系统的破坏。互联网业态与传统产业之间是统一与对立关系，平衡好这种关系至关重要。

**王建国（日本中京大学）：**

关于虚拟经济的定义，其实最早开始被人们所提出来的是 virtual company，virtual corporation。这些都是与网络相关联的。重新定义也未尝不可，只是与人们的一般认识或经济史实上有过的概念有些距离了。值得注意的是，虚拟不代表不创造价值。把这种虚拟与实体经济对立起来，其实是一种很愚蠢的思想方法。而事实上，虚拟部分与实体部分的相互配合，相互协调，构成了新形态的创造价值机制。

网络经济的外部性表明，网络规模越大对每个加入者带来的效益越大。而大规模带来的垄断，又有可能带来市场势力，从而导致对消费者剩余的盘剥。应该通过对这两者之间的平衡性对资源配置的效率分析进行分析考察以后，才会得到一个比较客观的判据。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

（1）互联网平台企业扩张的积极意义：①在“冲击”、“破坏”传统线下商业模式的同时，更促进了线下模式的创新，加速了线下企业的优胜劣汰，为实体经济创新发展提供了新动力。②一个更具全球战略意义的效应——为重构 GVC 创造了条件。其机理即在于以其强大的平台功能，打破了欧美传统跨国公司对于市场渠道的垄断，从而削弱其在需求端对 GVC 的控制力，有助于重构需求者驱动型 GVC，更多中小企业可以更便捷更低门槛参与 GVC。

（2）互联网平台企业扩张引发的忧思：①扩张后的信息资源垄断及信息安全风险、信息滥用风险；②扩张过程中的“脱实向虚”，形成金融帝国，集聚金融风险；③企业之间的竞争乱象（包括平台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平台企业与线下企业之间的无序竞争等）。

（3）对策建议：①做强做优平台功能，促进线下线上互动发展；②规范平台企业的金融创新，严控平台企业金融风险；③规范平台企业之间的竞争秩序。

**彭本红（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平台经济、众包经济和分享经济是新经济的典型表现形式，目前应包容发展而不是削弱和限制。对于平台企业的过度扩张，要进行审慎管控。何时管控和如何管控，要看平台企业风险程度，以及是否危害整个平台生态体系。政府可以利用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管制手段进行必要管制，以规范竞争秩序。

**杜运苏（南京财经大学）：**

互联网平台企业为中国企业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提供了很好的机遇，但到目前为止，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平台主要是进口的跨境电商增长很快，出口的跨境电商规模和层次还不是很高，在国外的影响力有限，这可能是以后发展重点，否则无法利用中国互联网平台优势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

**周 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在过去，文化产品的生产由少数人决定，而互联网时代可以由“大众”决定。“互联网 + 众”是指互联网提供了全球化资源（包括资本、智慧和业务等）的协作和共享平台，成为文化产业展示、交流和交易等综合性平台，从而有效的降低产业运作的风险。一方面，互联网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信息流平台，文化企业从互联网收集分享的创意，利用互联网互动性，实现了投资者与创作者的对接。在文化产品出现在市场之前，将潜在消费者的想法和建议融合到产品中，沟通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通道，减少了文化企业与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得企业能够精准定位细分市场，整合用户的碎片化需求，增强用户的满意度。另一方面，互联网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人、财、物等的集聚平台，通过“众筹”、“众智”、“众包”等方式获得文

化企业需要的投融资、创意想法和专业人才等重要支撑，变文化创意为现实的产品和产业。

**王思彤（江苏省统计局）：**

当前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应用情况如何？我在以全国各地城市白领为主的某微信群做了一个随机小调查。结果显示，除家居行业外，其他互联网平台行业都有人涉足。但发展极不平衡。其中，社交、零售、出行、生活类均有 72.7% 以上的被调查者使用过，而时尚、教育、汽车类只有 27.3%−36.4% 的人使用过，家装、家政类使用过的人就更少了。这表明，目前社交、零售、出行、生活类互联网平台已经融入到大众日常生活生活中，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而其他方面还只是小众消费，需要进一步开拓市场。

**谈 镇：**

（1）市场经济的本质核心不是必然带来公平性和效率性，而是市场主体疆域的动态性扩张。（2）互联网及平台兴起是对传统经济供需链条的技术改造，这种缩短供需见面距离本质上是交易费用的节省。（3）阿里成功来自产业分化进程中买卖痛点的舒缓，其核心产品是淘宝和以此分化出的支付宝。相对于有划时代意义的腾讯技术创新，可划归实体经济的阿里要防止的是先发优势而成大数据垄断的寡头效应和风险。

**李国庆（当当网）：**

（1）看 10 年以上商业史，用价格战补贴用户来打击对手、清空市场，是最昂贵的。更别说是靠烧钱。因为靠自己巨亏，暂时打死几个对手，但企业自己竞争壁垒没建立，甚至连竞争规模优势都没建立。一旦想盈利只有提高售价。届时新的竞争者满血涌入，包括被打残企业也死灰复燃。（2）下半场，电商技术、物流等第三方成熟。新进入者成本大幅度降低，不用像上半场企业每过一条新河，就建一座桥。（3）无论是零售还是服务的电商，符合传统商业规律，不必夸大顾客忠诚度。每年我去纽约，都冒出几个被叫好叫座的新零售业态，说明零售竞争激烈，以致下半场提法可能是白扯。（4）一批垂直电商或互联网倒闭除了烧钱不够，更重要是不够垂直，不够坚定，主要死在扩大品类和客群。当当图书不仅是打不死的小强，至今低价且规模性盈利，还逐年给读者折让更大，值得业界深思。（5）当当盈利大增前提下，百货销售额早已超过图书。（6）从来都有颠覆性技术，区块链、在互联网之上的物联网带来随时随地消费场景，那已经功成名就的企业，包括当当都和新星在同一起跑线，何来下半场呢？

**孙国民（南京大学博士后）：**

网络平台作为第三方平台，从交易费用上来看，它减少了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进而减少了交易成本；从福利经济学视角看，消费者可选择提升范围的扩大，无疑加大了市场竞争，提升了消费者议价能力，增加了消费者的福利。尽管如此，网络平台经济，依然有一定的局限性：

（1）信息鸿沟带来部分人可以搭上网络平台的快车，增加自身的消费福利，而另一部分人很难享受到这样的福利；（2）只能部分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尽管可以通过网络聊天形式进行产品功能和价格询问，但总体上更适用于轻工业品、日用消费品等，对大件和重工业品的网络平台销售相对要少，也是理性消费及消费特点决定的；（3）网络信息的有限性，网络平台好比一个婚姻中介，需要各自的努力；（4）网络平台在市场经济中到底承担何种责任，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并加强网络监管，特别是消费欺诈、对市场主体进网络平台审核把关不严（如无证无照问题、自制品问题、质量安全问题等）、品牌滥用等。总之，网络平台经济在更好地服务市场经济发展中做出了卓越贡献，但依然存在双刃剑，需要进一步趋利避害，成为促进经济发展与转型升级的新动能。

**周 斌（江苏省邮电规划设计院）：**

（1）欢呼。①“颠覆重构”，创造了网上购物、无人商店、移动支付等新的商业模式，激发了许多潜在的需求，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一定程度上甚至颠覆了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基础，重构了商业规则；②“裂变创新”，主要是由技术创新带来的应用，尤其创新基础上的快速深度和广度的再次及多次创新，快速裂变转化为具体应用，如基于搜索的百度，基于估算 GIS 共享单车，基于移动支付的淘宝，以及互联网规模用户基础的美团、唯品、人工智能、VR、AI 等新技术和应用同样继续影响等等；③激励和效应，短时间快速的规模壮大及财富效应，激励和刺激国家、民间、政府等很多资源向之倾斜，大众创业及创新，新型经济大多也围绕之展开，更加激发了相关经济的发展。

（2）忧思。①迷失与困境，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越来越大，经济发展内在动力的制造业超薄利润以及掌控权的削弱使得进入壁垒无形中多了非正常的心理壁垒而迷失方向，而只有无法退出者苦苦支撑陷入困境；②泡沫与表象，过多及重复的资源投入，互联网的规模效应和低技术进入门槛使得表象繁荣背后泡沫越来越大，类阿里摸着石头过河，顺带把石头也带走了，后者如追求海市蜃楼般进入，大多死在沙滩上；③道德与风险，技术的应用带来了更多陌生人应用，网络社交刺激了社会人更多现实无法满足的欲望，道德和风险远远超过了历来其他的经济发展模式，假货、跑路、诈骗等甚至让人更多呼唤正能量。

（3）对策。①正视和均衡，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同样重要，不存在谁优谁劣，而且两者真正良好发展应该是实虚融合，均衡发展；②鼓励和控制，主要是鼓励发展，尤其基础性战略性的技术研究与商用，而控制主要是风险，无论道德和经济风险，两者都需要国家层面或行业层面做好顶层设计并分步分层实施；③抓大和放小，从国家未来竞争力发展角度去推进相关工作，用垄断法、修正的公司法等大的法律和规章引导，鼓励和限制总体，其他的可一定规则内以采用负面清单方式积极推广。

**林学军（暨南大学）：**

对于互联网经济，我认为有三点好处：（1）互联网确实是促进了交易，减少了交易成本，对实体经济有很大的帮助。（2）互联网改善了服务，提高了教育、医疗、旅游等服务部门的服务水平。（3）互联网众筹、众创，促进了创业的发展。当然，互联网也带来不少问题，例如，网上营销的恶性竞争、虚假宣传、网络金融的违规借贷等。

对策：（1）制定相应的法律、规则，加强互联网业务的监管，严打欺骗消费者行为，维护市场秩序；（2）严管金融市场秩序，防范金融风险；（3）发挥行业协会作用，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做到自我约束。

**毛丰付（浙江工商大学）：**

几乎所有产业都触网，如果只从与互联网接触密切程度讨论，于事无补。我的看法是把互联网产业分为三类，内容提供商、技术提供商和基础设施提供商。基础设施又可分为硬基设和软基设，BAT 平台企业问题属于软基设，只有这类企业，由于可以最大化运用网络效应，可以形成巨大的市场势力和社会影响力，赢者通吃，行业垄断，跨界竞争，抑制创新。这类企业可以考虑达到临界值后实行社会共有，开放特定环节和端口，由企业、社会和国家共管共有。其他的像快播和知网，属于内容商，华为高通技术商，甚至移动电信等基设商都可以用传统的管制方式处理。

**侯赟慧（东南大学）：**

在“创新驱动战略”背景下，传统企业需要利用互联网思维重新架构运营模式。平台作为其他企业发挥功能的必要、共享的“互补品”，并由于平台供给者在核心技术、组织间界面、竞合规则等方面的设定和领导，使得众多企业之间的分工、合作、竞争等行为模式与认知框架逐渐强化，形成一个可以整合系统产品和服务供给、增强系统机体创新能力的产业生态系统。用互联网思维将传统企业改造为更加弹性灵活的互联式平台，促进企业的跨界成长，从而为工业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将传统企业改造成互联式平台，能获取新利润增长点和竞争优势，与外部不稳定、未来不确定性、环境高复杂性动态匹配和整合创新，实现企业跨界成长的“智造”梦想。

以平台为基础的产业生态系统增长受到网络效应的驱动，如何保证足量的同边和跨边主体参与平台型产业生态系统突破临界规模，激发间接网络正反馈效应，是企业能否成功实现跨界成长的最大挑战。具体而言，就是平台注意力竞争、临界规模的突破、平台身份的锁定和平台竞争优势的获取。传统企业要在网络平台战略驱动下，通过路径依赖的“自强化”机制、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的“互嵌”效应、以及强化平台竞争优势的“反哺效应”，并在产业生态系统中实现以平台企业为核心的“鸡蛋相生”的正反馈协同效应。

# 互联网产业发展

2017 年 8 月 10 日

**编者按：**8 月 3 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工信部信息中心在京联合举办 2017 年中国互联网企业 100 强发布会暨百强企业 CEO 论坛，发布了 2017 年互联网百强企业名单。伴随着近年来互联网产业的蓬勃发展，其与制造业的融合又会促进哪些产业的发展？互联网将是中国智造新的发力点吗？又将会带来哪些急需解决的问题？

本周，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组织群内专家、学者们，针对“互联网产业发展”这一主题展开讨论。

**刘志彪（长江产经智库）：**

制造业与互联网的高度融合，是技术变革的进程赋予中国建立现代产业体系的最大良机。中国的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不可能完全抛开原有的传统产业体系另搞一套，而是要以对传统产业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尤其是以信息网络化改造为起点。传统产业不等于夕阳产业。再传统的产业，经过现代信息技术的改造，都可以成为现代产业体系的一部分，如对古老的流通产业的改造，使之成为新型商业；对炼钢工艺的改造，使之成为智能炼钢产业。实践证明，信息化和工业化的融合，能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跨越，使产业结构发生软化，使其竞争力大大提升。

中国智造新的发力点，总的来说主要在于知识产业的嵌入。利用信息网络改造传统制造业，是一个很实际可行的切入口。中国现在在一些具有人口和市场规模优势的产业领域，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技术进步，有些已经领先于全球，如高铁、某些工程机械、互联网商业化应用，等等。人口和市场规模的优势，便于一些先进技术的制造企业，从早期的技术开发开始，就具有降低成本的市场容量优势。这是未来鼓励企业形成中国智造新的发力点的重要因素。

加快我国智能制造发展的主要的建议和策略：（1）从宏观战略资源配置角度，充分利用我国拥有几千家大型国有企业的优势，尽可能去推动它们做具有连续型积累特征的技术创新工作。尽管我们对国有企业的功能有不同的观点，但是飞机航空造船核电等等这些现代巨型工业，民营企业要在短期内超过它们，是不太可能的；况且，国家的职责是要推动承担这些任务的国有企业通过创新的积累，不断地向世界先进水平看齐和赶超，真正达到世界级企业的水平。对那种具有飞跃式的、破坏性特征的创新活动，可能更多的是要鼓励或是推动民营企业去承担。民营企业在这个领域的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由于种种原因可能要比国有企业更加合适。（2）从产业发展阶段看，在那种市场、技术和管理相对比较成熟的产业中，如机床、汽车等产业，要更多地提倡和发扬光大工匠精神；而对那种市场、技术和管理相对来说比较年轻、成长性较

高的现代新型产业，则更多地要强调发挥飞跃式的、破坏性的企业家创新精神。这是既能保持经济具有潜在增长动力又能持续稳定增长的前提和基础。（3）从创新的微观主体看，那种有利于充分发挥工匠精神的持续性创新活动，如果在其成长的初期，能够得到来自政府的、自上而下的纵向产业政策的规划和支持，无疑会有助于这些产业的技术和能力的最终突破，并形成竞争能力；而那些具有毁灭性的、飞跃性特征的企业家创新活动，实践证明不可能主要来源于政府的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或预先计划，而是主要来源于微观企业，来源于企业家精神，来源于基层员工的自发进取精神，以及活跃的自由探索，因此在促进其发展方面，宜多用横向的竞争政策。

**孟 楠（徽银南京）：**

互联网与金融的整合，应该是未来的一个重点领域。传统银行最缺乏的是大数据的运用和金融创新：这一方面是监管层和管理层的思维革新，一方面是互联网科技体系的建设。现在传统银行仅仅迈出了第一步，就是各种 APP 手机银行的运用，部分银行结合内外部数据运用，设计了相关的互联网金融产品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江苏银行的税银合作产品，未来这样的互联网金融产品还会越来越多。此外，任何互联网金融产品模型都是建设在严谨准确的数据分析上的，这方面的工作我认为应该是重点。

**杨 锐（苏州大学）：**

在经济领域，互联网可以产生两方面相关联但性质又不同的影响：（1）把互联网及其运用植入原来的分工体系，提升生产和交易效率，实现产品量的扩张；（2）利用互联网及其运用对原来的分工体系进行重新组合、变革，形成新的分工，提供新产品、新服务。

互联网对生产领域最大的影响，集中反映在形成新的生产方式：大规模定制。它与工业化时代主导的大规模批量生产的区别在于，前者需要在市场中发现差异化、个性化的需求，更为重视设计和研发活动；后者则是寻求市场中大众的相似性需求。

**林学军（暨南大学）：**

互联网沟通市场的供需，改变传统的设计、制造、市场及服务的方式。主要有：（1）智能设计。通过互联网，企业更加了解市场的需求，设计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还可以根据个人的需要进行个性化的订制。（2）智能制造。通过网络可以按照市场需要自动组织生产活动，减少产品库存和次品，提高产品效率与质量。（3）智能市场。利用互联网组织市场营销活动可以缩短供需距离，减少销售成本，开展有针对性的促销，提高服务质量，为顾客创造更多的价值。（4）智能服务。互联网改变传统服务业的服务方式，例如快捷借贷、远程医疗、网络大学、虚拟法庭等，这些服务覆盖范围广，针对性强，成本低，速度快，质量高。

加强互联网的管理和安全。互联网有许多优点，但也有许多弊病。例如泄露个人隐私，侵

犯知识产权，破坏网络安全等。因此，政府在大力建设互联网基础设施，推广互联网的应用同时，还必须加强互联网的管理，要制定相关的制度和法律，保护个人隐私、知识产权，维护网络安全。

**宋凌炎（江苏精诚 & 精缦毛毯）：**

互联网在制造业方面起了重要推动作用：首先，互联网信息化拉近距离感，减少了销售成本；其次，在生产环节通过数据整理，增加精准度，提高效率与品质；另外，很多企业已经把很多人工部分的和危险性工作由自动化智能化设备来完成，对产品升级与管理升级都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互联网企业不能结合实际，融入各个现实领域，为各行各业提供有效的服务，那么它存在的价值就不高了，未来是产业全面升级的时代，如果脱离了实际就会被淘汰。

**孙 军（淮海工学院）：**

互联网与制造业的融合是大势所趋，目前国内的一些研究主要集中在消费端驱动制造业转型，主要表现在阿里、腾讯等公司对于大数据的运用上，这是中国真正的优势所在。基于此，我认为：（1）通过政府购买大数据的形式，使其能够共享，能够为更多的中小企业转型升级服务；（2）鼓励和构建机制运用互联网推动科研人员协同进行原创性和应用性创新；（3）运用互联网大数据推动装备制造业真正的做大做强，为互联网下的制造业升级奠定雄厚基础。

**宋文阁（江苏省国资委）：**

互联网＋某产业就是产业互联网，是全产业链的深度互联网化，是产业和互联网的交融竞合。而国企尤其是央企往往占据着关乎国计民生的产业的龙头地位，或者是掌控着整个产业链的牛鼻子地位，在“互联网＋”推动供给侧改革、助力产业转型升级、为国民经济培育新动能的新常态下，央企的互联网产业既大有作为，又责无旁贷。

**闫 浩（江苏省经信委）：**

美国互联网技术发达，但是产业空心化。美国打出工业互联网的旗号，实质就是把产业优势从信息化层降维到工业自动化层，让信息化行业的标准成为制造业标准，继续领跑全球制造业。德国用工匠精神打造了世界第一机械制造强国（隐形冠军企业众多），但是由于市场规模的限制，互联网产业发展滞后。德国工业 4.0 就是要把产业优势从工业自动化层升维到信息化层，通过完善 CPS 系统，巩固制造业强国地位。

中国既是制造业大国，又是互联网大国，我们推动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是要把这两个产业的优势进行叠加，即把互联网的创新要素、创新作用不断融入制造业的全过程和产品的全生命周期，不断提高每一个环节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从而形成三个效应：叠加效应、聚合效应、倍增效应。

**任保全（常州大学商学院）：**

（1）互联网产业作为推进制造业发展的助力剂，应促进互联网产业演变出更多能与制造业衔接的新业态和新模式的触角。（2）中国制造与互联网的高度融合，将会给以市场需求为中心、需要及时跟踪终端消费市场、进行个性化和柔性化生产的制造业产业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3）互联网是不是中国智造新的发力点，关键起始于制造业自身的创新力和附加值的提升。

未来需要关注以下问题：首先，在当前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难的背景下，应大力推进互联网金融的创新与发展；其次，未来互联网产业的产业集中度会逐步提高，互联网产业企业的市场势力将明显提升，这就需要规范互联网产业发展行为，避免出现行业垄断而对制造业产业发展带来的危害；最后，在共享经济背景下，应以互联网产业为纽带，将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产业的每个环节结合起来，从而破除旧有的垂直分布的产业链和价值链。

**罗立彬（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中国互联网产业在全球领先，这对中国其他产业的发展是一个突出的机遇。考虑到中国“经济总量全球第二，人均收入又处于中等水平”、“互联网产业比较发达”、“人口众多”的国情，中国特别适合发展“共享经济”，共享经济是可以带动一些制造业发展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共享单车的模式几乎是带动了自行车制造业重新焕发青春，不仅如此，还产生了完全适合共享的自行车设计（不充气的轮胎，电子锁头等）。

对于政府来说，首先是放手让市场去自己寻找制造业和互联网结合的点，不要去阻拦。只有当新事物真正影响到公共资源或者公共利益的时候再去管，而且应该挑真正棘手不得不管的点去管。

**柯 杰（正善资本）：**

互联网的本质就是三个词：联接、互动、结网：（1）联接，是指物理世界和 internet 的世界连在一起，也叫“在线”。在目前阶段，联接层面，制造业企业的运营管理能否逐步移动化，比如使用钉钉进行流程审批、电话会议，提升工作效率。（2）互动，是指在线之后，人与人、人与物持续联动。制造业企业，产品经理与用户深入互动，让用户参与，真正了解用户痛点；（3）结网，是指分工和合作开始用网络的方式实现，结网的前提条件是联接和互动。制造业融合互联网，采购、生产、营销、服务全流程的专业分工和持续合作，世界范围内全产业链结网，达到效益最优化。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

对于互联网与自主汽车产业的融合持乐观意见，甚至可以预见自主汽车产业的跨越式发展。理由如下：（1）借助互联网技术平台，消费者可以更直接地参与汽车研发和订制，从而发挥

汽车消费对汽车制造的正反馈效应。目前，上汽集团已在汽车订制领域开了先河。（2）用互联网技术改造传统汽车，使汽车成为与工作生活密切相关的移动平台。目前，上汽集团、吉利汽车、比亚迪等车企已纷纷启动汽车互联项目，其中上汽荣威取得了较好成绩。（3）借助互联技术研发智能汽车，彻底实现汽车换代。目前，国内不少车企均已在此领域立项发力，有望实现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弯道超车。

**孙建波（中阅资本总经理）：**

（1）所谓互联网经济，其实就是产品或服务的销售互联网化。销售渠道的互联网化，形成了更强的垄断，对于每个互联网平台来说，都实际上形成了对生产者的更大的议价能力，进货价格更低，剥夺了更多的生产者剩余。对于消费者来说，渠道的垄断，实际上形成了更强的定价能力，销售价格更高，剥夺了更多的消费者剩余。因此我认为，中国的互联网销售领域，急需规范反垄断机制。（2）目前的共享经济，其实就是利用共享的幌子，做了一些公共租赁的事情。其低价策略，无非是占用了公共资源，或者降低了服务质量。拿共享单车来说，已经形成了可怕的城市垃圾，从城市发展的大方向来说是退步的。

对策：（1）培育本土品牌；（2）治理不正常的“共享”概念，不要再浪费社会资源了，要探索城市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方向。

**刘瑞翔（南京审计大学）：**

我觉得互联网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企业的运作模式。对于消费者而言，互联网无疑降低了信息搜索成本，并提供了电子支付等便捷工具，使得购物和生活更加方便。对于企业而言，一方面互联网改变了厂商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重视用户体验的厂商将获得消费者的青睐；另一方面，改变了企业内部的组织形式，在组织层级变得更加扁平的同时，决策权越来越向一线员工转移。

**刘晓昶（华泰证券）：**

互联网是另一条重要的“高铁”，连接着通往全球的信息资源。互联网 + 人工智能 + 制造业，将使传统制造业安上智慧的大脑、插上腾飞的翅膀，快速进行产业升级和改造，其带来的后续效应和影响，我们可能无法想象，但前景会非常远大。

**刘根荣（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

制造领域的共享经济业发展迅速，成为制造业发展的新引擎。中国共享单车开始进军国际市场，伦敦、曼彻斯特、新加坡等城市纷纷引入中国的共享单车。估计共享单车会加快在全球主要城市的布局，市场异常广阔，前景看好。下一波共享经济的引爆点共享汽车，现在还需要在技术上解决自动停车寻找停车位的问题。

互联网时代的制造业巨头会纷纷演化成为大数据公司，掌握终端消费市场的大数据是为了制造业发展的最重要资源。掌握消费终端信息，掌握消费者偏好，是制造企业生产适销对路产品的前提，还可以为企业创新提供方向。

**缪 荣（中国企业联合会）：**

互联网作为新兴产业一开始是从信息服务独立发展的，随着技术能力和商业模式的进步发展到电子商务、线下生活服务平台整合、产业互联网等生产性平台服务。

近两年的看点在产业互联网和商业领域的应用。找钢网等产业垂直整合平台短短几年营业收入已达几百亿级，今年将入围中国 500 强，此类企业会越来越多。商业领域将出现消费者价值为起点的互联网动态整合者，全面超越以厂商服务为起点的阿里模式和怡亚通模式，以及以卖场思维为起点的京东模式，携消费者之威以令厂商，推动商业体系彻底洗牌。

**刘建森（徐工集团）：**

互联网与制造业的融合可以表现为：（1）制造业企业研发管理的网络化、平台化，实现异地同步研发，实现开放式共享研发。（2）互联网与制造业在营销方面的融合，将通过信息透明，打破传统渠道代理的信息不对称优势，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3）产品智能化并网络化，实现物联网，将提高对产品的运行、保养的管理水平。（4）后台管理部门也可借助互联网，实现管理审批网络化，提高管理效率。如财务系统一体化管控，可以对异地子分公司的经营预算、现金流等进行实时监控。

**陈 东（南京大学博士后）：**

互联网对中国经济的改变，可以从对企业内外部发展环境的重塑来考虑。（1）互联网使社会信息传输数量、质量、速度、透明度有跨越式发展，倒逼政府提供更好的制度环境，为经济提供更好的服务。（2）互联网使公司治理方式更加扁平化、节点化、一体化、网络中心化，传统的董事会，监事会，股东会等方式或许在互联网冲击下要进行重塑。（3）互联网让企业的信号传递更加便利快捷，倒逼企业重视信用建设和产品质量建设。（4）互联网对重塑传统政商关系大有益处。不仅在于企业的发展更多依赖于市场，信息资源获取更多来自于市场，而且在于政府服务更多贴近市场，压缩了政府服务自由裁量权空间，也增加了政商合谋的违约成本。

**宋常铁：**

（1）中国制造与互联网的融合还有漫长的路要走，数字鸿沟未缩小反而加深。（2）中国互联网与客户距离缩短，根本上取决于对人本主义的倡扬和尊崇。（3）互联网、物联网是深刻的产业革命，会对所有行业有助益，而非现实中实体经济的佐料，是互联网 +，而非 + 互联网。

**伏玉林（华东理工大学）：**

目前互联网经济在要素和产品的交易环节和金融领域成效比较显著，降低了企业的采购和销售成本，改善了小微企业的融资环境。互联网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方向是从消费互联网向工业互联网的转变，为物联网和智能制造奠定基础。

亟待解决问题是：充分发挥互联网通用、交互、开放、共享的特点，规模化解决共性技术、通用技术的信息集成和处理问题；各产业、生产组织和单元、环节的共性和通用技术信息的时时共享问题；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大数据平台和工业自动化的优势，如何实现叠加或倍乘的“学习效应”。

**朱新聪（海尔）：**

互联网产业对制造业在技术研发、营销品牌推广、销售渠道等方面的影响非常大。两个产业相互融合，互推发展，就像中国的电子商务与物流快递一样，很难说是哪个主导。对制造业企业来说，把握互联网物联网经济新机会，完全可以实现弯道超车和换道超车。如家电行业的彩电，CRT 到背投等离子到液晶，每一次新技术新产品都带来中国彩电企业领导者的更替。政府部门需要做的就是引导和产业孵化，少监管多守夜。

**董也琳（南京市委党校）：**

互联网化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可能会主要体现在时空两个方面：在时间方面，制造业生产不畅、库存高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供需信息不同步和扭曲。通过信息化和互联网化的即时、多端口、同平台信息共享沟通，实现数据实时更新和纠错，达到定制生产、精益生产和精准营销的目标。在空间地理距离方面，互联网化可使产业链中研发设计生产销售突破时空限制，有利于研发设计等无形商品和服务要素快速全球分享，从而为全球创新链的链接提供物质基础和硬件条件。

**唐德淼（无锡环研中心）：**

互联网和制造业的融合路径有：（1）制造业进一步进行信息化、智能化和大数据的有效挖掘和转型升级，实现“+ 互联网”模式的有效融合和协同；（2）制造业对生产流程、生产线进行智能化改造，适应工业 4.0、中国制造 2025 建立智能生产线、智能车间、智能工厂，同时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升级，实现制造业的“智慧化”；（3）制造业要主动对接“互联网 +”商业模式，使制造业各个环节在互联网平台上实现横向和纵向或交互等方面全方位的资源有效整合；（4）互联网和制造业的产业规制，要本着有利于有效融合和效率提高的目标，进行深刻变革。

**何 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互联网与制造业的关系，存在一个“体”与“用”的关系。前几年，在风口下，互联网成为体，

而制造业成为用。现在，随着实体为体，制造业作为中国经济立身之本，重回本之地位。

互联网化，确实是中国制造业弯道超车的一个路径，然而如何让灵魂等待身体，确是互联网化深入发展暴露出来的问题。制造业面临的挑战，重重复重重，非常需要大智慧来认知与决断。制造业的互联网化，不要神化，也不要魔化。个人以为，还是要从行业、产业与公司的实际出发，一定要有定力与耐心，坚持以为我本，做好自己。

**张建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近几年，中国活跃的技术创新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有影响力媒体上的话题。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中国实实在在地抓住了信息技术带来的机遇，不仅出现了一些新兴行业，而且对传统服务行业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改造。例如网购、无现金支付、共享设施等。

但是，相比于服务业，制造业被信息和互联网技术改造的速度较慢。信息技术对制造业的改造包括产品、流程、组织和商业模式等方面，这也是技术创新的四个方面。目前，信息化产品已经比较普遍了，如智能马桶、智能电饭煲、智能电网，等等；而其它三个方面进展缓慢，其中难度最大的是流程改造，这也是德国工业 4.0 的关键。所以，政府应当在流程的信息化改造上给予企业更大的激励和压力。

**姜彩楼（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互联网对生产领域的改造，可以追溯到克林顿时期提出的“信息高速公路”概念。这个概念的提出得到了工业发达国家的积极响应。一方面，这些国家大幅度提升本国互联网能力，另一方面，互联网作为生产基础设施，开始对传统工业领域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并逐渐建立以互联网为决策基点的生产组织方式。互联网与制造业的结合，不仅仅是对要素、资源等物质层面的改造，而是生产方式、决策模式的彻底改变。

**朱丽萍（山西财经大学）：**

（1）互联网的网络外部性导致垄断是互联网的特性，梅特卡夫原则下网络产业的价值就体现在用户数量上，只有垄断才能创造出更大的价值。这是互联网产业与传统产业垄断最大的差异。（2）互联网的本质是信息连接，连接解决了人类沟通中的时空痛点，提高了效率，必然改变人类工作的协作方式、组织方式。（3）互联网与制造业的融合已经不是趋势，而是进行时甚至接近完成时。（4）中国互联网应用比较发达，但互联网的核心技术还是在美国。（5）互联网快速发展下应该关注伦理和法律的问题。

# 供给侧收缩的影响：像雨像雾又像风？

2017 年 8 月 16 日

**编者按：**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引领下，以“三去一降一补”为重点任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均取得积极成效，产业结构调整向纵深推进、经济增长新动能逐渐形成、宏观经济呈现稳中有进的态势，进一步夯实了我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基础；但与此同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依然艰巨，在推进过程中出现的不协调问题同样需要引起各界的关注。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与之而来的产量收缩及价格飞涨也逐渐浮现，这一问题将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何种影响需要深入探究。本周，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组织群内专家、学者们，针对“目前供给侧产量收缩，导致了所有涉及的部门价格飞涨，这种趋势对下半年或明年的中国经济有什么影响”这一主题展开讨论。

**龙小宁（厦门大学）：**

目前供给侧改革中多使用行政干预手段，用一刀切的方式降低产能，结果虽然在总量上降低了产能，但也造成了多方面的负面效应。首先，优劣产能不分，去产能反而加剧了市场中供需的不均衡，一方面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不足，而劣质产品的供给没有得到应有的削减。此外，因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不足、价格高企，相应地，劣质产品价格也水涨船高。这样又一轮的价格猛涨，进一步扰乱了价格引导资源有效配置的市场机制，给未来的投资环境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更不利于实体经济的复苏与发展。

总结起来，凡事欲速则不达，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经济亦如此。

**何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目前看，涨价的直接动因来自于去产能导致的供求失衡。从深层动因看，主要是资源价值、人权成本、生态环境成本提高的结果。涨价，就其直接效果而言，就是相关企业的盈利状况大幅改善，而这或许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一个机会。涨价，会是经济良性循环的一个起点。毕竟，在通缩中无人受益。现在的关键是，能否利用好新一轮商品价格上涨周期的宝贵的时间窗口，推动盈利与升级的良性互动。这个问题值得关注。

当然，涨价的幅度与速度，非常重要。最好是温和上涨，而不是价格暴涨，让经济大幅波动。

**唐德淼（无锡环研中心）：**

供给侧的“三去一降一补”等方案的实施，尤其是“去产能”的推进，打破了既定供需平衡，再加上产能过剩界定精准性的缺陷、地方政府或产业条线采用强干预的行政手段“关停并转”政府认为应该“下马”的产能、以及新的符合市场新需求的产能没有生成，也不能对由于“去库存”留下的供应缺位有效补位。

这一经济现象，将对今后经济发展产生影响：（1）关键生产要素将不同程度涨价，导致投资和产能的扩大再生产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要素价格易进入“价格不断攀升”的恶性循环；（2）消费性产品将出现“短期性平稳（价格）—维持性微涨—基于成本上升普涨”的价格上升现象，导致消费受到抑制，尤其中低收入人群的受抑程度更深，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功能削弱；（3）竞争性领域的生产企业，受要素涨价的影响，在产品销价上涨“话语权”小的情况下，供和销挤压下可能会选择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的市场“不道德”行为，导致企业专注质量、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提供引领消费的新供给难上加难。

**楼稼平（宁波布衣）：**

（1）这种价格上涨，不会再刺激供给侧的投资增加，却伴随着供给侧提供就业机会与岗位的减少。（2）这种价格上涨，非需求拉动，毋宁说是（社会的与自然的）资源价格的重估过程，因此，涨价的受益者是社会（制度）资源与自然资源的供应者（政府），而不是就业者的收入，也因此，这种价格上涨属 PPI 范畴，不直接导致消费市场需求侧势力的增加，故对 CPI 没有直接影响。（3）这种价格上涨，短期内是对下游产业利润的强制瓜分，中期则一方面压缩终端市场对这种资源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将诱致下游企业的资本 – 劳动结构的调整，即以技术、组织变革方式，减少产品的人工成本含量以腾出消化资源成本上涨的空间，未必会将这种价格上涨完全地传导到消费市场。

总之，这种价格上涨所引起的上下游市场规模变动是都收缩型的，在产业结构僵化之前、尤其是就业规模未压至极限前，不会引起 CPI 的全面上涨。

**宋文阁（江苏省国资委）：**

不可否认，去产能、去库存成效明显，但行政化的“硬去”带来了原材料价格上涨，给下游企业降成本带来了沉重负担，或许传导到 CPI，造成通胀。

当下的经济去杠杆，重点在国企，重点在金融，尤其是所谓的互联网金融；而不应放在民企。我倒觉得，降成本，尤其是通过科技技术降低成本，通过创新降低成本，通过降低税负率降低成本，意义更加巨大。

**邵 军（长江产经智库特约研究员）：**

以行政手段为主的去产能取得成效，国有企业获益巨大，已成事实。现在需要关注的是，本轮原材料价格暴涨，其中供求关系变化、预期行为、投资需求拉动、消费需求拉动诸因素各占多大比例，需要逐项分析。

在此基础上，需要回答：（1）如果供求关系变化，或需求增加，增加或恢复部分产能，是否以市场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是否继续对民企准入？（2）是否传导到最终消费品？在控制物价和维持下游企业盈利两者间如何平衡?

**刘志彪（长江产经智库）：**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上游价格飞涨，这是有利于倒逼中国经济转型的一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可能要掌控度，否则好事变坏事。长期的上游低价，里面并没有包含环保成本和劳动力正常补偿费用，而是通过下游的低价竞争，补贴了外国人。现在是一定程度上的纠偏。但是这种纠偏，会使下游产业非常痛苦，如果不能把涨价的成本消化掉，下游相关产业就要衰退。

上游长期低价，为什么会产能过剩？（1）加入 WTO 后，遇到世界市场黄金期，我们产能扩张速度快，现在人家进入结构调整期，我们自己国内消化不了；（2）2008 年四万亿量化宽松，产能又有所增加；（3）住宅、家电、汽车三大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在熄火，新的主导产业还没有形成，与此相关的产业必然发生产能过剩。

**宋凌炎（江苏精诚 & 精缦毛毯）：**

中国制造业经过了供给侧改革，价格上涨对于未来经济的影响：（1）供给侧改革对于去库存与产能过剩确实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会导致某些方面去产能过头，造成产品短缺现象，加上一些龙头企业看准缺货垄断操作，导致行业价格波动很大；中小企业在这过程很难存活。（2）在原材料价格波动大的情况下，由于成本的不可控因素，外贸销售企业心中没底，外贸订单接单受影响，外汇也随之受影响。（3）目前去产能基本还都是去民企的产能，这种不平衡状态会进一步推动民企倒闭潮。其实民企有一定的灵活性，经营者时刻对自己生产的产品是否过剩进行评估，同时民企的资金压力也不容许民企大量产能过剩；真正的产能过剩应该在国企和大企业当中，僵尸企业很多也在国企。

去产能力度过于强大，短期价格上涨，导致了很多不确定因素，由此将导致大批中小民企倒闭，对于税收与社会就业也会造成一定冲击。

**林学军（暨南大学）：**

供给侧改革涵义：（1）减少过剩产品的供给，减少资源浪费；（2）减少非市场需求、劣质的产品的供给，同时增加适销对路产品、优质产品的供给；（3）去产能应当遵循市场规律，

行政命令固然可以快速达到目标，但可能伤及市场需求产品，使市场供给从过剩变为短缺。

政府可以以行业发展规划进行引导，还可以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抑制过剩产品的生产，还可对过剩行业提高产品标准，严格生产条件等，尽量以市场经济的手段，通过竞争，优胜劣汰，减少产品过剩，达到市场相对均衡。

**陈 东（南京大学博士后）：**

（1）去产能后，上游价格暴涨但下游市场并未好转，对下游部分民营企业影响较大。（2）去产能后的补产能，在准入门槛上民间资本难进入；在进入能力上民间资本整体受打击较大，有心无力；在准入决心上民间资本将信将疑，怕再次被“去产能”。（3）去产能应该和增新动能同步。如果失衡，笼子腾了，鸟没有换来，这种笼子价格和鸟食物价格的同步提升，将会严重打击国内制造业的整体未来。

**毛丰付（浙江工商大学）：**

（1）本次调整可能加剧了结构失衡和调整难度。（2）失衡加剧会使冷热不均现象更明显。（3）计划手段和行政控制的应用范围和程度进一步加深。

**郭育嵩（新世纪物流）：**

（1）今年上半年出口增长15%，进口增长25%，说明中国所需大宗商品比较集中，量大价高，国内供应去产能所致。（2）近期人民币持续升值，也可反映出下半年出口压力大。（3）19大召开在即，“去产能”也是稳中求进的表现，明年中国经济应是稳中向好。

**陈 柳（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商品涨价是基建为代表的投资超预期、出口超预期、市场对供给侧改革减产预期、环保管制等多方面因素的结果，各个行业有所不同。因为钢、煤、有色的上半年产量都是显著增长的，所以，去产能的政策对这类商品价格影响主要是预期和炒作（影响大），政府投资带动需求扩张对价格影响是真实的，这点从不是供给侧去产能的工程机械高增长能佐证，有数据表明上半年建筑业总产值增长10.9%，而2016年是7.1%，2015年是2.3%。

我觉得目前去产能仍然是较温和的，去产能并没有去产量，主要商品产量仍是显著增长。按照经济新常态的判断，需求端增速不太可能高速增长，除非继续放任地方政府无节制举债投资或全球经济意外繁荣。按当前的财政货币政策导向，上游价格持续上涨的基础不存在，向下游传导的逻辑不存在。但其中关键是要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市场以合理预期，在部分商品今年需求出现结构性增长的情况下，仍以行政命令去这些行业的产能，市场价格怎么能不涨?

产业组织结构将真正成为影响定价的重要因素，中国传统产业在进入新常态之后才成为成熟产业。2011年到2014年的萧条，使得众多企业资产负债表无法修复，加之这几年的技术进步，

原有企业无法重返市场，大大提高了市场集中度。不少传统行业生存下来的大企业具有了定价能力，即使是家电行业、乃至算是新兴的智能手机行业，都很难有新的进入者。

**伏玉林（华东理工大学）：**

价格上涨是供求、制度和预期调整的结果。产生的影响：（1）价格上涨如果来自于资源环境治理因素，这将有利于经济转型；（2）价格上涨如果来自于劳动力供给总量减少所引起的成本上升，这将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状况；（3）价格上涨如果来自于低效率企业的“去产量”和高效率企业的“去产能”，这将不利于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4）过多的行政干预将引发价格信号的混乱（如交运和批零的高增长与PPI密切相关），加剧了市场预期性调整行为。

**张小兰（西南民族大学）：**

供给侧的目标是产能收缩还是产能升级？产能收缩可以预期的是库存降价格升，接续的措施应该是抬门槛升级产能，有能力有条件的企业应该主动升级，抓住时间窗口，提高升级后的产能产量，填补原有产能缩减后留下的空白。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

短期内，涨价所致的原材料成本甚至可能取代融资成本，成为下游企业最紧迫的成本压力，这种情况在纺织行业较为明显。当然，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对下游企业以及消费终端的影响，应该会呈现出产业差异。

从中长期警示意义看，还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思考。（1）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决策逻辑：重实体经济、优实体经济，为实体经济转型创造条件。这个逻辑要求既要关注短期数据，但又不能为短期数据而改弦易辙。原材料价格以及下游产品价格即属于此类。（2）驱动实体经济转型的两力：内力（企业利润）+ 外力（政府政策）。企业利润是转型的内驱动力，既源于价格销量决定的收入增加，也源于各类成本费用的下降；政府政策重心在于为企业转型提供外驱动力。内力是根本，外力是辅助。（3）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压力与动力，即实体企业生存压力 + 实体企业升级动力。上游原材料领域的行政垄断亟待打破，不能让行政垄断所致的成本压力成为新大山。（4）“三去一降一补”方案在执行层面要“不忘初心”，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是目标，市场化法治化是操作原则，政府之手主要集中于降行政成本，以及强化标准、品质、环保等方面的市场准入规则。

#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大规模兼并重组

2017年8月24日

**编者按：**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战略。在经济改革重要领域，资本市场一直发挥着拓荒、加速、完善的巨大作用；近年来，特别是2017年中国证监会提出要更好发挥并购重组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以来，监管层继续鼓励相关公司在强化信息披露、风险揭示的条件下以市场手段进行兼并重组，资本市场风起云涌的兼并重组正以其前所未有的活力助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攻坚，兼并重组也已经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实现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式之一。

历史经验表明，兼并重组有效推动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内涵式进程；但我国尚未发生大规模的兼并重组浪潮，经济发展过程中产能过剩、效率低下等的相关问题也逐渐积累并阻碍经济发展。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阶段，理顺二者关系，并通过引导资本市场的大规模兼并重组来有序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等方面仍需深入研究。本周，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组织群内专家、学者们，针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大规模兼并重组”这一主题展开讨论。

## 观 点

### 刘志彪（长江产经智库）：

资本主义发达经济的实践证明，在市场经济下，通过收购兼并走工业化成长道路，是一种最为内涵化的发展方式。这是经济运行机制不断自我清洁的过程，也是结构调整深化的过程，更是发展水平高度化的表现。同时我们看到，中国工业化历史也有六七十年，但是没有发生过一次像样的大规模兼并浪潮。长期投资的误差不可能自动得到纠正，产业结构不可能得到自动结清，僵尸企业、产能过剩不可能得到自动的清除，发展的包袱就会越来越大，发展效益也会不断地降低。

如果把收购兼并放在最重要的位置，那么供给侧如供求结构不适应、供给质量低下、僵尸企业越来越多、产能严重过剩、劳动者安置等宏观问题，就可以在企业的董事会上得到有效的解决，而不需要中央政治局层面出手，更不需要运用行政手段强制去产能和降杠杆。

鼓励通过兼并收购方式调结构：

（1）与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结合起来。联通的混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2）充分利用股票市场的公平公正公开的特性，积极鼓励优势企业兼并有利用价值的僵

尸企业。有时，一个反向收购的制度设计，便可以“三公”地解决混改中民间资本入住的问题。

（3）坚决打破地方部门保护和垄断，放开并购者的手脚。只要不违反国家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都应该积极鼓励企业进入，彻底打破民企进入产业的玻璃门、弹簧门。

**朱晓煜：**

中国企业大规模兼并重组需要解决规则问题。因为中国企业成份复杂，起步背景不一，国有私有常常混淆一起，万科事件就是典型案例。

**翟太煌（山西证券）：**

兼并重组无疑是解决供给侧失衡的最有效途径，而且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为其提供了三公且高效的手段。作为手段或桥梁的资本市场，一方面大量的僵尸企业退出历史，一方面强强联合的案例同样不在少数。与此同时不应回避大量僵尸企业产生的原因，从根本制度上解决僵尸企业。

**唐德淼（无锡环研中心）：**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只是通过非持续“文件”推动的行政手段进行“拉郎配式”资产兼并重组，没有产生资产配置向优质高效的转型升级，资产的核心竞争力、其所在产业链与价值链的控制力内在提升动力不足；供给侧推动下重组的内生动因匮乏，因此大规模兼并重组可能性不大。

要处理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兼并重组的关系：（1）兼并重组要基于产业链和价值链控制力的提升，培育市场竞争力强的舵手型“链主”企业；（2）慎重选择相关多元化战略做深产业链，还是采用非相关多元化战略“稀释”企业资源；（3）更好地发挥市场优化配置资源的作用，减少行政无谓的干预，打破国资、民资等身份“歧视”；（4）优化兼并重组的资本市场、资产评估、供给侧制度规则等政策环境，防止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名，为兼并重组而兼并重组。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

坚持原则，协调关系，明确重点，完善平台：（1）真正体现全面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特质，坚持法治化、市场化原则。（2）协调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做好负面清单管理并出台相关政策，优化营商环境；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3）明确兼并重组的重点产业领域，主要包括原有 GVC 分工体系下出现严重过剩产能的产业和构建新型 GVC 分工体系中急需培育龙头企业的产业。（4）完善兼并重组活动中的产权、股权、债权等交易平台，特别是应加快完善并充分利用股票市场这个平台，推进兼并重组。

**王世文（苏州科技大学）：**

并购能实现产业整合，但也会形成垄断，改变市场势力，影响价格和资源配置效率。

**孙 军（淮海工学院）：**

兼并重组实际上就是供给侧无法适应需求侧、供给过剩而进行的市场优化配置手段，目的是降低产能和不断满足需求侧出现的新需要。政府介入是有必要的，但若简单的以行政手段去产能、国有企业不断做大的话，虽然能够短期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但很难解决供需不匹配、效率提升和推动产业升级满足消费者需求等问题，并且在长期又会复发，严重浪费社会资源。另外，鉴于国内需求侧仍然弱势的背景下，上游去产能会严重伤害到下游企业。

鉴于此，提出如下建议：（1）政府要以负面清单形式去产能，不要强制性去产能；（2）鼓励利用资本市场进行兼并重组，并适当降低 IPO 规模；（3）鼓励企业纵向兼并，尤其是要为科技民营企业走出去兼并发达国家企业和利用他们的智力创造条件。

**宋文阁（江苏省国资委）：**

（1）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看，大企业发展之路大都通过并购重组壮大起来的，并且承接国家战略。

（2）从中国经验尤其是国企国资视角，大都是通过行政化手段，采用吸收合并的方式，调整国有资本的布局进行并购重组，但同时带来许多不协同、不协调。

（3）以三去一降一补为主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当因地制宜，更不能过多行政命令。

（4）供给侧结构改革与大规模的并购重组，两者不宜结合，否则国有经济及国有资本的总量、规模、结构，都可以压垮挤压民营经济及民营资本。

（5）联通混改的样本并不具有指导意义，BATJ 也是巨无霸的市值规模、体量巨大的非公有制资本企业，具备与国有资本混合的条件与基础。但更多的民营企业根本就没有实力与条件参与并购重组，只能被市场淘汰，被资本放弃。

（6）通过并购重组，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健全国有企业产业链、价值链及业务链，降低企业全成本，弥补国有企业机制僵化的短板，进一步提高国有资本证券化率，进一步提升国企价值创造，为增进人民福祉作出更大贡献。

**王辉龙（南京党校）：**

对企业的兼并重组应尽量避免不当行政干预，让效率高低成为兼并重组的尺度，政府要做的就是降低交易成本。

**陈岸立（山东农发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以提高社会整体经济效益为目标。兼并重组应以市场为导向，行政力量适度介入，充分发挥市场的力量，兼顾各种市场主体。

**崔卫东（蓝鲸咨询）：**

（1）产业治理能力强弱影响产业发展。产能严重过剩、僵尸企业难以出清，产业处于全球竞争的中低端，严重影响产业发展。

（2）以建设产业治理能力为目标的兼并重组影响收购方的态度与估值。作为全球产业领导者或规划成为产业全球领导者的收购方要站在全球产业治理的角度认识、评估兼并重组的价值，通过出清过剩产能和僵尸企业，创造良好的产业治理环境，获得产业治理价值。

（3）大规模兼并重组可以全面建设产业治理能力。大规模兼并重组可以促进社会资源优化重组，再造产业价值，增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

**何 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兼并重组，应该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第二阶段，是对供给侧进行结构优化的阶段。如果说去产能阶段的结构性改革，行政高压是非常重要手段的话；那么兼并重组阶段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应该更加重视市场的自主匹配。目前看，兼并重组确实水到渠成：国内规模型企业大量涌现，且行业间的恶性竞争已经趋于饱和。故，非常有必要通过兼并重组，让成熟行业与企业的竞争趋于良性。值得注意的是，在推动兼并重组时，也应处理好垄断与竞争的关系，要谨防部分强势企业以兼并之名，行垄断之实。

**吴福象（南京大学）：**

从产业发展和经济运行生命周期看，复苏尤其是繁荣阶段，主要是以企业内生性投资为主，带动社会的产业和产能扩张。而在危机和萧条阶段，基于相容性和互补性的兼并重组，则不失为更好的选择：一方面，它可以避免全社会投资扩张造成新的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又能更好的发挥集团化和规模化的经济优势，同时还能利用资本市场优势，引导社会的资源配置和流向。

**陈 琛（机工智库）：**

中国现在到了一个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网络经济全面发展的时代，兼并，可能不仅为了市场，更是为了技术的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比如大飞机、高铁、高技术船舶，技术突破必须要拥有巨大的财力，以及在研发到产业化阶段的规模化应用。

**陈 柳（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形成活跃的兼并收购市场或者说是浪潮，要看基于什么样的资源基础的并购：基于产能的并购，还是基于创新的并购，还是基于商业模式的并购？互联网新模式的市场中，市场化程度很高，经过一段时间惨烈竞争之后，在垂直细分行业都形成了寡头；活跃的技术并购，往往是巨头对特色小企业的收购容易成功，像华为这样技术型巨头是最有希望的；目前，当前我们说的并购主要可能还是基于产能的并购，这里面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可能是如何让失去竞争力的僵尸企业释放产能，现实中僵尸企业涉及以银行为代表的种种债务问题，破产难度极大，其他司法程序漫长且不利于产能并购。

**张明之（南京政治学院）：**

（1）厘清二者之间逻辑关系。大规模兼并重组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非唯一选项，警惕以供给侧结构改革为名而挤压民营资本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2）厘清二者之间层次关系。供给侧结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大规模兼并重组发生的领域和力度；大规模兼并重组能见成效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反映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要求。

（3）厘清二者之间价值归属关系。供给侧结构改革是宏观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伴随生产能力调整的是财富在国民经济不同产业间的流动；大规模兼并重组的结果是财富从中小企业流向大型企业。

**郭育嵩（新世纪物流）：**

（1）供给与需求产生了不匹配，资源配置错位。

（2）市场自我调节已不能实现优化再生，因为存在“囚徒困境”。

（3）政府行政干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保证，因为有人员成本、优化产业结构、税收等。

（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伴随大规模兼并重组是必然的，如钢铁业、煤炭业、造船业。

（5）兼并重组是消化、吸收供给侧与时代发展不协调的手段。

（6）兼并重组使行业集中度不断提升，供应与需求又有了新的动态平衡。

**缪放嵘（南京中诚石化集团）：**

目前国内的并购基于产能和市场的偏多，出发点仍然是规模经济，但市场化下更高效率并购出发点应该是并购带来更高的股本回报率，或者是更高的现金流周转低率，最起码是轻资产运营本质下能对整个产业链更好的控制。否则大环境不确定下应慎重并购。

**周景梅（扬农化工）：**

（1）兼并应该是企业自主行为，是一种“补强式”并购。（2）兼并后的重组是关键，如

何对被兼并企业进行重组，如何提升核心竞争力，企业文化如何融合则是兼并能否成功的关键。（3）跨国公司在发展过程中，不仅仅只是兼并，也有业务剥离，集中力量发展核心业务。目的和兼并一样，就是强者更强。

**张启祥（南京市信息中心）：**

企业兼并重组必须是以企业为主体且是自觉行为，也是一种“自衡式”并购。在此有几个不容忽视的问题：（1）政府行为是个双刃剑，标准尺度是有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有利于社会效益最大化；（2）操作过程中要厘清知识产权、企业文化等权重，明确其在股份中的占比；（3）在强强联手的同时，也有必要进行业务瘦身，副业辅业剥离，集中力量发展不可替代的核心业务；（4）尽可能兼顾社会效应，不宜将企业做成行业垄断寡头，这样将来会遇到可以预见的麻烦。

**刘建森（徐工集团）：**

（1）只有在经济发生严重危机时，才是收购兼并的时机，例如 2008 年–2012 年是海外并购的良机。

（2）收购兼并的企业必须三年内整合完毕，走出困境。

（3）中国政府主导的收购兼并行为是撤并，是对经营不善的高管的变相惩罚，对员工的保护。对于收容的一方，也是一种激励，至少是领导对自己经营能力的认可，所以会想法处置这些不良资产。如中国国机集团收购的一拖、常林、中国二重集团、中国地质装备集团等等。

（4）对于势均力敌、同业竞争激烈的双方，由政府强行合并重组，会大大挫伤双方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市场竞争、提高效率。如南北车合并。

（5）中国企业兼并重组要充分考虑中国市场的规模容量、人文差异和需求特性，不能简单参照欧美企业的收购兼并案例。比如，民企收购国企，国企职工主人翁意识拒绝认同新主人。

**宋常铁：**

（1）收购兼并是优化供给、淘汰落后的重要手段；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政府应给予鼓励、引导。

（2）混合所有制经济应是国有、民营经济互相促进、互为助力，要防止收购兼并成为国有企业收购富有活力民企，导致国企垄断所有高成长性行业。

（3）加强金融市场改革，尽快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遏止非理性收购冲动。

（4）丰富兼并收购的市场手段，让更多新产业、高科技产业在兼并收购中受益，加快成长，而不是相反。

（5）加强推动收购兼并的政府官员、国企领导的跟踪考核与党纪监督，防范政绩工程、形式主义，实行终生追责制。上市公司完善信息披露，确保有效的并购；对企业 IPO 进程中的并购尤其要认真审核，才准许上市。

**陈爱贞（厦门大学）：**

并购作为促进企业间资源控制权再分配以使得资源得到更有效利用的一种模式，只要是市场导向而非政府主导型的并购，都能影响并购后企业创新活动的规模和定位。目前中国企业并购存在的主要问题除了政府主导型并购、产能过剩行业并购难、并购绩效差等，还存在并购的“羊群效应”而带来的价值链驱动力偏离现象。典型的如机器人行业，大量中国企业通过并购方式进入系统集成服务环节，制约了我国机器人关键技术突破与国产自主品牌培育，如何引导更多资源通过并购等方式进入本体和关键零部件环节，是目前中国工业机器人行业亟需解决的问题。因此，在供给侧改革下需要从产业发展高度来引导企业基于价值链并购。

**伏玉林（华东理工大学）：**

大规模兼并重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是实现“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主要手段。大规模兼并重组面临的困难：（1）跨区域、跨所有制兼并困难重重；（2）地方政府保护降低了低效率企业被兼并的意愿、增加了兼并重组的风险；（3）因产能过剩盈利下降引起的资金压力和金融资本参与阻碍了兼并重组；（4）境外并购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建议：（1）改革并规范区域之间横向税收分配，降低地方政府因担心企业被兼并引起税源流失的阻力；（2）把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兼并重组结合起来考虑，以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为中心；（3）给予兼并企业扩大税收抵扣或税收减免的优惠；（4）落实对兼并重组的融资支持，鼓励金融资本多渠道参与产能过剩行业的兼并重组；（5）与“一带一路”战略相结合，规范和促进境外并购和投资合作。另外，根据全球制造业发展趋势，适当引导企业跨行业兼并重组。

# 长江产经智库学者齐聚姑苏，共话未来中国新动能与新产业

2017 年 8 月 28 日

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发展动能逐步转换的背景下，正确认识中国经济新动能和新产业，以此推动中国产业转型升级，进而保障中国经济稳定健康增长显得尤为重要。2017 年 8 月 27 日，由江苏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主办、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办的以“未来中国的新动能与新产业”为主题的“长江产经智库线下研讨会（第二期）”在苏州隆重举行。政、企、学、研各界专家、学者 100 多人齐聚苏州，大家集思广益、畅所欲言，就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与新产业展开了激烈讨论，为推动中国经济稳定健康增长提供了智力支持。会议分为主题演讲和分主题研讨两个部分。

## 主题演讲

主题演讲的发言嘉宾分别为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日本中京大学王建国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杨志勇研究员、Metalink 新材料公司马步洋董事长、厦门大学刘根荣副教授。

### 刘志彪教授提出产业经济学框架新构想

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作了《产业间、产业内与产业链：研究视角、方法与应用》的主题发言，从方法论的角度对产业经济学进行了深入阐述。刘志彪教授首先阐述了总量分析与结构分析的概念与差异，其次分别从产业间关系分析、产业内关系分析、公司内（产品内）关系分析进行了对比阐述，并提出了当前产业经济学最需要加强的分析领域是最终产品的产业链分析，包括产业价值链、产业技术链、产业竞争力链、产业创新链以及产业融合链等方面。最后刘志彪教授提出了自己对于产业经济学框架新构想：按照产业链理论重写产业经济学。

### 王建国教授分析日式经营对中国企业的借鉴意义

日本中京大学王建国教授发言的主题为《日式经营与中国企业》，介绍了日式经营的理论与实践，为中国企业的成长与发展提供了来自日本的经验。王建国教授讲到，日式经营包括了

三大要素，即终身雇用与年功序列、企业集团与企业系列、企业内工会。而日式经营亦具有其特殊性与普遍性，涉及了知性熟练的概念、中间组织或NETWORK组织论等。在理论介绍之后，王建国教授还以丰田式经营作为案例，对上述日式经营理论作了更加生动、更加具体的进一步阐释。

**杨志勇研究员解析当前税收政策对新动能形成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作了《促进新动能形成的税收政策》的主题发言，他以营改增、食药监局的“严格执法”为切入点，引出“当前税收政策对新动能形成的影响”这一问题，通过对新旧常态、新旧动能的对比，以及产业在不同税收政策下的发展历程，分析了产业发展创新与税收政策的关系，力图通过突破税收政策局限性，探寻新的经济增长领域。

**马步洋董事长阐述经济转型产业升级中的科技创新**

Metalink新材料公司董事长马步洋发言的主题为《关于经济转型产业升级中围绕科技创新发挥政府与企业两个主体作用的思考》，阐释了经济转型产业升级中的科技创新问题，提供了一个来自企业界的思考样本。他认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成功与否，在于政府与企业能否科学定位与分工协同，在于能否确保发挥市场机制下企业家主体的最大效用，取得突破的核心思路是必须深化全面改革，而围绕科技创新主线开展全面改革具有最多共识，或有实际突破效应。

**刘根荣副教授指出共享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厦门大学刘根荣副教授作了《共享经济：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的主题发言，他首先指出近年来共享经济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呈蓬勃发展态势，接着通过对比共享经济和传统租赁经济的差别，以及共享经济快速发展的动因，挖掘出共享经济的本质是产权制度变革，对传统经济有着颠覆性影响，但也存在着一些发展问题。最后，刘根荣副教授对我国共享经济的未来发展趋势和前景进行了展望。

**分主题讨论**

分主题研讨部分主要围绕新动能和新产业两个主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郑江淮教授阐述了全球价值链新趋势**

南京大学郑江淮教授发表了《全球价值链新趋势》的报告，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发展的变化以及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的变化。郑江淮教授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北美是创新活动的主要来源地，而亚洲是发达国家创新主要的目的地，电子制造业吸收的RDDT（跨国公司创新活

动）投资最多，RDDT 投资主要发生在全球化城市，并且 RDDT 投资可以与国内创新相互补充、相互促进。

**姜彩楼教授分析了创新激励的路径、障碍与展望**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姜彩楼教授作了题为《创新激励：路径、障碍与展望》的报告。首先，姜彩楼教授从市场层面、创新属性、国家战略需要三个视角切入，提出“为什么要对创新进行激励”这一问题。其次，姜彩楼教授重点阐述了创新激励面临的主要障碍，包括“市场机制缺陷、对新技术判断不准确、缺乏政策企业家推动”等。最后，姜彩楼教授也对中国创新激励的未来进行了展望。

**孙国民阐述诸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对策**

诸暨市发展与改革局高级经济师孙国民结合自身工作经验作了《诸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对策建议》的主题发言，就诸暨市参与“一带一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由于诸暨市具有区位优势明显、合作根基较深、体制机制较活的优势，但也存在外部不确定性增强、“引进来”的底气和功力不足、“走不起”的经验和水平滞后等缺点，需要通过转型、传承、合作、延伸等方式突破困境。

**林学军教授阐述基于“一带一路” 的粤港澳大湾区的作用**

暨南大学的林学军教授作了《基于“一带一路”的粤港澳大湾区作用研究》的报告。他首先指出了粤港澳大湾区研究的背景与目的意义，其次对粤港澳在“一带一路”建设的现状进行了回顾，最后，林学军教授着重讨论了发挥粤港澳在“一带一路”中的作用的策略问题。研究力图通过发挥粤港澳大湾区的积极作用形成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同时也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典型经验。

**林乐芬教授解读特色小镇**

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财政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林乐芬教授发表了《特色小镇你我他》的主题发言，首先对江苏省现有的特色小镇按照其特征分成了三类：一种是依托原有特色产业基础的；一种是依托地区资源、文化优势；最后一种是依靠区位优势发展新兴产业。林乐芬教授最后通过对宿迁保险小镇的详尽分析，得出了特色小镇的发展在“数量”和“特色”两个方面都不能“泛”。

**黄繁华教授阐述全球价值链攀升的服务业支撑**

南京大学商学院黄繁华教授基于长期对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基础，发表了题为《全球价值链

攀升的服务业支撑》的报告。他从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服务业支撑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内容、模式、路径等方面展开递进式论证，并使用实证分析检验了服务业对全球价值链攀升的支撑作用。最后，通过分析服务业支撑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因素，提出了当前发展的新动向、新机遇。

### 崔卫东认为消费服务型特色小镇是新产业策源地

江苏蓝鲸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崔卫东作了题为《消费服务型特色小镇是新产业策源地》的报告。他认为消费服务型特色小镇的产业具有消费品和消费服务基因，因而消费服务型特色小镇更能产生新产业，但需要来自商业模式、软件开发、投资基金三个方面的支撑，而且供给价值再造有利于推动新产业，经济学家思想也应努力转化为新产业。

### 宋凌炎董事长畅谈未来经济愿景

江苏精诚 & 精缦毛毯公司董事长宋凌炎在题为《如何看待新经济》的报告中畅谈了未来经济的愿景。未来会产生怎么样的新经济？我们怎么看待新经济？他认为，未来的新经济时代应该是信息透明化、数据精准化、供需平衡化、产品个性化、生产自动化、设备智能化、消费便捷化、服务贴切化、资源共享化的时代。

### 自由讨论

本次会议的最后环节是自由讨论环节，建信信托南京业务中心沈志强总经理、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杨志勇研究员、无锡环研中心唐德淼副院长、日本中京大学的王建国教授、浙江工商大学毛丰付副院长、厦门大学陈爱贞教授、南开大学踪家峰教授等专家学者们围绕下午的分主题发言各抒己见，百家争鸣，并针对智库发展问题积极出谋划策，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 刘志彪院长作总结发言

会议最后，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刘志彪教授首先对此次会议的协办单位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特别赞助单位江苏苏丝丝绸实业有限公司以及参加此次会议的学者、专家、企业家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接着对主题研讨作了总结发言，并对线上、线下会议未来的展开形式提出了想法。最后，刘志彪教授热烈祝贺“长江产经智库线下研讨会（第二期）”圆满成功。

# 如何在产城融合中发展特色小镇

2017 年 9 月 6 日

**编者按：**从 2014 年“特色小镇”概念被时任浙江省省长李强提出以来，现阶段特色小镇建设已遍布全国。作为与传统行政区划上的“镇”有明显差异的区域，特色小镇是一种集生产、商贸、旅游、居住及各类关联服务等功能于一体，具有“产　城　人”深度融合特征的新型发展平台，其健康发展不仅有利于推动发展动能接续转换和经济转型升级，也有助于促进大中小城镇协调发展并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在建设过程中，关键问题是如何将产业发展与特色小镇建设深度融合，以“产城互动、产城融合”推动特色小镇发展，避免特色小镇的“空心化”和“无序化”，努力建设一批新兴产业集聚、传统产业升级、体制机制灵活、人文气息浓厚、生态环境优美的特色小镇。

从“特色小镇”一词首次提出至今，特色小镇发展取得了斐然的成绩；但在遍地开花的特色小镇建设过程中，也暴露了特色小镇建设的“千镇一面”和“空心化”等突出问题，如何以产兴镇、产城融合也成为未来特色小镇建设过程中亟需解决的难题。本周，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组织群内专家、学者们，针对“如何在产城融合中发展特色小镇”这一主题展开讨论。

## 观　点

**唐德淼（无锡环研中心）：**

（1）产业形态定位要精准，根植于资源要素禀赋，不能脱离区域优势产业等核心支撑要素；

（2）空间布局要协调，土地利用要集约，产业发展要协同融合；

（3）从供给侧发力创新特色小镇体制、机制、路径、建设理念、发展模式、产业形态、社会治理等关键环节，聚合创新要素，激发内生发展动力；

（4）功能定位要以特色产业融合发展为“核”，打造产业和特色小镇协调发展、双向融合的产城融合模式；

（5）把特色小镇“申报审批制”改为“建设备案制”，防止出现新一轮的“圈地运动”。

**夏海力（苏州科技大学）：**

江苏发展特色小镇应凸显江苏特色，与激发江苏创新创业活力结合起来：

（1）将解决江苏城郊农村和小城镇衰败问题，践行小城镇建设的新理念、塑造新城镇，与建设特色小镇结合起来；

（2）将开发区和园区经济转型升级、破解制造业锁定，发展新产业、创造新业态，与建设特色小镇结合起来；

（3）将江苏集聚创新创业新人才，与建设特色小镇结合起来；

（4）将江苏政府管理的体制机制创新，与建设特色小镇结合起来。

**刘志彪（长江产经智库）：**

特色小镇的生命力在于以产业主导的产城融合。发达的产业是基础，没有特色产业，小镇景观、空间做再好再美，迟早也会衰落。由于产业不是完全可以人为规划的，因此产城融合的特色小镇，就不是完全可以人为炮制的，而必须以本地的比较优势为基础，以本地化产业为基础来构建。江苏平原地区多，尤其是南部大规模制造业发达，有较好的集体经济基础，因此特色小镇的建设必须基于这一省情，不能为了所谓的景观特色、概念花哨而炮制某些花里胡哨的特色小镇。在本地坚实的现代化产业的基础上构建最适宜居住的城市，才是苏南地区发展的主要任务。这一点情况与浙江等地有很大的不同。

特色小镇目前只能依赖大城市布局，决定了它只能是点缀式的，而不能成为人类主要的、主导的空间载体方式。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

特色小镇建设需要从长期形成的特殊生产生活方式着手，挖掘内生特色基因，构建特色小镇的生命力。

**孙国民（南京大学博士后）：**

（1）亮点：做好特色产业，传承特色文化；

（2）焦点：重点聚焦产、城、人文、生态相互融合；

（3）看点：有可以看的东西和值得看的东西。

**马步洋（Metalink 新材料）：**

城市群间点缀的特色小镇才是江苏应有之像。小镇可以解决就业、住宿，但是远离教育、医疗资源肯定不行。

**糜万俊（江苏酷鲨体育）：**

有产业支撑的小镇才有生命力，有产业才有人气。

**崔卫东（蓝鲸咨询）：**

作为产城融合发展的一种形式，特色小镇以良好的生活设施、生态环境建设为基础，其新产业发展离不开该区域（非镇非区，3 平方公里左右）产业基因。

**孙 军（淮海工学院）：**

特色小镇的成功必须建立在比较优势和市场化之上，同时需要政府顺应市场规律和动态变化并运用政策手段加以引导，确保特色小镇可持续发展。

顺应特色小镇的形成规律，在城市群落之间寻求特色小镇存在的意义和必要性，顺应人类生活习惯和经济发展的规律性特征。

**纪 明（广西师范学院）：**

基于空间位置的不同，特色小镇的产城融合路径应该不同：“城区（或郊区）小镇”应以生产生活服务业为主，而“县域小镇”应该以现代化农业为主。

**杨平宇（温州商学院）：**

特色小镇发展规划其实是更加注重生态环境的产业集聚区，“产·城·人”融合是一个长期、自然融合的过程。

特色小镇要做好符号的搜集，包括特色文化、特色产业、特色环境。

**张小兰（西南民族大学）：**

特色小镇建设要坚持市场运作为主体、质量效益为前提，突出制度创新、功能创新等创新理念，推进产业集聚、做强特色优势产业，实现人与产业、人与自然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李建平（卧龙湖小镇）：**

城镇化发展过程起源于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就业迁徙”而新建的小镇在当今中国“势不可挡”，这种特色小镇必须有自己的经营性物业，例如旅游、度假和医疗养老等产业发展，既是生活配套又是小镇产业发展支撑，也是小镇活力和人气所在。在这一类城镇化发展中成长的“特色小镇”，特色就是持续发展、小镇支撑和品质保证，而不至于像市区居民区的物业靠小区停车费支撑物业延续。

**彭本红（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特色小镇是长期制度和文化积淀结果，应依托市场力量，以特色产业、特定区位、特色商

业模式为基础进行建设。特色小镇不一定要融入城市中，边远乡镇如果有特定的资源也可以打造和培育。

**踪家峰（南开大学）：**

（1）特色小镇不能排斥大城市发展，相反只有大城市发展了，才能有特色小镇的发展空间；

（2）大多数特色小镇都是自我演化的，政府强推小镇建设拔苗助长。

**何 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建设特色小镇，出路在于“新”，即作为小镇安身之本的产业要有新意；然而，难点在于特色，特别是如何把特色产业化问题。破局之路离不开政府的扶持与引导，但最终走向成功一定是市场自我选择的结果。

**夏网生（江苏省商务厅）：**

特色小镇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区域，重点应该是强化产业特色，在此基础上围绕主导产业做融合发展的文章，把整个小镇的经济有机整合起来。

特色小镇是一个发展起来的结果，形成机理包括文化基因和市场作用；行政手段快速造镇形成的特色小镇虚有其表，没有内涵。

**石军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特色小镇建设的理论动因应是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根本驱动是产业体系的特色与优势，现实动力是政府政策的引导优势；

（2）新晋级特色小镇相当部分为“人为创造”的特色，短期打造的特色能否长久有待观望；

（3）特色小镇建设目标是通过吸收政策资源提升当地 GDP，这些小镇也注定只能首先是经济特色小镇，无法成为现代化的城镇；

（4）特色小镇建设的区域不平衡特征依然突出。

特色小镇建设过程中，政策的动机和初衷可能是好的，但战略导向、实施方案、市场机制、目标体系等方面，依然存在很大的优化空间。

**蒋青云（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足，当年费孝通先生从社会发展角度提出的小城镇建设并未成功；今天，我认为该是时候了，但把特色小镇建设看成是社会发展而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步骤可能更有意义。

**孟 楠（徽银南京）：**

特色小镇建设要充分调研、严格审批，在原有小镇特色和未来规划基础上，以底蕴和特色为核心，合理发展诸如特色传统文化小镇、特色产业小镇、特色体育小镇等。但不建议将特色小镇建设纳入地方政府考核。

**陈伟贤（南京医科大学一附院）：**

特色小镇长期居住人群可能以 60 到 70 岁的人群为主。

**姜德波（南京审计大学）：**

特色小镇建设应基于优势的地理位置、特色的自然资源、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良好的人文环境、必要的公共服务，相应才能有稳定的经济增长、可靠的财力支撑和对人口的吸引。

**赵正宇（南京市园林局）：**

（1）从本地资源禀赋出发，关注原住居民的城镇化进程；
（2）坚持城乡规划全覆盖，保证公共资源合理分配；
（3）根据主导产业合理配置空间结构，提高土地和空间利用效率；
（4）特色小镇的本质是城镇化，让农民分享城镇化成果；
（5）加强特色小镇的生态环境建设，避免走传统工业化破坏环境的老路。

**王思彤（江苏省统计局）：**

产城融合过程中，是产业影响城市而不是城市影响产业，特色小镇建设也应该遵循这个规律。小镇不要被已有的特色标签限制住，能够带动小镇发展的特色产业就保留并发展，反之就扬弃，发挥小镇船小好调头的优势，再造另一种特色。

**朱晓煜（南京市市级机关）：**

作为交通通畅、基础设施完善的区域，特色小镇应和开发区有本质区别，不应该刻意追求产镇融合，而是满足人们需求的产物。有居住功能，自然就有服务功能；政府的作用是基础设施的投入、合理的规划、适当的招商引资。

**陈心颖（福建省委党校）：**

（1）国民消费需求升级和消费观念的更新对特色小镇建设在人居环境方面提出了要求；
（2）特色产业的选择需要某些适合特色发展的高端产业基因或者禀赋来支撑；

（3）现阶段特色小镇应该主要布局在大城市周边，承接大城市外溢要素。

**苏 健（南京市社会科学院）：**

产城融合发展要求特色小镇以生态环境为依托、以特色产业体系为动力、以生产性和生活性融合为功能关系，实现多元复合性融合。特色小镇建设和发展应针对该区域经济基础和资源禀赋，充分发挥市场作用，辅之以政策调节特色小镇发展中的优势和劣势，从而更好地发挥产业集聚和辐射功能。政策调节应从经济环境、产业发展、生态环境等方面考虑。

# 如何打造江淮生态大走廊

2017 年 9 月 13 日

**编者按：**江淮生态大走廊位于南水北调东线长江与淮河流域之间，以京杭运河为主干线，包括扬州、泰州、淮安、宿迁、徐州 5 市。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有着明确的近期和远期目标：到 2020 年，南水北调东线区域生态环境显著改善，基本形成空间利用集聚高效、生态环境良好、产业结构优化、区域互联互通的生态经济走廊；到 2030 年，沿线区域社会经济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格局全面形成，成为南水北调工程生态环境治理的样本区。

“在南水北调沿线高起点规划建设江淮生态大走廊，以此为主轴构筑起江淮大地的安全屏障。”是江苏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和今年省政府工作报告的明确要求。2017 年开始，江苏省以生态保护倒逼经济社会转型发展，致力于让 5 市找到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确保“清水北送”长期稳定。本周，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组织群内专家、学者们，针对“如何打造江淮生态大走廊”这一主题展开讨论。

## 观 点

**何 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1）撤并关停运河沿线重污染高能耗低效益的企业。

（2）建设徐州镇江高铁，顺势推动扬子江城市群南北融合；以铁路运输取代运河水路运输功能，减轻水运污染。

（3）围绕运河沿线，设置限制开发区，禁止增量化工等污染行业进入。

（4）全面落实河长制，把沿线生态保护落实到人。

（5）建立合理生态补偿机制，让做出牺牲的人安居乐业。

**陶向南（南京大学）：**

建议江淮生态大走廊发展人才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其中人才生态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江淮生态大走廊的发展状态与过江大桥和高铁密度提升成正比，打通交通瓶颈，政府打好基础，江淮人民自己会按经济规律发展起来。

**陈 东（安徽工业大学）：**

高铁推动发展可以事半功倍。

**陆慧琦（溧阳市政府）：**

经济发展要有良好的政商生态环境，同时也需要良好的民生环境来留下人才，交通等基础设施还在其次。

改革进入深水区，要的不仅仅是“大手笔”，还需要以法治为核心的“精治理”，让政府的边界更清晰，群众的明天更可以预期。

**陈伟贤（南京医科大学一附院）：**

江淮地区人才辈出，但留守者文化和江南差距比较大，人才流失严重，这是今后发展的一个瓶颈。

**司增绰（江苏师范大学）：**

江淮生态大走廊是扬子江城市群的北翼与腹地，需要一条高速铁路贯穿几个城市，以解决人流客流问题。

**周小虎（南京理工大学）：**

应当实破江苏限制，将安徽、江西纳入一并考虑，重点是区域协同发展：江西生态条件优越，经济发展滞后；安徽在有些产业上已经有配套基础，如汽车等都可以考虑和江苏联动。

**孙映祥（南京机场）：**

（1）总体思路。以生态为中心，培育生态农业、林业、水产业向深加工延伸；发展文化旅游、生态旅游等休闲文化产业；打造运河黄金水道，以水上走廊带动生态走廊，与江苏的苏南和沿海地区形成了分工发展格局。

（2）产业结构调整。提升以生态为基础的农业、林业和水产业的档次；打造运河黄金水道主轴线，带动生态走廊，发展旅游、文化、轻工、软件、现代物流等产业。

（3）建议。江淮生态走廊建设重点是运河水上走廊和全区生态走廊。产业重点：生态农业、林业、水产及其深加工、文化、旅游、现代服务业、水运为中心的物流业。

高铁、信息都会有的，运河水道独此一家。

**刘晓昶（华泰证券）：**

江淮地区单靠传统的运河黄金水道已经不够了，建议江淮生态大走廊的南北方向建高铁及高速公路，建设江苏纵向大交通。建议江苏至少要形成“丰”字形高铁快速大交通，有条件可以打造“田”字形或叠加“米”字形，形成高铁交通网。

**张明之（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打造江淮生态大走廊需要厘清如下问题：

（1）战略定位。省级？区域？跟什么战略对接？

（2）战略层级。是整体战略还是生态战略？

（3）产业规划。如何与基础设施建设契合？如何定义适宜的生态产业？传统产业如何获得新生？

（4）政府职能。政府会给予多大的政策等方面支持？非政府组织怎样参与？跟以往的新农村建设怎样协调？

（5）区域优势。区域内江、湖资源，平原水网，运河共生，水是否作为一个核心资源？

**刘瑞翔（南京审计大学）：**

打造江淮生态走廊实际上是一个跨地区规划的概念，需要建立各地区之间的联动机制。

**刘志彪（长江产经智库）：**

（1）江淮生态大走廊是南接长江经济带开发、北连京津冀一体化两大国家战略的重要交汇带，还关系到江苏中北部崛起。在此打造生态大走廊，需要构建绿色安全屏障，这必然进一步倒逼发展方式的转型和产业升级。

（2）与水资源管理友好的清洁产业选择、与环境保护相适宜的生活设施建设，就是打造江淮生态大走廊的两个主要任务。

（3）江苏省要借江淮生态大走廊的建设，加快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具体化：

①要尽快将江淮生态大走廊上升为国家战略；

②要尽快专门立法实施最严格的水源地生态功能保护；在水源地划出生态保护红线和产业准入负面清单，防止水源地工业污染，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

③要加强对有利于生态建设的重大项目的支持和投入，如贯通南北的高铁建设；

④要设立有利于水资源安全的跨省沟通协调机制，协调沿线城市共同治水护水；

⑤建议国家建立国家南水北调生态补偿资金。

**赵正宇（南京市园林局）：**

应该从产业链布局、空间形态以及生态影响等方面研究生态走廊问题。

划定三到四个区域：①生态保护区，严格禁止一切污染企业和污染单位；②生态友好区，发展生态型和生态友好型产业；③生态发展区，禁止严重污染企业。

**崔卫东（蓝鲸咨询）：**

江淮生态经济区首先要两治四减，治水污染、治土壤污染、减化工、减工业废弃物、减农药、减化肥。

江淮生态经济区重点发展旅游、有机农产品及绿色食品、新能源、环保及农产废弃物综合利用、特色农产工业原料等产业，成为长三角重要旅游目的地和“菜篮子”基地。

**孙 军（淮海工学院）：**

（1）在建设生态走廊的过程中，推动当地产业集聚、绿色化发展，同时省里要拿出资金和项目支持当地发展；

（2）将当地部分人口外移，即使当地实力弱，但人口减少同样可以富民。

**高春亮（南京财经大学）：**

生态大走廊不是禁止开发，是发展生态产业－人口转移－城乡建设的体系，如果不发展产业，生态没有意义，也不符合绿水清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生态产业包括生态农业、生态旅游、高标准的高科技产业以及健康卫生服务业，同时辖区内人口应当向周边城镇转移。

**黄志军（江苏省农行）：**

当务之急是先通高铁，然后发展生态农业和休闲旅游业。

**彭本红（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1）加强治污，比如盐化工、化工厂、造纸厂等；（2）产业升级，不能再承接低端产业转移。

**郑江淮（南京大学）：**

（1）界定好生态产业的含义、标准和范围，然后建立负面清单。生态农业只是生态产业中一个部分，不能成为生态产业的主体，而应作为生态产业环境中一个重要部分。

（2）发挥劳动力禀赋和生态禀赋优势，引导生态友好、附加值较高制造业和服务业向该地区转移。

从江苏创新型经济发展来看，该地区应定位于生态环境资源和知识资源密集型地区，成为江苏的“中心生态园”和“知识孵化地”。为此，进一步加强贯穿苏北、江淮大走廊和南京的基础设施建设，充分降低交通成本，使得生态友好型产业留在该地区，大规模制造业向北部转移。

**李国强（DRC 国研中心）：**

（1）建设江淮生态大走廊使现有产业升级转型具有生态性，也使广大的江淮地区更具现代生态文明性。

（2）生态性与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并不是矛盾对立的，而是现代产业具有生态文明性。

（3）青山绿水既是金山银山，金山银山也要青山绿水，二者是在生态文明基础上的新发展阶段，是对工业文明的发展。

（4）实现青山绿水生态文明也需要治理，而不是简单的自然状态。

**赖红波（上海理工大学）：**

（1）挖掘和传承。建设江淮生态大走廊是在一直以来的县域经济规划和长三角规划的深入和深化，居间切入，最终形成整体发展规划。这个过程中既要汲取共性的部分，又要有自身的特色，形成“考察、挖掘和规划传承”系统部署。

（2）承上启下。江淮生态大走廊概念既要承接国家或区域“大战略”，又要对接“小战略”，兼具“视野”和“活力”。

（3）中观视角。江淮生态大走廊产业规划要发挥“中观”视角特色，“区域（宏观）—产业—企业（微观）”既要区别，也要融合。

**樊继胜（弘策咨询）：**

江淮生态大走廊覆盖大半个苏北，因此其内涵与苏北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重合的。苏北近年发展有所改观，但浅层面的多，深层面的少；“随”着的多，爆发性的少，尤其是缺乏整体格局和重大题材。建议由省里进行规划，和国务院要政策、和大型央企合作解决资源投入问题，尤其是与大型央企可做深度合作。

生态作为一种资源，从中长期来看有巨大价值空间。但怎么开发？怎么对价为经济价值乃至社会价值？有一点就是，肯定不能用抑制所在区域的利益的方式进行。

# 如何建设扬子江城市群

2017年9月20日

**编者按：**“1+3”布局是江苏省区域发展空间结构重构和区域功能优化布局的“新蓝图”，也是对以往沿沪宁线、沿江、沿海、沿东陇海线“四沿”布局的进一步深化：“1”就是由沿江八市组成的扬子江城市群；“3”，一个是连盐通一线的沿海经济带，一个是宿迁、淮安为主的“三湖”生态经济区，一个是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经济区。扬子江城市群以占江苏省约50%的面积，汇集了省域最为丰富的经济、科教、人文等要素资源，也贡献了全省约80%的经济总量，是江苏省经济“发动机”和增长极。从空间战略角度分析，扬子江城市群位于我国沿江与沿海生产力布局主轴线的交汇地带，是国家“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建设的重要对外开放门户，也是我国产业体系最完整、创新能力最强、城镇分布最密集、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在全国城镇化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建设扬子江城市群是江苏省委省政府扎实推进“两聚一高”新实践的重大战略决策。未来，扬子江城市群要形成高端发展的新经济板块，也承载着更高水平提升区域发展质量、更广范围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更深层次参与国际分工合作的时代使命。本周，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组织群内专家、学者们，针对“如何建设扬子江城市群”这一主题展开讨论。

## 观 点

**王建国（日本中京大学）：**

各城市连成群，主要的内涵应该是城乡差异的缩小。

**何 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扬子江既是纽带，又是南北差分的天堑。围绕扬子江的文章有：（1）继续强化跨江通道建设；（2）充分挖掘扬子江段黄金水道的潜力，为群内城市的大物流提供低成本环境；（3）推动对扬子江的保护；（4）打造互联互通的沿江产业链；（5）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推动沿江城市的生态环境建设。

建设扬子江生态大走廊，与既有的江淮生态大走廊，构成基本覆盖江苏全境的南北和东西向的生态十字链。

**赵正宇（南京市园林局）：**

要高度重视南京这个门户城市。

**洪仁兵（上海银行南京分行）：**

城市及区域战略规划目标很关键，但把公共服务和产业基础做好方为根本，地方好人气自然旺。

**孙 军（淮海工学院）：**

扬子江城市群规划应围绕提升创新能力，这是扬子江城市群能够成功的关键：（1）运用政策手段将区域内的各类政府创新资源和载体进行整合，推动高端要素跨城市流动和集聚；（2）运用市场机制和政府辅助手段，进一步推动区域分工深化合作，驱动各地区专业化特色化发展之路；（3）适当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打通相关交通瓶颈。

**刘志彪（长江产经智库）：**

如何抓住“1+3”中的薄弱环节，有重点地突破？目前这个设想中，各区域发展都缺乏系统化的动力。比如，扬子江城市群中部崛起的突破口在哪里？再如，江苏沿海地区的进一步开发开放怎么搞；还有，江淮生态区建设如何与产业发展协调？这个地区仅仅搞生态，不搞强大的产业，那么多人口是奔不了高水平小康的；最后，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徐州）的发展动力在哪儿？光靠徐州不可能有动力。

**王思彤（江苏省统计局）：**

扬子江城市群实际包含三个部分：苏锡常、宁镇扬、通泰。历史上泰州就属于扬州，而南通与苏锡常更靠近上海，所以不妨把原来的两个圈做大，分别变成宁镇扬泰和苏锡常通，从空间上分类聚合，先在两个圈里进行整合，然后再对两个圈进行对接整合，从而把扬子江城市群做成规模，做成有密切关联的群，而不只是地缘接近、各自为战的城。

**孙映祥（南京机场）：**

扬子江城市群的发展必然与上海是一体的。从长三角地区发展看，将会是“1+1+3”的三级发展模式，上海扮演了领头羊作用，辐射扬子江城市群，再辐射苏北地区。在这样的大定位下，扬子江城市群发挥加工业优势，主动承接上海辐射，同时依托苏北甚至安徽，形成完整产业链和区域分工。

**邵 军：**

扬子江城市群可定位为上海的北翼。

江苏发展扬子江城市群，重点在跨江发展，推进城市南北联动。南京江北新区建设是龙头，宁镇扬一体化、泰州与无锡常州联动、南通的北上海战略以及和苏州的联动，都是可行的。我不赞成苏州、南京双核的横向构想，这是脱离长三角的地域思维。

**姜彩楼（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扬子江城市群要放在苏北工业化方面难有作为的发展背景下考虑；利用好沿江地理优势，打通要素流通障碍，实现产业、要素相互融合共生，甚至进一步优化升级。

**彭本红（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产业基础和公共服务是关键。

**孙国民（南京大学博士后）：**

（1）高起点、高标准、高站位编制扬子江城市群发展规划；（2）建立扬子江城市群发展协调委员会；（3）积极谋划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4）打造扬子江“一江两岸”经济带。

**蒋青云（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从市场纽带（关系）和社会纽带（关系）的建设着手，基于各种功能流的网络化分工与合作，促进扬子江城市群建设。

**朱 虹（南京大学）：**

用小镇和供应链打造城市群社会生态。

**周 斌（江苏省邮电规划设计院 / 南京大学）：**

（1）“不破不立”：突破本位主义、短期经济、地方主义等阻碍城市群发展的内在因素。

（2）“大破大立”：改变以前一阵或以领导任期或其他短期运动式推进城市群建设的状况，从人、财、物、核心资源、甚至关系到融合的户籍、教育、医疗等先联动建设起来。

（3）方法要对、内容要深、效果要分阶段有明显感知到：注重前期的论证、研讨、规划等；经济发展与城市发展结合起来，分步不同点深入推进；让政府、企业、市民有明显的城市群建设效果感知。

推进城市及城市群建设必须“一城一策”，独特性也就是对应如何发挥最大的核心资源作用，同时未来发展最有潜力的方向。

**朱旭鹏（工商总行投行部）：**

有生命力的城市群不仅仅是高楼大厦、道路高铁，应该是产业集群、企业家集群，首先要服务好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

**李建平（卧龙湖小镇）：**

逐步形成“宁镇扬、苏锡常和沪苏通”三个小城市群，最终带动长三角沪宁杭大城市群的发展与形成。

**仰 远（江苏省地方税务局）：**

扬子江城市群普遍存在土地资源稀缺的情况，通过土地使用税差别化政策的引导，鼓励企业提高附加值或转让富余土地；在测算其产业引导效果的基础上，兼顾企业“投资强度、亩均税收、创新能力、环保评价”等指标要素，逐步向其他税种推广实施。

**司增绰（江苏师范大学商学院）：**

从交通设施、产业布局、自然基态保持与生态保护到城市城镇连绵带建设，都要体现生态化，把扬子江城市群建设与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联动起来。

**李 剑（IT 咨询）：**

推动扬子江城市群信息化协同发展，建设创新智慧绿色人文城市群：

（1）统筹部署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

（2）构建畅通高效的城际综合交通网络；

（3）建成三级政务信息资源整合共享平台，建设生态环境一体化监测网络；

（4）促进数字经济和智慧产业发展，建设扬子江城市群企业跨界信息服务平台。

**王辉龙（南京市委党校）：**

从交通、制度、理念上打破长江天堑的阻隔，仍然是江苏协调发展、融合发展的重要任务。

扬子江城市群作为长三角城市群的子城市群不应、也不可能与上海割裂。在扬子江城市群缺少绝对中心城市背景下，能否发挥南京特大城市和东部中心城市带动作用，显得尤为关键。理想的愿景是：南京科教资源与区域内产业高效结合，形成以江北新区和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为引领的创新型城市带。

**张远鹏（江苏省社科院）：**

扬子江城市群产业发展与协作主要问题：（1）产业同构导致的负面影响大于正面效应，产业集而不群现象突出；（2）现有产业协作机制的功能在弱化。

建议进一步加快构建扬子江城市群产业协作的政策和机制：（1）建立各级政策沟通与协调机制；（2）发挥产业同构的正面效应，推动区域内企业兼并重组，培育企业联盟，打造城际产业链；（3）创新机制，激发活力，形成新一轮产业协作发展动力；（4）鼓励支持“飞地经济”发展，创新合作模式，完善合作机制。

**蒋乃华（南通大学）：**

依托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江苏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协同扬子江沿线城市的产业政策和资源配置，可以重塑基于制造业生产网络的扬子江城市群的区域竞争优势。在区域竞争优势的构筑中，南京可以聚焦创新龙头、创新中心的定位上，逐步褪去生产基地的职能。

**陈 柳（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扬子江城市群建设要解决好城市之间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引导城市之间良性竞争：（1）涉及城市之间的各类基础设施省级层面要强势介入；（2）涉及重大项目落地的问题，要在扬子江城市群内部分梯度制定产业负面清单，以及优惠政策的权限；（3）突出相邻城市的领导干部交流。

**程 鹏（江苏巨和实业有限公司）：**

扬子江城市群要在尊重和借助上海巨大辐射力前提下，贯彻夹江发展、抱团发展。

南京作为扬子江城市群龙头，要提高软资源集聚和辐射能力，着重发挥知识密集优势和交通枢纽优势。

**陈长江（南通大学）：**

扬子江城市群建设要突出生态绿色原则，实现经济一体化与生态环保一体化协同推进，实现跨区域重大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跨区域重大生态工程一体融合统筹推进，推动绿色空间连绵一体、绿色经济相互协调、绿色制度统一完善。

# 美国缩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2017 年 9 月 27 日

**编者按：**所谓美联储缩表，简单地说是指中央银行减少资产负债表规模的行为，即在资产端减少当时买来的债券和 MBS，在负债端收回美元。其操作方式是美联储通过直接抛售所持债券或停止到期债券再投资的方式，直接抽离市场基础货币，实质等于变相提高利率，是更为严厉的货币紧缩政策，对流动性影响较大。通过“缩表”这种方式，美联储可以卖出国内资产，收回过去投放在市场上流通的美元，实现对基础货币的直接回收从而实现货币政策正常化。相对于提高利率，“缩表”更为严厉，也体现了美联储推动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的坚决立场。

1920 年以来，美联储共计进行了 7 次缩表。数据统计显示，美联储每一次的缩表都会对其他国家经济产生巨大影响：缩表后有的国家表现为物价大幅上涨，有的表现为经济大幅下滑，有的表现为资本外流大幅增加。2017 年 9 月 20 日，美联储宣布将从 2017 年 10 月开始缩减总额高达 4.5 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这是美联储自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首次宣布“缩表”，也标志着美联储货币政策进一步收紧。本周，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组织群内专家、学者们，针对“美国缩表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这一主题展开讨论。

## 观 点

**陈 东（安徽工业大学）：**

（1）缩表对世界和中国的影响不仅是一个事实上的长期性，也是一个心理上的长期性，其传导的影响将是深远的，影响也可以用“大杀器”来形容。

（2）缩表短期不会冲击美国企业的流动性，主要是刺激国际上美元回流，配合美国国内减税及川普的稳定制造业、扩大中产阶级就业等方式，将对美国经济的推动产生叠加效应，但对世界来说可谓雪上加霜。

（3）美国缩表对一个正常国家作用不一定大，但对一个发展不好的经济体来说，绝对是釜底抽薪的影响；如果 2018 年经济下行的预言证实，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和防止资金外流将面临巨大的压力。

（4）美国缩表可能会带来中国央行短期的降准来对冲，但目前的货币投放只会带来更多的低效投资；加之目前国内的环保压力，大量的民营制造企业可能在 2018 年大量倒闭，带来大量的失业，以及对未来经济的悲观预期，民间消费能力会受到收入减少和悲观预期双重作用，产生进一步断崖式下跌。上游的涨价无法持续下去，产业转型升级和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重

塑可能会受到较大冲击。

**张云逸（上海鸿逸投资）：**

有些人把美联储缩表的影响过于夸大，川普的减税和美联储的缩表是计划中的项目，但美元指数中期一直走弱。未来的变数很多，川普政策的落地进展和缩表的进度还需观察。另外抛开效率不讲，我国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执行力和应对能力，确实无出其右者。

**孙建波（家族财富管理 50 人论坛秘书长）：**

美联储缩表，体现的是美国及其主要贸易伙伴的复苏。但龙头先缩表，小弟的复苏节奏未必跟得上，往往会先导致资产回流，小弟们先痛苦两年，然后慢慢跟上。

**刘志彪（长江产经智库）：**

从 2009 年开始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支付使用市场份额目前只有 1.6% 左右，虽然已经是世界第六大货币，但是与美元影响相比不足挂齿。美联储缩表对中国经济一定会有较大的影响。

人民币自己缩表会毁了中国经济的杠杆体系，产生更加严厉的紧缩效应和摧枯拉朽般金融危机。中国国内企业前期正在通过一些市场和非市场的方式，如下达产能缩减指标、利用环保规制等，进行了部分产能出清，针对的是产业链的上游企业，尤其是有利于大国企，能否成功，取决于能不能顺利地转嫁到下游企业和消费者；如果不能，会反作用于上游复苏。

**刘晓昶（华泰证券）：**

美国缩表体现的是美国经济的率先复苏，美联储利用这一时间差优势为美国获得大量的利益。美国缩表的影响主要是较长时期内支撑美元走强和吸引全球资金回流美国，同时也影响中国等外围国家的货币政策、经济决策。

中国虽然未正式加息，但是今年以来的国内市场利率已经有了明显抬升。国内在股市楼市的种种降杠杆措施，也是对美国率先复苏缩表加息带来影响的应对之策。未来，中国跟随美国缩表加息是必然的，只不过现在是在争取时间让国内实体经济尽快跟上。

现在关注的不仅是美国缩表加息，还需关注到欧洲、日本等经济大国的复苏进程和复苏路径，中国后续需要有促进高质量、实质性复苏的举措。

**楼稼平（宁波布衣）：**

（1）若按美联储既定缩表方案，从 2017 年 10 月至 2019 年 7 月，表内证券资产累积缩减幅度将达到 6760 亿美元；此后，下降速度大幅放缓，直至 2023 年 4 月累积降幅达到 1.85 万亿

美元，完成缩表目标，“瘦身”后的证券持有规模约为 2.41 万亿，表内资产规模约为 2.62 万亿，均约等于当前规模的 60%。

（2）美联储在最初两年缩表所冲减的 6760 亿美元资产，如果完全受制于货币乘数效应（此中估计为 6），将相当于造成全世界美元 M2 减少约 4 万亿 USD。所以，初期按每月 100 亿美元不算快的节奏、以被动削减方式缩表，俾观察效果。一般认为，至少初期的缩表效果，很多是心理上的，并且人们现在并不觉得缩表是反向 QE。

（3）今年 8 月与 2013 年同期相比，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中，外汇占总资产比率由 81.21% 下降到 61.92%，央行的官方储备资产同期减少了 13.25%，而总资产规模却由 308926 亿元扩张至 347144 亿元；可见，在央行总资产规模扩张与官方储备资产减少之间，是“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和“对其他金融性公司债权”的增加，填补了两者之间日渐增大的差额。与此同时，中国 M2 规模由 106.13 万亿猛增至 164.52 万亿。中国央行这几年资产结构的变化以及 M2 异乎寻常的增长，意味着人民币对美元的依赖度在减弱以及中国经济对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敏感度趋于弱化。

（4）美联储缩表最初两年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可能是象征性的（QE 停止，即将反向），等缩表效应开始显示到传导到中国，当有较为充裕的时间可作反应与调整。中国有中国的问题，但一时还与美联储缩表无太大关系。

**孙国民（南京大学博士后）：**

（1）美联储缩表短期影响相对较小，一旦形成稳定的市场预期，并配合减税降负的产业政策，将会带来资金的大幅回流，进一步提升美国产业竞争力，同时还会进一步促进美国就业。

（2）美联储缩表对我国资本市场有一定的影响，带来我国资本市场的新一轮下跌，因此需要中国加快重启资本市场繁荣的应对之策去冲抵美联储缩表的不利影响。

（3）美联储缩表同美国的通胀也有一定的关系。当前美联储通过逆向操作 – 缩表来降低通胀预期，同时也可以部分抵消通胀带来的企业经营成本上升压力，而这种抵消程度取决于缩表调控的力度、节奏以及持续时间，总的来说是相机决策的结果。

**施 康（香港中文大学）：**

为什么现在缩表影响不大：（1）已经预期到了；（2）长远的渐进过程；（3）当前中国正在进行金融管制；（4）流动性都在实体外打转，缩表只是金融市场少几个循环而已；（5）我们已经太大了，太强了。

10 年前我们的货币与 GDP 通胀的相关系数大概 0.7 上下，现在落在 0.3~0.4 范围，流动性对实体的影响越来越小。当然长远来说，如果美联储一直持续紧缩，必然有影响。

**王 丰（江苏海美新材料）：**

短期是货币贬值，有利于外贸企业；但对高债务、高泡沫的杀伤力值得重视和研讨。

**司增绰（江苏师范大学商学院）：**

外汇管理的防火墙筑高了，从国外引智引资都会受到阻碍，对外开放环境也会受影响。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

美国缩表的实际影响不会太大，象征意义超过实际意义。从2007年次贷危机以来的实践看，这样的操作让欧元也“很受伤”，包括欧盟在内的国际社会对美联储政策操作动机的质疑和批评在增多。对美国自身而言，“以我为主”的“任性”操作也可能损害其国际货币霸主的形象。如果这样的影响产生并扩散，对其他致力于增强国际货币地位的货币而言是不是也是利好呢?

**于晓华（哥廷根大学）：**

世界70%以上的储备和贸易是美元。美元缩表会让美元升值，如果结合税改，那才是超级核弹，中国才受负面影响；如果没有税改，因为中国贸易规模比美国大，有可能增加人民币贸易份额，美国从贸易角度可能受损。

**王建国（日本中京大学）：**

当其他各国都在实行量宽政策的时候，美国率先结束，按正常情况应该是，美元流向美国的同时，各国对美国市场的商品出口也会增加。我觉得问题恐怕在于川普同时采取措施压制外国商品进入美国。

**何 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在公开场合，中美财长都在强调各自在重大金融经济政策上的协调，然而事实上，基于国家利益不同，大国间更多采取的是博弈式政策。国内去杠杆，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式缩表。已经提前进行政策卡位的中国，面对美国启动的缩表，究竟是保持政策独立性，继续推进去杠杆，还是为对冲风险，在去杠杆的速度与力度上有所调整?

**孙 军（淮海工学院）：**

美国缩表短期对我国影响有限，但若持续缩表，再加上贸易壁垒增加、一带一路放缓，堰塞湖将会高悬，任何管制恐怕效果都会有限。下一步我国必须在放活经济、解决房地产等根本问题上进行体制机制改革。

**林学军（暨南大学）：**

美国的缩表的确对我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如何应对美国缩表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我认为：（1）发展实体经济，增强综合国力。首先要加强供给侧的改革，调整经济结构；其次要创新求发展，不断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最后要稳定市场供给，防止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2）实行稳健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保持币值稳定。首先是货币的发行必须与经济增长同步，保持市场适度的流动性；其次是严格控制政府债务总体水平。（3）努力推行人民币国际化，减少因美元汇率波动而造成的不利影响。（4）加强外汇管制，防止资本外逃和本国利益受损。（5）在 IMF、G20 等国际场合，与其他国家一起反对美元霸权，共同维护正常的国际货币秩序。

# 如何建设和发挥优秀企业家精神

2017年10月8日

**编者按：**“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特殊技能的集合，或者说是企业家组织建立和经营管理企业的综合才能表述方式，它是一种重要而特殊的无形生产要素。创新无疑是企业家精神核心，敬业是企业家精神动力，专注是企业家精神底蕴，诚信是企业家精神基石。虽然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企业家精神有所不同，但是有一点永远不变，即企业家精神是各种优秀元素的综合体，是优秀企业家群体精神的展现。

企业家精神是企业的根，也是经济的根，必须大力弘扬和切实保护，而消除顾虑和担忧是关键。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就是一代代优秀企业家在市场环境不断变化、市场体制不断完善、市场竞争不断激烈中探索和摸索出来的，是在不断总结经验和吸取教训中成长起来的。企业家精神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力量之一，2017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这是中央首次以专门文件明确企业家精神的地位和价值，提出保护企业家精神的要求和举措。本周，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组织群内专家、学者们，针对“如何建设和发挥优秀企业家精神”这一主题展开讨论。

**马步洋（Metalink新材料）：**

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成功与否，在于政府与企业能否科学定位与分工协同，在于能否确保发挥市场机制下企业家主体的最大效用，取得突破的核心思路是必须深化全面改革，而围绕科技创新主线开展全面改革具有最多共识或有实际突破效应。

**司增绰（江苏师范大学商学院）：**

企业家精神是市场环境、文化环境、制度环境等培育的；培育有利于企业成长与企业家施展能力的环境，创新企业家生成机制，形成企业家市场。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

建议启动企业（家）“三库”建设工程：（1）全国性的企业（家）信息资源库，区域共享、行业共享、部门共享，利于精准服务、及时预警；（2）全国性的优秀企业家决策咨询专家库，在各级政府重大经济决策产业规划领域发挥优秀企业家决策咨询作用；（3）全国性的优秀企

业（家）案例库，为行业提供经验，为社会弘扬正气。

**施 康（香港中文大学）：**

给企业家安全感，以法治为准则，在自由的精神指导下，以市场化的运作机制，为中华民族经济的再次腾飞和民族的整体复兴添砖加瓦。

**朱旭鹏（工商总行投行部）：**

建立安定的社会环境和法治的市场经济体系，保护企业家私有产权并尊重其劳动成果。

**赵正宇（南京市园林局）：**

（1）容错机制，在法治范围内给予更多宽松环境；（2）动力机制，大力推进混改为核心的国企改革，转变国企内在机制；（3）保护机制，政府在市场公平、产权保护、经营环境方面给予更多的保护，严格区分企业家违规与合法经营之间的界限；（4）社会培育机制，树立社会宽容和多元价值体系，鼓励体制内具备企业家素质的人才积极向体制外的双向流动，形成全社会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企业与企业家成长氛围。

**刘志彪（长江产经智库）：**

企业家精神既是一种无形资源，也是一种决策和行动能力，它是一个国家产业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作为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无形资源，企业家精神具有独特性：

（1）企业家认知能力的独特性。企业家在决策过程中使用的是基于直观推断的逻辑，而不是大企业经理阶层利用的程序化的计划决策。在不完全和不确定信息的复杂世界中进行战略决策，使用直观推断方法可以简化决策过程，使企业家的思考出现显著的跳跃，由此产生各种创新成果。（2）企业家发现能力的独特性。这种抓住稍纵即逝机会的洞察能力主要取决于与市场贴近的程度、过去积累的经验和对学习机制的自我强化效应，甚至可能与某人的先天禀赋有极为密切的联系。这说明了企业家发现能力是一种难以模仿的异质性资源，是某些企业具有竞争优势的根源。（3）企业家实现机遇能力的独特性。一般的技术知识专家不具备企业家所拥有的那种专业化的投资能力。企业家思想给予的方式是通过企业组织的方式来运作所发现的知识，或者是直接把所发现的知识在市场上出售。（4）企业家协调知识能力的独特性。也就是熊彼特所说的“新的资源组合”的形式，生产新资源有这么几种情形：由企业家利用发明改革或革新生产模式，或运用一种未尝试过的技术生产新商品，或用一种新的方法生产老商品，通过开发一种新的原材料的来源，或新的产品渠道，或通过重组形成一个产业。

综上，企业家精神是市场经济中的一种独特的能力和行动，发挥企业家精神最需要的是有自由宽松法治化的市场经济营商环境。

**马春阳（国都期货）：**

法治化与市场化。

**王建国（日本中京大学）：**

企业家精神，就是开辟新事业领域所必须的精神。具备企业家精神的创业者，他们善于想象、勇于探索、探求商机；一旦发现商机，他们又能不惧风险、果敢创业。企业家精神也不是老板的专利，大企业内部的一般员工也可以有，大学生、家庭主妇也都可以有。

弘扬企业家精神，应为创业活动提供支撑、扫清障碍、加速企业家精神与成功创业之间的良性循环。结合我国目前的具体情况，并借鉴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经验，推进弘扬企业家精神的工作应从降低创业门槛、保护创业成果、加速良性循环这三个方面着手进行。

**宋常铁：**

（1）企业家精神是充分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天然产生的，最核心的是“进取”与“创新”；（2）最具企业家精神的是民营企业的领导人，也蕴含在企业员工、社会各阶层之中，要创造上世纪80、90年代人人以下海为荣的环境；（3）企业家精神是民族复兴的精神之源；（4）国企与民企责任均等必须与权利均等相对应，为民企创造应有的社会、市场、舆论、法治环境，提供企业家精神发扬光大的土壤。

**王相林（海峡银行）：**

拥有资源的人都可以有企业家精神。

**钟永一（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推进市场体制建设，保障企业家自由选择的权利、营造企业家自由选择的法治环境、提供自由选择的机遇。

**何　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1）舆论上正面引导，像宣传劳模那样宣传企业家；（2）判断标准上要多元，允许企业家有短板、有个性；（3）行动上要言出必行，徙木置信，全面落实去年底中央文件提出的对各类产权一律平等保护的承诺；（4）创造条件，培育一批女性企业家，调动女性创业积极性。

**孙　军（淮海工学院）：**

建立开放的体系和政策制度支撑。

**刘瑞翔（南京审计大学）：**

（1）加强市场软环境打造，降低企业家经营成本；（2）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要素资源配置效率。

**杨建中（加凯集团）：**

创业精神只是企业家精神中一种，真正能持业、做长青企业才是企业家精神的精髓。

**单豪杰（证券公司）：**

创造法治、公平、自由的竞争环境。

**翟太煌（山西证券）：**

企业家精神不必须和创新联系，或者简单反复也是创新；企业家精神不必须和挣钱相联系，获得外在认可、获得内心舒坦。

**孙国民（南京大学博士后）：**

（1）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本质特征；（2）企业家精神包括个体、团队、企业、政府、区域、国家等多层面；（3）企业家精神测度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新创企业数量；（4）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因素分为硬件因素和软件因素（包括制度因素、包括改革开放）；（5）企业家精神的高低及发挥的成效是区分企业家高低的重要依据。

**蒋青云（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企业家就像赌徒一样，让企业家精神得以发扬，就相当于赌场让大家都能够赚得到钱一样：（1）赌场有机会有人气；（2）赌场有充分的自由、有自己的规则，不受除法律之外的其他任何外在力量制约；（3）赌场老板守规矩守信用。

激发和弘扬企业家精神，无非“四信”：信仰、信心、信用、信任。党要信任为社会创造价值的企业家及其企业，政府要给社会信用，市场经济体制要稳定给企业家信心，重新喊出改革开放和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才能让企业家重建信仰。

**张 健（香港金融）：**

不论国有还是民营，只要企业经营者想让企业商业上更成功，通过竞争创造更多财富，都是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对他们的激励包括经济刺激也包括扩大社会声望，自然也包括行政提拔。

**张 晔（南京大学）：**

企业家精神首先是冒险精神，冒险的驱动力是利润。

**沈凯玲（澳洲大学）：**

企业家精神的培养需要整个社会的诚信，包括政府各个机构的诚信，从制度上对诚信以支持培育，这是软实力、金山银山，与治理环境污染至少同样重要。

**彭本红（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企业家精神更多体现在创新和社会责任，企业家精神的培育主要靠市场。

**楼稼平（宁波布衣）：**

企业家精神不是一个如何培育问题，而是怎样宽容、更大容忍问题。容忍平庸，宽恕错误，企业家精神在焉。

**王思彤（江苏省统计局）：**

企业家精神就是一个字：咬！对待已经确定的企业发展目标，要咬定青山不放松；对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大机遇，要紧紧咬合；对出现的困难与挫折，要咬紧牙关挺住。

**柯 杰（正善资本）：**

企业家精神就是一个字：韧！对于企业的使命、愿景、价值观，坚持不妥协；对于企业的战略突破口，缜密分析基础上，不断尝试，坚持找爆点；对于企业的人才组织、运营目标，坚持不降标准。

**陈 东（安徽工业大学）：**

（1）充分发挥各级工商联、行业商会、异地商会的作用，让商会和政府部门真正脱钩；（2）压缩审批和行政执法空间，改交司法监督，统一执法；（3）梳理近年来对企业的冤家错案进行纠正；（4）每年召开一次企业家大会，对过去一年做出突出贡献的企业和企业家进行表彰，提高企业家积极性；（5）把企业家培训纳入各级党校和院校培训；（6）建立企业家数据库，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给予必要的支持。

**周 斌（江苏省邮电规划设计院 / 南京大学）：**

（1）企业家自身的自我激励和修炼；（2）国家的培养、支持和保护；（3）配套的积极

社会舆论、容错机制、接班人培养体系等；（4）市场化非特权的公平商业环境。

**宋凌炎（江苏精诚 & 精缦毛毯）：**

企业家精神就是在没有任何驱动与激励下，自己创新挖掘机会，自己寻找最佳方法，敢于承担责任。企业家精神是一种创新精神、融合精神、认准方向不畏艰难的锲而不舍精神。

发扬企业家精神首先应该允许适当范围内的犯错，对于产生的新事物给予一定的包容性，特别是创新路上各项政策法规也要相应与时俱进。

**罗立彬（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1）降低成为企业家的成本；（2）提高成为企业家的收益。

**胡振华（温州大学）：**

首先从制度和精神上高度重视，然后研究相应的制度化规定，因地制宜去施行，营造良好的氛围，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企业家的保护和精神的弘扬。

**刘根荣（厦门大学）：**

企业家精神归根到底就是一种勇于闯荡市场的精神。给企业家松绑，让企业家可以放心大胆地创业、创新，而不是将公权力送到企业家手里。

**毛德勇（浙商银行资管）：**

（1）严格保护专利权，让创新精神获得丰厚的回报；（2）保护好企业的产权；（3）建立发达的金融市场，包括多渠道的股权交理流转机制，让企业家的股权有多渠道退出、转让机制。

**倪 敏（硅谷创业）：**

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的环境，而不是把企业家定义成一个特殊群体去照顾。

**张小兰（西南民族大学）：**

（1）维护企业和企业家的财产权等各项权利；（2）减少条条框框束缚，增加创业各种扶持；（3）企业做好内功，培养企业团队精神、创新精神、百折不挠的企业文化。

**李新颜（方正韩投基金）：**

企业家精神就是要把钱看得重，重到能够放弃眼前短期利益，直指长远利益。（1）企业

家精神不是什么人都有，很难培养出来；（2）企业家精神本来就在，需要把他激发出来；（3）企业家精神的激发，关键在于管住政府、创造三公环境。

建议：（1）政策出台长期化，改变短期化政策或者政策多变的现状；（2）修订束缚企业发展的政策，归还企业自主决策权；（3）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一视同仁；（4）保护知识产权；（5）鼓励企业家平等竞争。

**陈岸立（山东农发行）：**

（1）政府加强引导培育，培训提升；（2）加强氛围营造，国有民营一视同仁，为企业家成长创造良好管理；（3）加大财政投入，引导政策性金融、商业信贷、社会资本建立创业基金，鼓励创业；（4）加强风险教育，让企业家成长少走一些弯路，促其尽快成长；（5）尊重首创，做好宣传，先有企业家，后有企业家精神。

**缪放嵘（南京中诚石化集团）：**

企业家精神问题实质是社会怎么对待财富的问题，中国30年积累的财富相当于西方走100年，财富积聚效率比较高，但社会对财富积累靠什么的认识没有跟上。因此企业家精神要从三个层面上统筹考虑，还要避免两个误区：

三个层面：（1）社会层面，要认识到民营经济不是剥削经济；（2）政府层面，政府要按照全世界普遍的政企关系来真心诚意实实在在地改革；（3）企业家本身层面，民营经济的老板群体将是未来社会精英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经济的企业家有素质提升问题。

两个误区：（1）企业家的创新、抓住机遇等都不是企业家精神的素质特征，这些是天赋和机会层面的，不具有普遍性；（2）两极分化的原因，企业家和工人的劳动时间所创造的价值是不一样的，两极分化是必然的，但两极分化与企业家无关，也和人权无关，只和社会财富再分配的制度设计有关。

**吴继冈（常州市发改委）：**

坚持走改革之路，树立正确价值观，推进依法治国，营造公平环境，确立企业及企业家应有的地位。

**张月友（南京财经大学）：**

何谓企业家精神：创新（德国学派）、冒险（芝加哥学派）、发现市场机会（奥地利学派）。

**陈启斐（南京财经大学）：**

培育企业家精神最重要的是市场环境，有了好的环境氛围，优秀的企业家就会脱颖而出。

**杨 锐（苏州大学）：**

（1）涉及行业政策制定方面，设立立足于本地企业家决策咨询组织（包括各行业的企业家，咨询机构，智库等）；（2）涉及社会层面，鼓励企业家积极推动社会创新创业。

**王 丰（江苏海美新材料）：**

制定好政策，执行好法度，维护好市场，别的不用去管，也不用去刻意引导，市场会调节企业家的方向和力度。

**王洪飞（金科股份）：**

要打通企业家与政府官员之间互相跨越的通道，优秀的企业家可以到地方担任行政首长。商吏身份可以转换，提高企业家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

**孙映祥（南京机场）：**

“企业家精神”与“工匠精神”一脉相承。“技以载道”，弘扬“工匠精神”，培育“企业家精神”：（1）创新，这是企业家精神的内核；（2）敬业，忠于企业，爱岗敬责，不断追求完美和极致；（3）奉献，发扬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苦行僧精神。

培育“企业家精神”，要从营造企业家成长环境入手：（1）完善国有企业负责人选拔任用机制，拓展国有企业企业家成长空间；（2）改善营商环境，营造民营企业家平等成长空间；（3）依法保护企业家财产权和企业知识产权。

**林学军（暨南大学）：**

（1）企业家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2）企业家要有创新、创业的精神，为消费者提供优良服务；（3）企业家应当有雄才大略，有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战略眼光；（4）高等学校要为培养新一代的企业家做贡献。

**苏晓东（东源节能环保）：**

企业家精神核心：（1）永不满足于现状；（2）对企业经营的高度虔诚；（3）冒险精神。

**邵 军：**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构成，企业家精神就是市场经济的精神。凡与别的职业共有的都不是核心问题。

**周 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减少金融资源错配，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家都有合适的投融资渠道；减少人才资源错配，促进不同市场的企业家都有柔性化劳动力市场；减少政策资源错配，为企业家提供公平竞合的市场机制。

**李国强（DRC 国研中心）：**

一些政府部门的不积极作为，对于企业提出的问题和需求麻木不仁，这是当前发挥企业家精神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此，应建立一种促使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能负起责任来的倒逼机制和问责机制，强调在政府发挥作用的地方要发挥更好的作用，改善政府某些部门的低效以及不积极作为现象。

# 悠闲地宅还是勇敢地堵？——我看长假大家谈

2017 年 10 月 16 日

**编者按：**交通拥堵，是指一种车多拥挤且车速缓慢的现象，通常在假日或上下班尖峰等时刻出现，且这种情形常出现于世界上各大都市区、连接两都市间的高速公路及汽车使用率高的地区。人口和机动车的快速增长使城市交通越来越拥堵，这也是世界性难题。在我国特别是沿海发达城市，上下班尖峰时刻的城市交通拥堵现象较为明显；而在春节、国庆等全民假期期间，交通拥堵便成了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特别是在 2017 年国庆节与中秋节双节重合时期：据腾讯财经报道，中国国庆期间高速出现拥堵，许多人在高速公路上花了很长时间才达到目的地，交通拥堵再次受到人们的关注。

不管在哪个城市，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拥堵。根据联合国估算，每年由于交通拥堵造成的在汽油和时间方面的浪费总价值可以达到 3000 多亿美元。作为全球第一“堵”城，洛杉矶的司机每年因为交通拥堵而浪费的时间长达 104 个小时，在交通拥堵和汽油方面的浪费可以达到 97 亿美元，相当于每个司机每年因为洛杉矶的交通拥堵要损失 2408 美元。然而，对于国庆节全民休假时期而言，显著的交通拥堵不仅占用了有限的休闲时间，还降低了居民的休闲满意度。国庆假期期间，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组织群内专家、学者们，针对“如何看待休闲与拥堵的关系”这一主题展开讨论。

**陈志龙（财经作家）：**

哪些行业实行错峰式带薪休假，可以发起调查讨论。此外，每辆车每年给予一定数量的免过路过桥费的额度，随机分布自然不会挤在国庆这几天。

**王建国（日本中京大学）：**

（1）以每年 20 天带薪休假制度代替长假，时间可以自选；
（2）以铁路替代公路应该是个有效的方式；
（3）发展租车业务；
（4）优化城市规划模式，改变都市主要机能集中在市中心的现状。

**倪 敏（硅谷创业）：**

长假拥堵是在一个外在冲击下（放假，并且高速免费）产生的潜在需求的集体性释放，说明现阶段长假是和广大老百姓的幸福感受相关的。

根据高速公路与人口或车辆比例继续建设高速公路，降低过桥过路费。

**施 康（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人口密度较高而交通不是大问题，关键在于管理。

**张 宸（江苏省电信）：**

指定假期不如把假期交给员工自行安排选择。

**张月友（南京财经大学）：**

拥堵其实与长假还是短假无关。

拥堵是中国独特的国情，即家庭汽车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导致！简洁点说是，农民工市民化存在政策障碍导致，农民工市民化实现难度非常大，休闲和拥堵的问题将长期存在。

**刘志彪（长江产经智库）：**

交通拥堵，是集中长假制度对基础设施的利用产生排浪式消费冲击效应。

解决问题不外乎三种情况：

（1）进一步增加基础设施供给，短期不可能；

（2）减少对基础设施的需求，如就地城镇化，加快农民真正的市民化，等等，短期不可能；

（3）在既定基础设施供给下，通过分散集中的需求，减少拥堵的冲击力。需要制度调整，短期有效。

**林乐芬（南京农业大学）：**

集中长假制度是亲人朋友集中小聚的好机会，拥堵只是获得这种小聚幸福感的时间成本而已。

**王思彤（江苏省统计局）：**

私家车增长过快才是主要原因。人口多是我国国情，放假期间出门散心，是我国人之常情。所以，不鼓励、不限制，是最好的办法。

**孙国民（南京大学博士后）：**

拥堵反映的是供给不能满足需求，但这是最高峰期的需求，供给不能按照最高需求来提供，如果一味的增加供给，而且是需求最大化的地区，势必带来全国层面供给（特别是基础设施）的不平衡和差距扩大。

**鲁明泓：**

将邻近省区的放假时间错开。

**宋凌炎（江苏精诚 & 精缦毛毯）：**

高速公路堵车基本不是因为流量问题，而是事故问题造成滞留。建议高速公路实行严格分道制，如大货车走右侧，老司机走左侧，普通人员走中间等。

**李 湛（苏州发规院）：**

长假拥堵的根本原因是汽车产能过剩又没有好的管理制度。

**孙建波（家族财富管理 50 人论坛秘书长）：**

如果没有长假，各位根据自己安排休假，就好得多啦。

**华 生（三藏中国）：**

中国道路拥堵已经不只是节日的时段，会很长一段时间都存在，放开空中路线或许是缓解的办法之一。

**邵 军：**

现代化进程与活动半径成正比，个性化生活与节日拥堵成反比，出路就是现代化的增量要靠个性化的均量来缓冲。

**宋文阁（江苏省国资委）：**

拥堵主要人流量、设施及装备等秩序结构的管控，无论多少人马，如果在狭长地带通过，只要做到有序管控就不会乱。

**张小兰（西南民族大学）：**

解决拥堵，不外乎也是开源节流，开源短期难，节流还是要从提高出行成本、分开放假等

方法实现。

**杨平宇（温州商学院）：**

拥堵更多体现是人们生活改善，从而对服务（旅游）需求的增加。

**刘瑞翔（南京审计大学）：**

拥堵是需求突然爆发和供给之间的矛盾，正常状态下两者平衡就没问题。

**何 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堵的核心就是集中，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人多。

（1）调成小假期，加大频度，缩短长度，大幅减少出行；（2）实行区间管理，即起点与终点采取前后 +2 的方式，但限定总时长，相当于错峰出行。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

庞大的人口规模 + 出游探亲刚需 + 短期集中释放 = 拥堵。

**姜彩楼（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拥堵是放假、旅游、探亲、高速免费等因素的集中叠加。疏堵要走分散化的思路：（1）公众要有分散出行的选择，比如带薪休假；（2）假期高速免费可以折算成公民交通费发放，保证公平。

**李新颜（方正和生投资）：**

拥堵的原因之一，与基础设施相配套的服务没跟上。解决高速拥堵，核心在于减少城市之间的拥堵。

**颜银根（南京审计大学）：**

节假日的堵主要是单向的堵，“朝夕道”的思路可以用在节假日：单项堵说明资源分配出问题，考虑潮汐道；双向拥堵需要拓宽道路；部分时间段（如节假日）堵需要强化错峰出行。

**左建伟（省政府办）：**

拥堵还是车辆多了、人们出行量提高了，合理的机制安排是比较有效率的解决方案。

**张 健（香港金融）：**

（1）如果只有黄金周堵，说明基础设施供给端大体正常，只能通过调节需求来改善。

（2）调节高峰脉冲需求的主要办法就是削峰填谷：①靠计划手段，如错峰休假等；②靠市场手段，就是涨价；③技术手段，如预测、调度管理等来改善。

（3）高速公路假期免费政策加剧了黄金周的拥堵，且未来会更严重。

（4）开通热点城市间低价大巴，部分替代价格敏感型私人小汽车的出行，包括在高速公路上设置免费大巴 BRT 通道。

**彭本红（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分散放假，错峰出行为最佳。

**王洪亮（南京审计大学）：**

（1）假期的自主选择，在时间上错位出行；（2）在一些必须统一的假期上，公共交通工具和私人交通工具定价调整，引导公民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在空间上分流。

**汪德华（中国社科院财经院）：**

中国人的国民性需要这种集中长假制度。堵塞不可避免。一个可取的建议是发展租车市场，特别是在一些旅游目的地。

**方向阳（中国财政杂志社）：**

高速每年可发一定额度的普惠免费通行券，其他正常收费，节假日三倍收费。

**王 宇（南京大学）：**

交通拥堵不完全是交通问题，多种社会因素合在一起，很难用单一政策解决。如今年 10 月 2 日也很堵，说明消费者也在自我调整，但是旅游尤其是带孩子旅游现在也是刚需，这个估计很难用需求政策调整。

**赵正宇（南京市园林局）：**

假期交通拥堵，一方面与私家车增长相关，另一方面与收费引发的行为相关。

# 长江产经智库专家解读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

2017年10月19日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作为1981年以来，我们党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和表述的重大改变，十九大科学把握了我国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发展阶段性特征，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新定义事关全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并对今后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全局性、历史性新要求。10月18日，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组织群内专家、学者们，针对“十九大报告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解读”这一主题展开讨论。

**战岐林（山东工商大学）：**

发展的不平衡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瓶颈。不平衡发展，除了区域不平衡，还应该包括经济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之间的不平衡，但根本问题是居民之间的收入不平衡！只要人口自由流动，区域不平衡自然不是问题；如果居民之间没有收入差距，大家对生态环境的需求也会很接近；当前的生态环境问题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某些地区宁可不要青山绿水，也要首先提高收入，因为他们的收入还太低。

**翟太煌（山西证券）：**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包括住房需求、受教育需求、文化旅游需求、医疗需求、环境需求。

**蒋青云（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不充分继承了过去关于“落后生产力”的因素，既有“数量”含义，也有“质量”含义。

**张建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过去经济增长追求速度和数量，新阶段转向追求质量和效益，以实现民众对品质、安全、舒适和美丽的要求。解决新矛盾需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经济体系。

**王培君（南京林业大学）：**

人民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要，这些方面的发展，还不平衡，也还不够充分。

**邵 军：**

总体上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求与发展的矛盾这个基本判断，针对新时代，有三个新特点：（1）预期趋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向前看的，而不是仅仅这着眼于当下的生活需求；（2）范围趋广，在过去讲的“物质文化生活”之外，还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政治和环境方面的诉求；（3）差距趋小，矛盾来源于需求与发展的差距，因为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显著提高，由过去的“落后”，到目前的“不平衡不充分”，体现了在解决这个基本矛盾的进程中我们取得的成绩。

进一步解决这个矛盾，重点是全面提高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质量。

**毛翠英（南京财经大学）：**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仍是大体分为公共需要和私人需要两大类别。不充分与不均衡，也可考虑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供给，以及私人品的消费失衡。

**何 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1）从总体性需求与供给矛盾，转变为结构性需求与供给矛盾；（2）从短缺社会中的生存型矛盾，转变为丰裕社会中的发展型矛盾；（3）从单一以物质为主的矛盾，转变为涵盖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多元化矛盾。

围绕新的主要矛盾，应该集中解决乡村地区、中西部地区、低收入人群的需求；集中解决与经济发展还不够适应的人民群众对政治、文化、生态环境的需求新期待；集中解决产品的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等方面的问题。

**徐 琴（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十九大对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判断非常精准：（1）肯定了近四十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发展成就；（2）看到当前一系列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发展的不充分不均衡。既肯定了纵向的增量改善，又揭示了横向的发展差距。

这一判断有助于全社会对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形成正确认知，也有利于对暂时的发展不充分形成基本的包容度。以这一判断为基础，未来寻求“中国方案”的思路，必然是多面向多领域的深度探索，补短板将成为各个领域向纵深突破、向高阶攀升的重要取向，特别是创新不足、民生痛点、区域差异必将成为重点的补短板领域。

**陈 柳（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1）这一判断与五年来对我国经济社会进入新常态的判断、进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是一脉相承的，即社会最主要矛盾体现为经济体系的供需错位；（2）从需求方面看，当前社会需求超越了物质和文化层面，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后者是改革的短板，是今后发力的方向；（3）从供给来看，不平衡主要体现在区域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不同群体的差距过大，影响改革整体成果的共享；不充分主要指发展的质量不够高，表现为经济在价值链的位置、国家创新能力等问题。

**方向阳（中国财政杂志社）：**

解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更加凸显加快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任务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这也是十九大报告赋予财政部门的职责和使命。

**董也琳（南京市委党校）：**

“美好生活与不平衡发展的矛盾”在供给结构上的矛盾集中体现在速度与质量、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硬实力和软实力、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有形商品和无形服务的供需不平衡问题，解决路径是从数量供给为目标转向质量效率优先的供给模式，最终实现人民需求和社会供给在总量和结构上日趋均衡。在供给对象不均衡问题上，突出表现为城乡、区域以及先富和后富人群之间的非均衡供给，从而“着力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

“美好生活与不充分发展的矛盾”体现在“以人为本”的全方位发展需求与社会低质量低效益供给之间的矛盾，这也反映我国社会在供给质量和效益方面的巨大短板和发展空间，挖掘释放发展潜力的关键在创新，创新的关键和着力点在人才强国和科教兴国战略，这样才能“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最终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

**孙映祥（南京机场）：**

（1）明确了新时代的主要矛盾是供求矛盾，从而明确了主要任务是着眼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力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

（2）需求的内容和实质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今后的需求不再是“温饱”和“小康”，而是“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丰富了需求的内涵；“温饱”、“小康”和“现代化”的标准具有时代性，“日益增长的”指明了需求的动态性、延展性和提升性。

（3）供给的不足体现在结构和水平两个方面。“不平衡”指明了供给的结构性问题，从而要进一步深化供给侧改革，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变化，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

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充分”指明了供给的水平不够高的问题，今后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孙 东（南京市审计局）：**

十九大报告把“美好生活需要”分解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6个方面，对当前环境问题有清醒认识，对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空前重视。

缓解并逐步解决环境问题，需要在企业、政府监管、上级政府考核监督等多个多维下功夫：（1）企业要加快升级改造，减少能源消耗、降低污染排放；（2）政府应提升监管能力管理建设，完善环境监管制度，严格执行新环保法；（3）上级政府应不断加大对生态环保的考核力度，弱化经济考核指标，加快推进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工作。

**朱晓煜（南京市机关）：**

（1）体现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一脉相承，只是新时代站位更高，从物质文化需求变为美好生活需要，从落后的生产力变为不平衡不充分。（2）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内涵是“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3）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主要体现在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4）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

**林乐芬（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

不平衡主要体现在东中西部、城乡之间以及沿海地区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之间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较大；不充分是指未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大文明未能全面提升。

**孙国民（南京大学博士后）：**

（1）更加注重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发展依靠人民群众，发展就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奋斗的出发点和最终价值追求。（2）更加注重均衡发展。逐渐由不均衡战略向均衡发展战略转变，逐渐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异，最终实现共同富裕。（3）更加注重发展质量。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质量、精准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4）更加注重发展全面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方面“五位一体”的需要，是更加全面、更高水平的需要。

**刘志彪（长江产经智库）：**

（1）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准确地界定了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的多元化的需求层次，指出党在新时代不仅要搞物质文化生活建设，而且也要搞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建设，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不断增长的需要。

（2）标志着党的工作，要从在过去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进一步转向全面发展和建设，转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进程。

（3）对支撑发展的高级要素供给体系和结构，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不仅要进行现代经济体系的建设，要提升经济体系的发展质量，而且要更加注重制度要素的创新和供给，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尤其要加强，发展中的问题往往在于高质量的制度供给不足。

（4）指出了解决供给侧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发展不够均衡，发展数量不足、发展水平也有待不断地提升。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

（5）进一步明确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就规定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和水平，以及由此决定的党的根本任务。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

对经济建设中心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1）经济建设从总量规模扩张转向品质结构提升，需要依靠创新驱动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经济建设从非均衡发展转向协调发展，包括区域协调、城乡协调、产业协调；（3）经济建设要以人民的发展为中心，与政治建设、法治建设、社会发展、文化建设及自然生态等统筹推进。

总之，新时代的经济建设需要更好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而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则为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提供了坚实基础。

**杜运苏（南京财经大学）：**

不平衡放在前面，应该是为了突出强调结构不平衡，可能是今后一段时间关注的重点，已经不同于原来“落后生产力”的论断；尽管现在我国还不是非常发达，但生产力已经大大提高。不充分的范畴更加广泛，几乎各个方面都可以包含在里面。

**赵正宇（南京市园林局）：**

发展问题不仅包括经济，也包括社会、文化等诸领域，所以称不充分。

**高传胜（南京大学）：**

不平衡说的是不同方面之间的关系，不充分说的是每一个方面都存在的问题。

**程 鹏（江苏巨和实业）：**

新时代的主要矛盾，与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大会主要矛盾论一脉相承，又有了台阶式的提高，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这是对极左和极右两种垃圾的抛弃，不偏不倚地走科学务实的平和发展道路，是对“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这一判断的印证和锚定，是一头可爱的狮子醒来后和平的吼声。

中国集中精力把自身的这一主要矛盾解决好了，就是对世界和平与人类发展的最大贡献。

**周荣荣（江苏省统计局）：**

不平衡、不充分就是区域、城乡、收入的差异性，或是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制度发展要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相适应。

**姜德波（南京审计大学）：**

“不充分”还包括生产力发展不充分、资源利用不充分；“不平衡”既有供给与需求的不平衡，也有地区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平衡，更有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林学军（暨南大学）：**

经济发展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一直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矛盾问题。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策略。时至今日，我国在发展过程中确实存在东中西之间、产业之间、企业之间和企业内部等不平衡问题，这些不平衡的现象影响到社会的公平、和谐和稳定。

如何改进社会不平衡的现象：（1）加强社会主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把个人收入中的劳动收入比例提高到较高的水平；（2）初次分配讲效率，再次分配重公平；（3）加大政府收入再分配的力度；（4）加大扶贫攻坚的力度；（5）发挥基层工会的作用，增加基层员工收入，缩小工资差距。

**刘瑞翔（南京审计大学）：**

由于二元结构特征和地区差异，各级政府深度介入资源配置，能源、土地、金融、劳动力等要素市场不同程度存在扭曲，导致资源误配和结构失衡。这种政府主导的非均衡增长方式虽然造成了中国经济在一个较长周期的高速增长，但不可避免地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负面影响，产生了诸多经济结构失衡现象，如需求结构失衡、产业结构失衡、资源环境制约、地区差异、收入差距过大等。

在新的历史阶段，我国能否顺利处理好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发展不平衡之间的关系，关键在于能否转变经济增长模式，通过体制改革约束住“有形之手”，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长速度同时，有效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

**张月友（南京财经大学）：**

（1）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背景：①需求升级。人民群众的需求，由过去对生存和发展的追求升级为对自我实现的追求；由过去单纯对物质文明的追求，升级和转变为对物质文明、自然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等更高层次和更全方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②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经济政治体制不断改革和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当前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大国，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和发展。

（2）社会主要矛盾新表述的内涵：①贯穿于中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决定了我们的根本任务是坚持和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②高扬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共享发展。非均衡发展战略思想虽是中国实现温饱和基本小康的重要途径，但也是造成我国目前社会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较大等的直接的制度和体制原因。在非均衡发展战略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现在达到的小康是发展不平衡和不协调的小康。消灭贫穷有待落实，二元结构有待改变，区域发展有待协调，经济结构有待优化。③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不断促进人的全面而充分发展。中国的发展实践表明，目前我们的发展还是低水平和不全面的发展。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有待提高，政治、文化、自然和精神文明有待进步。

# 当代技术变革趋势、特征、影响及江苏应对策略

2017 年 11 月 7 日

**编者按：**技术的变革对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在人类发展史上，每一次重大的技术变革都会给企业经营和整个社会的产业构成带来巨大影响。建国以来，国家高度重视技术发展的重要作用，如 1988 年 9 月 9 日，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说：“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2013 年 3 月 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科协、科技界委员联组讨论时的讲话》中指出：“从全球范围看，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在全球化深化和信息化高度发展的当下，技术变革呈现加速发展趋势，并对经济社会的各方面产生深远影响，如何顺应技术变革趋势及其带来的挑战也成为不同国家和地区发展亟需考虑的问题。

本周，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组织群内专家、学者们，针对“当今时代技术变革的趋势与特征是什么？会带来什么样的时代性变化？江苏如何去把握？”这一主题展开讨论。

**史修松（淮阴工学院）：**

把江苏很好的制造业基础升级到智能制造，同时发展新的智能产业、智慧产业。

**赵正宇（南京市园林局）：**

网络对就业方式与生活方式可能产生重大变化，比如网络与智能技术改变生活、就业方式，对减缓城市交通拥堵，改变空间结构，劳动力成本问题，老龄化等都会有影响。发展互联网产业，政府应该改变扶持方式，侧重于市场运用本身，侧重于产业结构调整，侧重于城市功能的提升。

江苏应对措施：（1）以应用为突破，从拓展高技术市场的环境和空间方面吸引和发展高技术产业；（2）以升级为抓手，为制造业发展高技术创造良好的政策条件；（3）以企业为主体，以院校为龙头，在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前提下，充分发挥院校的优势和作用。

**杨建中（加凯集团）：**

发展新的智能产业，重在发展实体经济，并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上考虑。

**于晓华（哥廷根大学）：**

江苏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三大问题：城市化、老龄化、人工智能化。

**龚 曦（江苏国科）：**

（1）以人为本趋势越来越明显；（2）以人力替代为目标的智慧产业趋势逐渐加速；（3）环保产业；（4）电子行业变革。

从江苏角度看，无非是开源和节流。开源：对内引导电子商务导致的富余人力和资源向服务产业转移，对外深化出口竞争力；节流：政府事务效率效益深化改革，医改节约社保开支，人心经营有收有放。

**柯 杰（正善资本）：**

大力发展智能制造。高效整合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促进江苏智能制造产业加快迈向全球产业价值链中高端。

**孙 军（淮海工学院）：**

新技术带来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人才的价值愈发凸显。在不确定性时代，市场化的力量更要得到充分尊重。

江苏制造业基础雄厚、实力强大，很多战略性新兴产业来自于已有企业内部的自我创新。基于此：（1）大力支持在位制造业企业进行内部创新；（2）创造良好的市场氛围，大力吸引高端人才。

**杨平宇（温州商学院）：**

技术创新的趋势是不断满足人类需求。未来，技术创意应重点解决人的便利性问题，加强现代服务业创新。

**何 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技术变革新趋势：（1）空间上，技术创新的源头从原来的集中于发达国家，扩散到部分新兴国家；（2）内涵上，既有技术、产品的创新，又有业态与模式的创新；（3）内容上，既有高精尖领域创新，又有基于生活服务类的技术创新；（4）动力上，既有科研院所的传统动力，又有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动力源；（5）影响上，技术对民族国家边界的消解作用也在显现。

技术变革特征：（1）全球主要国家纷纷回归实体经济，形成了制造业振兴潮流；（2）金融是技术创新与实体振兴的推手；（3）创新本身成为全球经济转型升级的内驱力；（4）人才依然是新技术创新的根本。

江苏面临使命：建设有地方特点与地方优势的现代经济体系。实体、创新与人才，都是江苏的比较优势；相对薄弱的是金融服务业。

**张建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技术变革基本趋势：（1）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2）新兴科学和技术催生新兴先进产业。

江苏应对策略：（1）改造现有产业；（2）培育新兴先进技术产业。江苏发展先进产业时，应当以美德日等国家为竞争对手，宏观上立足全球视野配置资源，微观上放手市场，激发创新创业，以此致力于打造全球超级先进制造业集聚区。

**王思彤（江苏省统计局）：**

只有加速传统产业的智能化改造，加速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转变，提高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的技术含量，江苏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把握主动，抢占先机，立稳脚跟。

**张明之（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南京））：**

技术变革的趋势：智能化、生态化。

技术变革的特点：（1）技术革命具有自由组织性；（2）技术优势的生命周期缩短；（3）技术进步的路径依赖依然存在；（4）单个技术的突破需要相关技术的进步来实现。

带来的变化：（1）创新意识、着重知识、工匠精神等会得到大力倡导和弘扬；带来社会商品的极大丰富，供需结构新的更高层次的不平衡。（2）对传统的产业结构、商业模式、就业方式以及生活方式带来较大冲击。（3）创新成果的产业化更加依赖于资本的介入。

江苏如何把握：（1）为加快科技创新产业化，创造良好宽松的制度环境和政策支持；（2）专注高科技产业价值增值的关键节点形成全球性优势；（3）将科技创新模式植入一带一路构想、长江经济带战略、城市群战略，在产业、生态、人才、职业教育、社会发展等方面取得突破。

**唐德淼（无锡环研中心）：**

趋势与变化：（1）第一产业，经营生产方式将发生实质性的变革，将由条块分割的“小农经济”转变为机械自动化、智能智慧化、企业化；土地的持有方式和流转制度将出现实质创新；（2）第二产业，在智能制造、生活智能、绿色建筑、智慧交通、物联硬件、智慧机器人等产业领域创新突破；新一代信息技术、虚拟现实技术、互联网、物联网、工业核心共性技术的产业化创新应用日趋广泛；（3）第三产业，以智慧、便捷、精准和专业为特征的新型消费将不断升级“迭代”。

江苏把握的路径：（1）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发挥农业规模经济优势；（2）推进共性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创新，重点培育以智能制造、工业装备、物联技术、互联网等为特征的产业新比

较优势；（3）把握消费升级新特性，构建新型现代服务的产业体系。

**王显东：**

重视新能源变革：（1）减排刚需；（2）充分利用各种空间，给百姓机会和选择；（3）支持新能源企业发展，巩固并放大优势。

**宋凌炎（江苏精诚 & 精缇毛毯）：**

技术变革的趋势与特征：机器人将突破性的变革，并大量应用于信息技术、工业技术、生物技术、医疗健康、太空技术、能源材料等方面；虚拟现实将成为各地主题公园的亮点；智能汽车以及无人机时代即将来临；无人工厂与智能制造逐步替代传统制造业；大数据与互联网Ⅱ的结合，以及消费升级促进了高精度匹配的新的生产与销售模式。

江苏如何把握下一个时代机遇：（1）加强现有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工业化道路，鼓励企业全面互联网化的生产与销售高精度配合的新模式；（2）鼓励企业以投资合作、并购等方式与世界一流技术前沿企业交流；（3）给外来技术人员在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创造便利条件，在吸引高级人才的同时要留得住人，让人才有全面施展才华的空间。

**姜彩楼（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1）石墨烯技术开发应用带来材料革命。（2）攻克人类重大疾病；基因技术；合成生物学。（3）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替代人类工作，超市、大卖场、生产车间无人化已经成为现实。

**陈 柳（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江苏下一步抓住世界产业发展趋势的关键：在条件具备的城市能够在一个相对不是很大细分领域聚焦，集中资源进行突破，而不是仍然按照以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分类标准进行规划。

**刘志彪（长江产经智库）：**

技术变革趋势：信息技术、生命科学、新材料。

技术变革特点：彻底改变人的劳动方式；彻底改变人的生活方式。

时代性变化：提升经济自动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最终表现为大幅度提高生产率；提升人类健康生活水平，使社会进一步老龄化。老龄化社会成本的上升，可以用自动化、智能化的生产率上升来抵消，因此技术革命所带来的两种经济社会影响可以互相弥补和抵消。

江苏如何把握：未来，江苏经济社会发展成本的迅速上升，而生产率难以以更快的速度上升，将成为所有经济发展当中的头等问题。因此，如何应对这一问题，可以归结为如何用更高的生产率消化福利社会的高成本问题：（1）加大对生物医药、智能化、信息网络产业的投入，

争取形成四个世界级的先进医药、智能制造、新材料、物联网产业集群；（2）加快生产过程的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网络化速度，大力鼓励机器换人、智能化生产。

具体措施：（1）机器人大规模运用和碳排放限制，是制造业全球化行将结束的两个重要标志，江苏要尽快从加入制造业全球价值链，转向加入全球创新链，争取在全球创新分工中形成自己的一个环节；（2）要利用我国巨大的内需市场优势，支持我省企业自主创新和形成全球品牌；（3）鼓励江苏企业抱团走出去，通过并购获取全球创新技术和人才；（4）科技政策和产业政策要有所区分，要区分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进行不同的激励机制设计；（5）要把分散在各部门、各厅局、各地区的科技资金集中起来，运用公司形式重点支持四大世界级先进产业集群的成长。

**苏晓东（东源节能环保）：**

技术变革最大特征是智能化。智能化带来的时代性变化，是各个领域生产效率的极大提升，以及知识体系的解构与重构。

江苏唯有也必须牢牢把握好智能化时代的趋势，用智能化彻底改造传统产业，通过实体经济智能化来获得互联网 2.0、3.0 时代线上线下融合后的比较优势。

**林学军（暨南大学）：**

技术变革趋势：（1）创新全球化、专业化；（2）跨国企业是创新的主导力量；（3）新兴市场国家的创新在快速崛起。

带来变化：（1）创新成果层出不穷；（2）人类的幻想不断成为现实；（3）全球竞争更加激烈。

江苏的做法：（1）建立官产学的创新体系，提高本省创新能力；（2）发挥企业科研主力军作用；（3）加强国际创新合作，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开展科研活动。

**孙建波（家族财富管理 50 人论坛秘书长）：**

为什么美国的革命性科技创新都能带来超级牛市呢？因为美国处于全球产业链顶端，新科技及其衍生产业的利润，都集中在美国的公司。过去 30 年，中国为全球做代工的产业，大牛股都是过山车；着眼于内需的，乃至开拓国际市场的，成就了伟大的公司。

2017 年，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一个革命性的科技时代的来临。在人工智能与电动汽车这一确定性的科技革命中，中国会在全球产业链中扮演什么角色？如果还是做产业配套，这个领域就不会有伟大的中国公司，中国股市也不会有牛市。然而，在这一个伟大时代的开端，中国第一次与世界站在同一起跑线上：2017 年，中国政府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并明确了电动汽车发展的“双积分制度”。百度、阿里、腾讯、比亚迪、吉利汽车，纷纷确立了向这一领域奋进的目标。

最近，江苏在讨论新一代科技发展战略问题。我们中阅资本早就确立了“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电动汽车与无人驾驶”两大投研方向。在产业基金、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创投基金领域，

我们也在与地方政府一起，与上市公司携手，打造中国自己的科技生态产业链。我相信，面向未来10年的革命性科技创新，一定是中国人与全球一道，为世界科技发展做出中华民族的贡献。

**王辉龙（南京市党校）：**

（1）“互联网+制造”将引发制造业生产方式深刻变革，个性化、服务化、生态化生产成为趋势；（2）“互联网+新经济”推动产业组织创新，网络化和扁平化成为企业组织结构的新特征；（3）“互联网+新经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制造业服务化成为产业发展新趋势；（4）“互联网+制造”成为科技进步的引擎，互联网应用必将在制造环节带来颠覆性创新和全新的生产方式。

谁抓住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牛鼻子”，谁就能赢得未来，这个牛鼻子就是人才。吸引人才的关键就是当地的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资源的供给水平及可获得性，以及宽松自由的创业创新环境。

**张月友（南京财经大学）：**

技术变革的特征和趋势：（1）电子通信技术革命，由第一代电子通信技术（电话、广播与电视）向第二代电子通信技术（互联网技术）转型；（2）新能源革命，由化石燃料等不可再生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转型；（3）交通革命，由汽车、公交车、卡车、火车等构成的运输工具向插电式以及燃料电池动力车转型。

技术变革带来的变化：（1）崭新的国际关系理念，生物圈政治与经济全球化；（2）崭新的组织模式，分散式生产、开放合作、共享共赢；（3）崭新的时空观，由工具变为命运共同体，生产率让位于可持续发展；（4）崭新的资源观，分享胜于独占、社会资本重于金融资本、时间和注意力重于经济资源；（5）崭新的思维方式和人生观，质量重于数量、劳动让位于享乐。

总之，当代技术变革的特征和趋势及其影响决定了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主要特点是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主要任务是转变发展方式，所谋求的发展方式是创新发展，所谋求的发展目标是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因此，“要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稳中求进，坚持改革开放，实行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

**孙国民（南京大学博士后）：**

技术变革趋势与特征：（1）技术水平更高；（2）技术全面渗透到生产和消费的全领域、全环节；（3）为人类发展提供更有效率的解决方案和更有效率的生产、消费方式。

技术变革带来的变化：（1）生产领域更加提升供给侧质量，更加满足人的美好生活需要；（2）消费领域更加释放人的消费需求，更加释放人的全面发展及需要。

江苏如何把握：（1）打造全球有影响力科创中心，建设科学技术发展新高地；（2）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科学家队伍，在若干领域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3）实施全领域“中国制造 2025”示范区建设；（4）培育技能型人才，助力中国制造形成国际竞争力。

**王建国（日本中京大学）：**

从全社会的产业构成来看，新要素技术、新产品、新事业领域的层出不穷，带来了经济资源的不断创新与重组；顺应这种变化的区域性宏观管理，应该将重点置于激发创新与确立简单明了的协作、竞争的规则，维护市场秩序至上。另一方面，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在工艺技术创新方面挖潜效果远不如开发新的要素技术、开拓新事业的颠覆性创新所带来的成长性；因此，除了提高生产系统顺应市场变化的弹性、运用新的技术开拓新市场能力外，如何应对各种不确定性这个问题日显重要。

江苏的制造业在高附加价值生产方面还与德日等国家有所差距，而这些国家在致力于将自己的传统优势发挥到极致的同时，又谋求更好地融入到以新技术为增长源的新产业体系中。面对这种竞争压力，江苏应在认识自己弱势的同时，还要看到自己可以借力上海与浙江在新技术方面的优势及在新技术领域中国更具后发型优势的优势。因此，江苏应该在进一步通过改善内部管理、提高员工“知性熟练”获取制造业竞争力的同时，积极探讨传统制造业与新技术的各种结合点；在新技术领域方面，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建立有效的新技术创业机制，尤其是应该将推进尊重知识产权、使创业成果得到充分保护的制度建设放在首位。

**陈 琛（机工智库）：**

这个时代最大的特点是信息技术等先进技术和制造技术的融合：一方面，信息技术本身形成了通讯、电子以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相关产业，另一方面，信息技术正在加快融入到制造业各个价值链。

从经济学上看，规模效益主导的制造业发展规律正在向范围经济和网络经济转变。网络经济下，制造业本身也出现了信息通讯产业的特征；在大数据、工业云技术出现后，企业不仅仅在产业链环节形成了互联互通，甚至在数据和知识层面形成了无缝连接。

**宋常铁：**

各技术学科的新突破带来智能制造、信息服务、文化产品、产业逻辑关系的巨大变化，新业态、新模式、新思想不断涌现。在江苏不同地区、产业、组织、阶层间也会造成更多复杂的分层、隔阂，触及原有利益分配格局，对经济改革、社会综合治理带来持续挑战。

建议：（1）整顿现有教育格局，进一步完善终生教育体系，使其有利于当地就业、创业的再教育；（2）新业态、新模式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需要有效扶持，少用财税手段，慎用行政、法制手段；（3）鼓励跨学科经营人才的培养，提高创业企业的存活率、成长力；（4）做好社会、

产业转型中落后成员、产业的扶持和社会心理疏导。

**朱新聪（海尔日日顺）：**

当今时代一个重要的技术趋势就是物联网和智能化。产品的智能化和制造的智能化会成为常态。

对江苏来说，有两个优势：智能产品的巨大消费人群和智能制造业的巨大市场。对政府来说可以做两点：（1）通过各项政策来引导居民智能化产品消费升级；（2）加快智能制造的服务业发展，打造江苏智能制造产业及服务业新高地。

# 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与修昔底德陷阱及江苏策略

2017 年 11 月 13 日

**编者按：**“中等收入陷阱”指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塔西佗陷阱”通俗地讲，就是指当公权力遭遇公信力危机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颁布什么样的政策，社会都会给以其负面评价。

“修昔底德陷阱”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我国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对内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明显提高；但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中国威胁论”等国际舆论此起彼伏。但事实上，我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态度始终如一。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的重要论述中曾经多次谈到这三个“陷阱定律”，并对这些“陷阱定律”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由此可见党和国家对经济社会发展、执政公信力建设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态度。本周，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组织群内专家、学者们，针对“江苏如何防止和应对三大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与修昔底德陷阱）”这一主题展开讨论。

**马志军（内蒙古政协经济委办公室）：**

避免陷入“塔西佗陷阱”的办法就是政府不能朝令夕改、出尔反尔。

**罗来军（中国人民大学）：**

坚持走“科学的发展”道路克服所有的陷阱。

**宋文阁（江苏省国资委）：**

（1）“中等收入陷阱”从经济学角度理解，可以轻松跨越，如多发货币，如集体资产也

可以量化或证券化。

（2）“塔西佗陷阱”从国家治理现代化或人性人心角度理解，现阶段中国不存在这一现象。

（3）“修昔底德陷阱”从国防或军事战略角度理解，任何国家、任何组织都不能避免。

**朱晓煜（南京市市级机关）：**

（1）“中等收入陷阱”要解决经济增长动力不足问题，关键是激发全社会的创造力和发展活力；可以从转变政府职能、消除体制障碍和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等方面考虑。

（2）“塔西佗陷阱”在我们社会已初现端倪，并表现在民众对政府不信任和民众互相不信任两个层面：民众对政府不信任突出表现为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这需要引导教育广大干部按“三严三实”要求做好人做好事，其中选人用人是关键；民众互相不信任要靠法治的推行来解决，而依法守法的习惯养成要靠政府严格执法和提高全民族素养共同推进，此外教育、媒体和网络等要在宣传上予以配合。

（3）在经济全球化已成事实的当今世界，我国不具备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客观条件，主要问题在于预防大国间主观误判带来的威胁。从应对策略看：①国家层面通过对话合作互利共盈，管控分歧；②地方政府层面要推动开放发展，加强地方间交流，推动民间外交；③社会层面的媒体网络宣传引导很重要，专家学者的文章观点演讲都要管控引导。

**陈 东（安徽工业大学）：**

防范“塔西佗陷阱”需要重点解决的是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上的陷阱，尤其是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上的“塔西佗陷阱”：（1）加强对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政策的梳理，重视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问题；（2）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3）甄别纠正一批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提振企业家信心，让企业家有成就感、安全感。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

（1）“中等收入陷阱”：发展动能是否源于创新；

（2）“塔西佗陷阱”：发展成果能否为人民群众充分分享；

（3）“修昔底德陷阱”：发展理念是否开放包容共享。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有助于化解三大陷阱。

**何 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1）“中等收入陷阱”更需要关注容易被忽视的“中等收入群体陷阱”。江苏应该思考的是，如何与“富民”战略对接，不断壮大中等收入群体队伍。

（2）“塔西佗陷阱”源于公权力“不作为，乱作为”对公信力的侵蚀。应对之道：理念

上坚持人民本位，治理技术上不断改进优化；应对之术：社会学中的“印象管理”，即运用现代传媒网络，控制负面信息，提供正面资讯。走出“塔西佗陷阱”，公权力应避免对媒体技术的迷思，代之以营造规范有序、生动活泼的舆论环境，不断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越性与人民性。

（3）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一定存在“修昔底德陷阱”；但是，这一陷阱的最终走向未必是你死我亡。在互联互通的当今，中美之间的利益已经高度交织在一起，两国爆发全面对抗性冲突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江苏应在深化中美利益链上继续发力，推动与对方州市在经贸、文化、人才等方面的交流与互动，为坚实的中美关系作出江苏贡献。

**刘根荣（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

（1）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提高生产效率，改善两极分化严重的收入分配结构，避免“中等收入陷阱”。（2）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提高政府公信力，避免“塔西陀陷阱”。这要求各级政府规范自身行为，不越位、不缺位、不任性。（3）中国在全球化经济发展过程，一方面要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另一方面要以共享、共赢、包容式发展理念与欧美发达大国经济体一同引领全球化进程，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张月友（南京财经大学）：**

（1）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虽然直接指向经济增长，其实，中心要旨是发展方式转型，重点是结构优化。

（2）防止“塔西佗陷阱”策略：①转变政府的经济建设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②规范行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部门分配约束机制；③化解基层党群信任危机；④以重要民生问题为突破口，把促进结果均等作为我国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核心，提高党和政府公信力；⑤民意如水，宜疏不宜堵；⑥坚决惩治和预防腐败。

**王相林（海峡银行）：**

避免“塔西佗陷阱”要政治、法治和民心三者兼顾：（1）讲政治，有助于政府积极作为，增强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2）讲法治，使社会生活在一个有序的体系中运行，有助于社会和谐；（3）讲民心，所有的施政措施回归到人民为本的基础，保证整个系统演进方向正确。

相关对策：（1）切实加强法治建设，缩小甚至消除社会运行的模糊地带；（2）改善政府运行模式，弱化长官意志；（3）给予普通公民合理充分表达愿望的途径。

**程 鹏（江苏巨和实业）：**

依靠科技的发展避免“塔西佗陷阱”：扩大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应用，减少任意执法、自由裁量权，贯彻公平公正非歧视原则，依靠技术实现以人为本、真正为人民服务。

**谈 镇（江苏省委党校）：**

江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保持经济领先对策：（1）抓好民营经济和制造业这两个江苏经济持续发展的基本力量；提升原有产业和企业劳动生产率是江苏稳中求进的第一方略。（2）发展非银行金融，推进金融大省向金融强省迈进。（3）加快集体企业改制，释放企业活力。（4）扭住一中心、一基地重点工作、战略目标不动摇。（5）经济良性发展期弱化政府行为，加快“放管服”改革；经济风险波动期政府主动作为，帮助企业闯关度难。（6）利用厚重的科教优势，发展成为新产业变革的“垄断获利者”。（7）提高产业和人工智能、互联网结合度，提高有效供给、扩大市场占有率，改善消费者关系。

**刘志彪（长江产经智库）：**

（1）克服“中等收入陷阱”，需要社会和政府不断地投资于科技创新，以快速提升生产率，消化迈向高收入阶段的各种要素成本上升，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

（2）克服“塔西陀陷阱”，需要政府不断地投资于社会资本，建立公信力和获得社会信任资本的积累；

（3）克服“修昔底德陷阱”，需要中国政府不断地投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包容性发展。目前的主要任务是要把“一带一路”倡议落实好。

**陈 柳（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从债务角度谈一下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我们有独立的货币政策，政府债务风险不是不能兑付；真正的风险在于，经济愈来愈依赖举债和政府投资，投资效率越来越低。预算软约束使得依靠不断增加的债务保持经济增速，这可能是使经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风险。

**孙 军（淮海工学院）：**

（1）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在解决收入差距过大、老无所依的基础上，坚决以提高生产率为根基。

（2）“塔西佗陷阱”破解关键在于，坚决防止党政队伍继续扩大、税负无法降低的困境。民众申诉问题的渠道畅通并能够化解是关键。

（3）目前，“修昔底德陷阱”关键是中美之间：（1）继续扩大中美之间的投资贸易通道，加大进口；（2）沿“一带一路”构建自身产业链，形成以我为主的利益合作机制和通道。

**黄志军（江苏省农行）：**

破题“塔西佗陷阱”：（1）权力的制约，让权力运行在阳光下；（2）改变激励机制，把

特权背后的资源透明化、标准化、数字化，并且置于公众监督之下。

**宋常铁：**

（1）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本质是要缩小地区、行业、阶层的贫富差距。根本途径是：①坚定不移进行市场经济改革；②改变资源配置机制；③激发区域自身积极性，促进不同区域互补互惠；④深入改革财政税收体系。

（2）应对“塔西陀陷阱”：①保持政策延续性，推动政绩考核体系改革和领导干部重大公务终身追责。②政府、国企干部向上级述职，但政府、财政拨款事业单位、垄断性国企的各级正职领导应向国民“述职”，媒体公开，全民评议，公布结果。③公权力行使主动接受人民的监督。④加强社会政策创新，鼓励民间社团发展，引导网络社区成长。

（3）避免“修昔底德陷阱”：①主动融入国际社会，提高国家的开放度、包容度和文明水平；引导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理性发展。②通过创新，提高文化的普适度，意识形态的体认度，提高文艺传播水平。

**唐德淼（无锡环研中心）：**

（1）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路径：①持续推进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落实；②持续培育经济发展的驱动力；③变革制约经济发展活力释发的体制或机制“桎梏”因素；④科学化解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⑤加强教育改革，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创新人才的智力支撑。

（2）避免“塔西佗陷阱”路径：①推进依法治国战略；②严格执行换届审计和离任审计制度，防止职务腐败；③加强大政方针、制度和各类战略规划执行的一贯性，增强制度和规划的公信力；④创新选举、干部选拔和公职人员“淘汰”制度；⑤严禁借公权力谋利的行为；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增强人民获得感。

（3）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路径：①加强推进“命运共同体”发展战略，增强政治互信和经济共荣；②重视大国外交，寻求更多利益共同点，构建新时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作共赢的局面。

**张小兰（西南民族大学）：**

（1）经济发展是解决各种冲突和矛盾的根本途径，很多问题也只有发展中才能解决；

（2）注重发展的质量，创新与效率、公平与法治、民生与协调等多方面多手并举；

（3）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市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正视问题与解决问题。

**丁 可（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

从经济层面看，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体现在两方面：（1）作为很多国家最主要的资源出口市场，中国经济波动对这些国家宏观经济影响极大，也容易令他们陷入资源诅咒；（2）

作为世界工厂，中国对外大量出口工业品，对很多工业化刚刚起步的国家造成巨大冲击，而“一带一路”推进带来的基础设施完善和运输成本的下降，促进制造业进一步向中国等市场规模巨大的国家集中。

归根结底，这些问题在贸易框架内是无法解决的。要根本解决“修昔底德陷阱”，关键是推动中国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帮助发展中国家工业化。

**林学军（暨南大学）：**

（1）政府的公务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政府要有一套科学民主的决策程序和完善的规章制度、法律法规。（2）提高我国的创新能力，控制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形成完善先进的国家工业体系。（3）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做负责任的大国；提高国防能力，切实保障国家的安全。

**沈凯玲（澳洲国立大学）：**

这三个陷阱有些国家遇到了，但有些国家能避免。这种差异可能是在实事求是、在政策制定水平、在知己知彼方面的不同造成；因此，提高政策制定水平，充分了解情况，可能是避免这些陷阱的重要手段。

# 在环保约束下后发地区如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2017 年 11 月 29 日

**编者按：**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邓小平在规划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蓝图时，提出“小康社会”的战略构想。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深入，“小康社会”的内涵和意义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在 20 世纪末基本实现“小康”的情况下，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十九大报告一方面指出：确保到二〇二〇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另一方面提出：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环保约束逐渐成为硬约束的趋势下，后发地区如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和难点。

后发地区全面实现小康不仅是地区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同时事关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的大局。后发地区大多是拥有生态资源优势的地区，现在面临两难问题：摆脱贫困争取全面小康，必然要发展产业，从而可能破坏生态环境；受制于环境开发的约束又很难实现奔小康的目标。本周，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邀请来自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的张立冬研究员和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的王显东州长组织群内专家、学者们，针对“在环保约束下后发地区如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主题展开讨论。

## 观 点

### 张立冬（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等基本方略，积极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具体实施：

（1）推进生态高效农业发展，发展特色乡村旅游，推进农村电子商务等新业态发展。

（2）大力度引进新兴战略产业，推进农产品精深加工业发展。

（3）大力实施精准扶贫，落实好农村低保与扶贫开发政策制度衔接；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步伐，让广大农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

**楼稼平（宁波布衣）：**

（1）从与环保关系看，后发地区有三种类型：资源贫乏型、资源未开发型、资源枯竭型。

（2）资源贫乏型与枯竭型地区，可以实行迁徙，至少要大力压缩地区人口数量，使地区人员与资源承载容量相匹配。

（3）对资源未开发型的后发地区，有两条途径：①持续不断地实施中央扶贫政策；②构筑中央和地方新型的关系，唤醒地方自主意识，并以法律而不是环保政策规范来约束地方的经济开发行为。

**孙 东（南京市审计局）：**

环保约束愈发严厉和刚性，这是落后地区政府、企业、个人谋划发展之路时，必须高度重视的前提。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

（1）坚定后发地区选择绿色生态发展的决心，产业重点：生态旅游 + 生态农业，以及与之配套的生产性、生活性服务业。

（2）约束条件：道路交通等公共基础设施；本地劳动者发展意愿和发展能力；法治化市场化专业化的营商环境。

（3）措施：落实政策，增强政府公信力；完善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和管理职能；完善公共服务。

**汪德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院）：**

（1）环保标准要严格执行。

（2）在环保高压之下，总的方向应当是鼓励产业集聚，人群向大城市、城市群集聚；落后地区发展有特色的产业或服务。

（3）以改革政绩考核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为基础，特别是环境补偿制度要合理到位。

**周彩霞（南京理工大学经管院）：**

贵阳利用特色生态优势大力发展旅游等绿色产业和抓住大数据产业发展契机的成功经验表明，后发地区的经济社会健康发展需要当地政府有合适的定位，创造良好的综合环境，激发民间自发的发展活力。

**刘志彪（长江产经智库）：**

依据资源优势理论，在环保问题约束下，贫困地区适合于发展“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态产品加工业，或与旅游休闲业相关服务产业。其实，这些产业大多满足不了贫困地区全面奔小康的需要，更支撑不了走向现代化。产业发展的高加工度不足，才是资源丰富的贫困地区陷入恶性循环的关键。当今世界上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都容易陷入资源的魔咒和发展的陷阱；而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往往都是资源的贫瘠地区，在工业化过程中它们往往发展的都是深度加工类产业，或密集地利用了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和知识资本的现代服务业。基于资源的市场导向，才真正应该成为那些拥有生态资源优势的贫困地区的产业定位理论。

经验表明，区域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两个要素：区位与创新制度，两个方面至少有一样走在前列，才能实现高速发展。绝大多数贫困地区的建设，都必须发展现代交通构建居民距离大中城市的便利生活圈，才能吸引这些中心城市的人才前来消费甚至居住。在制度创新方面，最重要的是重视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国际经验表明，城镇化和科技创新，是驱动发达经济成长的两个轮子，也是中国区域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城镇化和科技创新是相辅相成的，提高了城市化水平，就能吸引其他地区的人口和资本往这里流入。通过城市人文的提升，优良的生态环境会吸引外地的人才来这里创新创业。

拥有丰富的生态资源优势的地区，大都是因为地理位置、交通条件的劣势，而在上一轮工业化中落后的地区。这些地区在现行体制下，往往并不能固守原先的未开发态势，而是具有强烈的发展工业项目的冲动。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地区现在“不发展”，有时也意味着全局范围内更高、更深层次的发展，但是我们在现实决策时，却不得不考虑下面三个强烈的约束条件：

（1）发展主义导向的经济体制和地方政府职能。只要仍然是发展主义取向，那么追求经济总量扩张的行为就必然继续；同时，即使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向了公共事务，转向了调节区域内的民生、进步和公正，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解决与承担公共事务相匹配的财政收入机制，地方政府就必须继续主动去搞工业、服务业大项目。

（2）生态补偿机制。没有补偿机制去买断生态资源丰富的地区不开发、维系绿水青山的权利，我们也没有正当的理由要求这些地区的人民固守贫困状态。

（3）地方税收制度体制模式。现阶段中国地方政府收入的激励机制结构决定了地方政府专注于房地产市场的热情，决定了它们必须大力扶持发展工业、服务业大项目。如果哪一天，中国地方政府可以从辖区内居民财产的保有、继承中征税，那么它们就自然会弱化强烈的发展工业大项目的动机，而把营造区域内安全、生态、宜居的城市环境作为重要任务，以吸引广大市民前来居住，以及增大财产的税基。

应该客观地说，生态环境保护和工业发展不一定有什么冲突和矛盾，制造业也不是污染的代名词，关键问题是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控制要到位、管理到位。如果这样，贫困地区一手发展抓工业项目，一方面发展生态旅游休闲，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否则，就将面临着生态环境

恶化的灾难。这是必须坚决避免的。

**吴先华（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生态资源如何深加工，提高附加值，是问题的关键。

**王显东：**

（1）生态环保是硬约束。

（2）如果欠发达地区还有国家更重要的生态战略地位，生态环保要求应该更严格。

（3）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既要结合可用资源禀赋，也要善于创新。

（4）需要人才支持和制度创新。在农村，需要有力的村干部群体，需要带头人。

**罗来军（中国人民大学）：**

（1）形成市场化机制，让市场决定哪些地方能发展高水平的产业形态；

（2）保障公共服务，确保不具备资源条件的地区生活无忧。

**马步洋（Metalink 新材料）：**

关键是释放制度活力，让人民去创造。

**陈岸立（山东农发行）：**

（1）立足于当地资源禀赋谈全面小康，这是基础；

（2）生态环保是硬约束，根据后发地区情况设定核心保护区、重点保护区、一般保护区，分区施策；

（3）途径要突出多样性，核心是长远、规划，关键是因地制宜、方向是突出地域特色；

（4）目标是全面小康；

（5）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赵正宇（南京市园林局）：**

（1）环保约束决定了产业必须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低（无）污染方向发展，而人才是第一约束瓶颈。

（2）后发地区的发展需要在空间结构上进行科学合理优化调整。

（3）从产业导向上，拉长农业等传统产业链是一个方向，而传统产业与高新技术结合也是重要方法。

（4）出台生态功能区的补偿办法。

（5）充分重视乡村发展，实施后发地区村落更新计划。

**战岐林（山东工商学院）：**

全面建成小康，是指人的小康，而不是区域的小康。某些地区，如果暂时没有发现好的条件，就要放开人口的流动，随着人口的流出，居民区逐渐还原成生态区。

**糜万俊（江苏酷鲨体育）：**

对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推动落后地区发展传统特色产业（林木制品、瓜果蔬菜等）。

**宋凌炎（江苏精诚 & 精缦毛毯）：**

（1）发展特色乡村体验旅游；
（2）发展乡村旅游乐园，植入文化 + 现代化元素；
（3）严格按照环保标准，对现有的企业改造，同时鼓励企业走自动化、智能化道路；
（4）建立公共岗前培训中心，以服务于未来工业升级智能制造大趋势。

**沈凯玲（澳洲国立大学）：**

单纯给所谓优惠或者拉郎配，未必能有好的效果；目标定的切实可行，做一些基础工作，解决温饱问题，也许更实际。

**杨平宇（温州商学院）：**

地方做好区域产业规划和污染企业的集中治理，推动污染企业清洁生产，鼓励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在产业园招商时，注重生态园区的规划，用产业链下游环节，消化吸收上游企业排放的污染物，做到资源的循环利用。

**陈 东（安徽工业大学）：**

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只要政府、企业、社会合力，完全可以实现共生共荣。

**刘根荣（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

落后地区是制度、人才、技术、资源、观念等多重因素影响的结果。发展必须因地制宜：

（1）一些落后地区在产业空间布局上有先天禀赋的局限性，不适合现代工业发展，应尽可能发展旅游、文化、健康等绿色产业。

（2）一些有条件的落后地区只是相对开发滞后，这些地区可以做大做强优势的地方特色产业。

（3）对落后的城乡结合区域，要做好基础设施的城乡一体化建设，发展服务城市经济的配套产业。

**何 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后发，往往是多维度的，不仅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制度环境、社会观念。建议尊重居民社会心态，合理疏导，发展以人民幸福感与获得感作为核心评价指标。重点补齐制度短板，打造制度上的绿水青山，稳定外来资本预期，提高其信心。尽量杜绝制度性后发对发展的负面影响。

**龚 曦（江苏国科）：**

（1）后发地区交通基础薄弱、人才匮乏、生活便利性差，盲目上马旅游业无异于饮鸩止渴；

（2）环保产业往往意味着污染产业，污染产业发展也需要人才、资金、技术等前提条件；

（3）政府不妨把就业数量作为补贴指标，吸引劳动密集型企业当地创造就业，以此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培养产业化集群运营基础；

（4）以乡镇或县域经济开发区为主体，以引进行业配套为主体，帮助珠三角长三角劳动密集型企业落户当地，通过就业，吸引中层管理人员回流，并通过磨合锤炼，新企业也就诞生了。

**颜银根（南京审计大学）：**

（1）发达地区转移的产业，应根据环境自处理能力有选择引进；

（2）鼓励中西部城市群建设，充分发挥规模经济，实现中西部地区经济更快发展；

（3）财政补贴需要加大力度，可以考虑用于鼓励欠发达地区污染企业购置环保设备。

**司增绰（江苏师范大学）：**

（1）生存环境较差的村镇可以在政府的主持下异地搬迁到适合生存的地方。

（2）适合生存的村镇要依靠当地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对环境污染小的产业的发展；适当发展集体经济或合作经济，利用集体力量参与市场活动。

**丁 可（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

旅游是环保约束下后发达地区全面实现小康的重要手段。日本有一个提法，叫六次产业化，中国也有类似概念，即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这里的关键就是旅游观光业。

**孙映祥（南京机场）：**

（1）根据本地特色要素资源禀赋，实现产业低碳化、高端化发展；

（2）转变增长方式，化生态优势为经济优势，这是后发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路径，

也是经济创新发展的核心动力；

（3）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推进核心城镇建设，发挥城镇的聚集和辐射功能。

**孙 军（淮海工学院）：**

后发地区陷入困境的一个原因在于，所使用的禀赋都是可以流动的，导致陷入资源禀赋陷阱。下一步要深入挖掘中西部非流动性资源禀赋的价值，这包括丰富的人文、自然旅游资源，当地特有的资源禀赋，等等。

（1）东部地区要持续增长，为中西部地区提供利用禀赋的条件；

（2）中西部地区人口要自由流动到东部地区，实现人均 GDP 的收敛；

（3）产业向中西部转移过程中，要坚决摒弃环境污染；

（4）抓住互联网、大数据和高铁开通等带来的相关机遇，政府结合当地特色扶持发展相关绿色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毛 强（中央党校学报）：**

（1）农业资源丰富地区发展有标识度的绿色农业，需要政府做好引导和培育工作；

（2）旅游资源丰富的地方发展旅游业，区域联合开发值得探索；

（3）资源相对贫瘠的地方，培育具有高技能水平的人力资本。

**杜运苏（南京财经大学）：**

发展能够结合当地要素禀赋优势的产业。

**伏玉林（华东理工大学）：**

（1）以发展产业为基础，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2）立足本地的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注重区位优势和发展阶段的研判，避免落入“资源诅咒”的陷阱。

（3）工业化仍然是欠发达地区减贫的有效手段，关键是处理好项目选择和生态环境保护关系。

（4）处理好发展房地产业和制造业的关系，避免房地产经济过度发展对制造业比较优势的损害。

**张月友（南京财经大学）：**

核心是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治理：

（1）出台政策鼓励本地农民工返乡创业，带动村民就业增收、脱贫致富；

（2）大力保护和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3）继续实施大学生村官制度，改进乡村治理，推进农业现代化规模种植和经营。

**周 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农业传统的产业链上，可以基于文化要素、网络科技和旅游特色等核心点，创新农业开发、生产、销售和消费等领域的模式，提升农业产业价值。

**方向阳（中国财政杂志社）：**

（1）依靠政府强刺激，选择一两个适合本地具有比较优势的新兴产业作出规划，实施弯道超越；

（2）改变政绩考核办法，依据生态指标因素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或探索以生态产品为媒介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

（3）发展如旅游、民宿、房地产、养老等生态优良地区具有比较优势的绿色产业；

（4）这些地区的生态环境治理本身会产生巨大的需求。

**杨 锐（苏州大学）：**

（1）特色资源不明显且与周边中心城市可达性低的欠发达地区，可与最近的相对发达的城市，围绕中间投入品行业建立绿色导向的飞地经济模式。

（2）特色资源不明显且与周边中心城市可达性高的欠发达地区，可与中心城市，以开发区为主体，展开合作创新行动计划。

（3）特色资源明显且与周边中心城市可达性低的欠发达地区，可以采取互联网 + 本地特色资源，同时尝试引入旗舰型企业家，形成示范效应。

（4）特色资源明显且与周边中心城市可达性高的欠发达地区，定位为中心城市的创业创新洼地，同时通过引入新型商业模式，立足于城市需求，产业化特色资源。

**陈 柳（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1）落后地区在全面小康建设中要做到不掉队，并不是要赶上发达地区。

（2）落后地区也存在异质性：①苏北等人口、地理、交通等条件具备发展制造业的后发地区，要在环保负面清单下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加工型产业，积极接受产业转移；②贵州、青海等因地理原因不适宜发展制造业、且人口稀少的地区，发展旅游业和特色商品业，引导人口合理迁移和聚集。

**杨建中（加凯集团）：**

（1）优先发展的产业规划尤为重要。

（2）加大引进东部或国外等外部资源力度：引进京东、苏宁等市场渠道资源性企业，打通市场通道；东部与西部企业联姻实施“一对一”帮扶政策，引导当地导向产业的快速发展。

（3）政府不仅要对中西部进行干部、技术、资源援助，更重要的是教育、技术培训，改善当地人民的思维方式。

**张小兰（西南民族大学）：**

贫穷地区发展，要在自己的优势上做文章，拉长产业链。

**高传胜（南京大学）：**

真正发展起来的地区产业，往往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不少后发地区，即使有合适发展的产业，往往也因为缺乏合适的营商环境和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挑头者而发展不起来。这正是一些后发地区落后的根本原因。

（1）江苏省后发地区最缺的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挑头者。如果土地“三权分置”政策具有足够吸引力并能得到顺利实施，外出务工的青壮年则会返乡做农业工人，或受此刺激而自主创业，原来的低水平均衡亦将被打破。

（2）只要土地能够有效流转起来，还会吸引投资者发展环保型非农产业。什么样的产业能够发展壮大起来，这取决于政府支持与市场导向的企业家行为能否形成耦合效应。

（3）完全靠外部转移支付的地区，无论如何也不能算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尽管如此，要“如期”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后发地区则必须得到其他地区和上级政府的支持与帮助。

**王思彤（江苏省统计局）：**

江苏省宿迁和徐州贾汪的发展经验值得借鉴：

（1）贾汪在资源枯竭转型示范上作文章，力求把全域旅游作为新的发展引擎；

（2）宿迁守护好京东这棵大树，吸引众多电商和互联网企业入驻，引进南外这样稀缺的教育资源，以京东小镇向外辐射。

**林学军（暨南大学）：**

（1）以严格的环保标准引导企业改变生产方式，增加环保投入；

（2）政府可以奖励环保企业、鼓励绿色消费；

（3）加强市场力量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可行策略如完善发展碳交易市场。

**鲁明泓：**

在可再生能源丰富和过剩地区，开放和发展加密货币挖矿产业：

（1）加密货币挖矿产业是一个万亿级甚至 10 万亿美元的产业；

（2）中国是加密货币算力强国；

（3）加密货币本身是国际硬通货，未来也可能成为类似于黄金的国家储备。

具体措施：

（1）组织国企从事加密货币的挖矿业务；

（2）发放专业挖矿牌照给合格的民企或股份制企业；

（3）与挖矿企业订立合同，统购统销加密货币，或允许企业自产自销；

（4）加强外汇管理，严防扰乱金融秩序。

**刘瑞翔（南京审计大学）：**

环境可能并不是落后地区发展的最主要约束条件，但落后地区的发展会进一步推动环境的改善。

# 美国税改：中国的对策

2017 年 12 月 4 日

**编者按：**美国参议院当地时间周六凌晨以 51 票：49 票通过税改法案，该法案将成为美国史上最大的税收减免法案，这也将是 31 年来美国国会首次修改税法。税收减免法案的通过，使共和党人和特朗普总统朝着以下目标迈出了一大步：一方面大幅削减企业和富人需缴纳的税款，另一方面也给美国百姓带来一系列变化。此次通过的税改法案，美国企业税税率将大幅下降，包括个人所得税在内的多项税制都将被简化，现行的多数项目式减税办法将被取消，以较低税率对美国企业转移回国的海外资产进行一次性征税等等。如该法案将把企业所得税从 35% 降低到 20%，允许企业主从企业收入中扣减 20%。

经济全球化的当今，世界各国的政策变化都会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特别是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本次通过的税改法案将会对全球各国产生巨大的冲击。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税改方案也必将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产生显著的影响。美国税改法案的影响如何，中国如何应对等一系列问题都亟需深入研究。本周，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组织群内专家、学者们，第一时间针对“美国税改：中国的对策”这一主题展开讨论。我们精选了大家发言中的主要观点发布于这一期推文中，如果你有什么有趣的观点或是希望对文中作者的观点进行补充、评价，都可以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观 点**

**陈岸立（山东农发行）：**

美国减税，从短期看，是重大利空；从长远看，是重大利好，会倒逼中国的税制改革，增强制造业竞争力。

**陆慧琦（溧阳市政府）：**

美国减税对中国的企业造成了很大的竞争压力，也对提高企业质量的供给侧改革造成了的压力。所以当务之急，要把十九大精神落到实处，着力改善企业的营商环境。

**陈 东（安徽工业大学）：**

中国应该立即单独成立一个机构，摸清一切税外的费和其他成本，然后综合计算我们的企

业负担有多少，摸清企业成本家底，然后痛下决心减负，时间窗口很短，不能等美国税改落地，企业外流加速后再行动。

立即把国内各种具有机关性质的慈善机构，如，红十字会、慈善总会、扶贫办、光彩会，以及各民主党派等等内涵的慈善功能统一整合。

**伏玉林（华东理工大学）：**

为制造业企业减负，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升实体经济的内在动力。

本来是应该对冲的，但是落到实处，只能通过改革来减负。

**罗来军（中国人民大学）：**

从政府角度来讲，不会减税，而会加强各种管制来控制国际减税的冲击。

**张中详（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

美国的减税，希望有助于中国加快收入税的调整。45% 的收入税不仅高，而且对应的起征点低。

泛泛来讲的话，降低整个制度性的交易成本很关键。这个应该是降成本的最关键内容。

税收影响产业转移，本来就不是特别担心劳动密集型，主要还是对高端制造业的影响。美国产业回流需要，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更需要。

**龙小宁（厦门大学）：**

短期内，需要减税来增加企业竞争力和对资本的吸引力；长期内，需要通过简政放权来避免财政赤字的过度上涨。恰好是供给侧改革的两个最重要内容。

**刘晓昶：**

就像各地开发区纷纷给予投资企业优惠政策一样，中美之间也存在类似投资环境的竞争关系。美国政府率先减税，中国政府只有做得更好、更到位，才能吸引和留住企业，给民众增加福祉！

**何　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我的看法，就是搭便车。加速推动美中贸易与投资便利化协定。在国内资本搭乘减税便车的同时，又对冲了协定对国内市场的冲击。实在是推进协定的难得时间窗口。

**盛文军（人行杭州）：**

（1）美国减税，刺激美国消费和投资，引致通胀预期，加息节奏加快。挑战中国货币政策，国内经济未明显复苏的态势下，加息不利于经济增长，不加息资金外流压力加大。

（2）美国减税有利于其资本市场尤其是股市上涨，对中国股市短期利好，后续没有实体经济增长的强劲支撑，恐难持续。

（3）中国应尽快研究出台结构性减税措施，尤其是民企。

**宋凌炎（江苏精诚 & 精缦毛毯）：**

美国减税对中国的企业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中国是个大体量的国家，我们应该吸取过去美国制造业转出现在又大力引入的教训。确切地说，中国低知识劳动人口比美国多得多，防止重蹈覆辙，适当对中国制造业减负，放水养鱼。

**王亚利（江苏省专利信息服务中心）：**

美国减税明显是想把有高技能的人、高技术企业、全球钱才统统吸引到美国去，我们国家可能会被动优化人才创新和服务土壤、营造企业营商环境、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优化创新创业生态系统，被动调整现行政策，应对美国的减税。

**柯 杰（正善资本）：**

人民美好生活需求更多聚焦在民生领域，需要源源不断税收收入来支撑。

我认为政府不会减税，反会基于信息化的便利，查漏补缺，把以前忽略的小微企业、个体户应缴的税全部收回去。

**孙 军（淮海工学院）：**

美国减税并非是孤立的，与加息和贸易保护是三位一体的，系统的。中国也必须从税收结构、规模，降成本、补短板和全面放活经济发展上下功夫。当然，短期，需要适当的控制资本外流和人民币贬值压力。

**夏网生（江苏省商务厅）：**

对高新技术企业影响有限，但对高科技人才个人所得税改革要加快。对外资外贸和对外投资政策要综合研讨，增强政策的一致性。

**卢亚娟（南京审计大学）：**

美国减税，垄断资本家少纳税获益更多，过多减税会导致底层人得到的医疗等公共产品减少。近5年，中国脱贫人口6600万，相当于法国人口，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重全要素生产力提高，本人认为，减税将是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抓手之一。

**方向阳（中国财政杂志社）：**

切实采取减轻企业综合负担（不一定就是减税措施），公平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负担，禁止地区之间公开和变相的税收洼地竞争，打击在国际避税天堂设立公司逃避税收行为。

从公平税负原则出发，要建立完善从国民角度的税收征管体系（重点是将国民取自境外的所得纳入征管体系）。

**蒋青云（复旦大学）：**

美国大幅度减税是全球重构价值链的一个机会。在美国重振制造业的时候，中国应该对研发和科技创新有更加多的投入，包括减税、优惠投资和让利政策等，趁机在高科技领域闯出一片新天地，从而适度改变全球产业分工。

**龚 曦（江苏国科）：**

作为企业来说，就是政策跟随，企业可以考虑调结构、挪财务，把利润留到美国，也是变相的货币转移。

**金心异（深圳独立学者）：**

（1）印钞票，收“通胀税”；（2）逐步开征“物业税”，既要让地方政府增加收入，又要避免房地产泡沫破灭。

**苏 伟（苏丝丝绸）：**

中国企业税负确实偏高，把税负降下来，国家从严执法，让企业把精力多用在正常的生产经营上来。

**蒋乃华（南通大学）：**

资本所得与劳动所得的不平衡是中国税收问题的重要表现。美国减税后，中国的减税设计应用是差别化、结构性的。

传统的资本项目管制仍是保住美元盈余的有效办法；不断高企的政府债务会直接削弱中央

政府减税的动力。但显然易见，结构性减税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和关键。

**周 斌（江苏省邮电规划设计院）：**

美国的减税政策开始对我们会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长期来看，可能还是好事，将供给侧改革更是进一步逼到了墙角，原来如果是国内自我激发，现在多了外部的刺激。

应对：（1）国家层面必须对应制定政策，应该是开放的含货币、财政、税务、进出口贸易、新兴产业等组合拳的政策；（2）国内可以正好利用这一机会，在研发、人才、三去一补、区域经济发展、精细化、共享经济等所有的只要参与全球市场的产业都必须有所推进方是良策，挺过去可能就是豁然开朗 .

**缪 荣（中国企业联合会）：**

面对面竞争，别人能减我们为什么不能，至少可以从结构性和区域性减税做文章。就像当年加入 WTO 一样，长期看税收竞争对中国不是坏事。

**谭洪波（扬州大学）：**

关于美国税改与中国房价：美国减税理论上会对中国房价起到抑制作用，但中国房价一向坚挺，因此实际上影响几何不得而知，且看明年房价走势。

从长远来考虑，中国应该实施减税，至少是结构性的，减税的短痛如果能够换来激发企业活力，实现经济繁荣，长期来看税收总量可能不降反增。

**施 康（香港中文大学）：**

美国减税是否长久，不是我们关注的事情。我们关注的是中国应该减税，有利于长远发展。只有减税，才能慢慢地减少政府的规模，和对市场的干预。

**司增绰（江苏师范大学）：**

重视美国减税竞争和营商环境竞争的短期与长期影响，以外部压力推进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优化中小企业营商环境，降低中小企业税费负担，提升中小企业市场活力。

**夏海力（苏州科技大学）：**

美国减税对我国的外溢性影响可能会较大，估计会挤压中国在生产资料、人工等方面的生产成本优势。建议我国要关注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也要适度推进税制改革，减轻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税费压力。

可以不用减税，但要减负，清理企业现在抱怨较多的各种收费和罚款。

**颜银根（南京审计大学）：**

美国减税有利于刺激企业生产和民众消费，对中国而言未必是坏事，未来出口未必不容乐观。

中国政府不应局限于税收上做文章，更应摸清同类美国企业与中国企业差异程度以及产业关联程度，激励差异化错位发展和中间品生产，形成价值链。

**刘志彪（长江产经智库）：**

只有减税降费，才真正能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税收是国际竞争的，不能孤立；尤其是它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下是持续的、全方位的和重大的。特朗普减税会导致资本和企业双重回流美国，从而对金砖国家尤其中国产生巨大的压力，主要表现在人民币贬值、资本外流、FDI 流入减少和外储可能减少。要想在不减税降费的前提下避免出现上述严重问题，就需要管制国内资本的流动。

**丁 可（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

税收水平只是影响产业转移的一个因素，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因素，不必惊慌失措。劳动密集型行业，比如服装、鞋帽的制造，不可能回流美国，中国也挽留不住，必然向低工资国家转移。机械、电子等零部件数量多，对供应链高度依赖的行业，要想把中国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形成的，全球最发达的供应链整个搬迁过去，难度极大。可能性较大的是汽车。运输成本高，对市场需求的变化又比较敏感，在美国生产有合理性，加上减税，相关企业确实有可能加大投资力度。

当然，中国确实需要以美国减税为契机，反思近年来营商环境恶化，对企业发展、升级造成的不良影响。

**沈凯玲（澳洲国立大学）：**

不必神化美国的政策制定。如果非要说中国需要减税，一定是主要基于中国情况。别人吃什么药是别人的病情决定的，自己吃什么药还是看自己的情况来。

**陈 柳（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从减税的前提的一个角度谈一下。减税难在哪里：（1）支出“刚性”，公教人员个人费占了政府财政的大头，有历史的原因、有机构设置的原因；（2）政府想做事，现在的逻辑是把钱收上来，然后再通过专项资金等方式补给企业；（3）政府招商项目、转型升级一系列载体建设以及“引智”，还有民生工程，这些是政府发展经济工作的主要着力点，需要政府大量投资。

我们进行减税，要把上述几部分分析一些政府哪些方面要少做少支出，比如精兵简政、减

少基础设施建设的过度超前、减少对群众福利增加不大的民生工程、减少“招才引智”的面子工程。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

税改被视为我国改革的深水区，提了 10 年未有实质推进。我们说的要壮士断腕深化改革，何以取信于民？塔西坨陷阱风险就是这样累积的。美国税改是一个重要的改革契机，政府应检视承诺，以降税为突破口兑现重大承诺。

**张立冬（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1）切实改善营商环境降低企业负担；

（2）建立基于内需、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体系。

**刘瑞翔（南京审计大学）：**

美减税政策出台对中美影响：

（1）汇率：造成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压力，可能对出口有一定影响。短期中国流动资本外流压力增加，对外汇储备会有不利影响。但是，长期资本影响比较小，中美企业和产业形态差异较大，比较优势不同，并不存在直接竞争。

（2）货币政策、楼市、股市：增加美联储加息的次数，影响各国银行的决策。比如中国央行在明年下半年“被动加息”可能性将增加，加息对中国楼市、股市将构成不利影响。

（3）实体企业：引发市场经济国家展开大规模的减税竞赛，对于中国的实体经济构成利好。

（4）特朗普准备废除遗产税，可能对全球遗产税产生深远的影响。为了保持竞争力，主要国家未来将纷纷废除遗产税，或者降低税率。中国推出遗产税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

**张小兰（西南民族大学）：**

我国不仅企业与个人税负高，而且只有交税，没有退税机制，企业哪怕做了慈善，也不能退税，很不利于企业做慈善。建议如果我国要减税，首先完善对科技投资，以及慈善的退税机制。

**高传胜（南京大学）：**

如果把税费看成是企业和公民购买政府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价格，那么发达的创新大国——美国可以算是高端市场。现在高端市场都在降价，作为中低端市场的中国不降价势必会引起客户转移，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理应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利用此外部竞争的有利机会，推进减税降费既有助于提高社会获得感，又可以逼着政府瘦身。

**陶 炜（南京鸿意地产）：**

中国应该早已有预案，影响大的会直接少额减税，目前不具备大规模减税条件，这两年实际上已通过企业家敲打震慑和外汇管控，大大减少了中企外迁的可能。

**张建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政府可能陷入了税收困境：美国的减税竞争与政府希望获得更多资金（投资国内外和国际活动）。摆脱的办法可能是税收的结构性，比如降低制造和生产性服务业的税费，增加其他行业的税费（比如房地产）。

**张月友（南京财经大学）：**

美国减税 + 货币正常化对中国价格的影响有二：人民币贬值压力增大 + 被动加息。对中国产业的影响主要是争夺税基 + 削弱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对中国市场的影响：利空股市，利空房市，考虑风险释放程度，主要威胁房市。综合一句话就是：实体经济生产率急需提升 + 防控金融风险。

防控资本外逃，在对外投资方面要继续加强资金监管，严控非技术类海外并购。还有，对外投资要避免动用外汇，鼓励和国际协调多用人民币。

**马步洋（Metalink 新材料）：**

只要美国开战，别国只能应战。手段可以综合考虑，但是堵不如疏，企业家进行利益比较后会用脚投票。为什么中国政府不能缩减开支？这是一个不得不、迟早要做的，因为已经不堪重负。

**王 宇（南京大学）：**

如果总是抱着财政收入不减少这个前提，很容易将自己的政策回旋空间变得非常有限。推动结构性税改，对于经济的整体影响很难确定，尤其是主张向房地产开刀，很容易引发经济危机，需要慎之又慎。

如果换个思路，不妨考虑一下在财政收入降低的前提下，我们该怎么办。我倒是觉得这是推动政府改革的好时机。在当前的大政府模式下，财政支出中不合理和低效率的部分是很多的。政府完全可以通过挤掉这些水分，以在不影响政府对经济和社会控制力的前提下，进行瘦身。政府当前的问题并不是钱太少做不了事情，而是钱太多在乱做事情。

**于晓华（哥廷根大学）：**

美国的税改逻辑：从国际的角度来说，吸引其他国家的资本流入，促进制造业繁荣，提高就业。这是美国脱全球化走向单边主义的具体一步棋。从具体措施和国内的角度来看，企业税

下降厉害，但个人所得税其实没有降多少。这是一个主流。企业税下降会促进国内投资，这其实就是供给侧改革。对于中国政府和决策者来说，对手的思路改变了，我们的决策思路也要改变。

**宋文阁（江苏省国资委）：**

中国政府应当积极应对，大力推进结构性减免税，深化供给侧改革。首先改革个人所得税，总体税负减少是方向；其次改革间接税中的流转税，如增值税，扩大抵扣范围，降低税率，总体税负减少是方向。再次改革房地产税及开征遗产税，总体税负增加是方向。最后在消费税上应当有积极作为。不应当消极应对，被动减税、免税、加息、资本外流等，否则会陷于两难境地。

**黄 端（福建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从战略上要保持定力。美国减税首先是美国国内的事务，直接影响美国国内。对世界的影响是间接的，不可把间接当直接。其次美国经济存在问题的原因很多，单靠减税不可能解决，可持续性是有问题的。因此，对中国的影响从影响力上讲是间接的，从时间上讲有待观察。加上中国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体量和中国经济自身稳定发展的因素，具备了从战略上保持定力的强大基础和应对能力，完全可以制定出自己的应对方案和隔离墙。

从战术上要认真对待。（1）美国减税对我国税制的确有一定冲击。税收政策是世界各国的权利，但在全球化下，一国的税收政策的变动必定会引发对其他国家的冲击，更何况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2）美国减税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比如人民币汇率、国际资本流动以及各类生产要素流动等一系列影响。这些影响既不要夸大，也不要小瞧，应当顺势而为，积极应对。（3）适时启动对不合理的当今世界经济秩序的变革。美国减税之所以会造成如此大的影响，除了美国的影响力本身外，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不合理的当今世界经济秩序也是一个重要原因。随着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兴起，改变不合理的当今世界经济秩序的呼声越来越强烈。适时启动对不合理的当今世界经济秩序的变革也是应对美国减税的重要对策。

# 当前和未来如何推动高质量发展

2017年12月11日

**编者按：**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近期，高质量发展频频出现在我国高层重要会议中：十九大报告描绘了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蓝图，并作出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判断；1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分析研究2018年经济工作会议传递出2018年经济发展的清晰走向：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在日前召开的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

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根本要求，有利于更好摆脱围绕速度判断经济发展的范畴，推动经济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即将到来的2018年，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宏大棋局如何落子？我国应如何推动高质量发展？本周，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组织群内专家、学者们，第一时间针对“当前和未来如何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展开讨论。

## 观 点

**罗立彬（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推动高质量增长，就要让能提供高质量产品的供给者具备充分发挥能力的机会和环境。全方位高水平开放，让全世界最优质的产品供给者可以为了中国的大市场而公平竞争；通过与国外签订与各种知识产权有关的经验来培育国内健康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推进人们对知识产权保护产生有效需求，创造更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来鼓励创新，也鼓励各种创新要素的流动。

**姜彩楼（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推动高质量增长，要充分发挥创新引领作用，推动社会进入全面创新阶段，引领增长质态升级。还要充分发挥标准、社会舆论的监督、倒逼机制，淘汰标准线以下的产品。还要重视不同收入水平消费者的需求，认识到刚需产品在我国将长期存在，通过制定标准引导建立满足我国高中低消费水平的产品生产体系。

**刘瑞翔（南京审计大学）：**

高质量发展是包容性发展，是环境友好型发展，是创新驱动型发展。

**踪家峰（南开大学）：**

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是诚信的社会，以及在诚信基础上建立的一整套机制。

**方向阳（中国财政杂志社）：**

高质量发展本身既是个中间目标，又是个手段工具，但它不是出发点和落脚点。一国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才是出发点和落脚点，脱离了这个大逻辑闭环，高质量发展无异于缘木求鱼。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创新驱动型、收益共享成本共担型的中高速增长，四者缺一不可。

**司增绰（江苏师范大学）：**

高质量发展，对照的是过去的高速增长。高质量发展应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都有所表现。在宏观方面一个表现是中高速合适的增长速度；在中观方面的重要表现是结构合理的产业系统和梯度合理的地区差异；在微观方面重要表现就是产品和服务的质量系统化和品牌系统化。

**周彩霞（南京理工大学经管院）：**

主政一方绝对不能仅仅高高在上地关注经济技术的数量指标考量，只有数量指标的增加未必是高质量发展。人文情怀必不可少。

**王建国（日本中京大学）：**

经济的质量，应该包括人们生活的质量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性两个方面。

目前，应该解决的是对我们的经济质量带来严重负面影响的问题：首先是环境污染问题，其次是医疗条件的改善，第三应该解决人们基本权利的保障，让百姓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人的尊严保障又是发展人力资本的必要前提。

**刘志彪（长江产经智库）：**

十九大报告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表述，主要内容有：一个“阶段判断”，即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二个原则”：即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三大变革”，即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着力点”是发展实体经济，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

过去在高速增长阶段，我们只需要强化生产要素尤其资本的投入就可以了。而在高质量发

展阶段，微观主体必须受到投入产出比的严厉约束，即上述二个原则成为经济主体决策的基础和出发点，才能形成高质量发展态势。质量变革、效率变革的前提是动力变革，只有把行政权力推动的经济体系转化为市场机制推动，才能实现发展阶段的转变。过去的发展之所以没有能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除了发展阶段和水平的限制外，最重要的原因是改革近 40 年来，我们的企业（尤其是国企）和地方政府的预算软约束。破除这种软约束，任重道远，但是它却是中国经济真正走上质量优势竞争的关键所在。

**张月友（南京财经大学）：**

我理解质量变革是指：过去我们讲发展的质量，主要是指发展的效率，用较少的资源投入生产较多的商品和服务。这与过去我们的社会主要矛盾是生产力水平低这一客观事实分不开。进入新时代，我们的社会矛盾已经转变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日益增长的追求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这一国情下的发展质量应明显区别与过去经济效率的提高，而更多要体现为发展的社会效益的提高。

因此，新时代要实现经济发展的高质量增长，应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兼顾。在经济效率上，主要把投入产出效率改变为经济发展的可靠性、产品质量序列的提升、高技术投入密度的提高和产出的高附加值增长上。而社会效率的提高，应体现为经济发展的环境容载及低污染可持续性发展、消灭贫困和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经济发展的可靠性在美国积极财政和紧缩货币政策的国际经济环境背景下，主要体现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颜银根（南京审计大学）：**

质量化经济应当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以产品质量提升为导向。从消费者层面和企业层面两个角度：（1）从消费者角度看，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对中高端商品的需求会增加。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居民整体消费层次会提高，会有从数量化需求转向质量化的需求。（2）从生产者角度看，质量化意味着产品质量的提升和企业生产方式的改变。

**何　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实是现代经济体系的方向。那么，何谓高质量发展？角度很多，但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这种发展能够给人民带来更多的福祉，既有生态的、收入的，还应有宪法所赋予的劳动者权益上，让劳工告别环境恶劣、风险巨大、收入不高的行业与职业，是衡量经济发展是否迈向高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与维度。

要以高质量政府政策引导，推动高质量发展。宏观政策，要尊重市场，尊重规律，尊重趋势。建议高质量发展，运用负面清单制度。以环保、人权与法治作为底线，淘汰低质量发展。发挥需求端变化的牵引作用，发挥市场的自我甄别机制，发挥公共政策的保驾护航功能。

**孙 军（淮海工学院）：**

在低质量高速增长阶段，政府可以充分“作为”。在以 GDP 为主的官员晋升考核体系和出口导向阶段，各级政府只要保证以外资为主的各种生产要素持续流入，通过各种措施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即可。但当前各种内外部约束已经使得这种模式不可维持。在高质量增长阶段，政府以前手段均基本失效，过去高增长掩盖的问题也不断暴露。高质量增长阶段，就是要更加依赖内需，更加依靠市场机制，这才是新时代最大的驱动力。这个阶段需要服务型政府而不是干预型政府，政府干预经济之手往后撤（国有企业改革、简政放权、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区域协调发展等），服务社会之手往前伸（化解市场失灵所带来的弊端，例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

**赵顺群：**

（1）更加深入地理解两句话：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要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这两句话综合在一起就是要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推动高质量发展。

（2）市场机制要发挥作用，需要深化改革来保障。如要进一步完善服务于市场机制的法律体系；进一步加快政府体制改革，从考核体系到选人用人等等；进一步鼓励基层依法合规创新和尊重企业家精神。只有深化改革才能转变发展方式，让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推动高质量发展。

**邵 军：**

经济高质量发展，主要针对过去高速发展阶段存在的质量不高问题，包括结构失衡、资源依赖、贫富差距、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有阶段性的内在因素，属于后发经济体在追赶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问题。更多的是导向问题，以上级考核决定升迁的干部制度，引导地方干部跟着上级的考核指标转，而单一 GDP 的考核指标，加剧了发展的不平衡问题。现在强调发展质量，改变单一 GDP 的考核是对的。但是，如果干部制度的导向不改变，仍然是跟着上级的考核指标转，那只是把 GDP 改成碳排放等指标，仍然会犯发展质量不高的错误。

因此，高质量的发展，就是以人民为中心，让群众满意的发展。需要更加重视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更加注重法治建设。

**苏 健（南京市社科院）：**

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应包含如下特征：可持续性和相对稳定性、协调性、以科技创新为主、人民群众普遍获益。推动高质量发展，首先要构建评价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

高质量发展的源动力还是民众的高质量需要。是政府要高质量发展，还是民众要高质量发展，这个逻辑顺序要界定清楚。民众高质量需要的意愿是强烈的，同时其现实制约也是严峻的。收入住房医疗教育养老是制约意愿向现实转化的五大难题。

**陈 柳（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过去传统上，宏观调控是调节经济冷热，冷了添火、热了加水，政策手段主要是货币和财政政策。现在，针对高质量发展实施宏观调控，目标是把调控政策精准化，把调控手段下沉到中观层面。比如：反复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把房地产市场调控放在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支持企业利用外汇储备走出去，主要支持具有战略意义的先进制造业，反对金融业、娱乐业的海外并购。这些政策都反映了基于高质量发展的宏观调控手段变化。

**宋常铁：**

高质量发展是40年高速度发展的延续，而非另开一局，历史无法切割。因此，既着眼旧有问题的解决，更根本上，还是要“发展中的问题在发展中解决”。

（1）更高质量的发展，首要是先发展，是前进。珍惜、维护改革开放40年来累积、发育形成的经济环境；系统、全面落实十九大报告精神，各级政府以雇员的身份、服务的意识参与到社会运行，为纳税人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

（2）发展是为了让人民安居乐业，这是经济生活的质量的基本点。经济质量最根本的保障，是民心，是人民的安全感、进取心、凝聚力。

（3）经济质量最急需的是动力。坚守改革开放的初心，坚持并深入下去。反市场垄断，才有市场的动力释放，民营企业是更可依赖的经济力量，必须让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给民间自发力量退出市场空间和政策资源。

**程 鹏（江苏巨和实业）：**

高质量发展就是壮士断腕，道法自然，就是轻徭薄赋不折腾。

**王思彤（江苏省统计局）：**

高质量发展，应该是能够有效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的发展，是五位一体统筹协调推进的发展，是合理的产业结构替代无序的产业结构的发展，是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自如切换的发展，是以先进技术替代落后技术的发展，是以优质产品替代劣质产品的发展，是以高效率替代低效率的发展，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是百姓有广泛获得感、幸福感、认同感的发展。

**高传胜（南京大学）：**

市场经济是需求导向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应该是适应需求、引导需求并提升需求的发展。因此，建立发现需求、适应需求并引导需求的多层次、多样化资源配置机制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市场、社会和政府等多部门协同治理的大趋势下，不仅需要深化体制改革、创造政策环境，让市场真正发挥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满足民众的多样化需求，还需要更新发展理念，破除政策障碍，让社会组织充分发展，有效地发挥其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积极功能。在此基础上，政府则应承担起兜底保障经济困难人群的基本需求的责任。

**包 特（南洋理工大学）：**

高质量发展不光要注意工业产品和技术的升级，也要追求文化、艺术和设计产业的提升。中国制造业发展到今天，已经诞生了以华为为代表的一系列技术和效率在国际上领先的企业。那么下一步，为了寻求产业的进一步升级和盈利进一步的上升，我们需要将战场移向设计或“审美”。事实上，由物质向精神的消费转换可能是现代消费升级的自然需求。回顾历史，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盛唐和英国工业革命时代的审美是当时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象征，也是对外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长期影响了周边和全世界的文化和精神面貌。

**张建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高质量发展包括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和协调的经济结构。在一个正常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总是伴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今天发展的质量不高，是因为过去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指导下，过度的偏重经济增长，甚至不惜一切代价保增长。在扭曲的增长激励中，应有的结构调整被人为的阻断了，并由此导致了社会结构的扭曲。

在要求高质量发展的现在，不再提增长的速度要求，已是一个明显的进步。今后的政策导向，应该致力于一方面解决结构不协调问题，包括城乡之间、产业之间及地区之间；另一方面是以竞争和监管来监督增长的质量。

**孙国民（南京大学博士后）：**

高质量发展关系到高质量发展理念、动力、路径以及模式选择：理念上要贯彻全面发展观和五大发展理念；动力上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为保障，更高水平、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有效率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路径上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为支撑；发展模式上要立足建设创新型国家、区域协同发展和乡村振兴发展，推动中国经济朝着两步走的现代化强国目标迈进。

**陈伟贤（南京医科大学一附院）：**

有了高质量的制度供给，才会有新时代高质量经济的发展。

**陈岸立（山东农发行）：**

坚持高质量经济发展，必须找到阻碍高质量发展的问题症结所在；要坚持问题导向，狠挖根源，痛下决心，刮骨疗毒，分类施策。对体制造成的阻碍，大刀阔斧对行政体制进行改革，推掉既得利益藩篱。对市场行为造成的，减少运动式、拍脑袋式干预，要用市场的手段，激发微观主体的作用，在充分竞争中培育引领、发展壮大。对人才原因造成的，要加大实用性人才培养，如加大对高端智库的财政投入，种树引凰。要加强顶层设计，减少各个领域的“拉链式”工程，着力在高新技术领域占领制高点，做好产业融合，从规模优先转变为质量领先

**倪 敏（硅谷创业）：**

坚持高质量经济发展，必须让经济建设中各角色归位。决策者归位，监管者归位，生产者归位。归位了才能准确定位经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对症下药。否则在错位的关系中，解决一个问题很可能就是引入一个新问题。

**陈 东（安徽工业大学）：**

坚持高质量发展，主要还是要靠企业家的创造力，而不是靠政府的计划力，因此，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从企业家微观主体来说，需要加强对其教育引导，营造鼓励先进宽松失败的文化氛围。从企业层面来说，可以从加强现代公司治理能力提升，打造积极的文化氛围为切入点。从政府层面来说，应该从加强对企业家法律层面保护，提高服务的落地水平和法治化水平，注重培育和引导行业协会商会等中介组织的力量作用。从全球层面来说，应该通过以进一步开放促企业家创新精神培育，工匠精神培育，提升在全球化中的竞争能力。

**宋凌炎（江苏精诚 & 精缦毛毯）：**

高质量发展，首先要高质量人才做支撑：（1）优生优育优化出生人口；（2）创造良好的教育条件，培养德才兼备且具有国际视野又能不脱离社会实践的优秀学子；（3）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让更多的孩子毕业后不仅仅只是为了工作而工作，而是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兴趣爱好，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工作，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周 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就是我们的产品供给从世界工厂到中国创造到中国智造的演变；就是情

感式国货支持到自主性的国货选择；就是创意经济下对美好生活方式的追求和转变；就是数字经济下智能生产和生活的推进；就是创新经济驱动下的绿色生态环境建设和发展。

**崔卫东（蓝鲸咨询）：**

建立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科学定义发展质量的高低程度：（1）不追求多而全的指标设定，抓住几个关键指标，能够直观判断发展质量的高低；（2）不同区域可以设定符合地方特点的指标，不一刀切，鼓励一线发展实践；（3）让人民群众感知发展质量成果。

建立区域高质量发展机制，以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推动实体经济提高效率。推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材料技术、能源技术等先进技术与传统产业跨界融合发展，建立产业技术共享的研发平台。推动现代金融在区域层面融入实体经济，促进产城内部以实体经济为主导的利益转移与平衡。推动以人力资源为中心的居住、休闲、娱乐、益智、健康体系建设，促进人的工作、成长、健康一体化发展。

# 从医患对立事件看医改方向

2017年12月18日

**编者按：**医疗服务是居民的基本公共需求，在我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下，医疗服务的供需等矛盾也较为突出，医患对立事件也时常发生。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入，居民医疗费用快速上升，“看病难，看病贵”“看不起病”等词语逐渐流行于社会各阶层；与此同时，暴力袭医事件频发，刺激着人们的敏感神经，而几乎每一次伤害，都让社会聚焦于医患冲突的“伤疤”。据相关部门统计，2006年全国医疗纠纷事件共发生10248件，到2016年全国法院共审结医疗损害赔偿案件20833件。医患关系紧张、矛盾突出，其成因很复杂，其中既有医患双方问题，也有医疗体制的弊端。日趋“畸形”的医患关系不仅严重冲击着医疗服务市场，也逐渐成为社会和谐的隐忧。健康的医疗环境、完善的诊疗制度、健全的保障体系成为医患共同的追求。

为了切实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并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2009年3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向社会公布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新医改运行以来，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我国医疗行业问题仍旧不少，医患冲突也时常发生。尽管医改是世界性的难题，但中国式医改有其独有的特征。本周，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邀请来自南京医科大学一附院陈伟贤主任和南京大学的高传胜教授组织群内专家、学者们，针对“从医患对立事件看医改方向”这一主题展开讨论。

## 观 点

**王建国（日本中京大学）：**

日本的医疗保障制度很好，患者自费部分每月超过一定额度后，就全数退还了。但是，日本的医保制度遇到一个极大的危机就是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国将很快迎来同样的问题，而且这个源于几十年来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性，恐怕要比现在的日本严重得多，中国应该如何度过这个槛？

**杜运苏（南京财经大学）：**

医保确实对老百姓生大病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医改表面是医患关系，实质是“钱”和“人”：“钱”方面，居民缴纳医保费在一定幅度增长情况下，政府也要加大投入，逐步扩大保障范围；

“人”方面，打通优秀医学院学生进医院的通道，同时提高医生待遇。

**赵正宇（南京市园林局）：**

医患对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医疗资源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

中国的问题不仅掺杂着总量矛盾，更多是结构性矛盾。总体而言，应该全面实施公共卫生资源的均质化：（1）空间布局上充分重视落后地区的医疗资源供给问题，鼓励发达地区医疗资源向中西部地区、大中城市向城镇农村转移，鼓励社会资本合法合规发展医疗事业，积极探索社区乡村医疗设施完善和水平提高的新合作模式。（2）进一步完善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建立一整套相对公平合理的异地就诊、就近就诊和分诊制度。（3）在医疗队伍建设上强制执行社区行医制度，保证医疗人员的人身安全，建立公平权威的医疗评价体系。（4）打破医疗卫生行业许多不合理的限制，改善医疗审批与监管工作，建设公平公正、高效透明、各方参与的开放式医疗管理体制。

**方向阳（中国财政杂志社）：**

医患对立如何产生：（1）信息不对称。专业知识很强的医方掌握完全信息为强者，患者处信息空白处弱势。（2）患者对医方的内心的不信任。（3）医疗供求的产品为患者的生命，患者本身痛感强烈敏感。（4）基本医疗保险层次水平远远解决不了普通患者痛感，大病医疗保障制度建立才是决定性的。（5）优质高端医疗资源严重分配不公、过往医患矛盾不公平的裁决在如同惊弓之鸟的患者心里造成心理定式。（6）当然也不排除的确存在个别不负责任冷漠唯利是图的医生，以及霸道患者。

问题可以归结为：人人平等的医疗（生命安全）需要与优质医疗资源供给的严重不平衡的矛盾。表现为按人群分割（比如官员军人群众）的医保制度体系，官僚式的公立医院和缺少监管唯利是图的私立医院供给，普通人的看病难看病贵及频发的医患冲突。

**陈伟贤（南京医科大学一附院）：**

医疗不能全公也不能全私，一般人和特殊人群医疗保障不能相差太多。医师要力争做道德的楷模。

**罗立彬（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医患关系问题的根本原因之一是医生服务供给不足，解决这个问题就有两个思路：（1）增加医生服务供给；（2）减少病患的需求，就是想办法少得病少跑医院，比如从教育出发培养人们从小健康的饮食和生活习惯，社区提供健康预防讲座和相关服务。

**盛馨莲（江苏省人社厅）：**

看病难看病贵还是大家都反映的问题，主要是重特大疾病患者的自付部分和自费费用还很高。所以，现在不仅要完善重特大疾病保障机制，还要继续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改善现在医院和患者只选贵的治疗倾向。

对于医务人员以及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现在大家比较关心备案制人员待遇问题，我们的观点是，同工同酬，按工资收入足额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同时参照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水平建立企业年金制度。

另外，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模式不应该一样，个人账户大量资金沉淀甚至被滥用，如何用活个人账户资金也是现在我们想研究的问题。

公共预防也很重要，工作做在前面。

**丁 可（日本亚洲经济研究院）：**

从在日本的亲身经历，提供两点借鉴：（1）社区的小医院，小诊所十分发达，基本上是小病去小医院，大病去大医院。（2）用法律将医院定性为非营利团体。医院的收入可以用来支付工资，进行与医疗相关的投资，但是禁止分红，彻底杜绝医院的逐利行为。

**彭本红（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医疗优质资源过度集中、医院过度注重效益、医生医德滑坡、患者对医生不信任等。

具体措施：（1）加大投入，逐渐使医疗服务均等化；（2）公立医院不能过度创收，强化医德考核；（3）开放公立医院为特权阶层提供的优质资源；（4）现行的改革继续推进，比如医联体、双向转诊、远程医疗、医生交流等。

**高传胜（南京大学）：**

（1）解决看病难与贵问题，无疑离不开医疗保险、医疗救助等医疗保障。目前，我国基本上实现了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全覆盖。但是，保险制度带来的第三方支付，客观上会造成医疗服务的过度需求，尽管现在通过患者支付保险起付线以下的费用、共同支付和共同保险，以及对医院的医疗支付方式改革来试图缓解第三方支付可能带来的道德风险问题，但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这也是医疗支出不断增长的不可忽视的制度原因之一。

（2）看病难与贵，本质上是看优质医疗服务的难与贵。政府通过大量投入武装起来的基层医疗机构实际上并未引起多少患者的兴趣，这也是现在推行分级诊疗面临的最大挑战。一味地模仿国外的分级诊疗做法，还忽视了我国公立大医院就是一个医疗服务产业集群的客观现实和百姓向往优质医疗服务的合理需要。目前，为了推行分级诊疗而限制公立大医院规模扩张的

做法，倒不如改为分拆公立大医院，让它们在竞争格局下重新成长壮大各自的产业集群。

（3）解决看病难与贵，还必须深化“放管服”改革，一方面让经验丰富的优秀医生能够开设诊所，另一方面让更多的社会资本能够投资兴办大型医疗机构。只有让个人诊所和社会资本投资兴办的医疗机构通过市场竞争机构吸引了优质医疗资源、分流了公立大医院的患者，才能真正实现医疗服务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龚 曦（江苏国科）：**

（1）医疗更多的是照护，治愈更多靠自体；（2）国外医改，同样困难重重；（3）医生内部的公平分配；（4）逐步将医院参与到医疗改革之中；（5）老百姓贫富差距要朝逐步减少的方向走；（6）有普遍真信仰，信仰带来平和的心态。

**颜银根（南京审计大学）：**

医疗的问题在于资源错配，导致高端医疗资源稀缺。下一步应该尽快推行分级诊疗：（1）降低综合性医院比重，提高专科医院和社区医院比重。（2）社区医院实行预诊分流工作，专科医院致力于专科诊治，综合性医院进行重急性疾病和多症状复杂疑难疾病诊治。

具体措施包括：（1）除社区医院外，综合专科医院不再设立普通门诊。除重急症外，需要社区医院检查结果和初诊结果才可到专科和综合性医院就诊。（2）化验检验影像科重点放在社区医院，专科综合医院仅保留部分化验检验影像业务，用于复诊住院用。（3）社区医院人才调配具有优先权，主要吸引原三级等综合医院等具有五年以上重急症经验医生，吸引最优秀的全科医生。（4）社区医院待遇和职业发展前景应高于专科和综合医院。

**梁 君（广西师范大学）：**

医患对立的一个原因是过度医疗，它有着强大的动因：（1）公立医院的财政拨款比例较低，医院的大部分运营费用必须自己解决；（2）过度医疗具有隐蔽性；（3）医疗事故的鉴定取证使医生不管大病小病先全面检查作为依据；（4）部分医生开大单，收药品回扣。

大多患者对过度医疗无法质疑或拒绝，只能对医疗效果寄以高期望，一旦这种期望落空，医患矛盾容易被激化。

**王 宇（南京大学）：**

现有体制下学习西方的分级诊疗制度，大力推广社区的做法，我个人并不认同。现有社区医院医生的水平难以恭维，而且短期内难以看到根本改善。大城市和发达地区推广社区医院，是一种资源浪费。农村和落后地区倒是可以慢慢推广，至少可以暂时部分解决农村看病难的问题。

在大城市，应该鼓励大医院建设分院，利用大医院的声誉和人才资源，建设多中心的综合

医疗机构。这样一方面可以解决大量医学院学生的就业，同时还能让他们在一个更好的医疗环境来提高自己的水平。与此同时，完全可以以大医院为载体，建立在线初步诊疗平台，既节省时间，又可以给患者提供优先的诊疗建议。

**洑福强（苏食集团）：**

美国所有医院的医生所开的全部处方必须在网上进入全美两个审方中心，二十四小时审方服务！这样的服务是双向的，对医生是一种监管，对百姓来说是一份安心。我国应该把审方统筹起来，或者根据我们国家的情况，分区域设立审方中心。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

医改应该把阵地前移，健全面向基层的基本诊疗服务，特别是农村的基本诊疗服务。

**刘根荣（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

农民对医保满意是因为农民福利水平得到切实改善；城市居民对医疗制度不满，是因为他们失去了免费医疗的福利。

**程 鹏（江苏巨和实业）：**

医药改革，关键是让不合理的药费支出降下来，让医生的收入正大光明地提上去。

**姜彩楼（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优质医疗资源的主体是医生。能否从医生的视角出发，比如放开个人诊所，鼓励医生通过个人服务提高自己的收入。

医疗分级的思路应该把一些技术含量不高的医疗服务下放到基层，比如常见病的诊疗、输液、一般伤口的包扎等。同时，名医生、大医生的诊所也起到调节的作用，个人可以通过支付相应的费用，得到名医生的快捷诊断、治疗。作为患者来讲，有了更多的选择权，小病小治，大病大治，优化社会医疗资源配置。

**王显东：**

（1）作为一个医生，他要提供最精准最合理的治疗措施，让患者得到最有效治疗是行医根本，也是保持和谐医患关系的基石。（2）医患和谐的核心：患者对诊疗的信任。（3）良好的医患沟通是医患和谐的保证。（4）领悟患者治疗成本是医患矛盾的分界岭。医者仁心，花最少的钱，提供最有效的治疗一直是我行医的根本。杜绝大处方，杜绝大耗材，让患者得到精准的治疗是医生赢得尊重的保障。（5）政府要加大对医院的投入。这是根本之策。

**陈心颖（福建省委党校）：**

三明医改导向是节约政府医保基金。从目前整体运行效果来看，政府医保基金开支确实节约了，但老百姓看病的负担比医改之前加重了。

三明医改的推动者没有根本摸清医疗规矩，把药品等同于一般商品，把病人等同于市场上的消费者。其实病人在用药的时候，跟消费者，完全不一样，病人倾向于用好药，哪怕贵一些，不是像市场上的消费者，要找便宜的商品。

**林学军（暨南大学）：**

（1）公共医疗不可以搞市场化。（2）政府应当加大对公共医疗的投入，培养更多合格的医生，充实到农村和三、四线城市，建立三级诊疗机制。（3）政府要增加医院的建设经费，增加医药的报销比例，保障人民群众看得起病，看好病，保证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4）政府应当提高医生的待遇，不得以医药收入考核医生，而应当以病人的满意度考核医生。（5）适当发展民营医院，多渠道解决医疗卫生问题，满足不同层次的需要。

**何 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医改至少存在三个制约前提：（1）人口众多。这是基本国情，特别是随着老龄进程加速，无论怎么改革，医疗资源紧张局面难以从根本上改观。（2）医疗属性，它是以身体与生命为对象，这意味着区别于一般性的商品供求关系。（3）社会性质。它决定了医改方向，其底线就是要保障居民基本医疗需求。这三大属性，规定和限制了我国医改的可能前景：政府保障基本医疗需求，以及由市场调节高端需求，可能还是比较适当。在机制设计上，重点还是解决流程中的信息不对称、不透明问题引发的过度医疗、浪费性医疗等问题。

过度医疗，既有利益上的驱动，又有职业风险上的自我保护动因。因为医疗，无法保证百分之百能够获得治愈。出于降低风险考虑，医生有动机进行繁复的检查，提供更为昂贵的治疗方案。故，通过第三方，转移医疗风险，降低医生职业不安，也许医生能提供更为恰当的、稳健的治疗方案。

看病难与看病贵应做区别性、差异化分析，并采取针对性措施。看病难，源于总需求庞大，短期无解。看病贵是否是一个问题，倒是值得商榷的：（1）有些病，的确贵，在国内外都要花费大量的金钱；（2）治疗方案不合理导致看病贵；（3）信息不对称，进入了莆田系医院导致的看病贵；（4）从实际情况看，纳入医保范围的治疗，基本上进入了看得起病的阶段。

**孙 军（淮海工学院）：**

我国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仍没有从根本上得以解决：医药分开并没有从根本上降低患者就医成本，医疗资源的过度集中增加了患者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很难持续增加下去。

下一步，应该尽可能多地发挥市场机制在医疗改革中的主导性作用，逐步全面放开市场准入、强化市场监管。政府负责老百姓的基本医疗保障，通过分级诊疗和医疗保险制度建设，最终实现我国医疗服务价格的降低、服务效率的提高，最大程度地实现公平医疗。

**张 慧（新疆经信委）：**

医改，导致看病贵、看病难、看不好病：（1）药品管理严重滞后，并与医院管理混为一谈。（2）医院管理失实，公立医院几十年没有增加，患者住不进院，医生忙的要死，医学生无法就业，恶性循化。私立医院发展，配套管理不健全。（3）医疗理念出问题，没有一个究其病因、实施医治、后续恢复的思路，现在治病就是一刀。

**张月友（南京财经大学）：**

从医患矛盾的几个表现看，虽然发生在医疗领域，其治理却大多游离在医改目标之外。比如，看病难和看病贵问题，不仅有以药养医的问题，也反映医疗服务供求失衡和地域差距大的问题，更有医疗服务供给的欺诈问题，其中，病人尤其痛恨供给欺诈（价格欺诈、诊疗不足和过度医疗并存），其中的服务欺诈问题就属于道德和法治领域的问题；还比如，伴随科技进步，西医临床越来越依赖机器设备，整个诊疗过程对病人缺少关爱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问题，则属于职业规范问题；再比如，医疗事故导致的医闹，是医疗技术不过关和纠纷处理失当导致，这属于医疗教育和管理领域问题；还有普遍的医患之间不信任问题是由社会媒体过度 / 不当宣传导致，这种则要归于传媒的治理问题。

**陈 东（安徽工业大学）：**

（1）进一步推进分级医疗，普通患者可以在社区医院就诊。（2）提高基本社区医疗医师的诊治水平，并改善提高其待遇。（3）加强常见病的宣传力度。（4）改善儿科医师的待遇，减轻其压力。目前儿科医师面临的待遇低、压力大没有得到改善，二孩的开放，使儿科医师短缺进一步严重。（5）科研能力强与临床要相结合。（6）加强医患矛盾的整治，严惩医闹，不要让医生付出的同时，还得承受医闹的压力，甚至付出生命。（转一个医生熟人的几点意见）

**王美今（中山大学）：**

消除医生、病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应是是医改的第一步。无论医疗体系如何改革，具体采取什么方案，核心都因该是维护病人对医生的信任。

一切方案的机制设计都应该围绕如何把医生收入与病人支出脱钩，医生的绩效考核应该只考虑医疗质量，而与创收没有关联。医生培养年限长，工作强度大，拿高薪是天经地义，总的来说应该让他们不搞创收（包括拿红包）就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但承担不一样的责任，达到不同的医疗质量如病人满意度，就有不同的收入水平。让医生去创收是产生医患矛盾的根源。

# 如何改进政绩评价机制，推进高质量发展

2017 年 12 月 28 日

**编者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必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创建和完善制度环境，推动我国经济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根本要求，有利于更好摆脱围绕速度判断经济发展的范畴，推动经济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会议同时指出，要创建和完善制度环境，推动我国经济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进展。因此，建立与高质量发展体系相适应的政绩评价机制，激发地方政府的发展积极性，对于推动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周，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组织群内专家、学者们，第一时间针对“如何改进政绩评价机制，推进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展开讨论。

**观 点**

**陈 柳（长江产经智库）：**

过去“制定指标——指标考核——形成地方竞争”的发展模式，是非常有效的，在新时代也要运用这种机制；但指标的确定和统计不再是 GDP 增长，而是要按照新发展理念确定新的衡量指标体系、统计方法和考核模式。

**踪家峰（南开大学）：**

（1）环境一票否决制，将环境当作计划生育搞；

（2）县长、市长、省长一律中央任命，500 公里回避制，退休一律回老家。

**蒋青云（复旦大学）：**

高质量发展不是一刀切的，不同地区对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感知都不一样；要让地方政府有自主决定发展质量目标的权力，让人大有考核的权力。

**陈心颖（福建省委党校）：**

试错容错纠错机制很重要，否则考核越多，干部纸上谈兵越多，数字造假越厉害！

**张中祥（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

关键要有不唯上、敢讲真话的制度和保障，否则上面讲 GDP，大家就搞 GDP 竞赛；上面讲环保，大家都跟着环保，缺乏总的协调考量。

**何 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在坚持高质量发展导向性考核的同时，尊重延续过去考核体系的合理成分。增加高质量发展指标，如，所在地区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本省民营企业 100 强、独角兽企业增量情况等指标。或建立高质量发展负面考核指标，如在本职能范围内出现重大低质量发展事故的或引发大规模民怨的，党政一把手三年内不得晋升。

如何把近期效果与长期效果结合起来，是关键。推动高质量发展，不关注即期效果不行，但是，只关注即期效果，就会短视化。真正的高质量发展，一定是既要只争朝夕，又要久久为功的。现在，只争朝夕的工作推动机制非常成熟，难点在于如何激励久久为功的基础性工作。

**孙 军（淮海工学院）：**

搞出一套绿色 GDP 考核体系比较靠谱。

**洪仁兵（上海银行）：**

有必要把各类民怨梳理一下，以此为基础优化指标体系，拼经济要转向拼民生了。

**林学军（暨南大学）：**

政绩的考核应当是全方位的考核：（1）上级考核，即纵向对比，看是否发展了，进步了；（2）横向考核，即同级之间相互对比，有什么优点与缺点；（3）下属考核，看百姓是否得到实惠，是否满意。

应当有个综合指数，如，人均寿命、人均住房面积、人均教育年限、人均医疗保障费用、人均收入、基尼系数、空气、水质优良率，等等。

**霍伟东（北京吉利学院 / 西南财经大学）：**

同时考核 GDP、空气质量优天数、人民群众患病率、意外死亡率减少。

**龚 曦（江苏国科）：**

（1）完全脱离 GDP 不现实，不过各地情况不同，横向比较科学性不如各地纵向比较更结合实际情况；

（2）民意满意度考核体系的建立与考核指标应用于组织人事的关联性探索，满意度指标细化到各部门各行业，权重配比分析；

（3）预算执行比例；

（4）财政数据公开比例；

（5）减少人为任性干预比例，发挥群众常态化功能。

**陈伟贤（南京医科大学一附院）：**

政绩的考核评价应当是全方位的考核评价，包括上级，同级，群众及私营企业国有企业，环保、GDP、群众生活满意指数一同考评。

**陈岸立（山东农发行）：**

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的核心是政治评价机制，要均衡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的关系，适当加大对下负责权重。

**姜德波（南京审计大学）：**

凡是有委托—代理关系、有上下级关系、有晋升竞争的，都有考核。新时代新发展理念下，推动高质量发展，考核指标必然要由唯 GDP 转向质量为主兼顾 GDP，即在考虑 GDP 的同时，关注创新、关注投入产出效率、关注技术进步、关注民生、关注环境、关注分配公平、关注社会和谐。

**郑江淮（南京大学）：**

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应是创新支撑，创新支撑就需要人才支撑，因此，高质量发展的要素应是激励人才，扩大人才来源，增加人才培育规模。

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中应该包括：（1）各地区大专以上劳动力规模和增长率以及来源构成；（2）各地区发明专利为基础的指标，例如每万人发明专利，等等。

**宋文阁（江苏省国资委）：**

（1）加强党对干部与人才的领导；

（2）建立健全干部选拔使用标准与政绩考核指标体系；

（3）加强履职经济责任审计监督，正确评价履职经济责任；

（4）加强各级官吏政绩考核，向广大人民群众公示考核等级；

（5）完善和优化新时代干部选拔使用标准，改革组织程序及相关法规，形成科学合理的高质量发展的绩效指标体系；

（6）发挥党委纪委两个主体责任，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形成干部能上能下的体制机制。

**刘志彪（长江产经智库）：**

强调高质量发展，就要适当减少政府的经济职能，增加其民生、文化、生态和社会职能。

道理很简单，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是决策者必须受硬预算约束。地方政府预算约束松弛，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老大难问题，也是粗放发展、债台高筑、可能发生金融风险的基本原因。适当减少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有利于其把精力集中在缓解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上，也有利于减税降费、推进扩大内需，更有利于确立企业真正的市场主体地位。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

（1）政绩评价机制应“优激励，强约束”；

（2）坚持五大理念指引，坚守民众认可底线；

（3）以“必须做 + 禁止做”为规定动作，以实践创新为自选动作。

**贾良定（南京大学）：**

地方政府的预算软约束，也会由于给企业带来制度软约束导致企业的一些软约束行为，从而导致企业竞争力不足，无法成长为世界一流企业。

**尹卫东（盐城市委组织部）：**

从组织工作视角，谈改进干部考核机制，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点在三个方面：前提是考什么、关键看如何考、核心在怎么用：

（1）指标体系上，强调区分度、体现差异性。改进干部考核机制首在优化考核指标体系：一方面，在考核对象上，应将市、县、镇各级区分开来，党委、政府班子区分开来，“一把手”、副职、中层、基层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在考核内容上，应适当减少经济性指标、增加民生性指标，更加重视对资源消耗、生态效益、债务化解等约束性指标的考核，加大美丽和幸福指数的考核权重，防止发展数据掩盖质量问题和成本问题，有效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和认可度。

（2）考核方法上，突出精准度、体现客观性。一要强化考核刚性。重点、关键事项要设定硬杠杠，科学划分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的界限。二要强化平时考核。经常性、近距离、有原则地接触干部，才能知根知底、知长知短。特别要突出群众口碑，干部业绩在实践、干部名声在民间，注重从“街头巷尾”“乡间俚语”中对考核结果进行再验证。三要强化综合分析。把干部实绩放到全局中去衡量和比较，辩证看待主观努力与客观条件、个人贡献与集体作用，准

确把握实绩“含金量”，防止“政绩平摊”“政绩垄断”等问题。

（3）结果运用上，注重多角度、体现权威性。一是突出在干部选用中的直接运用，将提拔重用的快与慢和干部的考核结果挂钩，对优秀的破格“插队”，对称职的比选“排队”，对基本称职和不称职的淘汰“掉队”甚至降职。二是提高在跟踪问效中的综合运用，建立考核结果反馈和正常谈心谈话制度，对后进干部进行教育勉励、提醒帮助，特别是对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蛮干，造成生态环境和群众利益重大损害的干部，不论在任离任都应严肃问责。三是加强在干部管理中的延伸运用，对在评议、民意调查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及时责令限期整改；对能力和素质不适应的干部，适时安排“回炉教育”或挂职锻炼，不断提高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总之，改进干部考核机制就是要透过发展质量看干部、着眼考核结果用干部、干不好重点工作调干部，在事业发展的赛道上发现、锤炼、选用干部。

**张月友（长江产经智库）：**

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要求政府的职能定位由经济建设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如果说，在 GDP 挂帅时代，作为市场的替代，政府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靠计划和长官意志，主要作用形式和路径是“服从、学习、贯彻、表态、反馈、修改到再服从、再学习、再贯彻、再表态、再反馈、再修改……”循环，官员的选拔、任用和监督工作也主要是围绕这一循环中的表现而展开。那么，在高质量增长挂帅的时代，官员的选拔、任用和监督工作应围绕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矛盾的程度而展开，应围绕人民是否满意的定量化指标而展开。

**高传胜（南京大学）：**

高质量发展必须以更好地满足民众需求为重要考核标准。在现行干部任命体制下，只要赋予人民对当地干部的罢免权即可实现上述考核目标。这样，可以将上下意见结合起来，让干部有为人民服务、满足当地民众需求的压力与动力。

**谈 镇（江苏省委党校）：**

根据各地不同发展阶段制定不同标准。

（1）环保方面：各污染区水、土、气等各项指标的明显好转；

（2）民生方面：人民满意程度；

（3）经济指标：从考核 GDP 转向 GNP，转向人类发展指数。

**夏网生（江苏省商务厅）：**

既要奖勤，更要罚懒。奖勤也许容易些，罚懒更难些；追责解决不了懒，可能还会滋生懒。

**孙 东（南京市审计局）：**

（1）强化考核与干部任用的关联，让考核业绩在干部选拔任用中充分发挥作用。

（2）总体上弱化“经济发展”指标权重，增加“民生改善”和“生态环保”指标权重，对于不同区域要实行差异化考核指标。

（3）在考核中，充分听取辖区群众意见，增加群众评议的权重。

（4）统筹设计各种考核，形成对领导干部考核合力。

**方向阳（中国财政杂志社）：**

研究建立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指标体系：选择其中关键的、影响力大、红线、底线指标作为约束性或一票否决性指标进行考核并向社会公布；增加像人民群众满意度等指标及其考核权重。

**刘根荣（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1）在推进精准扶贫工作的基础上，加大对社会不同弱势群体的保护力度以及必要的利益输送。

（2）加大科学技术创新。依靠技术进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能耗水平，降低污染排放，走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

（3）优化干部绩效考核机制。改变以往重 GDP 增速导向的考核机制，以绿色 GDP、人民群众是否满意为主要指标。

**陈 东（安徽工业大学）：**

善于听群众的反应：让群众真正评价发声，并且愿意听群众声音，愿意采纳群众意见。

**苏 健（南京市社科院）：**

考评需要公众参与，鼓励各地探索适应民情的地方民主机制，把当地居民的价值观纳入到当地的发展中来。

**颜银根（南京审计大学）：**

（1）高质量的发展应强调投入 – 产出，而不是仅仅关注产出。更少的投入获得更多的产品产出和更少的环境污染产出，更少的投入获得更优质的产出。

（2）高质量的发展应强调居民福利提升，而不是宏观经济水平。经济发展的目的是提高居民福利水平，一切与此相背离的发展都不是好的发展。

（3）高质量的发展应强调不足之处，而不是综合性的水平。如同对生活的追求一样，任何一个方面的不足都会大幅降低质量。因此，高质量评判标准应当以不足作为依据。

（4）高质量的发展应强调差异化评标体系，不应一刀切。比如，环保的权重在地方需要差异化，各地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同一标准明显有失公平。

**孙国民（南京大学博士后）：**

（1）发挥资产负债表的导向作用，特别是编制区域资产负债表和区域生态环境资产负债表，把这个表作为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考核的重要内容；

（2）突出动力、质量、效率变革导向，在注重生态环境指标的同时，增加创新指标考核；

（3）突出现代化指标体系的考核导向，特别是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发展导向；

（4）突出民生导向，经济和民生如人之两眼，不可偏废；且民生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出发点、落脚点和最终价值追求。

**宋常铁：**

政绩考评以公众评价为主，上级和组织考核为次。

**杨平宇（温州商学院）：**

改善绩效评价体系，必须要保证评价数据的准确性。

**杜运苏（南京财经大学）：**

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是多元的。

**彭本红（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高质量发展应是以生态环境和民生福祉为根本。

**唐德淼（无锡环研中心）：**

（1）确立“政绩”由谁评价的问题，规避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评价不能公允和科学的弊端；

（2）建立和形成多维的“政绩”评价体系，要涵盖主要的“利益”相关者，提供第三方科学评价的制度和机制空间；

（3）建立高质量发展的“政绩”指标体系，并严格执行该体系；

（4）改善执行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的主体责任性、连贯性、严肃性和规范性；

（5）推行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执行的问责制，甚至对重大决策终身追责；

（6）建立用人科学评价体系，用制度机制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动力。

**孙映祥（南京机场）：**

完善政绩评价体系中重要的一点是，把现有的考评体系真正落到实处。

**包 特（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要改进政绩评价机制，推进高质量发展，也许可以考虑用效率指标代替总量指标作为评价标准。建立一个类似投资回报率的指标，对地方政府每一块钱借贷、开支和投资的回报作出长期跟踪记录和评价。这不但可以降低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片面数量增长而进行低效率投资，也可以增加经济总量较大地区和较小地区的发展绩效可比性。

**杨 锐（苏州大学）：**

用经济发展率指标代替经济增长率和效率。经济发展率衡量一个城市的新产品和新服务的价值与基准年所有商品价值的比值。这可能是衡量一个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比较好的指标。

**郑登元（南京审计大学）：**

（1）先确定范围，在哪一些领域高质量呢?

（2）建立衡量的指标，标准的细项定出来，让大家有一个遵循的标准；

（3）多久评价一次呢？如果时间短，大家容易短视，如果时间太久了，有的人都已经调离开了，也不容易评价了。

（4）标准，谁来定？是一个委员会的组成或者是其它方式。达成结果由谁来确认？达到什么程度的给予什么奖励，达到什么程度之下的给予什么处分。

**张建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事事立法，每一项决策都要法律化，变成硬性规定。高质量发展的程度，都要依法裁定。

**刘昌伟:**

（1）要有刚性的数字，工农业、服务业等经济指标，卫生健康指标，就业率指标等；

（2）顶层规划和设计能力，对前任规划及时校正，对区域未来长期发展规划能力；

（3）民生改善提高情况，可以通过家庭收支提高、公共事务改善如教育，进行 360 度考核；

（4）规划、政策落实情况，核心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提高什么水平；

（5）应急能力，对于突发和规划外事务处理的有效性。

**徐 琴（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对于当下中国而言，有质量的发展，就是依靠创新驱动的发展、改善民生的发展和环境友好的发展。

（1）考核和激励都是线性的、单向的、单一模式的自上而下的贯彻和落实，这与创新发生的内在逻辑和机制完全相悖。因为创新究其根本是创造性活动，只能来自于市场和基层的发散性的探索。创新，无论是科技创新、产业革新还是制度创新，都只能在轻管制、去考核的宏观政策环境下发生。

（2）民生改善的发展，也不能依靠自上而下的考核，而需要转向依靠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和公众满意度测评。通过去考核或者简化考核，逐步引导民生建设从目前的官方考核导向转为公众需求导向。

（3）通过考核，防止各个主体规避环保责任；倒逼企业摆脱旧的路径依赖，更多地选择环境友好型产业以及绿色生产方式，实现发展转型。

**刘晓昶：**

官员评价考核不应由上（级）对下（级）进行考核，而应是针对高质量发展目标，由官员公开认领各项子目标任务，公开由群众评价考核，彻底改变各级官员“只唯上”的考核体系。

**唐德淼（无锡环研中心）：**

（1）确立“政绩”由谁评价的问题，规避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评价不能公允和科学的弊端；

（2）建立和形成多维的“政绩”评价体系，要涵盖主要的“利益”相关者，不能只唯“上”，提供第三方科学评价的制度和机制空间；

（3）建立高质量发展的“政绩”指标体系，并严格执行该体系，不能朝令夕改，通过建章立制，甚至立法，强化“刚性”；

（4）要改善执行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的主体责任性、连贯性、严肃性和规范性，不能因换届、换人等，而随意改变“指标体系”的执行目标；

（5）推行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执行的问责制，甚至对重大决策终身追责，杜绝只为“政绩”的短视行为，从而破坏高质量发展的稳步节奏；

（6）建立用人和选“官”的科学评价体系，要任人唯贤、唯能，通过法律规范约束为“官”行为，建立公务人员尤其是官员的“能者上、庸者让、废者下”的选拔和退出机制，用制度机制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动力。

扫一扫
关注“长江产经智库”